



[澳] 理查德·波斯沃思 ★ 著
李宏强 ★ 译

最新版修订本

墨索里尼

A BIOGRAPHY OF MUSSOLINI

世界上最经典的墨索里尼传记版本
意大利现代史顶级专家波斯沃思代表作

国际

墨索里尼

墨索里尼

MUSSOLINI



皮波人物12
· 军政馆12

我们尊敬的恺撒曾在这里统治过整个欧洲，这里的每一块石头都表明和提醒着这件事，请你们一定要坚信，我们过去的命运必将成为我们现在的命运。

——墨索里尼

非战不足以奋发有为，非战不足以改变平民政治所养成的人民的惰性。

——墨索里尼

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领导者，而他的内心想法与他在现实生活中的谦卑地位却让他产生了一种被夸大的自怜和命运不公的感觉。

——墨索里尼年轻时代的友人安杰利卡·巴拉巴诺芙


Sinoread
创造悦读生活

建议陈列类别：传记·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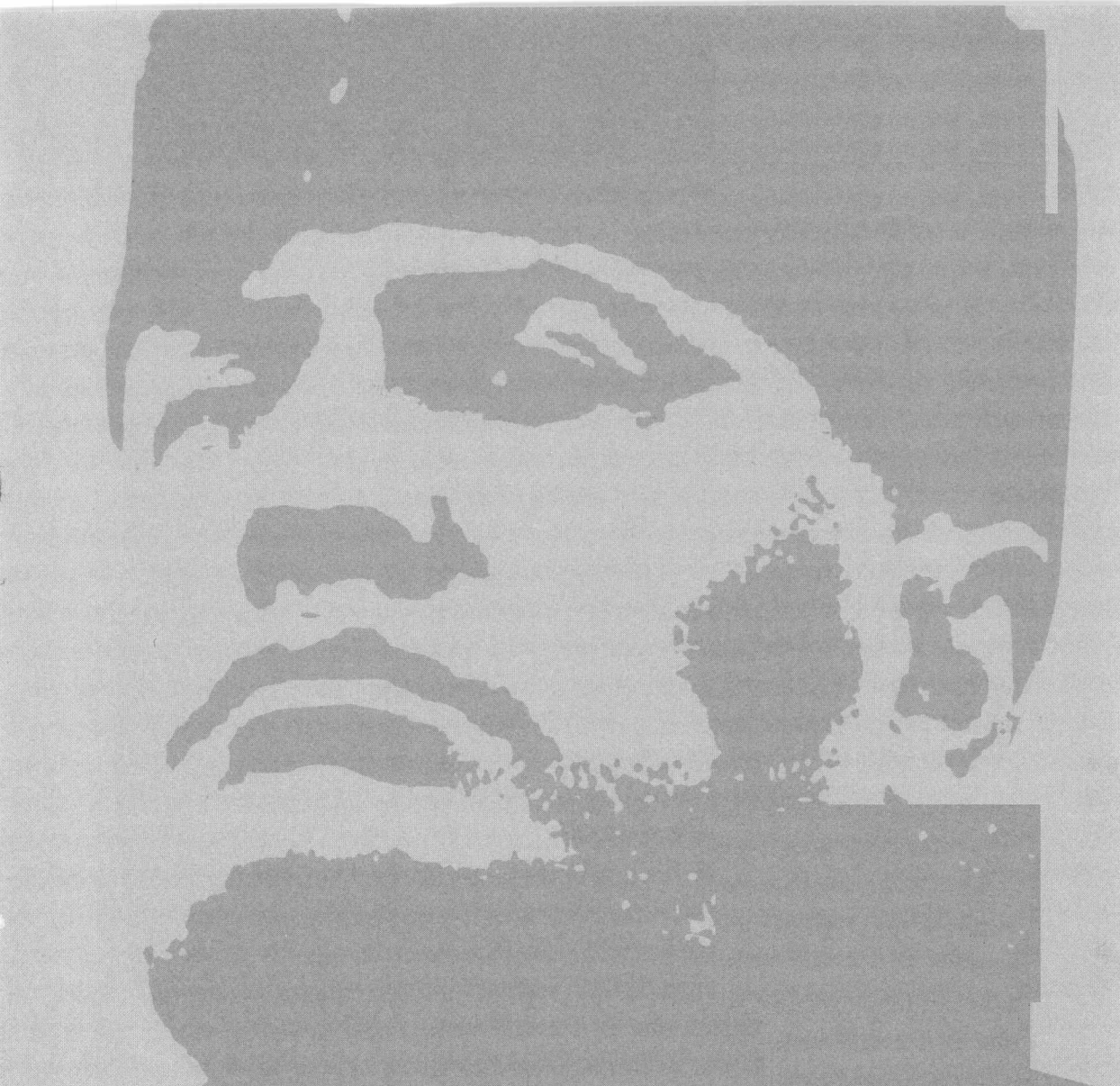
ISBN 978-7-80173-322-1



01 >

9 787801 733221

定价：34.00元



[澳] 理查德·博斯沃思★著
李宏强★译

墨索里尼

A BIOGRAPHY OF MUSSOLINI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墨索里尼/[澳] 博斯沃思著;李宏强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4.10
ISBN 978-7-80173-322-1

I. 墨… II. ①博…②李… III. 墨索里尼, B. (1883~1945) - 生平事迹
IV. K835.4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97755 号

Copyright: ©2002 Richard Bosworth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4-2041 号

版权 © 为 Richard Bosworth 所有。通过安德鲁版权代理公司, 其中文简体字
版权已归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所有。

墨索里尼

作 者 [澳] 理查德·博斯沃思
译 者 李宏强
责任编辑 韦尔立
策划编辑 李治威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16 开
24.75 印张 43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2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73-322-1
定 价 34.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0995 传真: (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作者序

朱塞佩·普雷佐利尼在他的战争日记中写道：“澳大利亚人虽然取得了托布鲁克，但他们在世界历史中却并没有什么地位。”于是，1941年1月，他光荣地退居到了哥伦比亚大学附属的意大利学院。朱塞佩·普雷佐利尼是一个知识分子，是墨索里尼年轻时代的资助人，他在作品里对意大利参加的法西斯战争表示了厌恶。对于任何厚颜无耻地对意大利的现代历史表示谅解和同情的澳大利亚人来说，他的作品可能是个令人扫兴的东西，更不能说是为领袖贝尼托·墨索里尼这个在1922年至1945年间的意大利领导人精心打造的作品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我也有幸来写意大利历史。并且，从多个方面来讲，我把一生的研究成果都总结在这本新的传记中了。

从我的名字就能看出，我是一个英裔澳大利亚人，天生与意大利就没有多少关系。然而，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开始阅读我父母的藏书，并且从中发现了一本由贝尼托·墨索里尼写的《我的自传》。也许我的父亲（他在1933年至1938年之间在剑桥大学的卡文迪什实验室工作，是一个研究型的化学家，并且在政治上有些模糊地倾向于左翼）是在1935年买的这本书，可能是有感于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给领袖墨索里尼带来的恶名吧。我的父亲后来死于心脏病，当时我还小，还无法与他讨论这些问题。但是我母亲后来回忆说，1935年11月，她曾和父亲到威尼斯度假（尽管意大利当时还遭受着经济制裁，而意大利人对制裁也是愤怒不已，因此当时并不适宜到意大利去旅行）。当他们走在街上的时候，那些不可思议的当地人竟然向我父亲身上吐口水（父亲金发碧眼，一副“英国人”的模样），并且骂他是“英国狗”。母亲也从政治上对这些事情进行了分析。1936年和1937年，他们还曾到纳粹德国度假，母亲对在德国的假期倒是有着很愉快的回忆：那里的啤酒和蛋糕都很好，交通情况也很好。

我们家住在悉尼郊区的上层中产阶级居住区。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数以十万计的意大利人就移民来到了澳大利亚，很多年我对他们都不太理解。虽然我从小就对历史

有些入迷，但那时并没有什么事情注定要让我以后成为一个研究意大利的历史学家。1961年，我到悉尼大学上学，主修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史。对我激励最大的老师是埃内斯特·布拉姆施泰德，他是为数不多的为逃避纳粹而到澳大利亚来避难的犹太人知识分子之一，著有一本戈培尔的传记。他向我保证将送我到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且哈里·欣斯利将会担任我的导师，而我的研究方向将是20世纪的国际关系。

20世纪60年代是“旧式外交历史”的十年，像许多做研究的学生一样，一开始也对“一战”的发生进行了一些研究。由于外交档案一般要保密50年，因此，我们这些博士生们可以看到一些新解密的档案材料，这些零散的档案也许可以显示出1914年（以及其他时间）的战争是如何发生的。欣斯利当时带的学生有将近一个连，分给我的任务是评估英国对意大利的政策。于是我就去了英国公共档案馆，它当时还在伦敦的档案街，并且开始阅读伦敦和罗马之间的外交信函。

欣斯利亲切地给我提出建议说，“文献”有时并不是获取历史知识的起点和终点，虽然我研究的课题是“英国史”而不是“欧洲史”，但是如果能够到罗马待上几个月的话，对我将会大有裨益。于是，1967年9月，凭着年轻时的自信和学得不怎么好的意大利语，我和妻子米卡尔到了罗马。经人引见，我们见到了意大利最有资历的外交历史学家。但是他是重要人物，没有时间来接待像我这样不知名的来访者。但是，他还是安排他的助手朱斯蒂诺·菲利波内·陶莱罗来照顾我们在那里的生活。我们在罗马度过了4个月美好的时光，我也到包括现代历史图书馆在内的许多图书馆查阅了相关资料。我们爱上了罗马，在我们看来，它确实是一个永恒的城市。当然，我查阅的主要是意大利自由党统治时代的相关资料，但我有时也受到吸引，想多了解一些有关墨索里尼和法西斯主义的知识。现在，我很喜欢有关墨索里尼的一些原汁原味的作品，例如他的勤务兵昆蒂诺·诺瓦拉所写的回忆录（尽管内容有很多的可疑之处，并且还是找人代笔写的）。

我的生活遇到了一个转折点。尽管我最终在剑桥所写的论文的题目是《英国对意大利的外交政策，1902~1915》，但我已经决定要研究意大利的历史了。1969年，我作为一个年轻讲师回到了悉尼，并且下定决心要写意大利的历史。我为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以便在澳大利亚每年的长假期间都到意大利去访问。这个借口就是，当欧洲处在冬季的时候，意大利却是很宜人的季节。另外，在那里可以接触意大利人，那里的档案也是公开的，游客的人数也有限。

从1998年签订合同算起，我写这本传记只用了三年时间。但是，它反映的却是我近30年的研究成果。因此也可以这么说，我欠了许多历史学家、许多档案资料和许多图书馆30年的债。所有这些我已经无法一一提及了，但是有一个情景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那是1970年的12月22日，我第一次到意大利国家中央档案馆。这个档案馆是一座法西斯式的建筑，位于“罗马万国博览会法西斯示范郊区

内”（我此前曾去外交部档案馆，位于罗马市的另一边，但同样是一座法西斯式的建筑物。附近还有具有纪念意义的法西斯帝国广场，后来改名为意大利广场）。在意大利国家中央档案馆里，我阅读了许多积满灰尘的有关意大利自由党政府的论文。意大利的档案馆与别国的不同，那里总有人在不停地低声交谈，抽烟的人把室内的空气弄得污浊不堪。突然，里面的学术研究活动停止了，每个人——包括学生、教授、档案保管员和取文件的人——都聚拢到了一张放着好多杯意大利苏打白葡萄酒以及节日糕点的桌子旁。一位男士发表了一个演讲，向所有的人表示祝贺，强调学术工作要发挥集体的优势，并且祝我们圣诞节快乐。后来我才知道，那位男士就是档案馆的馆长科斯坦佐·卡苏奇。在这次小型的庆祝活动中，我很清楚地发现了人性中的博爱精神，我也永远不会放弃对它的希望和期待。

我只在中央档案馆里查了一天的档案，我最喜欢的图书馆是位于拉文纳的奥里亚尼图书馆，那里有很多有关法西斯的相关资料，还有但丁·博洛涅西和所有很友好的工作人员。在那里，我阅读了大量在写这本传记时用到的背景资料。相比之下，位于罗马的意大利国家图书馆却很糟糕。它刚刚经历了开销不菲的技术改造，并且有严格的保密要求，所以多年来在它的入口处就看不到什么书。

在开始写这本书“还债”的时候，我很难——提及历史学科领域内的那么多同事。人太多了，有的是我在学术上的同事，或者是学生，有的只是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需要保持对学术的一种热情，他们在这方面对我帮助很大。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写了一些书，这些书也是我原来想写的，因此我非常爱看。他们的思维方法也是我努力学习并渴望自己能够企及的。他们热情友好，在物质、知识和精神上都给了我许多帮助，有些人还热情地就我的写作风格和观点进行了推敲。由于不能列出所有这些人的名字，所以任何一个名单都可能失偏颇。但不管怎样，我还是要特别感谢下列朋友：罗杰·阿布萨隆、洛雷塔·巴尔达萨尔、托尼·巴克、露丝·本吉亚特、朱迪·伯曼、马丁·布林克霍恩、朱迪·博尔顿、埃德蒙·博思沃思、玛丽·博思沃思、弗兰克·布勒茨（已故）、托尼·卡希尔、保罗·科纳、特里莎·克劳福德、詹弗兰科·克雷夏尼、帕特里齐亚·多利亚尼、尼克·杜马尼斯、希拉·菲茨帕特里克、弗朗西斯·弗拉纳根、奥斯卡·加斯帕里、迪克·吉尔里、安东尼·杰尔比诺、格雷厄姆·哈里森、哈维一家、玛丽安娜·希克斯、雷托·霍夫曼、厄尼·琼斯、朱迪思·基恩、大卫·洛温塔尔、菲利普·马登、穆里尔·马奥尼、法比奥·马卢萨、本·梅瑟、米内利一家、乔纳森·莫里斯、彼得·蒙蒂思、迈克尔·翁达吉、路易莎·帕塞里尼、罗斯·佩斯曼、洛伦佐·波利佐托、大卫·里特、吉诺·里佐、基思·罗宾斯、焦万纳·罗塞利、德里克·施罗伊德、恩里科·塞拉、格伦达·斯卢加、埃德·史密斯、乔纳森·施泰伯格、罗布·斯图尔特、卢西亚诺·托西、瓦西姆·格雷厄姆·怀特、沙恩·怀特。

同样，我还欠着许多大学的债——圣约翰大学、卡莱尔大厅学院，剑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牛津大学、位于罗马的英国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的意大利学院（在那里的时候，我曾努力地不对普雷佐利尼的灵魂太过无礼）——这些大学都很欢迎我去访问。在澳大利亚，人性的博爱正在遭受一些信奉经济唯理主义的人的破坏。国家研究委员会给我安排了一个舒适的住处，并且准许我两个学期不用授课，于是我利用这段时间来构思和写作这本书。这本书主要是在2000年至2001年的夏季在澳大利亚写的，那是一段特别令人高兴的时光。珀斯的天气总是很晴朗，每天早上一起床，我就径直走向计算机，用古老的研究方法为人们提供信息，带着文学创作的神秘写出篇章，世界上还有比这更美妙的事情吗？可能只有等到写另外一本新书的时候才会忘记这种感觉吧。

有些读者可能会为我这种温和的态度感到吃惊，因为我曾在一些场合参加过有关如何解读意大利历史的激烈的学术论战（在地处偏远的澳大利亚，获取史料方面的知识总是要比获取档案史方面的知识更容易出成果）。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左倾到80年代和90年代的右倾，意大利共和国经历了多次痛苦的转变，而这一过程在2001年5月的时候达到了顶点，右翼领袖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成为了意大利的新总理。所以，在研究意大利历史时不带任何政治立场是不太可能的。直到前几年，有一点才变得非常明显，那就是历史问题，尤其是对墨索里尼、他的法西斯政权及其事业、历程和结局的理解，对于许多意大利人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我还处在天真和单纯的年纪的时候，我发表了一篇很长的专论，对意大利1914年以前的对外政策提出了批评。之后我发现，意大利最权威的保守派历史学家罗萨里奥·罗密欧在一份报纸上把我痛斥为一个“仇恨意大利的人”。他最好还是去评估一下自己来自“博坦尼海湾”的遗产，而不要参与讨论意大利的自由主义。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结束历史”的时代（不管各种非理性的原教旨主义还有什么样的潜在力量）。源自启蒙运动（它相信人可以通过获取理性知识以及社会行为而实现完全性）的各种意识形态以及它们的后续表现似乎已经彻底失败了，市场规律也是如此。意大利的左派以及一些所谓的“雏菊派”或者“向日葵派”等新的政治集团也在一个“橄榄树联盟”的领导下试图找到“第三条道路”，所以，我也努力地避免让自己过于不合群。这种环境下，在我签订合同和开始写作初稿之间的那段时间里，我也被诊断出了心脏病，而正是同样的疾病夺去了我父亲的生命。但是现在技术发展非常迅速，所以我与其他五十多岁的人一样，感觉运气还不错，而不像我父亲那么不幸。我还固守着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理念和理想（并且还可以追溯到1789年），因此我对科技的进步有一种矛盾的心理，同时对当时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也混杂着蔑视和担心，不管是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带有一种对立的感觉。

我将让读者自己来决定是否认同这本书中所讲述的事件和态度，或者说让他们确定是否值得认同。我应当承认的一点是，从某种程度上讲，我是试图用“怜悯的眼光”来看待墨索里尼的。我相信读者们将会发现，我是把墨索里尼当成一个恃强凌弱的人、一个怯懦的人和一个失败的人来写的，并且，虽然写出了这本传记，但我并没有转变成一个领袖或者法西斯主义的崇拜者。墨索里尼的“朋友”阿道夫·希特勒已经有被人们广泛接受的想法，但墨索里尼则不同，我也确信，他与其他许多人并没有太多的不同之处。在他那一代人中，除了人性的仁慈之外，他的极度的虚荣和自负、他的令人吃惊的大男子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想、他犯下的众多疏忽和罪过、他的悲观的达尔文主义是许多人都有的。并且，不管有没有这种仁慈，现在我们很多人也有他的这些思想。

最后感谢两个人——一个是克里斯托弗·惠勒，最机敏和最给人以勇气的编辑；另外一个迈克，她在生活中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我，给我无限的欢乐，我也要把这本书奉献给她。

目 录

CONTENTS

作者序

引言

第 1 部

躁动青春

- | | |
|------------------|----|
| 1 复仇与贝尼托·墨索里尼 | 13 |
| 2 墨索里尼家族和少年时的贝尼托 | 32 |
| 3 移民和社会主义者 | 49 |
| 4 《阶级斗争报》 | 66 |
| 5 战争和革命 | 86 |

第 2 部

夺取政权

- | | |
|-------------|-----|
| 1 法西斯最初的几个月 | 109 |
| 2 法西斯夺权 | 126 |
| 3 政府 | 147 |
| 4 强行独裁统治 | 169 |
| 5 上帝所赐的人 | 190 |

目 录

CONTENTS

第3部

权力高峰

- | | |
|--------------|-----|
| 1 鼎盛时期的墨索里尼 | 213 |
| 2 阿道夫·希特勒的挑战 | 234 |
| 3 在埃塞俄比亚建立帝国 | 255 |
| 4 欧洲的危机 | 276 |

第4部

日暮穷途

- | | |
|---------------|-----|
| 1 第二次世界大战迫近 | 301 |
| 2 纳粹德国的不光彩的帮凶 | 322 |
| 3 第一次落败和无力的复兴 | 344 |
| 4 贝尼托·墨索里尼的阴魂 | 368 |

引言

在20世纪上半叶欧洲的政治家中，有哪一位可以让他的国民为他写出这么多的哲学和文学作品，不管其中包含的是批评还是祝贺之词？有哪一位能够在身处重大的危机并且自己的健康状况明显恶化之时还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摆着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作品，并且上面还有他自己所做的评注？谁公开宣布他喜欢树木并且急切地询问他的官员风暴给环境造成了什么样的破坏？谁在当政之后还在席间闲谈中迷恋于探讨知识界的前辈？谁至少在口头上声称他因为他们的专业精神和拒绝迎合潮流的态度而尊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并且敦促他的政党要“容忍这些教授”？哪一位看起来总是非常愿意接受采访，并且在采访中特别喜欢讨论当代的政治和哲学思想？哪一个著有多达44卷的个人文集？哪一位曾声称自己从来没有被钱弄脏过手，并且所说的话基本上是真的？谁能在交谈中使用除了自己的母语以外的三种语言？又有谁对自己的女儿非常关切，在女儿结婚和第一次怀孕之后，还经常给身居国外的她写信，并且有时只是讲一讲国家足球队取得的胜利给自己带来快乐？

这些问题可能有些令人感到吃惊，但是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贝尼托·墨索里尼，从1922年（或者说1925年）到1945年（或者说1943年），他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领袖，也是意大利的独裁者。以前有关他的英文版的传记以及许多同时代的人都认为，墨索里尼其实是一个既天真又愚蠢的人。正如标准的英国绅士（绅士有时候也会说出一些有点恶毒的话来）安东尼·伊登所说的那样：“我觉得，墨索里尼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强盗，他的话全是胡说八道。”杂乱、吹牛、炫耀性的自负、卑鄙残忍和无能——这些都是与墨索里尼联系最紧密的词语，这些东西反映出的墨索里尼是一个有趣和可笑的人，而不像希特勒等其他的独裁者那样是一个令人恐怖的人。希特勒等人才是可怕的极权主义暴君，而尽管墨索里尼是第一个宣布要建立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人，但实际上他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恺撒”，充其量不过只是一个小丑而已。

这本新传记的读者可能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然而，当读者们开始阅读此书

的时候，你们应当注意，长期以来对领袖墨索里尼的批评性的作品所反映出的不仅仅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少数民族的种族歧视，还有对“南方人”和“地中海人”的歧视，连我的一些澳大利亚朋友也把意大利人 (Italian) 称为“Eyetalians”。关于失败、浅薄和罪恶的假设经常出现在有关墨索里尼的英语文献中，好像在意大利以外的国家里根本就不知道这些失败一样。墨索里尼通常情况下被评价为“只不过是一个下三烂”，这好像是说，在其他更幸福的、更靠北面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领土上，那些统治者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将一直是一流的男人（和女人）一样。

然而在意大利，想要表现这种优越感就不太容易了。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即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意大利的左翼——通过这种或那种的方式都与意大利共产党（在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共产党本身在选举中赢得的支持率也在不断地增长）有联系——在自己的身上烙上“抗击法西斯的神话”。按照这种思维方式来解读20世纪的历史，意大利在1922年至1945年间的政治是一种恶毒的暴政，墨索里尼的独裁统治也让绝大多数的意大利人吃尽了苦头，而意大利与最邪恶的纳粹德国的结盟也是很自然并且是不可避免的。同样，意大利卷进“二战”这场惨绝人寰的战争和种族主义的大屠杀也是不可避免的。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也最好是用“法西斯主义的模式”来理解了，而这样也将会发现在这两个政权、两个“有感召力的”领导人之间有许多相同之处。这是一个已经被讨论了很多并且还可以继续进行讨论的模式。对于“战后”的意大利左翼来说，这种对历史的解释方法在现代的政治生活中的用处是最大的。它可以帮助阻击富人的贪婪、男人的大男子主义以及复苏的民族主义的诱惑力。它还可以赋予工人阶级、工会组织、社会人道主义以及相关的组织、机构和理念以特权，而这些正是法西斯主义所反对和努力压制的。

同样，也有很多的意大利人不同意左翼的这种世界观，也绝不认同对法西斯历史的所有方面都进行谴责。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一些所谓的“反反法西斯主义者”及其支持者，如为墨索里尼写传记的异常固执的作家伦佐·德费利切。早在50年代，两个前法西斯分子焦尔焦·皮尼和杜伊利奥·苏斯梅尔就写了4卷有关领袖的研究作品，并且对他表现出非常同情的态度（现在对学者们仍然很有用）。德费利切为墨索里尼所作的传记更长，总共7本书，加起来超过6000页，对墨索里尼的一生做了细致入微的描述。这套书从1965年一直出版到1997年，最后一本还是作者死后才出版的。用斯大林充满敌视的话来说，德费利切是属于那种“档案老鼠”类型的历史学家。他深入地阅读了大量的政府文件，特别是保存在罗马国家中央档案馆里的文件——这些档案被保存在一座原本用于举办“罗马世界博览会”的建筑物里，而这个展览是为计划在1942年庆祝法西斯统治二十周年而建的。因为德费利切明显不像左翼那样对领袖不友好，并且又是兢兢

业地地为领袖写传记，所以他对当时留存下来的法西斯分子们具有像磁铁一样的吸引力，他们也因而把自己保存的资料和日记拿来给他看。完成这些资料研究工作之后，德费利切开始写作出版该套传记了。尽管他的作品冗长而有些纷乱，而且他自己也做了一些编辑加工的工作，但他为后人留下的仍然是一部杰出的遗产，也是后来为墨索里尼写作传记的作家所无法回避和忽视的。

德费利切是墨索里尼的一个解释者，因此我们在读他为墨索里尼所写的传记时需要谨慎小心。特别是在传记的最后几卷书里，他经常设法为领袖进行开脱，也开始轻蔑地认为新闻工作者的一些文章是肤浅的“反法西斯的标准文本”。他还毫不谦虚地声称，他自己得出的是唯一可能的结论。但是他的作品中包含一些引起激烈争论的内容，比如，他强调墨索里尼的政治是“进步的”，还为墨索里尼的坏运气感到遗憾，因为他没有能够说服希特勒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心放在地中海而不是苏联。就在德费利切去世前不久，他这部传记中所反映出的对历史的态度成为意大利当时正在兴起的新的右翼势力可以加以利用的东西。意大利民族联盟中有一些成员自称为“后法西斯主义者”，他们对德费利切大加赞扬。民族联盟的前任领导人詹弗兰科·菲尼声称，墨索里尼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民族联盟的现任领导人是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这位亿万富翁在努力做一名政治记者方面要比墨索里尼更胜一筹，他成了政坛上一个带着令人恐怖的“鬼性”的传媒业巨头。在现代意大利，贝卢斯科尼在许多方面都制造了新闻，简直是太多了。

虽然我远在澳大利亚，但是与其他大多数的政治事件一样，这些事情也同样让我感到心中不安。我可以无礼地说，对于德费利切为墨索里尼所作的传记来说，我并不欠它什么债。我的作品中的脚注并没有过多地引用他所写的传记中的细节和资料。在我的研究中，我所采用的更重要的模式既不是英国人也不是意大利人为墨索里尼写传记时所用的那种模式（更不是这种新的、冗长的“德费利切”模式）。我对墨索里尼的描述是以我对欧洲历史的理解为基础的。

当克里斯托弗·惠勒友好地建议我可以尝试对墨索里尼进行一个全新的分析时，我有些犹豫。我以前从未写过传记，并且认为（现在还这么认为）自己在更大意义上属于一个“结构派”或者说“功能主义者”历史学家，渴望去探究一些政策的“社会根源”；而不太是一个“意图主义者”历史学家，相信伟大人物确实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伟大的“发电机”。我之所以对这些事情还有一些兴趣，是因为我受到了20世纪80年代一些有关纳粹德国的作品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教授20世纪欧洲历史的人的养老金都是希特勒给的，至少澳大利亚的情况是这样的。在35年的教师生涯里，我在教授欧洲历史时也在课程中偷偷地加入一些意大利的历史，而鉴于纳粹德国的恐怖和神秘，这也是学生们所喜欢的。当我沉浸于有关德国的历史文献中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些引起争论的话题很有吸引力，包括希特勒是否是一个“软弱的”独裁者，他的权力是不是也受到了一些限制，他的

理论的起源是什么，纳粹这种运动更多地是从“上面”强加的还是从“下面”涌现出来的。因为我还必须讲授苏联的历史（在从希特勒那儿领取养老金的同时也没耽误从斯大林那儿再获得些收益），我也阅读了希拉·菲茨帕特里克等人所写的有关苏联历史的一些作品。这些作品写得很好，同样也写了苏联历史中一些问题，特别是有关在当时复杂并且模糊不清的苏联社会中所谓的“极权主义国家”所具有的机能的问题。

因此，我在一开始就注重把墨索里尼放在他当时所处的社会中去进行研究，并且一开始就对“伟人”以及自由主义的理论（也是法西斯的理论）持一种基本的怀疑态度，这种理论认为每个人都潜在地拥有实现他或她的意志的自由。我确信（同时，我也告诫自己不要有愚蠢的想成为“伟大的传记作家”的野心），“我的”墨索里尼能够告诉我们许多有关一个特定个人的罪过，同时，他也会告诉我们许多有关意大利社会（以及意大利人）的情况。

在准备写这本传记之前，我也阅读了一些最近出版的有关20世纪主要的政治家的一些传记。其中有两本传记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一本是保罗·普雷斯顿为弗朗哥将军所写的传记，书中精细地分析了弗朗哥在长期统治西班牙期间是如何运用自己的权力的。我借用了他书中的一些主题来与墨索里尼进行了比较，包括普雷斯顿强调的弗朗哥的“高深莫测的实用主义”，他的“避免做出承诺以及……习惯于含糊其辞”。普雷斯顿告诉我，弗朗哥没有忘记使用障眼法，这也让后来的历史学家们非常困惑——“在一生中，他经常改写自己的人生故事。”在他的书中，出现了很多个弗朗哥。（我也问自己，我的作品中需要有多少个墨索里尼才算合适。）同时，至少是根据普雷斯顿的看法，的确存在真正的历史演员。弗朗哥的权力“可以与希特勒的相比，比墨索里尼的权力要大”。普雷斯顿认为，弗朗哥“几乎是在瞬间就能够确定一个人的弱点和/或价值”，凭着这种能力，他才得以掌握国家权力长达40年，并且“技巧完美，他能够狡猾而又敏锐地觉察到人性的弱点，因此能够坚决地打击他所有的敌人，同时又能保持民族主义者联盟的成员对他的忠诚。”不管他对待敌人是多么地残忍，也不管他的世界观是多么地空虚贫乏，但他的确是一个强力的独裁者。按照普雷斯顿的说法，弗朗哥最著名的话是1954年对波旁王室的继承者唐璜所说的：“我永远都不会完全相信任何人。”正是由于这种明智的小心谨慎，对他来说，“西班牙……很容易统治。”细想一下，普雷斯顿得出的结论是，弗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确实有一个（坏的）伟人，这个人快乐而残忍地实践着自己的自由的意志。

我的假设和偏好得到了一些纯化，于是我又开始读伊恩·克肖为希特勒所写的新的极好的传记——有很多个午后，我都把正在写的墨索里尼的传记放在一边，高兴地阅读克肖作品的第二卷（2000年底在澳大利亚才见到）。但是，当我在构思自己的作品时，我最感兴趣的是克肖作品的第一卷中的内容简介。克肖在简介中

说，在写希特勒的传记时，他是从一个“错误的”方向出发的。他自己的工作是深入地研究社会历史（我也知道他编写了许多历史文献）。他与许多“结构派”或者“功能主义者”都有联系，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些人都在与那些认为希特勒是他那个时代最出色的历史演员的“意图主义者”辩论。那些人相信“希特勒的战争”、“希特勒的大屠杀”和“希特勒的革命”，他们甚至认为希特勒是一个“精神变态的上帝”。相反，克肖和他的朋友探究了德国人民和纳粹统治之间的关系，衡量了纳粹在多大程度上赢得了德国人的“一致的意见”。

克肖的知识背景是一方面，另外，希特勒看起来好像没有真正的私生活（除了那些心理学历史学家们猜测的内容以外）。普雷斯顿所写的弗朗哥很幸福地与妻子和女儿一起生活，打高尔夫球，钓鱼，患上帕金森综合征后突然就转向了衰落。但是，如果希特勒有自己的私生活的话，那也更难以进入。克肖哀叹说，“在政治以外，没有什么空间可供元首退却，没有一个与他的公共形象相适合的更深刻的生活方式。”希特勒身上有着明显的矛盾之处，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他在办公室里却是出了名的浮躁和反复无常；但是有些时候，他却又彬彬有礼，具有“艺术气质”，并且喜欢波希米亚人的生活方式。他也许也认为德国很容易统治，也许不这么认为，但是通常情况下，他看起来根本没有为统治德国而感到烦恼。

纳粹德国的权力是集中在元首一个人身上的，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克肖解释说，这种权力“只是部分地源于希特勒自己，它更多的还是一个社会产品——希特勒的追随者们把社会的期望和动机转化成了这种权力并赋予了希特勒。”克肖又说，“因此，希特勒的历史必须是他的权力的历史——为什么他得到了这种权力，这种权力有什么样的特点，他是怎么样使用这种权力的，为什么他被允许扩大了这种权力并打破了各种制度的束缚呢，为什么对这种权力的反抗是那么地软弱无力呢。”在回答这些问题的同时，克肖得出结论说，韦伯式的有关感召力的理论为其提供了最好的概念上的工具，但是，克肖又警告说，针对希特勒自身的历史性分析必须与德国的社会情况结合起来进行。在克肖看来，维尔纳·威利肯斯说出了可以总结纳粹政权的所有历史的几句箴言。维尔纳·威利肯斯是普鲁士的一个农业方面的官僚专家，他可不像希特勒，在他的办公室里总能找到他。1934年2月，维尔纳·威利肯斯写道：“每个有机会看到的人都知道，就那些元首早晚打算要做的事情而言，元首在自上而下发布命令做这些事情时都会遇到巨大的困难。但是反过来，迄今为止，每个人都在德国的新政权统治下在自己的位置上干得很好，所以也可以说，他们是在为元首工作。”克肖又补充说，“对于每个单个的人来说，在元首的精神的笼罩下努力地为他工作是应尽的责任。”这就是克肖认为的一种新型的权力，这种权力虽然没有被明确地讲出来，但德国人却都处在它的影响力之下。并且，他们是在一种混乱、误解、自私和狂热中为领袖工作的。纳粹德国是“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国家，但是却没有任何的协调机构，只有一个严重脱离政府机器但却具有极

大的感召力的政府首脑。”

克肖的作品中提出的一系列的问题都适用于墨索里尼。但是很明显，领袖并不是元首的完全一样的复制品。他更像佛朗哥，有自己的私生活，有一个妻子和5个合法的婚生子女，以及众多的情人，在1914年以前所从事的职业也相当成功——还不到30岁，他就已经成为社会党中央党报《前进报》的主编了——身患疾病，尤其是在晚年，而且头发也白了。在办公室里的時候，他大多数时间里是一个谨慎的领导人，也经常会待在办公桌前，尽责地读一读报纸，也接受官方的程序（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他坚持每两周到皇宫里去一次，与国王维克托·埃玛努尔商议国事。而在法西斯政权整个统治期间，这位国君仍然是意大利宪法规定的国家领导人）。有很多证据表明，墨索里尼是知道怎样管理和控制男人（和女人）的。他的统治是由一帮忠诚并且其中大部分能够始终如一的随从支持的，这些人一方面欺凌弱小，一方面又阿谀奉承，而墨索里尼对他们也是一方面经常严厉斥责，一方面又给予他们腐败的机会。法西斯的各个地方首领之间也是明争暗斗，这是意大利版本的“制度达尔文主义”，同样，历史学家在纳粹德国也发现了这种现象。换句话说，很明显，统治意大利（或者说让别人看起来统治意大利）让墨索里尼非常地焦虑。

然而，当墨索里尼在1922年成为意大利总理并在1925年成为一个独裁者之后，他就表现出与希特勒相类似的一些东西了。排除一些官僚主义的表现，墨索里尼的统治大体上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事实上，他在1914年以前就被挑选出来并赋予了一定的感召力。为什么会这样？是墨索里尼天生就有领导才能吗？是他把“领袖”二字刻在自己身上的吗？还是其他人造就了他作为一个领袖应有的特质？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这种感召力发生改变了吗？如果说这种感召力在1921年和1924年发生的危机中受到了损害，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灾难中化为泡影的话，那么这种波动是怎么样发生的呢？又为什么会发生？在一个拥有感召力的领袖之外，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更加个人的和“人性化的”墨索里尼？另外，这种依靠感召力的统治在意大利是如何运作的呢？它是否使意大利社会“革命化”了呢（相当多研究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学者”历史学家都告诉我，墨索里尼的统治的确让意大利人民变得有些好战了，普遍地愿意像法西斯士兵那样进军）？我在深思，一个意大利男人或者一个意大利女人会是他们的领袖的真正的信仰者吗？当然，在法西斯政权统治时期出版的每一本书都向我保证说，法西斯的确引导了一场革命，而墨索里尼的统治也的确让意大利大为现代化了。那么，意大利人是否也是在为他们的领袖工作呢？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是不是克肖所写的纳粹德国的复制品呢？

有很多事情让我对这种由一个具有感召力的领袖领导的没有约束和限制的法西斯“革命”很是怀疑。我最早研究的就是自由党统治时期的意大利历史，我非常清楚当时意大利社会的舆论和实践，尤其了解与意大利民族主义者联盟（成立

于1910年)相关的那一代人的情况。当谈到法西斯的外交和殖民地政策的根源,以及有关“新罗马”和“它的地中海”这些言论的起源时,我总是感到很头疼。我很难相信,至少是法西斯主义处理国际问题的政策是“源自”墨索里尼的。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即意大利所打的特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这场冲突而言,已有的结论是法西斯的战争是一场灾难。但是像德费利切这样的修正主义者,以及讲英语的国家中他的一些崇拜者们都试图推翻这个已有的结论。我不赞同他们这种做法,并且,我自己认为,在“二战”这场“测验”中,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的表现比它的前任——自由党政府在“一战”中的表现更加糟糕。在自由党统治时期的意大利,国家和社会之间并不和谐一致。但是,从1915年到1918年,自由党政府却打赢了一场艰苦的战争,而这在1940年之后对于法西斯政权来说是不太可能的,这种情况尤其让墨索里尼感到难堪和不安,因为此前他总是拿自由党政府和法西斯政权进行比较。这种比较是如此地明显,因此,我们很难否认墨索里尼有关一个真正的“极权主义国家”以及它的革命化的人民的言辞纯粹是浮夸之谈(至少可以说在1940年之后是这样)。

就其他的一些事情而言,墨索里尼和他的大部分的追随者的态度与行为也引人注意。即使对墨索里尼本人有最为简单的了解,或者对他的玩世不恭、对他的粗糙的达尔文主义假设——即没有什么事物与社会一样、对他的厌世态度、他对孤独的又害怕又喜欢的态度、他对周围的一切事物的严厉指责以及他引起自夸的“野蛮无情”有所了解的话,你就会发现他并不是一个盲目的信仰者。不管怎样,他是墨索里尼,不是希特勒,不会按照一个信条并且是唯一的信条行事。那么他的随从们又怎么样呢?他的女婿、那个一度可能成为他未来的接班人、每天都喜欢在高尔夫球场上奔走并度过自己的快乐时光的加莱亚佐·齐亚诺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信仰者呢?齐亚诺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花花公子(或者,用更加现代的说法,是一个雅皮士),对他所说的那些坚定不移的法西斯式的言论更不能当真。那么“强硬派”,如罗伯托·法里纳奇或者墨索里尼的妻子拉凯莱是不是“真正的”法西斯主义者呢?答案还是:既是也不是。当然,在某些方面,领袖要依靠他们,而他们也希望把社会秩序翻转过来。他们(以及尼古拉·邦巴奇这个在1943年至1945年闯入领袖生活的前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让墨索里尼“半信半疑”:虽然他在1914年背叛了社会党,但他还是遇到了几个“实在人”。“半信半疑”这个词在这里非常重要,就齐亚诺、国王以及其他的精英分子而言,法里纳奇和拉凯莱的确是一种平衡的力量,但是,在这个需要妥协和交易(并且,墨索里尼认为这是“政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的世界里,他们的笨拙和粗俗、他们语言上的明显的暴力倾向以及他们自己的腐败方式都决定了有一些职位是他们无法担任的。

他们这一方的力量是不足的。墨索里尼有时也承认,他对经济问题不是十分

了解，也不可能充分地接触社会，也不可能完全理解文化问题，但是，他还是坚持认为自己精通“政治”。在实现这种“精通”的过程中，他比法里纳奇转化得更快一些，抛弃了自己原本的“土气”。当然，他有时候也会直接而固执地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例如，在征服埃塞俄比亚这一问题上，他就力排众议、固执己见；另外，再早十年，他同样是固执地为意大利货币里拉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确定了一个很高的币值）。但是，更多时候，他是在逃避、等待、“谋划”（总是在时间期限有弹性的时候）和观察，以寻求短期的和“战术的”优势。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极权主义”看起来都不足以描述出这种行为的微妙之处。

德费利切对法西斯主义的理解也包含两种互相对立的精神，即激进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和保守的“法西斯主义政权”。他书中所写的齐亚诺，从心底里可能是欧洲另一个年轻的保守主义者，而法里纳奇则希望把皇宫一把火烧掉。墨索里尼能够同时与这样两个人保持着关系，表明他心目的法西斯主义并没有把中庸和革命过分地割裂开来，虽然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之处，但他还是对二者都加以利用。墨索里尼更喜欢战术而不是战略，也只对政治比较偏爱，他不愿意在这种或者那种对法西斯主义的“最终的”解释中进行选择（或者说这也是他个人的人格特点）。墨索里尼和他的法西斯政权的基本特点，也必定是保守和激进共存。德国盟友的威胁在1939年之前就已经出现，但是在1940年10月的时候变得有些势不可当了，这就需要给法西斯主义做出一个明确的解释，需要一个总体的战略而不是一套战术、一个答案或者一系列的政策。墨索里尼的模式对纳粹的崛起和掌权是有一定帮助的，但是纳粹掌权之后，作为一个邻国，纳粹实在是太强大了，也太苛求了，同时也太相似而又太陌生了。作为一个独立的事物而言，法西斯主义是无法与纳粹主义相比的。

最后，对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这种说法，我也有很多怀疑。但是，我的这种怀疑更多的不是来自于历史知识，而是源自我对意大利共和国的了解。从1967年开始，我就有幸每年都到意大利旅行，另外，我与身在澳大利亚的意大利移民也有接触。特别是在这些移民澳大利亚的意大利人之中，我常常发现残留的对墨索里尼的崇敬之情（这是一个引起兴趣的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但是我还发现，在这些意大利移民的表面态度之下还存在着一个多变而暧昧的世界。在澳大利亚，到处都可以见到“意大利人”，并不限于意大利国家派驻的代表以及罗马天主教会派驻的代表。在这里，在这个意大利人的大家庭中也存在着权力和矛盾。

我认识的那些意大利人都经历过独裁统治和战争，是存有差别的一些人。他们并不像许多澳大利亚居民那样渴求一个具有同质性的“单一的澳大利亚”，这一点也每每让我感到伤感。那么，在法西斯主义统治下的意大利人是不是也是如此呢？难道墨索里尼并不是他的地区、他的家族以及他的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化身吗？当然，我很愿意承认，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期，意大利的确存在着

一些现代化和同质化的进程，但是，这种进程当时在别的地方也都在发生。而我感兴趣的是，当时的意大利人曾在多大程度上操纵着这个进程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是以自己的方式来理解这一进程的？我再次提出这个疑问：他们真的是一群愿意“为他们的领袖”而工作的人吗？德费利切和其他一些人声称，当时在意大利是存在某种类型的“一致意见”的，至少在1940年10月意大利入侵希腊遭遇惨败之前的情况是这样。墨索里尼与意大利人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像克肖所认为的存在于希特勒与德国人之间的关系那样，只要墨索里尼愿意，他的伟大形象就可以让意大利人心甘情愿地去实现他的意志而不管它到底是什么东西？也许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但是在我看来，更多情况下，墨索里尼这个“掌权者”是在为意大利人工作的。即使当他在抱怨人性的微弱的时候（他同时也是在责备自己的软弱和没落），他也在努力使自己变得随和和受人欢迎。一方面，他是一个有感召力的法西斯独裁者，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两面讨好玩世不恭的政客。一方面，他在探寻模糊晦暗的将来，另一方面，他又试图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现在。他感到担心和焦虑，希望自己不要遭遇太大的失败，也希望自己能够再多熬过一天。

然而，从多方面来看，他还是失败了。但是，如果对墨索里尼持完全理解和完全宽恕的态度，这种想法是欺骗性的。但我还是一个反法西斯的传记作家，我不会把“我的”墨索里尼突出地作为一个法西斯主义者、一个独裁者、一个军阀或者是一个男人来描述。这个复活的恺撒不值得用古罗马的凯旋仪式来欢迎。他是残忍的（但不是最残忍的）。他并没有让意大利真正实现现代化（也许这并不完全是件坏事）。从任何严格的意义上讲，他的法西斯主义都没有在自由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之间开辟出第三条路来。他的确使用了“极权主义”这个词，但是他的意大利并没有发生太多的改变，甚至也没有摆脱原先就普遍存在的保护人、代理人与家族之间的关系和纽带。他的迟来的独裁专制，或者说经济上的国家主义也因为许多原因而失败了，但是，由于游客、移民和天主教等原因，意大利永远也不会与世界主义完全断绝关系。他在非洲建立的帝国也是老式的、摇摇欲坠并且代价高昂的，与19世纪时的帝国更为相似，而与希特勒和纳粹们所想象的他们即将在东方苏联的废墟上以及欧洲犹太人的居住区上建立起来的种族帝国有着很大的差别。墨索里尼的确有自己的种族主义，但是它缺乏一致性，变化无常，并且是“不科学的”，从来都没有能够让他具备一个优秀的纳粹党卫军的新成员所应具有严厉性。

总而言之，从很大程度上讲，墨索里尼并没有实现独裁统治，但是，由于命运的安排，他先是成为一个满怀野心和希望的乡下人，后来又在周围地区成为了“本阶层的第一人”，并且在此后得到了令人炫目但又非常脆弱的荣誉，最后又以悲惨而又应得的死亡而结束。马拉帕尔特可能有些夸张，但他的确为墨索里尼贴

上了一个“伟大的白痴”的标签，并且否认这是他和其他知识分子朋友们的“同谋”。不管怎样，从许多方面来看，他的一个说法的确是正确的，即在意大利复兴运动使国家重新统一（但实际上并没有统一）之后，墨索里尼代表了意大利社会的方向。作为一个男人和一个法西斯“思想家”，墨索里尼固执地认为自己拥有绝对自由的意志。但是，像他对待其他许多问题一样，他在这个问题上也同样是错误的。

需要提醒的一点是——这本书的第一章是从1944年1月的故事讲起的，并且就此引出了结尾，即墨索里尼在1945年4月的死亡。喜欢按部就班地阅读传记的读者可以直接从第二章读起。但是，我要告诉读者的是，这本传记的作者既不相信完全而绝对的自由意志，也不相信绝对的宿命论。写作传记时容易出现的一个明显的错误是太轻易地提出假设，即根据人物最终的真实结局来把他往那方面写。真实的情况当然不是这样。在前面的几章里，我也以实际的历史的方式一次次地停下来，对当时还只是“部分成型”的领袖提出质疑。在我们所有人的一生中都会有很多转折点，历史在这些转折点可能会发生转折，也可能不发生转折。当然，在贝尼托·墨索里尼并不完美的一生中也有很多这样的转折点。他可能是意大利一代人的独裁者，但绝不是他一个人的力量使他最终成为了这样一个独裁者（并且，他也没有从这一角色中获得太多的个人满足）。

第1部

躁动青春



1 复仇与贝尼托·墨索里尼

很多关于法西斯时期的作品都有着非常精彩的标题，但最好的要属《外公枪毙了爸爸》，这是法布里齐奥·齐亚诺写的一本回忆录，记录了法西斯政权后期的一些琐碎事件。他叙述的事件发生在1944年1月11日上午9点20分，当时，维罗纳城门外执行了一次处决。维罗纳是意大利的北方城市，位于德国和拉丁世界的十字路口，很多世纪以来控制着通往勃伦纳山口（位于阿尔卑斯山脉东段，奥地利和意大利两国的边境上）的通道。因为背叛了法西斯意大利的伟大“领袖”贝尼托·墨索里尼，5个法西斯头领遭受了枪决。执行处决任务的是一个行刑小分队，他们都是年轻的意大利人，但另外有3个纳粹党卫军在一旁监督。在被处决的5个人当中，最著名的是科尔泰拉佐伯爵加莱亚佐·齐亚诺，墨索里尼的女婿。照相机镜头旋转记录着死刑过程，齐亚诺转过身来面对着枪手，他这个最后的姿态要比他一生中大部分的行为更有价值。6个月前，盟军开始把目标指向意大利本土并迅速逼近西西里岛，法西斯防御军队士气非常低落。在这种情况下，1943年7月24日至25日，齐亚诺和其他18名法西斯最高委员会的成员投票反对墨索里尼继续担任意大利的作战总指挥。正是由于这种背叛行为，齐亚诺、埃米利奥·德博诺、卢恰诺·戈塔尔迪、乔瓦尼·马里内利和卡洛·帕雷斯基如今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据说，他们的血将被用作成立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时的圣餐。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成立于1943年9月，继续在意大利北部实行法西斯统治。墨索里尼此刻坦率地承认，这次处决“具有政治意义”，而并非单纯的司法处决。

齐亚诺是科斯坦佐·齐亚诺的儿子，1930年4月24日，齐亚诺与墨索里尼的大女儿埃达结了婚，婚礼豪华而奢侈。科斯坦佐·齐亚诺曾担任法西斯的交通部长、海军将领，是战斗英雄、民族主义者、里窝那的管理者。他经常出入各种社交场合，而他的投机生意也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巨额财富。结婚以后，加莱亚佐·齐亚诺成为法西斯最阔气的年轻人，被认为是墨索里尼的指定接班人。他曾任驻华外交官，又相继担任了法西斯文化部长和外交部长，1943年2月开始担任驻梵蒂冈大使。齐亚诺是他那个时代的雅皮士，如果他不在办公室，那就很可能在优

雅的海滨胜地或是罗马阿夸桑塔高尔夫球场找到他——他正是在阿夸桑塔遇见埃达的。齐亚诺深得罗马这个永恒之城里的年轻女贵族们的青睐，据说他与她们上床的频率甚至比墨索里尼臭名远扬的性征服纪录还要高。*

齐亚诺有时穿着法西斯的黑衫并配上法西斯敢死队的吓人的装束（他实际并不是敢死队的队员，加入法西斯党的时间也没那么早），也尽力让自己的演说不比别人的差（尽管受到尖嗓音的限制）。在这些场合中，他宣称自己是“法西斯革命”的仆人和真正的信仰者。1939年11月4日，他在以法西斯主义者的身份参加了声势浩大的维托里奥威尼托区纪念日的爱国活动（即意大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的周年纪念庆典）之后，便前往高尔夫球俱乐部打球。在那儿，他向其他法西斯头目（朱塞佩·博塔伊、亚历山德罗·帕沃利尼和埃托雷·穆蒂）表示，他衷心希望英国能够赢得这场战争，而不是纳粹德国，并且清楚地解释道，英国值得取得胜利，因为它代表着“高尔夫球的最高水平、威士忌和舒适的生活”。

不管多么瞧不上齐亚诺的轻浮草率，博塔伊还是在1943年7月25日和他一起投了票。1944年1月以前，他一直四处躲藏，等待时机加入法国的外籍军团从而抹去自己的法西斯记录。穆蒂死了，他是在1943年8月企图躲避皇家官员逮捕时被射死的。当时，人们普遍呼吁把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政府设在加尔达湖附近的市镇，但是帕沃利尼却支持把它设在萨罗。据一位很富同情心的历史学家称，他做出这种选择最根本的动机是对墨索里尼的崇敬。当然，到1944年1月的时候，这位来自于佛罗伦萨、其阶级和文化背景可与齐亚诺相媲美的帕沃利尼已经转变成一个“超级法西斯主义者”，**并高声宣称他的昔日旧友最终应该受到惩罚。

然而，墨索里尼试图反对这样的报复行动。齐亚诺与埃达的婚姻情况可能是“众所周知”的，夫妻俩的生活里或许充斥着赌博、酗酒甚至毒品。但是，在1943年到1944年间的危机中，埃达证明了自己对自己的男人、两个儿子的父亲、她始终深爱着的丈夫是忠贞不渝的（她这时仍然亲切地称呼他“公鸡”）。她质问、威胁、斥责自己的父亲缺乏家庭责任感并且残酷和怯懦。面对着自己最喜爱的女儿，这位领袖低下了头，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改变齐亚诺的命运。另一位来访者看到了一个看起来“疲惫沮丧”的人；这位萨罗共和国的领袖用手努力压着胃部的痛处，他想解开衣领，好像呼吸有点儿困难。

* 一位为齐亚诺写传记的作家声称，墨索里尼曾与162个不同的女人有过性关系，但齐亚诺在担任外交部长的7年里就超过了这个纪录。

——作者注

** 帕沃利尼的父亲是一个著名的学者（以及民族主义者）。他的兄弟娶了一个犹太人，但同时也是个积极的法西斯主义者。

——作者注

但是，埃达的歇斯底里在她的母亲拉凯莱·圭迪那儿却不怎么管用。拉凯莱始终看不起齐亚诺，在她看来，这位拥有至上特权的少爷太腐化了，居然打高尔夫球。尽管拉凯莱做了20年意大利统治者的妻子，但她很珍惜自己的国母形象。她朴素、节俭、见识广博，对丈夫忠贞。1943年，她知道有人背叛了自己的丈夫。她的忠贞后来发展成了对上流社会的妒忌和敌意，她相信人终有一死，而那些叛逆者应该受到惩罚。作为家族中真正“坚强的人”，她要让其他人认为她是从来不哭的。那些像帕沃利尼之类的在萨罗共和政府后面摇摆不定的法西斯主义分子，不论出自何种动机，都对拉凯莱表示称赞。博洛尼亚大学校长戈弗雷多·科波拉认为，新政府表明了那些法西斯主义者的态度。他写道，新政权必须用鲜血来巩固，而不应像“犹太教教士、共济会会员和女人”那样喜欢妥协。

毫无疑问，德国盟友和萨罗共和国的庇护者们对这种观点拍手称道。他们处决齐亚诺有着特殊的原因。自从1939年春天起，这位当时的外交部长就已经对纳粹主张的世界秩序持怀疑态度，直到最后关头才极不情愿地同意意大利参战。纳粹分子很坚决地认为，齐亚诺以及其他那些落入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手中的同伙应该被处死。他们必须去死，这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应受的惩罚，同时也被当做是对意大利到目前为止在战争中遭遇的令人羞辱的失败的补偿。换句话说，他们必须算清这笔账，因为在法西斯政权中，“一切都是为了政权，没有什么可以反对政权，没有人可以游离于政权之外”，“极权主义”一词就是产生于这个体制。但是，这种体制已被证明是空洞和虚伪的。尽管没有人说得如此直白（目前为止意大利编年史还没有对此事进行过多的评注），但是毫无疑问，齐亚诺是贝尼托·墨索里尼的替罪羊，墨索里尼才是一个失败的极权主义者、一个失败的法西斯独裁者、一个失败的民族领袖和一个失败的为纳粹—法西斯新秩序而战的战士。

1944年，那些曾经指责墨索里尼制造了所有灾难的人不再讨论这位独裁者的罪过和缺点，因为萨罗共和国的宣传已经在为新的困难时期塑造一个新生的墨索里尼了。即使在今天，一些历史学家也断言，自1943年9月以后，墨索里尼勇敢地把自己当成意大利人民的盾牌，抵御德国联军的愤怒以及持续战争的恐怖。但是，血肉之躯的墨索里尼却忐忑不安地住在加尔尼亚诺的费尔特里内利别墅里，他远非一位英雄人物。他生病了，疲惫而沮丧，家人也在他周围争吵。他的大儿子维托里奥软弱但又自命不凡，曾被墨索里尼称做“白痴”，但此时他却迟对地高等政治显示出极大兴趣，*并且得到了他的堂兄维托的协助。聚集在这个地区的还有许多与墨索里尼关系更远一些的亲戚——一位历史学家竟列出了200人。正如一位观察家讽刺地评论道，墨索里尼对家人有着深厚的感情，但是只有在他们

* 与他谈过话的一个人认为，维托里奥是“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过的最大的一个笨蛋”。

不侵犯他的工作空间时才是如此。然而，对于所有放弃法西斯主义的人来说，处在死亡阵痛中的法西斯主义通过小墨索里尼们和圭迪式的人物向人们表明，家庭这个机构并没有成为牺牲品而落入“极权主义”的控制之中。

在心灵的深处，拉凯莱或许想知道贝尼托是否还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她忙碌着，给来访者留下的印象是勤奋、专心地操持着家务。她告诉一位官僚，丈夫存在的问题是他相信任何与之交谈的人，可是她却谁都不相信。只要一有机会，她就会因丈夫和克拉雷塔·佩塔奇仍然保持着关系而诅咒他。1943年8月到9月间，墨索里尼把他这位最后的、愚笨的但自己又离不开了的情妇短暂地关押了一段时间，*然后又把她安置在一座名叫奥索里恩的别墅里面，那儿曾经住过一些修女。埃达最后一次回家是在1943年12月26日，她尖叫着说，战争失败了，他们都完全生活在错觉当中，他们不能让加莱亚佐在这种情况下成为牺牲品。然后，她离开意大利去了瑞士，从此再没见过她的父亲，也再没有和父亲说过一句好听的话。相反，她还声称自己是“叛徒和盗贼”的妻子，并且为此而感到骄傲。**只有两个最小的孩子，罗马诺和幼时患上小儿麻痹症并因此而智力低下的安娜·玛丽亚没有让墨索里尼太恼火。二儿子布鲁诺在战争期间的一次空难中丧生，他的遗孀吉娜·鲁贝蒂也住在费尔特里内利别墅里。她很受墨索里尼的喜爱，这位领袖可能是更钦佩她有胆量公开嘲笑那些认为轴心国能打赢这场战争的人。

1944年1月，墨索里尼还试图从所有人的视线中消失。最严重的是，当他故意让齐亚诺走向死亡的时候，他是怀着万分的懦弱在逃避现实。在处死齐亚诺等人的前夜，这位领袖胆怯地故意躲避着以自己的地位所能够允许的宽恕他们的机会。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清楚，目前纳粹德国和狂热的法西斯分子只有看到别人的鲜血才会感到满意，尤其是他女婿的鲜血。他也可能意识到，一旦做出这种牺牲，他们就会原谅或是忽视他明显的无能。这种动机无疑使他在事后更加渴望从友好的来访者那里得知女婿和昔日同事被处死时的详情。然后，在确保对自己的利益毫无损伤的情况下，他可以虔诚地表明，他们不该遭此下场。更为可怜的是，墨索里尼还试图把自己拒绝干预此事的责任怪罪到旁人身上，悲哀地说他在1月10日经历了一个不眠之夜（元旦那天他就因发烧和胃痛卧病在床）。还说是其他人充满敌意的阻挠使他没有听到他们恳请宽恕的请求。他还亲笔给齐亚诺的母亲写了封信，强调他自己是多么的孤独。当埃达表示他的这些痛苦的说辞不足以让她信服时，墨索里尼怀着十足的自负向任何愿意听他说话的人宣布，“命中注定

* 她因为此事而满怀自怜，丝毫没有在意意大利当时正在经历的灾难。

——作者注

** 1945年3月，墨索里尼最后一次请求埃达原谅他，但她仍旧拒绝了他。

——作者注

我要遭受所有人的背叛，包括我自己的女儿”。*即使在1945年3月，他仍然在谈论着自从齐亚诺死了以后他所忍受的“残酷和长期的”“痛苦”。处于自我困扰之中，墨索里尼试图躲避一度包围了法西斯主义和意大利的灾难现实，拒绝对周围积聚的复仇情绪。

挑选与之交谈的人爱听的话说是他的习惯，墨索里尼在女婿被处死之后这样主张，“现在我们已经开始继续前进了，我们一定不要让任何事情挡住我们的去路，而是要继续前进以取得合理的结果”。1944年1月到1945年4月，意大利的历史的确是经受了一段痛苦的经历，意大利半岛北部成了“二战”前线的通道，同时也陷于复杂的内部争斗与残杀之中。相反，“被解放了”的南方在盟军和王室的联合统治下，就其所经历的民族传统阶级暴政、性别及地区差异以及在意大利的贫穷与盎格鲁—撒克逊解放者的强大之间的差距而言，相比北方不是那么严重。

在当今的意大利，至少在一些群体里面，鼓吹有必要原谅和忘记社会共和国的罪过是很普遍的现象。我们相信，当时的意大利人，包括“二战”以后的那一代人中的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在内，很多都认为墨索里尼是值得理解和尊敬的，并且选择为他而战。“内战”时期，道德不受任何一方垄断，意大利人相信，与入侵的代表自由民主的盟国（以及他们的共产主义朋友）相比，忠于萨罗共和政府更能体现出对国家荣誉的承诺。

抚慰过去是很好的，这对于坦白自己的过错和承认自己所犯的大量无法避免的罪过很有好处。然而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只是纳粹德国的傀儡盟友，而德国这个在现代国家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国家仍然在继续灭绝欧洲犹太人，在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对意识形态上的或种族上的敌人进行着大屠杀，直到1944年，仍在日益迫近的失败中遐想着胜利的愿景。佛朗哥只是个“半法西斯分子”，但他的军队在西班牙内战中取得胜利后，可能已经屠杀了10万国民，将另外30万人永久流放。此外，其余的人也在饥饿中挣扎，整整一代人的自由受到了压制。**如果纳粹在“二战”中取得胜利将会是何种情形？即使不管墨索里尼“真正的”意图可能会是什么，他难道就不会做出一系列恶劣的“合理结论”了吗？1944年1月，乔瓦尼·真蒂莱之类道貌岸然的知识分子的确在文章中迫切要求意大利从这位让国旗重新升起的领袖身上重拾民族精神，并且要求对反法西斯主义

* 在自怜的情绪中，他还把埃达谴责他的信拿给其他法西斯官员看，让他们为自己的命运慨叹不已。这种做法在1943年7月之前是从来没有过的。

——作者注

** 《西班牙内战》(The Spanish Civil War)的作者托马斯认为，佛朗哥的军队在战争中杀害了11万共和党人，另外在1936年至1939年间，他们又杀害了7.5万人。

——作者注

者给予“无情的惩罚”，但他的这些言论同当时全世界都处在战争中这一背景是分不开的。他的一些同事，如通过实行20年的法西斯统治而聚敛了大量资金并因此而声名狼藉的阿尔登戈·索菲奇，现在也不再痛骂法西斯主义体内生长的、必须被彻底无情切除的腐败“脓疮”并要清除它“最后一滴腐败的血液”了。可以想象的是，乔瓦尼和索菲奇以及其他支持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知识分子正在为他们的政治对手鼓吹一种可怕的结局，而他们也知道自己在这么做。他们或许相信，和平将会像以往那样不言而喻地带来妥协，但他们不了解纳粹同盟的本性，在坚持这种传统的玩世不恭的态度时，他们已经把自己托付给了死神。

毫无疑问，直到1945年春天之前，游击队的数量还很少，尤其是他们本身的动机也并不是太纯；毫无疑问，抵抗力量也有自己的凶手；毫无疑问，英美的轰炸机也在意大利城市上空疯狂地空袭，而盟军武装对待被解放出来的意大利人民所做出的文明行为也只是摇摆不定的；毫无疑问，取得胜利的美好想法最终未能在1945年成为现实。然而，如果另一方获胜，包括东山再起的贝尼托·墨索里尼的胜利，将会把欧洲、世界以及意大利本身带进黑暗的时代。

1944年至1945年间，墨索里尼很少考虑这样的前景，可能是面对的困难太多了。毕竟，无论是在1940年，还是甚至是在1935年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时，他都没有说明发动战争的目的。作为一个傀儡独裁者，在处死了自己的女婿和其他同事之后，他原先的优先地位才得以继续下去。尽管盟军向崎岖的亚平宁山脉挺进的速度很缓慢，但他所控制的领土却在不断地缩小。1943年10月1日，那不勒斯陷落，之后，罗马和佛罗伦萨也相继于1944年6月4日和8月11日陷落。如何解释德国人留给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独立的含义是个棘手的难题，对于他们来说，意大利边境也是攫取的对象。德国人的心思是，的里雅斯特和特伦蒂诺在1918年以前是由哈布斯堡帝国统治的，他们想从1943年9月起让这两个地方“暂时”收归德国管理。墨索里尼装模作样地向他的官员们抱怨说德国人没有和他商量，并且要求让意大利人自己来管理意大利。实际上，希特勒，这位独一无二的德国“领袖”，仍然赞成由墨索里尼在法西斯意大利重掌权威。戈培尔的说法似乎更合乎逻辑：要“恢复”“德国”对“他们”曾经统治过的领土的控制权，并且敦促德国收回整个威尼西亚地区。不久之后，这位纳粹宣传部长在日记中草草地记下了他和同事长久以来的想法：“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共和国是如此的软弱无力，谁来担任墨索里尼内阁的部长职位都无关紧要”。对于绝大多数纳粹头领来说，墨索里尼更像个傀儡，而非独裁者。

正是在这种被德国藐视的氛围之下，1944年4月，墨索里尼前往萨尔茨堡附近的克莱斯海姆城堡与元首进行了两人之间的第16次会面。掌管萨罗政府正规军的鲁道夫·格拉齐亚尼元帅发现墨索里尼很紧张，并且说话总是绕圈子。4月22日的讨论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墨索里尼也争辩说他的臣民正在意大利建造一个真

正政府。不管多么的不可信，他确实在一些问题上坚持己见，包括让德国改善意大利战俘和移民劳工的生活条件，这些人从1943年9月起实际上就被德国当做奴隶劳工使用。同样，他怀疑希特勒是否能够解释清楚德国对里雅斯特以及其他意大利边境领土的真正意图。“巩固意大利共和政府符合德国的利益”，他急切地恳求道。但是，希特勒却反常地保持了沉默。鉴于战争还在继续，墨索里尼又谈到了令他感到困扰的战略上来。他告诉希特勒，英国才是轴心国真正的敌人，难道就不能说服苏联接受它以前的边界，从而把整个战场转移到西方吗？

墨索里尼喋喋不休地谈论着自己想与斯大林达成妥协的想法，这暴露出他对于纳粹的种族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理念的肤浅认识。同时，这也暴露出墨索里尼对于希特勒和其他纳粹德国领导人思想中的狂热有着深深的误解。1944年，德国正在东部战场打着一场真正的战役，这是整个“二战”中最为重要的一场战役。为了自己民族的小小的利益，一位意大利领袖热切地希望纳粹能够脱离这场战役，这完全是痴心妄想。

然而，尽管墨索里尼的表现极为拙劣，但他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让元首接受了他的一些想法。而其他德国人也许还在评论着墨索里尼作为谈判者的无能，并把他跟维希政府的总理皮埃尔·赖伐尔相提并论。之后，两人就加强意大利军事防御能力的方法又进行了一些技术性的讨论，希特勒也针对盟国的一些“不合常理的”特点以及轴心国取得胜利的必然性发表了一番评论。此时，元首恢复了一些往日对这位意大利领袖所持有的敬佩之情。他坦率地表明，他已经决定要“坚决地”“依赖”墨索里尼了。

作为恢复领袖威望的一个象征，元首还允许领袖到由德国提供训练帮助的意大利圣马可师兵营参观。他在那里受到了热情的款待，他自己的士气也暂时受到了一些鼓舞。回到意大利之后，他立即公开发表了他所谓的与元首的“苏格拉底式对话”，并对将来有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他用惯用的比喻评论道，战争“对于人民来说是一次极为重要的测验”。在测验中，一个国家不一定总能取得成功，它“有可能会输得很漂亮，也有可能赢得很糟糕”。但是，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他到前线看一看，他的乐观主义就会受到打击。

在与元首的会谈中，墨索里尼坚持认为罗马是“意大利的精神中心”，应当尽一切力量守卫这座精神之城。但是到了7月，当元首和墨索里尼准备进行最后一次会面时，罗马这个永恒之城已经陷落了，这个事件促使墨索里尼可怜兮兮地问一个法西斯同党，这是否意味着罗马人民已经把他遗忘了。1944年，想在意大利找到一群兴高采烈的人是很困难的。在乘火车去往位于东普鲁士的希特勒总部的途中，墨索里尼还停下来向正在接受纳粹专家训练的意大利士兵们发表了讲话。他试图用种族主义鼓励这些年轻人（还有他自己），但是，他的种族主义对于任何纳粹听众来说可能都还不够纯正。他宣称，“在30个世纪的历史中，罗马城中从

未出现过非洲人，但现在它的城墙已被那些野蛮粗劣的种族亵渎了”，意大利的“多种肤色的敌人”应该意识到，最终的胜利是不属于他们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军队，正如正在听他讲话的士兵一样，将会是他们真正强硬的对手。

不管他的或是听众的士气是否受到这些情绪的鼓舞，人们都不大愿意接受的言外之意是，意大利移民先前所寻求的伊甸园“美国”，现在却是他们真正的敌人。这是一个必须认真进行思索的问题。格拉齐亚尼曾经在演讲中谈起公元9年被阿米纽斯摧毁的瓦鲁斯古罗马军团，与他相比，墨索里尼的演讲至少更有针对性，但他却意识到自己正在谈论一场“德国人”消灭了“意大利人”的战争。

1944年的夏天，在纳粹统治下的欧洲乘火车旅行是很不安全的，墨索里尼一行不断因炸弹袭击和铁路故障而被耽误。因此，当意大利人看到机车停在铁路旁待了一个小时却还无法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并不会感到奇怪。终于，火车艰难地到达了目的地，墨索里尼下了车，元首裹着毯子，伸出左手而不是右手来欢迎领袖。在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的有意安排下，墨索里尼迟到了。德国保守派中的左翼打算暗杀希特勒（他们打算利用外交方式与西方势力结成反对斯拉夫共产主义的强大战线，这和墨索里尼所期盼的战争模式正好相反）。

在这种情况下，两位饱受打击的独裁者之间要想进行严肃的谈话看来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场的翻译为后人描述了房间里受到炸弹袭击后的景象，这两位老人就好像在无可奈何地等着戈多*的到来，希特勒坐在一个翻过来的箱子上，墨索里尼坐在一把摇晃的椅子上。不出人所料，希特勒此后最感兴趣的就是描述当时所发生的情况，发誓一定要让失败的刺客死得很难看。他宣称，他躲过这次劫难表明上天正在拯救他，并将帮他取得最终的胜利。墨索里尼用些陈词滥调表达着他的震惊和悲痛，但看到希特勒此时没有了原先的傲气，他心中却在窃喜。从东普鲁士回去后，他对一个法西斯记者说，“我们并不是唯一遭到背叛的人”。两位独裁者最后一次马马虎虎地对前线战况评论了一番。希特勒强调佛罗伦萨是他的“梦想之城”，**一定要守住。墨索里尼则再次请求把那些在德国的意大利军队派遣到意大利南方。这次，心烦意乱的希特勒立刻表示同意。虽然元首做出这个小小的让步，但回到意大利之后，墨索里尼仍然找到很多理由和德国大使鲁道夫·

* 出自《等待戈多》，这是爱尔兰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1906~1989）创作的一部两幕悲喜剧，1952年用法文发表，1953年首演。《等待戈多》是戏剧史上一次真正的革新，也是第一部演出成功的荒诞派戏剧。剧本通过描写两个流浪汉永无休止而又毫无希望的等待，揭示了世界的荒诞与人生的痛苦，表现了现代人希望改变自己的生活处境但又难以实现的绝望心理。

——译者注

** 希特勒曾说自己“最大的愿望是能够作为一个不知名的画家到意大利四处游历”。

——作者注

拉恩争论不休，因为意大利共和国已经不再拥有自己的外交政策了。

5个月以前，墨索里尼还很期望与他的这位德国保护人见上一面。这次，他显然很明确地告诉拉恩他不想听到的是什么。墨索里尼提到，“许多意大利工业家正张开双臂等待着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到来”。接着他又补充道，更多的工业家对于9月8日意大利放弃德国联盟是负有责任的。他暗示此时正是压制和规范这些社会力量时刻，也是让意大利社会共和国这一名称中的“社会”真正变为现实的时候。同样，此时也可以为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创造一个大众的和“革命的”基础，他在1943年7月25日之前就想这么做，但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落空。

在那几个月里，有关“社会主义化”的谈论很多，墨索里尼也很高兴能够借用1919年的法西斯主义，他当时的计划中包含着推进社会平等的激进计划。毕竟，墨索里尼曾经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社会主义者，现在，他在某种程度上又重新使用了年轻时代使用过的词汇，他甚至有些感激那些讨论让意大利朝着左翼方向发展的同事。布鲁诺·斯潘帕纳托是自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始终和墨索里尼在一起的一个记者，30年代期间，他又到处宣扬要在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间寻求意识形态的调和。他后来说：“社会主义化不是即兴创作，不管在法律上还是在实际中都应该极其严肃地对待它。”

斯潘帕纳托在文章中有意赋予法西斯主义一段合法的历史，这也为“战后”新法西斯主义创造了政治空间。正如1919年到1920年间所表现的那样，在意大利社会共和政府时期，墨索里尼自己的社会革命路线也是摇摆不定的。但无论如何，他的权力以及想要摆脱德国控制而独立的想法对于形成真正激进的政策来说犹如杯水车薪。相反，时常出现的情况是，墨索里尼不断退缩，避免正面作答，他期望在第一天安抚一个谈话者，第二天再安抚另一个。因此，他对他的一些新精英们说，与恢复常态的要求相比，任何社会变革计划都是次要的，应结束暴力，恢复民族尊严。在其他一些场合，他催促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化。由于发现实现灵活平等社会的承诺存在矛盾，他指示他的官员不必要求那些向共和国提供财政资助的人具有党员身份。墨索里尼可能也是为了使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对于他为此而付出的努力，或许可以用他在1944年8月作出的那段辛酸的评论作为最好的总结：“任何人都会犯轻信的错误，不论他处于何种阶级或智力水平，这是很惊人的事实。”他继续说道，在任何竞赛中，“谎言总会战胜事实”。这也难怪，在这之后不久，他自己的这些胡言乱语就变得一目了然，他告诉一个忠诚的法西斯听众，意大利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化具体体现为“具有人性的、意大利的、可实现的”社会主义形式，但不知何故，这种形式却避免社会均衡。

在花言巧语和制服的下面——墨索里尼要求身着制服，以避免出现“民主社会懒散”的现象——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在一条道路的边缘蹒跚而行，这条道路不是社会革命，而更像是无政府状态。武装力量的问题始终没有完全解决，雷纳托·

里奇手下的“共和国国民卫队”与格拉齐亚尼竞争，要建立一支传统的“国家的”和“非政治的”武装力量。1944年8月，“共和国国民卫队”最终被吸纳进了国家军队。那时，其他独立的武装组织也正在继续发展。法西斯党总书记帕沃利尼当时正与内务部长圭多·布法里尼发生个人争端，在他的支持下，一支由自愿者组成的“黑衣旅”正在发展壮大，他们在理论上效仿法西斯在崛起掌权阶段时法西斯小分队的做法。像那时一样，他们现在也通常是代表当地的一种精神，成为支持当地首领的一支力量。他们同样诉诸于暴力行为，甚至可以威胁推翻墨索里尼。最为臭名昭著的半独立的首领是尤尼奥·瓦莱里奥·博尔盖塞王子，他就是所谓的“X级鱼雷快艇”（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的指挥官，一位海军英雄。博尔盖塞毫不犹豫地提议道，领袖的超凡魅力已被历史埋葬（他大声宣称，加尔尼亚诺人只存在于“民间传说”中），他还在纳粹领导层中寻求保护者，并且想寻求一种独立的外交政策。他于1944年1月被捕，后来在纳粹头领的干预下得以释放。1945年的前几个月，墨索里尼仍感到不安，担心博尔盖塞可能会发动政变，打算通过提升他为实际根本不存在的萨罗海军总参谋长来削弱他的实力（并答应为他众多的通奸行为保守秘密）。*同样，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记者也并没有在意识形态领域达成一致，而是相互争论不休。墨索里尼为长期（非政党）担任警察长官的阿图罗·博基尼之死表示沉痛哀悼，同时也就萨罗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公共秩序和媒体舆论存在的问题作了最为坦诚的评价，他悲痛地低声说道，回到1940年——“如果没有警察长官，想管理这个国家就是不可能的”。

与此同时，意大利人也在忍受着德国以及他们自己人的恐怖活动。1944年3月，一颗由游击队放置的炸弹在罗马墨索里尼曾经住过的宫殿附近爆炸，30多名士兵在此次事件中丧生。为进行报复，就在阿皮亚路附近一个名叫阿迪亚蒂恩的山洞里，德国人包围了335人并将他们全部屠杀（其中包括77名犹太人）。6月，作为对游击队袭击的报复，赫尔曼·戈林师在向托斯卡纳的瓦尔迪基亚那撤退时也屠杀了200多人。9月，位于博洛尼亚外围的马扎博托的家乡同样遭到了相应的报复。在城市里也是如此，德国纵容恐怖策略。他们在米兰的洛雷托广场公开暴尸的行为引起了墨索里尼的抗议，他悲痛地对拉恩说，这样的行为会影响士气并损害民心。的里雅斯特和阿尔托—阿迪杰之间的边境领土是意大利在“一战”中获得的战利品，目前由德国管理，他们承诺说，如果纳粹能在这一地区实现和平就把它划归德国统治（纳粹党卫军首领奥迪洛·格洛博奇尼克以前残忍地从事着灭绝犹太人的职业，如今把的里雅斯特的未来具体化了）。

* 克拉雷塔·佩塔奇和布法里尼·圭迪也试图说服墨索里尼对付博尔盖塞。

在墨索里尼一生中，当然，是自从他成为一个法西斯主义者以后，他就已经播下了暴力的种子，现在，他和他的国民开始收获了。大量的法西斯狂热分子有着与德国人一样的杀人意愿（与那些不信法西斯主义并且在等待着这场折磨意大利的灾难赶快结束的人一样多）。萨罗政府失败的原因非常简单。到1944年的时候，食品供给缺乏，通货膨胀无法控制。这个新政府在宣称要实行公正可信的配给计划时，与原来的法西斯政府同样无能。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墨索里尼却把目光从他周围爆发的灾难上转移开，然后全神贯注地进行自我辩白——在6月到7月间，他在米兰的《晚邮报》上连续发表文章，抱着很大的偏见记述了1943年7月的失败。如果他能够编写这段历史的话，他很可能会美化自己的名声。

然而，到了1944年的年底，墨索里尼的确努力举行了最后一次群众集会。像以往那样，他的演讲技能可以迷惑和感染他的臣民。他告别大湖区的灰暗，又回到了米兰，并且在它的歌剧院里发表了演讲。他谈到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国王和他的总理彼得罗·巴多利奥元帅对他的背叛，谈论1943年7月到9月的分裂行为对意大利人民产生的影响，并赞扬有着优秀素质的意大利人民还是意识到了与德国和日本盟友并肩作战的必要性。他声称，这场战争还没有输，财阀统治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的协约肯定很快就会破裂。他企图复苏早先的法西斯主义精神，对社会主义化也是认真的，还小心地提到了1927年到1935年法西斯政权的黄金时代。他再次把马志尼称为时代的预言家。新秩序将支持促成一个统一的欧洲，意大利人“能够感觉到自己是意大利人，而因为他们是欧洲人，所以同时也会因为他们是意大利人而能感觉到自己是欧洲人”。墨索里尼还声称，正是这种混合体将确保他们坚定地抵抗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以及犹太共济会成员的世界大同主义，这些也就是他们的“恐怖”的混合敌人。无论过去受到多少挫折，意大利共和国将会寻找到“第三条路”。

当战争没有开始的时候，墨索里尼和他的听众都可以把自己沉浸在对这些话及美好时光的回忆当中。但是阴暗很快就再次来到现实中。墨索里尼努力要成为一位不辞辛劳的统治者；在友好人士的眼里，他像是一位有能力的管理者；在他的顾问看来，他也是一个“细心、勤奋、专注”的人。同样，他有时也称赞一些优秀官僚的技能和敬业精神，称他们对于任何统治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当他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他的魔力一下子消失了——1929年至1943年间，他是在罗马威尼斯宫雄伟壮丽的“两半球之厅”里统治意大利，而现在，他却窝在位于加尔尼亚诺的邈远的办公室里，即便是友好的旁观者也都认为，他现在看起来更像一个乡村律师或医生。他声明已经厌烦了自己的工作（毫无疑问，他也厌烦了自己）。他后来荒唐地企图起草新宪法，这也证实了他的职位形同虚设。墨索里尼装作对这样一个问题很感兴趣，即一个领袖是否应该最多任职两个7年或是两个5年。假如他在1936年当意大利军队耀武扬威地进入亚的斯亚贝巴之时放弃

自己的权利，那他还能对自己的名誉抱有什么幻想吗？

他已经意识到，现在该是回顾自己人生的时候了。他仍然偶尔接受一些采访，有一次还热情地谈论起新闻这一职业，回忆说“办一份报纸就像是做了一回母亲一样”。他有时也探讨一些哲学方面的问题。他一直更喜欢猫而不是狗，可能是因为想到了希特勒，还想到自己“当狗的几年”。墨索里尼承认他犯过错误，但那都是逻辑推理造成的后果，而不是出于他本能的判断。如今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囚徒，命运的一个玩偶。但是，他并不害怕死亡，当死亡到来的时候，他会把它当做自己的一个朋友。他很少或者根本不信仰法西斯主义的信条，但是却相信意大利人民的善良，在与外国记者交谈时他也坚持这么说。反过来，当他与一个意大利人谈话的时候，他却驱使意大利人仍然要把法西斯主义当做20世纪的理念，告诉他们历史最终将证明他是正确的。他现在认为，自己参加战争是为了遏制德国，并且他早就知道美国注定将成为世界强国。有时他也声称，在内心深处自己始终都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是唯一一个把社会主义思想应用到实践中并创造了社团主义国家的人。他再次努力否认自己对1924年的社会党代表人物贾科莫·马泰奥蒂被害事件负有责任。“能击倒一头牛的溃疡病”困扰着他的工作，但是对他来说最惨的还是失去了弟弟阿纳尔多，“他是那种传统的意大利人，廉洁、聪明、安静、富有同情心”，他的光辉鞭策着意大利人民。在长期的职业生涯里，能让他尊敬的人很少。毕竟，利己主义是“至高无尚的法则”。人类是动物王国中的一员，他们一边谈论着精神和灵魂，一边却在相互争夺、残杀和欺骗。

要不是有这场他应当负相当大责任的战争，欧洲人民和意大利人民也不会经历恐怖和屠杀，而他也将以最为平凡的方式了却一生。4月15日，墨索里尼在与一位昔日的仰慕者谈话时用了可以想见的最不恰当的比喻：“我命中注定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现在这个时刻就要到了。”第二天，墨索里尼在政府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解释说，他要到米兰去，但不会在那里待太长时间，然后将到帕沃利尼和他的“黑衣旅”的集合地瓦尔泰利纳去。他又不是很明确地补充说，他将最后一次“走向人民”。4月18日，在事先没有和纳粹盟友商量的情况下，他最后一次去了米兰（如果算上他在死后尸体被送到米兰那一次，这可能是他倒数第二次到米兰），这让纳粹盟友非常气恼。在米兰，他也想找到一个合适的住处，于是便住在了当地官员的府邸里，好像他的政府在那里还继续存在一样。当时，失眠正在深深地折磨着他。他神经紧张，对周围的事物无动于衷，寝食难安，而这种情况在以前也曾经出现过。即便这样，他仍然机械地说，战争就是一场“伟大的戏剧”，这场戏剧可能不止有五幕，而是六幕、七幕或者八幕，而他早已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即他已经全盘皆输了。正是带着这种心理，他开始了他的最后一个星期，沦落成了一个“政治梦游者”。

自从1943年9月起他就多次谈到，如果战争对纳粹和法西斯不利，他的政权

将英勇奋战到底。但是，1945年2月，他却在考虑，的里雅斯特是意大利民族在“一战”中得到的奖赏并为其带来了荣誉，现在又是意大利在斯拉夫（和德国人）的海（指亚得里亚海）岸的最后大本营，那么他是否应该在这里抵抗到最后一刻呢？但是，纳粹德国却认为的里雅斯特已经算是归还德国，因此禁止他这样做。于是，他最终选择了瓦尔泰利纳这个地方。*它是和瑞士（墨索里尼年轻时曾到过瑞士两次）接壤的阿尔卑斯山脉中的一个山谷，尽管那个地方在意大利民族的历史上没有什么名气，但它距离米兰的距离非常近。正如墨索里尼向格拉齐亚尼所讲的那样，“法西斯主义必须死得英勇”——这话格拉齐亚尼肯定是爱听的。

实际上，在瓦尔泰利纳，墨索里尼仍然没有认真筹划过军事策略，他并没有打算让自己死得多么伟大。正如斯潘帕纳托评论的那样：“大家在谈论抵抗，但是我不清楚怎样抵抗，在哪儿抵抗。”墨索里尼也并没有制止这种混乱。相反，4月24日，他略显轻松地承认：“没有命令，我不能再下达命令了。”他又说，在历史的跌宕起伏中，每个人都有只能充当观众的时刻，朋友们一定要集中记住他们做过了什么，而不要抱怨将要发生的事情。听到这里，斯潘帕纳托弯下身来吻了一下领袖的手——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说的。

如此庄重虔诚的时刻转瞬即逝了。有一次，墨索里尼没有放过责备他人的机会。他对任何愿意听他讲话的人说，德国人背叛了他，而且他们以前已经多次干过这种事。言外之意是，他已经不需要纳粹—法西斯联盟和战争了。或者，也许是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民都有责任？所有的人都欺骗了他。

与此同时，墨索里尼也在试图与反法西斯抵抗力量取得联系，尤其是准备和社会党代表进行谈判，而在“一战”前，他也曾是社会党的一员。他还想做最后一次交易，想在与对手的讨价还价中占到一些便宜，但这最后一线希望也落空了。4月25日下午3点，在米兰红衣大主教伊尔德方索·舒斯特的宫殿里安排召开了一次会议。舒斯特是一个爱国的反共产主义者，也是在天主教势力中认可墨索里尼政权的一个重要人物。对于他的童子军组织，他提倡要为其提供“健康的、基督教和意大利式的教育”。他争辩说，进军罗马让国家避免落入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手中，并为1929年教会和国家之间签订《拉特兰条约》铺平了道路。他称赞法西斯主义的帝国战争“为埃塞俄比亚提供了向天主教信仰和罗马文明敞开大门的机会”。到1937年的时候，舒斯特还对宣扬法西斯神秘主义的山德罗·墨索里尼学校的成立进行称赞，而这所学校是以信奉天主教的伟大的阿纳尔多的名字来命名的。直到1938年墨索里尼政权公然推崇种族主义之时，舒斯特才开始怀疑法西

* 据说，当4月27日墨索里尼到达这一山谷的时候，有大约8000名崇拜者自发地前来欢迎他。

斯主义是否并不比这个罪孽深重的世界上的其他意识形态更加优越。墨索里尼按时到达了主教的宫殿，然而，抵抗力量的首领们却迟到了。红衣主教和墨索里尼进行了一个小时的闲谈。

关于墨索里尼与罗马天主教会成员的最后交往，舒斯特给后人留下了生动详实的记述。他回忆说，在欢迎领袖时，自己对他为挽救意大利于灭亡之中所做出的牺牲，以及他“为了使意大利不再继续遭受最后的劫难而愿意到国外的监狱里抵罪”的想法表示感谢。但实际上，他的这些话可能加深了墨索里尼的悲哀。舒斯特继续说道，教会永远不会忘记领袖为《拉特兰条约》付出的努力。他还认为墨索里尼受到自己的法西斯党的领导层如此恶劣的对待的确令人遗憾（红衣主教是激进的法西斯主义者罗伯托·法里纳奇的旧敌，1931年曾就罗伯托·法里纳奇的不忠警告过阿纳尔多*）。经过起初这番随意的评论之后，红衣主教注意到他的这位来客有些沮丧，话很少。于是这位仁慈的传教士送给墨索里尼一小杯葡萄甘露酒和一块甜点。谈话依旧很不和谐地进行着。舒斯特又问墨索里尼是否读过他的新作《圣贝尼迪克特》，墨索里尼不得不承认自己还没有看过这本很有价值的作品。于是舒斯特十分关切地强调说，他所写的正是领袖的真实写照，坚持认为这本书将有助于领袖理解他所说的“您经受的考验正是在永远公正仁慈的上帝面前的赎罪”。墨索里尼又一次不知所措，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紧紧握住了红衣主教的双手，而在舒斯特看来，这是领袖在表达感激之情。

《圣本尼迪克特》这一话题使得谈话转移到蒙泰卡西诺的悲惨命运，以及圣人和伦巴第国王托蒂拉相遇的修道院上来。他们二人都清楚，著名的本尼迪克特纪念碑是于1944年时被入侵的英美联军毁掉的（提到联军的轰炸，舒斯特始终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由于对他人的罪恶达成共识，两个人因此而显得兴奋了一些。更明显的是，为了探求对墨索里尼的不朽灵魂进行拯救的方法，舒斯特甚至声称，一位牧师在蓬扎岛找到了某种能“复活”墨索里尼宗教感觉的方法。墨索里尼曾于1943年8月在那座岛上经历了短暂的监禁。对于红衣主教在谈话中转换话题的速度之快以及所流露出的探测内心想法的意图，墨索里尼仍是感觉不自在，谨慎地回答说，他对于放在自己面前的《救世主传记》的思索“达到了某个程度”。舒斯特没有就此追问得太深，但是他又一次意味深长地提起了独裁者衰败的故事，也就是拿破仑在圣海伦娜遇见上帝的故事。

为了逃脱主教对其精神状态的不断探究，以及对即将成为战犯并被流放的令人恐怖的设想，墨索里尼声称，明天他要解散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并将带着3000人退到瓦尔泰利纳背水一战，然后他会投降。舒斯特打断了墨索里尼

* 在4月19日与墨索里尼的谈话中，主教同样提起了此事。

的话，精明地告诉他只有300人会跟他走，墨索里尼悲哀地承认这种估计可能是正确的。舒斯特意识到这对于墨索里尼不断减少的自信来说又是一次打击，于是便把讨论转回到宗教事务上来。他向他的客人询问宗教仪式方面的问题，然后又说自己感到吃惊的是，他发现掌管意大利教会命运的人却不是很清楚基本的宗教仪式细节。当意识到自己的态度在二人之间又一次引起了尴尬时，舒斯特发现更为安全的做法就是陈述他自己对于东正教的观点，即东正教永远都不应该和“真正的基督教会”天主教相混淆。

在谈话的开始，两位老人很有可能就斯拉夫人和共产主义者的罪恶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最终谈话却被抵抗派谈判者们的到来打断了。对于他们的到来，舒斯特谨慎地保持着沉默，但是却听到墨索里尼说他只相信古代史，因为现代版本都被“激情”歪曲得很厉害。他还记得领袖抱怨“德国人总是把我们像奴隶一样对待，最终还是背叛了我们。”当会谈结束墨索里尼准备离开时，红衣主教没有忘记把那本《救世主传记》再次递给领袖，以免他在匆忙混乱之际疏忽了这份珍贵的礼物。

不管墨索里尼对红衣主教打算捕获并拯救其灵魂的意图有何看法，他现在又改变了方向。他向几乎没有和他进行过谈判的反法西斯发言人喋喋不休地说起了德国的罪行。有消息传来，德国党卫军的将军卡尔·沃尔夫已于下午5时同意结束对盟军的抵抗。由于情况紧迫，讨论被迫终止，墨索里尼向抵抗派代表承诺说，他会在一个小时之内给他们进一步的消息。然而，一回到处处，他却准备立即带着亲信随从逃往靠近瑞士边境的科莫。他的做法可以和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与巴多利奥相比了。1943年9月8日，国王和巴多利奥把罗马和意大利人民丢弃给了入侵的纳粹分子和那些选择跟随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法西斯分子，自己逃命去了。

在科莫的36个小时之内，千疮百孔的萨罗共和国政权化为了乌有。在最后的危难时刻，墨索里尼和他的谋士无法决定是该前往瓦尔泰利纳还是该寻求瑞士的怜悯和援助。4月27日破晓前，他们继续向着科莫湖西岸前进，但是既没有朝着法西斯自吹自擂的防御工事进发，也没有向着边境前进。拉凯莱和年幼的孩子被遗弃在了科莫。墨索里尼给妻子写了一封很凄楚的信，恳求她“能原谅我对你做的那些没良心的错事。你知道，你始终都是我唯一真正爱着的女人。在这个神圣的时刻，我在上帝和我们的布鲁诺面前向你发誓。”

抛开对拉凯莱不朽的爱情告白，在护送墨索里尼一起走的人之中有佩塔奇和她那个饭桶哥哥马尔切洛（他们化装成西班牙领事夫妇）。*包括帕沃利尼在内的许多其他共和国法西斯分子也跟着他们离开了科莫。还有尼古拉·邦巴奇这个忠

* 在这一行人中还有刚刚20岁的埃莱娜·库尔蒂。

诚的伙伴始终和墨索里尼待在一起。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10年，那时邦巴奇是切塞纳（弗利铁路沿线附近罗马涅的一座市镇）的一名社会党记者，墨索里尼当时在那里工作。邦巴奇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1921年1月，他加入了刚刚诞生的意大利共产党。但是后来，他逐渐向法西斯独裁统治妥协，赞成意大利征服埃塞俄比亚，同时也享受着国家的新闻津贴。* 1943年9月以后，他成了墨索里尼的随从之一，时常出现在费尔特里内利别墅。由于坚持主张新法西斯主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化形式，他成为了公众人物。在这个危难时刻，他几乎成了墨索里尼的朋友，而这位领袖曾始终坚持他不需要、也不能需要友谊。邦巴奇在墨索里尼身边待到最后一刻的事实暗示着，墨索里尼来自于社会冲突和罗马涅仇恨的根源并没有被彻底斩断。

然而，这支护送队伍还存在着另一层含义，仅仅用1945年之后的怀旧情绪是不太容易解释清楚的。除了法西斯的军队以外，还有撤退下来的纳粹士兵前来增援，这些士兵塞满了两辆装甲车，德国空军中尉沙尔迈尔带领着他们，希望从某条小路穿到到达德国的领土。为了更好地隐瞒身份，墨索里尼决定独自和这些曾经的盟友一起走。他穿上他们的大衣，戴着德国头盔隐藏起众所周知的面貌特征，躲在卡车的驾驶室里，裹上一条毯子抵御着初春的寒意。在科莫湖和瑞士之间的乡村地区，游击队十分活跃。4月26日傍晚，大雨如注，第52加里波第旅堵住了位于栋戈南侧湖边的道路。在庞塞特，湖泊周围山峰险峻，游击队在路中间横放了一棵巨大的树干，还有岩石和碎石块，等待着看谁想从此经过。18个月以前，当墨索里尼首次在加尔尼亚诺确立自己的地位时，他曾有些懊恼地说道：“湖泊是处于河流和海洋之间的妥协状态，我不喜欢妥协。”他的预见是对的，他命中注定要死在科莫湖畔。

第二天早晨6时30分，有消息在游击队中传开，一队敌军正朝这里行进。经过短暂的交火，一颗飞散的纳粹军队的子弹打死了一个正在道路上方加工大理石的无辜工人，德国要求谈判。沙尔迈尔起初打算强硬一些，但是游击队派来了增援部队。游击队还注意到，邦巴奇、戈弗雷多·科波拉、梅扎索马和鲁杰罗·罗马诺虽然都声称得到墨索地区牧师的庇护，但他们的庇护是无效的。刚过晌午，当沙尔迈尔接受了意大利人必须投降的条件后，游击队认出了那个狂热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副总理弗朗切斯科·巴拉科，于是怀疑其他法西斯分子也混藏在这支队伍里。

* 警察在1937年9月18日提交了一份报告，声称他还没有“卖给”法西斯主义，但是已经准备与之合作了，并且是“出于工人阶级的利益”。墨索里尼用他的红铅笔在这段文字下面画了线。

下午3时，游击队允许这队人开始缓慢地前进并从这里通过，但是每个人必须出示自己的证件。正在这时，一个名叫朱塞佩·内格里的游击队员叫他们的头领乌尔巴诺·拉扎罗过来，极其自然地用当地方言（这对于法西斯民族的大同理想是一个莫大的嘲笑）说道：“我们抓到了一个大头儿！”他先把拉扎罗怀疑的注意力引到蜷在卡车后面黑暗中的一个身影，德军坚持说那个人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因为喝醉了躺在那儿。但是当拉扎罗扯掉了那个人身上的毯子，他知道他面对的是谁了。他用法西斯式的称呼喊道：“同志！”那人没有理睬他，他又喊到：“阁下！”那人还是没有吭声，于是他喊道：“贝尼托·墨索里尼骑士！”听到这最后一个称呼，那人才有了反应。拉扎罗摘掉了那个人的头盔，领袖果然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他脸色蜡黄，目光呆滞，好像什么都没看见似的。我看得出他已精疲力竭，但不是恐惧”，拉扎罗后来回忆道，“墨索里尼似乎彻底丧失了意志，在精神上他已经死了。”他一直拿着一把机关枪和一支手枪，却没有要用它们的意思。在解除武装后，他被正式逮捕了，并被带到栋戈的市政厅。接下来的那个晚上，也是他的最后一个晚上，墨索里尼是在栋戈的兵营中度过的。在他的生命中，复仇之神的最后一次到访，实际上要比这位能力超凡的领袖所预言的那种富有戏剧色彩的形式平凡得多。

其他人也被带到了栋戈：不会说西班牙语的佩塔奇兄妹俩已经无法要求外交豁免。帕沃利尼企图逃跑，但是被子弹击中，由于害怕立即毙命，他还是被拖了回来。那天傍晚，在米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领导成员桑德罗·佩尔蒂尼，最终成为1978年至1985年间意大利共和国的总统，在广播里宣布了领袖已被抓获的消息。佩尔蒂尼没有隐藏自己的观点，他在民族解放委员会上对他的同志们说，应该“像对待一条疯狗”那样把墨索里尼打死。

墨索里尼生命中的最后24个小时笼罩着毫无意义的争议。其中的一个插曲是关于一个文件皮包的命运，墨索里尼被第52加里波第旅拦截的时候随身带着这个包（似乎没人问过那里面是否包括一本已被翻阅过的舒斯特写的《圣本尼迪克特》）。显然，墨索里尼到最后一刻仍很珍惜这个公文包，它里面到底装着什么东西，存在着很多说法。其中有墨索里尼对1943年7月25日那次政变中逮捕他的人所提出的诉讼材料以及他们的反诉讼材料，墨索里尼显然直到最后还很珍视这些东西。还有人声称文件里包括一些丘吉尔和其他一些人与法西斯达成妥协的信件，而这些人“战后”是不想与法西斯有任何关系的。除了对那些热衷于阴谋推理的人而言之外，不管有没有证据，这样的揣测的确毫无意义。另外，还有一些人就4月27日到28日所发生的事件的确切时间和性质展开了争论。官方的记录是，墨索里尼和佩塔奇于4月28日下午16时10分在“5月24日之路”附近被枪决（这是一个地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的名字是以意大利在1915年决定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一天命名的），它就在圣吉利诺迪梅泽格拉村庄的外面。那天早晨，

这对情侣在附近的一间游击队用过的农舍中团聚了。随后，一些共产党人带着从米兰那里下达的命令来到这里，要对墨索里尼进行即席判决。起初，墨索里尼还以为行刑班头领瓦尔特·奥迪西奥是来释放他和佩塔奇的。佩塔奇费力地钻进奥迪西奥简陋的菲亚特1100汽车里，她那双黑色羊皮高跟鞋很是碍事。但是，当墨索里尼被放到贝尔蒙特别墅门前，也就是行刑地点时，他“温顺地服从命令，就像一只羊羔一样”。子弹第一次没有打中目标，据奥迪西奥说，墨索里尼当时因恐惧而发抖，“在死亡面前表现出动物本能的害怕”。最终，墨索里尼倒下了，被打成了筛子。

对两个人的死有好几种版本的说法。有些人说其实这两个人早就被枪毙了，可能是午前在其他地方行刑的。当在梅泽格拉的刑场行刑时，他们早已是尸体了。新法西斯政治家及记者乔治·皮萨诺坚持强调这两个人不是一起死的，共产党和他们的游击队朋友密谋把真实情况神秘化，他认为这是典型的邪恶的共产主义方式。更为浪漫的说法是，墨索里尼跃起打算保护佩塔奇，遭到看守她的人的殴打，在随后混乱的挣扎中被射死，这样一来墨索里尼在最后一刻就成了一名英勇无畏的骑士。在这个版本中，佩塔奇是后来被打死的，虽然并非有意，但也没有其他的选择了。这种说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少直接证据，最相信这种说法的人完全有理由希望墨索里尼死得英勇些。

值得强调的事实是，墨索里尼的死在当时并不是唯一困扰意大利的事情。游击队刚刚在栋戈射死了在庞塞特或周围地区捕获的那群人中的15个人，包括帕沃利尼、邦巴奇和泽尔比诺（意大利共和国最后一任内务部长）。当尸体被运到米兰公开展览受众时，又有8名法西斯党的尸体被运到了这里，其中包括阿基列·斯塔拉切，他在20世纪30年代一直担任着法西斯党的书记。在20年暴政及5年世界大战期间，根据不太精确的统计数据，死亡人数估计接近1.2万人。而墨索里尼在1940年6月欣然加入的战争本身就吞噬了40多万意大利人的生命，这其中还未包括那些在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帝国战争以及西班牙内战期间被意大利人杀害和致残的人数。众所周知的罪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这些事件提供了更为重要的背景，而一些可怕的词语，如“奥斯维辛”和1945年8月后的“广岛”，可以使人们对这段历史有更加深刻的了解，它们提醒人们，人类曾经差一点跌入无底的深渊。

了解这些之后，作为历史学家，我不会为贝尼托·墨索里尼的死感到遗憾，也不打算为他的死增添一些光环（或是夸大他的独特性）。所有证据都表明，在这位独裁者的生命被那些子弹结束以前，他在心理、精神和政治上就已经死亡了。然而，一个恐怖的场景的确值得思索。不管是在梅泽格拉，在米兰还是在本书后文叙述的事件中，墨索里尼的结局都是很“正常”和很“传统”的。落败的独裁者逃到他人知道的地方，像一只老鼠一样被他的臣民逮住，臣民因他的罪行和无能

又把他杀掉以示报复。这和希特勒的命运截然不同，后者在藏在柏林城下面的弹药库里自杀了，远离市民遭受的深重灾难以及征服者们经历的无限艰辛。墨索里尼的死也不同于斯大林，斯大林是在他的别墅里因中风与世长辞的，而对于他的人民和追随者来说，连他的别墅都是一个可怕的所在，这些人后来紧张地围在他床边，努力地下决心去察看他们的上司是否真的死了，并且不知道哪种选择更加安全：是应当尽早承认还是应当晚一些承认他的去世。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生命的一刻夹杂着对走向毁灭的现代性的恐惧（同样，他们即将拥有的历史身份也是如此，不管是伟人或是邪恶的人）。

但墨索里尼的死却并非如此。法西斯主义残害了太多的生命。在法西斯崛起并掌权的过程中，其倒行逆施的国内政策，其在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的不义之举，其插手西班牙内战多管闲事，以及后来对于其自身来说有些特殊的“二战”，意大利墨索里尼的独裁统治早已把至少100万人送进了坟墓，或许更多。这是一份残酷的记录，而这本传记的意图也是自觉地反法西斯的。毫无疑问，我必须承认的一点是，人类所犯下的罪行、做出的蠢事以及酿成的悲剧贯穿着20世纪的历史，而墨索里尼在其中的位置却相当平凡，只不过是那些使欧洲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伤痕累累的暴君杀手中的最不起眼的的一个。尽管用历史编纂学晦涩的行话来说，也能够通过“结构主义”而不是“意向主义”来有效地对希特勒等人进行剖析，但是墨索里尼却更明显地反射出了他的民族、阶级和性别的特性。很可能的一点是，希特勒等人的自由意志也像墨索里尼的一样，时常受到他们所支配的社会的束缚、限制甚至拘禁。但是我的任务是为这位领袖写一本传记，而并非记述他在当代历史上声名狼藉的独裁统治。因此，我必须把故事从头讲起，从意大利一个婴儿的出生讲起，看看这个名叫贝尼托·墨索里尼的男孩儿是如何地不同寻常。

2 墨索里尼家族和少年时的贝尼托

1883年7月29日是一个星期日，下午两点钟，亚历山德罗·墨索里尼和罗莎·玛尔托尼夫妇的家里发生了一件喜事：他们的儿子降生了。附近有一个小的行政中心普雷达皮奥，它位于罗马涅亚平宁山脉的山麓上，居高临下地扼守着一条从省首府弗利通往托斯卡纳的小路。墨索里尼夫妇所居住的小村庄名叫多维亚，村庄的房屋就散落在普雷达皮奥这个小行政中心的下方。7月底正是意大利北部夏季最热的时候，当地的农民无疑正在关注着即将到来的收获季节的收成情况。而就在这个婴儿降生的那一刻，一个雷电击中了哈普斯堡皇室位于维也纳的美泉宫上的双头鹰标志并把它掀翻到了地上。一个匈牙利的狂热分子后来断言，这一事件似乎预示着这个婴儿的降生以及他日后对国家产生的重要影响。7月30日，这个婴儿在当地的罗马式的教堂—圣卡西亚诺教堂里接受了洗礼，并被取名为贝尼托·阿米卡尔·安德烈亚·墨索里尼。今天，游客还可以找到这个教堂（大部分是在法西斯统治时期重建的）并买到一张墨索里尼洗礼时使用的洗礼盆的纪念明信片。就是这个洗礼盆里所盛的圣水洗出了未来的领袖。

尽管年轻的墨索里尼已常常显示出有别于他人的独特个性，即易怒和野心交织在一起，但多维亚毕竟不是普雷达皮奥，而普雷达皮奥也不是弗利，弗利也不是博洛尼亚，博洛尼亚也不是米兰或罗马，并且这些伟大的意大利城市都不是巴黎。而墨索里尼在憧憬着这些梦想中的大都市，他的家族在附近地区也还是有一定声誉的。他们可能没有被人尊称为“先生”，但他们也应该更不愿意混同于社会的最底层。在法西斯专政的最后时期，出了无数为墨索里尼所做的圣徒传记，其中一部的作者还努力地证明墨索里尼具有贵族血统——作者声称，确有一个名叫“墨索米尼”的人于公元996年从博洛尼亚来到了威尼斯，因此，他的家族的社会地位也上升了，几个家庭成员在医学领域相继成为了知名人物，还至少出过一个圣洁的牧师，并且在证明其在“道德和公民精神方面的崇高”。这位热心而充满敬意的研究者还投入到了对有关争议的墨索里尼家族史的研究之中。与贵族阶层的联姻最终使得墨索里尼家族可以使用“伯爵”这个称号，但在1560年间，身为贵族

的墨索里尼家族又离开威尼斯回到了他们的祖居地罗马涅地区。对墨索里尼家族的记载在此之后有一个间断的时期。但是，墨索里尼的一位英国崇拜者又提出了新的主张，称墨索里尼家族的一个成员曾于18世纪在伦敦成为了一个作曲家并“取得了一些名声”；还有一个意大利的专家提出了他谓之于“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墨索里尼家族是真正的罗马血统。此外，还有一些对这个独裁者持友好或敌视态度的人也在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他“其实”是一个塞尔维亚人，或者马其顿土耳其人，或者阿根廷人，或者甚至是一个波兰籍的犹太人。

20世纪20年代末，当这个独裁者获悉了更多关于他的家族血统的虔诚的研究结果时，他公开地对此表示不屑一顾，并劝阻他的追随者们不要把他们的研究扩展到更近的时期。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里，拥有贵族血统对一个领袖来说是难堪其重负的。但墨索里尼的这种谦虚仍然是有限度的。1943年7月，一名年轻的外交官埃吉迪奥·奥尔托纳参观了一个位于普雷达皮奥的城堡，这个城堡是由一群心存感激的民众为墨索里尼家族捐资重建的。这个年轻的外交官注意到，在这个城堡的一面墙壁的显著位置上，陈列着墨索里尼家族的家谱。^{*}奥尔托纳并没有说明家谱名录的细节，也许该名录只是更多地记录了有关墨索里尼家族发家史的一些历史事实。17世纪至18世纪期间，墨索里尼家族居住在梵蒂冈统治下的罗马涅地区与自由的托斯卡纳地区之间的高山边界地区，他们是靠租种别人的土地维持营生的小佃农。他们一般有自己租种的土地，而这些土地的拥有者是更为尊贵的一些当地贵族，如卡尔博利家族等。在墨索里尼家族中这样的成员有弗朗切斯科·墨索里尼和雅各布斯·安东尼奥斯·墨索里尼。到了19世纪末，墨索里尼家族已被迫向下迁移到波河平原，这当然是为了能够找到一个受雇于人的工作，也许同时也是受到了那些正在成长的中心城市的文化的吸引，如博洛尼亚和弗利。史上有记载的墨索里尼家族的第一人是贝尼托的祖父路易吉。当地人还记得他是极有个性的人，他常穿着国民警卫队的制服在城镇的广场上昂首阔步地四处走动。在1847年至1849年发生的政治骚乱期间，他第一次穿上这身制服。他喜欢吹牛，经常向人吹嘘自己曾在关押教皇庇护九世^{**}的监狱里干过事。对于一个曾在神学院受过教育的人来说，庇护九世的命运的确令人叹惜。从其他方面来讲，路易吉·墨索里尼也是一个失败者。他因为经济上的需要而把自己的土地卖给了他的兄弟彼得罗，在此之后又迫于生计而受雇于人。路易吉直到1908年1月才去世，那时

^{*} 可能是由墨索里尼的妻子拉凯莱摆设的，她在此处待的时间要比她丈夫长得多。

——作者注

^{**} 庇护是15世纪以来的历代意大利籍天主教教皇的称号。

——译者注

他在家乡已经算是一个耆耆老朽了。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墨索里尼家族的社会地位当时正处于下降之中，而亚历山德罗和贝尼托所具有的那种人格和个性也应该部分地归因于他们想让其家族恢复富有和受人尊重的地位的强烈愿望。

对于“贝尼托·阿米卡尔·安得烈亚”这个名字——一个奴颜婢膝的传记作者在后来说，领袖墨索里尼可以省去他的姓，理由很明显，因为苍天已经赋予了他至高无尚的荣誉，他的形象即使放在最亮的群星之中也会发出灿烂的光芒。但实际上，为这个婴儿取这样一个名字是有另外一番含义的。按照意大利农民家庭的传统，这个孩子可能会随他的祖父而取名为路易吉，之所以取贝尼托这个名字是出于对贝尼托·胡亚雷斯的崇敬。贝尼托·胡亚雷斯是墨西哥的一个革命家，他打败了哈普斯堡皇室的皇帝麦克西米连。出于对皇室的憎恨，他宣布拥护“德国”王朝。后来，在复兴运动期间，他遭到驱逐，但仍在的里雅斯特和特伦蒂诺就职，身上带有一些爱国主义的色彩。但亚历山德罗在这个名字之外还坚持要加上另外两个名字，每一个名字都代表着当地一个卓越的“社会主义者”：阿米卡尔代表着阿米卡尔·奇普里亚尼，安得烈亚代表着安得烈亚·科斯塔。母亲罗莎笃信天主教，坚持要按天主教的传统为贝尼托进行洗礼。而父亲亚历山德罗却是一个暴躁的反教权主义者和一个支持人民权利的革命者。因此，贝尼托的洗礼便真实地反映出父亲和母亲在这件事上达成的妥协。

在法西斯政权的统治下，许多事情都要与现实环境相适应。亚历山德罗曾干过一段时间的铁匠，于是就有人说：父亲锻造了钢铁，他的儿子锻炼了人民。然而，更有意思的是，到1883年时，墨索里尼的父亲已是当地一个知名的“社会主义者”。亚历山德罗于1854年11月11日出生在一个农场，那时，他的父亲，也就是贝尼托的祖父，还自己拥有这个农场的土地。当亚历山德罗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的时候，他就参加了当地的政治运动。1876年，他已是“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社会主义组织代表大会”在他的家乡普雷达皮奥及邻近的梅尔多拉地区的正式代表。这些“危险分子”在博洛尼亚举行了会议，博洛尼亚是那一地区的首府，城中有着精美的柱廊。对于亚历山德罗这样一个没见过什么世面的乡下人来说，博洛尼亚的“文化”和“历史”毫无疑问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结婚之前，亚历山德罗·墨索里尼总是很自豪地称自己是科斯塔和奇普里亚尼的追随者，甚至是朋友。这两个人都是在意大利发展社会主义的关键人物，科斯塔还在1882年成为了第一个被选入意大利议会的“社会主义者”。据说，亚历山德罗·墨索里尼支持和帮助了他的竞选运动，并且直接负责在普雷达皮奥及其周边地区动员了约几千名支持者，他们的投票在后来被证明对科斯塔的当选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科斯塔和奇普里亚尼都是激进的实践主义者，而不是理论型的马克思主义者。奇普里亚尼曾与加里波第在阿斯普罗蒙特作战，还在克里特岛参加了希腊反抗土耳其统治的斗争，并参加了巴黎公社。参加巴黎公社使他遭到了惩罚，他被囚禁

在新喀里多尼亚岛的监狱里。他不是个正统的“墨守陈规”的社会主义者，倒更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典型的表现是他在精神上非常崇高，但在现实中却喜欢不怎么精心准备就去发动起义。看来，迈克尔·巴枯宁*对羽翼未丰的意大利社会主义的影响与卡尔·马克思是同样大的。科斯塔也是这样，至少在他的早期生涯里，发动革命是他的政治理念的主要内容。这样一个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名字却被后来的法西斯头子所借用，真是有点讽刺意味。1874年，科斯塔宣布，他的政治目标是“从整体上毁灭这个国家，包括它的经济、政治和宗教……废除其军队、银行和宗教仪式”。后来，他变得正统了一些，并且因其穿戴的精致和举止的得体而赢得了一些声誉。1892年，一个统一的意大利社会党成立了，而科斯塔对这个党的成立起着主要的影响作用。按照定义来解释，科斯塔和奇普里亚尼都是自觉的国际主义者，都向往人与人之间能有兄弟般关系的乌托邦，他们在大体上或者至少从理论上不屑于为意大利这个国家和民族谋取一些小小的利益。

亚历山德罗·墨索里尼从未登上过全国性的政治舞台，但在当地却的确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早在1878年，他就被作为一个潜在危险的革命者而引起警察的注意。1880年5月，他就因威胁他人人身安全和财产而受到正式的警告。据计算，作为一个激进主义分子，他在当地的出版物上一共发表了至少20篇文章，不言而喻，这对于一个只受到过一点点正规学校教育的人来说，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在他儿子统治意大利时，有人写了一部传记，称他因“批判所有的恶行和腐败堕落”而名扬当地。然而，1889年，他的革命热情减退了，变得更喜欢妥协。他的社会党也与当地的自由党人合作并把统治普雷达皮奥的教权主义者赶下了台。从那之后，亚历山德罗就在镇议会里供职，先后担任过很多个职务，最后官至副镇长。他有一段时间是单纯以社会党为基础，有时是和其他党派联合。1891年，为了给镇里买一台现代化的脱粒机，他非常明智地去了米兰，并且把他的长子也带去了。从那之后，他把理想与现实结合在一起，在普雷达皮奥发起成立了一个合作社，这个合作社一直存续至1898年。据记载，他还支持在镇里开通电报，支持镇里的乐队，促使镇里拿出开支补贴给当地的穷人以满足他们在医疗

* 迈克尔·巴枯宁(1814~1876)，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作家。1842~1848年巴枯宁辗转于德、法、瑞士、比利时等地。1847年，巴枯宁在巴黎举行的纪念波兰人民1830年反沙皇政府起义17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说，对沙皇专制制度进行严厉抨击。1849年5月，他参加德累斯顿人民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被捕。1861年巴枯宁重返欧洲。1846年会见马克思，要求加入第一国际。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他发表了一系列宣传无政府主义的著作，其中《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集无政府主义观点之大成。1872年因企图分裂第一国际，在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第一国际。1876年7月1日，巴枯宁病死于瑞士。

方面的需求。更让人吃惊的是，1900年，他正式对教皇翁贝托一世的被刺表示遗憾，称这个教皇在内心里还是一个“绅士”。

然而，在自由党当政的意大利，身为一个社会党党员是有危险的。1902年发生了一场暴动，亚历山德罗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但还是被捕并且被监禁了6个月。对此，正如给他写传记的作者所强调的那样，是“不公平的”。祖父、父亲和贝尼托都曾出于政治原因而经历过牢狱之灾，这显示出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在当时的意大利社会中的确是不同寻常的。监狱生活的经历对亚历山德罗的健康和精神都产生了影响，而妻子罗莎于1905年2月的去世，可能更让他丧失了继续做一个政治激进分子的勇气。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他的社会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就在罗莎去世前的几年，她继承了一笔遗产，从而使家庭的财富增加了，社会地位也随之上升。根据墨索里尼的妹妹埃德维杰的回忆录上的记载，当地的农民开始谦恭地称呼亚历山德罗为“老板先生”。从1908年开始，这个家庭把当地的一条河流——拉比河沿岸的土地租给别人耕种，每年能收取490里拉的地租。

妻子去世后，好像是在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亚历山德罗离开了曾是他的政治权力根据地的普雷达皮奥，并在弗利郊区开了一家乡村旅馆，做起了小旅馆的老板。在那里，他与自己在年轻时曾追求过的一个名叫安娜·隆巴尔迪（她已恢复使用她娘家的姓）农民寡妇生活在一起。安娜·隆巴尔迪还把她的5个女儿一起带到了这个家庭，其中有一个是十几岁的小姑娘，名叫拉凯莱·圭迪。就是这个拉凯莱很快成了贝尼托的社会党同伴，并且最终成为他的原配夫人。亚历山德罗的另一个问题可能就是喝酒了。他参加过多个酒友组织，其中较早的一个名叫“酒鬼俱乐部”，他们有一个很自豪的口号，宣称其成员打算“活着工作，死了也要战斗”。虽然更多宽容的旁观者把亚历山德罗的健康问题归因于他患上了关节炎，但他儿子的政敌们却毫不怀疑亚历山德罗在晚年已是一个老酒鬼。不管真实的情况到底如何，就在这个名叫“狙击手”的带有一些爱国主义色彩（缺少了些社会主义者的国际主义精神）的小旅馆里，亚历山德罗于1910年11月去世了，享年56岁——墨索里尼家族的大多数成员都不是很长寿。*去世前不久，这个小旅馆老板想让他的大儿子在从事教师工作的间隙回家到小旅馆里当侍者。这当然使儿子很不高兴：“那是多么糟糕的事情啊！一名教师……一个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屈尊来做一个从事简单工作的侍者。”无论年轻时曾有过多么高的革命热情，晚年已成为有产阶级和小生意人的亚历山德罗·墨索里尼已不再热衷于坚持平等的原则，转而关注起能体现个人情况的不同阶级和社会地位之间的复杂的差别了，特别是与有产阶级的差别。

* 路易吉自己的父母30多岁时就死了，而路易吉的妻子40岁出头时也死了。

但是，墨索里尼家族里总是存在着政治冲突。在这方面，一个有影响力的家庭成员是罗莎·玛尔托尼，即亚历山德罗的妻子和墨索里尼的母亲。在法西斯统治时间，罗莎·玛尔托尼被描述为“领袖的母亲”，代表着她的孩子们尤其是贝尼托“回忆中最美好的情景（并且这最美好的情景是永恒的）”。罗莎·玛尔托尼生于1858年4月22日，她的背景和世界观与丈夫是不一样的。后来的一本传记夸大其词地声称，她的父亲是一名兽医，经常谦恭并尽其所能地带一些药品给当地的牲畜治病，并且还在离弗利3公里的一个村子里为当地农民传授科学知识。但是，除了拉凯莱以外，圭迪的姐妹们却都认为罗莎的父亲并不识字。罗莎·玛尔托尼家的社会地位稍高，这样她就接受了一些学校教育。事实上，1876年，18岁的罗莎获得了一个可以在小学里任教的文凭。后来，在法西斯传记作家为她所做的传记里，把她的从教称为“现有的适合妇女从事的最崇高的职业”。第二年，她被安排在多维亚村任教，这个村里的家庭居住比较散落，村里人把小学校舍称为瓦拉诺。罗莎当时的薪水是每月50里拉，虽然非常微薄，但比一个农民的收入还是要高一些，而一个农村姑娘更是不可能挣到这么多钱。从罗莎·玛尔托尼于1894年写给普雷达皮奥议会的一封信中，我们就可以了解有关那个学校的情况（墨索里尼的家庭可能住在与校舍相邻的两间房子里）。她在信中请求议会为校舍装上窗户，因为冬天狂风会把雪花吹进教室，弄得她和学生满身都是，她因此还让学生们把教室封死了。

让罗莎的父母感到沮丧和后悔的是，就是在多维亚这个小村子里，他们多才而能干的女儿遇到了亚历山德罗·墨索里尼并“下嫁”给了他。因为在他们所在的小圈子里，他们家很可能算是唯一上进的“知识分子”。1882年1月，两人举行了宗教仪式喜结连理，这的确有些让人吃惊，因为不仅是亚历山德罗·墨索里尼本人经常在平时的革命性的言辞中对宗教仪式表示不屑，而且就连他们的长子后来也长时间远离宗教仪式。罗莎是远近闻名的虔诚信徒。她常带着心爱的贝尼托按照宗教节日的日程安排参加宗教活动，这让墨索里尼后来在需要的时候也会打起天主教的幌子，称其为“我儿时的宗教信仰”（尽管他在其他场合也曾坦言，他讨厌熏香和信徒身上的气味以及摇曳不定的烛光和管风琴的嗡嗡声）。后来一个传记作者这样声称，年轻的墨索里尼喜欢阅读《圣经》，并且至少能说出《利未记》和《民数记》中的一些名字。成年之后，他的记忆力仍然非常精确，这也证明了他的确有很好的智力和理解力。

罗莎·玛尔托尼对宗教的虔诚是传统型的，并且意志非常坚定。她的教学方法也有些类似。1900年，她向她的上级解释道：

“在教授地理课时，我采用的是最为合理的方法，尽量避免拘泥于复杂的命名，因为这样只会在学生的头脑中留下一些抽象和无用的概念，而这些概念在学生头脑中也只能是停留片刻然后就被忘得一干二净了。而关于历史课，我则着重于对学生

情操的陶冶，把塑造学生的性格放在首位，让他们有坚强的意志和决心。”

她还特别补充说，如果教室里的灯光不是那么昏暗并且照明能够更有保证的话，她的教学方法将会更加有效。

一个狂热分子后来宣称，墨索里尼具有的那种勤奋和自助精神与塞缪尔·斯迈尔斯*所提倡的精神有很多共同之处。但是事实上，在墨索里尼家族中，罗莎·玛尔托尼是最明显的“维多利亚式”的保守派，是一个“改良主义”的忠实信徒。虽然自己并没有获得提升，但她却是一个好教师，与丈夫相比，她在当地更为人们所尊重。到她46岁去世时，她已经为自己的职业和家庭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举行葬礼时，为她送葬的队伍超过了1000人，这足以证明她的努力和奉献，以及墨索里尼家族的声望。

到了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的宣传家们喜欢宣传“领袖在每一个场合都要赞扬意大利妇女，领袖的母亲和妻子是意大利妇女的典型代表，她们在平静和家庭生活中经历着历史，正是她们让领袖了解了意大利的妇女”。另外一个容易轻信的传记作家甚至回忆说，罗莎曾送给幼时的贝尼托一只小白兔作为宠物，他非常喜欢，还常常亲吻它的温暖的粉红色鼻子。更为典型的是，这些已经作古的作家们还会补充说，在婴幼儿时期经历过这些带有预示性的事件之后，墨索里尼已经神秘地汲取了意大利妇女的精神，并把其中的精髓用自己的坚强的男子汉气质表现了出来。然而，另外一个对墨索里尼更为狂热的传记作者却很不屑一顾地宣称：“对于墨索里尼来说，父亲亚历山德罗·墨索里尼和母亲罗莎·玛尔托尼的作用就像是约翰（施洗者）对基督的作用一样。他们只是上帝和历史的工具，被赋予的任务就是照看一个最伟大民族的弥赛亚**”。然而，这是对墨索里尼的父母施加给他们的儿子的影响的一种武断的曲解。除了充当监护人之外，亚历山德罗夫妇还把他们的许多态度、观念和习惯传给了墨索里尼。反过来，墨索里尼思想中的一些混乱和折中主义也反映出父母间真实存在的世界观上的差别。

家里还有两个弟弟妹妹住在瓦拉诺校舍隔壁的房子里。最小的是个女孩，名叫埃德维杰，生于1888年11月10日。她很少公开参与哥哥的生活，但却承担起

* 塞缪尔·斯迈尔斯（1812~1904），英国19世纪著名的社会改革家和人生随笔作家。他写过许多脍炙人口的人生随笔作品，如《自己拯救自己》、《品格的力量》、《人生的职责》、《金钱与人生》、《信仰的力量》、《命运之门》等，这些作品对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的道德风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98年伦敦《金融时报》发表纪念斯迈尔斯的社论，认为“同其他各种形形色色的理论家相比塞缪尔·斯迈尔斯将带领人类更加健康地进入21世纪。”塞缪尔·斯迈尔斯有一句名言说：“我既不崇拜偶像，也不信仰鬼神。我唯一的信条是相信自己肉体和精神的力量。”

——译者注

** 弥赛亚，犹太人盼望的复国救主，这里指墨索里尼。

——译者注

了监护墨索里尼的孩子的角色，成了一个合格的姑妈。她也凭借自己的能力和良好的判断力而受到墨索里尼的尊敬。更显眼一些的是墨索里尼的二弟阿纳尔多，他出生于1885年1月11日，比贝尼托小18个月。好几年里，兄弟俩与同龄的孩子一样，一起睡在一张铁架床上（据称床是由身为铁匠的父亲做的，并且从照片来看，这张床还装饰有男小天使和葡萄）。兄弟俩在有生之年关系一直非常好，直到阿纳尔多于1931年12月21日早逝，享年46岁（与他母亲的寿命一样）。虽然阿纳尔多已习惯于谦恭地介绍自己为“小墨索里尼”，但他通常是他哥哥的一个关键的密探——成年之后，他与哥哥多年来一直在每天晚上10点钟通电话——他可能是贝尼托唯一一直最为信任的人。相比之下，墨索里尼的长子维托里奥却从来没有完全得到过父亲的信任。

像贝尼托·阿米卡尔·安德烈亚一样，父亲也给阿纳尔多起了一个很革命的名字。于是就有人夸耀说，这证明亚历山德罗·墨索里尼的政治经验、社会地位和野心都有所增长。阿纳尔多·达·布雷夏是12世纪的一个反对等级差别的清教异教徒，因叛乱而被基督教会绞死。在19世纪的意大利，反教权主义者都把他当做“民间自由的传道者”来纪念。除了在起名过程中试图从历史中寻找灵感和渊源之外，另一件事也反映出墨索里尼家的社会地位的上升：阿纳尔多不是罗莎亲自带大的，而是由一个农妇奶妈带大的。虽然取了一个异教徒的名字，但他可没有成长为一个异教徒。他在教育方面受到母亲很大影响，当然父亲的影响也是有的。他比哥哥长得敦实得多，但是到1920年之后，他看上去已经不怎么健康，总是气喘吁吁的。阿纳尔多的额头比贝尼托的更高一些，再加上他的稍稍凹进去的下巴，都表明他是墨索里尼家的一员。

阿纳尔多在大学里主攻农业科目。1902年，他大学毕业了，并因此有资格称自己是“墨索里尼博士”，而他确实也曾适时地这么称呼过自己。阿纳尔多曾跟随哥哥出国前往瑞士，并在那里做过劳工和园丁。1905年底，母亲去世，阿纳尔多匆匆地赶回家。但让他感到沮丧的是，他还是没有能及时赶回来最后拥抱母亲一次。他当时正受雇为人传授多种农业技术，先是在切塞纳，后来又到过盛行天主教的威尼托地区。他于1909年结婚，并在此后的10年里先后养育了3个孩子。1914年，他转行到当地的行政机关工作，谋得了一个公共秘书的职位。1918年，他所在的镇陷落到了奥地利人手中，于是他被征召（不是自愿的）参加了意大利陆军。此后不久，得益于他的教育层次和阶级地位，阿纳尔多被送到军官学校学习。这样，他很平静地度过了这场战争，并且成了一名中尉，这个军衔可比当时还是下士的贝尼托·墨索里尼高多了。

不管参军或服役给了阿纳尔多·墨索里尼多少东西，他一直都坚信他家庭里的长幼等级要比国家权力的等级更为重要。他很快就开始帮助兄长了，一方面是出于法西斯信仰的原因，更多的还是出于世俗的观念——他的哥哥还记得，阿纳

尔多花在照顾贝尼托的家庭上的时间要比照顾贝尼托本人的时间更多一些。一个法西斯的唱颂歌者补充说，阿纳尔多像个影子一样不离左右，但他却“没有妨碍伟大的兄长的身体运动”。还有人天真地说，唯有贝尼托·墨索里尼比阿纳尔多更加了解意大利人民，他是老师的老师。事实上，阿纳尔多·墨索里尼还有另外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他对宗教的虔诚，他的政治观点是带有教权主义色彩的。他妻子的兄弟还是一个牧师，最终为墨索里尼已经长大的孩子施行了洗礼。对于法西斯对社会和精神革命的 attack 的真实性，分析家们仍有争议。但值得一提的是，阿纳尔多对现状还是满意的，当然也包括教会，也许还包括国家的现状。小墨索里尼不是一个革命型的人。不管是在普雷达皮奥还是在周边地区，人们都记得他是一个“好家伙”。而他的哥哥则恰恰相反，是个有名的“坏家伙”。

法西斯喜欢宣传说，墨索里尼“来自于人民，并且了解人民所有的渴望。”当然，墨索里尼一家的背景是有些特殊，它并不能涵盖意大利其他的时期，以及其他的社会阶层和地区。然而，从任何关于墨索里尼的个性和思想的读物中，仍然能够发现有关他的家庭以及罗马涅地区这个他出生的小地方的一些痕迹。

当阿纳尔多和贝尼托·墨索里尼进行一些亲密的谈话时，他们会像意大利其他家庭的兄弟一样，很自然地用方言交谈。这种在语言使用方面的偏爱也反映出意大利在当时出现的一些新事物及存在的缺点。1883年，现代意大利还没有经历完一代人的时间，它定都罗马的时间也没有超过10年。类似的，现代意大利语也是刚刚形成。现在的语言历史学家称，1860年意大利统一的时候，只有2.5%的意大利人（大约60万人）能够轻松而自愿地使用民族语言。

当时和之后的民族主义者承认，意大利的统一是很自然的事情，并且自豪地确信意大利民族是一个原发性的民族，而亚平宁半岛上的人种血统也具有永恒的一致性。但事实上却不是这样。虽然法西斯分子们在鼓吹罗马的永恒特征和文艺复兴运动的辉煌，但由自由主义统治的意大利实际上却是一个脆弱的国家。在国际上，意大利被要求扮演的是一个暧昧的，甚至是可怕的“最弱的大国”的角色。在贝尼托出生前14个月，意大利的外交家就促使意大利与德意志帝国和哈普斯堡皇室统治下的奥地利结成了三国同盟。这是一个奇怪的同盟，正像民族统一主义者叫喊的那样，复兴运动*或者叫国家统一事业还没有完成，因为奥地利还统治着的里雅斯特和特伦蒂诺。既然这段时期是帝国主义时代，那些掌握政府权力的人就在深思：也许民族统一主义者的热情可以被削减，而欧洲的紧张局势可以被转嫁到非洲和更广的世界范围内。1883年，保守的伦理学家及政客悉尼·松尼诺为意大利规划了一个“宏伟的殖民未来”，而意大利的外交部长帕斯夸莱·斯塔尼斯

* 复兴运动，19世纪为解放和统一意大利的运动。

劳·曼奇尼——一个那不勒斯人，也积极地投入到为帝国规划掠夺计划的过程中。1885年1月，他派遣一支伯萨利尼联队占领了红海沿岸港口马萨瓦，自此开始了对厄立特里亚的占领，并使之后来成为意大利的殖民地。从这个荒僻之地到广袤而脆弱，仍处在中世纪的埃塞俄比亚王国，也许意大利可以在所有这些土地上展现现代帝国的光荣、神圣和财富，同时也可以向意大利人证明，对意大利来说，参加奥地利和德国组成的联盟要比参加敌人的联盟更加有利可图。

这些国际形势的变化也对墨索里尼家族成员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影响。自由党更加直接地与他们接触，一个突出的议题是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加富尔和他的自由党朋友们组织了一个反教权主义组织，他们的一项主要纲领就是“现代化”，而意大利的统一违背了以教皇庇护九世（1846~1878）为首的梵蒂冈教廷的意愿，并且也对他们造成了伤害。19世纪80年代，在位的教皇是列奥十三世（死于1903年）。他在当选后，变成了一个年老的反动分子。异教徒或持无神论的自由党此前在罗马篡位并夺取了政权，而他们的政权后来被颠覆了，现在还不清楚是否是教会策划颠覆了他们的政权。

1883年时意大利的总理是阿戈斯蒂诺·德普雷蒂斯，他是一个伦巴第族人，同时也是一个共济会会员。他提倡多数派的变化论（指由多数派政府吸收各派人士参加，以免出现真正的反对派），即提倡一种非意识形态的政治路线，从而为自己赢得了声誉。他的政府成员来自中间派别，同时，他还通过不断的联盟过程来收买左翼和右翼的“极端主义”反对派。他自己当然是最佳的领导者，他非常熟练地为这些反对派提供下议院议员的位子作为好处和报偿，从而把这些人拉入统治阶层的主体内（这种做法被一些伦理学家看做是“腐败”）。德普雷蒂斯留下的遗产是持久的——在大多数人看来，1946年之后的意大利共和国仍旧保持着他的非意识形态的传统——但是，在19世纪80年代，他的做法仍遭到了批评和挑战。意大利当时的选民人数很少，只占到全国人口的2%，因此也很容易控制。1882年1月，德普雷蒂斯自己也承认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源自欧洲更为工业化的部分，并通过选举改革的方式从北部扩展到了意大利半岛。这种变化让参与选举的人口比例增加到了7%。但德普雷蒂斯仍然有办法把这一数字控制得比较低，因为意大利的农民绝大部分都是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所以他的办法就是规定选民必须能够识字。

德普雷蒂斯以及之后的几任总理——德普雷蒂斯于19世纪80年代在任，90年代是弗朗切斯科·克里斯皮*，而于1903~1914年在位并成名的是乔瓦尼·焦

* 弗朗切斯科·克里斯皮（1819~1901），意大利政治家，在意大利的复辟王国中担任总理（1887~1890年和1894年），曾提议与德国建立巩固的联盟。

利蒂——都承认，对于这样小规模选民，仍然可以通过传统的手段进行“控制”。然而，从19世纪80年代之后，所有的意大利政治家们都必然要专注于当时的“社会问题”：占人口多数的大众仍然游离在他们的政治体系之外。怎样才能把这些大众安全地“国有化”，从而把他们转变成为忠实的意大利国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此后的一段时间之前，这一问题一直是意大利政界所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

统治意大利的自由党有两个主要的敌人，每个敌人都注定创立他们自己的现代的大众政党。正如前文提及的那样，一个是由天主教徒组成的，他们主张要么恢复教皇的统治权力，要么建立一种像《新事通谕》里描述的那种天主教的民主政治。另一个敌人是由“社会主义分子”组成的，类似安德烈亚·科斯塔和亚历山德罗·墨索里尼之类的人物，他们主张进行政治革命，甚至是更加可怕的社会革命。如何用一个可以容忍的政治体系把这些敌人收纳进来，并且避免陷入“混乱”以及避免让有产阶级交出他们的财富、土地、专业技术和知识？有必要使用强力手段来解决问题吗？早在1876年，伦巴第族的自由党人及金融家马尔科·明盖蒂就在思考有必要成立一个“所有保守势力的联盟”以集合起来对抗“社会主义分子们的主张”。

对于意大利的社会主义的成长来说，从波河河谷延伸至亚得里亚海的埃米利亚—罗曼尼亚地区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事实上，早在1881年，安德烈亚·科斯塔就成立了“罗马涅革命社会党”，这也是他从无政府主义转向在意大利建立完全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第一步。同样，法西斯的宣传家们也不断地强调他们的领袖及其家庭也具有“罗马涅”的特质。铁匠亚历山德罗被想象为“一个充满勇气但是又很谦逊的罗马涅之子，并且像那片土地一样热情”。贝尼托则被称为“罗马涅灵魂的载体”。在1942年法西斯统治的黑暗日子里，还出版了一些有关“领袖与罗马涅”的照片，并且严肃地加以解释说，墨索里尼家族已经在这片土地上耕耘了3个多世纪。

这些堂皇的言辞反映出了什么事情？我们需要回顾一下历史。在16世纪和17世纪之间，多个公爵领地上朝代的更替让梵蒂冈获得了从亚平宁半岛的分水岭一直到波河的广大地区的统治权。但是，从多个意义上讲，这些土地仍旧躺在“山的那一边”。这一地区的气候差别很大，波河河谷的大雾在冬季会笼罩在平原地区的上空长达几个月都不散去，这对阳光明媚的罗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尽管这个尚处在早期的现代国家还有许多弱点——没有几个国家比教皇的统治还要脆弱和不稳定——但类似费拉拉和博洛尼亚这样的城市的居民仍然有一种强烈的城市身份的感觉，并且对来自罗马的无能、残酷的“外国”政府的统治心怀怨恨和不满。罗马涅地区的人在当时就像是一群异见分子——无政府主义在这一地区一度非常盛行，而共和主义在接下来的自由党执政的时期也很活跃。

然而，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确保了作为一种现代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在罗

马涅地区找到了适合其成长的最肥沃的土壤。它对革命做出的许诺对于城镇里的知识分子来说颇具吸引力，尤其是那些人口在1万左右的小镇里的知识分子。贝尼托·墨索里尼曾在弗利编辑《阶级斗争报》，那时他没有什么别的目的，就是想在政治上练练手，以便有一天能够获得提升而到博洛尼亚去。这一地区的一位历史学家称，到1900年时，博洛尼亚“虽未被官方承认，但已是意大利的文化首都”，并成为了工业“首都”都灵、商业首都米兰以及行政首都罗马的竞争者。可以预见，在那之后，博洛尼亚的知识分子们也在努力地想把自己与都灵、米兰和罗马的竞争对手们区别开来。

但是罗马涅的社会主义渗入农业的方式却是令人吃惊和与众不同的，年轻的卡尔·马克思轻视地宣称，如果像他们那样把农民们一个个地独立开来，就像是马铃薯一个个都不长在一起一样。波河河谷的农业也像意大利其他地区在早期那样感受到了资本主义的影响。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罗马涅腹地也陷入了经济危机之中。旧时代的小佃农们也在社会阶层的阶梯上被赶上赶下，但更多的人落入了更低的社会阶层，因为当时的农业生产方式已经演化为所有者按日雇佣劳动者的形式（也即今天所谓的匿名公司的形式）。正如现代的一位历史学家所说：“博洛尼亚平原或者是范围更小的丘陵地区的农业，也像其他地区一样变得产业化了”。当时，社会主义者们提出的预言是很有道理的，他们称工人阶级正在一步步地走向贫穷，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资方与劳动者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1901年，博洛尼亚已有的农村组织联合组成了农民工会，成员达到了25万。

换句话说，当旧的世纪成为过去之时，不管是在城镇还是在乡村，博洛尼亚地区的任何“新人”都有可能称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年轻的贝尼托·墨索里尼就是这样。1903年5月1日（劳动节），年仅19岁的墨索里尼出版了一首写给巴贝夫*的十四行诗。巴贝夫是一个“共产主义先锋”，曾于1796年在巴黎发动了一场旨在推翻政府的“平等阴谋”，失败后被送上了断头台。在这首诗里，墨索里尼歌颂了巴贝夫在巴黎发动革命的那段伟大而令人悲哀的日子，歌颂了他就义前的笑容。墨索里尼写道：“临死前，他的眼中仍然闪动着，一个社会主义者的信念，以及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纪的憧憬”。在他自己的新世纪里，墨索里尼正在梦想着也发动一次起义，而他自己则将在起义中起到导航灯的作用。但是，对于贝尼托·阿米卡尔·安德烈亚这个自觉的、年轻的革命者和知识分子来说，如何才能登上人生的这一舞台呢？

在墨索里尼的专政统治下，他在婴幼儿时期的成长过程也不可避免地被严重神化了，出现了无数个流派的奴性作家来强调他的天才和与众不同，而这些都是

* 墨索里尼当时还把 Babeuf 错拼成了 Baboeuf。

为了证明“领袖永远是领袖”，并且即使不再往前追溯，从他出生时起他的行为就已经“像一个真正的罗马人”。一个后来转变成法西斯政权的御用文人的家族旧友宣称：“当贝尼托·墨索里尼还是个婴儿的时候，他就表现出对学习和精神沉思的极大的热情。”很难对类似的证据加以解释，但很明显不能根据其表面意思来理解。然而，第一个有关墨索里尼幼时的故事是一个心理学上的阴谋。墨索里尼这个未来的演说家直到过完3岁生日之后才开始学说话。这把他的父母急坏了，带着他到弗利去找耳科、鼻科和喉科的专家给他检查，估计这一趟的花费也不会少（这对一个农民家庭来说是难以支付和想象的）。据称，医生告诉母亲罗莎：“不用担心，很快他就会说个不停。”一个现代心理学家更加担心，唯恐墨索里尼的这种晚熟是由于家庭环境不好造成的——毕竟，就连墨索里尼这个虔诚的社会主义者在为父亲所写的讣告中也承认，从总体上讲，亚历山德罗的一生是不成功的——但是，他可能会吃惊地发现罗莎和亚历山德罗夫妇其实是非常和睦的。

然而，年轻的贝尼托的成长道路与同一地区的同一社会阶层的孩子相比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据说他比较“骄野”，这更证明了他先天具备的领导素质。法西斯对墨索里尼儿童时代的描述集中在他带领着一帮顽童在当地的农场上撒野，或者会把他描述成一个儿童哲人，经常坐在圣卡西亚诺外面的一棵老橡树下深思（这棵老橡树在1945年之后被出于复仇目的的反法西斯者砍倒了），或者描述他在哗哗流淌的拉比河畔深思。而墨索里尼自己更是说那是他一生中所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光。

唯一能显示墨索里尼这个男孩的与众不同之处的是，当他9岁的时候，在经过了一番家庭争论之后，他被送到了位于法恩扎的一所教徒学校里寄宿学习。按照当时的标准，这算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学校了。学校位于从弗利到博洛尼亚的铁路沿线上的一个城镇里，而这个城镇是过了弗利之后的第二个城镇。学校有200多个学生。学生的年龄差别也很大，小的只有6岁，大的则将近20岁。为墨索里尼选择这所学校，除了反映出墨索里尼家族的雄心之外，也反映出罗莎·玛尔托尼在这件事情上有更大的影响力——贝尼托声称，是当地一个有权势的佐利家族的一个“顽固的”女人让母亲罗莎把她的宝贝儿子送到了这所学校。贝尼托身处那些天主教神父之中艰难地熬过了两年。除了宗教之外，让他感到难受的还有与宗教无法分开的课程。当然，在多维亚，甚至在普雷达皮奥，墨索里尼一家都是受人尊敬的人。但是在法恩扎，光是城里的一座铁桥就足以让乡下人感到惊奇了，而那些好市民们更是不容易接受从城市外的荒蛮之地来的一个下等人。墨索里尼痛苦地回忆说，在教徒中间，他还被分在第三等级，即最低的等级。身处第三等级真是让人感到羞辱，尤其是在上课、就餐、穿衣和住宿安排方面。总而言之，学校的那些神父们好像对他父亲亚历山德罗的名声心怀敌意似的，常对他们的学生恶言相加，完全忘记了她母亲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在他们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行为

下，年轻的贝尼托成为他们不喜欢和虐待的目标。即使这样，在经过几次公开的抗争之后，贝尼托回忆说，学校的伙食有所改善了。

结果是，这个男孩与老师们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了。有一次，在与同学发生轻微争吵的过程中，墨索里尼这个当时还不满11岁的小孩拔出一把小刀刺中了同学的手，之后是一阵喊叫和哭闹。而一个暴怒的神父对这个未来的领袖说，他的灵魂像煤一样黑，并且罚他当晚到外面与学校的看门狗睡在一起（后来一位仁慈的老师帮他避免了这种可怕的遭遇）。由于相信暴力并且难以控制，墨索里尼在此后的某个时间被学校开除了。这一事件倒成为法西斯分子、反法西斯者以及善写耸人听闻的传记作家们的共同素材了。还有一些分析家决心要证明，当时在这个未来的领袖面前只有一条路可走。对于这些分析家来说，这一事件也是有利的论据。

通过墨索里尼在法恩扎上学的经历得出太过明确的有关他的本性的结论是有问题的。1894年暑假结束后，墨索里尼转到福林波波利的一所国立学校。福林波波利是罗马涅平原上另一座城市，但不是很有名。在这所学校里，墨索里尼竟然成了一个模范学生（尽管他又因另外一起刺伤人的事件而惹了点儿麻烦）。这所学校名叫“焦苏埃·卡尔杜齐学校”，是以意大利伟大的自由主义者及爱国诗人卡尔杜齐的名字命名的，并且这位诗人的兄弟瓦尔弗雷德·卡尔杜齐还担任学校的领导。在这所学校，贝尼托还真于1901年的夏天通过了各门考试（虽然有时也是挣扎着才通过）。墨索里尼的毕业成绩单显示，他的教育学、语言、文学以及“品德”等课程的成绩最好，而农业和数学的成绩最糟。他还在音乐方面有所发展，音乐不仅成了他终生的兴趣，而且他当时甚至说想寻找一份相关的职业以做一名专业的音乐家——他说他的目标是要谱出一首能表达“宇宙万物运动”的曲子。1899年，墨索里尼参加了在优美的山区小镇贝尔蒂诺罗举行的“树之节”活动，从当时拍摄的照片上能看到他在吹奏短号。这让后来的政治家常回忆起他在福林波波利的日子。事实上，这所学校给了他第一次在公众面前出名的机会。1901年初，墨索里尼被选中代表学校去参加一个纪念威尔第的演说活动，朱塞佩·威尔第是意大利复兴时期的英雄和作曲家。社会主义者所办的全国性日报《前进报》用一篇3行的短篇消息报道了这一事件，并郑重地说明活动中的短号手是“学生同志墨索里尼”。而博洛尼亚一份名为《零钱报》的日报也报道说：“那个男孩的演说赢得了许多掌声，即使人们误以为他的名字是贝尼托·墨索里诺。”*尽管墨索里尼的辩论技艺不错，但学校的会计仍然把一张22里拉68分的未付账单送到了墨索里尼家所在镇的镇长那里，以催促墨索里尼家赶快付款。

* 卡拉布里亚的强盗墨索里诺，在当时臭名昭著。

墨索里尼的一位校友于20世纪30年代间发表了一份报道，回忆墨索里尼是一个骄傲但在通常情况下沉默寡言的男孩，并且喜欢穿黑色的衣服扎黑色的领带以便与其他学生区别开来。他的脸色有些苍白，但却因为热情、喜欢运动和跳舞而名扬校内。当他还是一个在校男孩的时候，就自夸说自己曾花50分进过弗利的妓院，并且已经失去了童贞。他甚至说，这件事让他怀有罪恶感，但同时也激起了他强烈的性欲。他还跟朋友们说自己是一个写诗的好手，但总是把写好的诗稿撕碎。他还让别人知道，自己总是在思考一些深刻的问题。他的口袋里装着一个印有卡尔·马克思肖像的像章，就像他的护身符一样总是带在身边。墨索里尼突出的眼睛每天总是热情地散发着光芒。他还开始蓄起了一片小胡须，并且一直保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但他的胡须却从未长得像他父亲的那样茂盛）。他的记忆力超群，课程中有必须学习的但丁的作品，而他却把它转变为自己的一个武器。*据说，他喜欢在深夜穿过福林波波利黑暗而寂静的街道，高颂着但丁的《地狱篇》（《神曲》第一部）中的诗句，看起来好像是在攻击挡在他面前的房屋的墙壁一样。他尤其喜欢但丁那些含有恶言抨击的作品。

完成学业时的贝尼托·墨索里尼年轻、聪明、愤怒、雄心勃勃，有时有些暴力倾向（像他周围的社会环境一样），从许多方面看都处于社会的不利地位，但是却注定有幸生活在一个能够让他的独特才能发挥作用的年代。像历史上的许多政治家一样，他在许多方面也都被说成是“本阶层的第一人”。他怎样才能实现对自己许下的诺言呢？怎样才能安慰自己的愤怒和雄心呢？怎样才能从“本阶层的第一人”转变成为重要的社会生活中首屈一指的人物呢？他如何才能找到一条通往大世界的路呢？

答案会是当老师教书吗？在他的学生时期的最后几个月里，墨索里尼就已经作为一名学生老师而协助授课了，据说教的是历史课。而1901年，母亲的职业看来也要注定成为他未来的职业了（阿纳尔多也曾当过一段时间的教师）。在当时的意大利社会，到学校教书同样能赢得人们相当的尊重，并且对他来说至少还可以到稍高层次的学校去任教。这一点可以从1910年5月份学校在一个学期结束时在福林波波利举行的一个庆祝活动中得到体现。这个活动是为庆祝“诗人的兄弟”——校领导瓦尔弗雷德·卡尔杜齐在这所学校任教满20年而举办的。当时的贝尼托·墨索里尼已获得了一个光荣的头衔——社会主义者创办的全国性日报《前进报》驻弗利记者，并且负责报道此事。他报道说，市长主持了庄重的仪式，卡尔杜齐老师戴着一块金表手拿祝贺名册出现了。他以前的学生从那一地区的各个地方赶来与他

* 但丁是意大利中世纪的宗教诗人，当时已被奉为统一的现代意大利及其全国性语言的主要的文化象征。

们以前的老师在宴会上欢聚。市里安排了一个招待会，接着还在市剧院举行了一场音乐会。当然，在此之后还为演讲和祝酒留出了充裕的时间。

在10年前，年轻的学校毕业生会知道他有一天将赢得这样的尊重吗？1901年12月，墨索里尼在一本教师杂志的增刊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作品：一篇对俄国小说的赞赏性评论。在之后的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最可能从事的职业就是去做一名教师了——并且，如果他的最终伴侣拉凯莱的记忆力可信的话，当他们的第4个孩子出生后，他就想让她以“教授”来称呼自己了。但是，年轻的贝尼托·墨索里尼还有另一个伟大的理想——从政。但他仍然处于进退两难的局面之中——怎样才能把这两种职业结合起来呢？

理想的解决方法就在当地。年轻的贝尼托，这个拿着“文凭”的“毕业生”，在数次申请教师职位失败之后，想在普雷达皮奥市政府里谋求一个秘书的职位。他的申请被认真地进行了研究，并且议会还就此事进行了投票，而亚历山德罗则在投票过程中自觉地回避了。但是，贝尼托最终还是因为太年轻和缺乏候选人经历而以10比4的投票结果落选了，看来他只能去当教师了。据说，亚历山德罗鼓励儿子不要灰心，干脆走出去、到外面的世界去。他说，他的儿子没准会成为“明天的克里斯皮”。1902年2月，皮耶韦—萨利塞托地区（是瓜尔蒂耶里—艾米利亚的一部分）的一所小学校里有一个空缺的教师职位。这个学校离家有100多公里，但仍然位于意大利的红土地带之内。于是，墨索里尼离开父母，到这个小学校当起了教师，据说这还是亚历山德罗的介绍信发挥的作用。墨索里尼最终也承认，他在当老师时干得不怎么好。同时，他还谴责说，学生的教科书里也留下了反动的教权主义者的印迹，甚至在社会主义者控制的市镇也未能幸免。他还对在培养学生的原创精神方面的失败做出了解释。*而其他人则说，他在当地任教时，很多时间是待在“兄弟会酒馆”里饮酒打牌度过的。而且，由于墨索里尼对纪律的看法接近于自由主义分子，因此他遭到了当地学生家长的抵制。6月份，他发现他的任教合同没有被续签。究其原因，激进的教学方法可能还在其次，更重要的可能是发生在他身上的丑闻：他与当地一名士兵的妻子发生了奸情。

无论如何，年轻的教师已经在考虑准备离开波河河谷这个小世界了。1901年5月，墨索里尼申请了出国护照。他家的经济情况不错，在市镇上名声也很好，因此他顺利地拿到了护照。他通知6月初刚刚回到家乡的一个朋友说，他很快就要实现“不仅在但丁的土地上居住过，而且还要在特尔的土地上居住”。1902年7月9日，贝尼托·墨索里尼教授——一个小学教师，出发前往瑞士边界了。母亲为他

* 墨索里尼当政后还没有忘记他当初的理想，即让教师们有自己自由的教学方法，并且他们所教班级的人数也不应当太多。

准备了路费，这些路费相当于她近一个月的工资。墨索里尼说他只对“他的女人”说了再见，之后他再也没见到过她。根据他自己的回忆，他曾有一次在争吵中刺伤了她的胳膊。当她真的再次见到丈夫时，她会非常高兴的。在缓慢行进的火车上，墨索里尼从一张报纸上得知父亲被捕了，但这场家庭危机并没有动摇他愤然离开意大利的决心。在1914年之前的10年里，数以百万计的意大利人离开了意大利。他回忆说，他乘坐的火车也挤满了出国的人。墨索里尼下决心要成为一个移民了，他将在异国庆祝他的19岁生日。

3 移民和社会主义者

在穿越瑞士边界时，墨索里尼走的是一条被千千万万意大利人走过的路。从1896年到1905年的10年间，400万余名意大利人移民国外，而在之后的10年里，移民总数增加至600万。最初的移民多是经由意大利北部进入欧洲的。而当新世纪开始的时候，有一批移民开始从意大利南部出发，美国和拉丁美洲开始成为他们的首选目的地。此外，还有许多移民前往瑞士、法国、德国和奥地利。例如，在1902年，就有50233名墨索里尼的同乡（绝大多数都是男子）前往瑞士，而墨索里尼只是其中的一个。在此后的10年里，墨索里尼还在奥地利的特伦蒂诺待过一段时间。他还想过要去美国或者马达加斯加，但后者看起来是一个不太可能的选择。1903年，他告诉一个朋友说，自己正在考虑去非洲过上20年——这样就可以避免被征召入伍了。1910年末，他和拉凯莱还讨论过要一起去美国，后来因为发现她有可能已经怀孕而放弃了这个设想。

意大利移民一般都是年轻男子。在1896年至1905年的10年间，移民中的男子几乎是女子的5倍。移民们一般把自己看做是“旅居者”，或者叫做“候鸟”，他们努力工作并且忍受着剥削。无论是先出来还是后出来的同胞，现在都知道他们所在新国家的风俗习惯，也能够为了自己的利益来对自己进行调整。这些移民们都打算着有一天能够更加聪明而富有地返回家乡。通常情况下，意大利的移民会像墨索里尼一样不止一次地出国和返乡，这就需要有点冒险精神。对于许多人来说，出国的过程就像是当了一段学徒，或者说得更好听些，像是被征召入伍了一段时间。这段历程大多是悲惨的，并且不可预知。边界上的生活就像是一个开幕式，移民们最终能够“发财”并在完全成年后荣归故里。这些移民们没有什么国籍观念，好像现代的意大利这个国家与他们的希望和恐惧都毫无关系似的。

每个移民在离开意大利时都带着发财的梦想和精神的解放，但每一个移民的命运却又不是一样的。国外生活的经历更加剧了两性的差别并支撑起了传统的家长制度——已有的习惯和信仰在年轻的墨索里尼的思想中得到了确认。更加明显的一个问题是国籍，这也是事关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的政治利益的问题，

即这些移民到底是认同那些接收他们的国家，还是认同意大利。这里有一个有些奇怪并且带些讽刺意味的可能，即虽然移民们是因为意大利这个单一民族国家不能够在眼下为他们提供生计，也不能够在未来为他们提供机会才移民国外的，但移民运动却的确促进了意大利人的“国民化”进程。从定义上讲，在一个现代国家里，移民的过程包括统计、造表和评估等程序。这些移民离开了意大利和自己的家乡，但不管是接收他们的国家还是意大利政府的代表，在与移民接触的时候都称他们是“意大利人”。那些与他们混居的人们也都是这么称呼他们的。有关身份的问题总是不那么简单。有时“拉丁人”愿意聚居在一起，好像他们仍是罗马帝国的臣民。“意大利人”更是经常成立一些俱乐部和各种协会，并且这些组织都是由来自同一个地区、同一个城市或者同一个村庄的移民建立的，而组织中的成员则是由返回家乡的亲属的传统的“移民链”约束的。但不管怎样，“意大利”这个词是无法从移民的词汇中消失的。事实上，正如一个移民所说的那样，正是因为移民到了拉丁美洲，他才知道自己是一个意大利人。

后来的意大利法西斯政权里有很多重要的人物都有这种逐渐地认同自己的意大利国籍的经历，例如曾担任法西斯工会头目的埃德蒙多·罗索尼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出生于1884年，比墨索里尼小一岁，家乡位于离普雷达皮奥不远的费拉拉省内的小村庄。在一次劳工运动中，他与意大利警察发生了一次小冲突，之后他便移民去了美国。在那里，到1912年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民族主义者，坚持认为成立“一个严格的意大利工人阶级联盟”是战胜资本家老板并使他自己的事业有所进步的最好途径。另外一个在美国的意大利移民是阿梅里戈·杜米尼，他于1924年成为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军队的头目，并杀害了社会党议员贾科莫·马泰奥蒂，从而制造了法西斯政权最大的公共丑闻。杜米尼实际上属于第二代移民，他于1896年出生在圣路易斯，但后来又被送回意大利接受了一些教育。在那之后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杜米尼在意大利陆军服役，并逐渐变成了一个民族主义者。

最初，墨索里尼自己并没有走上这些类型的移民之路，他是一个社会党成员。他的父亲亚历山德罗在一篇引以为自豪的发表在当地报纸上的一篇短文里，谴责了意大利把他的公民赶出这个国家的可耻之举——据亚历山德罗称，多维亚村里的9户人家共约50人都移民去了巴西，遭罪是肯定的，客死他乡也未可知。他警告说，黄热病正在热带地区蔓延。当时以及此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把移民解释为一个跨国剥削的过程，资产阶级通过这种方法在国内和国外同时压低工人的工资和各种条件。事实上，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的移民并不是很多。在大多数明白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些移民中还有很多叛徒和破坏工人运动的人。

在墨索里尼看来，他移民到瑞士并没有违背社会主义思想。然而，他移民国外可以算是一种变相的放逐。除了带有年轻人的冒险想法之外，这同时也表达了

他对意大利这个国家的一种蔑视，因为在这个国家里，他被认为是不值得雇用的人。在他的新住所里，墨索里尼所有的想法都是要忠诚于社会主义组织，因为他们在他远离家乡的时候为他提供了一个家。在到达瑞士短短几周之后，他就开始定期为一份名为《劳动者的未来》的日报写文章了。墨索里尼曾对一个朋友说，他当时正与一位来自洛桑的律师蒂托·巴尔博尼共同编辑那份报纸（事实上，那份报纸的编辑和意大利社会党的书记就在瑞士）。墨索里尼没有得到编辑的位置，但他确是一个勤快的作者和天生的记者，在到达瑞士后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他就发表了9篇文章。

从这个意义上讲，墨索里尼是一种“知识分子移民”。1902年，自由党统治的意大利的各个公共机构都在许多“最好的和最聪明的”新一代移民的挑战下被搞得声名狼藉，并且这种状况至少要持续到1915年5月意大利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根据当时主要的社会学家们的研究，在世纪之交的意大利，每1000个居民中就有0.74个律师，而在管理很好并且很有秩序的普鲁士，这个数字只是0.12。1900年，意大利议会里每32个社会党成员中就有27个称他们自己为“教授”，意思是他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课程的毕业证并有资格到学校任教。从这些详细的数字中，悲观的保守派人物朱斯蒂诺·福尔图纳托得出了一个明显的结论，对意大利如何才能把它的人民“国民化”这一问题感到绝望。他猛烈抨击新形式的“知识型无产阶级”，认为他们比经济型无产阶级更加卑劣，更具威胁性，而一些极端的政治派别的加入更是增加了他们的活跃性和不稳定的因素。墨索里尼当然不是大学里培养出来的律师，但是他也要求被称呼为“教授”，并且大胆宣传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自由和责任，称知识分子是精明和积极的，并时刻准备着“革命”。他预测他的世界是一个范围很广的世界。事实上，在为《劳动者的未来》所写的第一篇文章里，他就把欧洲资产阶级因威尼斯钟楼的倒塌而产生的惊慌沮丧与他们对奥斯曼帝国屠杀亚美尼亚人所表现出来的宽容进行了对比（事实上，墨索里尼的文章颇具攻击性，称这座古代的纪念碑“没有什么明显的建筑风格”。）他还补充说，暴乱的库尔德人还有好色的特点，他们把亚美尼亚的妇女们绑起来，并对她们施以“说不出口的暴行”。他还用带着修辞色彩的语言问道：文明何时才能战胜邪恶？而他的答案是：“拥有经济特权的单一的社会阶层统治其他阶层的这种暴政的消失，将意味着狂热和盲信以及种族歧视的终结，然后所有的人都将团结如兄弟。”

从一开始，“墨索里尼教授”就很喜欢就每个问题都发表自己的意见。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喋喋不休”的人，并且一点也不会感到不好意思，一定要让他人感觉到他的存在。他接受的实际教育的面可能比较窄，但他却是厚颜无耻。在他21岁生日之前，不管自己实际上多么缺乏经验，他总是非常的好斗，希望自己能够成为那些知识分子中的一员。正如一位同时代的人所精确描述的那样，他“视其他所有的知识分子为敌人或者竞争者”。

但是这种知识分子的称号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有关他在移居瑞士期间的经历，有一件事颇有争议，即他在1904年时是否参加了瓦尔弗雷德·佩瑞多在洛桑大学开办的课程。佩瑞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分子，他因提出“创造性的精英”的假设而成为一个世界知名的人物：那些有活力和意愿的人注定是统治者。他也因此而最终被宣布为法西斯理论的鼻祖。在法西斯统治时期，官方的宣传说墨索里尼听过佩瑞多的课，但是有人对此表示怀疑，而他当然没有参加过任何考试。也许，他是否听过课、他关注的范围和他的理解力水平都不是很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这位曾经当过教师的人一直在从他周围的环境中吸取着精神食粮，无论他对环境中一些观点的了解是多么的不确定。

事实上，墨索里尼去瑞士这件事的性质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放逐和一个经济移民的交织混和。有一段时期，墨索里尼身无居所，只好在公园的长椅上过夜，或者找一份不稳定的工作，如建筑临时工、屠夫或者帮助别人卖酒（尽管他很快就被提升去做行政工作，但至少他的一个同龄人注意到，这个假冒的工人的双手还是又白又嫩的）。有时候，墨索里尼想洗洗手可却找不到洗手的地方。他还记得有一个以前的雇主让他特别生气，因为他嫌墨索里尼这个工人穿得太好了。他还欠过不少债并且难以还清，有的是欠已回到罗马涅地区的朋友的，也有的是欠新认识的朋友的。他还病倒过，可能是由于流落他乡孤苦零丁再加上人生地不熟而造成的。后来就有传言，说他曾在什么地方感染上了梅毒。反法西斯者从那以后也宣称墨索里尼曾经干过小偷小摸的事。据称，墨索里尼曾经偷过一个朋友的手表，但这件事也有可能不是真的。他也曾与一个学医的波兰学生有过一段带点异国情调的恋爱。1903年，他还在洛桑与一个离婚的女人发生了不怎么浪漫的两性关系，但是正如他向一个男性朋友解释的那样，这只是“为了满足肉体而不是精神的需要”。*最后，在1903年，他收到了母亲生病的消息，于是在10月到12月的这段时间里，他急匆匆地赶回了家。这次回家让他有机会拜访旧友（他还发现，家乡的生活节奏与移民国外的生活节奏大不相同），而在与家人团聚时，时年已经18岁的弟弟阿纳尔多也想出国。这样，再次出国时他就带上弟弟一起去了。这些并不是唯一的选择。生活的转折，剥夺与希望的转换，与家人、家庭和家乡从未间断的联系，以及一个新世界的吸引，所有这些交织在一起，成为那个时代年轻的男性移民者所熟悉的经历。

当然，其他移民国外的人都没有成为意大利的独裁者，所以，不管他的自我评价如何值得怀疑，也不管他所谓的“知识分子的流浪”是出于多么利己的想法，

* 他夸大了自己的年龄。在同一封信中，墨索里尼说他在思索如果一个20岁的人“没有感觉到爱的需要”，那会是多么奇怪的事情。

毕竟墨索里尼已经开始形成他的一些主体观点和行事模式了。对于这个移民来说，社会主义至少在口头上已经成为他生活的核心。在墨索里尼回到母亲床前的那段日子里，他曾夸大其词地向一个学友解释道：“11月底之前，我将再次打起行囊前往那未知的世界，因为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项基本需求。如果停下来的话，那我真的会死去的。”而其他人们也开始承认他的重要性了。罗马的一份自由派报纸《论坛报》在1904年的4月份刊登了一篇文章，报道了墨索里尼与警察发生的一次冲突，在文章中他被描述为当地社会主义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墨索里尼宣称社会主义理念是他的基本信条，那么这个年轻人心中的社会主义到底是由哪些部分组成的呢？

年轻的墨索里尼的信念体系中最为突出和持久的特点在当时被称为“最高纲领主义”，这是对革命行动的一种承诺，早在30年前就被科斯塔和奇普里亚尼所推崇。相反，墨索里尼常常表达自己对那些持“改良”观点的温和派的蔑视，如于1892年创立社会党的创始人之一的菲利波·图拉蒂，他此时已是下议院的议员了。图拉蒂的可敬以及他人对他的尊敬对墨索里尼这个充满活力的年轻革命者来说都没有什么吸引力。对他来说，国家的权力机构自然而然的就是他的敌人。

因此，在墨索里尼移民瑞士期间总是与警察之间不断发生麻烦也就丝毫不会令人感到吃惊了。他被逮捕、监禁、被从一个省驱逐到另一个省，有一次甚至在被关押10天之后被驱逐到了意大利的北部边境城市科莫的附近。但是，他立即在那里买了一张火车票又返回了卢加诺，然后再次集会并且利用法律和秩序的力量来为自己辩解，但很快又不得不出于安全而到巴尔博尼和其他社会党的朋友家里去避难。这些经历只会让他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更加明确和坚定。他在《劳动者的未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宣布了自己的路线：“我们没有单一的模式。我们只希望党能够回到它原始的斗争方法上来，并且能够引导一种不可替代的战斗精神去打破已有的秩序，而不会因为进行政治或金钱的交易而弄脏了自己的双手……”墨索里尼是一个极端主义者，并且他认为自己还是一个纯粹主义者，有资格使用奇普里亚尼和年轻时的科斯塔的名义。在自己所写的诗歌里，他对遇难的同志表示庄重的哀悼，号召对那些加害他们的人进行复仇。他是一个共和主义者，在一份名为《无产者》的报纸上，他嘲笑了那些君主们，呼吁立即推翻他们的统治。国会在他看来也不过是一个上演滑稽剧的机构，正直的人们有一天也必须把它摧毁，而那些指望它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墨索里尼还是一个反教权主义者。在瑞士10年期间的后期，他还写了一篇题

* 墨索里尼此时为《社会主义者的先锋》周刊撰写文章，这份刊物比先前刊登他文章的那份报纸更具知识分子的雄心。

为《红衣主教的情人》的文章，把教会描述成一个满是肉欲、伪善和谋杀的地方。1910年的时候，这些在他的心目中已经算不上什么新鲜的观点了。在他离家在外过的第一个圣诞节期间，他就为《劳动者的未来》写了一篇抨击教会的自私和腐化的文章，把基督所受的苦难与他在人间的代表们的自私和腐化的生活进行了对比，还宣称，如果有机会的话，他将“诅咒”教会这些人并把他们“痛打一顿”。那时他可能没有想到，这些人日后竟然成为了他的朋友或者盟友。几个月之后，他更是大胆地对“修道院里的恐怖”进行了道德上的评说。相比之下，他在多维亚小村里时还只是拥有天真的狂热，而移民到了瑞士后，社会主义的影响正在膨胀并有可能迅速地取代他的宗教信仰。

墨索里尼的演说也满是类似的主题和态度（他宣称要把每个星期天都用来发表政治演说）。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尖锐的反教权主义态度，并最终于1904年3月25日在洛桑与一位名叫阿尔弗雷多·塔利亚拉泰拉的新教牧师之间展开了一场公开的辩论。在演讲的开始部分，墨索里尼引用了布鲁诺、莱布尼兹、罗伯斯庇尔、培根、伽利略等一大堆已故的伟大思想家的观点来作为自己的论据。然而，这种知识分子的早熟还不是全部的内容。据说，这位未来的意大利领袖在结束自己的演讲时，还专横地站在一张桌子上足足有5分钟，以这种方式来挑战全能的上帝并显示他自己。而上帝没有理睬这些噪音和这位亵渎他的年轻人。

更为明智一些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宗教问题最好还是留给个人去讨论，而痛恨牧师等神职人员的传统也正在过时。墨索里尼公开地把这种温和态度描述为趋炎附势和倒退。他更是进一步向年龄更老一些的、经验也更为老道的埃米尔·范德维尔德发起了攻击，此人是一个改良派，最后当上了比利时的外交大臣。当然，这个年轻的社会主义者用这种尖锐的态度来攻击教会和神权的举动也有令人不解的一面。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会是这么鲁莽地想问题吗？一个心中装着人民福祉的社会主义者对待那么多人所持的信仰的态度会是这么凶猛好斗吗？反教权主义者在对待看不见的敌人（至少上帝已经被算做一个）时不也是掩饰着自己的野心、用一个肤浅的承诺为自由和平等戴上一个面具吗？社会主义者们就党的路线中有关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与他们的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争论，而争论的背后隐藏的却是上面提到的那些问题。

如果反教权主义只是一个社会主义理论家研究的问题，那么一个更大的问题则把国家也包含了进去。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认为，社会主义从定义上来说国际主义，而社会主义的胜利将解放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因此，每过10年，国家都会采用更为现代的政治形式，而民族文化也将传至欧洲各地。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可以是通过人员的交流，也可以通过教育——这是每个国家通往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这个时代里，农民（还包括一些工人）都可以变成法国人*、德国人等等。当时，社会主义者说自己在是领导潮流，他们谴责侵略主义，不重视民族主

义者的对抗，甚至多次庄重地集会以显示他们的“国际主义”。他们还承诺发动一场总罢工以削弱资产阶级发动战争的能力，而在更为美好的未来，工人是不能杀害其他工人的。但是，就在这些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和实践的表面之下，民族主义的暗流却正在回旋涌动。不久之后，这股暗流的强大力量就会把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和最复杂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一扫而光。1914年8月初，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成员全部给德国政府投了战争信任票。年轻的墨索里尼是如何解释自己在国家这一问题上的态度的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有一些天真，有一些自私，还有一些矛盾。上文已经提到过，墨索里尼在理论上是一个狂热的国际主义者。然而，虽然他相信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当时意大利的民族化进程相比意大利以北的一些国家来说更加软弱无力，但认同意大利国籍的观念却也开始见诸于他的言行之中了。当墨索里尼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他就曾经为意大利发生全国性的大危机而兴奋过整整一个月。当时，埃塞俄比亚人在埃德华**之战中击溃了意大利军队，从而使总理克里斯皮为意大利帝国拟定的计划破产。在那之后，意大利没有像欧洲其他国家在非洲的其他地方的做法那样，重整旗鼓再去报战败之仇，而是偃旗息鼓带着羞辱从孟尼利克皇帝二世的领地撤回了国内。

墨索里尼对瑞士这个国家也是比较了解的。他习惯于去了解当地的社会主义者，不管他们是瑞士人还是从意大利来的。语言是如此基础的一件事情，“我在学校学过法语”，他天真地思考：“但是我却理解不了（在瑞士，他周围的人讲法语），大概是我的耳朵不适于听外国语言的发音吧。”至少，根据他自己的讲述，他的法语口语很快有了提高，而且他一生中都喜欢经常读一读法语。然而，瑞士的气氛与意大利是不同的，并且，这种气氛已经浸染了那些说意大利语的瑞士人。这是一个天生的适合改良主义的国家。墨索里尼抱怨说，瑞士人太安逸于他们的生活了，他们不喜欢真正的革命。他们天生就不是他的同伙。

带着一些不安，墨索里尼在那些意大利移民者中间寻找着属于一个流亡知识分子的安慰。毕竟瑞士对于许多流亡的人来说是一个落脚之地，在这些中间就有列宁，他从俄国警察的手里逃了出来，重新开始了流亡知识分子的生活。在这个相对自由的环境里，列宁能够集中精力筹划发动革命，并逃离国内的派系之争。在赶回家去看望生病的母亲途中，墨索里尼还翻译了俄国无政府主义的代表克

* 当时法国农村已开始现代化。

——作者注

** 埃德华，埃塞俄比亚北部的一个城镇，位于阿斯马拉的南部，1896年孟尼利克皇帝二世在此决定性地击败了意大利人，从而保障了对埃塞俄比亚独立的承认。

——译者注

鲁泡特金的一篇作品，希望这些流亡的异见分子能够承认他的地位。从意大利回到瑞士后，墨索里尼多了几分沉着，他开始在坚持最高纲领主义的意大利社会主义者中活动。这些人包括贾基诺·梅诺蒂·塞拉蒂，还有一个俄国的流亡者安杰利卡·巴拉巴诺芙，她是来自俄国南部贵族家庭的一个年轻人。

墨索里尼那时和安杰利卡·巴拉巴诺芙一起工作，而她后来也公开指责墨索里尼背叛了社会主义事业，还挖苦他是一个“专为金钱工作的人、犹太、该隐*”。巴拉巴诺芙还花时间教墨索里尼学习基本的哲学，所用的方法是一问一答和死记硬背。比如她说出费希特的名字，他就回答：“命题、反命题、综合”；她说：“黑格尔”，墨索里尼就回答：“论点、反论点、合题”；她说：“马克思”，他就说：“需要、工作、阶级斗争”。他的女老师后来带着些恶意很尖锐地评价墨索里尼说：“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领导者，而他的内心想法与他在现实生活中的谦卑地位却让他产生了一种被夸大的自怜和命运不公的感觉。”

此时，墨索里尼开始阅读有关工团主义运动**的著作了。工团主义不同于社会主义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10年时的意大利非常盛行。他浏览了乔治斯·索列尔***的著作。此人是一个被疏远了的法国旧官僚和工团主义理论家，他相信“神话”的力量，并且认为通过带有战略性的言辞的煽动，再加上民众遭受苦难的现实，很容易就可以把民众引向暴力活动。墨索里尼的思想的可塑性还是太强了，不管以何种方式，也不管在什么地方，他在文化和社会两个方面想揭竿而起的那种野心都太赤裸裸了，哪怕是在这个或那个学校当个助手都让人放心不下。但是，在瑞士的最后一年里，他的话语里多了些工团主义的内容，这些内容都可以在他此后的思想中寻找踪迹。一遇到合适的刺激物，他就会努力地重新捡起这些内容。

突然间，在1904年的最后几个月，墨索里尼结束了他在瑞士的流亡生活，留下弟弟阿纳尔多在伯尔尼独自谋生，自己又回到了家乡。人们现在还不太清楚他这次回家的目的。他母亲的健康状况仍然没有什么改善，在母亲床前尽孝可能是他做出这一决定的部分原因（罗莎还是慷慨地给她这个移民国外的长子送去补

* 在旧约全书中，该隐是亚当和夏娃的长子，他出于忌妒谋杀了他的弟弟亚伯并作为逃犯而被判罪。

——译者注

** 工团主义运动，通过直接的行动如大罢工和破坏行为来宣扬把工业和政府置于工会联盟的控制之下的激进政治运动。

——译者注

*** 乔治斯·索列尔（1847~1922），法国政治哲学家。其作品促进了革命的工团主义运动。他最重要的书为《暴力论》（1908年）。

——译者注

贴)。另外一个解释是从政治方面给出的。当时意大利对逃避兵役者实行了大赦，趁此机会，墨索里尼决定回国应征参加意大利陆军。过去他曾经说过，移民到较远一点的地方是为了避免被征召入伍。1904年3月，意大利国家曾传唤他到博洛尼亚，但他没有注意到这个传唤。后来，一个军事法庭以逃避国家兵役罪对他进行了缺席审判。而此时，看来他可以轻易地洗去身上背负的不爱国和逃避兵役的恶名了。他被编入了伯萨利尼联队，这是意大利陆军中一支纪律严明的精锐部队。他甚至有点沾沾自喜了。

同样，我们也不应对他的行动感到吃惊。意大利陆军在当时对应征入伍者还是颇具吸引力的，也许可以称之为“国立学校”，这当然也是一个能够增加男人价值的地方（同时也使意大利社会中的在贫穷或者富有阶层中都很常见的暴力活动合法化了）。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墨索里尼在参军这个幌子下混了短短的两年。并且，在刚开始服役的时候，部队还慷慨地给了他两个月的假期，让他回去看望临终的母亲。在此之前，他收到泰米斯托克莱·佐利写给他的一封信，说他母亲感染上了脑膜炎。罗莎最后在病床上倒没经受太长时间的痛苦，她不到一周就去世了。

据说，贝尼托跪在母亲床前恳求她原谅他的任性，并请求她保佑自己的未来。母亲已经不能说话了，但还是从他那不同寻常的头饰上认出了他，她把那件头饰拥抱了很多次。据说，墨索里尼被母亲的去世彻底地击垮了，他悲痛地说：“母亲是我唯一真正爱过的人，她曾经离我那么近，现在又舍我而去了。”他努力地克制自己的悲哀，但是：“在这痛苦的时刻，我只有在任何人都难免一死这一永恒的规律面前屈服。我想在这种宿命中找到一些安慰，但最具安慰性的哲理都不足以填补我永远失去亲人而产生的空虚。”为罗莎写传记的法西斯作家更加煽情地说，墨索里尼母亲的去世等于是借此机会把她的儿子托付给了意大利，但是同时又给她所有的孩子留下了“回忆中最美好的情景，并且这最美好的情景是永恒的”。

据说，在墨索里尼从瑞士返回意大利之前，母亲罗莎就曾写信给他，劝他能够安分守己一些。有一段时间，他的极端激进主义好像真的有所收敛。在母亲去世后一周，他给部队的指挥官写了一封信并表达了他作为一名士兵的爱国热情，希望能够为了国家而做好准备以抗击可能来自北方的野蛮人的入侵。1906年9月，他的服役期结束了，他又重新当起了教师。1907年11月，他通过了博洛尼亚大学设立的一个考试项目，从而提高了自己的任教资格，教起了中级法语。但他仍是一个叛逆者。据说，他叼着香烟，带着一副吊儿郎当的神情走进考场，这个样子把其他老师都惊呆了。但在其他方面，他的生活看起来却是无精打采的。他准备做一家之主了，妹妹埃德维杰要嫁给普雷米尔科勒的一个小店主，他对此也表示欢迎。与过去相比，他现在对出租土地赚回的租金收入更加感兴趣。在一些人的眼里，他当教师的表现也比以前好多了。1908年7月，当他从利古里亚区的教师

职位离职时，还享受了公众宴会相送的礼遇。

然而，墨索里尼并不是一个受人尊重的人，他毕竟很难改变自己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他的性生活仍是非常混乱，当他前往位于意大利北部边境的托尔梅佐任教的时候，有谣言说他有一个出生后很快就夭折了的私生子。墨索里尼一生中只有一次喝酒过量（这是他的敌人说的）。虽然发表的文章有所减少，但他还是一个社会主义极端分子（也是一个反教权主义者），他对演讲的兴趣并没有减退。例如，乌迪内当地的报纸还弄错了他的名字，把他描述为“热情洋溢的革命家教师博索里尼”。这个社会主义极端分子还临时准备了一篇长达45分钟的有关异教徒乔达诺·布鲁诺的长篇大论。这个演讲是如此富于灵感，以至于当演讲结束时，他的同志们高唱着工人的赞歌并到当地牧师的家门外示威。最后，他们高喊着崇敬布鲁诺和永远支持当时法国的反教权主义者的口号结束了示威。

在奥内利亚，墨索里尼有了特别的理由来重振他的政治生涯。他在一所私人的天主教学校里任教，与塞拉蒂兄弟俩一起住在城里。卢乔·塞拉蒂编辑一份当地的社会主义周刊《锉刀》，墨索里尼很快就在刊物上发表了内容广泛的多篇文章。他又可以变成一个天真的乡下人了，比如，他哀悼爱国小手册《心》的作者埃德蒙多·德·亚米契斯，并回忆说这是他年轻时最喜爱读的书。他还在复活节期间发表了一篇文章，谴责基督教的一些节日完全漠视真正的劳动者，他习惯的政治行为方式也在这篇文章里暴露无遗（这篇文章对他的雇主不可能有什么吸引力）。他还说只有“白痴”才会相信圣经里的故事。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敏感地为“知识分子”辩护：给社会主义带来麻烦的不是知识分子，而是那些“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却不知道为什么”的人。他为这份周刊《锉刀》所写的最具野心的文章是一篇纪念马克思逝世25周年的长篇评论。在这篇评论里，墨索里尼把这位社会主义之父当做一个极端主义分子，同时又是一个“科学的”和务实的人来赞美。他的文章充满热情，并推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个阶级是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特权的，除非它被强制这么做。他还毫无疑问地证明：最终的斗争必将是暴力的和“灾难性的”，因为不遭受沉重的打击，资本家是不会投降的。

墨索里尼还是觉得教书不如政治那么有吸引力。像以前一样，他在奥内利亚任教的合同也很短命，于是他又开始想去找点更好的事情做。像其他许多野心勃勃的年轻人一样，他也想找到一个愿意资助他的人。于是，他很有礼貌地征询塞拉蒂，问他能否在曼托瓦再发行一份报纸，如果合适的话，墨索里尼请求塞拉蒂让自己去做。但这次申请并没有成功，于是他无奈地回到了家乡。他推测革命已经发展到了罗马涅地区，于是就在家乡向他用来发表文章的周刊《锉刀》的读者们宣扬革命精神。然而，一次罢工、一些尖锐的演说和一次争吵又导致他被逮捕并锒铛入狱，后经人呼吁才被放了出来。经历这些事件之后，墨索里尼回到了父亲亚历山德罗位于弗利附近的家里，又开始转向文化方面的研究。他为一份工团

主义的报纸《自由专栏》撰写讲解克洛普施托克*的诗歌的文章，还在一份地区性文化杂志《罗马尼阿思考》上为尼采辩护，说尼采其实是一个乐观的知识分子，他的作品是对生活的一种赞美。

当记者们还在消化他的独特观点的时候，年仅25岁的墨索里尼找到了迄今为止最好的一份工作：他的资助人塞拉蒂和巴拉巴诺芙推荐他为社会党在奥地利统治的特伦蒂诺地区的书记，并负责编辑社会党在当地的报纸。1909年1月22日，《劳动者的未来》告诉它的读者们来了一位新同志：“贝尼托·墨索里尼除了是一位经过证实的战士之外，还是一个热情的宣传家，在反教权主义方面尤其擅长。他是一个有文化的年轻人，并且，对我们的社会主义运动极为有利的一点是，他精通德语。”为他写传记的一位最具学究气的意大利作家把此事写得更为简单：“从心理学上讲，墨索里尼到特伦托去任职就像他干其他工作一样，是出于一种冒险的精神和寻找一种新奇的感觉的想法，说得更简单些，也是为了生计。”

特伦托**是一个有3万人口的城市，那里曾发生过反宗教改革***。墨索里尼对在这里的生活的描述是混杂的。他说他在那里从事的工作的要求并不是很高，但他必须发表很多演说，演说场所常常是在啤酒馆里。这不是他最喜欢的集会场所，因为他已经宣布戒酒了（事实上，按照一些心怀叵测的朋友的说法，他已经患上了抑郁症）。那个城市里有3份互相竞争的刊物。一份是社会主义者办的报纸；另一份是天主教的报纸；还有一份是民族主义者凯萨·巴蒂斯蒂办的《人民报》，后来成为“意大利国家战争烈士”的机关报。这3份报纸经常利用各自的版面相互攻击，虽然墨索里尼不赞成这样，但他还是在巴蒂斯蒂的《人民报》工作了，并且很快就开始为报纸写文章了。据他自己说，当地的社会主义者对他的热情表示怀疑，并且不喜欢他的个性。为了打发时间，他还“按照坡****的方法”拼凑了一些短故事。为了能找到一份私人法语教师的工作，他还满市里

* 克洛普施托克（1724~1803），德国诗人。他的不押韵的古典结构的作品影响了歌德和德国文学的发展，其中有著名史诗《救世主》（1748~1773年）。

——译者注

** 特伦托，意大利北部城市，位于威尼斯西北部，可能建立于公元前4世纪，它是塔兰托议会（1545~1563年）的所在地，正是这个议会建立了反宗教改革的基础。

——译者注

*** 反宗教改革，16世纪罗马东正教会发起的意在对抗新教改革一个改革运动。

——译者注

**** 爱伦·坡（1809~1849），美国19世纪诗人、小说家，以其阴森可怖的诗歌如《乌鸦》（1845年）和短篇小说包括《厄舍大宅的倒塌》（1839年）而闻名。

——译者注

跑着张贴小广告，并且保证自己有“快捷而可靠的教学方法”。不管怎样，在特伦托生活还是有好处的。其中之一就是警察对他的干预不会像在意大利那么多。此外，他还可以在市里的图书馆看看书（这个图书馆从上午9点开放到晚上10点，订有40种日报和8种杂志，涵盖了欧洲4种主要的语言）。所以这个城市要比弗利好得多，后者是一个无知的“到处是卖猪和紫苜蓿者的城市”。

不管怎样，特伦托是墨索里尼生活过的最大的城市。这是一个最清楚地拥有自己的文化和历史的城市，在1918年之后注定要成为南蒂罗尔*（或者像意大利的爱国者们要求的那样叫它上阿迪杰）的首都。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个地方对于墨索里尼的重要性，是普雷达皮奥、奥内利亚、托尔梅佐，甚至弗利都不具有的。由于奥地利的一些重大事件都发生在这里，所以它在当代政治史上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奥匈帝国的哈普斯堡皇帝对于“欧洲的美好时期”这一概念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奥地利式的社会主义”的一些主要的拥护者，如奥托·鲍尔和卡尔·雷纳等，也在寻找一条能够打破困境的正确路线，即怎样才能把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国家联系起来。在范围更广的知识界，克利姆特、舍恩贝格和弗洛伊德等人也都允许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去挑战巴黎作为欧洲文化中心的地位。维也纳的市长卡尔·卢埃格尔一方面支持民众，一方面操纵反犹太主义，是另一种形式的现代性的先锋，并赢得了阿道夫·希特勒（生于1889年）的赞赏。1909年的希特勒还是一个失败的艺术家的最低点。并且，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当时都还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存在。虽然他们后来相互成为了盟友，但如果当时他们互知道的话，那么毫无疑问他们都会蔑视对方的文化、个性和政治观点。

有关维也纳的争论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淡化了，但有关特伦托的争论却起来了，在国家形成这一问题中，这个城市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位置。在南蒂罗尔地区的某个地方，意大利语和德语在此交汇。也就是说，在当地，一个农户所说的方言可能带有德语的成分，而另一个农户的方言却可能带有拉丁语的因素。那么，这种语言上的边界在政治上应当怎么样对待呢？是否应当让这种语言边界与国界一致起来呢？意大利的“民族统一主义者”（那些想“赢回”未收回的意大利领土的人）为了彰显特伦托的重要意义，于1896年在特伦托竖起了一尊但丁的塑像——但丁被奉为新的、“第三个”意大利的国家象征。即使是那些最有名望的意大利资产阶级的代表也希望从被他们称为“天才和伟大的、令人鼓舞的领袖”的但丁那里得到些东西。如果这种“种族的”民族主义理论被人们接受的话，那么它对于一息尚存的哈普斯堡皇室的多民族帝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意大利和奥匈帝国已经加入三国

* 蒂罗尔，地跨奥地利西部及意大利北部的位于阿尔卑斯山东部的一个地区。在古代由凯尔特人居住，在19世纪蒂罗尔被不断地、部分或整体地在奥地利和意大利之间来回转手。

联盟这一事实又意味着什么？怎么样才能把国家事务与其他的政治理念统一起来呢？社会主义就不用说了，还有天主教。当时奥地利是现代“基督教民主”或者“基督教社会主义”成长和成熟的地方，而阿尔奇德·德·加斯佩里，这位在“二战”后成为意大利总理的基督教民主派也是在这个地方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并且因为主张教权主义而让墨索里尼愤怒不已。墨索里尼只在特伦托待了8个月，但是就在这期间，他带着他那种就任何问题都喜欢发表意见的厚颜无耻的积极态度，观察并亲自参加了许多辩论，而且搅乱了这个城市的本来的沉寂。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墨索里尼就各种问题匆忙写就了一系列的文章，这只是给后来的分析家们带了许多麻烦，因为很难把他的各种观点统一起来。墨索里尼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反教权主义者。过去他只是带些尖锐的玩世不恭的态度，而此时则是喜欢有意地亵渎神灵了，他在文章中写道：“我敢打赌，许多天主教徒和相当多的牧师会更喜欢一份好牛排，而不是耶稣。”他忘记了自己也曾经在军队服过役，此时又站在了明确地批判军国主义的立场上，他写道：“恐怖的章鱼用它那上千根黏糊糊的触手不停地吮吸着人民的鲜血和精华。”

他鼓吹社会主义。尽管他也曾随母亲去教堂听过布道，但是他在《劳动者的未来》上发表的第一篇社论还是把宗教全盘否定了：

“社会主义意味着个人觉悟的提升和净化，但其结果需要一系列的努力才能实现。事实上，从专业人员到普通工人，每个人都可以为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每天为社会主义做一件事情，从而为推翻现存的社会做准备。”

实际上，由于派系斗争和分裂持续困扰着社会主义运动，所以做一个社会主义者比这里讲述的要困难得多。有一次，墨索里尼说自己是工团主义者，但是，1907年，工团主义的支持者塞尔焦·帕农齐奥和奥里韦蒂宣布与意大利主流的社会党脱离关系。现在，墨索里尼决定不再做一个工团主义者了，一方面是害怕，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工团主义能够证实其未来的道路。他解释说，尽管难以理解乔治·索雷尔，但毕竟他还是一个主要的哲学家。墨索里尼说，要弄懂他的逻辑，就像要理解德国作曲家瓦格纳*的旋律的主题一样困难，因此非得需要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才行。罗伯托·米歇尔斯是另外一个经常就各界精英在历史中的角色进行评论的评论家，他也是值得重视的。当然，墨索里尼还是非常重视马克思，但还有与这位社会主义之父同等重要的人物，那就是查尔斯·达尔文，他们两个都宣扬“用斗争来反对传统、权威和教条”的思想。无论如何，当时都存在不止一个马克思似的人物。墨索里尼宣称，最具吸引力的是年轻时的马克思，因为他“首先是

* 瓦格纳(1813~1883)，德国作曲家，尤以其浪漫歌剧著名，常以德国传说为其作品基础。作品包括《汤豪塞》(1845年)和四幕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1853~1874年)。

一个见诸行动的人”，宣扬“当前，一个人不应当只是研究世界，更要去改变它”。

如果区分谁是正确的社会主义者有些不太合适的话，那么在特伦托，另外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就是民族差别的问题了。在这一点上，墨索里尼的立场也是摇摆不定的。对社会主义虔诚的时候，他会记得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国际主义者，承诺将解救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而爱国主义是“迷信”，是由资产阶级一手操纵的。在一次演说中，他对听众说，真正的无产阶级是“在定义和基本需要上就反对爱国主义的”。但是，要想保持这种纯粹的清白是非常困难的。当德国的同志们要与意大利的同志们打交道时，他们总是不太礼貌。墨索里尼写道：很明显，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已被民族主义玷污了。并且，德国人从总体上都低估了意大利移民对中欧的工人阶级所作出的贡献。是否拒绝德国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一直是一个核心问题。此外，他的散文中还出现了一个同样比较模糊的结论。“斯拉夫人”在他们的“文明和灵魂”中就包含着“悲剧”。意大利人也像“南方的其他民族”一样，是“怀疑论者”和“宿命论者”。但是，他们也有潜在的乐观的一面。当法国飞行家路易斯·布莱里奥横越英吉利海峡时，这一事件在墨索里尼看来象征着“拉丁人的天才和勇气”的胜利，同时也证明了科学的现代人拥有无限的潜力。他认为，为了赢得对“自然、生命和宇宙”的最后胜利，人们应当拒绝派系斗争。

墨索里尼的文章中还有另一个大的主题，也是他的社会主义理念中的一个复杂的因素，即他对知识分子的偏爱，以及想在知识分子中出风头的一种不安分的欲望。在与巴蒂斯蒂保持联系的同时，墨索里尼还与另外一份报纸《声音》的编辑朱塞佩·普雷佐利尼互通信件。普雷佐利尼是一个行政长官的儿子，其阶级地位和文化背景都比墨索里尼要好，但他最终也只是一个记者，并且他的政治观点也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意识形态的目的。他还以《没用的意大利人》为题记录下了自己的生活经历。1909年，他编辑的报纸《声音》在当时持不同政见的年轻人中间已经享有很高的声望。正如墨索里尼所说的那样，这些年轻人把当时的意大利总理焦利蒂以及他的自由主义形容为“无可救药的平庸”，是一个“时代的错误”和“民族的耻辱”。墨索里尼自己订阅了这份报纸，并且，在他的新乐队的一次演出中，他还公开地力劝特伦托的人们也订阅该报。墨索里尼称，普雷佐利尼是一个“有勇气”的知识分子，而“勇气”正是大多数同时代的人身上所缺乏的品质。

有人对墨索里尼与普雷佐利尼之间的通信中的差别进行了研究。一开始，墨索里尼恰当地对特伦托的“知识分子的生活”表示了遗憾，觉得这种生活让人觉得“不太舒服”。当有可能稍微严肃地进行解释的时候，他便试着向他的可能的资助人解释了当地政治的复杂性。他解释说：他坦率而敏锐地承认，毫无疑问，生活在特伦托的“意大利人”喜欢自治，而不喜欢被归并入意大利。同样，的里雅斯特人既“不完全是意大利人”，也不注定就是“完全的斯拉夫人”。但是，墨索里尼后来解释说，他对普雷佐利尼最为敬佩的一点是他寻求“让意大利人知道意大利”。他钦佩地对

普雷佐利尼说：“为‘意大利人’创造一个灵魂是一项崇高的使命。”

然而，墨索里尼也在自己供职的报纸上更为详细地写道：很明显，社会主义者也不应当轻易地“放弃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以及他们与生俱来的传统。他们只是坚决不要一个‘资产阶级的祖国’。在热爱他们自己民族的同时，不能强制他们去恨其他的民族。所有民族和谐融洽的发展和兄弟般的关系才是社会主义者理想中的完美状态。”

有些分析家认为，墨索里尼的这些言论表明，到1909年时，墨索里尼已经变成了一个民族社会主义者了。但是，过分根据字面的表述来判断他的观点，并认为他的转变过程已经定型都是错误的。与普雷佐利尼通信时，他是在试图接近一位已得到承认的地位高过他的人，可以看出他在努力地讨好普雷佐利尼以获得他的尊重和兴趣。他的言论表达了一种欲望，那就是想跳出特伦托到更令人激动和更为重要的地方去：也许是佛罗伦萨，也许是米兰，或者也许是罗马。墨索里尼并没能很好地掩饰自己的雄心，他不想把自己的世界限制在意大利。事实上，当他憧憬辉煌的未来的时候，他想去的地方还是巴黎。在为《劳动者的未来》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中，他用极富特色的语言描述了巴黎：巴黎是一个能极好地考验一个人的“热情、仇恨和爱”的都市，是一个“相对较小的，但却发生着能够决定世界命运的斗争的竞技场”。在那里，人们在斗争中都精神百倍；在那里，牺牲是伟大的，恶行是可卑的。这是一个能够容纳整个宇宙的城市。墨索里尼的野心是有朝一日能在巴黎被奉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1909年，未来主义者菲利波·马里内蒂*为墨索里尼的运动发表了宣言，有人认为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而他用来实现自己的野心的方法，同时代的意大利知识分子并不是不知道。

然而，通往顶峰的路并没有变得很平坦。他的工作又一次很短命地结束了。此前，他曾发表过许多自信的言论，说哈普斯堡皇室的警察相对比较规矩，或者说无所事事，而他自己又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危险分子”，所以，他从到达特伦托的那一刻起就被警察盯上了。1909年夏天，当局决定把他驱逐出去。同时，因为弗朗茨·约瑟夫皇帝要到邻近的因斯布鲁克视察，警方需要全面地警惕，所以非常急切地想找到一个驱逐墨索里尼的借口。8月29日发生了一宗神秘的失窃案，虽然缺乏墨索里尼与此事有关的证据，但警方还是把这个案子栽赃到了墨索里尼

* 菲利波·马里内蒂（1876~1944），意大利文艺理论家。他写的未来主义剧本，如《饕餮的国王》、《他们来了》等，展现夸大的、违反理性的舞台形象和人的梦幻般的、惊恐的感觉。1909年2月20日，他在巴黎《费加罗报》发表《未来主义宣言》，以后又相继发表《未来主义文学宣言》、《未来主义戏剧宣言》等，提出一整套未来主义理论主张。1919年起，他参与法西斯党的活动，墨索里尼建立独裁政权后，马里内蒂被任命为科学院院士、意大利作家协会主席。

的头上。他们搜查了他的住所，并拿走了他写的文章。墨索里尼自己也被抓了起来，被关押在罗韦雷托的监狱，并且警方还要给他下达驱逐令。9月24日，他出庭受审，但令警察们厌恶的是，他竟被宣布无罪释放了。但是警察还是严密地监督着他，墨索里尼一气之下宣布绝食。但是两天之后，奥地利官方又把他放在了边境上算是了事。他于是又回到了位于弗利郊区的父亲的小餐馆，这实际上跟被驱逐没什么两样。1910年3月，罗马议会中的社会主义党派的议员还就此事进行了抗议。

对于墨索里尼来说，前景看来又变得严酷了。他又一次失业，重新混迹于弗利那些卖猪者之中，远离了“欧洲”知识分子和特伦托的政治世界，并且他的前途乌云满天。回到家仅仅6周之后，他便计划再一次出国，并且这次要到更远的地方去。他给一个他认为可能会跟自己一起出国的朋友写信说：“我在意大利待烦了，我在这个世界待烦了（我指的是旧的世界），我想离开这里到那个新世界去。如果我能发财——那也是我希望的，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一个同龄人回忆说，墨索里尼当时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老，衣冠不整，惹眼地扎着一条飘动的黑领带，乱糟糟的胡须3天没刮，提前谢顶造成的闪亮的脑袋与黑黑的下腭形成了奇怪的对比。他的诽谤者指出，他那双喷火的眼睛习惯性地不停转动，这让他看起来很像传统照片上遭受了社会不公的无政府主义复仇者的样子。

也许这种状况让他的性欲增强了。当然，墨索里尼此时已经找到了一个愿意与他一起生活的女人。在他为《劳动者的未来》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墨索里尼对爱情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说它可能会导致过度的伤感，并鼓吹需要“一个新的法律，一个新的道德，一个新的宗教”，从而推翻资产阶级的暴政和天主教的体面。墨索里尼终生保持着波希米亚人或者“拉丁人”的性习惯——一位评述者说，墨索里尼与400多个女人睡过觉。毫无疑问，墨索里尼有许多情妇，不管是长久的还是短暂的，还有许多私生子。他与拉凯莱·圭迪的关系比较持久，并通过婚姻的形式及时地确立下来，而且育有5个孩子。1910年9月1日，尚未满20岁的圭迪就为墨索里尼生下了长女埃达。次年，墨索里尼写道：拉凯莱是我的女性同志。

虽然有关他们夫妇关系的传说非常多，但他们确是在罗莎的教室里第一次相遇的。当时，墨索里尼正在替母亲上课，还是女学生的拉凯莱像其他许多学生一样，被这个新来的年轻老师那“像火一样的眼神”打动了。从贝尼托·墨索里尼自己这方面来说，他可能是被那个女学生的金发碧眼吸引住了，从而忽略了她那结实的体形和平平的智力。拉凯莱比墨索里尼小7岁，很长一段时间，她都用尊称“您”来称呼墨索里尼，而不用更为亲密的“你”来称呼他。拉凯莱家比墨索里尼的家更穷，更接近于贫农。事实上，他们俩的关系中最让人吃惊的事情是雄心勃勃的墨索里尼并没有舍弃她而去另攀高枝，那可意味着有可能给墨索里尼带来财富、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方面的优势。作为一个独裁者的妻子，拉凯莱露面

不多，她也不渴望露面。与其他政治家夫妇一样，她也不时地与贝尼托生活在一起。但是，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等人都不一样，更不用说其他许多政治领导人了，他有着“正常”的“家庭”生活，或者，至少他的生活特点与数以百万计的同龄人是一样的。他一直都很珍爱拉凯莱，并把她看做是自己与“真实世界”和“人民”的联系。

贝尼托和拉凯莱在1910年初就开始同居了，而同时她肯定也怀孕了。几个月之前，墨索里尼就与她“订婚”了。并且，他还写信对她的道德状况表示担忧，因为她当时与他的父母一起住在小旅馆里。1909年底，为了避免与年老体衰的亚历山德罗住在一起而染上疾病，拉凯莱搬到一个已婚的姐姐家去住。当墨索里尼最终来接她到弗利一个小住所里去的时候，他们在雨中步行了好几公里，并且根据拉凯莱1945年之后的回忆，她当时并没有觉得需要打上一把伞。在她看来，打伞是浮华挥霍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而不适合像她们圭迪姐妹这样的人。

他们的生活还是很拮据，拉凯莱永远也无法忘记的是，她当时对墨索里尼把钱浪费在买书上的习惯感到沮丧和难以理解。但墨索里尼后来终于有了一份工作，意大利人习惯上称此为“生活有了着落”。1910年1月9日，他成为了弗利当地一份四页开的社会主义新闻周刊的编辑，并同时兼任社会党当地分部的书记。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的特点，这份报纸被取名为《阶级斗争报》。接受这份工作意味着可以在弗利当地成为社会主义行政和文化方面的领导，所以，墨索里尼回到了家乡，接受了这个职位。再加上他的天才和进取心，未来正在向他招手。他可能摇身一变成为弗利的一个贵族，当然也是当地的一个知识分子，没准儿还会成为议会的议员（在自由党统治的意大利，许多政治家都是沿着这条路开始爬升的），并且很有可能成为一个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他的革命和社会主义理想可能妨碍他的前途，而其他年轻的理论空想家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已经“转变”了。1910年初，墨索里尼好像真的有了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他可以对以前那么精心规划的革命道路一笑置之。他可以很快就挺起个大肚子，穿上一件双排扣礼服，并且会有一堆尊敬他却又缠着他不放的客户。在谈起他的光辉职业时，他带着一副不太成熟的口气说，他终于完全具备了从事这一职业资格。自从离开福林波波利之后，他吸收了“文化”，获得“世界范围内的知识”，掌握了多种“现代语言”，因此，从多种意义上来讲，他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人物。但是，只有一件事情妨碍着墨索里尼顺着这条路走下去。墨索里尼自己写道：“我是一个不安分的人，脾气暴躁。”待在弗利并不足以满足他。贝尼托·墨索里尼仍然希望离开弗利这个昏昏欲睡的省份，走得更远、更快、更高。

4 《阶级斗争报》

在法西斯政权统治时期，墨索里尼曾宣称他是“一个旧农业文明的儿子”。这种自夸对他来说是不真实的（用在他弟弟阿纳尔多及其家庭上还比较合适）。当然，1910年1月份的时候，墨索里尼在思考他能代表的最后一件事情，即他与这片土地之间有不可分割的有机关系。到弗利之后，墨索里尼把兴趣更多地放在从知识方面激起大浪，进而宣传他的革命理想以及他自己。我们没有必要有意地把这些事件分开来看，而那些试图这么做的历史学家们经常会犯时代错误，从而过早地制造出一个非常鲜明的法西斯头子的形象（如果曾经有这么一个人的话）。1910年，墨索里尼所想象的自己的人生道路还是比较折中的。例如，在到《阶级斗争报》任编辑之前，他曾申请到博洛尼亚一份著名的自由保守的日报《零钱报》工作，但是没有被接受。于是，他很快就很高兴地把这份报纸指责为“制造谎言的工厂”。如果他真的为这份报纸工作的话，那么他的社会主义就不会表现得那么极端了。但是在弗利，认同革命是很容易的，尤其对于有他这样的阶级地位和教育背景的心怀抱负的青年来说，更是很难有其他选择。

贝尼托·墨索里尼由于身为《阶级斗争报》的编辑，因此也就成了弗利首要的社会主义者，而此时他还未满27岁。他的精力充沛得像要爆发出来，无论是在政治方面、知识方面还是性方面。同时代的人回忆说，他喜欢凌晨三四点钟才睡觉，但早上8点又出现在城市广场上充满渴望地等待着从城墙外的大世界送来的报纸。说是编辑一份四页的报纸，但实际上是他自己写，因为《阶级斗争报》只有他一个真正的记者。编辑这份报纸，再加上领导当地的社会主义分支机构，这些都还不足以成为他的一个全职工作。白天的大部分时间，墨索里尼会倚靠在一个亭子上，翻阅报纸和“所有艺术、科学、经济和哲学方面的新书”。不管何时，只要有这方面的新书问世，他都会立即弄到手并贪婪地很快读完。晚上11点，他才故意炫耀似地坐在当地的咖啡馆里开始为第二天的报纸写文章，这些文章多是在讽刺和以牙还牙地批评别人的错误。人们开始注意到，墨索里尼总是瞪着眼睛，如果你屈服于他这种好战的、居高临下的目光，那么他就会把你变成他的奴隶。他

的厚嘴唇也显示着坚定和统治欲望，这大概是他的崇拜者们说的。总而言之，人们都说他的确具有一个“非凡的男性”的特征。很快就有人说他能够放电，即使现在有一点人们已经很清楚，那就是他能够产生一种“特殊的紧迫感”，“在判断方面有显著的弹性”，并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新闻记者”。按有些人的说法，他是一个正在成形的领袖，但也有相反的说法，说他当时只不过是一个有野心的乡下人，并且前途未卜。

最初，在他刚从特伦托回到弗利的时候，他在罗马涅地区的社会主义和地区政治中并没有什么位置，还只是一个外围人物。在弗利，共和主义运动至少与社会主义运动一样兴盛（墨索里尼很快就承认了当地一个政治家的影响力并称之为“当地共和主义者的领袖”）。处在这种相对没有什么名气并且力量较弱的情况下，墨索里尼的任务是参与所有可能的政治活动。除了反对资产阶级及已有的秩序外，当然也要反对共和主义，而且要反对在社会主义运动中任何对他的理念和方法表示怀疑的人。另外，反教权主义可能仍是一个值得坚持的主题。他很谦虚地把自己标记为“一个真正的英雄”，并且很快就告诉他的读者们一个令人惊叹的自由思想家的案子：几个月前在西班牙被处死的弗朗切斯科·费雷尔。墨索里尼声称，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统治仍然没有受到挑战。* 1910年2月，他也确实为一个法律上的胜利而欢呼了一阵子：头年12月他就摊上了这个案子，现在终于解脱了。当地有一个名叫阿戈斯蒂诺·杰梅利的牧师，他想鼓吹卢尔德**能够治病的可能性（这当然是不科学的），谁知他刚一宣布，墨索里尼就组织了一些无业游民到当地的教堂外进行了一次带着些骚乱性质的抗议示威。

但是，反教权主义现在已经不时兴了，墨索里尼自己也开始承认这一事实。他的社论也必须集中到其他事情上。比如，一个社会主义的领导者有责任记录下党的历史，于是他这就为安德烈亚·科斯塔写了一篇充满悲情的讣告。几个月之后，他又如法炮制地为自己的父亲写了一篇，同时也捎带着把自己家的族谱关系说得清清楚楚。当时还有带着些传奇色彩的谣言说，他曾在父亲的坟前发誓永远效忠社会主义。然而，编辑报纸也有令他不满意的地方。刚刚当上编辑后不到一个月，他就在一篇典型的文章中严厉地指出，弗利人的整体文化层次不是很高，特别是社会主义分部的成员们更是如此。走进他们的房间，你会看到他们在打“布雷斯克拉”***，

* 意大利东北部城市拉文纳的共和主义者谴责像墨索里尼这样的极端社会主义分子的行为有些像宗教裁判所，墨索里尼很轻易地就反驳了他们。

——作者注

** 法国西南部比利牛斯山脚下的一个城镇，以罗马天主教的圣地而闻名。

——译者注

*** 布雷斯克拉，一种纸牌游戏。

——作者注

而且打得还那么臭，根本不会有人拥有像卡尔·马克思那种凝眉深思的样子。整个城市里没有一个能够引以为豪的像样的书店，图书与明信片和香水杂乱地堆在一起。书在弗利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状况？墨索里尼在苦苦地思索。如何才能严肃地讨论它们呢？当地人不去读严肃的报纸，只有4个人登记订阅《声音》，而工团主义的刊物《自由之页》则没有一个人订阅。他所在的城市竟是这样一个地方，“人们在酒馆里、舞厅、妓院和运动场里任自己的头脑随意地腐化”。墨索里尼总结到：“在弗利，知识分子的利益总是排在最后一位”。而每天午后都要在广场上闪烁一下自己的光芒的墨索里尼对这种状况真的是非常不满。他怎样才能找到一条道路从而让自己获得更大的满足呢？

答案就是奋起，加倍运用自己的革命雄辩术，不仅要在弗利出名，还要在整个地区，甚至更大的范围内出名。出身于罗马涅的背景可能会帮助一个人跳出这个地区。作为一名代表，他第一次参加了在米兰举行的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并获得了在会上发言的机会。墨索里尼努力地用一种生动有效的方式来介绍自己，称自己代表了他所在地区的“绝对不妥协”的态度。*罗马涅精神意味着，这里有一个年轻人准备公开声称“意大利议会已经腐败至深并且不可救药”。他也将以无所畏惧的斯巴达精神斥责那些随处可见的改良主义者。当改良主义者的一个领导人——莱奥尼达·比索拉蒂颇具争议地同意将于1911年3月在罗马皇宫会见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并就谁可以在下任政府中任职一事提出建议时，墨索里尼也站出来勇敢地大声谴责。此外，墨索里尼还对自己党内的绅士们进行了无情的攻击。例如，他以号召的口气写道：“律师就像是军队中的官员和牧师，他们像蝗虫一样跳上年轻的国家的躯体并吸取其最好的精华。”他还补充说：“律师和牧师永远都不可相信，因为他们为了生存必须撒谎。他们永远也无法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类似地，共济会会员也不是好同志，他们在米兰到处都是，所以邻近的拉文纳才是潜在的召开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的一个更好的地方。他说，当代社会主义的唯一危机存在于它的支持者而不是它自身的理念——他后来又多次提到人员不足这一问题。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一眼就能够看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是内在性的，并且需要立即以它的最高形式表现出来——即“完全彻底的革命”。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虽然墨索里尼轻视当地人的生活，但他自己的生活也难免单调乏味。例如，他的报纸曾经刊登了一篇热情四溢的报道（很有可能是墨索里尼自己写的），描写了他1910年5月访问普雷达皮奥的情景。访问当然是应邀进行的，但同时也是为了体现他对家乡的支持。他在那儿发表了一个相当长的

* 事实上，墨索里尼支持的党内派系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表现不怎么好，而墨索里尼自己也没有给人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

演说，题目是“社会主义者和工人运动”。那天是一个伟大的日子。墨索里尼的天才自始至终都在闪光，普雷达皮奥也会为他而骄傲。“来自社会所有阶层的‘众多’男女听众”聆听了他的演讲，他也没有让他们感到失望。那位演讲者，“他的名字是那么贴近我们工人”，他将近两个小时的演讲内容大大超出了我们的期望，“他的语言尖锐而令人信服，并且充满激情。许多听众是那么的全神贯注，他们不断发出发自内心的赞许的叫喊，演讲结束时他们报以长达几分钟的掌声向他致敬。”记者把整个事件总结为“一次真正的知识盛宴”。所有人都希望贝尼托·墨索里尼能够很快答应在普雷达皮奥再发表一次演讲。

能够在家乡被人们奉为名人肯定给了墨索里尼一些满足。但是，这并没能让他跳离他的家乡——他从来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但墨索里尼仍在从普雷达皮奥和弗利遥望着外面更为宽广的等待他去征服的世界。到中央党报《前进报》去当编辑有没有前途呢？当时《前进报》的影响力有所下降，墨索里尼带着些厌恶和自私抱怨说，这是由于党内派系纷争和编辑不力造成的。在编辑《阶级斗争报》时，墨索里尼就开始鼓吹为中央党报寻求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他认为应该把报纸从罗马迁往别处，因为这个城市缺少真正的工人阶级，并且从定义讲它是一个寄生的城市（不管后来法西斯的宣传家们怎么说，但墨索里尼的精神中的确没有罗马的元素）。他用非常通俗的语言说，所谓的“永恒的城市”里满是“廉价的女房东、擦皮鞋的男孩、牧师和官僚”。他悲伤地说，就在罗马城门外，一些家庭还在稻草屋里勉强维生，好像他们仍是远离欧洲文明的远古人类。如果把中央党报迁走，那么迁到哪里好呢？米兰也许可以，但那是个有证券市场的城市，商业占据着统治地位。佛罗伦萨呢？但那个城市里现有的报纸的质量太差了。这些城市都不行，无须多说，最适合一份社会主义报纸的地方是艾米利亚—罗马涅的首都博洛尼亚。在那里，《前进报》可以扎根在“全国无产阶级生活的中心……那里离罗马涅的红土带也很近，并且有成千上万的社会主义者随时准备着做出任何牺牲”。墨索里尼有自己的小算盘，如果《前进报》能在博洛尼亚编辑，那么他这个来自弗利的、曾被《零钱报》拒绝的年轻而好斗的记者就可以在这个精神首都里任职了。

墨索里尼此时正在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极端主义者”，一个罗马涅地区的社会主义勇士。1911年5月，在回顾以前编辑《阶级斗争报》的经历时，他有些得意地回忆说，他不光有效地反对了共和党人，并且也有效地反对了教权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以及社会党的主流派别：“在这种允许充分自由地进行批评的环境下，我发现自己有完全的自我判断力”。他把报纸的发行量扩大到了1600份，并且其中“约有1000份”是订阅的。他自豪地宣称，这些忠实的读者主要都是“真正的工人”。另外，每个星期天，他都要到弗利或者其他更小一些的城镇去宣传社会主义的真理。在那些地方，他要踩着满是尘土的道路才能找到当地的小

广场和社会党的支部。他还经常到低档的乡村市场的小旅馆里住宿——就在这样的一个小旅馆里，他遇到了后来成为博洛尼亚的法西斯头目的莱安德罗·阿尔皮纳蒂。

1911年，可以说墨索里尼努力工作而且卓有成效，不光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别人也是这么评价他的。他喜爱年纪尚幼的女儿，继续与拉凯莱住在一起。他在《阶级斗争报》做编辑的时间也比以前从事的各个职位的时间都要长，而他也对编辑这份报纸寄予了很多的快乐和期望，这是他在以前担任其他职位时所缺乏的。也许他可以适时地缓和一下他惯常对待世界的那种粗蛮无礼的方式，进而培养一些亲切感和幽默感。于是，他在自己的报纸上详述了罗马淫人喜欢修辞、暴力和他们城里的钟楼的方式，他们不愿出国，只知道他们的家乡是世界的中心。他惯常用反语进行讽刺，但这篇文章却表达了一种含混不清的态度，一半是敌视，一半却是喜欢，而更多的却是写他自己。墨索里尼正在成长为一个在弗利有影响力的人物。

他擅长的散文还是那么的直率、具有讽刺性，并且有些粗鲁。索雷尔——这个他一度非常尊敬的人，现在的政治态度有些右倾，于是便被墨索里尼批判为“一个习惯去搜抢图书馆书架的靠抚恤生活的人，一个隐蔽的向往旧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人，法兰西共和国的一个敌人，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一个敌人”。而那些聚集在佛罗伦萨并成立了意大利民族主义者联盟的知识分子，则被他称为“君主政体、军队和战争”的阿谀奉承者，“三个词，代表着三个机构，也是三种荒谬。”但是不久之后，这个组织就成为了他的法西斯事业的盟友了。墨索里尼承认他曾经挑衅过普雷佐利尼以及他在《声音》工作时的同事，因为他们对民族主义者表示欣赏。他还承认自己曾经对国内的民族主义及其观点产生过共鸣，赞同“为了进步、统一和意大利民族的复兴而进行的民主和文化运动”。但他的共鸣也仅限于此。现在，他的社会主义信念太坚定了，容不得更多的让步。并且，他必须承认，还有比意大利更糟糕的地方，比如遥远的美国。在那里，“拥有资产的贪婪的美国资产阶级毫无限度地掠夺，毫无顾忌地拥有，并且他们不像欧洲的资产阶级那样，他们没有一点点害怕和怯懦。他们是粗暴的、独裁的、罪恶的。当他们感觉到需要的时候，就会让自己的双手沾满无产阶级的鲜血。他们没有丝毫的人性。他们只对剥削感兴趣。”*但是，墨索里尼并没有与普雷佐利尼完全决裂。事实上，1911年的三四月间，墨索里尼还谦恭地请求普雷佐利尼为他即将出版的一本书预付版

* 墨索里尼还攻击了美国资产阶级的“无可比拟的野蛮和残忍”，那些“残忍的唯利是图的人”，称他们的残忍集中表现在使用电椅上，但事实上，他们的司法体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证明他们的残忍。

税。这本书名叫《一个社会主义者眼中的特伦蒂诺》，还是由普雷佐利尼赞助准备在佛罗伦萨出版的。墨索里尼抱怨说，父亲的去世造成了他一时的拮据。他的言辞似狂风暴雨，但言辞之下隐藏的是他对意大利国籍的认同，并且，他在国际主义的革命社会主义上的投入已经是有所节制了。

墨索里尼是一个坚定的社会党人吗？墨索里尼是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吗？墨索里尼具有有影响力的声望吗？这些问题一直存在于墨索里尼的脑海中。但有一点不太可能，那就是墨索里尼将安心地待在这个省份。他对极端路线的无休止的探索，以及对可能由此给他带来的荣誉的追求，都没有停止。甚至当他最初的极端性有所减退的时候，他在实践中对社会主义的忠诚却到了一个转换点。1911年4月，在他的发起下，社会党弗利分部宣布从全国组织中独立出去。他写了一篇题为《勇敢挑战》的文章来证明这么做的正确性，这篇文章很有特点，并且是他发自内心的想法。他在文章中说：“我们不是在提出一个新的政治标准，而是要从那些人手里挽救社会主义。”因为他们代表的是对理想的妥协和腐败。他还写道：相反，他和他的法西斯（这可能是他第一次使用这个词，但没有赋予它最终的意思）则代表着纯粹的社会主义。

然而，通过这一次从党内完全分离出来的行动，墨索里尼走在了时间的前面。党内的马克思主义朋友很快就找到墨索里尼进行谈判，希望他能回到党内来。1911年的夏天，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意大利都面临着许多重大的事件。而对这些形势的关心，也在罗马涅地区有所反映，而这些也都将确立墨索里尼在社会党内的名望。有些人认为，在此之后的18个月里，墨索里尼就要定型为未来的他了。

1911年至1912年之间这段时间，对于自由党、焦利蒂和意大利来说都是一个分水岭。20世纪初初期非常适合于一个新的政治体系，因为从1898年到1900年，在路易吉·佩卢将军的准独裁统治下，国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国王乌贝托一世被一名从美国回国的无政府主义移民暗杀，但这件事却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动事件，相反，却标志着自由党政权统治的开始。在焦利蒂的英明管理下（他曾在1903~1905、1906~1909和1911~1914年三次担任总理），意大利的经济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很繁荣，就连一些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如图拉蒂）也承认意大利是一个正在“前进”的地方。以都灵的工厂、米兰的银行和热那亚的港口为特点形成了北部“三角工业区”，意大利正在迅速地接近现代化，而这些在过去都是属于更富有和更强大的一些国家的特权，如英国、德国和法国。鉴于有了这些现实中和期望中的进步，1911年意大利举行全国庆典以纪念复兴运动50周年，看起来也是合情合理的。一尊“宏伟的”维克托·伊曼纽尔的白色纪念碑被竖立在了罗马城丘比特神殿的下面，用来宣示对拉丁文明的继承。在纪念碑的落成典礼上，人们聚集鼓掌。但《前进报》的编辑克劳迪奥·特雷韦斯却不愿就此给予赞扬。

但是，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通常不会只传递单一的信息。1911年，再次出任总理的焦利蒂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处境。国家的两个部分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南部至今还没有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该为南部做些什么呢？应该为广大的贫穷和落后地区的人民做些什么呢？意大利之外的欧洲是一个危险的世界，紧密的联盟正在建立，帝国主义正在耀武扬威，意大利如何能够防御或者改变自己的“大国中最弱的一个”的地位呢？此外，怎样才能让意大利的人民“国有化”呢？或者，更准确地说，让亚平宁半岛上的意大利人“国有化”呢？怎样才能说服他们相信执政的意大利政府也是他们的政府呢？特别是，如何说服那些异见分子——具有说服力的社会主义者、天主教徒、民族主义者和知识分子，他们正越来越尖锐地攻击自由党的缺点或者叫做“腐化”——怎样才能不用革命、战争和专政的手段而把他们“转化”并吸纳进现有的政治体系中来呢？

焦利蒂的确有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战略来应对这些重大问题。在国外，他打算夺取土耳其统治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并恢复这些地区原来的名字——利比亚。无论这些地方实际上是多么穷，如果夺取了它们，总能安抚一下民族主义者，并且能够提高意大利在世界上的声望。在国内，焦利蒂推行了一项全国性的保险计划，并且把它与扩大选民范围结合起来。1913年选举时，大约65%的意大利成年男性都有权进行投票选举。从理论上讲，这两项措施的结合是一种最具长远眼光的非常英明而实用的自由主义。而事实上，这项在国内实行的计划却变成了灾难，并预示着自由党统治下的意大利的苦难的开始。但是，有一些人却在为总理焦利蒂陷入困境而欢呼，并趁机让自己成为全国知名的重要人物，这其中就有贝尼托·墨索里尼。

一些社会主义者也被焦利蒂的计划所吸引，比索拉蒂和图拉蒂就是其中的两个。他们都是爱国的人士，像焦利蒂一样，他们也从国家未来的角度去看问题。地位不高的社会党人，实际上，大部分普通党员虽然对这些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但还是非常重视它对当地的影响。例如，在焦利蒂执政期间，罗马涅地区的阶级斗争加剧了。农业的现代化使得曾经存在于各种农民（包括或大或小的土地所有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租种土地的小佃农，以及按天受雇的农民）之间比较复杂的差别变得简单了。在博洛尼亚或者弗利的内地，生活富裕的地主和艰难维持营生的农民之间的冲突也越来越严重了。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土地落入了有限的一些公司手中，公司的匿名所有者远远地住在米兰或者罗马，他们的利益由受雇佣的

* 的黎波里塔尼亚，利比亚西北部的一个地区。

——译者注

** 昔兰尼加，利比亚东部的一个地区。

——译者注

经理来维护，而这些经理通常比他们的雇主更加无情和贪婪。另一方面，农民们组成的一些联盟也在不断地成长，而且更多地是从那些最穷的农民以及领取工资的农民中吸收新成员。小佃农们也是如此，在资本化的压力下，他们的经济情况也相对不如以前了。他们很多是社会党人，也有许多乡村劳动者，以及墨索里尼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他们组成了一个不太稳定的联盟。

像一些工业家一样，1910年，地主们也成立了一个保护伞性质的组织——“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来维护和扩大他们的利益，这就更助长了知识分子们的激进主义，并且使得农民们对社会主义更加地忠诚。1911年4月，在博洛尼亚召开的“全国农业大会”拒绝了总理焦利蒂意在调和大众矛盾的政策，并且呼吁“团结所有不同领域的人们，在自由和公正的原则受到颠覆的威胁之时，为国家财富的生产和发展作出贡献。”焦利蒂可以在议会中宣扬甚至实践现代化、妥协及“民族统一”，但是各个省里的现实却难以改变。富人看起来变得更加富有了，并且更加傲慢专横，而穷人则变得更加贫穷了，但同时也变得更加固执和武断了。

这种情况简直就像是为类似贝尼托·墨索里尼这样的雄辩家和有个人野心的人定制的一样。好几年以来，他一直为他所在地区的罢工和其他“社会运动”而鼓掌喝彩。而现在，突然之间他就登上了全国性的舞台。现在有一点越来越明确：就在1911年的夏天，意大利国内的爱国纪念运动一浪接一浪，正是这些运动给了墨索里尼攀升的契机。同时，这也促使焦利蒂准备采取行动夺回的黎波里。意大利的外交官于9月29日向土耳其递交了正式的宣战书，而意大利的军舰却在此前就已经到达了它们的目的地。

按照社会主义的理论，面对战争、不公、殖民和皇帝发动的战争都要尽最大可能地发动整个工人阶级进行全面的罢工和抵制。墨索里尼就是为此大声叫喊但却无能为力的一个人。在他就利比亚问题为《阶级斗争报》所写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于9月23日）中，他谴责了“好战者们专业地模仿英雄气概的行为”。称那些以主要理论家恩里科·科拉迪尼为首的民族主义者有时厚颜无耻地为反马克思主义的行为辩护，他们说意大利是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因此应当避免阶级斗争，并代之以集中力量对抗英国和法国等资产阶级国家。墨索里尼当时也不清楚焦利蒂是否是在有意戏弄这些滑稽可笑的人和恶毒的武力炫耀者。但是，他明确而有力地写道：如果有战争，“意大利的无产阶级必须时刻准备发动总罢工”。

当政府的确准备采取行动发动战争这一消息传到弗利时，墨索里尼也采取了行动。9月25日，在他的要求和敦促下，当地的社会党分部进行了投票，一致同意举行罢工。在墨索里尼和当地其他领导人的演讲的鼓动下，9月26日，社会党的骨干分子破坏了通往梅尔多拉的铁路，阻碍了军用列车的通行，并且击退了前来阻止他们的骑兵部队。墨索里尼在为《阶级斗争报》所写的报道中充满激情地说：“弗利的无产阶级已经竖立了一个伟大的榜样。总罢工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他

还轻蔑地说，改良主义者没有做任何事来阻止政府的罪恶战争，这表现了他们的怯懦和漠不关心。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必须破坏这场战争，他们用“新的革命精神”武装了自己，这种革命精神已经在当地的同志们的身上得到了体现。墨索里尼还用一种熟悉、生动，但从历史的角度讲却并不太精确的类比补充说，法国大革命是什么？可以说是一次持续了多年的总罢工。我们不必去理会那些反对罢工的人，不管他们是索雷尔这样的人，还是工团主义者（其中有一小部分在利比亚问题上转变成了爱国主义者）、议会中的社会党成员、来自意大利总工会的保守的工会主义者或者任何其他类型的改良主义者。当然，教权主义者以及他们的反动朋友们也包含在内。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现在可能是发动“革命”的时候了。

但是政府很快就对煽动骚乱者采取了严厉的措施。10月14日，墨索里尼和另一名同志彼得罗·南尼一起被捕了。后者在“二战”后60年代还作为社会党人出任过意大利的外交部长。一个同时代的人称，政府在逮捕墨索里尼时还是遵循了一定的程序的。当警察找到墨索里尼时，他正在常去的一个地方喝咖啡。警察很有礼貌地对他说：“墨索里尼教授，您必须跟我们到警察局去一趟。”墨索里尼问警察能不能让他先把咖啡喝完，并且很谦恭地保证他一定会去的。之后，他就向拘留所走去了。11月18日，墨索里尼教授到弗利出庭受审。在法庭上，他用华美的语言把自己作为一个英雄进行了辩护：“我不是一个做了坏事的恶人，也不是一个普通的罪犯，而是一个有理想和有良知的人，一个有信仰的鼓动者和战士。”他这么说只不过是想要在即使得不到公平审判的情况下至少获得一些尊重罢了。在法庭上旁听的人们都被他的言辞搅动了，但法官却不为所动，仍然认定他有罪并判处他一年监禁。在众人的呼吁下，他的刑期被缩短了。1912年3月12日，他得意扬扬地出狱了，并且他的地位也因这件事而大大提高。《阶级斗争报》一直让它的读者保持着对其领导人做出的牺牲的关注。1月份，一位匿名的作者在文章里写道，他被墨索里尼的目光（仍然是“永不停息、深邃和燃烧着的光芒”）、头脑、言辞和灵魂的力量深深地打动了。他有“苏格拉底一样的头脑”，他是一个“领导人”。在罗马出版的另一份社会党报纸也对墨索里尼的人格进行了类似的赞美。一个记者写道，墨索里尼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就不用说了，他毫无疑问已经成为“党内最具同情心和重要影响力的一员”。最后，《前进报》也刊载了一篇阿谀奉承的文章，文章里说：“墨索里尼同志今天上午出狱了，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们在他朴实的家里见到了他和他所深爱的家人，并且与他聊了一会儿。他在狱中并没有遭受什么身体上的折磨。大量表示祝贺和支持的电报从全国各地发来。”看来墨索里尼值得让弗利的同志们为他在著名的维多利亚大饭店举行一个庆祝宴会了。墨索里尼不像他的父亲亚历山德罗，他大张旗鼓地采取行动表明自己的信念，从而登上了全国性的舞台。

在弗利社会党分部为他举行的庆祝宴会上，墨索里尼穿梭走动，到处宣扬和

巩固他最近的政治成果。他现在已经是《前进报》驻弗利的记者了，他告诉读者说，他决定扩大《阶级斗争报》的版面，并努力使它的发行量翻一番，达到2800份，并把它变成“罗马涅地区最优秀的、读者最多的报纸之一”。他的知识分子的雄心还进一步膨胀，写了一本有关捷克新教的改良者约翰·胡斯*的书。虽然这本书（实际上出版于1913年）附有参考文献《约翰·胡斯真相》，但却是一本让人感到非常奇怪的书。它证明不管墨索里尼曾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他绝对不是一个历史学家。墨索里尼在书的简介中坦白地承认，意大利的图书馆里很少有关于胡斯的书籍，而他自己又不是那些为数极少的能读懂捷克语的意大利人中的一个。这本书虽然赞扬胡斯是抵抗德国霸权的捷克民族英雄，但书的大部分篇幅仍是体现了墨索里尼作为一个反教权主义者的观点，描写了女修道院里的性欲，罗马教皇的阴谋和罪恶等。在墨索里尼这本书里，胡斯这位新教先驱几乎被他重新塑造成了一个复兴运动之父。

幸运的是，墨索里尼的职业还没有误入写书这条歧途。现实中的有利条件出现了。1912年7月7日，社会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来自意大利全国各地的代表齐聚位于博洛尼亚西边的雷焦艾米利亚。这对于改良主义者来说可不是什么幸运的事，就在一年前，他们还在米兰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而此时，围绕利比亚战争而形成的危机加剧了社会的紧张程度，并把雷焦变成了一个革命的堡垒。7月8日，当墨索里尼站起来发言时，他还戴着前9个月的英雄壮举给他带来的光环，他的表现就像在家乡一样。

他的演讲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有意表现出坚决不妥协的态度，从而向忠诚的党员以及范围更广的世人显示，他们必须承认他这个来自弗利的年轻编辑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在演讲开始，墨索里尼就适当地引用马克思的理论作为支持，对意大利议会（以及议会中的社会党议员）发动了一场彻底的全面进攻。他宣称说，在意大利这个国家，“议员们都患了白痴病……并且已经到了最让人感到耻辱的地步”。焦利蒂的选举改革只不过是一个保持议会运转的骗局罢了，而议会这个机构对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来说“根本就不需要”。所有那些打着社会党的旗帜被选入议会的人都是可耻的。但只有图拉蒂还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因为他公开表示意大利的无产阶级全都厌恶战争（图拉蒂当时正在试图让党内的对立派别互相妥协，墨索里尼还不想与他对立）。

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很简单——把为首的改良派人物比索拉蒂，伊万诺·博诺夫，安杰洛·卡布里尼，圭多·普罗德雷卡开除出去。3月份，一名罗马的建筑

* 约翰·胡斯（1369~1415），捷克斯洛伐克宗教改革者，1409年由于攻击牧师制度的堕落而被开除教籍。他在著作中对天主教会的权威和正确性提出了质疑。

工人向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开枪射击，比索拉蒂和他的同党对此公开表示遗憾。但是，墨索里尼宣称，他并不想毫不留情地对待他人，但人们必须同意“容忍比索拉蒂这种行为简直就像自己也成了国王的一部分一样”。他继续说，毫无疑问，那些心软的人们会说斗争应当集中在信念上而不是人身攻击上，但这样做还不够好，因为知识性的对话的作用是有限的。有时，对具体的人发难是“合乎逻辑和仁慈的”。墨索里尼以民众领袖的名义宣布：“我们拿来让其经受严峻考验的不是信念，而是应当归入党的章程的特定的行动，而这些党的章程并不是由我们自己制定的。”他还打了一个比喻来进行说明，这个比喻在20世纪的灾难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险恶的角色。他说：“社会党必须实行开除制度，因为它是一个活的有机体。正如梅奇尼科夫*发现生理学上的抗体**一样，党的体内也有社会主义的抗体。如果我们不自我防卫，那么党内的不纯洁分子就会像血液里流动的破坏性细菌最终杀死人体组织那样把党分裂掉。”总之，意大利新型的政党必须把精力集中到一件事情上，那就是击垮已经乱作一团的支离破碎的自由党的政治体系，并且要“从所有的方面对其进行攻击”。最后，墨索里尼用一个意大利人难以回避的问题总结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成员众多并且团结紧密”的党，同时也是为什么他带来一份“被开除者名单”的原因。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会去跟随改良主义分子，“现在不会，将来不会，永远也不会。”

对与会的社会党的代表而言，这是一个出色的演讲，博学（墨索里尼引用了塞万提斯***和马克思的言论，而比索拉蒂则被指责过多地引用了索雷尔）而“科学”，同时又贴近群众，而这正是墨索里尼长期以来喜欢的风格。弗利发生的革命证明了墨索里尼在当时的正确性，受到攻击的代表被开除出党（他们分裂出去成立了自己的改革党）。墨索里尼原先的资助人塞拉蒂的一个朋友科斯坦蒂诺·拉扎里被选为党的书记，而安杰利卡·巴拉巴诺芙和墨索里尼自己则被选入了党的委员会。此外，发生在雷焦艾米利亚的事件也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流亡国外的列宁在俄罗斯《真理报》上高兴地写道：意大利人民正在走上“正确的道路”。年纪较老的革命鼓动者奇普里亚尼也在媒体上赞扬墨索里尼，称“他对革命的投入精神就像我一样”。墨索里尼这一壮举给他带来的好处可不只限于他人的口头赞扬。党内的极端主义分子此时同意，《前进报》不能再由特雷韦斯编辑了，而必须

* 梅奇尼科夫(1845~1916)，俄国动物学家、细菌学家，曾获1908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
——译者注

** 墨索里尼实际上使用是一个更为专业性的词汇：噬菌细胞。
——作者注

*** 塞万提斯(1547~1616)，西班牙小说家，《堂吉珂德》的作者。
——译者注

交由革命派来编辑，需要由一个充满热情和活力的、坚定的人来取代他。机会就在眼前。而当时，就在从雷焦艾米利亚回到弗利几周之后，墨索里尼又提交了一份在当地任教的申请。

这是他最后一次认为新闻业和政治都不是他适合从事的职业。很快，党内获胜的一派就宣布推荐墨索里尼作为《前进报》的编辑。1912年10月，他因工作需要而到了普利亚，这也是他第一次到意大利南部。在那里，他频繁地发表演讲并撰写文章，在当地农民中间讲述社会主义将会给他们带来的前景。“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都积极地愿意工作，换句话说，人民将不再是平民。”1912年12月1日，还差6个多月才满三十岁的墨索里尼担任了《前进报》的总编辑，并把家随《前进报》一起搬到了米兰。拉凯莱和女儿埃达也搬到了一所朴实的住所里，并且把自亚历山德罗死后就一直独居的安娜·圭迪也一同带来了。这个大家庭开始四处想办法支付每年1000里拉的租金。

在第一篇社论里，墨索里尼就称自己为成为“意大利社会党的精神和物质遗产”的发言人而感到自豪和激动。他解释说：“在雷焦艾米利亚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之后，获胜的派别就有责任担负起领导党和所有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实践的重任。”当然，他也会听取所有派别的意见，但他仍会变得“更加革命”。“我们郑重地承诺将向资产阶级反动的哲学家、反对党集团以及弱小的萨伏伊王国政府*证明，意大利社会主义具有无限的活力。

此后的墨索里尼好战而坚持纯粹主义，并准备为自己的理想做出任何牺牲。在为另一份报纸写的一篇化名文章中，他告诉《民众报》的读者说，党的新闻工作者不应当认为自己的工作是为了职业生涯中的升迁，而应当更多地投入到斗争中去（这份报纸的编辑保罗·瓦莱拉记得墨索里尼有一双“喷火的眼睛”，与拉凯莱这个“好家庭主妇”住在一起，并且对自己的贫穷保持着乐观态度）。但是，事情又一次被证明不像它们表面看起来的那么简单。就在同一份报纸上，墨索里尼表达了自己有些奇怪的不安：“我是一个淳朴的人，我的社会主义也是一样。我像一个流亡人士一样在现在的市场社会中到处走动。我不是一个商人，我对商业也没有兴趣。”几乎就在同时，他告诉《前进报》的读者们说，尼采是社会党人不应忘记的一个名字。通常，墨索里尼总是准备着辩论。“信念能够移山，因为它可以产生一种让山移动的幻想。幻想也许是生活中唯一的真实。”墨索里尼在问自

* 萨伏伊，历史上的地区名，是法国东南、瑞士西部和意大利西北部以前的一个公国。此地在被裘力斯·恺撒征服以后几次易手，并在15世纪早期成为公国，1720年萨伏伊大公取得撒丁国王的头衔，1861年萨伏伊征服者伊曼纽尔二世登上新成立的意大利王国皇座，同时原萨伏伊的大部分地区割让给了法国。

己，一个社会主义者能够并且应当变得多么“英雄”，多么“理想主义”和多么“反唯物主义”？

墨索里尼的这种知识上和人格上的无休止和不安分也反映在他在雷焦艾米利亚会议后不久写给普雷佐利尼的一封信中。这封信的用词需要仔细地评价，因为墨索里尼希望取悦于收信人，所以遣词造句都很用心。他在信中坦白地说：“我可以代表一些革命者，当然，我对社会主义的信仰观念与许多朋友的俗气的革命主义观念都相去甚远。”墨索里尼在信中露骨地吹捧自己，目的是让普雷佐利尼能愿意继续做他的“朋友”和资助人。墨索里尼在思索，“我要把我的理念调整得更好，更加精准。”虽然如此，他还是理解现在与改良派的冲突只是社会党与其他更加关心报酬和生活条件的各个组织“在生存斗争中的一个小插曲”。他在后来给普雷佐利尼的一封信中解释说：“我有一种在沙漠中呼喊的感觉。”他是一个达尔文主义者？一个尼采主义者？一个布朗基主义者？一个工团主义者？一个就任何问题都能写出好文章的记者？同时扮演知识分子和极端主义者的角色一点也不容易，而此时墨索里尼的名望更大了，也更加重要了，并且他更加具有观察和想象个人机会的能力了。

让理想去适应行动是一个问题，社交是另一个问题，而性则是第三个问题，特别是当墨索里尼一家在大都市米兰安家之后更要面对这些问题。这个大都市里有那么多的诱惑，同时也有那么多规矩要学。作为《前进报》的编辑，墨索里尼加入了当地一个成立于1890年的有名的记者俱乐部“伦巴第记者协会”。在俱乐部里开会时，墨索里尼都刻意地保持着低姿态，尽管一个新的同僚带点讽刺地说他不多说话是“令人难堪的”不合适。他回忆说，墨索里尼总是喜欢在牙缝里嘟囔，别人很难听清他在说些什么，并且一旦发生矛盾，他就会变得非常暴躁和粗鲁无礼。然而，大多数时间里，墨索里尼还是努力地与大家和谐相处。不过此时，他过去那种明显的不习惯社交的邋遢不见了，相反，他还戴上了一顶圆顶的礼帽。此外，墨索里尼还费尽心思地让人们看到他出没于米兰最有名的画廊，这是当地一个优雅的聚会场所。他还不时地走进市里一些消费不太高的酒吧和饭店，尤其是在有别人付账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墨索里尼在米兰认识的男人总是让他心里感到不踏实，因为他们与普雷达皮奥或者弗利的同志不一样。米兰的女人更是不一样，其中最有名的当数《前进报》的艺术评论家玛格丽塔·萨尔法蒂。她生于1880年，已婚并且有孩子，还是一个犹太人，自称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和新女性。她丈夫是一个社会党律师，并且支持犹太人的复国运动。她的父亲是威尼斯议会里一个反动的教权主义的代表。而她自己的政治观点也潜在地像墨索里尼那样有弹性。墨索里尼和她的关系一直持续着，直到法西斯通过的反犹太人的种族立法迫使萨尔法蒂到纽约避难（在墨索里尼的协助下）。早先，萨尔法蒂曾经为墨索里尼写过一部感情横

溢的自传，* 虽然我们不应夸大她的政治角色以及她对情夫墨索里尼的影响，但她对墨索里尼政府的文化政策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影响的。

然而，更加典型的还是墨索里尼与莱达·拉法内利之间的恋情。她是一个作家、小说家、记者和极端主义者，并且夸耀地说她正在寻找无政府主义和“阿拉伯主义”之间的内涵。墨索里尼写给她的信在法西斯统治期间差点被毁掉，后来这些信件还被公开展示，而拉法内利对她与墨索里尼之间的关系的叙述也被编辑出版了。与萨尔法蒂一样，拉法内利也生于1880年（出生地是托斯卡纳地区的皮斯托亚），所以比墨索里尼年龄稍大一些（比拉凯莱大十岁）。二十岁的时候，她在埃及待过3个月，可能与未来派画家卡洛·卡拉有过一段关系。回到意大利之后，拉法内利很快就因为自己的许多观点而成名。她公开指责神职人员的好色，特别是猥亵未成年人；她还反对种族主义，认为黑人应当充分地参与社会事务；她支持“自由恋爱”，即使她相信自由的最高境界存在于穆斯林世界里。但更为传统的是，她还敦促把“广大的男士”从酗酒和嫖妓中解救出来，而“广大的女士”则不应当忘记或者放弃为母之道。为了提升普通民众的地位，她在批判那些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可能背叛工人阶级的人的同时，还宣布自觉的精英和先锋人士可以组成社会的“第四阶层”。

尽管墨索里尼在一生中都是最为粗暴的家长，但初到米兰后，他还是确信自己找到了一个精神上的配偶。墨索里尼就巴黎公社问题发表了一个热情洋溢的演说，给拉法内利留下了深刻印象，主动把自己介绍给了墨索里尼。她还在一份无政府主义周刊《自由报》上写了一篇吹捧他的文章：《英雄时代的社会主义者》，这肯定让他的自负进一步膨胀了。他仍然是一个以男性的和有力的冲动方式去感知和判断事物的人。他是一个男人。在后来写的一部小说里，拉法内利描写了一个“长着大而乌黑的眼睛，表情稍有些疯狂”的年轻记者。他常常会陷入神经质似的沉思，英俊而有些粗鲁，又总是表现出一种不安，很容易被他的女人身上浓重的香味所吸引。在这个人的身上，野心和好色在进行着激烈的竞争。他内心的矛盾好像一直都存在。娶到一个年轻而美丽的金发碧眼的女人并没有让他满足，音乐和写作也是一样，而“新闻工作对他的吸引力就像黑夜里的一盏电灯吸引一只飞蛾那样”。这个充满热情的年轻人极欲让人们关注他，尊敬他，但不知道为什么，对他来说，满足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只有具有东方气质的女人的神秘诱惑，才能让他沿着魔幻之路最终感觉到快乐和幸福。

据莱达说，1913年的墨索里尼想让整个米兰都陪他一起熬夜并且注意他。如

* 这本自传被译成了英文，墨索里尼对这本书非常满意，亲自为它写了前言。这本书流传得比较广泛。

果这是莱达对她的朋友的刻意描述，那么她所崇拜的人却在莱达这个他新认识的女人面前表现得有些糊涂。他们之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样约会。试图在报社的办公室里约会是不可能的，那儿从来都不会是只有墨索里尼一个人。咖啡馆里也不行，因为那里总是挤满了人。比较好的选择是在她的住处。他可以在周二的下午3点到她那里（意大利人习惯于在上午干正事，下午干些其他的事，看来墨索里尼的习惯也是这样）。墨索里尼用情人间常用的陈词滥调写道：“你理解我，并且理解的方式与众不同。我感觉到我们之间已经发生了些什么……或者只是我在愚弄自己？直接地告诉我吧！等着我，我也将带着一种奇怪的颤抖等待着你。”

几天之后，他又写信给她：

“昨天，我与你一起度过了3个小时的美妙时光，但我又感觉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们谈了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我们有着共同的喜好和厌恶，不管是在政治上、艺术上还是在哲学上，甚至对天气情况也是如此。我们喜欢孤独。你想到非洲去寻找孤独，我则在喧嚣的城市里寻找，而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你的小客厅对我来说是一个新发现，它与其他人的不一样。你的气质让我对神秘而美妙的东方产生了幻想，那儿有浓郁的芬芳，有令人疯狂和着迷的梦想。”

看样子，墨索里尼这个乡下人，在衣服上还留有未曾掸去的从达莫利尼带来的尘土的时候，就深深地迷恋上了莱达这个女人，至少在那一刻是这样。“和你在一起，我感觉离米兰、新闻工作、政治、意大利、西方、欧洲……都很遥远。让我们一起阅读尼采的作品以及可兰经。听着，我每个下午都有空。给我写信吧，如果我我能去，我就会准时在那儿，并且一定会小心谨慎的。”

但是，即使两个人都想找到恋爱的捷径，也会发现有不少麻烦。墨索里尼的生活比他先前所说的要忙得多。很快，他就因为必须到罗马、苏黎世，或者生病而向莱达道歉。但是，当他们真的在一起时，他感觉就像在天堂一样：“我看起来年轻了十岁，我简直有些疯狂了。”在他的莱达的陪伴下，他被一种感觉俘虏了：“这种感觉，我试图去解释，但又不想去解释……我干脆把我的时光交给命运运算了。”

于是，故事在继续着。有一次，她错误地出现在他的一个会议上，而他则后悔没有公开地欢迎她光临。在争吵之后，他们能够在周六重归于好吗？他半夜里带着激情离开了她的住所，“我的神经还在兴奋地颤抖，我的心从未像现在一样没有规律地跳动，我的大脑一团混乱，只好喝了一大杯苦艾酒来让自己镇静一些。”黑夜里，他会写信抱怨她不在身边：“半夜，我感觉自己在漂流，心中充满了欲望和乡愁。我想把我血管中流动的电流传给你一些。谁知道为什么？”但是在这之后，他可能又会老生常谈了。他必须离开几天，当时是7月中旬，“我要带着同族的两个人到沿海地区去。”但是，他会在星期六赶回来。

事件也会朝坏的方向发展——据一位权威人士称，拉法内利很快就与一个突

尼斯人有了关系。那人与她信奉同一宗教，而拉法内利自己则根本不承认自己曾做过墨索里尼的情妇。此时，墨索里尼在怀疑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恋爱是不是一种“病态的”关系。难道他没有时而在广场附近傻等她却见不到她吗：“你又让我变得像个男孩，一个很天真、很没有耐心的傻瓜。”当她宣布他们之间的关系结束时，他接受了，说这是“命运”，承诺要归还她的信件，并且带着夸张的悲伤委托她把他的信件付之一炬。1914年2月，她又给他写信了。他也说她的信纸的香味曾让他的内心充满了喜悦：“你知道，你的香水对我来说有一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它是那么有穿透力，那么美妙、奇异而有异国风味。你给了我一种在别处找不到的感觉：一个小时的安宁和休息。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与你的接触让我有与瓦格纳进行交流的感觉。”

争吵再次发生了。尽管她长于“精神游戏”，但是他担心她从来就没有理解他的本性：“我就是这样，我也要用一个面具来掩饰我的轻率。但是在这个面具下面，真实的我正在从你这里溜走，因为你并没有想阻止我。”他还准备去参加一个会议：“亲爱的莱达，你身上有种什么东西吸引着我，让我神魂颠倒，征服了我。”凌晨两点钟，他闻着她身上的香水味道，它的记忆让他在回家之前给她写下了最后一张便条。又是在凌晨两点钟，对她的思念又在他脑海中引起了一番哲学的斗争。他想做一个现代的男人，因此更加被她“非凡的品味、美丽的疯狂时刻、她的发现以及在‘阿拉伯主义’上的进展”所吸引。即使他有时并不真正理解她的意思，她独特的魅力也会让他高兴。他继续说：“但是，最重要的，我的全部身心都被你吸引了，因为你成功地让你的生活成为了一部令人喜欢的小说。”她的付出是值得尊敬的，也是诱人的。但她必须明白，他毕竟不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

墨索里尼开始用“B.”来签名了。而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开始了。莱达反对战争，她写文章反对它，而墨索里尼对此事则没有把握。他抱怨说，最主要的知识分子，如利维奥·恰尔迪和菲利波·科里多尼，都在巡回演讲鼓动意大利参战。战争“就像传染病一样，没有人能够幸免”。在革命挑战面前，无产阶级看上去“充耳不闻，困惑不解，漠然置之。”墨索里尼也面临着严峻的两难选择，而他在这一问题上做出的选择将摧毁他的波希米亚人的恋爱梦想、知识分子的梦想以及这种前卫的放荡生活。莱达也不再是他的了。

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促成了这段恋情呢？成熟之后，墨索里尼更喜欢宣称一个男人只有对他自己才真正感兴趣。然而，与拉法内利的交流是无法忘记的。毫无疑问，墨索里尼对她所说的大部分言辞都只是些陈词滥调，除了感觉是发自内心的以外，他的目的也就只剩下性的征服了。不管怎样，这些信件倒是真的反映了墨索里尼刚到米兰时的心态。墨索里尼是一个到大城市里来寻找出路的乡下人，他从来都不认为女人也有思想，现在却一半是希望，一半是担忧。这个社会党的主要人物简直是有些痛苦地在渴望他人承认他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这个浪漫

的愤世嫉俗的人，这个有些病态的处在恋爱中的人，他希望自己有一个广阔的恋爱和知识的世界，但实际上却与拉凯莱和埃达以及以后要出生的其他孩子们一起过着一种单调的生活，并且还要设法应付政治事务，这些都让他为之叹息。他的其他女人都没有像莱达·拉法内利一样使他既激动而又经受挫折。

在米兰生活会遇到很多问题。墨索里尼的个人收入不稳定，光是搬家到大城市就花了不少钱。为了支付路费、房租和购买家具，墨索里尼从弗利的一个朋友切萨雷·贝尔迪那儿借了100里拉，这笔债务直到1913年10月才还清。墨索里尼在1913年3月给切萨雷·贝尔迪写了一封很坦白的信，信中说：“我在这儿像狗一样地工作，并且生活在孤独之中。牧师、工团主义者以及其他的人，他们从所有的方面攻击我。”几个月之后，他又写信说：总而言之，他喜欢的激烈的争论让他成为了“意大利最招人恨的人”（这个词在他形容自己的词汇中还会出现）。

孤独、仇恨、鲁莽、强烈地追求平等但在现实中却被看做低人一等，这些都是墨索里尼生活中常有的事，但他却是一个认为自己生来就要注定当个领导的人。他在《前进报》干得很好——虽然他自己不承认，但他确实是一个现实的商人。通过一系列的解雇和熟练的结党联盟，到1913年3月时，他已经除去了报社内所有对他的总编辑职位构成竞争的人。同时，他还使《前进报》的发行量一翻再翻，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该报的发行量已经达到了10万份。他还改进了技术，从而降低了报社的赤字。他还准备草率地声明编辑报纸都是他一个人的工作。正如他对一个同事所说：“不管是就社会党还是就公众而言，我都对报纸负有唯一的、完全的责任。此外，我没有个人的偏爱和憎恶，并会根据报纸的需要提交所有的编辑素材。”墨索里尼毫不费力地担任着管理报纸的角色。他不知疲倦并且毫不留情，确实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记者之一”，并且在记者这个职业的“败事”方面比“成事”方面做得更好。所以，正如墨索里尼待在弗利时所能想象到的那样，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么他就可以担任这个职位，成为当地的一个贵族，在职业生涯上有所建树，并且能够像英国当时的洛兹·诺思克利夫和罗瑟米尔，以及鲁伯特·默多克和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一样赢得一个现代的“提出意见者”的名声。

但是，编辑报纸还是无法满足墨索里尼。他渴望表现自己更宽范围的知识。比如，编辑这份社会党的全国性报纸要求他对外交政策方面的一些问题进行评论，而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1914年以前的欧洲格局的形成上。墨索里尼善于辞令，不管是对利比亚战争的实际成本（墨索里尼认为这次战争是对金钱的“可笑的”浪费），军事工业的扩展，还是对巴尔干事端的细节，甚至对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计划等，他都能提出不容辩驳的观点。

类似地，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也在意大利几个相互竞争的社会主义派系中调整着自己的路线。例如，他一段时间是工团主义派系的朋友，一段时间又变成

了他们的敌人。他还就社会主义文化举行了一系列的公共讲座，在这些讲座上，他还试图表现他的公开和智力。许多不同的人物都在这些讲座上发表过演讲，如加埃塔诺·萨尔韦米尼和朱塞佩·普雷佐利尼。他最初的目的是向米兰的工人阶级介绍一些思想家，如柏拉图、坎帕内洛和巴贝夫等。随后，他还在罗维戈和佛罗伦萨举办了讲座，据称，这最后一次讲座的听众达3000多人。1913年至1914年间，墨索里尼还抽出时间推出了一本不仅针对大众，而且针对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的理论性刊物，并乐观地把它命名为《乌托邦》。虽然在刊头上宣称代表意大利的革命社会主义，但刊物却更加重视法国大革命的传统，刊物的第一期上就刊登了盖德*和布朗基的作品的译文。

在他所写的社论中，墨索里尼解释说，《乌托邦》不是由党创立的，而是为党创立的。他还解释说，他希望成为健康的宗派主义者。他认为，派系差别的根由是存在着一种“理念嫉妒”，“对待理念就像对待女人一样，你越爱她，她就会伤你越深。”同时，他还告诉阿尔切斯特·德安布里斯说：“我当然是一个宗派主义者。我的灵魂很狭隘，充满了宗派主义者的愤怒。它就是这样，我也不为之感到羞耻……不管是今天、明天还是永远。”但是，在《乌托邦》里，他却简直成了一个自由论者。他刊登工团主义者的文章，如塞尔焦·帕农齐奥和阿戈斯蒂诺·兰齐诺。他还刊登一些自由主义异见分子的文章，如马里奥·米西罗利以及他的朋友们的文章，如玛格丽塔·萨尔法蒂。此时的墨索里尼又成了一个教授，忙于应付各种不同的理念。在另外一篇社论里，墨索里尼还高兴地提到一个事实，那就是普雷佐利尼在他的刊物上曾提到过《乌托邦》。像往常一样，在提到一些文化上的资深人物时，墨索里尼又变得非常恭敬：“我在知识和道德上尊敬的一些人赞扬了我，虽然我们在政治上或意识形态的细节上有些分歧。”

实际上，《乌托邦》一直没有达到它的预期目标，它的内容并没有什么规律，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宗旨也被编辑个人的自我膨胀所扭曲。但是，有一点必须承认，那就是贝尼托·墨索里尼在这其中的确表现出许多天分。比如，他确是一个杰出的善于劝诱的演讲者。1913年，他第一次尝试进入议会，但是失败了。在那之后，他在弗利被当地的共和党人痛打了一顿。但是，谁会怀疑他将最终在国民大会里找到一个职位呢？当然，他还是不知疲倦地进行演说，主要的内容是对党忠诚。大多数时间，他都会宣扬革命，但这更多是出于热情而不是确信。例如，他于1914年3月在米兰演讲时就表现出了狭隘的眼界：

* 朱尔斯·盖德（1845~1922），法国记者和社会主义者，组织了法国劳工运动（1879年）中的一支马克思主义。

“我深信地方政府并坚决支持它，我讲得这么确切是因为我是一个社会主义革命者，因此我反对国家。市政当局是市民们能够用来抗击来自国家的不断入侵的最后一个堡垒。”

后来，一个与之过从甚密的朋友注意到墨索里尼到处演讲和参加聚会所带来的麻烦。虽然是下意识的，但墨索里尼总是预先在遣词造句上非常用心，并且也很注意对演讲内容和感情的控制。现在已无从得知这种做法是在什么时候成为他的习惯的，但也许可以推测，当他成为社会党党员时就开始学习这种技巧了。同时，他对演讲带来的掌声和赞誉也已经习惯了。他非常注意留心观察和尊重别人，特别是当他们有可能对他自己、他的形象及“感召力”产生影响的时候。1922年之后，已是管理者和独裁者的他坦白地承认，他从与他对话的人身上学到了许多语言、姿态和肢体语言。在与别人的交往中，在传递明确的意思的同时，他也希望自己能够传递更多暗含的意思。后来，他的追随者们声称，他对姿态和手势的运用是“无法模仿和无与伦比的”。还有一个在战争中致盲的法西斯宣传家宣称，他一听到领袖清晰的讲话就着了迷。根据他的敏锐的听力，墨索里尼“有不止一种声音，或者说他能以多种不同的音质和音调讲话”——他的声音可以从甜美亲密转变为尖锐有力——“从而再一次确认了他灵魂的多样性。”

在法西斯政权统治下，墨索里尼当然具有毋庸置疑的无限魅力。然而，即使当他任《前进报》的编辑时，这种超凡魅力就已经在形成的过程中了。“领袖”一词可能在那时就开始流行了，而在1914年3月份，这个词甚至被用在了平淡无奇的总理焦利蒂的身上（尽管这一用法带些讽刺的目的）。虽然如此，“领袖”一词开始用在墨索里尼身上还是很有意义的。无论墨索里尼有关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演讲的内容是什么以及多么有力，他给听众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的个性。1914年时，很多意大利人都在寻找一个“领导人”以打破随处可见的妥协、混乱和腐化。无疑，在可选的有限的一些人里，墨索里尼正在因为这一角色的潜在人选而为人所知。他的难以压抑的活力，他的无法磨灭的野心，他的敏捷的思维，他在任何不平等面前表现出的傲慢不屈，都在帮助他成为一个在政治上有价值的年轻人，特别是当新世界与大众有某种程度的联系的时候。

一年之后，意大利已经参加了战争，而墨索里尼也不再是一个社会党了。这时，来自普雷达皮奥省的一个老朋友托尔夸托·南尼在普雷佐利尼的请求下，为墨索里尼写了一本歌功颂德的传记，这是众多类似作品中的第一部。这部传记的表达不很连贯，也许比墨索里尼在演讲中常用的不连贯的表达更有甚之而无不及。在传记中，南尼描绘了一种“自然的力量”，称墨索里尼为“最卓越的行动者”，“使得意大利的无产阶级不再做沉默的羔羊”。如果南尼在传记里所说的以及处在他背后的普雷佐利尼和知识分子圈子都是可信的，那么人们此时已经认识到墨索里尼有做领袖的潜力。

事实上，南尼的作品出版时，它能否吸引众多的读者，或者会不会让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还都很难说。1915年，墨索里尼的迁升因为一些事件的出现而发生了偏转。另外，早在意大利参加“一战”之前很久，就有依据称墨索里尼在1912年至1913年间实现的那次闪光的胜利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的确，社会党于1914年4月在安科纳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就确立了革命派在党内的支配地位，从而强化了墨索里尼在《前进报》和在党内领导层中的个人地位。然而，还有一点在那时也逐渐变得明显了，那就是革命派在长期政策上表现得极端模糊。最基本的，他们连如何实施革命也不清楚，同时也不清楚革命需要哪些条件。

不久，在所谓的“红色周”里，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和暴乱，特别是在罗马涅地区。墨索里尼撰写社论预言性地鼓动人们采取更为猛烈的行动，在政府及其军队试图恢复秩序时骚扰他们。但群众的不满仍是自发的，这让墨索里尼和其他社会党领导人感到非常吃惊。而他们在准备上的不充分，以及在战略和战术上的更多严重的失败再也无法隐藏了。到1914年六七月间，有许多理由能够让人相信，更加温和的社会党人将在未来的几个月里恢复优势地位。

事实上，其他许多更为重要的事件将决定社会党内各派的命运。1914年6月28日，哈普斯堡皇室埃斯塔·弗朗西斯·斐迪南德大公及其妻子在萨拉热窝遇刺，他们的被刺身亡标志着欧洲结束了它的“美好时光”并开始陷入“一战”的泥沼。早在3年之前，罗马涅地区的工团主义者奥里韦蒂（复兴运动之前拉韦纳地区一个家庭的后代）就用当时非常典型的语言悲叹说，意大利社会“因渴望悲剧而正在死亡”。很快，意大利人和欧洲其他国家的人一样，迎来了足够大的悲剧，这个悲剧足以满足他们的任何渴望。

5 战争和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意大利政府和各个组织都陷入了极大的困境之中。当时，意大利是“三国联盟”的成员，另两个成员国德国和奥匈帝国都在极力地拉拢意大利参战。同样，协约国也在拉拢意大利。鉴于与英国和法国有着“传统的友谊”，意大利最终选择了中立，意大利政府于1914年8月3日宣布了中立声明。而真实的情况是，意大利的军事实力较弱，经济和工业的实力相对也比较弱，不参与战争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但是，自由党政府做出的这一决定却加深了国内的政治分裂，并削弱了自由党的社会基础。

意大利人之中支持中立的人占了明显的多数。这些人包括主要的政治家焦利蒂，国王，军队中的重要部门，共济会，大部分官僚，绝大多数社会党人，包括新教皇本尼迪克特十五世在内的许多天主教人士，农民主体以及几乎所有的意大利妇女。这些个人和组织在意大利是否参战、何时参战等问题上意见不一。即使是因其中立政策而被指责为怯懦的焦利蒂，也愿意等到战事的胜负情况比较明朗时再让意大利加入即将获胜的一方。但是，他当时并不想操之过急。大部分意大利平民的判断力不错，这在当时的欧洲是不寻常的，因此他们没有成为“短战幻想”的牺牲品，他们并不相信战争将在圣诞节前结束的预测。

然而，那些反对意大利过早参战的多数人最终却没能决定形势的发展。支持早日参战的有两个主要的集团。一是意大利政府自身。当时的政府是一个少数派政府，相比焦利蒂当政时更为保守。政府总理是南部的一个律师安东尼·萨兰德拉。这届政府非常短命，并且受到了托斯卡纳伦理学家悉尼·松尼诺的很多影响，后者于1914年11月之后还担任了外交部长。很长时间以来，松尼诺一直都在叫喊要在国内实行更为严厉的统治（并结束焦利蒂的妥协和混乱模糊的政策），同时在海外进行扩张。“一战”正好给萨兰德拉和松尼诺之类的人物带来了极好的机会。现在，他们可以挫败自由党，削弱焦利蒂在议会中长期保持的多数派地位，并且，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可以“参与历史”了。

另外还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虽然不是很喜欢意大利政府本身，但是

却支持早日参战。它是由那些知识分子组成的，特别是新生的一代人。他们的思想倾向于扩张，并且不愿接受协调。然而，他们又自认为将组成意大利未来的新新人类，没有他们，就没有一个健康、现代和繁荣的意大利。随着所谓的“中间时期”的慢慢过去，意大利与轴心国和协约国之间的条约变得不合时宜了，意大利的知识分子也开始明确地要求政府不要再犹豫。在这些知识分子中，墨索里尼当然是非常突出的一个。

伦佐·德费利切很早以前就认为，在“红色周”失败之后和七月危机开始之前，墨索里尼就已经预测到了未来。伦佐·德费利切写道：“只有墨索里尼明白，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始了，而社会主义不能再与时代的步伐不一致了。”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墨索里尼成了与国家政府保持接触的社会党人。一个历史学家也许很难相信，因为很明显，意大利是因数量占少数的一小部分人的操纵才参加了战争，或者说是被他们“说”进了战争。不管是哪种情况，都有证据表明，墨索里尼与其他绝大多数的同时代人一样，并没能够很快确认7月的危机将被引向何方。然而，作为一名好记者，他还是在事发一天之后报道了发生在萨拉热窝的刺杀事件。此外，这一重大事件也促使他认真地思考它的意义。他认为，弗朗西斯·斐迪南德的遇刺身亡表明，哈普斯堡皇室与“斯拉夫世界”之间的矛盾已经非常深了。巴尔干山脉正在被“民族仇恨的爆发”震碎。根据他过去在特伦蒂诺的经验，奥地利当局“既是可恨的，也确实被人们恨”。但是，墨索里尼并没有赞扬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者。他在一篇评论中预示性地总结说，刺杀奥地利大公是民族主义和中央权力之间的斗争中的一段“虽然痛苦但是又可以解释的插曲”。而对于饱受折磨的奥匈帝国来说，中央权力既是它的力量，也是它的祸根。

在之后一个月里，他没有再做任何评论，但是却非常担心希腊的冒险主义。其他记者往常也不是不清楚，巴尔干随时都可能“燃烧”。墨索里尼的注意力主要还集中在国内，试图就“红色周”写一篇积极的有倾向性的报道。在一篇对这些事件的回顾性评论中，他宣称“革命”在当地即将发生：“意大利需要一场革命，它也一定会有一场革命。”当奥地利把最后通牒送到塞尔维亚之后，他才又开始关注国际局势的发展。他认为，任何事情都将在“奥地利军事集团”的命令下才会发生。带着对哈普斯堡皇室更多的敌意，墨索里尼继续对它进行诅咒，他认为三国联盟可能秘密地签订了条约，并坚持意大利应当对任何冲突都保持严格中立的立场。意大利的无产阶级不能沾上一滴鲜血，因为这不只是自己的事。社会主义者在外交上的政策必须坚持“不为战争提供一个人、一分钱”。

在8月的第一个星期里，巴尔干的警报扩大成了整个欧洲的冲突，墨索里尼也从指责奥地利领导层转向指责德国皇室领导层。他悲叹说，德国对比利时的人侵可能会让“全欧洲”团结起来反抗“德国集团”。他还说，德国的行事方式前所未闻，是一种“强盗行为”，“对比利时的人侵赤裸裸地暴露了它的目的、企图和

灵魂。”“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和泛德国主义”有着可悲的历史。1870年以来，德国人扮演着一个“欧洲文明之路上埋伏着一个强盗”的角色。这些话虽然有些极端，但却反映出墨索里尼在当时的真实的感情反应，他反对轴心国，支持法国。不光是左派人士，他和其他许多意大利人一样，都有一个心理上的文化包袱，那就是要提防奥地利，因为意大利在复兴时期遭受了它的残暴统治。相反，法国这个“拉丁姐妹”却是值得尊重的，但这一称呼听起来却带着些嫉妒和敏感的感情。

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不能过多地根据墨索里尼的言辞来确定他的未来。直到8月底，他还在担心三国联盟条约会将意大利拖入参与战争的轴心国一方。* 当政府很明显是在戏弄另一方时，墨索里尼又多次写文章支持社会党“保持绝对中立”的路线。党的理论教条告诉他，战争只会对资产阶级有利：“无产阶级不能去参加侵略和征服的战争，因为战争结束后，他们只会像以前一样遭受贫穷和剥削。”但是，他的思想却没能与这一路线保持一致。他在报道中直率地说，德国占领布鲁塞尔是蛮横和残忍的。他确信，德国军队射杀了人质，并且使用了达姆弹**。加入协约国一方可能也有好的一面，他们需要意大利冲在前面吗？或者说意大利保持中立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也帮助他们？的里雅斯特从民族上来说是意大利人，但这个城市却被斯拉夫人所包围。对于它的未来，最公平的解决办法可能就是把它国际化。墨索里尼的想法好像总是很宽泛，而新的冲突只会强化这一趋势。但是，在这些散乱的言辞之下，他开始感觉到这场战争同时可能会带来机会，一个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机会。

头脑中有了这些怪异的想法之后，到1914年9月的时候，虽然仍旧相信社会党支持中立是坚持原则的做法，但墨索里尼对当局的中立路线的支持已经开始减退了。逐渐地，他开始对协约国的事业直率地表示出同情了。他也开始注意到，许多主要的知识分子也已经开始支持意大利参战以抗击轴心国，而他们中很少有人持有“左翼”的政治观点。普雷佐利尼和他的《声音》、“南方主义者”、极端的民主党人及历史学家加埃塔诺·萨尔韦米尼和他的《联合报》，类似德安布里斯和科里多尼的工团主义者，*** 他的老编辑凯撒·巴蒂斯蒂等，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表示支持意大利参加战争。意大利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也把这次战争描绘成一个机会，希望能够趁机结束腐败和因循守旧的焦利蒂时代，给人民一个更加幸福的

* 直到9月19日，他还表达了对这一可能性的担心。

——作者注

** 达姆弹，又称柔头弹，是一种杀伤力很强的子弹。

——译者注

*** 但是，工团主义运动的大部分人仍然坚持反对战争的态度。

——作者注

未来（同时他们的天才能够得到更好的承认）。墨索里尼教授怎么能够不被他们的事业所吸引呢？

于是，他开始逐渐地从正统的社会主义理念中退却了。9月13日，墨索里尼解释说，他决定在《前进报》上刊登一篇由塞尔焦·帕农齐奥写的文章。他说，毕竟，“让那些支持意大利参战的人保持沉默是可笑的，也有些狭隘”（尽管墨索里尼之后又对帕农齐奥的观点进行了评论以证明它们是错误的）。9月30日，他就意大利无产阶级的感情偏爱发表了一篇社论，称意大利的无产阶级像自己一样，在协约国的问题上有些摇摆，但他又生气地否认说，这种感情绝对不会把工人阶级转变成“战争贩子”。就在5天前，他还给阿莫德奥·博尔迪加写了一封私人信件。此人是那不勒斯的一个工程师及知识分子，后来成为意大利共产党的领袖。在这封信中，墨索里尼说他感觉中立和改良组成了一个卑鄙和罪恶的同盟。他担心，在重大事件面前固执己见可能是典型的“逃避历史”。毕竟，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精髓在于“历史的火车头”这一概念，也就是要相信社会是发展运动的，而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手应该能够正确地看清社会发展的过程和时间表。当然，在墨索里尼看来，中立的被动和参战的主动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到了破裂的关头。

于是，10月18日，他在《前进报》上发表了一篇至关重要的文章，题目是《从绝对中立到积极中立》。墨索里尼本来就并不太稳定的耐心此时已经完全丧失了。社会党当时的政策是“安逸舒适的”，因为它是那么“消极”。墨索里尼用保持了自己个性的语言写道：“但是一个政党，如果它想留名青史，或者在情况允许时去创造历史，它就不能让自己被源于无法争辩的教条或者永恒的规则的政策所束缚，并超越时空地把自己与变化所带来的铁的必然性分隔开来，否则，那简直就是自杀。”事实上，意大利保持中立对协约国已经是很有利的了，而这一政策正在被“对奥地利和德国的深深的敌意”继续培育着。同样，在欧洲其他国家都已参加战争的时候，意大利再袖手旁观明显是荒谬可笑的。法国、比利时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都已经承认了“民族问题”的意义，意大利人怎么能不这样做呢？

墨索里尼最终从马克思那里找到了比较近似的可以引用的话。他记得这位社会主义之父曾留下过这样一句话：“不管谁为未来设计了一套程序，那都是革命性的。”于是，他总结说，绝对中立从定义上来讲是“向后看”和“停滞不前”。“我们生活在世界历史中最为悲惨的一刻，这也可以说是我们的特权。作为男人和社会主义者，我们愿意成为面对这场伟大的戏剧而只充当懒惰观众的人吗？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愿意以某种方式去扮演这场戏中的主角吗？”他最后总结说，如果为了顾及党的表现形式而毁灭它的精神，那将是一场灾难。

这篇社论引起了轰动，至少在社会党内部以及他们的朋友中是这样。但墨索里尼阐明的这番道理绝不是他一个人的观点，其他许多社会党人也有类似的看法，特别是那些自认为是知识分子的人。甚至连安东尼奥·葛兰西这样后来被法西斯

杀害的烈士也都被这些看法吸引了。像朱塞佩·普雷佐利尼这样虽不是社会党人但却受到墨索里尼尊敬的人，很快就这篇社论向墨索里尼这位《声音》以前的订户表示祝贺。同样，这篇社论也在社会党内引起了争论。10月19日，社会党高层在博洛尼亚召开了会议。在会上，墨索里尼强调他的新观点是有原理可依的，并且重申党内对他的攻击是“简单而荒谬可笑的”，随后，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无论如何，他的分裂活动太过公开了，于是，他辞去了《前进报》编辑一职。

官僚程序总是行动缓慢，直到一个月之后，墨索里尼才被正式开除出了社会党。他最后为自己辩护的言辞也非常有戏剧性：“你们今天恨我是因为你们仍然爱我……不管发生什么，你们都不愿意失去我。12年的党龄应该并且已经能够确保我的社会主义信仰了。社会主义就在我的血液中流淌。”他宣称自己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敌人。当时间证明他对战争的看法是正确的时候，他预言说：“你们将再一次看到我和你们在一起。”

当然，墨索里尼并不是唯一一个离开社会党的异见分子，特别是在第一世界大战期间。在许多国家，极大的矛盾要求社会主义者必须在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理念和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理念之间做出选择。不止是墨索里尼这一个背叛者——或者用当时人们对他们的常用称呼“老鼠”——发现争吵在当时是有意义的，而分歧最终还是有可能修补的。但实际上，他们的社会主义生涯却因此而结束了。由于社会党的不安全性和软弱性，他们喜欢发泄愤恨。他们用“老鼠”来称呼贪污者，用“犹太”来称呼被众多有钱有势的社会主义的敌人所收买的人。此外，主张参战的媒体欢迎墨索里尼转变成为爱国主义者，而一些大的资产阶级的报纸，如《晚邮报》和《时代报》，也报道了这一事件，并希望能够采访这个最新的爱国者。于是，一句诅咒性的话开始在社会党的忠实党员中广泛地散播：谁是他的主子？

墨索里尼认为有必要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11月10日，他接受了博洛尼亚一家名为《零钱报》的报纸的采访，这家报纸的所有者是以菲利波·纳尔迪为首的糖业利益集团。采访中，他宣布了一个新的决定。他用一贯的好战方式声明，他还没有准备退休去过“自己的私人生活”。相反，在弗兰科菲利·奇普里亚尼和其他左倾主战者的支持下，他正在准备为了他们的事业而创办一份新报纸。这份报纸被命名为《意大利人民报》，一个带有更多的马志尼色彩而不是马克思色彩的名称。在第一期报纸的报头上印有两句口号性的格言，一句是布朗基所说的：“谁有铁，谁就有面包。”另一句是拿破仑所说的：“革命是一种理想，但需要有刺刀来支持。”后来，从1922年10月起，《意大利人民报》就成了法西斯政权的正式机关报。

尽管对有些证据还存在着争议，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到10月份的时候，墨索里尼已经在玩两面派的手法了。当时他已经与纳尔迪直接接触了。纳尔迪是代表并鼓吹当地地主利益的一个臭名昭著的人，他当时正与政府的最高层接触，

包括出身贵族的外交部长安东尼奥·圣朱利亚诺。纳尔迪因其交际广泛而出名，当时人们对他浮华奢侈的生活方式都议论纷纷。他的报纸也是一段时间因负债累累而濒临倒闭，突然之间好像又非常红火。在红火的时候，纳尔迪用于庆祝而喷洒的香槟“能流成一条河”。墨索里尼与纳尔迪之间的这笔交易的结果是，纳尔迪保证向墨索里尼的新报纸提供资金，并且还保证对所有的资金来源保密，正如墨索里尼自己所说：这才是“我可以接受的钱”。两个人在米兰的一个饭店里安排见了面，一个旁观者对墨索里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说他“脸色苍白，但是乌黑的眼睛闪闪发光，就像瓷器娃娃的眼睛一样”。

后来，纳尔迪还和墨索里尼一起到瑞士去寻求从法国特务机构那里得到资金。在旅途中，他们之间也保持着明显的阶级差别。圆滑的纳尔迪像往常一样住在最好的旅馆里，相反，墨索里尼则和另一个做记者的熟人马里奥·吉拉尔东在稍差一些的旅馆里同住一个房间。最后，纳尔迪还是非常慷慨地带着他们俩出去喝酒、吃饭和跳舞，当然，还有嫖娼和一些金钱交易。在这期间，吉拉尔东曾试图与墨索里尼讨论索雷尔的观点，但却没有什么结果。他得出结论说，“墨索里尼好像不愿意在复杂的理论教条上纠缠不清。当他喜欢一个理论时，他就全盘把它接收下来，然后便试图去向公众卖弄。”回到旅馆时，他注意到墨索里尼的内衣已经破损，袖口也磨破了。他在刮脸的时候总是匆匆忙忙，而且非常草率，有时还会不小心把脸刮破。由于同住一屋，吉拉尔东还发现墨索里尼长着—双大脚。

怎样才能弄明白这个复杂的行贿受贿的故事呢？以前，墨索里尼看起来并不是那么贪婪，尽管他也是从任何可能的渠道四处借债，然后，只要他觉得对自己有好处，或者如果自己高兴，他就会把这些钱一股脑儿地花个精光。即使在后来当政的时候，他虽然不像法西斯官方的宣传中讲得那么无私，但也不像后来成为西班牙独裁者的佛朗哥*以及许多法西斯政治家——不管是意大利国内的，还是其他国家的——那么腐化。在接受这些秘密资金时，墨索里尼在毫无顾忌地违背着他以前一贯坚持的社会主义运动章程。这些秘密资金包括来自法国大使馆的补贴，而在1917年之后，英国人也开始为他提供资金。**此时，他已经无视莱达·拉法内利和其他许多同志对他的怒骂了。那些人痛骂他已被老板们的金钱玷污，而

*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1892~1975），西班牙军人和政治领袖，领导民族主义政府在反对西班牙内战中（1936~1939年）击退共和党员的武装力量。他在1939~1975年期间以独裁者姿态统治西班牙一直到死，之后波旁皇室君主政体复位。

——译者注

** 令人感到滑稽的是，当时在罗马负责此事的可能是塞缪尔·霍尔阁下，他当时为英国的特务机关工作，后来在埃塞俄比亚战争开始时担任负责外交的国务大臣，“二战”期间任英国驻西班牙佛朗哥政府大使。

——作者注

他却因此而更加确信，不管自己以前有过什么样的革命宣言，但此时他已经永远都无法回头了。如果社会主义信仰未能在他身上实现的话，他也许还可以去做“墨索里尼教授”，即做一个有自己的头脑的自由职业的知识分子。并且，他想当然地确信，会有其他人愿意出钱出版他的作品。

如果这就是1914年末墨索里尼的处境的话，那么这个处境也是极不稳定的。更大、更有实力的人物并不是特别地需要他，仔细研究当时的殖民地部长费迪南多·马丁尼的日记的内容就可以发现这一事实。费迪南多·马丁尼是一个托斯卡纳的自由党人，当时任厄里特里亚的总督（在那里，他喜欢对当地人进行清洗），后来还试图为普契尼*写抒情诗，但没有成功。费迪南多·马丁尼可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早在1914年10月10日，他就很有可能是从与纳尔迪的谈话中注意到，墨索里尼虽然不愿意公开支持参战，但已经声明：“如果证明战争是必要的，那么社会党也会尽到他们的责任。”就在圣诞节前夕，马丁尼又与当时正处在烦恼之中的纳尔迪见了一面。纳尔迪对费迪南多·马丁尼解释说，他已经给了墨索里尼钱，并且知道这位《前进报》的前任编辑将会使整个北方的左翼人士都改变立场，转而支持爱国主义。但是纳尔迪又抱怨说，他实在是无力独自承担这一任务所需的沉重的财务负担。并且，他已把此事告知了来自博洛尼亚的一名律师，而这位律师也已经见过了议会中来自当地的议员路易吉·费拉。这位议员承诺将向维托里奥·伊曼纽尔·奥兰多部长提出此事，而这位部长也将会告知萨兰德拉总理来处理这件事。但这条赞助链不知道在哪个环节上断开了。纳尔迪急需2.5万里拉，因此才来请求费迪南多·马丁尼帮忙。墨索里尼对他的资助当然非常感激，更加卖力地鼓吹他的事业。然而，另外一点也同样明显，那就是这条资助链非常复杂，而他只是远远地站在最末端，意大利所有与他同时代的人都明白其中的规矩。墨索里尼当时的地位离一个潜在的国家领导人的地位还差得很远。

在纳尔迪提出请求之后，费迪南多·马丁尼开始持续地关注墨索里尼了。1916年的时候，他正在寻求让意大利的势力进入亚得里亚海，他认为墨索里尼有些过分热衷于领土吞并，甚至有些“发狂”。他回忆说，墨索里尼当时的作用还仅限于国内。卡洛·斯福尔扎是另外一个意大利精英分子，1922年后，他拒绝接受法西斯主义。他认为墨索里尼的关键特点在于，他是一个“善于自学的人，并且总是有点自命不凡。”从他的评论以及马丁尼的态度可以看出，墨索里尼在背离社会主义运动之后的处境，就好像是在还没有准备好怎么航海就把自己扔到了海上一样。虽然社会党内部到处都有激烈的派系纷争，但社会主义能够给它的信奉者一种价

* 贾科莫·普契尼（1858~1924），意大利歌剧作家，其作品包括《波希米亚》（1896年）和《蝴蝶夫人》（1904年）等。

值上的安慰，一种归属感，在世界上有一定的位置，也给了他们一条通往未来的路和一个保持乐观的理由。当类似费迪南多·马丁尼和卡洛·斯福尔扎这样的人与墨索里尼这样的人之间的社会差别实际上已是如此之大的时候，社会主义的这些优势对人们就更加具有安慰作用了。一位同时代的人记得，当墨索里尼去参加1914年10月至11月间的关键会议的时候，他面色灰白，气得浑身发抖。他有理由激动。墨索里尼选择参战实际上是跨出了危险的一步，这一步看来在1914年底是无法给他带来高兴和平静了，并且也让他在此后失去了希望，并在对待人生价值这个问题上代之以一种更为玩世不恭和愤世嫉俗的态度。对于那些跟随他改变立场并为《意大利人民报》的前几期撰写文章的左翼人士，如山德罗·朱利亚尼、乌戈·马尔凯蒂、亚历山德罗·基亚沃利尼、尼古拉·帮瑟维奇、奥塔维奥·迪纳莱、玛格丽塔·萨尔法蒂和曼利奥·莫尔加尼，他都从来没有从内心里抛弃他们。但是，也许他们之间更多地是在培育一种“友谊”关系，而不像已经失落的更为积极的“同志”关系了。然而，墨索里尼对一些最为亲密的跟随者也更为频繁地表现出一种蔑视，因为他绝望地发现，他们中许多人也同样是“老鼠”。

那么《意大利人民报》要追求一条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呢？11月15日，墨索里尼宣称，“现在是一个全面拍卖理念的时代”，欧洲社会主义的命运与这场战争的结果息息相关。而那些反对他的人，因为知识上的无知，其实是站在那里等死。于是，他向“意大利的年轻人、年轻的工厂和学校、年龄上年轻和精神上年轻的人们、这一代人中被命运安排来创造历史的年轻人”呼吁，他们提出一个既可怕又迷人的字，那就是“战”。在第二篇社论中，他努力更加详细地解释说，战争尽快结束是符合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的。这就是墨索里尼的“短途幻想”。否则，相互的仇恨就会过深地在社会中扎根。德国必须被打败，而俄罗斯对协约国一方的影响也必须被消除。需要采取行动，并且就在现在。“让无产阶级非国家化是错误的，让他们丧失人性是一种犯罪”，而这实际上正是绝对中立政策给出的建议。

这份报纸虽小，但墨索里尼仍拿出大量的栏目用来就某些问题进行个人争论。他与那些把他开除出党的人激烈地争论，他坚决地说，他们已经开始战斗了。而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都是一个优秀的战士。正如他对一个来自奥内利亚的旧友所说的那样，就个人来说，他正在从一句格言里寻找安慰和力量：“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他的敌人已经“在他的背上刺了一刀”，他们是“最怯懦的懦夫”，比“暴民”强不到哪儿去。就他而言，那些来自弗利的以前的同志们更应该被批评。他们是“歇斯底里的”和“吃人肉的野蛮人”，他们试图阻止他说话，但是他们注定将要失败，因为不管怎样：“我还是原来的我……一个为了所有自由和社会公正事业而战斗的顽强和无私的战士。”他早晚要打败那些可怜的对手。在接受一份保守主义日报《意大利报》的采访时，他耸人听闻地问了一个可能会把读者惊呆了的问题：“只要我手中还有一支笔，口袋里还有一支手枪，还有什么人会让我害怕

呢？”实际上，这并不是一句带有修辞色彩的话，在墨索里尼当时急切想进入的知识和政治世界里，决斗仍然是一种为人所接受的解决问题的方式。1898年，安德烈亚·科斯塔就曾与共和党人费利切·卡瓦洛蒂决斗过，并在第33次“为荣誉而战”中死去。虽然《意大利人民报》竭力谴责发生在德国大学里的“令人讨厌的”德国式的决斗，但墨索里尼自己恰恰有着这种容易进行地中海式的决斗游戏的暴躁脾气，而他被逐出社会党更是让他义无反顾地进行决斗。1915年2月，他与利诺·梅利诺进行了3轮决斗。3月，他居然坚持与以前在《前进报》时的前辈克劳迪奥·特雷韦斯进行了8轮决斗。在剑术决斗中，墨索里尼有一次被刺伤，而特雷维斯则3次负伤。据说特雷韦斯的精力非凡地旺盛，而在他们的决斗结束时，双方并没有像绅士一样地“和解”。同时代的人还注意到，在1914年10月之后，墨索里尼的心情轻松了些，他不再到以往去的地方吃饭了，而是到高档一些的地方去吃。此外，他还开始纵容自己有了骑马这样奢侈的嗜好，并且最终发展到了驾驶汽车。

墨索里尼这么做并不是为了效仿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是想为自己的事业在自己身边聚集一批人。一个新的同盟是迪诺·格兰迪，他是一个学法律的学生，也曾做过记者。1914年12月初，墨索里尼已经在鼓吹建立一个所谓的“法西斯战斗的革命者”的革命组织了。1915年1月6日，《意大利人民报》公布了这个组织的组成人员的草案。墨索里尼用一种典型的表达方式强调说，这个组织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个“所有学校里的危险分子和持不同政治观点的人组成的自由协会”，它还带有一些共和的性质。这个革命组织的书记——他们自己是这么称呼的，是卡拉布莱恩·米凯莱·比安基（他后来也成为法西斯党的一个书记）。墨索里尼的工团主义的联系人阿尔切斯特·德安布里斯是这个革命组织的另外一个高层领导，10年之后，他成为另一个早期著名的法西斯。

墨索里尼解释说，“法西斯战斗的革命者”的目的是告诉“工人阶级”，只有参战才能制造“社会革命”，因为这样才能把意大利与“上百个革命者的摇篮”——法国、“自由的”英国以及“宽宏大量而又英勇的”比利时捆在一起。墨索里尼还提到了他所谓的“法西斯运动”，解释说这一运动能够有助于在国际范围内传播“颠覆、革命和反宪政的理念”，因为它不受“一个政党的章程和僵化的理论”的束缚。

但是，这种言辞上的锐气并没有能够改变很多人的立场，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墨索里尼遇到的问题更多了。在有关意大利是否应该参战这一问题上，不管是在政治界还是在知识界，《意大利人民报》都找不到属于自己的空间。报纸的读者也被告知它的资金正在减少。3月15日，墨索里尼坦承地告诉普雷佐利尼，报纸最多只有1600个订户，而且大部分还是按月而不是按年订阅的。报纸一直在详细地阐述参战如何能够把“意大利人民”带入历史的进程中，墨索里尼此时也在不停地重复普雷佐利尼那有价值的说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打赢一场战争就相

当于通过了一次考试。但是“人民”好像不为所动，而绝大多数平民也像议会的大多数议员一样，继续支持中立而不是其他的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墨索里尼面对明显正在衰退的参战热情，他的个人性格促使自己对此暴怒不已。1915年，在所谓的“五月的灿烂日子”之前，一度有迹象表明焦利蒂有可能再一次回到政府执政，这激起了民族主义者的情绪，他们在罗马和其他城市进行动员来反对这件“可怕的事情”。墨索里尼的言辞非常地极端，他在报纸上敦促：“开枪，我说朝那十几个为首的人的后背开枪。”他又补充说：“议会是传染疾病的脓包，它会毒化国家的血液，必须把它清除掉。”如果君主不支持参战，它也会“遭报应的”。而普雷佐利尼也依然没有反对这种知识分子口头上的野蛮，他也建议，对付焦利蒂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朝他的胸口连射5发子弹”。他还敦促说：“在意大利人民的第一次伟大的战争中，国家必须采取‘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政策。”德国人的目标是让意大利人“灭亡”。但是，“对于一场旨在让我们灭亡的战争，我们也必须报之以一场让他们灭亡的战争。”

不管墨索里尼的民族主义在1914年10月前具有什么样的特点，他现在发现，想从嘴里说出民族主义者的话来好像非常容易。在瑞士的德国人统治了瑞士，但他们在内心中还是“普鲁士人”，意大利人必须记住这一事实。所有的外国人都喜欢傲慢地把意大利人看做是“游荡的音乐家，卖小雕像的小贩，卡拉布里亚的海盗。”必须让这些人在“一个新的、伟大的意大利”面前俯首鞠躬。墨索里尼对来自社会党人的攻击仍然非常敏感，他们指责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帝国主义分子，对此，他仍旧是矢口否认。他现在崇拜的英雄是伟大的民族统一者朱森珀·加里波第*，他在《意大利人民报》上简称之为“领袖”。虽然墨索里尼没有找到意大利获取提契诺、科西嘉和马耳他的理由，但他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只是伪善地宣称：“像所有的原则一样，国籍的原则不能以‘绝对的判断’来加以理解 and 实践”。在达尔马提亚，他想阻止类似扎拉、斯帕拉托和拉古萨这样的“真正的意大利中心”被“斯拉夫”化，但在这一问题上，他也希望能够与塞尔维亚人达成一些妥协。特伦蒂诺和的里雅斯特则不同，因为它们从“地理上、历史上和精神上”来说都是意大利的。

毫无疑问，此时的墨索里尼对自己的事业已经非常地坚信，不管它现在看来还是多么的不确定。虽然他现在只好听天由命了，但他仍然宣称自己站在革命的一边。1915年5月24日，意大利最终对奥匈帝国宣战，墨索里尼在他的报纸上为他自己，也是为所有意大利人写道：“意大利有自己的历史性人格，并且这一性格

* 朱森珀·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将军和民族主义者，曾率领1000名自愿者占领西西里和那不勒斯（1860年）。他的征服导致了意大利王国的成立（1861年）。

现在是鲜活的，它有自己的躯体和不可朽的精神。”墨索里尼当时不可能已经参加反动的“民族主义者联盟”，但他当时正在鼓吹的信仰无论还有多少社会革命的残余思想，都已经与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和唯物主义离着十万八千里了。

1915年5月底以前，意大利已经加入了战争，这是一场非常特殊的战争，因为萨兰德拉—松尼诺政府试图打一场有限的战争，他们只想与奥地利一国开战，直到1916年8月才被迫对德国宣战。*其他国家都无法理解意大利的怪异想法，他们都倾向于要么让意大利放弃战争，要么要求他们也打得像西线战场那么好。1917年10月至11月间（大约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同时），意大利军队在卡波雷托一战中大败，被奥德联军赶到北部平原上（这个平原一直延伸到米兰）。但意大利人称，从军事上来讲，他们的战争大部分都是山地战争。**就在那年的10月23日至26日之间，轴心国的军队俘虏了大约30万名意大利士兵。最后，意大利军队在协约国盟军的支援下才守住了威尼斯以东皮亚韦河的防线。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又逐渐把轴心国的军队逼退，直至最后在维托里奥威尼托取得“胜利”（对此还有争议）。1918年11月4日，在西线战事结束前一周，奥地利军队投降了。

截至那时，已经有500多万意大利人被征召入伍，这个数字等于1913年参加全国选举的人数。整个战争期间，意大利人的死亡总数超过了50万，另外还有差不多同样多的人伤残。像过去一样，在战争中最惨的还是那些农民的子女。在1915年以前，农民这个阶级是最不愿认同意大利这个国家的。1919年，约有63%的战争孤儿来自农民家庭。在确保他们不上前线去参加战斗的前提下，就连萨兰德拉教授也率先垂范把自己的3个儿子送进了军队。

像其他参战国一样，意大利战争对后方的需求也非常大。1919年，一个士兵评论说，在战争期间，“实际上意大利是没有人管理的”。并且很明显，意大利也没有一个能与兴登堡、克里蒙梭或者劳埃德·乔治相提并论的人物脱颖而出。没有一个将军或者一个政治家来统治这个国家，国家权力仍然分散在多个政治、军事、工业、地主、共济会及官僚中的精英的手中。另外，战争需求对意大利社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从1915年到1918年，在意大利参战的这3年多时间里，中央政府的支出总额比复兴运动以来正常情况下50年的支出还要多。在战争期间，官僚力量大大增强了，工业利润也极大地增加，并且与国家的关系也更为密切，同时，工人阶级的规模也大大增加了。工人们很少被征召入伍，因为没有人能够取

* 1915年10月，意大利的确正式参加了对抗土耳其的战争。

——作者注

** 1916年，意大利声称阿尔卑斯山区的战事与众不同，因此被法国军队嘲笑。这也证实其他国家确实对意大利军队的拙劣的战斗力抱有歧视的态度。

——作者注

代他们在工厂里的生产技术。所以，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对战争的体验存在着极大的差别。

1918年11月，意大利从它的军事冒险中逐渐浮出，胜利已经依稀可见了。在之后举行的凡尔赛和会上，意大利外交部长松尼诺对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新民主”的理想主义和其中的伪善非常地不适应。与以前一样，其他参战国对意大利的地位的看法并没有改变，仍然把它作为几个大国中最弱的一个来看待。此外，意大利社会当时也已被战争搅得混乱不堪。1919年，寻求一种途径以便把民众维系在国家体系内的需要比1914年时更为迫切。而过去一年里发生的冲突事件使政治和社会方面的鸿沟表现得更为明显了。从1915年到卡波雷托战败期间，意大利原政府倒台了，一些反动残忍的信奉君主制主义的将军们还在寻求让战争带上些传统的特点。正如萨兰德拉用他那一贯生硬的表达所说的那样：他的意大利正在为“神圣的自我主义”而战，这意味着他将维护和扩大现有的统治精英阶层的利益。在1917年10月以前，这些精英们很少去向大众解释当时发生的一些事件，并证明这些事件的正当性。意大利与其他所有的参战国都不一样，在1915年4至5月份之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意大利人至少是消极地反对参加战争的。

而在参战之后，打一场现代战争的要求反而让社会的矛盾缩小了。士兵和他们的家人以及那些新生的社会阶层都因为战争而在经济上受了益，并且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因此开始支持国家的一些举措。1915年5月，原本在议会中占多数的焦利蒂集团缩小了，代表着更为保守的自由党派别。可怜的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尽管身材矮小并且态度朴实可亲，仍然被人称做“国王士兵”，不过他自己对这个称号也已经习惯了。但是，鼓动参战并宣扬所有的意大利人都属于这个国家的真正的行动，则是发生在战争结束前的最后12个月里。此时，罗伯托·法里纳奇加入了墨索里尼的事业，担任《意大利人民报》驻克雷莫纳市的记者。他曾是一个社会党改良派，之后又主张参战并应征入伍。后来，因为他是一个技术熟练的铁路工人，又被从前线召了回来。他确信，卡波雷托惨败是“一个旧的意大利和一个新的意大利”之间的转折点。正如他所说，在战争结尾时，意大利的民族化进程仍是方兴未艾，而在其他参战国，这一进程已经失去了活力。但同时，民族化宣传的效果却还是十分有限，并不是所有的意大利人都准备认同自己是意大利人。1919年，意大利国内就这场战争的意义和它对未来的影响展开了一场争论。墨索里尼自己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军事的，另一部分是政治的。虽然不是自愿的，*但他还是应征入伍了。1915年9月2日，他

* 他确实于1915年7月给一位政府部长写了一封信，抱怨征兵名单上没有他的名字，并威胁说如果不尽快征召他入伍，他将自愿到法国去参军。

在为他的报纸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庆祝自己被征入伍了，并把报纸委托给曼利奥·莫尔加尼管理。墨索里尼当兵的经历是他日后发展成为法西斯领袖的一个重要的必不可少的部分，也许是最本质的部分。正如一个擅长吹牛的宣传家所说，新的法西斯国家的每一个“军团士兵”都是纪律严明而又热情浪漫的，因为当了兵之后，他的个性就会与伟大的“军团领袖”墨索里尼的个性融合在一起，而领袖的精神是无处不在的，并且领袖会成为每个士兵的“创造者、鼓舞者和永远正确可靠的向导”。

这些夸张的言辞的主要来源是墨索里尼的战争日记。1923年，法西斯党官方的出版社自豪地出版了这本日记，并且让意大利的学生和法西斯的忠实信徒们恭敬地阅读。这本日记最初是于1915年至1917年间在《意大利人民报》上连载的，其中有很多内容都是编造的，如果不参考后来为墨索里尼虚构的故事（在当时还没有达到极致），是很难读懂它的。不管怎样，这本日记的确包含一些有意义的内容，不管它是不是蓄意编造的。墨索里尼加入了著名的伯萨利尼联队，他认为，作为一名士兵，应该用简洁而精确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非常高兴能到前线服役：“现在是战时，所以你要去战斗。战壕里的生活是自然而简单的，有时甚至是单调的。对于意大利的士兵来说，雨水和跳蚤是首要的敌人，然后才是敌军的枪弹。”

他解释说，战争是“灰色的”，是由“服从、忍耐和坚韧”组成的，所有真正的士兵都会把它作为一项“不能讨论的任务”来接受。战时的政治是简单的。他说他在军队里从未听人说起过中立或者参战之类的话。来自偏远村庄的农民士兵很可能理解不了这么难而生僻的词。他认为那些从国外回来的移民士兵，特别是从美国回来的，是最好的士兵（虽然他还弄不清楚是否是因为在国外经历了民族化或/和民主化才让这些士兵产生了回国的动力并为国献身）。墨索里尼注意到，相比之下，那些伊索恩佐前线附近的村民对战争的态度仍是神秘莫测，“那些斯拉夫人仍然不喜欢我们”。对于卡波雷托这个地方，他则不屑地称之为“一个肮脏的斯洛文尼亚小镇”。

技术和效率是好东西，但骡子仍是意大利军队最有用的助手。在高山前线上（他的岗位曾经一度在将近2000米的高山上），士兵们的作战地点有80%都是山坡，他们要用绳子串在一起才能行动。他有时甚至对这种情景及其吸引力所代表的哲学意义非常地崇敬。

至于其他的在战时日记中常常抨击的有关等级和阶级差别的事，墨索里尼则相对较少提及。在服役早期，他确实报怨过，因为一个上校不知道如何去鼓舞部队，而总是对他们喋喋不休，好像他们不是成年人，而是学校的学生一样。他还记得前线的士兵曾怀疑，通过与士兵拉帮结派的方法，那些最好的给养在发给他们之前已被苛扣掉了一部分。在日记中，他还写他一有机会到附近商店里去时，

就会利用他胆大而熟练的技巧顺手牵羊地为战壕里的伙伴们偷些巧克力和沙丁鱼。这让从报纸上读到他的日记的读者为他欢呼不已。与以前对待民间和知识分子圈子里的阶级和社会地位上的差别的态度有所不同，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对军队中不同级别间的差别并不是很挑剔，而是乐意去适应它们。有时他也很爱慕虚荣，当别人尊敬地称他为“主张参战的记者贝尼托·墨索里尼”时，他就会非常得意。然而，当他所在的联队的士兵从各个地方零散地聚集到一起的时候，他才注意到，他是联队中唯一还愿意读报纸的士兵。对于他的战友来说，对付大雪和严寒才是最要紧的事。

有时候，他也会表现得对人非常恭敬，这是他很少表现出来的一种态度。1917年3月，在后方的一次训练中，一颗手榴弹提前爆炸，他被弹片击中而负了伤。后来一位知名的传记作家在写到此事时声称，一块弹片直冲墨索里尼的心口飞来，最后被他怀里揣的一本书挡了下来。而他的报纸也声称，他负伤后曾经忍受了40.2度的高烧。当时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正在视察一家军事医院，墨索里尼因为负伤住院而受到了国王的接见。他们俩互相说了些陈腐的套话，但这几句对话却在法西斯当政期间被不停地回放以显示其庄重和重要意义：

你怎么样，墨索里尼？

不是太好，陛下。

好样的，墨索里尼！你现在不能动弹，还有伤痛，但你必须坚持下来。

谢谢您，陛下。

总的来说，在墨索里尼成为独裁者之后，他的战争日记才有了更大的意义。当然，墨索里尼当兵时是一个爱国者。当他经过特伦蒂诺边境的时候，他确实动了感情，因为他就是在这个地方被奥地利当局随意捆绑起来的。有时他也会高兴地想，战争其实就是一个熔炉，它能够熔炼地区主义并最终铸造出一个真正统一的意大利来。同时，战争经历也让他更加确认自己的唯意志论，更加确信意志对于成功的作用：“谁希望赢得战争，谁就能赢得战争。谁能够调动和利用更大的精神能量和决心，谁就能够赢得战争。”毫无疑问，这种态度与他战前所信仰的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是格格不入的。但是，这种与众不同的信条并没有在“一战”的众多前线上起到什么作用：再怎么说明，墨索里尼毕竟只是一个与其他士兵没什么两样的下士而已。

心高气傲的墨索里尼过去一直在避免陷入一般人的生活，但他还是在家里过起了这种生活。1915年12月17日，他因患上斑疹伤寒症而被放假在家并第一次住进了医院，弟弟阿纳尔多也来看望过他两次。在这期间，经过一个民间的仪式，墨索里尼正式娶了拉凯莱·圭迪为妻。9个月之后，也就是1916年9月27日，她生下了一个儿子，并因时而宜地为他取名维托里奥。1918年4月22日，她又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并为他取名布鲁诺。墨索里尼的妹妹埃德维杰在拉凯莱怀孕期间

来陪她住了一段时间。由于已经和拉凯莱正式结婚，当时年纪尚幼的爱女埃达终于成了他的合法子女。从部队退役后，墨索里尼偶尔还有时间与埃达一起练习一下李斯特的钢琴曲。

家里的事务最好还是能够处理好。1915年11月11日，墨索里尼又有了一个儿子，他的母亲为他取名为贝尼托·阿尔比诺。这个贝尼托最后好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去了。这个不幸的儿子的母亲来自特伦蒂诺，名叫伊达·伊雷妮·达尔瑟。她曾经拥有一个美容院，但后来为了情人墨索里尼而把它卖掉了，并且从那之后在《意大利人民报》工作了一段时间。与拉凯莱相比，墨索里尼的指挥官倒是更充分地接受了她与墨索里尼的夫妻关系，他把伯萨利尼联队关于墨索里尼受伤的通知寄给了伊达，而不是拉凯莱。还有一些证据表明，伊达和贝尼托已于1914年底通过宗教婚礼仪式结了婚。墨索里尼也承认确有此事，并且付给了伊达一些生活费。后来，他还多次通过弟弟阿纳尔多给儿子贝尼托·阿尔比诺送去一些生活费，但他自己却不愿费事去看看这个孩子。然而，战争保证了拉凯莱在与伊达这个竞争者的竞争中取得了胜利，她赢得了墨索里尼的感情，并嘲笑伊达是“疯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正是别人给她丈夫墨索里尼起的绰号。但是，她的胜利并没有限制墨索里尼有其他的恋情。据为他们作传记的人称，墨索里尼一直迷恋着玛格丽塔·萨尔法蒂。她最初对战争持怀疑态度，但后来成为了一个爱国者。她的长子罗伯特在战争中是一个英雄，他的牺牲让萨尔法蒂与墨索里尼更加意气相投了。不管在办公室里发生的恋情有什么样的特点，许多事情都表明拉凯莱才是为墨索里尼照顾家事的合法妻子。在他的眼里可能有其他女人，但是战争进一步证实只有一个拉凯莱。

他的家事本来不会那么混乱的，但一些大的斗争让墨索里尼的生活变得复杂了。1914年，他看起来像是社会党中的一个明星人物。但是，不管墨索里尼多么希望意大利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实际上却让他的政治影响力减弱了许多。在最初宣传参战的几年里，墨索里尼的影响力与其他几个大人物是无法竞争的，如宣称自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情人的酒鬼诗人加布里埃勒·邓南遮，富有的花花公子和未来主义作家菲利波·马里内蒂，以及许多有名的民族主义者，如哲学家恩里科·科拉迪尼和身为记者和议会成员的路易吉·费德佐尼。与这些人相比，墨索里尼就像是一个来自穷乡僻壤的小男孩，阶级出身比他们都低，文化背景也自然为他们所不齿。许多人还推测，墨索里尼是一个浑身带着乡土气的农民。而军队里的上司也相信他还没有改掉喜欢煽动闹事的恶习，决定不送他到军官培训班去。这确实让人有点惊讶。他们非常势利地相信，从墨索里尼的阶级地位和文化背景来看，他更适合当一名士兵。

即使是在前线，墨索里尼也没有抛开《意大利人民报》。在离开报纸前的几周里，他还对社会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他当时声称，即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内

心里也是德国的民族主义者),并且狂妄地断言生产将会赢得战争:“工作和战争,这其中隐藏着胜利的秘密”。他还宣称,当前这场战争是一场人民战争,意大利可以被动员起来赢得这场战争,就像法国的革命士兵于1792年在瓦尔密获胜一样。但是,在他离开之后,《意大利人民报》上这种豪言壮语也随之散去了。继任的编辑缺乏墨索里尼那样的热情以及在新闻和管理方面的技能,也无法扩大报纸的销售量。据谣传,莫尔加尼在接替墨索里尼之后,偷偷地花了大量时间和金钱来设法还清伊达·达尔瑟住旅馆的花费以及其他大量的开支。同时,虽然墨索里尼不时地从前线上写信阐明了他们在“静态政党”时期结束后的目标,但“法西斯战斗的革命者”的影响力仍然在减退。1917年时,报纸已经陷入财务危机。在来自米兰的犹太裔商人切萨雷·戈尔德曼的帮助下,报纸才暂时渡过了难关。后来,在那一年的年底,报纸又得到了重工业和造船业巨头安萨尔多公司的资助。

墨索里尼的受伤和住院也是一个机会。在他受伤之后,《意大利人民报》的同事们用了大量篇幅来报导他们的领导为战争做出的牺牲。他们把他称为领袖、加里波第的后继者。如果使用这些夸张的头衔还觉得意犹未尽的话,他们又给他安上了“赋予人们灵感的人”、“激励人心的人”的称号,并且是“我们自己的”。其他与墨索里尼熟识的人也承认,他具有其他人所没有的鼓动别人的能力。看来这些夸张的奉承还是有道理的,1917年6月,墨索里尼重新回到了《意大利人民报》编辑的位置上,报纸很快就恢复了以前富于攻击性的特点。他坚持认为意大利应当发动“全面战争”。尽管这已经是非常吹毛求疵了,他又用他惯常的鲁莽向当局发起了挑战,要求成立一个“真正的”政府,一个首先要大胆地与“德国人”战斗的政府,特别是努力与德国皇室贵族作战的政府。*必须拒绝类似“神圣的教皇彼拉多十五世”这样软弱无力的假冒维持和平的人。必须用更多更好的宣传来保证意大利军队具有至关重要的“精神健康”,并因此而赋予它“灵魂”。需要有一个更大的推动力来为战争加上一个“社会内容”。墨索里尼的大多数言论都非常强硬,但偶尔也会说出带些乌托邦特点的话。他也幻想过战后的世界是一个田园牧歌似的世界,关爱将代替仇恨,人们将从痛苦中解脱,被破坏的生产也将得以恢复。他的想法很简单,当和平恢复时,将不再有那么多骚乱,并且,人们的“灵魂和身体都会变得‘缓和’”。

但是,意大利军队在卡波雷多的惨败结束了墨索里尼这种美好的幻想。墨索里尼以前最为尖锐的警告现在看来是有道理的,意大利已经被拖到了全面败退的边缘。面对这种境况,墨索里尼宣称,意大利必须进行全面的抵抗,“我们必须全民皆兵”。意大利人必须显示出他们高贵的血统,万众一心。对于社会党人和其他

* 他此时注意到了“列宁”,并谴责其是被德国收买的叛徒。

叛国者，不应当给予他们任何尊重和仁慈。无聊的娱乐活动应该结束了，管弦乐音乐会、剧院、赛马场和咖啡店都应当被关闭，所有的意大利人都应当接受军事训练，并且用士兵们的纪律来约束他们。他还强调说，农民也不应该被忘记：“为了这个国家，必须救救农民，必须把土地给农民。”国家应当移交给那些正在为它而打仗的人。他敦促说，总之，意大利“需要一个政府，一个男人，一个既要有艺术家的微妙触觉又要有勇士的强有力的双手的男人，一个敏感而充满意志力的男人，一个了解人民、热爱人民、能够引导人民，同时在必要的时候又能够用暴力让他们屈服的男人。”可以想象，按照这个标准，他自己倒是非常适合的。意大利可以发动一场“只集中于这场战争的战争”，而最终将会出现一个“敏锐而精明的政府，它能够根据形势和情况来调整自己路线”。它的路线也将非常简单：“对于那些单纯和无知的人，要用宣传手段；对于那些暴民，就要领导他们。”

对许多人来说，墨索里尼的想法仍然太过极端（而他的利己主义仍像过去一样明显），但他的想法却是符合时代特点的。德费利切声称卡波雷多惨败把墨索里尼从一个煽动者转变成了一个政治家，这也许有些夸张。但是毫无疑问，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出现了一种新的氛围，真有点“人民战争”的样子。这种新氛围给了具有墨索里尼这样的阶级出身和文化背景的人一个潜在的空间。1917年12月，150多名代表和90个议员（包括萨兰德拉）加入了“法西斯国家防御议会联盟”。1918年1月，墨索里尼适时地写了一篇文章，为“152个法西斯代表”欢呼。当时的新任首相是温和的自由党人奥兰多，他也试图表现自己既是一个人民权力的支持者，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呼吁在国外进行扩张，在国内进行社会改革，并且似乎还要承诺分发土地给那些“国家的英雄的农民士兵们”。墨索里尼可能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但历史的进程好像又一次沿着他的路线进行了。

但他还是会不时地把自己描述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但多是出于强调自己具有作为“社会主义者”的资格。他在文章里写到，他的社会主义可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以及“民族的”，因为“否认自己的祖国就像是否认自己的母亲一样”。为了庆祝来自“新世界”的美国士兵到欧洲参战，他忘记了过去对美国资本家的厌恶，称他们充满了一个“年轻种族”的“勇气和魄力”，并且称他们的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也是一个“明智”的出类拔萃的领导人，他揭示了协约国的事业是多么的“神圣”。墨索里尼仍然渴望建立一种“专政”政体，因为专政如果想转变为“民主”，那就像变成“反动”一样容易。“只有专政才能把一个人从他原来的位置拿开并放到最适合他们的位置。”1918年5月，他声称自己为此位置推出的候选人是威尔逊，因为他是一个“贵族”，并且“敏锐而坚决”。威尔逊具有摩西的特点，能够把欧洲人带入一个更好的世界。1919年1月，当威尔逊声称“帝国主义是生命永恒不变的规则”时，墨索里尼仍然充满热情而不知分寸地向“威尔逊帝国”致敬，因为他表达了“需要、希望和对人类灵魂的忠诚”。墨索里尼在他的报纸上声

称，威尔逊是“人民崇高的领袖”。

相比之下，俄罗斯发生的事情却让人震惊。羞辱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正是由社会主义者送给意大利的，也正是意大利所期待的。在墨索里尼看来，伴随列宁主义而来的是独裁、兽行、恐怖和混乱，这是“社会主义”的失败。他在战争结束后声称，苏联的社会主义者比杀人犯强不到哪儿去。如果有机会，他们在俄国做了什么，就会在意大利也这么做。

然而，他的思想中还保留着一些辩证法的残余。1917年年底，他更加清楚地解释说，他现在支持由那些在战壕里蹲过的人来管理这个国家。他声称，意大利正在分成两个大的派别——“那些蹲过战壕的和没蹲过战壕的；那些打过仗的和没有打过仗的；那些工作着的人和那些寄生虫。”生产才是最要紧的（而不是他一度主张的工资和工作条件）。一个有效的政府能够轻而易举地动员10万名妇女去代替那些身体健康但目前却被拴在工厂里的男人。《意大利人民报》副标题标明它是一份“社会主义者”的报纸，但1918年8月，这个副标题被换成了“士兵和生产者”。墨索里尼在报纸的社论中响亮地宣布，一个由士兵和生产者组成的国际组织正在诞生。

墨索里尼在其他一些问题的立场上也突然转变了。虽然对达尔马提亚**怀有野心，但他还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民族主义者。1918年4月，他还带着一些乐观主义说，“道义的准则”要比“领土的准则”更为重要一些。***类似地，他还对给予印度更大的自由的建议表示欢迎，并且带着崇敬的态度说，他相信英国人正在“逐步地”这么做。对于各国正在制定的国际联盟的框架，他更是表示怀疑。他认为，国际联盟从概念基础上就不符合意大利。比较典型的一点是，他更偏爱现实主义而不是理想主义。他露骨地说，“从宇宙生命的最低形态到它的最高形态，统治的愿望都是最为基本的法则。”****人类毕竟还是受着一种“非凡的兽性”

* 布列斯特，苏联欧洲部分西部一个城市，位于波兰边界附近的布格河畔。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东线战事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于1918年3月3日由俄、德双方在此签订。

——译者注

** 达尔马提亚，南斯拉夫西部一个历史地区，濒临亚得里亚海。公元前1世纪时被罗马征服，10世纪时，被塞尔维亚王国和克罗地亚王国分成两半，15世纪后又被众多势力控制，1918年成为南斯拉夫中心王国的一部分。

——译者注

*** 尽管阜姆（南斯拉夫西北部港市里耶卡）更加是一个“意大利的地方”，但他的确认为目前可以把它交给克罗地亚人。

——作者注

**** 他在1919年1月对此又有所补充，声称“帝国主义是永恒不变的生命法则”。

——作者注

驱使的。此时，达尔文在他的思想中的分量要比马克思重多了。

1918年11月11日，西线战事令人吃惊地结束了，不管是墨索里尼还是意大利的领导层对此都始料未及。当然，《意大利人民报》也对协约国的胜利表示祝贺。然而，墨索里尼所写的祝贺文章中使用的对比却让人感觉到有些否定和不安的意味。他在文章中写到，罗马帝国的崩溃和拿破仑的倒台都无法与西线胜利的伟大意义相提并论。他还补充说，现在，“胜利让你眩晕，整个大地都在颤抖，所有的大洲都在被这一危机撕裂，这个星球上没有一个地方不被这一飓风所震撼。在古旧的欧洲，一些人消失了，体系崩溃了，机构垮台了。”他还大言不惭地引用但丁的话说，“努力”会得到回报的。和平的到来能够确保实现他一直在宣扬的“真正的革命”吗？

当然，战争的结束实际上也让贝尼托·墨索里尼面临着走入另一个死胡同的危险。战争结束了，支持参战的左翼人士还有什么用呢？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当这个世界很可能再次回到原来的社会精英及其子孙手里的时候，他这个从微贱阶层出来的第一人还能够获得尊重并保持影响力吗？墨索里尼此时还是一个亲法国者，他喜欢把自己与乔治斯·克里蒙梭相比，他是法国的“老虎”，胜利女神像的建筑师，一个转变成为民族主义者的雅各宾人。但是其他人却并没打算接受这种对比。为了赢得应得的尊重，他还需要去做更多的政治工作。于是，早在1918年11月14日，墨索里尼就在试图把类似他这样的人结合成一个组织了。他满怀希望地说：“如果从某种意义上讲战争是我们的，那么战后的世界也必须是我们的。”这个组织可以叫做“法西斯选民大会”。他回忆说，他的报纸也具有“罗马风格的男子气概”。它还保持着它的“深刻的恨和爱”，仍然为未来的战斗和胜利做好了准备。它可以成为“一份有理念、有新闻、有信息的伟大的报纸”。

似乎只剩下一个问题无法估计了，那就是谁将会和墨索里尼一道，并且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他喜欢的社会政策总带些极端的色彩。他在1919年2月份说，“老板”和“业主”已经不复存在了，并且这场战争表明，意大利人必须齐心协力。左翼人士对此将会有何评论呢？此外，墨索里尼教授还有那么多来自各个阶层的竞争者，不管他们是不是反对社会主义，是支持还是反对战争，是不是激进主义者。未来主义者、工团主义者、“民主派”、退伍老兵组织、民族主义者、加布里埃勒·邓南遮，还有其他许多希望掌握未来的人，并且他们都确信自己或者他们的团体在意大利参加并获胜的这场战争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而且现在最好是对他们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有所兑现。

在1919年的头几个月里，政治界和知识界还非常混乱。然而，有两个词在鼓舞着墨索里尼，并且二者有可能合二为一。一个词是非常明显的“民族”，另一个则是不太熟悉但却变得有些吸引力的“法西斯”。1919年2月，从威尼斯和米兰到费拉拉和佛罗伦萨，再到那不勒斯、墨西拿和卡利亚里，出现了20多个退伍老兵

的组织。1919年3月23日，墨索里尼召集这些组织的代表，以及其他在战前支持参战的各色组织在米兰举行了一个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人有基亚沃利尼、法里纳奇和马里内利，后来又有翁贝托·帕塞拉、马里奥·詹保利、科拉多·帕沃利尼、切萨雷·罗西、马里奥·焦达、费鲁乔·韦基、马里内蒂等其他许多人加入。所有这些人在后来的法西斯政权中都有各自不同的角色。在一座能够眺望圣墓广场的建筑物上，他们聚在一起筹划着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法西斯组织。法西斯运动将要正式诞生了。

第2部

夺取政权



1 法西斯最初的几个月

在和平到来的第一年年初，贝尼托·墨索里尼站在了另一个十字路口。他已经35岁了，是3个合法孩子的父亲，并且拥有并编辑一份在意大利最重要的城市米兰有影响力的报纸。他是一个有能力的记者，一个称职而高效的经理，并且已经有了一定的声望。一个很快就要离开《意大利人民报》的同事回忆说，他的总编辑在喝咖啡时的休息期间也喜欢把自己关在屋里，并且威胁说会向任何打扰他的人开枪。这虽然有些夸张，但也反映出了一定的真实性，因为墨索里尼——这个退伍老兵们的代言人身上总是带着枪。他亢奋地工作着，但却从来不用借助笔记和档案文件。“不管看什么，他都能过目不忘。”任何下属如果拿着写好的稿子鲁莽地闯进他的房间，墨索里尼都会对稿子根本连看都不看一眼，也不管写得是什么，就会立即得出结论说他是在制造垃圾。而墨索里尼自己倒好像在什么地方都能写出文章来，不管是在剧院还是在咖啡馆里，或者是在办公室里与朋友闲聊的时候。这时，墨索里尼的情绪总是摇摆不定，是一个“痛苦的多愁善感者”，一个结合了“暴君的残暴和小孩的犹豫”的男人。但总的说来，他又是一个“永远都不抗拒诱惑的人”。他也会因为排版上出现的小错误而和别人开玩笑（另一个记者还记得墨索里尼那宽容的微笑以及让人感到温暖的“亲切”）。他开玩笑说，他的小孩都数得出一个“知识分子”犯的“印刷”错误。他还说，在他所有的孩子中，他的报纸是“最完美的一个孩子”。正如在法西斯当政时一个宣传家喜欢强调的那样，做编辑让墨索里尼对人民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他说：“新闻工作让我理解了构成政治的人的要素。”

1919年6月，一个警官并非出于恶意地向新的总理——杰出但刻板的经济学家弗朗切斯科·萨韦里奥·尼蒂报告说，他发现墨索里尼精力极其旺盛。墨索里尼的一天开始得很晚，一般是到了中午时分才离开家，并且一离开家之后就会直到凌晨3点才回去。从他的时间安排来看，即使把他在性方面的征服和在决斗*中的胜利看做是男孩子的游戏而不去考虑，最起码他的身体一定非常好。他还在战争中参军服役，并且至少没有给他自己丢脸。他的参战经历让他可以有理由声称

自己能够代表意大利的士兵，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他可以就范围广泛的问题发表演讲，并且，对于大多数问题，他都可以用一种贴近大众的口语进行演讲，但同时又不失知识上的深度。不管是面对什么样的听众或者读者，也不管是对国外发生的事件还是米兰市内的政治事件，他都能用口语化的或者书面化的语言来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且，不管在哪种情况下，他都能才思泉涌，妙语连珠。他的演讲虽然缺乏一个真正的演讲者应该具备的庄重，但“富于感情”和“冲动性”却对观众非常具有吸引力。那个警官还报告说，墨索里尼“至少是一个富于感情的人，并且因此而赢得了许多同情和朋友。”同时，辩论是意大利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习惯，而墨索里尼则是一个无情而鲁莽的争论的散播者，尤其是当这些辩论涉及那些自认为是知识界一员的人的时候。煽动人心的政客、哲学家、党内的派系和首领，所有这些人的简要情况他都试图掌握，并且还真的能了解得不错。那位警官继续分析说，他对手中的钱使用起来非常大方，当然自己不会很贪。没有用金钱和腐化去争取他，他就转而支持参战了，这让官方感觉好像有点太容易了，可能确实是反映了他的真实理想。不管从事什么事业，墨索里尼后面总会聚集起一群朋友。同时，他也是他的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很有才智，知道如何去揣测一个人，并且能够很快就弄清楚他们的长处和弱点。

在这份冗长的评价中，这位警官试图向尼蒂说明，在自由党统治的意大利，墨索里尼是一个未来的政治家。正如这位警官提醒总理注意的那样，这位《意大利人民报》的总编辑“极有野心”，并且“并不总是坚持自己的信念和理想”。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不满足于在社会中低人一等的地位。德费利切和他的追随者们声称，这里所描写的墨索里尼仍然属于左派人士（并且从观念上还总是保留着一些社会主义者的残余），这种说法明显带着同时代人的政治动机。由于太过专注于墨索里尼自己宣称的政治理念，所以他们忽视了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类似这样的行为模式。弗朗切斯科·克里斯皮就是一个例子。他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特别是法西斯的宣传家们喜欢把他描述为墨索里尼的先驱。19世纪90年代，当克里斯皮达到他成功的顶峰之后，他开始在国内实行强硬保守的政治路线，并且毫不掩饰地命令军队向示威的农民开枪射击。同时，他还在国外实行帝国主义（虽然最后在阿杜瓦以失败而告终）。在这次惨败之后，他的事业崩溃了。更有说服力的事实是，他的政治生涯始于19世纪50年代，那时他是西西里的一个乡村律师，声称将通过

* 1919年，墨索里尼至少进行了两次决斗，1920年又进行了一次。也许那一年最臭名昭著的一次是他向一个老相识发动的挑战，这个人就是历史学家加埃塔诺·萨尔韦米尼，后来成为一个最坚定的反法西斯时事评论家。墨索里尼曾于1920年的8月12日、13日和17日3次用他惯用的粗暴的语言在《意大利人民报》上把加埃塔诺·萨尔韦米尼描述成为一个不敢应战的“懦夫”。

“革命”来推翻波旁王室的统治。换句话说，他也是来自远离社会权力中心的阶层的一个野心勃勃的男孩，整天把“革命”这个词挂在嘴边，其实最终的目的是想保证自己能够尽快地爬升。甚至在1860年之后，在一个统一的意大利社会里，他还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左翼人士。但是，他自己对舒适生活的渴求（大胆而有活力的性生活是需要很高的花费的），以及一般的进化规律，都让他稳步地倒向了右翼，因为他在这边能够得到更多的回报和机会。

克里斯皮的例子也许有些极端，但这个粗糙的模型却描绘出了意大利许多政治人物的发展历史，不管是在自由党当政时期还是在1946年后共和党当政时期。根据1919年初的形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想象墨索里尼很可能会沿着相似的路径发生“转变”。他的生活方式开始变得奢侈起来了。他把家搬到了波拿巴市场中心地带的一所更大更宽敞的公寓里，并且还迷上了开快车（1919年10月，他还在法恩扎这个不吉利的地方遭遇了一场车祸，但却大难未死）。1921年，他还拥有了一辆四缸阿尔法跑车。他还不停地参加剑术训练，并且经常与人决斗，他甚至梦想着有一天能飞上天空。他的家庭开销也很大。1918年10月，他和拉凯莱都患上了流感，而拉凯莱的病情更为严重，这让他们支出了一大笔医疗费用。第二年，年纪尚幼的布鲁诺因患上白喉病而夭折了。这些花费没准儿是由墨索里尼的情人玛格丽塔·萨尔法蒂支付的，她当时很富有，能够支付得起这些费用。并且，她当时也快40岁了，可能花钱也会更大方一些。不管有没有她的提示或者点拨，墨索里尼的穿戴开始高档起来了。他剃掉了自己的小胡子，穿上了有领圈的衬衣，想为自己塑造一个崭新的形象，让自己看起来更为雅致一些。

这些个人化的事情其实暗含着更多的政治意义。有很多人都在讨论为什么墨索里尼和意大利在“一战”之后都没有再恢复到1915年以前的生活状况。克里斯皮绕过了自由党的派系之争。在他当时生活的社会里，只有不到7%的成年男子享有投票权。从定义上来讲，绝大多数人都被远远地排除在了公共政治权力的影响之外。但是，在1914年之前，这个旧世界就正在一步步地往危机中滑落了，而“一战”的爆发证明这个社会的体系已经失灵了。“一战”后的世界将是一个“大众时代”，政治家们不能再靠幕后交易来塑造自己了，而应当公开并响亮地向公众说明自己的理念。这就需要组成一个大众政党，并且能够建立一种针对大众理念的文化霸权。墨索里尼已经在竭力炫耀自己并等待机会发生“转变”，他和他的前辈都已经注意到了这一事实，即一个“新的、‘战后’的政治家必须以某种方式去收买大众”。

实际上，法西斯在幕后干的事仍是污秽不堪（我们自己的世界也是如此）。然而，就演讲和表演——即政治家对人民、财政界和知识界的精英所进行的营销——来说，到1919年的时候，政治家们必须要宣称他们的政治观点反映了大众的意愿，源于他们的需要。此外，要想建立一个让人可信的纲领，近代的历史，以及第一次

世界大战的意义对他们来说都非常重要。所有的政治家都必须就战争这一问题表明自己的态度。

看起来墨索里尼是幸运的。按照最简单的理解，他对这场战争的进程和特点的把握是正确的。尽管美国的帮助来得稍微晚了些，而同时俄国也发生了革命，但他还是把赢的赌注压在了意大利、法国、英国及协约国集团上。而被墨索里尼抛弃的社会党则试图奉行一种“既不支持也不破坏”的可敬的路线，但他们的路线过于圆滑了，善良得难以解释清楚。只有当意大利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被普遍地认为是一场灾难的时候，社会主义才会在战争结束后在意大利茁壮地成长。这场战争耗费了那么多的人力和物力，因此，不管从理性角度考虑是多么地有道理，但是如果要让意大利的大多数人放弃他们的付出所应得的回报，这对他们来说是很没有号召力的。1919年，那些对战争持肯定态度的选民成了那些敌视社会主义的社会派别可以利用的工具。

当然，战争的影响实际上要复杂得多。首先，战争证明意大利这个单一民族国家是一个不太可靠的胜利者。实际上，外交部长松尼诺和总理奥兰多确实在凡尔赛和会上试图实现他们的目标和宣传计划，并试图按照美国总统威尔逊的理念来重塑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国家，但这些努力最后都彻底失败了。因此，在“一战”后的国际政治格局中，意大利赢得了—一个被诙谐地称之为“—一个光荣的失败者”的地位。不管意大利在战争中做出了多么大的牺牲，它在国际上的地位仍旧是“—大国中最弱的一个”，甚至比这个地位还要差。从个人角度来讲，1919年初的墨索里尼也是如此。到底什么样的人才会是他的选民呢？他的权力的经纪人又是谁呢？那些老的社会精英以及他们在民族主义者阵营中的年轻同志们都已经发现，墨索里尼的才能在整个战争中，特别是在卡波雷托惨败之后的那段时期里是非常有用的。当时，意大利的领导人希望抓住他们能够获得的任何帮助来提升大众的—民族意识，并把民众的意志引向坚决支持战争的方向，而墨索里尼恰恰是一个为他们的事业摇旗呐喊的优秀的鼓手。但是他们的事业真的有前途吗？并且，墨索里尼只是一个来自普雷—达皮奥的男孩，浑身上下还带着些乡土气，自身也有局限性，只不过是—从他那个阶层出来的第一人罢了，他能与他们的事业相协调吗？并且，墨索里尼也并不是—唯一一个宣扬意大利全民参战的人。不管从阶级的角度还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讲，他能不承认邓南遮、科拉迪尼、萨尔韦米尼等人的资历吗？况且还有其他许多潜在的新的政治家呢。不管这些人怎样努力地把—自己同其他人区分开来，但他们都希望依靠他们在战时的爱国行为在新的和平时期赢得民众的信任。

如果说这些是墨索里尼“—向上看”时遇到的问题，那么当他“—向下看”时，也还面临着—一些明显的问题。当他试图与那些阶级地位还不如他的大众建立联系时，他使用什么样的理念呢？1919年1月18日，天主教徒们发表了一个宣言，宣布他

们成立了一个大众政党——意大利人民党。这个党的领导人是路易吉·斯图尔佐，是西西里一个野心勃勃的极端的牧师。墨索里尼以前是坚决反对教权主义的，因此他和意大利人民党没有什么理由成为朋友，而社会党对战争的憎恨又像是一个难以穿越的障碍，阻碍着墨索里尼再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当代表们聚集在米兰一个能眺望圣墓广场的建筑物上讨论成立“战斗的法西斯蒂”时，墨索里尼肯定有些迷茫甚至绝望：他怎样才能找到一个空间来实现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抱负呢？当时，实际上可以说是在1919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有很多理由担心自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逐渐埋没。当时的他还在编辑《意大利人民报》这份小报，他是否会发现自己首先已经“输掉了”自己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呢？

然而，他的面前确实有一个复兴的机会，在仅仅3年半之后，墨索里尼就成为了意大利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就在这短短的3年半时间里，“战斗的法西斯蒂”的纲领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并在一项赢得民众信任的政治运动中深深地扎了根。而法西斯运动所必不可少的领导人，他们唯一似乎可能的民族政治领袖，就是墨索里尼。他，而不是别人，担当起了领袖的角色。那么1919年3月时的劣势和弱点是如何转变成1922年10月28日的政治胜利的呢？

墨索里尼的崇拜者在20世纪50年代收集出版了一套《墨索里尼作品全集》，其中把在圣墓广场附近举行的会议生动地描述为“法西斯的真正诞生”。然而，这种说法实际上是简化了1919年春天意大利国内的复杂情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的笼罩下，墨索里尼用他那典型的蛮横和玩世不恭的态度解散了那些在米兰加入他的事业的人，并称他们是“不重要的人”。而在当时，正是墨索里尼自己才是一个更加明显的小角色。当时出席会议的人中，费鲁乔·韦基和马里内蒂都比墨索里尼名气大，而且更加积极。韦基是一个名叫“平民突击队”的组织的领导人，这个组织正在为战争时的“阿蒂提”，或者称突击队——现在的退伍老兵们——描述一个和平时期的前景，这也是“阿蒂提”在战争期间怀有的理想。韦基也拥有一份报纸《突击队》，并且认为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人民报》是“另一个反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韦基的运动在意识形态上没有太多的纲领，他声称将依靠年轻人，要实行义务兵役制并建立一支受欢迎的军队。他还承诺将致力于教育体系的改革，让学生们在一天里只用3个小时的时间来上正课，另外要有3个小时用于体育锻炼。他还有其他一些更加特殊的想法。韦基认为米兰是“意大利的神圣之城”，并且，也许是为了让自己有别于佛罗伦萨的民族主义者，他竟然大胆地连人们对但丁的崇拜也表示怀疑，而在其他人的眼里，正是这位诗人为意大利这个国家和民族指明了一条通向辉煌未来的道路。对于韦基来说，加里波第是一个重行动而非言辞的人（并且不是一个佛罗伦萨人），“更像一个诗人，而不是但丁。”为了保持坚定的政治信念，平民突击队的追随者们一致通过了一个口号：“第一是家长，第二是家庭，第三是我们自己，最后是国际主义。”突击队员们还更加充满热情地声称，他们彻底地反

对社会主义、教权主义和所有形式的中产阶级的消极性。

这个运动还有它自己独特的形式和礼仪。这些突击队员们平时都穿黑色的衬衫，这样在战时也能容易地识别自己人。他们还谱写了自己的圣歌“阿诺伊”（翻译过来最接近的意思大概是“意大利属于我们”）以显示他们的团结和对自己事业的忠诚。韦基在宣扬自己的理念时并不是很耐心。一个不太友好的批评者还记得，突击队员们穿着黑色的衬衫从米兰的一个酒吧闲逛到另一个酒吧，但是却没有有什么明显的目的，“他们大声地吵吵嚷嚷，直到最后喝得动弹不得。”相比之下，一个当过兵的牧师则对他们更为恭敬，他写文章赞扬了他们年轻而慷慨的骑士精神，以及在与国内和国外的“野蛮的”敌人作战时愿意战斗至死的精神。另外一个崇拜者也称他们体现了“民族血统中不变的天才”，散发着意大利人抗击沉重的德意志精神的热情和活力。在前线上，他们勇敢地投入“战争的训练”，而在和平时期，他们则希望“有一点正式的纪律，但不是官僚主义，以及最为灵活的等级制度。”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讲，他们都具备男子汉的气概，并且集思想、美和行动于一身。他们是一个新的贵族阶层，如果出现叛徒，不管隐藏在什么地方，他们都将把他们看做自己的敌人。

韦基认为，未来主义过于口头化，并且不是很贴近普通的退伍军人。于是，1919年2月，他与马里内蒂聚在一起讨论怎样才能赋予他们的理念一个更加贴近现实的基础。马里内蒂是当地知识分子中一个非常有名望的人，是一个公认的媒体人物。他还是一个非常矛盾性的人：一方面，他用革命性的语言批判资产阶级的迟钝和无聊；另一方面，他自己却住在米兰一条非常热闹的大街旁的一所华丽的别墅里。一方面，他大胆地提倡男权主义，并于1919年离婚后又与另外一个更年轻的女人同居了；另一方面，当他在4年之后与这个女人正式结婚后，他又非常地惧内。他是一个旗帜鲜明的爱国者，但同时又从来都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能够作为一个世界主义者在巴黎得到承认。因此，在大多数人看来，他是一个不太可信的政治人物。1919年初，他曾写过一篇文章，声称他认为这场战争带来的最积极的结果是那么多的男人从全世界以及各个不同的阶层突然聚集到一起……“杂乱而匆忙地与同一个女人进行性交”，然后公然推翻传统的家庭。可以想象，这篇文章很难对大众产生吸引力。*他还要求把教皇从罗马驱逐出去，从而“把意大利人民从天主教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同样，这也是一个没有什么新意的政策。还有人把马里内蒂写成是一个“可信的小丑”，而这些却让墨索里尼成了一个虽然不招人喜欢但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人。抛开马里内蒂这个未来主义者的反复无常的行为不说，有一点应

* 在另外一个场合，他还敦促废除警察，理由是一个社会应当足够地团结以保护自身。

该不会让人感到惊奇，正如一位参加这一运动的追随者所说的那样，墨索里尼而不是马里内蒂将成为这一运动所梦想和喜欢的“新人物”。

然而，当时米兰的知识界已经是躁动不安了。许多人都支持或者表示同意马里内蒂的观点，即“我们的种族胜过其他所有的种族，我们出产了众多的天才”，而马里内蒂当然是其中最有威望的一个。4月15日，他和韦基把他们的一些言辞变成了行动。他们俩在米兰的一条商业街上一个雅致的面包房里碰面之后声称，他们的职业是做“攻击性的新闻工作者”。他们继续前行到附近的《前进报》总部，接着便对那个地方进行了一次洗劫，这就是后来被赋予了一些神话色彩的“法西斯的第一次胜利”。墨索里尼自己虽然没有参加这次行动，但却想表现出一种左右逢源的态度。4月17日，他在接受一家报纸的采访时解释说，虽然这次攻击是马里内蒂和韦基自发进行的，但他自己对这次攻击负“全部的道义上的责任”。那些身居高位的读者们读到这些话后就会明白，墨索里尼是在表明他又可以成为意大利社会精英们的一个有用的同盟了。社会党的《前进报》因为不支持参战而被人们认为是不爱国的新闻媒体，因此警察们对这种攻击行为也漠然置之，而警察的态度更加助长了法西斯的嚣张气焰。同样，社会党的刊物也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大肆的渲染，在谴责马里内蒂和韦基的越轨行为的同时，他们更加严厉地谴责了墨索里尼这个“老鼠”。但是，他们越是这么做，就越发扩大了墨索里尼的政治影响力。

有一点是确定的，即墨索里尼的真实的政治立场还令人怀疑。从某种意义上讲，马里内蒂和韦基虽然嘴里满是空话，但实际上还属于右翼人士，而墨索里尼及其同党则是在言不由衷地大谈着社会革命。“战斗的法西斯蒂”的第一书记是阿蒂利奥·隆戈尼，他是一个空军退伍人员，早先还是一个铁路工人和工团主义者。1919年9月，一个更加积极活跃的人接替了他的位置，他就是翁贝托·帕塞拉。而墨索里尼自己则在圣墓广场大会之后仅仅两天就宣布，“工团主义的时代”已经来临了。他说，工团主义可以成为介于阶级斗争和阶级合作两者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而奥里韦蒂这个更加圆滑的工团主义的支持者则说，工团主义在这个国家里能够找到它的阶级基础。墨索里尼也很快就补充说，法西斯运动完全不需要什么精确的意识形态，因为它是“非党化的运动，没有什么章程。”他还声称，对于与君主政体、教会或者甚至是社会主义有关的问题来说，并且实际上对所有的事情来说，都没有一个最终的解决方案。1919年4月，还有传闻说墨索里尼还想试着回到社会党内。

当然，墨索里尼当时的思想状况也可以被描述为一种混乱和机会主义。而且，如果试图把他当时一系列的想法用一个单一的概念来归纳，那将会是一种有勇无谋的冒险。墨索里尼还继续在《意大利人民报》上发表凶猛好战的文章。目前可以确认，外交是墨索里尼擅长的专业领域之一。《意大利人民报》的读者还会注意

到，墨索里尼开始猛烈地抨击英国了，“英国是世界上最肥胖和庸俗的国家。”他还敦促说，爱尔兰和埃及应该获得自由，而马耳他则应当成为意大利的领土。几个月前，他还对伍德罗·威尔逊尊敬有加，现在却嘲笑他从根本上就是“反欧洲”和“反拉丁”的，最多也就是一个糊里糊涂的教授而已。6月初，墨索里尼警告说，凡尔赛条约的最终签订，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不管现在在巴黎达成什么样的协议，意大利都无法否认1915年做出的参战决定所带来的后果。相反，当他们回忆起那场战争时应当感到骄傲才对，因为那是意大利自罗马帝国灭亡以来“所有意大利人”一起打的第一场战争。不管由新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建立的王国抱有什么样的企图，或者“国际富豪集团”抱有什么样的企图，意大利人都不应当放弃亚得里亚海东北部的港口城市阜姆，它必须属于意大利。

墨索里尼此时的言辞中也开始流露出反犹太主义的迹象了。反犹太主义在当时的意大利还不是太多见，但有一份名为《意大利生活》的报纸却比较尖锐地反对犹太主义。这份报纸的编辑是乔瓦尼·普雷齐奥西，是一个还未被解除神职的牧师。这份报纸自夸说，经常给它写稿的撰稿人包括经济学家马费奥·潘塔莱奥尼、商界领袖奥斯卡·西尼加利亚和但丁·费拉里斯（他们自己都是爱国的犹太人）、民族主义者科拉迪尼、哲学家帕累托以及其他许多知识分子和政治家，而这些人阶级地位和影响力都要高于墨索里尼。在墨索里尼的一篇谴责俄国的“列宁主义”的文章中，他使用了一些可能是引自普雷齐奥西的话。他发表评论说：“8%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是犹太人，他们的秘密图谋实际上都是为伦敦和纽约的犹太人银行家服务的。”“一个种族的人是不会背叛自己的种族的”，他在1938年之后又多次重复了这句话。

有些评论家总是强调法西斯和纳粹这些词的感情色彩，原因在于他们急于得出结论，那就是法西斯和纳粹发动了“一场针对犹太人的战争”。而更为可能的情况是，这些词反映出墨索里尼像变色龙一样的根据环境不同而变化的能力。事实上，他还曾写文章对匈牙利的犹太革命表示支持。另外，墨索里尼对金融家和商人的厌恶也并非一成不变。他在所写的第一篇有关新政府的文章中就对尼蒂进行了攻击，但同时又对但丁·费拉里斯扮演的角色表示赞赏。但丁·费拉里斯是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这个大商业联盟的主席，并且一贯慷慨地捐助民族主义者的事业。墨索里尼带着些奉承的口气写道：“费拉里斯是一个靠自我奋斗成功的人，一个付诸行动的人，一个志在挽救意大利于社会分崩离析，同时使意大利的工业和工业家实现现代化的人。1920年春天的一天，好像是为了证明他新近对商业产生的兴趣一样，他在一名友好的记者的陪伴下勇敢地走进了米兰的证券交易所，并且听那位记者耐心地为她解释那里正在进行的对他来说非常神奇的交易。

墨索里尼对当时的社会状况进行了很多评论，涵盖的范围很广，并且野心勃勃。他的大多数评论都是凶猛好战的，并且更多地集中在国内发生的事情上，特

别是经常对主流的社会党进行痛击。墨索里尼回忆说，1914年的时候，是社会党把意大利拖入了一场“内战”，并且这场冲突直到今天还没有结束。他解释说，这场战争并不像社会党描述的那样是一场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战争，而是一场“民族主义力量”与“反民族主义力量”之间的战争，它是以精神而不是以经济为基础的。这不是一场物质的斗争，而是一场精神的斗争。

换句话说，不管墨索里尼是多么地渴望得到社会的承认，他在口头上还是一直坚持对社会主义的敌视态度。然而，随着争论的升温，可以看出，这场争论不是由墨索里尼主动挑起的，而是由社会党人挑起的。因为，在1919年8月份，他又回到了呼吁人们订阅《意大利人民报》以救其于倒闭危险的悲惨境地。尽管社会党人一直在骂墨索里尼是一个被人买进来卖出去的“老鼠”，是又一个被玷污的老板的雇佣者，但令人担心的是，社会主义运动也有着更多的“老鼠”。当时，因为实行战时经济，再加上社会和政治体制方面存在着许多问题，意大利陷入了极度的混乱之中。尼蒂政府为了应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个没有什么吸引力的口号：“多生产少消费。”社会主义者满怀希望地问道：现在是发动革命的时机吗？这正像当时流行的一首激进的歌曲所唱的那样：“我们应当像俄国社会主义者那样发动革命。任何不劳动的人不准吃饭。”社会党的这些言论让他们的敌人万分恐惧。虽然他们大力号召的一次意在支持俄国的罢工于7月份最终失败了（墨索里尼和他的朋友对此次罢工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可还是有大批的人蜂拥加入社会主义的组织。看样子，在11月即将举行的选举中，社会党将会有很高的得票率。此时，各种情况都非常适合法西斯采取一些极端的行动，包括对战争奸商课以重税，降低男子的选举年龄并让妇女参加选举，实行一天8小时工作制，解散参议院和许多其他的极左翼组织等。但是，看起来正是社会党在1919年的秋冬季里左右着历史的潮流，并且可以嘲笑力量小且分散的“战斗的法西斯蒂”。据一个历史学家的研究，在1919年年初，有多达16个竞争性的组织都在使用“法西斯”这个词来描述自己。从无政府主义者到不安分的资产阶级大学生，除了名称之外，这些“法西斯主义者”没有任何其他的共同点。

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在1919年8月份的时候，墨索里尼已经找到了资金来开办一份新的刊物，他把它起名为《法西斯》。这份刊物的宗旨是帮助宣传解释法西斯运动，而当时“战斗的法西斯蒂”正在成为众多法西斯组织中最为有名的一个。但即使如此，在“一战”后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们还是没有获得足够的政治空间。但是，有一个事件加剧了意大利在战后的危机，并且，从长远来看，为贝尼托·墨索里尼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机会。1919年9月12日，被韦基称为“伟大领袖”的民族主义诗人加布里埃勒·邓南遮带领着1000名忠实的追随者（与他到西西里去时带的人数一样多）向阜姆进发，想要夺回这个拥有49000人的小城。在演说中，他们称自己的行为是“伟大的民族事业”。在那里，邓南遮建立了一个

所谓的“带感情的独裁统治”，声称要保护那儿的意大利人，抵抗所有的外来者。他还与工团主义者阿尔切斯特·德安布里斯共同所拟定了一个《卡纳罗宪章》，这份文件成为后来法西斯社团主义的纲领性文件。但是德安布里斯自己很快就与法西斯断绝了关系，称墨索里尼是“极端的利己主义”，使用“不光彩的政治伎俩”，把法西斯主义引向了“反动的革命”，并使之成为了地主们的一个工具，而且还出卖了阜姆。很明显，在这场嘴仗中，极具宣传才能的邓南遮使用了一些新的宣传技巧并在阜姆赢得了人心。按照一些历史学家的说法，这位诗人才是现代法西斯的先驱。

回顾起来，邓南遮是一个与马里内蒂有所不同的政治人物。这两个诗人互相都不喜欢对方，对于对方作品中的一些用词也不以为然。马里内蒂多用钢性的语言来赞美机械制造业的兴起，而邓南遮则因使用柔美的语言和轻快的描写来表现作品的主题而成名。但是两者又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希望意大利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并且二人都非常热爱巴黎。相比之下，邓南遮有着更高的国际声望，并且曾经在法国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他也资助过意大利战争，并且，在为支持参战而举行的游行示威中，他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人物。在战争期间，他还参加了一些远征国外的军事行动，这些行动在当时被广为宣传。其中最为著名的一次是在1918年8月9日，他们对维也纳发动了一次勇敢的空袭行动。不管他过去的角色和现在的生活方式是多么的模糊不清，邓南遮已经成为了一个为人们熟知的新的民族主义者。并且，在有些人看来，他是一个可信的民族领导人，而他自己则更是这么认为。

墨索里尼并不是很喜欢邓南遮和他的小自由王国阜姆。这也没什么让人感到吃惊的，毕竟，这两个领导人的在阶级和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别太大了。然而，不管是在当时还是之后，墨索里尼都在试图利用邓南遮的行动及其造成的影响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922年以后，在邓南遮占领阜姆期间，墨索里尼还与他进行过合作，共同描绘国内和国外的政治前景。然而事实上，墨索里尼并不愿意到阜姆去加入邓南遮的事业，因为他害怕自己的领袖气质会被遮蔽在这位诗人的阴影之下，并从此被永远地埋没。墨索里尼对邓南遮占领阜姆的赞扬也只是限于口头上。他在《意大利人民报》上对此事欢呼雀跃，称它是反抗“西方财阀联盟”的伟大壮举。他还说，尼蒂是一个“冒牌的经济学家”，一个极端保守而呆滞迟钝的南方人，他永远也不会理解这一壮举的伟大意义。墨索里尼甚至还在10月7日坐飞机到阜姆进行了一次访问，但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还是到那里去宣传召开“战斗的法西斯蒂”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帕塞拉并没有隐藏自己对邓南遮的愚蠢的厌恶，在他的有效协助下，10月9日至10日，这个大会在佛罗伦萨召开了。于是，在这次大会上，正是墨索里尼而不是邓南遮在新的政治格局中大放异彩。在会上，墨索里尼用一种刻意的、含糊不清的语言宣告一个组织正在崛起。这个组织“不是共

和党，不是社会主义者，不是民主派，不是保守派，也不是民族主义者”，而是一个年轻的、相信战争事业的组织，是一个“所有的否定和肯定的综合体”，他的成员都反对尼蒂这个“下流货”和“粪袋”。

墨索里尼并没有把所有精力都放在阜姆的问题上，他更为关注的是即将到来的全国大选，而他自己则是米兰地区的一个候选人。他写文章和发表演讲，动员人们投票支持他。他在公共集会上大唱突击队的赞歌《青春》也是出于此目的。墨索里尼不断地强调自己“没有偏见”，并且作为一个当过兵的人，具有解决意大利的种种问题的决断力。他宣称，“只有知识分子和意志坚强的人才有权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他还更加有些卖弄地强调说，他曾经参加社会党但又从中退出，并且愿意改变自己的立场以适应那些他曾经反对的社会目标。

但在当时，很少有人愿意听他这番言论。选举当天，墨索里尼在他的选区中只得到了不足5000张选票。相反，一些反战的党派，如社会党和意大利人民党则大获全胜，赢得的选票刚好超过了下议院508席中的一半，而社会党则独得了其中的156席。11月19日，《前进报》欢呼“革命的意大利诞生了！”尽管邓南遮还占据着阜姆，但不管是那些希望维持旧秩序的人，还是那些支持意大利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对此结果都感到垂头丧气。在阜姆，邓南遮这位诗人好像也屈服于另外一种形式的极端主义了，并且声称这就是“有活力的城市”。这种对革命言论的放任态度让类似西尼加利亚这样原本很友好的商界人士也感到非常地紧张和忧虑。其他人也注意到了他的“军团士兵”——邓南遮带着些炫耀地这么称呼他们，尤其是那些退伍的空军士兵们——开始用吸食可卡因这种方式来逃避生活的艰辛了。这种毒品在“一战”之后的“美丽世界”中开始流行起来。

尽管在1919年底的时候，法西斯组织只剩下了米兰、都灵、威尼斯、克雷莫纳、博洛尼亚和的里雅斯特的分部，并且力量也很弱，但墨索里尼却拒绝在这一新的现实面前低头。他厚着脸皮掩饰说，他的选举失败只是“表明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没有获胜，但也不算失败”。至于社会党，他预言说，他们不会永远欢呼下去的，在法国的选举中，他们的同志已经惨遭败绩了。在意大利，社会党的选票和他们的意识形态在大众中的渗透力已经脱节了。“罢工狂躁症”无法持久，而社会主义革命也远没有完成。墨索里尼推断说，“肯定会有像这次失败一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他开始乐观地在右翼中寻找政治空间了。

然而，就在这次选举之后，尼蒂下令把墨索里尼、韦基和马里内蒂一起抓了起来，墨索里尼的事业也因此而暂时中断了。警察发现墨索里尼和他的朋友们非法私藏枪支。但是，同样是在总理的干涉下，这些法西斯支持者们又被放了出来，而对于米兰地方当局要求对墨索里尼私藏枪支进行起诉的建议，尼蒂也没有理会。尼蒂当时正受到许多敌对势力的困扰，很明显，他的自由党这时需要与墨索里尼保持接触，因为墨索里尼可能会发生“转变”，而这正是尼蒂可以加以利用的。虽

然在选举中遭遇惨败，但墨索里尼并没有被逐出意大利的政治舞台。

事实上，在选举的骚动还未平息的时候，就有消息说墨索里尼可能要和工业家埃托雷·孔蒂一起参加一个远征高加索的行动了。墨索里尼这么做是因为，据说政府要在那里实行委任统治，而墨索里尼想象那里的孟什维克们可能会欢迎他这样的人。西尼加利亚在《意大利生活》上告诉民族主义读者，这个交易的前景是不错的，但是他谴责了尼蒂在此之前没有通过谈判继续向前俄罗斯帝国占领的地区扩张。后来这次行动被推迟了。1920年2月，墨索里尼沉着地，或者说厚颜无耻地解释说，他不愿意去巴库，因为他认识到，在阜姆这一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离开意大利是一种不爱国的表现。当然，他也从未想到过要与被人轻视的卡戈亚（指代弗朗切斯科·萨韦里奥·尼蒂）一起吃饭。

虽然远征高加索的计划流产了，但这一事件却表明，虽然法西斯目前的政治境况很悲惨，但它的确正在赢得一群新的改变信仰者，代表人物是多病的文学家温琴佐·法尼·乔蒂（他大多数时间居住在里维埃拉地区），他发表作品时通常用“伏特”作为笔名。他有着正统的民族主义者背景，并且与未来主义者也有交往。但是，当他与墨索里尼走到一起之后，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完整主义者”，“支持君主政体、宗教和社会等级，主张在人与人、阶级与阶级之间实现有约束的和睦，在时间、传统、家庭、种族选择、主权和帝权之间实现世代的团结。”他说，自己最为推崇的是日本的社会形式。他认为所有的历史都是由贵族统治的，而墨索里尼则是一个“还需要塑造的历史的领袖”。很明显，法尼·乔蒂代表的是法西斯的右翼势力，他们很难容忍马里内蒂和韦基的极端主义，对墨索里尼暂时投靠的工团主义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1919年年底的时候，很多因素都在驱使墨索里尼进一步倒向右翼。这位社会党人亚历山德罗的儿子现在已经很难抑制自己对前辈的怨恨了，而他的妻子拉凯莱仍像原来一样粗鲁，认可了墨索里尼在日常谈话中的对前辈的这种敌意。于是，墨索里尼开始了一个新的政治历程，而这一政治历程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反社会主义。1920年，他在《意大利人民报》的新年致辞中劝告读者们“回归个人”。此时，他和他的朋友们已经下定决心要粉碎社会主义运动了，并且不仅是在政治上，而且是在整个社会中彻底粉碎社会主义。在1920年这一年里，这种决心在进一步地加深和蔓延，而虽然就其基础和组织来说，“法西斯主义”还只是一个非常地方化的事物，但它已经开始显露出其全国性的诉求和目的了。

法西斯政权时期的一个部长拉法埃洛·里卡尔迪后来还回忆起了法西斯早期在马奇地区的发展。他所在的城镇西尼加利亚就位于安科纳北部亚得里亚海的边上，当地有共和主义的传统，但是当地的中产阶级却为社会主义的暴力和缺乏爱国性而感到悲伤。于是，1920年，法西斯的支持者们开始在一些名门贵族的俱乐部里聚会了。里卡尔迪描述了一个出身于更具男子气概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年轻人，

他拿了一根台球杆做旗杆，把象征着当时尚在初期的反社会主义运动的三角旗贴在了台球杆上。事实上，这个年轻人多半是里卡尔迪杜撰的。随着这个集团的活动增多和野心的扩张，他们开始希望当地的组织能与全国性的组织取得联系，于是里卡尔迪便被选为代表到米兰去见墨索里尼。当里卡尔迪见到墨索里尼时，墨索里尼正在他的办公室里看报纸。他发现这位领袖满面愁容，烦躁不安，根本没有注意到里卡尔迪的到来。直到他向他解释自己是来自马奇的法西斯分子，并且他们需要一些武器的时候，墨索里尼才在一张纸上写了一个地址，并在签名之后给了他，然后立刻又埋头读他的报纸了。里卡尔迪注意到，这位未来的领袖的眼睛里充满了活力。他匆匆离开墨索里尼的办公室，到墨索里尼所写的地址去拿了两袋子左轮手枪和手榴弹。对于那些渴望一夜成名的乡下人来说，墨索里尼的确很有感召力，他支持他们无情地使用暴力，并且能够发给他们所需的武器。

在意大利北部的其他地方，类似的事件也开始发生了，虽然在时间上稍晚一些，但影响却更大。在的里雅斯特这个在哈普斯堡皇室统治时期就以“反斯拉夫”而著名的城市里，弗朗切斯科·琼塔纠集了一些人，对任何来自“斯拉夫人”和“共产主义者”的反对都予以摧毁。在波河河谷和托斯卡纳地区，反对社会主义的势力的行动已经有些失控了。在他们看来，地方的统治简直就是暴政，而最穷困的阶层甚至威胁要推翻“所有的文明”。在20世纪最初的几年里，在南部的普利亚地区的一些城镇里，一些当地的地主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组织起了一些小分队。而现在，这些小分队在这些地方又复活了。1920年3月，墨索里尼就已经承认，从个人的角度讲，他并不在意被贴上反动派的标签：“这个称号让我们感到高兴，因为现在，当革命的言辞正在盛行时，被人称做反动派就是一个贵族的标志……也是像我们这样的少数派运动的一个标志。”虽然如此，他还是时而带着些歉意重申自己将履行承诺，要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大约也就是在同时，他又开始宣扬“个人的自由”了。他宣布，当一个国家将成为一个“银行家、放高利贷者、赌场老板、海员、强盗、保险商、邮商、铁路工人、剧团经理、工业家、教师、烟草店主、法官、监狱看守和收税员”的国家时，它就变成了一个“莫洛克”^{*}。不管在口头上谈论什么话题，墨索里尼与官方的社会主义的冲突已经是深入骨髓了。在罗雷托广场发生了一起谋杀事件之后，墨索里尼在文章中写道，社会主义者的野蛮程度已经超过了那些原始部落和“食人者”，而这个广场也将在他个人的历史上继续扮演角色。他带着些恐吓的意味说：“那些对他人施以私刑的人，并不代表着未来，而是代表着人类的野蛮时期（那时的人反倒比文明人类更加健康）。”

^{*} 莫洛克神，被旧约中的中亚人和腓尼基人所信奉的神灵——要求以小孩为祭品的火神，比喻能够强迫别人做出重大牺牲的可怕力量。

法西斯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于5月24日召开了，这一天正好是意大利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5周年纪念日，因此还带着些爱国主义的意味。在这次大会上，墨索里尼集中攻击了社会主义者，称他们犯有“反意大利罪”。这时，他已经与他原来的理想完全背道而驰了。他不能也不应该拒绝梵蒂冈的潜在力量了，虽然从个人的角度讲，他也承认与任何宗教都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天主教却可以与国家的力量相结合，并且可以加速其力量的扩张。君主政体也不能轻易地放弃了，而建立共和政体也可以推迟到合适的时间再说了。即使是他一个月前还在极力谴责的官僚主义，现在也有了好的一面。此时，愿意听墨索里尼的话的是法西斯的高层成员，这些人本身就公开倒向了右翼。而拒绝他的新路线的正是那些他以前的盟友，如马里内蒂和韦基等。这些人没有能够更新他们的成员资格，他们还特别厌恶未来主义者，并且认为墨索里尼是在向教会献媚。

于是，法西斯开始寻找一个新的政治立场了，而尼蒂政府也进入了它最后的悲惨时期。阜姆问题还悬而未决，社会主义却已经席卷了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和乡村，连最穷的农民与许多地主的契约关系也有了改善，而旧时农民阶层中复杂的阶级差别也面临着革命性的重新洗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乡村也不再承认城市以前享有的优势地位了。民众也同样难以应付，天主教工会也开始像社会主义者一样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了。经济陷入困顿，生活费用与1913年相比疯狂地上升了4倍。工会要求增加30%的工资，并且态度也越来越强硬。尼蒂甚至在他最擅长的外交领域也遭遇了失败，于是，1920年6月9日，他辞职了。接替他的是乔瓦尼·焦利蒂。1914年以前，他确实是一个强势而机敏的政治家，但是现在他已经将近80岁了。并且，在民族主义者看来，他在战争中奉行的中立政策已经让他在政治上无可救药了。

社会危机的火焰在燃烧。八九月间，在焦利蒂还没有正式就任总理之前，他就面临着工人们“占领工厂”的重大问题。并且，这一问题在夏季达到了高潮，这更深化了社会中的暴力行动。在都灵和米兰，金属制造工人组成的工会和一些革命的知识分子，如安东尼奥·葛兰西，正在计划着把口头上所说的社会革命付诸实施。随着一个又一个工厂先后被他们控制，至少有500万名工人加入了他们的事业。这些工人是如此团结，就连乔瓦尼·阿戈内利这样有象征性的现代工业家都在打算接受他们的一些控制。面对着这么多不寻常的事件，9月11日，焦利蒂以他典型的小心谨慎而又带些浮夸的方式给米兰的官员发了一封电报，他在电报中建议说：“有必要让工业家们明白，任何意大利政府都不会只为了保护他们的钱财而诉诸武力或者惹起一场革命。”为人所知的一点是，这位总理还向意大利的银行施加压力，让它们撤回对那些奉行强硬路线的工业家们的支持。并且，很明显是为了与阿戈内利这个皮埃蒙特人保持一致，他还表示支持工人们分得一些那些雇用他们的公司的股票。

事实证明，至少在短期内，焦利蒂仍然是一个战术运用大师。他相信社会风暴将会自生自灭，而布尔什维克也不可能很快就接管这个国家，事实证明他的预测是对的。到9月25日的时候，工人们占领工厂的行动就结束了。左翼并没有，也不会发动一场革命。但是，另外一件事却是焦利蒂没有预料到的。就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右翼发动了一场反抗运动。地主、工业家、民族主义者和那些对战争怀有积极印象的人团结在一起，驱散了意大利共产主义的幽灵，并对那些在1920年差点掌权的人大肆报复。这个获得胜利的运动正是由墨索里尼领导的。在危机发生的几个月里，他不停地就发生的事件进行评论，这些评论听起来偶尔还表示出对穷人的怜悯，但又总是以反对社会主义者的理想和行动作为结尾。他写道：“阶级斗争”在一些乌托邦里可能会是一件非常好的事，但是在意大利则不是，意大利最急需的是生产。法西斯仍然强调实际，但是“我们的原则原来是、现在也是：为国家的战争辩护，捍卫已有的胜利，竭尽全力反对意大利国产的社会主义者去模仿俄国革命。”他又继续引用了法西斯的一句口号写道：“我们的确是少数派，但是‘一只狮子的吼声可以把100万只绵羊吓得四散奔逃。’”在工人们占领工厂的运动开始后，墨索里尼还预测说，其他所有反社会主义的党派最后都注定将要解散，因为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做出像狮子那样勇敢的行动。虽然他们暂时实现了一些自己的目标，但他们的成员最终一定会转变为法西斯的成员。墨索里尼早就把自己当成了一个领导人，现在，他开始着手寻找一个潜在的、能够追随自己的既有钱又有影响力的大众了。

当自己的前途充满灿烂阳光的时候，墨索里尼就有时间来放松一下了。在那年的夏秋季节里，意大利沉浸在不满之中，但作为一个编辑和辩论家，墨索里尼却不像以前那么忙碌了。相反，他的生活却因有了一个新的爱好而变得生动活泼起来，这个新的爱好就是驾机飞行，这正好也让他为适应新的政治生活做好了准备。这个年轻时曾是社会主义者并为布莱里奥征服海峡而欢呼的人现在终于有机会飞上蓝天了。这种对飞行的迷恋一直回荡在他脑中，1919年8月，他还想象着在未来，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也能够消失，就像飞行时距离好像消失了一样。于是，他浪漫地思考：“所有的灵魂也都将融入一个灵魂之中。”在将近新年的时候，他对邓南遮借口说，自己一时疏忽没有注意阜姆发生的事，又解释说 he 正在计划飞往东京；而为这一环球旅行做准备花去了他许多的时间。而6个月后，这次以东京为目的地的飞行还真的实现了，但是却没有墨索里尼。但他还是充满热情地掩饰说：“绿色、白色和红色闪过，那就是意大利，光芒将会停在空中。”他又夸张地说：“这象征着意大利代表的无限。飞行，写就了现代最伟大的诗篇，可以与但丁的《神曲》相媲美了。”

并不只是墨索里尼一个人对飞行进行过过度的渲染。飞行，尤其是飞机本身自带的敞开式的驾驶舱，对于许多同时代的人来说，好像是显示了“反动派的现

代主义”一样，因此对全世界的新右翼来说都颇具吸引力，这些人包括赫尔曼·戈林、查尔斯·林登伯格，以及墨索里尼的许多意大利朋友。朱塞佩·博塔伊就是他这些意大利朋友中的一个。他有民族主义和未来主义的背景，后来因为自1921年起领导了“法西斯飞行员罗马俱乐部”而加入了法西斯运动。另外还有反社会主义者费拉雷塞·阿尔皮诺，以及后来成为法西斯政权的航空部长的伊塔洛·巴尔博（他的姐姐名叫的里雅斯特·玛丽亚）。1921年的时候，巴尔博已经是最积极和最重要的法西斯小分队的头目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宣传家们宣称，征服天空所需要的个人的勇气从根本上来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因此，飞行的梦想和击垮社会主义者的梦想总是伴随在一起。“达尔文主义”和“民族主义”也都变成了一个航空上使用的词汇。墨索里尼还极富代表性地宣称，意大利必须力争获得“空中第一”的地位，而那些因为成本过高而反对这一目标的白痴们，如尼蒂，都是些吝啬鬼，人们应当把他们丢在一边不去理会。从1919年8月起，《意大利人民报》就开始极力支持发展飞机，并且强调法西斯的现代性和技术乐观主义。而墨索里尼更是把自己描述为一个“飞行狂热迷”，并且，至少有一次，他竟然穿着飞行员的衣服出现在了法西斯的会议上，把参加会议的人惊得目瞪口呆。

墨索里尼对飞行的兴趣并不只是停留在理论和宣传上。1920年7月，他从其他繁忙的事务中抽出时间来在阿科的一个机场开始了飞行训练。阿科位于蒙扎的外围，就在米兰的东北方向。他的飞行教练回忆说，“墨索里尼教授”一身编辑的打扮来到了这里，“穿一身黑色的套装，戴着硬圆顶礼帽，灰色的鞋罩。”在接下来的飞行训练中，他偶尔还在下午把拉凯莱和儿子们以及女儿埃达带出来走走。有一次，他显得特别匆忙，因为他在飞行训练之后还有其他的安排。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一共完成了18次飞行训练，时间总计有7个半小时。1921年3月，他还遭遇了一次飞行事故，但却侥幸生还了，只是付出了一些代价：脸被划破，膝盖也扭伤了。虽然墨索里尼的飞行教练在为他的快乐飞行课程做宣传时总是安慰别人说：“我们为每个乘客都投了保险”，但飞行的确仍然是件危险的事情。但他终于成功了，成为了一个飞行员。从1921年5月份开始，墨索里尼和另外一个犹太人法西斯朋友阿尔多·芬齐一起被加泽塔·德尔阿里亚佐恩称为“议会中首批能飞的议员”，*这让他们感到非常满足。事实上，墨索里尼在一生中都对这段时间的经历保持着美好的回忆。成为独裁者之后，他还多次驾机出行。1941年8月，他自己驾驶飞机并坚持要让希特勒作陪。希特勒吓得脸色苍白，认为这是愚蠢和危险的行动，是拉丁式的故作勇敢。不管有什么其他的事可以让贝尼托·墨索里

* 在1921年举行的第二次选举中，法西斯的选票骤增至178000张，在国会中也赢得了一些席位，并且组织了法西斯党团。

尼感到烦恼，但在1922年前后，飞行对他来说真的没有什么可怕的。1920年至1921年间，他在敞开式的驾驶舱里向天空和那些反对者们发出了挑战——他们还在固守物质利益不放，并发誓要把墨索里尼打下来。而墨索里尼在征服天空的同时，已经在计划征服整个意大利了。

2 法西斯夺权

那些以写传记为职业的“蓄意的”历史学家们更喜欢争论说，独裁者就是独裁者，伟大人物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天生就拥有自由的意志，正是他们在推动和改变着社会。但是，切萨雷·罗西就反对这种观点。他是墨索里尼的一个早期的追随者，后来与法西斯运动决裂，但之后又在特务机关供职，个人的目的也很模糊。他评论说，法西斯的绝大多数典型特征都是“自下而上”地形成的：罗马式的敬礼始于维罗纳，为去世者举行庄严的仪式始于摩德纳，在棺材前下跪的做法来自佛罗伦萨，对反法西斯人士强灌蓖麻油的做法始于费拉拉，雇用卡车拉着法西斯分子到乡下进行惩罚性的游行始于博洛尼亚，而法西斯的童子军运动则起源于皮亚琴察。切萨雷·罗西解释说，这些当时流行的特征、习惯和仪式都是自发地出现的，而它们之所以能够扩展到更大范围的法西斯运动中，则是互相模仿的结果。他还可以举出其他许多个类似的例子，如穿黑色的衬衫，唱法西斯党的颂歌《青春曲》，以及喊口号“大家冲啊！”等，都是源自法西斯敢死队的做法。许多保留下来的法西斯政权的舞台道具都是由邓南遮在阜姆发明的，或者更宽泛地说，是由未来主义者发明的。而“法西斯”一词在“一战”之后的意大利已经是无处不在了，“领袖”一词最初也绝不仅仅是用来称呼贝尼托·墨索里尼一个人。总而言之，今天的历史学家们所说的法西斯仪式，以及它传递信息的各种方式，都不能说只与墨索里尼一个人有关。

但墨索里尼的保守的个性和他的创新性之间的矛盾并不仅限于马术。当然，在1920年底至1922年10月间，法西斯兴起了，而墨索里尼也掌握了政权，但我们并不能据此得出假设说这两者自然地实现了和谐。相反，墨索里尼成为法西斯领袖和法西斯运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还是飘忽不定的，两者间也并不是很轻易就结合在一起的，而正是相互的利己主义的约束才没有让二者分开。那几个月在意大利的政治历史上非常关键，墨索里尼有可能正在朝着未来的领袖发展，但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结果和社会后果仍然不是很清楚。

同时，焦利蒂总理仍然用他惯常的规则和方式工作着。他仍对外交政策保持

着持续的关注，他认为，邓南遮在阜姆的故作姿态必须结束，而巴尔干地区的其他许多难题也必须得到解决。1920年8月，他找了个理由把意大利军队从阿尔巴尼亚撤了出来。意大利军队最初是在1914年圣诞节到达的阿尔巴尼亚，但那是一个又穷又不稳定的地方，意大利军队占领那里并没有得到什么明显的好处。意大利军队的撤出推动了意大利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王国的谈判，并且签订了《拉帕洛条约》。根据这个条约的条款，新的南斯拉夫国和意大利划清了亚得里亚海的边界，但这个条约却回避了邓南遮和阜姆的问题。圣诞节前夜，意大利军队开始清剿城里遗留的贫民武装，并且没有付出多大的伤亡就镇压了反抗。而在此之前还在大声叫嚷着“无阜姆，毋宁死”的邓南遮，此时却找到了另一条出路：他在1921年1月18日逃回了意大利。这位“领袖”——他的崇拜者们习惯这么称呼他——可能拥有“无限的魅力”和吸引人的散文风格，但是他显然缺乏忍耐力和持久力。

贝尼托·墨索里尼对这些事件保持了一种袖手旁观的态度。他很清楚地意识到，邓南遮这个有可能成为新右翼领袖的竞争对手，现在即使不能算是正在被完全淘汰，也可以说是正在被削弱和羞辱。有一点是真实的，即1921年年末的时候，法西斯运动的一场危机让类似巴尔博和格兰迪（他当时是设在博洛尼亚的办公室的一个律师）这样的地方法西斯领导人再次建议让邓南遮来领导法西斯运动。同时，邓南遮也在1922年10月的政治角逐中再次露面，尽管这位诗人当时还有些行动不便——他从一所豪宅的窗户上摔下来受了伤。在每件事情上，墨索里尼都找到了正确的战术来对抗这位诗人的吸引力，1922年以后，邓南遮就被限制在萨罗附近的一所叫维托里亚勒的豪宅里，而它的建筑风格也反映出邓南遮当时的思想正处于一种调和的状态。他被有名无实地抬升为蒙泰内沃索亲王，但他对此却非常高兴，拱手让出了自己所有的政治影响力。邓南遮超凡的感召力已经荒废了，而墨索里尼的感召力却大大增强了。

1920年，当阜姆还被意大利占领着的时候，墨索里尼就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邓南遮冒险占领阜姆时，他的态度似乎有些冷漠。现在，他意识到不能再给别人这种印象了，于是便经常就外交事务发表一些评论。这些评论的言辞尖锐而富于攻击性：阜姆必须划归意大利，《凡尔赛条约》必须修改。他敦促说，意大利应当有勇气去追求一个“全球性的政策”。一个“年轻人”必须是一个“帝国主义者”——只有意大利人给予了阿尔巴尼亚人一些希望，如果不是意大利人到了他们那里，当地人恐怕还在他们“原始的茅屋”外面的泥土里挣扎谋生呢。一年以前，他曾经谈到过反犹太主义，现在，他又旧事重提了。这就让他关于国家组成的定义缩小了，并且与他最近对个人自由产生的热情也是相互矛盾的。他评论说：“意大利不知道反犹太主义是什么，我们相信它永远也不会知道。”但是他又补充说，犹太复国主义正在开始对这一宽容的传统构成威胁了。迄今为止，意

大利的犹太人从总体上已具备了坚定的意志，准备“为这个我们深爱的家乡”付出他们的鲜血。并且，他们很可能会有足够的智慧来这么做。他又暗带着威胁预测说，如果他们不够聪明，那么反犹太主义将会在“一个从未出现过反犹太主义的国家”里开始成长。

墨索里尼的这些评论反映了什么样的事实？虽然墨索里尼用一些陈词滥调予以否认，但当时意大利的确存在着潜在的反犹太主义因素，特别是天主教右翼，而许多意大利人的思想中也确实隐藏着一丝对犹太人的歧视。《意大利生活》也不断地对“犹太国际主义”进行猛烈的抨击，1920年8月，该报的编辑普雷齐奥西发表的一篇文章语言尤其尖锐，声称大卫·劳埃德·乔治是犹太人血统。如果不是这一“事实”惹起了太多的麻烦的话，普雷齐奥西还会继续到处讲述“犹太老人的协议”^{*}的故事。当时，这个故事在意大利以外流传甚广，例如，《伦敦时报》就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就普雷齐奥西而言，这个协议证实了他长期以来持有的观点，即从马克思到托洛茨基的革命者都在暗中与从纽约到华沙的国际银行业和股票经纪业相互勾结，并且都穷凶极恶地企图把意大利牺牲掉。但墨索里尼看起来却从未特别喜欢过普雷齐奥西，据说，墨索里尼还对一位朋友说，以前曾当过牧师的普雷齐奥西的眼神很邪恶。但是，墨索里尼自己的反犹太主义则是他有意识的复杂想法的一种反映。他不能落在右翼的后面——如果民族主义者迈向反犹太主义，那么墨索里尼也会这么做。从另一方面讲，墨索里尼像鹦鹉学舌一样模仿周围人的观点和态度的行为也越来越多，但这却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即使是在法西斯独裁统治期间，他自己的立场也经常严重地受到最近与他谈过话的人的影响。当然，即使墨索里尼真的是反对犹太主义，那也是深藏在他的表层思想之下的，因为这位领袖当时还在与玛格丽塔·萨尔法蒂继续着恋情，与阿尔多·芬齐保持着友谊。并且，当时还有为数众多的爱国和保守的犹太人对法西斯运动的成长表示支持，而墨索里尼对他们的支持也非常欢迎。

同样，对于墨索里尼对外交事务的评论，我们也不能太当真，或者只凭字面意思去判断他的真实思想，不能像某些批评家那样急切地想证明“墨索里尼是个彻头彻尾的战争贩子”。他发表这些评论的首要目的与当年作为一个社会党在《前进报》和《阶级斗争报》上发表评论的目的是一样的，即希望通过炫耀自己关于

^{*} 这是纳粹种族主义宣传中为犹太人所杜撰的罪恶，声称在1897年在瑞士巴塞尔召开的第一次犹太人大会上，一些犹太人领袖签署了一个图谋统治整个世界的协议。这个协议纯粹是纳粹捏造的。

——译者注

^{**} 民族主义者路易吉·费德佐尼认为墨索里尼在1922年以前特别像只变色龙。

——作者注

国际事务的知识来让自己更加出名。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政治家一般对国际事务都有自己的看法，而墨索里尼也是一个民族主义政治家，或者说想成为一个民族主义政治家。因此，他绝对不能放弃任何一个机会来就意大利在国际外交中的地位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了解这些之后，我们就不会为他的言辞与真实想法的不一致而感到过于吃惊了。一方面，他不断地发表带有民族主义者色彩的言辞激烈的大空话，另一方面，他却已经准备接受焦利蒂签订《拉帕洛条约》这一现实了，并且很快就适应了巴尔干半岛的新格局。并且，早在1920年10月，在没有大肆张扬的情况下，他就通过米兰的官员阿尔弗雷多·卢西尼奥利与焦利蒂取得了联系并不断地与之交换看法了。墨索里尼甚至还与外交部长斯福尔扎见了面，并向他保证说自己对邓南遮的支持是有限度的。他转用一种非常坚定的口气写到，意大利目前极为深切地需要和平，只有“疯子和罪犯”才会否认这一真理。他还趁机指责了民族主义者联盟在罗马的成员，说他们对亚得里亚海的每一个小岛的主权都过分地纠缠。他带着轻视的态度称他们是“犯了时代错误的帝国主义分子”，而反过来，他的法西斯只是“健康的扩张主义”。墨索里尼也许希望焦利蒂和斯福尔扎能够明白，他在外交事务上的立场是可以因形势而改变的。

不管墨索里尼对国际形势有何评论，他关注的主要还是国内的事务。的里雅斯特和威尼斯—朱利亚就是国内外事务交汇的地方。在这两个刚被意大利吞并的地区，“边境法西斯”甚嚣尘上，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而早在1920年6月，墨索里尼就宣称，通过战争在这两个地区取得的政治和种族的胜利不容许有丝毫的妥协。他用讨好当地支持者的言辞说，右翼的意大利人必须“积极地扫平的里雅斯特”（这是对这一地区的未来的一个暗喻，意大利当时还没有完全吞并的里雅斯特），必须通过一个种族和阶级清洗的过程来清除奉行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和“斯拉夫”因素。9月，墨索里尼在的里雅斯特以较过去更加尖锐的言辞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演说。在这篇题为“罗马的辉煌”的演说中，他列举了意大利的先进之处，包括水电技术等领域以及其他许多领域。他又像当初被称做“墨索里尼教授”时那样自负地补充说：每一个现代人都读过塞凡提斯、莎士比亚、歌德和托尔斯泰的作品，但是但丁的作品仍然是最好的，其内容含古纳今。有了他的思想，意大利人完全可以把意大利的社会主义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从自己的头脑中清除出去。而苏维埃政权事实上也不过是“一小撮知识分子的独裁统治”而已，他们与“真正的工人”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那天晚些时候，墨索里尼又给《意大利人民报》的办公室发去电报，为当地“了不起的”法西斯运动而欢呼。他还愉快地宣布，法西斯现在已经在整个威尼斯—朱利亚地区的地方政治中赢得了统治地位，就连那里的地形也已经被证明“完全适合法西斯主义的发展”。让他的社会党和天主教竞争对手感到害怕的是，法西斯自己的财团和联盟正在各个地方崛起。与其竞争对手相比，法西斯明显的优势可以归功于

“民族斗争”，他们主张意大利应当高于“南斯拉夫的妄自尊大”和“斯拉夫的种族仇恨”。看起来，种族差别好像在政治上更有推动力，因此其方向也要比阶级斗争更加容易引导一些。“威尼斯—朱利亚地区法西斯运动的发展标志着一个伟大国家复兴运动的开始，并且，我们在期待和梦想一个新的意大利的诞生，而他们正是组成这个新意大利的慷慨而坚强的先驱。”但是，墨索里尼可并没有提到，各省的法西斯分子已经得到了意大利政府驻各地方代表的默许，对他们的一些行动持视而不见的态度。例如，7月份，法西斯暴徒纵火烧毁了巴尔干饭店——一个斯洛文尼亚人的防御堡垒。在他们的心目中，军队、警察和官员与法西斯的观点是一致的，即如果暴力是出于意大利种族的利益，那么它根本就不能算是暴力。在刚刚被意大利吞并的北部和东部领土上，意大利政府已经“消失了”。当弗朗切斯科·琼塔证明法西斯暴力在这些地方是有益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对此提出异议。

但是，这些暴力代表的是哪个阶级的利益？占领工厂运动的失败已经证明，在1920年9月之前，整个社会对社会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收获已经大为不满。现在，这些“农民法西斯”，特别是在波河河谷、托斯卡纳地区和翁布里亚，已经成为法西斯主义数量最大并且最具影响力的群众基础。当时，社会主义在这些地方的势力非常强大，强大得甚至有些自负。并且，虽然这些地区的阶级关系有些紧张，但现代化的农业却发展得很快。甚至连《晚邮报》的编辑、自由党人路易吉·阿尔贝蒂尼也为这些地区的“神圣的反动”辩护。当时，意大利的精英分子们普遍对反对社会党的运动持同情态度，所以，如果认为是墨索里尼自己直接控制了佛罗伦萨和摩德纳等地发生的“征讨”行动，那将是愚蠢的。他只是利用了这些运动引发的政治浪潮，法西斯运动当时还只是在地方上势不可当，墨索里尼还要让自己保住法西斯运动全国领导人的位置。如果他在的里雅斯特表现得让人确信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那他在其他地区就必须表现得更像农民社会主义者的一个敌人。

在这个阶段的法西斯的迅猛发展中，博洛尼亚和费拉拉的法西斯运动更加具有代表性。这两个历史悠久的城市位于波河平原上，法西斯很早就在这里深深地扎下了根。个案研究的结果证明，在费拉拉，正是法西斯的成功摧毁了当地的社会主义运动。在1914年之前，这一地区就已经是工会主义和社会暴力的天下了。米凯莱·比安基是这一地区的一个积极人物，他是一个卡拉布里亚人，一个工团主义者，因为奉行“第三条路线”而得到了一时的好处。但是，在当地最贫穷的农民、没有土地按天受雇的劳动者和地主之间仍然存在着斗争，而在“战后”时期再次出现的危机也比以前更加严重。佃农和其他中间阶层的农民原本就对他们的家庭和那些没有土地按天受雇的劳动者家庭之间的地位差别非常在意，他们掺在中间也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了。而以农民组织“土地联盟”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组织试图把两个阶层都吸纳进来。1920年8月，土地联盟宣称它的组织在费拉

拉省一个地方就拥有7.4万名成员，这是它拥有成员最多的一个省份，其次是博洛尼亚，有7.3万名成员。然而，这些大众追随者没有受到过多少组织原则和实践的教育，因此，内在的意见分歧很容易就让他们变得四分五裂。

尽管当年参加圣墓广场会议的代表是奥拉奥·加焦利这位当地的未来主义者和“一战”时的敢死队员，但是，1919年，工团主义运动却成了法西斯在费拉拉主要的表现形式。到1919年底的时候，费拉拉的法西斯运动已经崩溃了。后来，在1920年底的时候，顽固的加焦利又号召用暴力来报复社会主义“盗贼”，法西斯在费拉拉又复活了。加焦利的法西斯非常地富有和“现代”，能够召集起许多卡车拉着法西斯暴徒从费拉拉出发去突袭正在乡村举行会议的社会党。当地的社会党也不愿意屈服，不管是在言辞上还是在策略上。而在此之前，他们还曾经在播种和收获季节里举行罢工，让地主们非常头疼。但是，法西斯的装备更好，也更加残忍和无情。另外，社会党内部的阶层差别和分裂的问题也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在1921年初的时候，当地社会党的力量崩溃了。但是，在社会党崩溃之后，法西斯内部也出了问题，加焦利与伊塔洛·巴尔博之间出现的竞争开始加剧了。后者在社会上更受尊重，并且，他在当时和以后都与费拉拉主要的犹太人团体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另外，当地的法西斯组织和米兰的法西斯总部之间也在酝酿着一场争论。费拉拉的法西斯运动非常兴盛，大有完全独立之势，这让米兰总部竭力想对它施加一些限制，并且想让它为总部多出一些经费。巴尔博本人愤世嫉俗、野心勃勃，但又很有能力，他的权威随着当地法西斯组织的扩大在不断地扩张。当地的法西斯组织使用的是威逼加利诱的方式，一方面，许多成员都是在枪口的威逼下参加他们的组织的；另一方面，他们也许诺将会提供一些“社会公正”，号召人们起来反抗横行霸道恃强凌弱的大地主们。然而，当地那些更加左倾的法西斯分子们逐渐发现，他们的影响力和优势正在遭受排挤，加焦利和他的朋友最终退出了法西斯运动。1921年夏天的时候，先前过于关注费拉拉本地事务的巴尔博也开始喜欢起“外交政策”了。他的法西斯小分队开着卡车在费拉拉与威尼斯和拉文纳的交界处游荡。1921年9月10日，发生了引起轰动的3000名法西斯小分队“进军”拉文纳的事件。据说意大利伟大的诗人但丁死后埋在拉文纳，当地人要在那天为他竖起一座纪念碑，因此，费拉拉的法西斯分子到拉文纳这一事件看起来似是一种爱国的行动，但他们却趁机开始对那里的“红色势力”进行了一次残忍的清洗。这些法西斯分子还庄严地列队走过但丁的坟墓，以此来显示他们的勇气，并庆祝他们战胜了那些不爱国的社会党人。

博洛尼亚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虽然当地的主流社会主义都是比较负责的改革者，但在1914年之前，当地也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危机。但丁·费拉里斯以及当地的糖业利益集团和武器制造商，都是右翼中突出的代表，他们还为民粹主义者联盟主办的报纸《民族理想》提供资金。在“战后”时期，特别是当社会党在1919

年11月的选举中获得了63%的选票之后，博洛尼亚当地的社会冲突也加剧了。《零钱报》意味深长地评论说，这次选举中真正的输家是“温和派”，事实上，温和派已经不可能再继续维持它的政治地位了。当选举结果开始显现其作用的时候，法西斯在当地的势力还非常弱。1919年8月，当地支持激进行动的法西斯分子只有可怜的15个人，而到了12月，这个数字进一步减少到了6个人。但是第二年，激进分子莱安德罗·阿尔皮纳蒂却取得了当地法西斯运动的领导权。他是墨索里尼的一个老朋友，自夸曾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和参战支持者，但是现在，他却更愿意与当地的一些精英们做交易。1920年11月，他们对当地社会党总部所在地达克西奥大厦发动了武装袭击，从而让人们明白了他们做的是什么样的交易。但是，这种行凶杀人的暴力活动却得到了墨索里尼的认可，他在一篇社论中写道：“事实就是这样。意大利的社会党就是驻扎在意大利的一支俄国军队。要抗击这样一支外国军队，法西斯必须打游击战，并且要以非凡的力度来打。”由于得到了墨索里尼的认可，博洛尼亚的法西斯运动开始迅猛地发展起来。另外，尽管阿尔皮纳蒂出身微贱，并且因此而使当地的法西斯运动有些保守，但当地农村的地主集团和城市的商业利益集团还是为法西斯运动提供了大力的支持。据说，阿尔皮纳蒂在1921年6月结婚之后，他的住所里连个厨房也没有，而他的妻子则用一个可以拎来拎去的炉子做饭。然而，他却在一篇题为《进攻》的文章中不停地引用安德烈亚·科斯塔的观点，从而引发了和格兰迪的争论，而后者在社会上更加受人尊重。

然而，在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的其他地方，情况却有所不同。在邻近的雷焦艾米利亚地区，当地的法西斯运动创始人奥塔维奥·科尔吉尼同始还兼任雷焦议会农业委员会的主席。相反，在墨索里尼的老家弗利，虽然法西斯势力在1921年4月宣布成立地方组织时还在卢比肯河畔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仪式（法西斯青年们开着汽车来到那里，并对那些参加聚会但有些发呆的农民发表了长篇大论的讲话），但法西斯运动的势力还是很弱。而在1922年9月之前，福林波波利和普雷达皮奥还都没有法西斯党的地方组织。

这一地区一些关注法西斯主义的反法西斯观察家，特别是博洛尼亚的观察家，已经认识到了这一运动的社会保守性。虽然他们也承认，这一运动对于那些“喜欢扛着武器”以显示自己在社会地位和意识形态的不同的人的确有一些吸引力，但同时他们也认为，这一运动与其说是一场革命，还不如说是“中产阶级的一场动乱”。正如一个幡然醒悟的前共和党法西斯分子在1921年秋天描述的那样：

“每一个地区，每一个省份，都有自己的法西斯组织。在艾米利亚地区，主要是由农民组成；在威尼托地区，则主要是民族主义者和保守派；在北部和东部边境地区则主要是针对斯拉夫人和德国人的民族统一主义者和煽动者。这些运动在一些小城镇里激起了个人仇杀行动以及当地的利益冲突，然而，不管是通过它的工团主义组织还是通过暴徒小分队来开展这些活动，他们实际上都是为社会中最

富有的阶层服务的。”

这些运动看起来好像有多种色彩，但是法西斯发动斗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在反对社会党的阶级斗争中获胜。

在这些地区的南边，社会危机并不是那么严重，统治精英们的利益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威胁，因此墨索里尼也没有给予这些地区多少关注。例如，在阿布鲁齐地区，法西斯运动就发展得很缓慢。1920年，当地还是出了一个法西斯的首领贾科莫·阿切尔博，他在当地的地位于1921年4月的选举中得到了确认，他后来还在法西斯政府内担任过部长。阿切尔博于1888年出生在当地一个很有名的资产阶级家庭，1914年前，他在政治上还是支持焦利蒂的做法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却支持意大利参加“一战”，并且还打算参军去打仗。他的一个兄弟还是著名的伯萨里联队的一名上尉，并且在前线牺牲了。1918年之后，阿切尔博参加了当时还前途未定的“民族战士联盟”，并且无可争议地成为了法西斯运动在省首府特拉莫的领导人。他曾一度崇拜出生于阿布鲁齐地区首府佩斯卡拉的邓南遮，是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和保守派，非常敌视民族战士联盟中那些大谈要与社会党进行交易的人。1921年2月，面对该地区另外一个城市中心拉魁拉内势力更强、更加极端激进的法西斯运动，阿切尔博在考虑如何才能让特拉莫的法西斯运动的发展超过拉魁拉（法西斯党的书记阿代尔基·塞雷纳当时正开始在这里崛起）。当地的地主也决定支持阿切尔博的事业，并且为他决定对社会党的一个据点瓦斯托发动进攻而欢呼雀跃。到1922年的时候，阿切尔博已经是阿布鲁齐地区得到普遍承认的一个“新人”。尽管有历史学家对此表示怀疑，但1922年之后，在他的法西斯领地上，一度被称为“焦利蒂主义”的许多体系和结构已经非常明显了。

再往南去一些，在西西里，法西斯几乎就不存在。然而，在1919年，彼得罗兰扎·斯卡莱亚王子——一个后来成为法西斯政权的殖民地部长（据传他是黑手党的一个资助者）的当地贵族，敦促成立一个“经济党”，声称要“最大限度地保护”现有社会体系以防任何的社会威胁。*在那一年以及接下来的一年里，西西里的一些地方也发生了一些极端事件，如占领土地等，而天主教的意大利人民党也正在成为当地一股重要的势力。然而，在1919年11月的选举中，这里的情况却与北方的情况不同，旧的自由党集团占据了优势。那一年，少数墨索里尼派的法西斯分子在革命的工团主义者的领导下出现在巴勒莫，但是，他们却没有得到当地人的响应，他们的组织也很快就解散了。到了1921年选举的时候，当地又出现了一股不同类型的法西斯，为首的是来自墨西拿的一个律师真纳罗·维莱利，以及

* 到1920年时，他的“农业党”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武装小分队，从事政府无力从事的活动。

来自巴勒莫的一个考古学教师比亚焦·帕切，后者后来成为法西斯政权的一个主要的宣传家。但是，他们的法西斯运动仍然是软弱和分散的。黑手党操纵的社会暴力维护着现有的社会精英们的利益，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社会党人毫不夸张地描述说：“社会党人明白，说不好哪天早上你就再也醒不了了。”西西里版本的自由主义在使用暴力维护社会秩序方面从来都没有畏手畏脚过。

1921年的春天，当社会主义的浪潮正在各个地方退去的时候，各种形式的法西斯正方兴未艾。到了5月份，法西斯已经控制了威尼斯—朱利亚和波河平原的绝大部分地区。在曼托瓦，一个名为“意大利三年级”的学生集团与更具民族主义倾向的退伍老兵组织合在了一起，共同组成了法西斯组织。同样，法西斯在皮埃蒙特地区的几个省，如亚历山德里亚、诺瓦拉、托斯卡纳、翁布里亚甚至普利亚，都夺取了政权。在托斯卡纳的阿雷佐，摩托化的小分队出门“远征”长达5天之久。这些进攻造成了重大的伤亡：1月至4月间，官方统计有105人死亡，431人受伤；4月到5月间，又有102人死亡，388人受伤。最臭名昭著的是法西斯在3月1日对佛罗伦萨以西的工业城镇恩波利的洗劫，疯狂的法西斯分子嘲弄地对当地的社会党喊道：“你们要么离开恩波利，要么就永远地待在这儿！”

随着这场社会战争的前线继续向前推进，作为这么多种形式的法西斯运动的领导人，墨索里尼肩负的任务也是错综复杂的。凭借着各省法西斯分子的能量和决心，他们应当继续他们的准军事行动，但是他们不应当忘记服从他们唯一具有感召力、驱动力和社会关系的未来的领袖。同时，在更大范围内的其他政治家，尤其是焦利蒂，在制订他们的计划和政策时也应记得墨索里尼。墨索里尼必须用多种声音说话。同时，他还需要费心思索如何让当时还仍然是一种“运动”而不是一个政党的法西斯制度化，并且还需要解决它的财政问题。1920年10月，资产阶级报纸《费拉雷塞报》带着感情表达了当时许多自由派精英的感想，渴望一个“男人”来掌管这个国家：“如果出现这样一个人，他将使全国上下的意见统一起来。”墨索里尼必须确保自己成为这个得到最广泛认可的、有准备的、愿意并且有能力担任这一角色的人，而不是巴尔博或其他法西斯首领，假如是焦利蒂或其他一些老的政治家，那就更糟了。

墨索里尼的思想路线保持着灵活多变是有许多原因的。新年伊始，他发表了另外一篇有关经济自由化的专题论文。他这篇文章必须让那些愿意从经济上支持法西斯运动的工业家们听起来像美妙的音乐一样顺耳，而事实正是如此。他在文章里写到，意大利这个国家的发展是畸形的。他又引用明显不会错的经济自由理论说，国家拥有的每一个问题都是一场经济灾难。国家无疑需要处理许多事情，但是商业却不在其中。毫无疑问，法西斯代表的是如何巩固“政治的国家”，但是同时，它也支持逐渐地解散“经济国家”。他和他的支持者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也持欢迎态度。1921年1月，在里窝那的议会里，意大利共产党诞生了。其他许多

事件也证明，意大利左翼当时在法西斯的攻击下又陷入了新的犹豫和困惑中。共产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带着蔑视的态度讥讽墨索里尼的法西斯运动是由“猿人”组成的，只会“制造新闻，而不是制造历史”。但即使是他也无法隐瞒左翼的境况正在恶化这一事实。

农村的问题对于墨索里尼来说也值得一提。他解释说，法西斯真心地承诺，最终将让那些在土地上劳作的人获得土地。但是，任何旨在实现更大的社会公平的行动都是缓慢的，并且只有在全国上下意见一致、对经济不造成任何损害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同时，对农民社会主义的攻击必须继续下去，不是因为法西斯运动固有的暴力，而是“出于外科手术的需要”。墨索里尼虔诚地评论说，他在政治上永远都不应当放弃“骑士精神”。

焦利蒂号召在5月份举行选举，这才是关键问题。墨索里尼宣布，我们的运动“没有虚伪的温和”，并且要用“能够确保意大利人民的精神和物质上的伟大”的政策来“统治这个国家”。接着墨索里尼又解释说，法西斯将不会因循意识形态的教条：

“我们奢侈地允许自己既是贵族又是平民，既因循守旧又改革进取，既反动又革命，既接受规律和教条但又要根据时间、地点和环境等情况超越它们，总之，要根据我们所处的‘历史’环境来决定。”

焦利蒂自己绝对不会不喜欢墨索里尼这段话。这位总理当时已被新的“战后”世界的大众政治搞得晕头转向，此时他决定就一个松散的“国家集团”来赌一把，而这将使法西斯候选人大受欢迎。墨索里尼对此并没有提出异议，他用充满哲理的语言解释说：“对于那些不想在偏远的象牙塔里孤独地度过一生的人来说，生命需要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和一定的交易，或者干脆就用不好听的词来说：妥协。”他又补充说，不管怎样，这个因法西斯的出现而变得更加坚强的国家集团，很快就会踩着法西斯的步点节奏、带着法西斯的荣誉和辉煌前进。他们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焦利蒂了。对于墨索里尼这一绝妙的安排，无论是意大利中部的法西斯首领，还是边境法西斯中的民族主义者都再也没有什么担心的理由了。

而焦利蒂自己也很自信，他对斯福尔扎说，法西斯分子们只不过是“一捆爆竹：他们确实能制造出很大的噪音，但只会留下一团烟雾。”但事实证明焦利蒂的自信是不正确的，而他管理国家政治的日子也即将结束了。有一点是真实的，即已经发生分裂的社会党在选举中失去了他们在众议院中所占席位的20%。并且，在那之后，议会里的声音听起来让人感觉非常刺耳：议会中至少有35个法西斯分子（还好他们中有16个人都是律师）。这其中就有“贝尼托·墨索里尼教授”，并且，情况很快就变得明朗了，已经完全“转化”的墨索里尼并不像焦利蒂所希望的那样。刚一当选，墨索里尼就立即宣布法西斯将与对手联合组成议会中的极右派。墨索里尼希望传达的还不只是一个信息：他的法西斯分子仍然“趋向于共和

党”，并且不愿混同于永远缺乏民众基础的民族主义者联盟的成员——他们新的议会中只得到了10个席位。墨索里尼宣称，法西斯组成了“一个思想和行动上的贵族”，并且，他们携着光辉的荣誉，已经超越了受阶级所限的民族主义者；法西斯，并且只有法西斯，才是新右翼中的赢得胜利的运动。他又好斗地补充说，那些得意的资产阶级就像社会党一样也是法西斯运动的敌人。法西斯有着真正的大众基础，这也让它变得更加强大，他们已经为资产阶级准备好了“弹和火”。墨索里尼很快就强调，他不喜欢议会的所有东西，包括让议员们就座的方式，以及演讲中的装模作样。议员们都是安逸的绅士，议会充斥着“没用的闲聊”。如果设上一个论坛，让像他这样“坚强的人”能够响亮有力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可能还会好一点。法西斯正在挥动着无礼的大旗进入传统的国家权力的大厅。由于法西斯起源于“一战”中的退伍士兵，所以墨索里尼宣称他们在议会中的行为将会像“一个步调一致的、有组织有纪律的连队”一样，重于行动而不是空谈。如果旧的精英们打算敞开胸怀欢迎法西斯，那将是友好的态度。军装是不能脱下来的，用于在地毯上穿着的拖鞋（这个词后来常用于描述资产阶级的软弱，而同时代的人也注意到，墨索里尼总是像一个真正在工作的人那样穿着他的内衣睡觉，并且自己连一套睡衣也没有）现在则必须扔掉。

实际上，墨索里尼的地位根本没有他自己声称的那样坚强有力。以前，他经常批判首都罗马的腐化和邪恶，但等他自己当了议员之后（他当时还在接受议会中一些老领袖的资助，但这些人有时甚至还想不到他的名字怎么写），他也希望自己将来能够获得更多的优势和利益。他暂时住在一个雅致的旅馆里，并且已经开始偷偷地享受罗马的一些奢侈生活了。*在个人的恩怨中也夹杂着政治冲突，事实上，国会中新的法西斯议员，乃至整个法西斯运动的团结都是一时的，他们取得胜利之后，法西斯便陷入了危机。这个麻烦用了6个月才得以解决，而等到这一危机最终化解的时候，一个新的政党，事实上是一个新类型的政党在贝尼托·墨索里尼的领导下诞生了，而他则成为这个政党的唯一令人信服的领袖。

事实又一次证明，墨索里尼言辞上的极端和不妥协的态度代表的并不是他的全部意思，从他的字里行间还能读出其他意思。焦利蒂的政府在6月27日垮台了，虽然墨索里尼一直与焦利蒂保持着距离，但他并没有放弃为他的法西斯军团寻找新的朋友和盟友。当时，刚上任的新总理是温和派的伊万诺·博诺米，他在选举中为“年轻健康”的法西斯作出过贡献，并且对法西斯运动帮助民族精神“再生”的方式大加赞扬。但同时，他又敦促法西斯结束暴力行动。7月21日，在利古里

* 可能就在此时，他与安杰拉·库尔蒂的关系开始了，并且生下了一个女儿埃莱娜，这在后来“二战”中最黑暗的日子里给了墨索里尼一些安慰。

亚的萨尔扎纳，他的新政府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要对法西斯的过激行动进行约束，警察击退了一个来自托斯卡纳的法西斯小分队，他们原本是打算攻击当地的左翼人士的。通过这一行动，博诺米向社会表明，意大利国内的暴力程度已经让人无法容忍了，他的政府将奉行依法治国的政策，而他则愿意在法西斯和社会主义之间居中调和。

虽然在1914年10月之后墨索里尼仍发表了大量的言论，而法西斯在最近的几个月里也仍然有暴力行动，但墨索里尼却对博诺米政府的做法并未感到吃惊或者难以接受。事实上，在7月21日的事件发生之前两周，他已经感知到了风向的变化，并且已经在公开或者私下的场合谈到要明智地与社会党签订一个“和平协议”了。在萨尔扎纳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法西斯全国委员会在罗马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墨索里尼自己的路线却非常清楚。在当时，法西斯的暴力至少可以说是太过火了。正如7月24日他在自己的报纸上发表的社论中所说的那样，太多后来加入法西斯运动的人都用一种个人的、愤世嫉俗的态度来理解法西斯运动，从而把它变成了一个“为了暴力而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组织”。需要肃清这些被误导的新加入者，而那些留在法西斯组织内的成员则必须接受它的纪律，而他所认为的纪律，就是在任何事情上都要听命于领导，并根据他的意志行事。

许多法西斯分子都对墨索里尼在政治路线上的突然转变感到震惊，这中间就有罗伯托·法里纳奇。他此时已经是克雷莫纳的一个霸主了，曾在下议院的洗手间里把一个先前反对意大利参加“一战”的共产党代表痛打了一顿。他后来成为法西斯政权中一个主要人物，并且从未否认过墨索里尼的影响。无论在当时还是之后，法里纳奇的不妥协态度都是最强硬的，并且为自己有与领袖相同或相近的权力而感到非常得意。7月23日，因为不愿意与“布尔什维克”做交易，他干脆辞去了在全国委员会内的职务。在支持他的人中，有经济学家马费奥·潘塔莱奥尼。他还在《意大利生活》上全面地谴责了那些打算与“尼蒂这样的社会强盗”谈判的人，认为这种行为是对那些聚集在法西斯旗帜下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们的理想的背叛。此时，墨索里尼在报纸上发表的观点也反映出他思想上的困惑，他是否已经陷入了犹太人邪恶影响的折磨？那些真正信仰法西斯的人好像很难把这个“和解协议”与他们的信条联系起来，他们喜欢详细地描述自己的“远征”行动，说正是在一种神圣意志的支撑下才进行了这些行动，并且一种深刻的类似宗教的感觉让他们精神倍增。

事情发展得很快。8月2日，法西斯与社会党及其所属的工会组织“意大利总工会”之间签订了一份协议。这份协议表明法西斯的路线发生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这在法西斯组织内部引发了极大的恐慌，但墨索里尼第二天在《意大利人民报》上发表的言论却显示出他在这一恐慌面前泰然自若。他写到，协议签订了，

它已经成为了“历史”。它保证了国家的安全，而国家必须能够控制各种“派别”。另外，对社会和平的承诺让法西斯在其他工作上有着“无限的”空间去发挥（出于谨慎，墨索里尼并没有对此作详细说明）。不管怎样，墨索里尼的语气变得自私起来了。“如果法西斯不追随我，那么没有人能强迫我去追随法西斯。”他又用毫不妥协的口气说：

“一个创立、领导一个运动并为之付出全部精力的人，有权对几千起在各地发生的事件进行分析，并进而对整个政治和道德全景进行一个全面的综合。他有权站在山颠去俯视整个地平线和观察世界，这个世界既不是博洛尼亚，也不是威尼斯和库内奥，而是意大利、欧洲和全世界。”

他暗示，没有一个真正的全国性的领导人，法西斯是无法生存并发展繁荣的。

墨索里尼之所以大胆声称自己对于法西斯是必不可少的，是为了阻止那些打算拒绝他的路线的人。但在当时，他还没有成功。当时在哲学上著名的“新民族主义之父”恩里科·科拉迪尼虽然承认与过去几个月相比，“这些法西斯”已经有了“心理学”上的价值，但他同时又敦促说，意大利最根本的“问题”仍然是怎样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法西斯的年轻和他们得自战争的遗产让他们成了一种“民兵”。然而，暴力毕竟与政治不同。国家政府必须要掌握国家的命运，也要镇压社会党人。他继续严肃地说道，同时，情况已经因“和平协定”而变得更糟糕了，因为它把那些能够成为这个国家化身的人和那些不能成为国家化身的人之间的争论转变成了一个“运动会”，就看双方高兴不高兴参加这个运动会了。

在法西斯运动内部也有类似的观点。博洛尼亚的格兰迪和威尼斯的彼得罗·马尔西克就大喊大叫地对墨索里尼发动了攻击。彼得罗·马尔西克是一个左翼的支持参战分子，他自己在威尼斯当地奉行的政治路线也是摇摆不定。但关键的问题还是权威正在不断增长的朱塞佩·沃尔皮，他是一个商人，有时有点倾向于焦利蒂。在战争期间，他还与德国的银行业过从甚密，这对一个民族主义者而言是非常危险的。沃尔皮刚刚被民主派的殖民地部长任命为的黎波里塔尼亚的总督，这位名叫乔瓦尼·阿门多拉的殖民地部长后来成为法西斯政权的财政部长，是“米苏拉塔伯爵”、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的领导、得到承认的威尼斯“总督”，并且是一个被墨索里尼高兴地称为“朋友”的人。沃尔皮是一个政治上很圆滑的人，与他发生的争论让马尔西克努力地让自己去代表一种纯粹的法西斯极端主义，他甚至大胆地宣称：“我们让法西斯运动成为墨索里尼的牺牲品”。格兰迪也绝不是一个值得推崇的法西斯民兵，但是，他的确很有野心，也很有能力，能够拿得出手。虽然年轻（他生于1895年），但已经在想象着干一番杰出的大事业了。对他来说，现在正是宣布艾米利亚是法西斯运动的真正的“摇篮”的好时机，这样就可以用一种奢华的米兰难以仿效的方式来让自己获得信任了。8月16日，格兰迪在博洛尼亚组织反对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分子召开了一次会议，许多地位微贱的法西斯成

员趁机对此表示支持，比如来自托斯卡纳的年轻人马里奥·皮亚泽西。他非常希望能够掌握佛罗伦萨的领导权，拒绝与“野兽般的”社会党人做任何交易。

这种在小范围内对半无政府主义状态的狂热的喜欢有点脱离了维护国家的伟大和团结的美好理想。皮亚泽西喜欢佛罗伦萨是因为他非常轻视罗马——他要辞去在“战斗的法西斯蒂”执行委员会内的职务，但被墨索里尼在8月18日搁置了。他在辞呈中写到，“和平协议”已经在农村造成了失控的状态，他已经难以应付了。他说，他只想成为一个“米兰法西斯运动的简单的追随者”。法西斯运动不需要他的“感召力”，并且事实上，他的一些法西斯同事已经准备好不再信任和重视他了。

墨索里尼的退却只是一个战术策略。协议签订不到一周，他就在强调自己为法西斯生存所作出的贡献了，说自己使法西斯避免了来自左翼和右翼的敌人的攻击。他还敦促说，现在是把法西斯运动改造成为一个有完全组织性和纪律性的政党的时候了，并且可以让它在“灵魂”和“运动”上都有极大的发展。在之后的3个月里，他稳步地巩固了自己在这个新近完成了体系化的组织内的地位。

11月初的时候，他已经准备表明自己的“回归”了。他在罗马召集了一个党代表大会，但罗马只是国家政治权力的一个象征性的首都，当地的法西斯势力还很弱（通过另外一次被广为宣传的决斗——芬齐当时是他的随从，墨索里尼从心理上淡化了这一事件）。当罗马会议开幕时，只有1/3的代表是他的可靠支持者。然而，墨索里尼事先已经对格兰迪进行了试探，他非常了解格兰迪，已经为他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第二年1月份将要出版一份新的理论刊物《等级制度》，他让格兰迪到那儿去当编辑，这份刊物可能是由玛格丽塔·萨尔法蒂资助的。这让人们以为墨索里尼是在为保证格兰迪这个年轻人的前途着想。在大会的进程中，法西斯头目们没有能够团结一致并形成统一的政策。直到11月8日，墨索里尼、格兰迪和马尔西克才在与会代表们的欢呼声中拥抱在了一起（但是，威尼斯的法西斯没有被收买，同时在法西斯运动中也没有了前途，他们还与格兰迪发生了争吵，后来在第二年的2月份退出了法西斯党）。墨索里尼为实现党内公开的一致而付出的代价是放弃了“和平协议”，但他还是很讲策略，在一周之后才公布了这件事。在他看来，付出这个代价是值得的，它淡化了法西斯运动内部及其领导人之间的冲突，使冲突不再那么表面化了。从多方面的意义来讲，墨索里尼都已经赢得了对其他法西斯头目的最后胜利。法西斯运动不能没有它的领袖，而墨索里尼现在可以确认，自己的地位已经极大地超出了党内的任何竞争者，虽然他从未丢弃对他们的怀疑。法西斯党员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些随从，相比之下，他们更需要墨索里尼，而不是墨索里尼更需要他们。

在墨索里尼相对比较退缩的几个月中，他继续为正在形成的法西斯党寻找一个完美的思想理念，他的思想也在更广的范围内延伸。法西斯必须反映出这个民族的“原始性”和永恒性，在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面前，个人只是“短暂的生命”。

国家必须为民族服务，法西斯将使民族“恢复”，就像法西斯坚决地捍卫第一世界大战的遗产一样。目前，党对未来建立一个君主制政体还是一个共和制政体这一问题还不清楚，但是它想建立一个与议会平级的国家技术委员会，这将是一个服务于实际而不是口头的机构。移民也应该有投票权。就经济而言，应该把生产放在第一位。有时可能也需要国家来对工业进行保护，但墨索里尼当时正在想努力加强与商业和金融业的关系，所以他对罗马的听众强调说，“就经济而言，我们是自由党人，因为我们相信国家的经济不能托付给一个集体性的组织，或者一个政府性和官僚性的组织。”

毫无疑问，目前真正的答案还存在于党内。如果法西斯能够赢得斗争，那么纪律必须要占有统治地位。在“战后”的各种环境中，借用军事的和战斗性的词汇都是非常自然的，也成了一种习俗。这种全盘军事化的做法遭到了其他党派的反对者的嘲笑。12月，在对议会发表的一次演讲中，墨索里尼对这些反对者进行了谴责。为了保证自己对法西斯的指挥权，墨索里尼想尽办法把自己的副手都换成了愿意听从自己的可靠的人。接替太过独立的帕塞拉而成为法西斯党书记的是米凯莱·比安基，他是墨索里尼以前在《前进报》时的同事，也是墨索里尼的一个长期的崇拜者。8月份时，墨索里尼已经指示让他研究发展出一种明确的法西斯哲学了（一种不太复杂和没有什么争议性的哲学）。墨索里尼夸耀地说，那些“理解他们的事业并为之进行战斗的士兵们一向是最好的”。在比安基之下有3个副书记：阿基列·斯塔拉切、阿蒂利奥·泰鲁齐*和朱塞佩·巴斯蒂亚尼尼，他们后来都在法西斯独裁政权中长期任职。接触过斯塔拉切和泰鲁齐的人都不怎么喜欢他们，包括其他属于墨索里尼的人。法西斯党的管家是乔瓦尼·马里内利，他是一个既有官僚效率又有能力管理墨索里尼个人财务的人。据说他是一个胆小的人，患有抑郁症，并且生活腐化（1944年得到了证实）。**除了墨索里尼自己以外，在法西斯党高层里任职的议会议员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已经驯服于墨索里尼的格兰迪。这样，法西斯党的领导班子组成了。

同样，他们还创立了一种新的管理方法。法西斯小分队都划归各地的法西斯党分部管理，但要接受一个巡视将军的检阅。法西斯的妇女组织——有9个妇女参加了当年的圣墓广场会议，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种妇女法西斯主义并没有被取消——受到的控制更为严格。早期的法西斯妇女分子倾向于把她们的女权运动与墨索里尼的事业联系在一起，但是，在1921年底的时候，这些妇女组织开始

* 墨索里尼后来解除了他的职务，称他是“我的弱点”，一个没有什么思想的人。

——作者注

** 一个同事还记得他又矮又胖，爱出汗，并且眼睛斜视。

——作者注

明显地对妇女自由表示怀疑了。在意大利的大学里，中产阶级出身的学生的组织也很有势力，法西斯主义也在其中普遍流行。新的法西斯党在博洛尼亚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法西斯大学联盟，试图对这些大学里的组织也加以管理。

对于这一组织结构的功效已经有许多评论，但仍存在相当大的争议。例如，历史学家埃米利奥·真蒂莱认为新的加强了纪律约束的法西斯运动具有了军事化、神秘性和宗教的特点，与其他竞争者已经完全不同了。他说，法西斯主义代表了“一种新的精神状态”。他的追随者都是真正的“政治宗教”的信徒，都是法西斯“礼拜仪式”的老手，都是决心要让大众民族主义化或者法西斯化的人。正如一个法西斯党员所说的那样，他的武器是：

“法西斯真诚而不可分割的拥护者……不仅仅是女人，女人总是说得太多而做得少……勃朗宁手枪是法西斯唯一像喜欢肉欲一样喜欢的东西。当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忠诚于法西斯的时候，勃朗宁手枪是唯一永远忠诚于法西斯的东西。并且，有它也就足够了。”

毕竟，“战争对于我们来说永远都不会结束。我们只是用内部的敌人取代了外部的敌人而已。”

然而，在日常的政治生活中，这种态度是很难坚持不变的，特别是当政权建立之后，需要更为单一的管理。事实上，即使是在1921年至1922年间，也有理由怀疑法西斯分子的灵魂是否真的法西斯化了。在当时和以后，有太多的法西斯分子在他们奉为神圣的法西斯主义中为利己主义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并且有时还夹杂着自我怀疑。墨索里尼是最不轻信意大利的各种精神的人，像看待其他精神一样，他更愿意用一种现实的而不是神化的方式来看待法西斯主义。

然而，针对左翼人士和外国人的准军事行动仍然存在。博诺米政府发现，自己的战略也随着“和平协议”的破裂而失败了，并且已经无法挽回。同时，一场经济危机也发生了，而意大利国家银行的倒闭更是雪上加霜地让危机进一步恶化了。于是，新年之初，备受困扰的博诺米辞职了。2月26日，另一个联合政府接管了意大利，为首的是来自皮埃蒙特的路易吉·法克塔，他曾是焦利蒂的下属。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一个看守政府，官方曾在萨尔扎纳实行的强硬政策现在已经变成了人们脑海中的回忆。到了1922年的夏天，法西斯小分队又开始了他们的暴力活动，并且官员、警察和军队却没有出来阻拦他们。7月末，伊塔洛·巴尔博领导了一次谢尔曼*式的进军，他们穿过墨索里尼的家乡，从里米尼到圣阿坎洁洛，再

* 谢尔曼（1820~1891），美国联邦军将军。他在被任命为美国联邦军西路军总司令（1864年）后攻占了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1864年），并进行了一次破坏性的进军，一直打到大西洋沿岸，有效地把南部邦联分割成了两半。

到萨维利亚诺、切塞纳和贝尔蒂诺罗，“破坏和焚毁所有赤党的住宅和以及他们集会的场所”。他在日记中夸耀地写道：“这是一个恐怖之夜，我们的队伍举着火把，天空中飘着一柱柱烟雾，从整个罗马涅平原一直到山顶都成了被激怒的、急于复仇的法西斯征服的对象，他们决心让赤党的恐怖永远地结束。”当然，巴尔博也承认，左翼也进行了一些软弱无力的抵抗。*到了秋季，法西斯分子们在特伦蒂诺和阿尔托—阿迪杰也开始这么做了，任何反对全面法西斯化的人都遭受了同样的后果，而对于这些法西斯分子的暴行，政府仍然是袖手旁观不加制止。

到了9月，法西斯小分队已经到达了特尔尼和奇维塔韦基亚，离罗马只有一步之遥，对首都罗马发动进攻好像已经迫在眉睫了。即使是在法西斯组织内部，巴尔博、法里纳奇甚至比安基也非常迫切地想采取行动。当时，法西斯已经控制了意大利的很多地区，正如一个法西斯分子后来所说，攻占罗马并掌握国家权力只是一个“在发生前就已经有的事实”。那么怎么样才能把法西斯在“真正的意大利”取得的胜利转变成为一种对“合法的意大利”的国家权力的占领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先了解墨索里尼对这些不断增长的、来自“下面”的迫切要求的反应。1921年11月达成的交易表明，各省的法西斯分子仍然把墨索里尼奉为他们的领袖。但对于墨索里尼来说，光是这种敬意还不够，他想要的是追随者们义无反顾的尊重和献身。1922年9月，一个曾是未来主义者的记者埃米利奥·塞蒂梅利发表的一篇文章说出了墨索里尼这位法西斯领袖正在期待的新论调。在这篇文章中，用来描述墨索里尼的语言非常高调（尽管它还没有达到法西斯夺取政权之后对墨索里尼进行描述的那种热情的强度）。塞蒂梅利在文章里说，墨索里尼象征着一种“不可思议的惊人变化的力量”，他眼角的皱纹可能真的暗示着他“对讽刺的微妙感觉”，你还可以想象他是在笑，而他的脸则永远都是与众不同的。同样，他的步态也是如此迅速、匆忙，甚至显得有些心烦意乱，这也反映出他思想的深邃和对重新振兴意大利所作出的承诺。此时的墨索里尼是一个正在转变为上帝的人，至少，塞蒂梅利在文章中描述的墨索里尼是这样的。

然而，一个真实的世界仍然存在，而法西斯小分队的行动有时显得太过头了。即使是在法西斯当政时出版的巴尔博的日记中，作者也回忆说，墨索里尼曾在1922年的夏天劝阻他行动不要过于鲁莽和草率。在那段时间，又有谣言说在墨索里尼和那些态度更为极端的法西斯诸侯们之间可能再次发生分裂。如果墨索里尼打算消灭这种潜在的冲突，他就必须保持与官方权力中心的联系。事实上，与国家权力中心之间的联系在继续强化着墨索里尼作为领袖的感召力。在他的文章、

* 在这次突袭之后，为了显示自己的男子汉气概，巴尔博半夜里在安科纳附近勇敢地进行了一次裸泳。

演讲和行动中，墨索里尼都需要完全清楚地表明他才是法西斯运动中最举足轻重的人，一个理解罗马、意大利、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人。如果他的理解出现了错误，如果他是一个傻瓜或者笨蛋，那么他就会失信于意大利所有的法西斯以及那些目前还在统治着意大利的精英们。在他参与的每一场政治角逐中，他都必须赢得胜利。

因此，在就许多问题表达自己的观点的时候，他所采用的方式都必须是既尖锐而“革命”的，同时又能够为日后妥协和进行可能的谈判留有余地。1月22日，教皇本尼迪克特十五世去世了。他是一个善于妥协的人，曾经因为对意大利参加“一战”表示怀疑而支持右翼。墨索里尼以前曾是一个反教权主义者，而法西斯分子，特别是那些极端的法西斯分子，最近也多次与信众发生表面化的冲突。特别是克雷莫纳的法里纳奇，他是一个强烈反对神职人员的保守派，对神职人员干预民众事务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但是，本尼迪克特的去世促使墨索里尼赋予了教皇这一罗马遗产以哲学上的合理性，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以此来提醒教会：他们之间是可以成为朋友的。只要能够重新控制住法里纳奇和他的朋友，教皇就可能容忍法西斯“好的一面”，而墨索里尼也就可以从中受益了。当时的新教皇是米兰原来的大主教阿基列·拉蒂，被称为“庇护十一世”。他出身于伦巴第一个地主家庭，真心地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及其所有行动。他也是一个独断专横的人，但很快却被教皇的宣传家们赞颂为热爱“纪律和工作”，所有这些赞美之辞都是比照墨索里尼的性格给出的。墨索里尼也注意到了这种对比，同时也注意到了新教皇的华丽衣饰。教皇拥有的永恒而无限的感召力让墨索里尼认识到，法西斯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说起来可能有些让人感到吃惊，但罗马教廷的确开始用一种积极而肯定的态度来看待墨索里尼了。

当然，对外交事务的评论还得继续。在对这些事情进行类似专家性的分析时，《等级制度》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工具。1922年3月，墨索里尼觉得能够从繁杂的国内事务中抽出些时间了，于是他前往德国去了解了一下那里的实际情况。在德国，他拜会了很多人，其中就有瓦尔特·拉特瑙。这位德国犹太裔政治家在几个月之后被德国右翼暗杀了，在谈及此事时，墨索里尼声称他早就预料到了瓦尔特·拉特瑙的命运，但他这种说法没有太多根据。在这种形势下，墨索里尼并没有显示出任何潜在的反犹太主义倾向，相反，他还极力地声称意大利的法西斯运动与极端的德国右翼的血腥复仇不存在任何共同之处。同时，他还表示自己深信魏玛共和体系“从历史上讲，对于德国人民的灵魂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他还说，作为一个旅游者，他发现德国剧院的质量非常差，并且从建筑上来讲，与位于罗马蒙

^{*} 1922年9月，他把主要的天主教代表及工会主义者圭多·米廖利驱逐出了克雷莫纳。

特西托利奥广场的意大利国会大厦相比，德国的国会大厦更小并且更加丑陋。此时，从许多方面来讲，他的文章都在显示他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人物了。

从德国回到意大利之后，墨索里尼继续留意着国际形势以寻找着有利之机（他过去惯常的不顾后果的勇猛好斗仍然没有什么改变，他又进行了一场决斗，并且重伤了对手）*。在外交方面，他敦促说意大利应当更加明确地采取自立的立场，从而向其他国家——比如英国——显示，意大利不是只会生产冰激凌。他又借用民族主义者的话说，“意大利已经成年，不应当再被当做一个孩子来看待。”相反，奥地利倒是需要意大利的支持，土耳其的凯末尔·阿塔蒂尔克政权也需要意大利来支持，意大利人必须在土耳其反对“希腊帝国主义的未经认可的妄自尊大”。他不停地就一个又一个问题发表评论，而《意大利人民报》的读者以及整个意大利政治界都被告知要对这位法西斯领袖渊博的知识和广泛的涉猎表示崇拜。

最为重要的是，国内还有一些上层人物需要墨索里尼去迎合，不管他是发自内心还是迫于压力。1922年2月，“领袖”一词还没有被完全神圣化，而墨索里尼自己在恭维工业家吉诺·奥里韦蒂时也称他为领袖。但是，墨索里尼言辞中真正的目标却是其他政治家。在政界里，墨索里尼日益变得更加沉着，潜在地也变得更加无情。法克塔政府接替了以前的软弱政府，但是他的政府也是同样地软弱无力，政府虽然发生了更替，但那些政界中的“大腕”们却仍旧是“一战”中统治国家的那些人。有许多证据可以证明，意大利社会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冲突，而墨索里尼也高兴地认识到，只要一个领导人登上了顶峰，他就能待在那儿或者差不多的位置。1922年的夏天，到处都有谣言说萨兰德拉或者奥兰多甚至焦利蒂都在打算东山再起。当这些旧的领导人听到这些谣言时，他们便开始养精蓄锐加紧准备，并强化了他们的战略，以便在公认的敌人尚未成气候时打败他们。对于萨兰德拉这个最接近右翼的人，墨索里尼采取了礼貌而谨慎的态度，他的策略是通过中间人居中调解，最后换来的结果是，萨兰德拉这位前总理在9月份宣布，他认为自己是一个“荣誉法西斯”。对于奥兰多，墨索里尼于7月份与其进行了公开的接触。虽然不久之前，这位来自西西里的领导人还谈到，如果他组成新政府，将会让墨索里尼出任外交部长，但是他们之间的谈判最终还是失败了。毫无疑问，意大利的政界当时正在消化这个来自普雷达皮奥的男孩已经赢得的声望。墨索里尼能否成为一个未来的“大腕”，或者说他能否最终成为国家的领袖，还需拭目以待。

最关键的对话者还是焦利蒂。虽然年事已高，但他仍然认为自己是正在等待着挽救这个国家的人，因此也被墨索里尼认为是对自己最具威胁的竞争对手。10

* 大约6周之后，他又与记者马里奥·米西罗利进行了一场著名的长达40分钟的决斗，一直打到米西罗利无力再决斗下去才结束，并且决斗的双方最后并未达成和解。

月初，墨索里尼还对一位朋友说，“要么我们现在吃掉他，否则他和他的朋友将来就会吃掉我们。”虽然已经下定决心让焦利蒂出局，但墨索里尼还是热情地通过中间人表达了自己希望让这位老自由党人重新掌权的愿望，尤其是当焦利蒂可以防止诡计多端的奥兰多掌权的时候更是如此。墨索里尼的政治伎俩是如此丰富，而且他的厚颜无耻又是如此不加掩饰，正如民族主义者路易吉·费德佐尼（墨索里尼当时也在和他进行着微妙的谈判）所说的那样，他的讨价还价能力可以与焦利蒂相提并论了。他还总结说，墨索里尼有胜过这些老政治家的潜力。

在这之后就有了法西斯进军罗马的背景，法西斯政权后来喜欢称之为“法西斯革命”。10月24日，法西斯党在那不勒斯召开了一次会议——其他地方的法西斯运动的发展并没有在南部造成太大的影响。各地的诸侯们都急切地敦促进军罗马，到了10月28日的早晨，他们已经在对武装支持者进行动员了。在此前的几个月里，墨索里尼有好几次都差点发动法西斯式的突然袭击。9月份，他更是直率地说：“我们的运动目的很简单，就是想统治意大利。”尽管这样，他还是在谈话中就民众的不成熟进行了评论，*这种感情能够很容易地引起农村的法西斯分子和意大利普通民众的共鸣。

在那不勒斯期间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墨索里尼并没有反对那些不停纠缠的地方诸侯们。但是，他已经很清楚地表明，对局势进行控制是他的职责，但是这种控制是在政界而不是在社会中才最为有效。后来，法西斯政权急切地想为进军罗马冠以一个革命的称号，但在1922年的10月，通过谈判促使政府发生变化至少和赤裸裸的暴力威胁所起的作用是等同的。在高层政治的舞台上，除了政治家以外，军队和君主也是应当被考虑在内的两股势力。10月14日，他向军队中为首的将军彼得罗·巴多利奥（尽管他因为卡波雷托惨败而声名狼藉）发出了警告，因为有谣言说他敦促对法西斯分子采取军事行动。虽然墨索里尼认为他的法西斯党和国家军队有很多共同利益，因此永远也不会真正地发生冲突，但是他还是在文章中写道，任何这样的举动，都将导致“大规模的屠杀”。那么著名的“国王士兵”——维克托·伊曼纽尔的情况怎么样呢？对他来说，最好是暗示他的堂兄弟奥斯塔公爵——一个比他更高更好的士兵——能够成为一个更加有男子汉气概的国王。国王与其他人一样也有自己的弱点，因此也能够被压服、威逼和敲诈，从而被迫接受由法西斯分子来控制政府。

法西斯的这套规则竟然非常管用。但即使这样，法西斯分子的武器装备还是非常差，开始下起的秋雨以及缺少好的地图都能轻易让他们惊慌失措。他们组织

* 他说，民众的不成熟让他和他的法西斯党已经更加明确地与社会党和民主党对于1789年时的原则的“怪异”热情彻底断绝关系了。

了一次从佩鲁贾和其他城市中心向罗马的进军，在这期间，墨索里尼故意卖弄似地待在自己位于米兰的据点里。并且，他还公开上剧院看戏并连续3天断开电话线，以此来显示他不会受到任何事情的滋扰。那些主要的政治家们相互观察着别人的动向，却无法实现团结一致。萨兰德拉、奥兰多和焦利蒂都在期待着能够回到总理的位置上去，但从内心里讲，他们每个人都宁可把总理的位子让给年轻的墨索里尼，也不愿意给另外两个讨厌的老竞争对手。军队的首领们也不可思议地向国王建议说，他们的军队是忠诚的，但是最好不要试图来检验这种忠诚。梵蒂冈也不愿意插手此事。法克塔也因为宣布战争戒严令而把形势搞得更糟了。10月29日的早上，墨索里尼接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电话，授权他组成一个联合政府。他的态度也非常强硬：他将“穿着黑衫作为一个法西斯主义者”进入首都罗马，他有30万“有组织并且忠诚于自己的命令”的法西斯分子的支持。他并不着急，有人建议他租用一辆专列去罗马，被他以勤俭为由谦恭地谢绝了。晚上8点半，他登上了米兰开往罗马的直达快速列车，14个小时之后到达了罗马。在那里，一些全身泥泞的法西斯分子正在为他们的胜利组织游行，并且在罗马到处寻找工人聚居区进行破坏以发泄心中的怒气。10月31日，年仅三十九岁的墨索里尼宣誓成为了意大利最年轻的总理。意大利的绝大多数人，包括法西斯的政敌们也都对此表示欢迎。但是，墨索里尼年轻时代的朋友、历史学家兼记者加埃塔诺·萨尔韦米尼却在10月29日给巴黎的一个朋友的信中写到，他的国家“正处于疯狂的边缘”。而玛格丽塔·萨尔法蒂则更加宽容地猜测说，她的情人和他的法西斯现在正在“恢复意大利人民的风格”。他们两个说的都不是完全错误的。

3 政府

墨索里尼来到了罗马。据说，在等待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前来委托他组阁的时候，他宣布：“陛下，我把维托里奥威尼托的意大利给您带来了。”*尽管后来法西斯政权的宣传家们以及墨索里尼自己又多次谈到此事，但实际上这纯属子虚乌有。墨索里尼私下里就曾嘲讽地说：“这就跟学校给学生们开会时说的那些垃圾一样。”扬·克肖认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塑造了希特勒，但这种方式并不适用于墨索里尼。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元首希特勒很可能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墨索里尼则不同，他在1914年以前就已经有了很高的声望。如果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忽略掉，那么可以把墨索里尼看成是一个追求意识形态或者政治生涯的人。但是，意大利所打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很特殊，并且的确在1922年10月底的时候对政府产生了影响。法西斯和他们的领袖可以从很多方面代表意大利。例如，在1915年之后，当自由主义者把火炬传给民族主义者的时候，在那些统治精英们的心中的确存在没有释放出来的帝国主义野心。新一代人也打算下决心改变意大利“列强中最弱的一个”的地位。法西斯的外交政策可能最终走上让自由主义者们黯然失色的纵容侵略的道路，同时也会让自由主义者的野心转化为法西斯的野心，不管是对埃塞俄比亚，还是在“我们的海”（在1918年以前，意大利人就这么称呼地中海了）、巴尔干半岛、东地中海以及利比亚。更为重要的是，法西斯表现出了一种新的残忍和兽行，一种男子的杀戮和残害的欲望，对成为杀人机器的一种渴望，残忍的“同事之谊”，所有这些特点和态度构成了一种新的原始的野蛮，而这种原始的野蛮集中体现在了德国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在法西斯崛起的过程中，墨索里尼自己也从未远离过暴力，他曾进行过多次最为粗暴并且结局惨痛的决斗，也对别人进行过侮辱性的掌击、强灌过别人蓖麻油、放火烧毁过一家报馆或者农

* 在一份给博纳尔·劳和普安卡雷的官方信件中，墨索里尼宣布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已经认可他是“维托里奥威尼托背后的民族理想主义”的代表。

民开会的地方、买卖过枪支和炸弹，还曾穿着法西斯小分队的制服进行过摩托化的武装进军，并且杀害过一个自己的敌人。

好像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这一特点，就在进军罗马的前夕，墨索里尼任命阿尔比诺·沃尔皮为自己的私人保镖或者叫打手。此人是一个擅长杀人的屠夫，是后来暗杀马泰奥蒂的凶手之一。在墨索里尼及其随从以及众多的追随者们看来，正是公开允许暴力以及认可施暴者的作用才让一个男人真正成为了男人。到达罗马之后，墨索里尼还给弟弟阿纳尔多打了个电话，告诉他取得了胜利，并谦恭地对命运的垂青以及尽责的弟弟为他祈求神灵的保佑表示感激。从那之后，他就有意炫耀似地经常跑到一个很雅致的地方与上流人士们一起喝咖啡。他可能是征求并接受了玛格丽塔·萨尔法蒂的建议，很快就融入了首都罗马的各种社会和艺术沙龙之中（他很快就为参加一个展览的人喝彩，并宣称：“没有艺术和艺术家，你就无法统治这个国家。”），而萨尔法蒂对他的爱也让他备感安慰。一个同时代的人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墨索里尼没有任何被法律控制和约束的感觉，但是这位新总理却喜欢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坚强的人，“一个不善交际的动物”^{*}。年轻的时候，墨索里尼就表示他对马克思和达尔文两个人的思想都很感兴趣。到了1922年的时候，达尔文的哲学在他的思想中已经占据了统治地位。与其他许多人一样，他信奉的也是一种更加极端的达尔文主义。一次又一次，墨索里尼都可以证明自己是最适合这个世界的“适者”，但是他取得的胜利从来都不是很甜美。他也在担心，他这次的最后一搏所取得的胜利又是短暂的，如果是这样，那后果就太可怕了。贝尼托·墨索里尼现在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理查三世一样，正在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当然也应当承担这一赌注所带来的风险，并且他一直相信，命运必将在某个地方、某一时间并以某种方式与他为敌。

当代的文化和历史学家们都喜欢充满热情而浓墨重彩地描述“极具吸引力的法西斯主义”，另一方面，对法西斯分子及其领袖心中的怨恨却写得含混晦涩。许多法西斯分子只不过是意大利复兴时期自由党人的后代，但他们是一群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有着痛苦经历的人，他们注定难以再次获得“美好时期”时社会中的富裕阶层才能享受到的“舒适”了。在父辈们的言谈中，一个美好而友善的世界将最终出现并扩展到所有社会。当时法西斯中也出现了雅皮士，他们自己也渴望生活能够过得安逸自由一些。但墨索里尼和他的政权被人们认为是开创了一个动员的时代——征召、进军、战斗，从来没有失去他们的威胁和恐吓，并且永远都为下一场冲突和检验做好了准备。当法西斯开始统治这个国家的时候，他们发现，在他们的保护下意大利中的“秩序”恢复似乎有些操之过急，甚至是有些

^{*} 他是在写给容易受感动的博塔伊的信中这么讲的。

狂热，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他们通过努力取得的所有胜利一下子就会变成很虚幻和不确定的东西，就像在维托里奥威尼托的经历一样，那将是一件具有讽刺意味的事。

法西斯在夺取国家权力的过程中死了2000多人（官方公布的进军罗马时的死亡数字是3个人），这个数字与20世纪即将发生的可怕事件所造成的死亡人数相比并不算高，但在当时却已经是一个很高昂的代价了。过去两年里发生的伤亡，以及取得政权所用的含混手段——一半是通过政变，一半是人为的操纵——都急切地需要新的政府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那么，已经成为总理的墨索里尼有什么样的打算呢？这个问题根本没有明确的答案。他是一个政治家，虽然年轻，但却沿着一条曲折的道路最终走上了权力的殿堂。他已经写（说）了许多——1922年10月前，标准版本总计36卷的《墨索里尼全集》已经出版了18卷。但是，他并没有写出一本政治哲学方面的著作，更没有什么能与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或者《希特勒秘著》相比的作品（虽然历史学家们对于这些作品在1933年之后对于希特勒的事业的影响以及书中的理念的来源还存在争议）。也许法西斯的小分队已经在为法西斯运动添加神秘的一面了，而法西斯成员们也已经接受了一种法西斯精神。他们也许会因为法西斯的各种仪式而真心感动和精神振奋。然而，墨索里尼自己却仍然是一个最缺乏神秘色彩的人。巴尔博在他的日记中写到，10月6日，当他们在米兰见面时，领袖让他们的灵魂“和谐地震动”，并且他对未来的预测是如此清晰，真是让人佩服之至。然而，关于对未来的预测的细节，巴尔博却只字未提。相反，其他具有批判眼光的同时代的人则注意到，墨索里尼的观点经常摇摆不定，并且总是避免进行深入的讨论，有时还为自己找借口说，细节问题应该留给专家们去讨论。他们看清楚了，面前这位领导人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更感兴趣，却不喜欢就自己的态度或者政策进行协调。这个政治家更感兴趣的不是真正知道什么，而是让别人看起来自己知道什么。

墨索里尼很快就形成了自己的执政风格，这种风格多少带有一些古时的风格，也反映出他对责任和权力的看法。整个执政期间，他用一枝钢笔、黑墨水和坚强的手把自己几乎所有的演说和少数的信件及电报都写了出来。他从未忘记自己当年还是社会党党员时取得的经验，即复杂的问题可以分步骤来理解。他简单地列举出了他认为需要采取行动的事项，这种简单的“顺序”体现出一种军事化的风格，适合于一个领导军事政权的独裁者。一个同时代的人认为，墨索里尼是用当年管理《意大利人民报》的方法来统治意大利的。他是主编，而他的部长们就像是副主编，他自己的任务是确定总的基调并精心拟定大标题。墨索里尼喜欢自夸说他的生活非常精确有序，实际情况也确实是这样。当时，墨索里尼的日常生活总是被没完没了的来访者打断，并且，这些人的访问很少能在15分钟内就结束。为此，墨索里尼在他的办公桌上放了一只小时钟，这样就能让来访者看清楚时间

在时钟的滴答声中一分一秒地过去。他有时也接见一些重要的部长和官员，但普通的法西斯分子或者外国人却很少能见到他的面，相反，如果是在罗马度过一些快乐的时光，那他从来都不吝惜时间。

对于意大利人更是如此，必须是有名望的人才能见到这位领袖，并且还要承诺拥护墨索里尼并有可能提供一定的财力支持。而墨索里尼在大多数时间里看起来很高兴接受这些访问，并且总是要表现出对来访者的生活和信仰非常了解的样子。这是一个繁重而费力的任务，但是事实证明墨索里尼能够胜任。但是有时候，他的“知识”的肤浅也让他难以用他的简洁方式来驾驭更为重大的政府事务。已经有很多作品从领导人的角色方面对墨索里尼进行了刻画，并且预示了一个世界的到来，在这个世界里，政界的首领们都变成了到处行走的推销员，他们更愿意通过想象和听别人的讲述来了解社会，而不喜欢真正投入地对这个社会进行更加深入的了解。

墨索里尼开始以总理办公室为中心向周围的环境扩展了，并且逐渐地习惯了首都的生活，而这种生活正是过去经常被他极为蔑视和不齿的。墨索里尼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的奋斗还没有结束，他也很急切地想知道，作为从普雷达皮奥出来的他这个阶层的第一人，他是否具备了足够的资格和技能来应付“永远不灭的”罗马城内像流沙似的多种多样的政治危险和社会危险。他的私生活仍是杂乱无序，应付这种生活需要付出很多的精神能量和费用。他的工作也是如此。法西斯取得政权有些太过突然，超出了他们的计划和设想。他们工作起来都是匆匆忙忙的，也许这才更像是法西斯。当然，在进军罗马之后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墨索里尼还在萨沃依饭店里一个被称为“豪华营地”的地方，通过卢多维西来发号施令管理意大利。在那里，他开始从各个方面为政府制定政治路线。也是在那里，可能更加急需应付的，是那些急切地前来讨要官职的人以及奸商。墨索里尼的私人秘书亚历山德罗·基亚沃利尼找到了应付这些人的方法，他也开始管理政府的秘密资金了。这种秘密资金曾经对焦利蒂是那么有用，现在，法西斯事业也有了自己的秘密资金了。

事实上，来向法西斯讨要官职的人多得不计其数。不管法西斯是什么形式的“革命”，总有一群急着从中受益的人为其鼓掌喝彩。这里只举一个例子：1922年12月18日，雷纳托·奇塔雷利这个来自卡拉布里亚的初出茅庐的工程师来找墨索里尼要官职。而且几年之后，他居然真的到西澳大利亚的珀斯做了领事，虽然这可能是国家所有的外交官里地位最低的一个，但毕竟也是一个官职。奇塔雷利只是在被称为“乱杀无辜”的淘汰旧的外交官的过程中受益的一个，而他的提升也只是归功于宣称自己是一个纯粹的法西斯。在珀斯，他的确是一个疯狂的极端主义者，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对墨索里尼保持着无限的热情（他说：“领袖就是我们伟大的复兴事业的独一无二的工程师。”）。此时，也许奇塔雷利的灵魂已经神秘地被法西斯信仰完全占据了。但是，他在最初给墨索里尼的信中也的确就普通意大

利人的生活方式提出了一些疑问，特别是南部的意大利人的生活方式。

奇塔雷利在请求信中首先讨好地表达了他对“阁下杰出的灵魂拥有的高贵直觉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伟大的理解力”的完全而彻底的信仰。一些背景有助于了解奇塔雷利这个人。他是一个卡拉布里亚医生的儿子，父亲的早亡让这个家庭陷入了极为困顿的境地。奇塔雷利本人曾在“一战”中参军并勇敢地打了两年仗，他的两个兄弟也英勇地牺牲在了战场上。带着失去亲人的痛苦和战争的磨炼，他在战争结束后到都灵去学习机械工程。在那里，他结交了当地的法西斯分子切萨雷·德韦基，他们俩还一同参加法西斯小分队对卡萨莱和维切利的“红色分子”的袭击。这些惩罚性的袭击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后来，奇塔雷利又回去继续自己的学习了。他自己也承认，在这段时间里，贫穷也曾逼迫他去接近焦利蒂以寻求一个能够获得好报酬的职位。但是，这位老政客在此之前可能已经有了其他人选，所以并没有兑现自己多次许下的诺言。奇塔雷利坦率地说，他的两个小妹妹还住在一个食宿费用都非常便宜的公寓里，所以，他开始把自己的希望从焦利蒂转向墨索里尼了。他必须承认自己不是一个法西斯党员，但是，“小的时候，我就知道一种信仰，那就是祖国”。为了意大利，他愿意付出“任何牺牲”，直至“失去生命”。他在演讲中说，他只有24岁，但却已经经历了那么多磨难。那么，他能不能见到他万分崇敬的领袖呢？或者更明白地说，能不能立即得到一个职位让他把“我的工作、我的技术、我的热情和我的生命”献给“深爱并为之祝福”的意大利呢？

从1922年10月到1923年12月，法西斯党的党员数量从原来的30万猛增到了78万多，南部的增长尤其迅猛。这些新加入的法西斯分子许多都有着与奇塔雷利同样的动机和世界观。在他们的思想里，能在法西斯政府里谋一个职位，那就意味着利益，并且是个人的利益，而且看起来既体面又崇高。1926年，使用推荐信的做法被官方禁止了，*但实际上，在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这种做法仍然非常普遍。据说，在就任总理之后，墨索里尼自己每天都要收到大约1500封寻求照顾和支持的信件。

墨索里尼很快就知道了“分发恩惠”的好处，于是，1922年12月，他把办公地点搬到了一个五星级的大饭店里，这个饭店位于圣玛利亚维多利亚大教堂的一角的附近。圣玛利亚维多利亚大教堂是巴洛克式的建筑，里面有贝尔尼尼**为圣

* 在之后的两年里，这一禁令又被重申了两次。

——作者注

** 贝尔尼尼(1598~1680)，意大利雕塑家、画家和建筑家，意大利巴洛克风格的杰出代表，以其流畅、动感的雕塑，如“阿波罗和达佛涅”(1622~1624年)及其包括圣彼得大教堂在内的许多教堂的设计而著称。

——译者注

女特里萨塑造的一尊塑像。这尊塑像神情专注，显示她是上帝和妇女的一个真诚的信徒。贝尔尼尼的著名雕塑对于这位新总理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对他对法西斯主义的痴迷理解的影响都是非常短暂的。1923年3月，在巴龙·阿尔贝托·法西尼*——一个有着广泛的关系并且熟悉罗马所有的大街小巷的人——的有力协助下，墨索里尼又搬家了。这次是搬到了位于蒂托尼广场的一个单身公寓里，这是个很奇特的地方，自由党统治时期的能工巧匠在罗马皇宫的下面挖了一条隧道，隧道正好经过这个地方。也就是说，这位“革命的”新总理好像是住在皇宫的大门口一样，而法西尼正好也是一个在王室圈子里受欢迎的人，自然在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和墨索里尼之间扮演了一个中间人的角色。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墨索里尼的生活更直接地由女管家切西拉·卡罗奇来负责了。她是一个传统的令人敬畏的女人，在“妇女圈”里有着绝对的权威，同时对墨索里尼又有着纯粹的个人尊重。

拉凯莱、埃达、维托里奥和布鲁诺还住在米兰的公寓里，墨索里尼的岳母安娜也搬来和他们住在了一起。墨索里尼当上总理没多久，安娜就富裕起来了，并且有了足够的信用买下了位于福林波波利外围的一幢别墅。这时，当她想起祖父当年被迫转让家族土地的羞辱时，她会不会感到高兴呢？这幢别墅原来是一个有钱人的家产，而墨索里尼一家一直到1925年3月才开始住在这里。当时以及在那以后，人们都很少看见墨索里尼穿着意大利乡村绅士的服装，但是拉凯莱却很高兴扮演这种在福林波波利以及罗马涅地区的其他地方受人尊重的贵妇的角色。她很爱参加地方上一些有影响的活动，如果不考虑她的个人气质、形象和言谈用词的话，她俨然已经变成了一个贵妇人了。

阿纳尔多·墨索里尼和他的妻子及孩子也搬到了米兰的帕格诺路附近的一个公寓里。贝尼托·墨索里尼的升迁也让他的弟弟有了出头之日。远在繁忙而深不可测的罗马，墨索里尼急切地需要一个真正可靠的人来照看《意大利人民报》的日常工作，那可是在很长时间内给他带来欢乐并巩固了他的影响力的一份报纸。正如他自己希望的那样，如果自己的权力能够持久，那么他将让这份报纸扮演法西斯政权的宣传工作和“信息”的焦点的角色。墨索里尼在米兰需要有自己的。已经有大量的作品讲述了这个意大利家族的历史，所谓的极权主义的最终的限制，以及墨索里尼对其他法西斯分子的从根本上的不信任等。自从1919年从军队退役之后，阿纳尔多一直在《意大利人民报》负责报社的财务工作，现在，墨索里尼又把报纸的编辑工作交给了他。除了新闻工作之外，在其他所有不宜公开的事情

* 法西尼在写给墨索里尼的信中对墨索里尼送给他照片并鼓励他采取进一步的爱国行动表示感谢。法西尼后来在法西斯政权的旅游部门找到了一个报酬不错的职位。

上，阿纳尔多都扮演着一个墨索里尼的代理人和朋友的角色。正如墨索里尼后来用很有特点的语言向一位美国记者诉说的那样：“我对弟弟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的确，他是太胖了点，但那并不是他的错。当我需要义无反顾的奉献和无拘无束的友谊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他。”

这个弟弟真的是不可或缺的。然而，1931年，阿纳尔多却突然去世了，他的才十几岁的儿子维托接替他担任了《意大利人民报》的正式主编。毫无疑问，年幼并且没有什么经验的维托·墨索里尼是不能胜任这个职位的。事实上，很少能看到他出现在报社的办公室里。直到1936年他“成熟”之前，报纸先后“暂时”由墨索里尼的老友山德罗·朱利亚尼和专业记者乔治·皮尼负责。并且，在1931年之后，对于其他一些非正式的事务，墨索里尼也只能亲自处理了，失去了弟弟，这个世界好像变得更加痛苦和不可信任了。

如果把这些事务排个优先次序的话，那么新政府的事务自然还是墨索里尼最为关注的。他组成的新政府是一个微妙平衡的政府，他自己兼任总理、外交部长和内务部长3个职务。按照焦利蒂的理解，内务部长是个对地方行政官员和警察发号施令的职位，因此也是国家统治中最为重要和秘密的部门。它使用的资金是独立于国家预算之外的，可以窃听别人的电话，还可以干一些偷偷摸摸不公开的事情。除了1924年到1926年的萨罗共和国时期之外，墨索里尼在他当政期间一直担任着内务部长。这个职位太重要了，哪怕是亲兄弟担任也难以让他放心。

在主要的法西斯分子中，阿切尔博担任了副总理，芬齐担任了内务部副部长，这些下属都是墨索里尼的朋友，没有一个是好战的法西斯地方首领。而法西斯运动的其他主要成员，如巴尔博、格兰迪、法里纳奇、比安基等，都没有被墨索里尼安排担任部长级的职务。邮政副部长看起来是一个没什么地位的职业，但是毫无疑问，那些担任这个职位的人都认为这是一个传统的“腐败”部门。钱从这里哗哗地流过，并且做起各种交易来也很安全。对于一个法西斯分子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好位置，尤其是一个不太轻信上帝和他人的法西斯。也正因为如此，邮政部副部长的位置多次换人，先是米凯莱·泰尔扎吉，后来因为他声称自己是共济会会员而太显眼，被来自普利亚的地方首领朱塞佩·卡拉东纳取代了（卡拉东纳曾极力向墨索里尼建议说，一个政府，即使是一个“革命性”的政府也不应当把南部的代表排除在外）。

同样明显的是，其他许多职位也安排由现有的社会精英来担任。这些人并不是法西斯党人，但他们却愿意支持已经取得成功的法西斯运动，或者愿意追随法西斯运动的成功领导人墨索里尼。巴尔博是一个机警的人，墨索里尼曾对他说，自己打算在时机合适的时候再对付那些“信奉自由主义的大叔们”，但是目前，他更愿意与那些同样愿意与他合作的人进行合作。乔瓦尼·真蒂莱是意大利最著名的两个哲学家之一，也是在国际上真正享有声誉的一个知识分子，为了能够实现自

己的梦想——一个强大而团结的意大利，出任了墨索里尼政府的教育部长。两个军事部门——战争部长和海军部长分别由阿尔曼多·迪亚兹将军和保罗·塔翁·迪雷韦尔担任。前者曾在“一战”后期担任意大利的总司令（但疾病很快就使他退休并待在卡普里成为了一个快乐的享乐主义者）；后者在1917年至1918年间就是意大利的高级海军将领。

路易吉·费德佐尼这个议会中首要的民族主义者，宣誓就任了墨索里尼政府的殖民地部长，这是一个具有双重重要意义的职位。自从民族主义者联盟自1910年成立开始，它就是意大利扩张主义的最热情的支持者。费德佐尼本人就一直在不知疲倦地支持意大利的势力进入亚得里亚海、爱琴海乃至整个地中海。对于所谓的德国对意大利的民族文化和财政的控制这一说法，他也像偏执狂似的表示关注。他草率地宣称，意大利文明只能随着意大利的势力扩张才能够得到发展。民族主义者主张在国内奉行极端保守的政策，对民众中出现的任何没有经过法西斯的平民主义*确认的力量都持怀疑的态度。在法西斯进军罗马之前的几周里，意大利民族主义者联盟的领导层还宣布，只要国王号召他们保卫国家的机构和制度，他们的准军事性的常备小分队会时刻准备着向法西斯开火。墨索里尼意识到了他们的威胁，同时，在他的脑海中也对这些玩弄政治和技巧的上层阶级人士产生了敌意。

鉴于这些潜在的冲突，墨索里尼和意大利民族主义者联盟之间在10月28日之后很快就达成了妥协。费德佐尼趁机保证说，民族主义者与墨索里尼之间的“友谊”是永恒的，当然也会支持他的事业。但是，他同时又奸诈地感谢领袖对他们的深深的“忠诚”。1923年2月，民族主义者法理学家阿尔弗雷多·罗科（此人从1925年之后担任法西斯政权的司法部长）草拟了一套详细的条款，作为意大利民族主义者联盟被吸纳进民族法西斯党的条件。从那之后，法西斯政权的精英分子中也有了一些民族主义者。正如当时主要的共产主义者帕尔米罗·陶里亚蒂认为的那样，民族主义运动同样也吸收了法西斯主义。**他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很具有说服力的。墨索里尼内心里也在盘算怎样才能暗中破坏民族主义者的趁火打劫和傲慢自大，他曾对一个朋友说，费德佐尼是那种出门买卷儿手纸也要先穿上件黑外套的老正统。

墨索里尼任命经济学家阿尔贝托·德斯特凡尼担任财政部长，因此也安抚了商业界。从1923年2月起，原来独立的国库也并入了财政部。德斯特凡尼是一个

* 平民主义，强调民众的权力、需要和愿望等的政策。

——译者注

** 他认为当时民族主义者和法西斯之间的关系就像是希腊首都雅典之于罗马的关系一样。

——作者注

法西斯主义者，但他的令人敬畏的性格和与最高层的知识分子们打交道时的那种信心让他成为了一个非常独立的人。他在经济上的观点非常传统和保守，很快，他就敦促墨索里尼减少新闻媒体对商业事业的探听和多管闲事，并且认为那些无业游民应当勒紧自己的裤腰带，而不是依靠国家的帮助。他还主张稳步削减军费开支，在他的建议的推动下，墨索里尼在议会里宣布将“不惜一切代价”地平衡预算。他还用自己独特的语言补充说，历史经验表明，严格的财政政策才能拯救国家。德斯特凡尼任职期间，法西斯认可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凡是有益于菲亚特公司、各个银行甚至国际资本的做法对意大利也是有利的。1924年，墨索里尼对《芝加哥每日新闻报》一位来访的记者说，他和他的政府坚定地支持“最大程度的经济自由”。*当年晚些时候，德斯特凡尼在全国的一片掌声中宣布，国家的预算实现了赢余。此时，墨索里尼可能已经开始着手清除自由主义者在政治和文化领域的思想了，但在经济领域，他还是非常小心谨慎。这有可能是因为他对管理家务有着与生俱来的良好感觉，也有可能是他精明地意识到，有了钱才能赢得来自自由主义者和法西斯两方面的尊重。

担任劳动和福利部长的是斯特凡诺·卡瓦佐尼，这又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卡瓦佐尼是保守的意大利人民党的一名成员，1923年4月，他敦促意大利人民党代表大会接受自己的领导并与墨索里尼进行合作，他的主张得到了法西斯的支持，而梵蒂冈的罗马银行也得到了友好的对待。这个银行1922年10月的时候正处在困境之中，但政府的官方和非官方的帮助挽救了它。其他天主教保守人士也同样表示支持一个独裁政府，他们宣称，一个独裁者将会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可以依靠他去阻止布尔什维克主义、共济会和民主浪潮的威胁。对于民主浪潮的威胁，他们说是因为那些罪孽深重的人还没有从精神上准备好。庇护十一世很可能没有对此提出异议，尽管路易吉·斯图尔佐一度坚持自己对人民党的承诺，并于1923年7月辞去了自己的职务。从那之后，没有了梵蒂冈保护的意大利人民党逐渐衰落，最终在1926年解散了。

那么法西斯党自己的情况怎么样呢？法西斯党的党员们是如何看待罗马发生的这些事件的呢？墨索里尼的政策对于他的支持者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谁将有可能对纪律和秩序持苛刻和警惕的态度，谁又将对恢复正常秩序持敌对态度呢？这些问题的答案在11月5日变得清楚了：墨索里尼态度坚定地通电所有的官员和警察，让他们制止“血腥并且让国家蒙羞”的社会暴力。他又补充说，当年参加冲突的许多人都是披着意识形态的外衣，但他们真正的动机则是源于“狭隘

* 他又加上了一个动人的预言，说美国有朝一日将在许多艺术领域里领导人类文明，并将使以往最伟大的荣誉都黯然失色。

的地方和个人热情”。现在是恢复国家权威的时候了，不管是对法西斯的敌人还是法西斯自己。就连最纯粹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加埃塔诺·萨尔韦米尼现在也承认：“墨索里尼现在不像那些成群的年轻法西斯分子们那么疯狂了”，也不像邓南遮这个“最疯的疯子”那样了。但萨尔韦米尼还是有些担心，因为邓南遮还想通过一个“超法西斯主义运动”把墨索里尼赶下台去。

萨尔韦米尼对当时的政治形式看得并不是那么准确和敏锐，但有几个问题还是值得一问的，那就是墨索里尼的这些旨在缓和社会危机的命令能够被各地的官员们贯彻执行吗？或者能够获得各省的法西斯分子的完全赞同吗？甚至墨索里尼自己是否真的认可这些命令呢？在大多数问题上，墨索里尼继续在用两种或更多种声音说话。首次在下议院发表演讲时，他就坚决而有力地宣称：“革命有它的权利。”他和他的法西斯党战胜了他们的对手，如果他愿意，他可以显示这种胜利的意义：“把这个无能的、死气沉沉的议院改成我的军团的宿营地……我可以关闭议会并组成一个纯粹的法西斯政府。我能做到这些，但是至少在现在，我还不想这么做。”类似的话他并非只说过一次。当意大利保守势力的精神领袖悉尼·松尼诺去世时，墨索里尼这位新总理趁机宣布：“法西斯党的利益必须高于一切。”类似的，当提到教会的时候他也是带着夸张和虚伪的尊重，声称与外在的现象相反，自己的灵魂是“深深地依附于宗教的”，并且，天主教包含着一种应当尊重和维持的根本的力量。墨索里尼对教会虔诚，对国王尊重，在许多场合对民族主义者都非常礼貌，但自己仍然是穿着黑衣的法西斯党的领袖，墨索里尼给自己留下了广阔的选择范围。他曾干脆地对一些省的法西斯分子说：“我是意大利最优秀的年轻人的意志的代表，是几千名死去的法西斯党人的激情的化身，也是惠及子孙后代的为理想和权力而进行的伟大斗争的代言人。”他的言谈和行动让人搞不清楚他是在试图限制还是在试图释放听众的政治热情。

言谈之外，有许多证据表明他正在使改革制度化。在10月份之前，墨索里尼就曾说过要创立一个与议会平级但相互独立的机构。他认为，这样一个机构将会比充满内容空洞的演讲的参议院更有效率。到了12月15日，人们才清楚他指的是什么：媒体被告知，法西斯党最高委员会在五星级大饭店内总理的私人住处召开了会议。与此同时，政府的内阁也在开会——墨索里尼也开始行使他的总理权力了，到月底的时候，内阁已经开了12次会议了。由于忙于行政事务，墨索里尼当时并没有试图去解释政府内阁和法西斯党最高委员会之间的关系。但非常清楚的一个事实是，法西斯党最高委员会的成员都是法西斯运动中赫赫有名但却没有被安排进内阁的大人物，领导进军罗马的四巨头都在其中：伊塔洛·巴尔博、切萨雷·德韦基、米凯莱·比安基和埃米利奥·德博诺（从1922年起担任警察总头目）。另外还有法西斯工会的领导人埃德蒙多·罗索尼，和很快接替比安基成为民族法西斯党书记的尼古拉·圣萨内利——一个没有什么特点的人，以及朱塞佩·巴斯

蒂亚尼尼和阿蒂利奥·泰鲁齐。最高委员会的这次会议由阿尔多·芬齐负责记录。在这些人中，只有马西莫·罗卡和法西斯党的新闻官切萨雷·罗西后来没有长期在法西斯独裁政府中担任显要的位置。1923年1月，法西斯最高委员会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又有迪诺·格兰迪、阿基列·斯塔拉切、弗朗切斯科·琼塔和皮耶罗·佩森蒂等其他许多人参加。这些人周围立即聚集了一群随从，而法西斯的党羽们也找到了自己的角色。法西斯党最高委员会开始对自由党政府的残余机构发起挑战从而取得讨论和决定重大事件的权力。

法西斯党最高委员会首先采取的行动带着些革命的意味。法西斯党主要的领导人们在考虑用何种方式以“最好地利用法西斯的军事组织”。他们的解决方法是创立一支“国家安全部队”，但很快又改成了“国家安全志愿军”。这样一个机构可以对法西斯分子的能量进行引导，如果任何反法西斯势力有反对新政府的重大举动，他们也可以时刻准备进行打击。有证据表明，与自由主义者们公开的期待相比，法西斯对于法律和法制进程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正如法西斯党最高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所说的，国家安全志愿军从“从本质上讲就是法西斯的”，创建的目的就是要坚决地捍卫“十月革命”的成果，并将组成革命卫队。

但是，事实再一次证明事情并不像它看上去那么简单。在法西斯最高委员会举行的两次会议期间，墨索里尼与法西斯党之间的关系又面临着一场危机。就在1922年圣诞节前的3天里，法西斯的小分队一路横冲直撞地袭过都灵、菲亚特城，并且袭击了阿戈内利家族和许多工厂。葛兰西*和他的报纸《新秩序》也遭到了袭击，报社的办公室被洗劫，被袭的还包括一所马克思主义有着重要影响的大学以及一群有着坚定信念的工人。这所大学是一个反法西斯的根据地，在法西斯进军罗马之前还没有陷落。现在，都灵的法西斯分子在法西斯四巨头之一德韦基的领导下开始了残酷的复仇，他们付出了十几个人的生命的代价，也上演了许多丑恶行径。对这一事件进行分析就会发现有两点让人感到奇怪。这种谋杀和烧掠是地方法西斯分子的行为，墨索里尼并没有对他们发布任何直接的命令。实际上，在这次行动的第一天，他还针对一些谣言给德韦基写了一封充满抱怨的信——当时有谣言说，皮埃蒙特的法西斯领导人声称进军罗马的行动是他们发动的。墨索里尼写这封信的意思非常明确：“是我策划了这次行动，是我想这么做的，并且最后的行动也是我领导的。”德韦基很快就给墨索里尼回了信，否认了所有谣言，并且满口奉承地保证说：“您是领导，我是随从。”但是，他在都灵的行动却暗示，他对墨索里尼的忠诚和尊重并不是完全的和绝对的，他的确想找到一些途径逼迫墨索里尼承认他的重要性和价值。

* 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

但德韦基并不是墨索里尼要考虑对付的唯一一个人，当时的形势很复杂，他还有其他更急需对付的敌人。像意大利其他地区的法西斯一样，都灵地区的法西斯内部也存在着许多派系争端。尤其典型的是，那些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法西斯分子与他们那些更加保守、在社会上更受尊重的同事之间存在着矛盾。例如，在那不勒斯，具有超凡魅力并且永不妥协的激进法西斯分子奥雷利奥·帕多瓦尼就受到了以保罗·格雷科为首的力量的挑战。前者是1921年浮现出的当地的法西斯首领，曾一度是法西斯最高委员会的成员；后者以前曾经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在当地的商业界有许多朋友。形势很快就明朗了，格雷科得到了墨索里尼的支持，几个回合下来，帕多瓦尼就放弃了自己的政治地位（1926年，他有些神秘地从自己家的阳台上坠落而死）。*

类似的矛盾和冲突在每个小镇和城市里都存在。在都灵，德韦基的权威受到了彼得罗·戈尔戈利尼和马里奥·焦达（他于1919年在都灵创立了法西斯，以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抵制，他们两个仍然坚持当年在圣墓广场会议上确立的激进主义理想。相反，德韦基却是一个君主制主义者，在民族主义者、军队和教会中都有很多朋友。也许可以推测，对都灵的工人阶级的袭击可能是激进主义者的行为，但是事实上情况却正好相反，这些谋杀是由德韦基和他的党羽们干的。事实上，戈尔戈利尼和焦达也对他们的野蛮行径进行了严厉的谴责。都灵的反法西斯力量衰落了，但是其他的法西斯分子对都灵法西斯分子的这种行事方式都表示反对。事情变复杂了。1923年5月，墨索里尼感觉自己的力量已经足够强大，可以把德韦基从政府中驱逐出去了。于是，他用一番专横独断的言辞把德韦基轰出了政府，而这也成为他日后的一种惯常的做法。**但是，虽然把德韦基赶出了政府，但墨索里尼还是把他当成自己个人的朋友。1923年10月，他被任命为索马里总督，这是一个遥远的职位，他自己也真心希望自己不要成为一个令人讨厌的人。***虽然遭遇了这种命运，但德韦基在都灵的影响并没有被削弱。在法西斯执政期间，他一直都是当地的法西斯首领。而焦达则相反，他于1924年退出了法西斯党。另外，还有一件让人感到荒谬的事：都灵在整个法西斯当政期间都相对比较独立，都灵的市民都认为自己是都灵人，并且，当地一部分工人又回过

* 墨索里尼在一封信中说，他也是一个“急脾气”，并且对帕多瓦尼已经烦透了。

——作者注

** 墨索里尼粗暴甚至是野蛮地谴责德韦基说，他总体上是不称职的。

——作者注

*** 几个月之前，还以为自己是在自由党政府担任部长的费德佐尼曾威胁说，如果让德韦基出任普兰尼加的总督的话，他就辞职。

——作者注

头信仰起了过去的社会主义和民主。都灵的“法西斯化”有自己的方式，这种方式当然不是由墨索里尼直接策划的。事实证明，都灵是一个对任何期望都具有高度抗拒性的城市，它可能会“设法拥有自己的领袖”。

都灵的情况进一步证明了这样一种说法，即在短期内，国家安全志愿军的创立更多地是为了能让法西斯分子们平静下来，而不是为了进一步推动革命。事实上，1923年6月，墨索里尼就在参议院里夸口说，他的政府迄今为止解决的最大的问题是“法西斯小分队抗拒政府权威的问题”。各地方上的法西斯诸侯们并没有被他这些话所迷惑，对于国家安全志愿军的建立是为了集权和控制这一说法，很少有人再持怀疑态度了。当然，把民族主义势力的常备小分队吸收进来还是有用的，尽管这可能会对军队自己的权威造成损害。更需要强调的是，反法西斯人士认为，不管这些法西斯小分队表现为何种形式，他们都是法西斯暴政的体现。看起来，墨索里尼正在寻找一种比他的前任们更加极端的方式来统治这个国家。但是，墨索里尼是否找到了能够弥合“法制的”意大利和“现实的”意大利之间的旧有隔阂和差距的桥梁，这在1923年时还不是十分明朗。

虽然国内事务还是墨索里尼的主要关注点，但他并没有完全抛开国际事务。在执政的头两个月里，他访问了瑞士和伦敦，就赔偿以及其他战争遗留问题继续进行谈判。甚至在10月29日离开米兰到罗马赴任之前，他还发表了一个带点镇痛剂效果的公告，说他的政府将遵循一种“以高贵尊严为基础，避免犹豫和威胁”的国际政策。就任总理之后，他又借用民族主义者常说的一个比喻说：“意大利希望受到各个世界大国像姐妹而不是像侍者一样的对待。”他在下议院发表的第一次演讲态度上也是摇摆不定的。此前，他已经承诺新政府将接受所有的已签订的条约的约束，但后来他又严厉地补充说，“革命有它的权利”，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同时，他又承诺说，意大利将严格地奉行现实主义的政策。

当时，就连在国际上影响力最大的《伦敦时报》也认为，尽管法西斯是一个“来源混杂的奇怪的组织”，并且“它的暴力太容易退化成为无节制的行为”，但它仍代表着“一种对历史更久的、具有创造性的意大利自由主义的一种回归”。此前，墨索里尼曾把他的政府定义为一个保守的政府，所以《伦敦时报》的这种态度让他在推测这是不是英国政府对他定义的“保守的意大利”的一种回应。与其他许多国外媒体一样，《伦敦时报》也渴望并准备相信法西斯有“坏”的一面，但也有它“好”的一面，并且希望墨索里尼能够代表它“好的一面”，但它真正担心的还是意大利的民主会“变野”。同样，《伦敦时报》的这种担心在外交界也存在。不管怎样，墨索里尼最初说要奉行的革命性的外交政策的威胁——如果那是他真正的想法的话——现在开始减退了。1923年2月，他就国际形势发表了带有政治家风范和气质的第二次演说，称“外交政策中也可以有创造性”。当时的英国驻意大利大使罗纳德·格雷厄姆很快就向国内报告说，墨索里尼是一个“有着杰出能力

和胆识的政治家，就是有些鲁莽和倾向于暴力”。但他又补充说，墨索里尼能够“根据现实情况迅速做出反应，并且善于从实践经验中学习”。他的“法西斯政府”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外国都干得不错。当然，他有时也会陷入“难以控制的愤怒”，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位领袖是“一个奇怪的人，并且近来引发了人们对她的一些评论，因为他经常开着一辆双座汽车在罗马城里穿街过巷，而汽车的副驾驶座上蹲着一只个头不小的幼狮”。格雷厄姆又补充说，不管怎样，“意大利人好像很喜欢他这样的人”，并且，当他这种行为不太正常的时期过去之后，墨索里尼很快就平静下来了，他的表现又像其他任何绅士一样了。对于国际媒体来说，对贝尼托进行驯服和教化，让他发生必要的改变从而变成“我们中的一员”并不是一件非常艰巨的任务。

意大利国内的外交官们最初对外交政策也存在着一些怀疑，但这种怀疑很快就被消除了。意大利民族主义者联盟的观点对意大利的外交政策有着深刻的影响。同时，官员们通常对法西斯的平民主义都持怀疑态度，并且常常嘲讽这位新的国家领导人身上还带着乡土气的粗俗，其中一位还专门抽出时间来教墨索里尼学习一些起码的官方礼仪。再后来的一些评论夸大了墨索里尼和他的外交官员之间的矛盾，事实上，从那时一直到1940年，有更多的证据表明，墨索里尼和这些外交官员之间存在着很多的共同点而不是深刻的争论。法西斯革命的情况还不算太糟，从政治和社会角度对新政府的外交政策进行的种种假设还不至于造成太大的混乱。主要的外交官员中只有一个人辞职——1922年10月，卡洛·斯福尔扎辞去了外交部长的职务，但是又担任了驻巴黎的大使。而在其他级别更低的各个部门中，也只有一个人公开地表示过不同的政见。这些外交官员与其他官僚一样，也适用那些典型的官僚主义原则，比如虚伪的镇静、困惑并且办事迟缓。他们深信，法西斯的狂热是不会持久的，事情总是万变不离其宗。当时任意大利驻伦敦大使的贾科莫·德马蒂诺经过一番老练的遣词造句之后小心翼翼地解释说，那些引起英国的各界精英们警觉的感觉已经消失了，因为法西斯政府已经平静下来了。他又意味深长地补充说，罗马已经准备接受法西斯政府了，华盛顿当局也已经认可它了。只要他们的这些观念被理解和接受，他们就会慢慢地推动他们的新总理朝着他们期待的方向转变，而这位新总理就必须对政府的权力基础进行现实的评估，并且考虑怎样才能让意大利在国际上取得权威和地位。正如其中一位官员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一个最好的总理应当像那不勒斯的圣真纳罗那样，即一年只露一次面，而在其余的时间里要一直对公众保持神秘。那么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真的已经“平静下来”了吗？或者说墨索里尼会去收拾那些不听话的刺儿头们吗？1923年已经过去几个月了，但国内外的评论家们还搞不清楚法西斯或者说意大利的新政府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将会更加注重意识形态的信仰，还是国家的利益。

民族主义是很难被抑制的，况且墨索里尼也不是唯一希望国家在世界上有更强大的地位的意大利人。例如，法西斯政权中重要的知识分子、历史学家焦阿基尼·沃尔佩就在《等级制度》中写到，科西嘉人“以最明显而可能的方式”带着我们的烙印，并且希望法国人能记住“科西嘉人的历史也是我们的历史”。*当时，玛格丽塔·萨尔法蒂也去了突尼斯，在那里，来自欧洲的移民的主体实际上都是意大利人。1923年11月，墨索里尼以一个华而不实的词“拉丁人”为笔名为她准备的一篇文章写了序言。在这篇文章中，她敦促居住在突尼斯的意大利人要保持和发扬自己的“意大利风格”，但她同时也不得不承认法国人是很好的管理者，并且也得出了一个老套的结论：阿拉伯人“在内心里都还是大孩子”。**

意大利与其他大国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是，意大利与那些稍弱一些的关系怎么样呢？这些国家中最令人头疼的就是希腊，这是一个经常被民族主义者严厉斥责的国家。墨索里尼最初接触到的有关国际形势的信息都敦促他绝不能放弃多德卡尼斯群岛***，并且要设法延长国际条约的时效。墨索里尼被告知，希腊人是不值得感谢的，意大利人要比他们优秀，所以必须像一个好主人那样严厉地对待他们。

巴尔干地区的其他国家、非洲甚至世界其他国家都有可能是一个爱国政府面临的问题。有那么多国际问题需要关注，以至于1923年8月28日，墨索里尼建议他的官员们再次抑制那些过于狂热的法西斯分子。而在此之前，他还敦促要保证他们在任何地方事务中都对民族法西斯党占有优势。这位总理解释说：“国际秩序中最微妙的问题目前正在浮出水面。”意大利和希腊之间正在酝酿一场全面的危机。

除了偶尔活跃一下之外，墨索里尼自己对国外事务的干涉并不多，还没有过分超出意大利本国的范围。但是，8月28日，墨索里尼却给意大利驻雅典的公使发了一封电报（这位公使的名字非常响亮：朱利奥·切萨雷·蒙塔尼亚），敦促对

* 相反，墨索里尼却建议说，任何的爱国行为都应当分散地、悄悄地进行。

——作者注

** 在他的序言中，这位“拉丁人”有些朦胧地说“意大利信仰”在一个地方能够成长，但没有指明这个地方是哪儿。

——作者注

*** 多德卡尼斯群岛，位于爱琴海土耳其和克里特岛之间的希腊东南部群岛，1522~1912年间为土耳其所有，意大利在1911~1912年的意土战争中占领了该群岛。“一战”期间，1915年4月26日，为了使意大利成为协约国，英、法、俄3个协约国同意大利签订了秘密的《伦敦条约》。条约中规定意大利将获得对多德卡尼斯群岛的全部主权。“二战”结束后，意大利于1947年2月将多德卡尼斯群岛让与希腊。

——译者注

那些头一天在希腊——阿尔巴尼亚边境线上“犯下野蛮屠杀罪行”的人立即进行“警戒性的惩罚”。当时，意大利的一名将军恩里科·泰利尼正带人在边境上视察，与其他人一起遇害了。希腊人称这是强盗干的，但蒙塔尼亚却认为当时的希腊政府至少是资助了这些暗杀者。8月29日，墨索里尼命令意大利的海军舰队做好准备以占领科孚岛*，除非希腊政府在20个小时之内答应一系列过分的要求。这些要求很多都是羞辱性的，比如要求希腊政府参加在雅典的罗马天主教大教堂内为死者举行的葬礼，并且希腊政府的每一位部长都要公开向意大利国旗致敬；此外，希腊政府还要立即向意大利支付多达5000万里拉的巨额赔偿。希腊政府对此的态度虽然很温和，但还是拒绝了这些要求。于是，8月31日，在没有发出任何的警告情况下，意大利军队先对岛上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狂轰滥炸，然后在一片混乱中登上了科孚岛。于是，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用一种类似法西斯小分队进行袭击的方式登上了国际舞台，并开始对社会主义者和国内其他的敌人进行残酷的打击。

法西斯分子喜欢把这种方式解释为“有益的暴力”，利用这种方式，法西斯让不少对手相继垮台了。但是，民主世界的情况要比意大利各省的情况复杂得多。虽然占领了科孚岛，但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事还并不完全清楚，而墨索里尼很快就给他的外交官们一个很奇怪的通知，说意大利对科孚岛的入侵是“和平和暂时的”。当时，一些主要的法西斯分子，甚至是在社会上很受尊重的乔瓦尼·朱里亚蒂（后来成为民族法西斯党的书记）等人，都建议墨索里尼让意大利趁机从“国联”中退出，并宣布法西斯革命不接受国际力量的制约。**相反，一些职业官僚则因为这一事件的突然性以及无法预测其后果而深为担忧，这其中就有当时任外交部秘书长的萨尔瓦托雷·孔塔里尼。他是一个经验丰富老谋深算的西西里人，首都罗马当时正是酷暑难耐，他跑到伊斯基亚享受宜人的气候去了。

另外，墨索里尼很快就发现，他并不是只在对付希腊。在英国、法国等其他国家，意大利这种激进的行动让人们又想起了1914年奥地利向塞尔维亚所发的最后通牒，当然，奥地利人没有意大利人那么好的运气。这些国家认为，意大利对科孚岛的单方面占领是对新成立的国际联盟发起的直接挑战，并且，国际联盟成立时承诺要通过集体安全来确保和平，因此意大利的行动也是对“国联”这种未经过检验的承诺发起的一个挑战。人们当时对此非常担心，尤其是在媒界。《伦敦

* 科塞拉爱奥尼亚群岛中的一个希腊岛屿，与大陆的西北部相望，1864年割让给希腊前曾被罗马·拜占廷、西西里、威尼斯和大不列颠统治过。

——译者注

** 朱里亚蒂在给墨索里尼的信中又礼貌地补充说，墨索里尼是唯一适合对此事做出决断的人。

——作者注

时报》当时发表的一篇权威的社论说，如果法西斯失败了，那将对意大利不利；但是如果国际联盟失败了，那将对整个欧洲都不利。对此，墨索里尼愤怒地告诉左右为难的意大利驻伦敦大使说，“英国媒体的举动是完全无法接受的”，并且有可能对英、意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造成永久性的伤害。许多历史学家都确信，任何形式的法西斯主义都意味着战争，并且认为在未来的10年里，欧洲将出现一种新的最无所顾忌的外交方式，并且，这种方式将会达到顶点。他们还认为，对于国际联盟的垮台，墨索里尼应当比其他任何人都负有更大的责任。但占领科孚岛只是一个开始，1935年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发起的侵略才是顶峰。

有人认为，墨索里尼突然占领科孚岛只是他的“个人行为”，这种说法是欠妥的。所有的事实都让人相信，意大利社会中的精英们是支持墨索里尼“强硬地”对待希腊的。由极有声望的路易吉·阿尔贝蒂尼任主编的意大利最有影响的自由主义势力的报纸《晚邮报》当时就全力支持墨索里尼政府，它对英国对此事的反应提出了批评，并称面对希腊的“鲁莽的挑衅”，意大利是在显示自己的“现代化”和“自我牺牲”。曾经把意大利引入“一战”的保守主义分子安东尼·萨兰德拉此时在日内瓦担任意大利驻国际联盟的代表，他也对墨索里尼的决定表示支持，称赞这是一个乐于增强国家威望的政府。另外，当时的海军将领塔翁·迪雷韦尔也已经为进攻希腊准备了好几个月了，因为两国在多德卡尼斯群岛主权问题上也争议了很长时间了。事实上，塔翁早在8月1日就曾建议墨索里尼对希腊发动一场全面的海上战争，并称将会“以最小的风险获得最大的收益”。他还学着民族主义者的话说，用不了多长时间，亚得里亚海就会成为“意大利的一个内陆湖”。当时带兵占领科孚岛的指挥官安东尼奥·福斯基尼在其回忆录中说，他只是按照塔翁的命令采取了行动，从未见过领袖的面。*

换句话说，按照托格里亚第**的观点，至少从国际政策方面来讲，科孚岛事件证明法西斯政权的政策经常受到民族主义者的影响，墨索里尼的行事方式也没有与他们的希望和习惯发生抵触。并且，如果了解真相的话你就会明白，墨索里尼当时对于国际联盟的暧昧和混乱提出的批评也是与英、法等国内的保守主义分子的想法是一致的。伦敦的新闻界也都不愿充当“国际警察”的角色，《早邮报》、《每日邮报》甚至《观察家》都援引《现实政治》的话说，他们对意大利的行动表

* 直到1953年，福斯基尼仍在为这次行动辩护，坚持说当时行动的目的只是为了让意大利赢得尊重。

——作者注

** 托格里亚第(1893~1964)，意大利政治家，在他的领导下(1926~1964年)，意大利共产党成为西欧最大的共产党组织。

——译者注

示欣赏。这些媒体说，墨索里尼正在把他的国家引向一个“具有男子气概的方向”，这是值得为之鼓掌喝彩的。到了1月份，就连更加支持新外交方式的《前进》杂志也宣称墨索里尼代表的“不只是法西斯主义”。在欧洲，不管是在20世纪20年代还是30年代，对国际联盟的作用表示怀疑的人都不止墨索里尼一个。

不管怎样，科孚岛危机都只是夏天里的一场短暂的暴风雨。9月12日，塔翁向他的领导人墨索里尼建议说，如果事情发展到要与英国皇家海军在地中海进行对抗的话，那么意大利舰队最多只能支撑“48个小时”。15天之后，意大利对科孚岛的占领结束了，意大利和希腊两国之间的冲突留给了国际社会来从中进行调解。当时在国际联盟中，意大利仍然被看做是“列强中最弱的一个”。另一方面，墨索里尼自身的形象并没有因这次科孚岛危机而受到损害。事实上，9月23日，意大利的特务机关向他报告说，英国驻罗马大使罗纳德·格雷厄姆先生认为墨索里尼的行动“太过冲动”；相反，他已经向英国国内当局报告说，这一行动向人们显示出墨索里尼具有“无限的能量”。这位领袖所持的是一种怀疑论的现实主义，这就意味着从现在开始，与意大利之间的友谊可以建立在对利益得失进行严格评估的基础之上。格雷厄姆并不是唯一崇拜墨索里尼的外国人。早在1922年11月，罗马就收到了一份情报说，德国巴伐利亚有个名叫“希特勒”的法西斯首领对意大利最近发生的事情印象很深，很急切地希望能够与意大利的新政府发展更好的关系。墨索里尼对这个潜在的兄弟般的德国政府也表现出了一些兴趣，但是1923年11月希特勒发动的“啤酒馆暴动”的失败让墨索里尼认为希特勒和他的党羽们只不过是一群“小丑”罢了。还有一个外国人对墨索里尼的政策非常同情和支持，他就是西班牙的将军米格尔·普里莫·德里韦拉。他在1923年9月发动军事政变之后访问了罗马，并且以后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墨索里尼说：“您的身份不光是意大利的领袖，您是反对分散和无政府主义这一全球运动的传道者……法西斯主义应当是一种能够征服所有国家的运动……法西斯主义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真理。”在普里莫崇拜墨索里尼的同时，他也得到来自另一方面的夸奖，他的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热情地称他为“第二个墨索里尼”。

这么多对墨索里尼的吹捧当然会让他感觉非常不错，但是这些其他国家的外交官们同时也注意到，墨索里尼在科孚岛问题上表现出的这种热情一旦减退之后，就没有怎么再重新出现过，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意大利的外交政策在20世纪20年代虽然出现过一些摇摆，但总体上并没有让世界感到吃惊。相比之下，法西斯主义在国内的命运以及对他的法西斯政权的建设则一直是墨索里尼最优先考虑的问题。

从这一点来看，墨索里尼的关注点还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这也让一些同时代的人更加认为他是一个新的焦利蒂。*墨索里尼还希望组织一次选举，他毕竟只是议会中35个法西斯议员的领导。现在，他需要得到更广泛的支持以确保自己在

可预见的将来能够像焦利蒂在1901至1915年间那样成为政治上不可或缺的人物。为此，他使用了两种不同的手段：一种是合法的，另一种则是公然地带有法西斯和革命色彩的手段。贾科莫·阿切尔博是来自阿布鲁齐的一位有名望的法西斯，根据他的同事、南方人米凯莱·比安基的一个提案，拟定了一部法律。虽然议会中存在颇多争议并且遇到了许多困难，但他们最终还是在1923年的夏秋季节在议会通过了这部法律。这项法律能够使议会中最大的党（赢得25%的选票）的席位增加，从而在多党体系下能够形成一个稳定的多数派。左翼中的大多数都反对这一法律，但是其他力量，如焦利蒂、萨兰德拉、奥兰多、《晚邮报》以及梵蒂冈和国王都支持这一法律，其中也有许多得意的保守派人物放言要维护国家的一致和加强领导层的权威。11月，参议院只开了一次会就通过了《阿切尔博法案》。1月，在得到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的批准后，意大利议会被解散了，大选定于4月6日举行。

这是一种更为法治的手段，那么法西斯党自己的情况怎么样呢？它在罗马以外的地区采取了哪些行动呢？社会暴力并没有停止。1923年8月，左翼天主教牧师乔瓦尼·明佐尼在费拉拉附近遇害，但这只是法西斯分子的最丑恶的行径之一。法里纳奇被认为是最激进的法西斯分子，在与墨索里尼频繁的通信中，他一直在敦促墨索里尼不要与旧势力的任何残留进行妥协。克雷莫纳的地方首领也一直在热情地鼓吹，要用“聪明的外科手术的方法”来对付那些明显对法西斯主义及其革命性的胜利持怀疑态度的人。

法里纳奇在意识形态方面并不是非常复杂，但是法西斯也确实试图在知识上有所创建。朱塞佩·博塔伊来自于罗马，以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1919年第一次见墨索里尼就被他吸引住了。1923年6月，在《法西斯评论》杂志创刊的第1期上，他在社论中表达了对一系列法西斯人物及其支持者的敬意，包括阿切尔博、巴尔博、巴斯蒂亚尼尼、比安基、科拉迪尼、费德佐尼、福杰斯·达旺扎蒂，真蒂莱、琼塔、格兰迪、E.M.格雷，塞尔焦·帕农齐奥、罗卡、罗科，切萨雷·罗西和罗索尼。在这篇社论中，他解释需要巩固“革命”的成果，而这要通过“确定特定的政治和精神价值”来实现。民族主义的烙印仍然非常明显。事实上，科拉迪尼在第一篇文章中就阐明了“政治教条的历史特点”。福杰斯·达旺扎蒂是另外一个受命在卡波雷托惨败之后想办法重振民心的民族主义者，他宣扬，说政府中有法西斯主义还不够，应当说法西斯就是政府才对。在战胜了那些“失败的党派”之后，法西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它必须继续前进，并在意大利社会中“所

* 例如，萨尔韦米尼就把墨索里尼描述为“一个更大的、更真正的焦利蒂”，他这话的意思是想说明“意大利希望被这样统治”。

有最强有力的力量”的支持下建立一个真正的单一民族国家。帕农齐奥是一个来自南方的工团主义哲学家，他补充说社会主义现在已经被彻底打败了，法西斯主义现在有了自己的根基，这将保证法西斯主义和国家能够统一起来。

这里描述的事件不光是当时讨论的问题，而且也是1945年之后在编写历史时讨论的问题。墨索里尼亲自为《法西斯评论》的第2期写了前言，对这种遵守一定纪律的评论表示赞赏。他又一次成了“墨索里尼教授”，很高兴地看到法西斯主义能够显示本身在知识上的创新，当博塔伊宣称法西斯主义“首先是一种知识层面的东西”时，他尤其感到高兴。墨索里尼强调说，法西斯主义必须“有教育意义”，否则它就什么都不是了。在之后的几个月里，博塔伊和其他一些人继续在宣扬他们的要求，那就是革命不应当陷入被动。博塔伊写道：“作为一种明显的信仰，法西斯主义已经达到了一个层次，它必须要成文化并且要有自己的庙宇和殿堂。”在法西斯党的最高委员会里，成员们也在讨论法西斯的“历史任务”是“为国家建立一个新的统治阶层”。博塔伊在对国家安全志愿军的战斗精神进行赞扬的同时，更加小心谨慎地补充说：“任何想把墨索里尼与法西斯主义分开的企图都是愚蠢和荒谬的。”

博塔伊并没有忘记显示对墨索里尼的尊重。地方上的法西斯党领导人变得太过独立时就会犯错误。他们必须明白，他们的领袖是一个“手中握有权力但同时又和蔼可亲的人，他并没有忘记，也不会忘记，要想统治一个国家，既不能完全相信别人，也不能强迫他们，而应当是这二者的完美结合才对……法西斯要想真正地‘墨索里尼化’，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聪明地按照党的纪律生活。”在抵抗那些“不满的、迷惑的、无能的、卑劣的”诱惑的同时，法西斯应当努力自觉地支持“领袖的斗争和关注的问题”。在精神和态度上，博塔伊永远保持着对墨索里尼热情的支持。但问题是，有多少意大利人愿意像博塔伊那样从精神上屈从于墨索里尼呢？

墨索里尼感觉生活很空虚，并且这种感觉还在加深，别人对他表达忠诚和爱戴也无法缓解他这种感觉。在举行大选期间，他在《等级制度》上发表了一篇有关马基雅维利*的专题论文。他在文章中说，他刚刚又读了一遍这位佛罗伦萨作家的文集，并且觉得这位作家的观点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鲜活。不能简单地指望人们去革命地“遵守法律，缴纳税款以及在战争中服务”。任何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都不会希望人民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马基雅维利这种愤世嫉俗的洞察力暴露出了启蒙运动**的一些梦想的愚昧（同时也显示出了墨索里尼在1914年以前的政治哲学）。

* 马基雅维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理论家历史学家，他的著作《君主论》（1513年）阐述了一个意志坚定的统治者如何不顾道德观念的约束来获得并保持其权力。

如果不能把这些有关人性特点的阴暗的想法从墨索里尼的思想中完全驱除的话，那么在此时，墨索里尼对这些事情看来已经有了明确的看法了。1924年1月，在向党的忠实信徒发表演讲的时候，墨索里尼警告他们说，一个领导人不能被好的或坏的顾问所左右。在他的“根本不善交际的生活”中，他总是在精神的孤独中做出决定，并且通常都是在深夜。每天早上都会有五六个人来向他简要地报告一下的意大利的情况，他倾听他们的报告，但最终还是凭自己的判断做出决定。他的感召力和“野性”不断地吸引一些人改变信仰投靠到他这边。墨索里尼为选举准备了一份进入政府的大名单，全国上下的精英们都急切地想加入到这个大名单中。阿纳尔多·墨索里尼向哥哥提了一个非常明智的建议，认为这份大名单中应当包含那些老的社会精英，因为重要的是人而不是派别。由于政府获得了这些“最优秀的人们”的普遍支持，所以选举活动进行得相对比较平静和有秩序。墨索里尼又适时地明确命令所有官员压制暴力活动，不管它是哪个政治派别策划的。

选举的结果是大获全胜。这份大名单也不再需要《阿切尔博法案》的帮助了，因为政府在意大利北部赢得了超过一半的选票，在中部获得76%的选票，而在18个月前还基本没有法西斯活动的南部，政府竟然获得了81.5%的选票。自从1861年以来，在意大利的历史上还没有哪个政府获得过如此彻底的胜利。选举结果出来之后，墨索里尼还想与温和的社会党人达成和解，以进一步统一全国的意见。他能让改良派的领导人菲利波·图拉蒂和工会领导人卢多维科·达拉格发生“转化”并加入一个完全统一的国家政府吗？

左翼中也有一些人士坚定地反对法西斯浪潮，这其中就有贾科莫·马泰奥蒂。他本身是一个改良派，但却由于自身的阶级和宗教背景而招致法西斯格外的忌恨——他的家族在罗维戈的一家地方银行中存有的资产非常显眼，但在“一战”中却坚决拒绝做出爱国之举。马泰奥蒂自己与很多国际人士也有关系，1924年4月，他还访问了伦敦并且会见了英国工党的领导人。5月30日，马泰奥蒂又一次在意大利议会里大声反对被他称为骗局的全国大选，还说选举期间的暴力活动的水平可以和墨西哥相比了——但愿这话不会冒犯墨西哥。更让法西斯担心的是，有谣传说他已经收集了有关法西斯腐败的致命的证据：与一些著名的银行家如塞缪尔·古根海姆、J.P.摩根和安德鲁·梅隆有着密切联系的辛克莱石油公司好像提供了巨额的贿赂，目的是为了保证在意大利国内控制汽油分销的权利。此外，还有一些非法军火贸易的传言，据说阿纳尔多·墨索里尼也卷入了其中的一些交易，墨索里尼的其他一些随从也在其中，包括芬齐这个来自波河平原（紧靠着马泰奥蒂的地盘）的非常富有

★★ 启蒙运动，18世纪的一个哲学运动，强调运用理智来审视先前被接受的信条和传统，该运动带来了许多人道主义改革。

的法西斯。*暴力活动并没有给法西斯招来什么灾祸，现在它会在腐败的重压下垮掉吗？

不会的。6月10日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马泰奥蒂被绑架了。当他在位于台伯河畔的住所旁散步的时候，一群武装人员把他强行塞进了他们的汽车飞驰而去。这个武装小分队的首领是阿梅里戈·杜米尼。他1896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他的关系网很发达，最高可以一直到达墨索里尼本人。马泰奥蒂从此开始了一次旅行，但他注定不会再回来了，新闻界从此也没有了有关石油和其他可能的丑闻的线索。但是绑架马泰奥蒂的确对墨索里尼1922年10月以来费尽心机建立起来的大厦构成了威胁。类似的事情不只发生在各个省份，就在首都罗马的大街上喷溅的鲜血似乎已经沾到了总理自己的手上，他的政治盟友们能够逃过被谋杀的厄运吗？

* 芬齐的兄弟吉诺为威斯汀豪斯公司做事，而芬齐自己则因为娶了一个红衣主教的侄女而与这个交易圈有了联系。

4 强行独裁统治

1924年6月初，墨索里尼已经成为了“一战”之后政坛的“新人”，并且手中已经握有了一定的权力。他很高兴地管理着这个国家，并且能够非常得心应手地让支持他的联盟保持着生机和活力，事实上，他还成功地扩大了这个联盟。他还小心翼翼地与旧的自由党人士交好，他们可是在选举中加入他的政府大名单的最重要的一股力量。一方面，他继续使用各种有时甚至是无情的手段对各省法西斯的“能量”加以控制；另一方面，他却利用他们的暴力活动保持着对政治对手的威慑。墨索里尼宣称，“秩序”，法西斯的秩序，是一个根本性的国家问题。如果没有秩序，意大利的货币里拉就会贬值，而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也不会有它应有的地位。从1922年10月起，墨索里尼就已经成功地成为了法西斯的领袖和武装部队的总指挥，是一个正在成长发展的政治家。他位居罗马，处理的已经不再是地方上的各种琐事，而是意大利的军国大事了。在选举中大获全胜让他的政治力量大为增强，这也大大超出了焦利蒂、克里斯皮、德普雷蒂斯和卡武尔的预想。事实上，只要他愿意，墨索里尼现在就可以成为一个“议会独裁者”，并且不会遇到太多的危险和威胁。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贝尼托·墨索里尼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在意大利国内和国外都尽人皆知的政治家。

那么，他知道自己在朝哪个方向走吗？他已经下定决心要成为一个法西斯独裁者吗？有些分析家是这么认为的。当然，他的个性特点还是倾向于极权，但他与自己的法西斯党的关系还不很确定：要么是他被接受为法西斯无人匹敌的领导人，要么是他把法西斯运动移交给各省的领导人。所以，他必须找到另外一条获取权力的途径。此外，尽管他在控制大选中表现出的热情说明他还把议会当做是一种权威，但他从来都没有掩饰过自己对大多数议会活动的轻视。最为重要的是，墨索里尼与他的自由党前任们在认识上的一个明显区别是，他认为即使是在相对落后的意大利，一个成功的政治家现在也需要有一种方法或者理论把相当大比例的人口聚集到他的事业上来。沮丧的民主党人加埃塔诺·萨尔韦米尼悲伤地宣布，只有大约10万意大利人真正在意他们的国家，而大多数农民和妇女在政治

意识上都处于边缘地带，他们很容易被再次拉回到现代政治和社会生活之前的状态。情况的确是这样。但是墨索里尼已经认识到，经过“一战”时的动员，所有的意大利人都必须在政治上表明立场。他们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了，他们必须认为自己属于意大利这个单一民族的国家。无论以何种方式，作为总理或者独裁者的墨索里尼都希望能够继续推进“民众的国民化”。

历史学家们又需要小心了。事后聪明往往会忽视现实生活中的混乱和妥协，并且容易从其实根本不存在的事物中得出结论说某个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当时墨索里尼是否已经意识到他正在走向“极权主义”（很快人们就开始这么说了），他是否已经决定推行一种以自我神化为最明显特点的非宗教的信仰，都还值得怀疑。虽然墨索里尼是一个喜欢打破一切旧事物的人，但他看起来还是受到了那些更具权谋的传统政治家们的牵制。有谣传说，墨索里尼在选举胜利后又萌发了3年以前就有过的也是他从未放弃过的想法，即让一些社会党人发生“转化”并把他们拉进自己的政府。* 1924年6月，墨索里尼仍然在努力把联合政府的总理和法西斯领袖这两个角色更好地结合起来。

马泰奥蒂被绑架和谋杀是墨索里尼一生中遇到的一个大危机。他是否应当为此事负责？为他写传记的意大利作家德费利切认为他不应当对此事负责，最起码不应当负直接的责任。最新研究这一事件的历史学家毛罗·卡纳利的意见则不同，他把此事直接归咎于墨索里尼。他认为，1923年7月的时候，一个名为“切卡”的“秘密的犯罪组织”已经成立，并且受墨索里尼的指挥。虽然加害马泰奥蒂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让他在石油丑闻等现实问题上闭嘴，其次才是攻击那些“反对法西斯”的人，但这一组织的创立的确标志着“极权的国家恐怖主义”的开始。

卡纳利的观点是非同寻常的，但套用一句法律术语来说，也许对墨索里尼的这些指控还“未经证实”。但是，有一点是没有什么疑问的，那就是墨索里尼在很多时候确实对暴力和谋杀活动采取了纵容和鼓励的态度，并且他确实恨马泰奥蒂。另外一点也很清楚，即对于由杜米尼领导的法西斯小分队进行的攻击活动，法西斯党的最高层事先是知道的，并且这些活动得到了马里内利、芬齐、切萨雷·罗西和菲利波·菲利佩利的协助。菲利波·菲利佩利是《意大利邮报》的编辑，也是阿纳尔多·墨索里尼与金融界之间的主要联系人。1924年6月9日或10日的晚上，杜米尼以及他的党羽把菲利佩利给他们弄来的汽车在基吉广场边的一个院子里停好，然后谎称杜米尼是罗西的助手，就开始在罗马干了一件大事。同时，这些事件之后的法律程序也已经被设计好了，可以让他们避免遭受彻底的调查。虽

* 事实上，在6月底的时候，墨索里尼还在与人讨论社会党联盟是否能为国家提出一些建议。

然杜米尼和他的小分队中的其他成员后来确实因为这件事进了监狱，但他们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但是，还存在一些其他问题。杜米尼和为他具体干事的人——刽子手阿尔比诺·沃尔皮，在墨索里尼的私人秘书处那里都有备案，其内容确实让人感兴趣。他们两人都直接或者通过家人或朋友给墨索里尼写过信，除了对他表达虔诚的尊重之外，也有坦率的勒索。例如，1929年5月，阿尔比诺·沃尔皮的妻子阿苏马拉·诺尔基·沃尔皮就敦促墨索里尼帮忙给她丈夫在米兰的一个新市场里弄一份营业执照，理由是沃尔皮家族的经济状况不太好，并且阿尔比诺·沃尔皮在“阁下及法西斯的事业中”取得了不小的“功绩”（并且仍然时刻准备着取得更多的功绩）。5年之后，沃尔皮家的经济情况仍然很糟糕，一个朋友又向墨索里尼提起了沃尔皮“对领袖的忠诚、勇气和贡献”，而沃尔皮自己则向墨索里尼保证说，除了为领袖、他所爱的人和家人祈求神灵保佑之外，他并没有做什么其他的事情。

杜米尼与墨索里尼的通信内容更是让人吃惊。到1939年的时候，他已经从法西斯政权的各种津贴中侵吞了大量的数额，官方的统计超过了237万里拉。在给墨索里尼的信中，他很喜欢问这样的问题：“阁下是否忘记了在那危险的几年里，阿梅里戈·杜米尼为法西斯事业所做的事情？”当他向墨索里尼勒索钱财的时候，杜米尼经常把达尔文的理论哲学化，称命运可能很高兴让他“看到我们自己的苦难的终止，同时也会看到所有那些徒劳地想消灭我和我的整个家族的人的消亡”，而与其他地方一样，在法西斯党的高层也同样隐藏着许多恶毒的人。换句话说，杜米尼更多地是把自己看成了法西斯信仰的一个客户或者被委托人，而不是一个无私的士兵。他的母亲写给墨索里尼的一封信能够进一步证实这一点，在这封信中，她向墨索里尼抱怨说把他儿子关在卡拉布里亚的隆戈布科是无法容忍的，因为那地方（位于意大利南部）“就气候、孤独、食物和住房来说，简直就是一个给野兽住的地方。”杜米尼一家不会相信这种说法，即南部的每一个小村庄都是法西斯国家内平等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却知道，作为一个雇主，墨索里尼应当对他的被委托人担负起一定的责任。

墨索里尼与杀害马泰奥蒂的杀手之间的信件更进一步证明了这种雇主—代理人的关系。但是，墨索里尼对于这些谋杀显示出的负罪感说明了什么？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复杂的。在其他政权里，类似杜米尼和沃尔皮等人的勒索是难以得逞的，很少有人会认为敲诈希特勒等人会取得什么成果。还不用和弗朗哥在西班牙对共和党人进行的残酷追剿相比，单单是与纳粹德国在1934年的“长刀之夜”进行的大屠杀相比，不管是从暗杀行动本身还是从事后的处理上来讲，杀害马泰奥蒂的行动都显得很业余和很不成熟。当马泰奥蒂被塞进汽车的时候，附近的一个看门人就看到了他们的汽车车牌号，并且随即对他们进行了跟踪。这些法西斯小分队是真的想杀害这位社会主义者，还是只想把他痛打一顿呢？如果他们的目的是杀

害他，那么杀手们在处理他的尸体的时候就显得太笨了，他们沿着离开罗马的路开到了萨宾山里。据说，他们开着他们的汽车四处兜圈子，一直到汽油快耗光了才停下来在路边挖了一个很浅的坑，把马泰奥蒂的尸体埋了。对于暗杀之后必然引起的谴责和质疑（一直持续到1924年8月16日尸体被发现），他们也没有做什么准备。1924年6月12日，因为担心事情会进一步牵扯到墨索里尼自己，法西斯政府仓促之中决定逮捕杜米尼，这也是一个冒险之举，显然不是事先计划好的行动。最后，墨索里尼不辞辛苦地亲自给马泰奥蒂的遗孀及子女送去了一些经济补偿，这说明他可能觉得心中有愧，也说明他并不像其他独裁者那样残酷无情。如果这是真实的墨索里尼的话，那么说明这位独裁者心目中还存有一丝懊悔，不管是对他的追随者还是对他的牺牲品，这在20世纪历史上那段残忍的时期中的确是与众不同的。

无论如何，暗杀马泰奥蒂这件事在短期内对于墨索里尼对政局的把握都产生了最为重大的影响。在经过最初的犹豫之后（他的妻子拉凯莱、情人马格丽塔·萨尔法蒂都竭尽全力帮他重新振作起来），他下决心要采取行动来巩固自己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地位。他的面前有三股势力，每一股势力都有巨大的潜在的危险。那些信奉自由价值观和法律的旧社会精英们会与他这个涉嫌参与谋杀的总理再行合作吗？那些声称反对法西斯的更为极端的反对派们会怎么样应对这件事呢？最后，各省的法西斯分子对此事又会持什么样的态度呢？他们会不会借此机会把革命进行得更深入、更迅速以清算他们所有的敌人，并且在需要的时候抛弃墨索里尼并拥立更为激进和极端的法西斯领袖呢？

但是，无论是国王、教皇、军队、商界、意大利的政界和民间的精英们，还是众多著名的外国媒体，都没有给墨索里尼找太多的麻烦。《伦敦时报》的一篇社论可以充分代表和总结他们在这件事上所持的态度。这篇社论称，“与其他大多数文明国家相比，在意大利的政治圈里，杀人是更为常见的事……”但是，《伦敦时报》在形式上并没有宽恕这次谋杀，并谴责这些人是打着为法西斯事业服务的幌子搞犯罪活动的一群“乡村恶棍”和“城市小流氓”。这篇社论甚至还宣称墨索里尼可能会“得到他应得的报应”。无论怎样，《伦敦时报》的编辑还是相信这位总理所持的信仰的，并且支持他去战胜“布尔什维克主义”，同时也认为他的衰落是“可怕而令人难以想象的”。

梵蒂冈的《罗马教廷观察》则更愿意原谅这件事或者干脆把它忘掉，它利用一个可预见的比喻鼓吹说：“让那些没有原罪的人先去批判吧。”国王也持这种态度，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在几个月前还赞扬了墨索里尼的工作能力，说他有“出色的吸收和消化信息的能力”，同时还为他战胜“其他派别的低劣游戏”而鼓掌喝彩。大选之后，国王在议会发表演讲时也极力地奉承墨索里尼取得的胜利，称“在“一战”中取得胜利的一代现在执掌了政权”。在马泰奥蒂危机的整个过程中，国

王维克托·伊曼纽尔都拒绝要求墨索里尼自动辞职，对这一事件一直都采取“装聋作哑”的态度，一直到墨索里尼在议会中失去多数派地位。而萨兰德拉的日记内容也表明，他当时也对墨索里尼持支持的态度。国家安全志愿军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特色、它的不正规性和对军队的额外津贴的威胁等，都让军队的领导一直不怎么喜欢它。马泰蒂奥危机发生后，为了在墨索里尼心中赢得更重要的地位，军队向墨索里尼移交了一批作战剩余物资——10万支莱福枪。一些商界的领袖对这一暗杀表示了不满和谴责，吉诺·奥里韦蒂干脆宣称：“（法西斯的）黑旗可能并不比（布尔什维克的）红旗好到哪儿去。”意大利主要的工业家们又捡起了他们引人注目的老话：政治就是一笔肮脏的交易。他们坚持的是利己主义的路线，声称现在是应当专心致志谋取利益的时候，让其他人去做重大的政治决策吧。他们的这种决策在9月份得到了一些甜头：墨索里尼增加了他们在参议院的席位。甚至连自由党哲学家及历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也对“法西斯主义最好的因素”表示支持，并且制止了那些反对墨索里尼的运动。

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当得知有关这次暗杀的最初的消息，以及墨索里尼于6月11日和13日在议会中处于困境的时候——墨索里尼在议会无力地反驳说这是针对他个人的“恶毒的阴谋”——很少有自由党人士为此感到担忧。意大利的股票市场也只是轻微地波动了一下。但是，这一危机很快从一个法律问题或者对社会暴力的容忍的问题转变成了一场法西斯与反法西斯势力之间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意大利旧的社会精英们明白他们应当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之上。

但是，共和党、社会党左翼以及一些民众一起做出了一个严厉的抉择。6月13日，大约有100名议员退出了议会，从而让政府背上了一个违宪的恶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反法西斯人士虽然与墨索里尼有着一些典型的共同之处，但他们却把自己这一举动与罗马共和国时期时一些平民的做法相提并论，自称是“亚文丁退出”。国王、军队和教皇都动摇了，左翼的先锋们也采取了更加严厉和苛刻的立场，但他们自身的特点却决定了他们最终必将遭遇失败的命运。

墨索里尼知道怎样对他们进行迂回包抄。6月17日，他宣布由前民族主义者路易吉·费德佐尼出任内务部长，这是一个绝妙的决策。*费德佐尼是一个受人尊重的人物，由他出任内务部长打消了人们对于法西斯主义的怀疑，以及那些旧的精英才们对于当前正处在苦恼之中的法西斯领袖墨索里尼的怀疑。费德佐尼在这一事件上表现出的顺从态度表明，意大利民族主义者联盟已经同意与民族法西斯党合并了，这也确保了费德佐尼自己不会再搞阴谋策划去妨碍墨索里尼的意志了。

* 同时，法西斯警察头目德博诺被免职，接替他的是没有什么鲜明色彩（但是是一个亲民族主义者的）官员弗朗切斯科·克里斯皮·蒙卡达。

不管怎样，反法西斯人士逐渐发现，他们采取的不合作态度可能不会有什么结果。时间的推移对他们也不利，他们的许多分支机构都暴露了。到1924年11月的时候，共产党领导人葛兰西已经变成了一个最高纲领主义者，他失望地总结说，“客观地讲”，法西斯主义和自由民主是类似的。在法西斯小分队多年不停的攻击之下，工人阶级已经非常衰弱，变成了没有什么活力和目标的“分散的、支离破碎的民众”。他抱怨说，意大利共产党没有什么路线和方法来控制局面。*较为温和的一些的社会党人对共产主义者的不妥协态度感到很吃惊，但对于他们敦促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团结却充耳不闻。民主党人士乔瓦尼·阿门多拉又退回到了原来的不妥协态度，声称：“我们这些有修养的中产阶级才是意大利最后的希望。”他的这种态度让那些确信自己是为工人或者农民服务的人听起来肯定不会太顺耳。路易吉·阿尔贝蒂尼也不在《晚邮报》上与法西斯主义眉来眼去了，虽然有些迟到，但他还是勇敢地站出来再次肯定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但是，虽然他的报纸的发行量有所增加，但报纸的编辑还是没有能够为这场危机提出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在天主教人士中，斯图尔佐和德·加斯佩里在考虑是否应当取消不与社会主义者联盟的禁令，但是更具权威的教廷发言人宣布，整个亚文丁试验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在法西斯统治下最黑暗的日子里，反法西斯人士可能会认为亚文丁的经历帮助锻炼了他们的政治理解力，但是，他们很快就明白，在1924年的环境中，他们对墨索里尼的权力控制还构不成大的威胁。

更为喧闹的还是法西斯分子自己，当时他们中最为典型的人物是法里纳奇。他在自己的报纸《克雷莫纳新闻》上表达了自己坚定不移和毫不妥协的态度。早在6月14日，他就警告说，如果各省的法西斯相信是党的领导人背叛了他们，那么麻烦就大了。虽然墨索里尼在罗马发表了多次具有政治家风范的出色的演讲，但是法西斯已经不能从“依靠战胜那些被征服者而获得的权利”中回头了。墨索里尼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一个法西斯的国家，并且必须背水一战，义无反顾。

相比之下，墨索里尼自己的口气却有些摇摆不定，他费尽心思地尽说些听众们爱听的话。虽然为了对付反对派和任何“颠覆活动”的复活，他自己也组织过官方的法西斯集会，但是，当他走出最初的迷惘之后，他便命令他的官员们及时地向他汇报有关情况，特别是法西斯极端分子的情况。

他继续谴责持不同政见的法西斯分子杀害了马泰奥蒂，并否认自己个人对此负有任意的责任。他还在《意大利人民报》上发表文章说，这一暗杀行动是“野蛮的、没有任何用处的、反法西斯的，并且用政治的观点来看，也是反对墨索里

* 在反法西斯的各派别创立“亚文丁联盟”仅一周后，共产主义者又主动从中退出。

尼本人的。”*墨索里尼用任命费德佐尼来向议会下院保证，他还是喜欢“法制”和“国家的和解”的。然而，他还是加上了一点野蛮的暗示，宣称无意“放弃那些我们负有极为神圣的义务并且将不惜一切代价捍卫的原则”。他也向法西斯党的最高委员会传递了类似的信息。民族主义者现在已经与其他势力完全融合在一起了，毕竟，“法西斯主义”是由旧有的各种“主义”组合而成的。他继续补充说：“意大利的法西斯化必须继续进行，但是不能强制性地加快这一进程的速度。”

几周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他的政府居然挺了过来，墨索里尼认为是自己的努力赢得了自由党的精英。他宣布，新的意大利在国内和国外都需要和平，但是这种和平是建立在“尊严、骄傲和纪律”的基础之上的。法西斯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合作是“可能和值得的，结果是丰硕的。”法西斯主义已经走过了使用大棒和蓖麻油的时代，现在甚至应当表现得温和一点了。“当有一天国家对我感到厌烦的时候，我不会生气地摔门而去，我会平静而问心无愧地离开，因为在从银行到外交政策等每个领域里遇到的那么多重大而艰巨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这些诱人的话语让类似法里纳奇这样的人更为迫切地感受到，在自己的话语中一定要避免任何“威胁和恫吓”。墨索里尼告诫说：“你不能只摇动一枝橄榄枝，而应当摇动一整片橄榄树林才对。”

但是第二起暗杀却把这一危机引向了另外一个方向。9月12日，法西斯代表及工会主义者阿尔曼多·卡萨利尼在罗马大街上被射杀。看起来，现在是血债要用血来还了。法里纳奇立即做出了反应，呼吁适可而止，并要求阿门多拉、阿尔贝蒂尼、斯图尔佐和图拉蒂为法西斯付出的牺牲负责。像他自己这样真正的法西斯已经不能再容忍自己的手被束缚起来了，妥协只可能是别人干的事。他号召各省的法西斯分子支持和拥护自己，并敦促说：“绝不能把但丁和马志尼的国家拱手送给列宁。”

有一段时间，墨索里尼反对并顶住了要求法西斯小分队发动“第二波”攻势的压力，至少在公开场合他是这么表示的。10月4日，他小心谨慎、虔诚而又带着些明显的军事领导人的精神声称：“一旦哪一天军队变得具有煽动性了，那么国家就会有致命的危险。”此外，他又开始趁机讨好位于米兰的博科尼大学里的诗人和知识分子了（他还适度谦虚地报怨说，自己至今也没有得到合适的做学问的机会）。他还到意大利旅游俱乐部——米兰资产阶级的一个爱国堡垒——进行了官方的朝拜。另外，他还非常礼貌而得体地对贾科莫·普契尼的去世表示哀悼，称他的音乐为意大利这个国家带来了“纯洁而辉煌的荣誉”。在北部许多小城镇里发表

* 一些更加忠诚的法西斯媒体也随即跟风奉承。最典型的是博塔伊，他写文章称这一暗杀是“最为残忍的、没有人性和愚蠢的犯罪行为”，简直就是“政治行为向犯罪的蜕化”。

演讲的时候，他也从来都没有忘记赞扬当地人的美德。但是，他还是没有采取什么行动。事实上，他在11月11日又一次向议会保证说“拉西主义”正在减退，并且“一些法西斯分子的违法行为已经不单单是无法容忍了，而是应当受到严厉的惩罚”。一周之后，他又在参议院半开玩笑地说：“否则，那些反法西斯的派别也可以再来一次‘法西斯’亚文丁退出嘛。”

行动还是要有一些的。到了12月份，急切地叫嚣要采取行动的人已经不止法里纳奇一个了，而有关马泰奥蒂被害一事的司法调查已经触及德博诺和芬齐了，并且墨索里尼自己也再一次面临被控有罪的威胁。另外还有谣言说，法西斯内阁中也发生了公开的意见不一，德斯特凡尼请求辞职，而包括费德佐尼在内的众多由前自由党和民族主义人士担任的部长也都惶惶不安，并且很难控制。法西斯分子中的不满也在不断增长，这些不满主要集中在费德佐尼担任内务部长这件事以及墨索里尼自己无休止的推诿和搪塞上。尽管法里纳奇对墨索里尼的潜在的竞争者提出了告诫，称“意大利只能有一个神话——那就是领袖”，但他还是敦促他的领导墨索里尼尽快吹响发动进攻的号声。托斯卡纳的极端法西斯分子库尔齐奥·祖克特（他的笔名库尔齐奥·马拉帕尔泰更为人所知）毫不悔改地对墨索里尼本人发动了进攻，声称“并不是墨索里尼带领法西斯夺得了总理的位置，而是法西斯帮他夺取了权力。”现在，“墨索里尼必须服从各省法西斯的革命意志，要么就把革命赋予他的权力交出来，即使是暂时交出一段时间也行。”

压力在不断地积累，事情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1924年12月30日，墨索里尼指示各级官员转告所有在家过圣诞节的议员们，让他们必须全部回来参加将于1月3日举行的议会会议，届时总理将发表重要讲话。墨索里尼还试图让公众保持平静——据广泛流传的一个故事说，1925年1月2日，一个来访者在早上9点钟与墨索里尼见了面，并且两人还一起讨论了但丁散文的高雅优美的风格及其意义。墨索里尼还声称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即每天早晨都要读一篇但丁的诗歌，这也意味着他在第二天发表的演讲的内容将肯定会受到这位伟大的民族诗人的影响。然而毫无疑问，尽管他还在担心国王、军队和旧的精英们可能会对各种形式的法西斯政变做出负面的反应，但他现在已经被说服并已下定决心要公开地解决危机了。

墨索里尼在议会发表的演讲言辞非常激烈，把反法西斯的“亚文丁联盟”的行动谴责为“从其目的来看是一次违反宪法的退出，一次不能接受的事变。”墨索里尼自己则是一个“通情达理的聪明人，一个很有勇气的人，并且完全不在乎利益的得失。”如果他想建立一个切卡，那么他就会全身心地投入这件事。不管在6月份里有什么样的阴谋，现在“我对议会和全体意大利人民宣布，我，一个人，对已经发生的事情负有政治的、道德的和历史的责任。”“如果这些暴力活动的爆发是特殊的历史、政治和道德环境造成的结果，那么我也应当对此负责，因为从开

始主张参加“一战”一直到现在，是我发起了一个宣传运动并创造了这一历史、政治和道德环境。”在演讲即将结束时，他又宣称：“当两股无法协调的力量相遇时，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武力。”墨索里尼说完这些话沉默了片刻，这时一位竞争对手注意到，法里纳奇带头第一个大步穿过议会大厅走上台握住了墨索里尼的手。1925年1月3日，马泰奥蒂事件终于尘埃落定，而贝尼托·墨索里尼也宣告成为意大利的法西斯独裁者。

言辞之后就是行动。1月12日，国王批准了墨索里尼的新内阁。在当时和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也有一些人离开内阁，主要是自由党人士。到了8月份，墨索里尼自己已经集总理、外交部长、战争部长、海军部长、民航部长于一身了。后来，他又兼任了社团部长（1926~1929年）、殖民地部长（1928~1929年）和公共事务部长（1929年）。此外，1926年11月，墨索里尼又重新把内务部长这一职位抓到了自己的手中。这种权力的轮回有它独特的一面，身兼数职并不是巩固个人权力的最为明显的途径，希特勒和弗朗哥从来都没有像墨索里尼这样做过。当然，墨索里尼兼任的众多部长职务的绝大部分日常工作都是由副部长们来做的，而这些副部长职务绝大多数又是由法西斯分子担任的。例如，格兰迪从1925年5月起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巴尔博从1926年11月起担任民航部副部长，泰鲁齐、比安基和阿尔皮纳蒂都先后担任过内务部副部长（比安基还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公共事务部副部长），琼塔担任副总理，博塔伊则担任社团部副部长，就连已经从马泰奥蒂事件中脱身的亚历山德罗·莱索纳，迪诺·阿尔菲耶里以及德博诺也在其他部门担任了副部长。从1925年7月起，朱塞佩·沃尔皮接替德斯特凡尼担任了财政部长。此人曾奉行焦利蒂的路线，以前是一个中立主义者，在自由党执政时期最终被阿门多拉任命为的黎波里塔尼亚的总督，从1922年10月起，他也开始心甘情愿地为法西斯效命了。通常，独裁统治在意识形态方面都有实用性的特点，例如，沃尔皮直到1923年7月才加入法西斯，但他却声称自己早在1921年1月就已经是法西斯的成员了（他还夸口说，1922年，自己曾在46家公司的董事会里任职）。后来担任殖民地部长的莱索纳逐渐地扮演起了墨索里尼与阿尔巴尼亚政客艾哈迈德·索古之间的沟通渠道的角色。从1925年1月起，已是总统的索古又在1928年成为了国王索古一世。作为对莱索纳在行贿和外交方面的技巧的回报，法西斯党的历史上也对他进行了记载。

随着政府职位的变化，法西斯党内部的管理层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在经受了马泰奥蒂事件的阵痛之后，1924年8月，法西斯党成立了一个包含15个成员在内的紧急情况指导委员会。1925年2月12日，墨索里尼任命法里纳奇为民族法西斯党唯一的书记，并且宣布将在党内肃清腐败分子、对事业没有热情的人、一心想发迹的人和玩世不恭者。墨索里尼对法里纳奇这位新上任的党的书记下令说，法西斯党各地方上的争论必须被限制在地方上，不能破坏“法西斯主义和政府工作

的声誉”。墨索里尼任命自己潜在的竞争对手法里纳奇为法西斯党的书记是为了加强对各地方法西斯党的控制，这是一种“让贼来捉贼”的方法。法里纳奇虽然在法西斯政权内担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但墨索里尼却掌握了他受贿的事实和其他一些弱点，因此能够很容易地控制他。墨索里尼后来还多次使用了这种手段。法西斯党在经过肃清之后又经历了大的扩张：在法里纳奇的管理下，党员人数在1924年下半年减少到了不足60万；但1926年又猛增到93.8万人。民族法西斯党的大门再次敞开了，那些有眼光、能够认识到加入法西斯党的好处的人，以及那些能够认识到打算长期执政的墨索里尼将会给他们带来好处的人，都纷纷加入了民族法西斯党。

从心理学上讲，墨索里尼与法里纳奇之间的关系非常有趣，反映出了法西斯政府和他的领导人的许多问题。法里纳奇是一个极端主义者，并且得到了诸如马拉帕尔泰等许多不同类型的法西斯革命者的认可，而狂热的反犹太主义者普雷齐奥西和他的报纸《意大利生活》也对墨索里尼表示支持。法里纳奇原本是一个铁路工人和社会主义者，他最高兴做的事就是谴责对宗教的虔诚，还喜欢对任何礼貌和庄重进行嘲弄。他在法西斯政权中担任主要职务几乎一直到法西斯灭亡，并且坚定地支持与纳粹结盟，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者。法里纳奇更像是一个坦慕尼协会*的成员，而不太像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狂热分子。**虽然他在法西斯媒体中扮演着一个非常显眼的角色，并且还厚颜无耻地公开为杜米尼和杀害马泰蒂奥的凶手辩护，但他既不是一个希姆莱***，也不是一个戈培尔****。除了他自己，他对于其他任何人和任何信仰都不会发自内心地相信。并且，任何妨碍他发财和成名的人都会让他暴怒不已。

法里纳奇经常与墨索里尼通信，他的信件通常是充满热情的，但是他心里明白，意识形态最终都是虚无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显然墨索里尼也持

* 坦慕尼协会，成立于1789年的纽约市，是一个民主党实力派组织，由原先的慈善团体发展而成，因其在19世纪犯下的种种劣迹而成为腐败政治的同义词。

——译者注

** 虽然法西斯政权早就对公共暴力进行了劝阻，但根据墨索里尼的秘密档案的记载，到了1928年的时候，法里纳奇还与法西斯记者、墨索里尼的吹捧者埃米利奥·塞蒂梅利进行了决斗。

——作者注

*** 希姆莱(1900~1945)，德国纳粹头子，权力仅次于希特勒。他领导纳粹的精英——保安梯队负责指挥第三帝国的警察和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协调集中营和灭绝集中营的行动。被英军俘虏后自杀身亡。

——译者注

**** 戈培尔(1897~1945)，德国纳粹宣传部长。他利用德军电台、新闻媒介、电影和剧院发动反对犹太人和其他团体的政治宣传，极端忠实于希特勒，德国战败后他杀掉全家并自杀。

——译者注

这种观点。同时，法里纳奇经常就法西斯理论和实践的脱节进行指责，但墨索里尼每次都容忍了他，有时甚至还有些喜欢听这种指责（他也经常宣称自己是一个说真话的法西斯）。同样，墨索里尼也喜欢偶尔与同样务实的妻子联系一下。法里纳奇坦率地承认，在墨索里尼及其同事中，他唯独把墨索里尼当做自己的一个“兄长和朋友”。但是这种兄弟间的亲密关系也是有限度的，在墨索里尼的秘密档案中就有一些证据让他能够轻易地控制法里纳奇：克雷莫纳的法西斯头目以最为直接的方式一字不漏地剽窃了法里纳奇的电话内容，从而自己也得到了一笔不错的报酬。*墨索里尼把电话的内容进行了夸大，并且以正式通知的形式声称，法里纳奇的所作所为足够判上半年监禁了。

除了民族法西斯党自身以外，其他的社会力量都必须调整自己来适应这种公开的独裁统治。尽管到1925年5月的时候，墨索里尼还没有对军队的一些重要职位做出任命，但是他一直在关注着军队，因为他非常明白，在任何社会里，权力都潜在地来自武装集团。在伊松佐的僵局和在卡波雷托的惨败都在意大利军队的历史上留下了重大的污点。“一战”过后，一些专家们在怎样才能让武装力量更加现代化和更有效率这一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尽管一直没有把细节问题讲得很清楚，但一些极端主义者已经在叫嚣着要建立一支平民化的国家军队了。军队中数量众多的将军（1914年有176名，而1919年则增加到了556名）则以一种更为审慎的态度对待国家发生的变化，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下降。在法西斯崛起并掌权的过程中，有关军队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军官整体的工资和待遇上。1922年，墨索里尼先后任命了4个人担任战争部长，由此可以看出，军官的工资和待遇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据说，对于法西斯分子对“前失败主义者”的攻击，军队的领导层一直保持着高度的忍耐。军方的报纸《意大利军队》也在1922年10月31日为“我们的革命”欢呼，但之后又解释说法西斯主义取得胜利很好，因为“革命其实没有向意大利人民展现什么新的东西。”

从1922年到1925年，迪亚兹主持了军事力量的改组重建工作，但调整之后的军队仍然是一支非常保守的军队，因为德斯特凡尼大幅削减了国防预算。但是，用来为军官、特别是将军们加薪的钱还是筹集到了。从1924年11月开始，军队设立了一个新的军衔——元帅（这一做法暗含的意思是，意大利人也可以与拿破仑在法国设立的军事体系相匹配了，从而可以避免在国际会议上处于弱势地位而“蒙羞”）。1924年，迪亚兹不严谨的传统主义受到了广泛的攻击，尤其是他的那些竞争对手，如安东尼奥·迪焦尔焦将军和加埃塔诺·贾尔迪诺将军等。他与国家安

* 墨索里尼的秘密档案中保存了对法里纳奇的电话进行窃听的记录。1932年，法里纳奇在电话中夸口说作为一个律师，他自己每年能赚到70万里拉。

全志愿军之间的关系仍然非常微妙。

墨索里尼这个独裁者快刀斩乱麻地解决了这些难题。他任命彼得罗·巴多利奥担任了军队中类似总参谋长的职位，而彼得罗·巴多利奥以前就曾在尼蒂和焦利蒂的政府中担任过同样的职务。巴多利奥是法西斯政权内的一个不倒翁，他担任这一职位一直到1940年秋天意大利军队在希腊遭受重大失败时。巴多利奥出身于皮埃蒙特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祖辈也是自由党人，而他自己后来则贵为亚的斯亚贝巴公爵。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曾在皮埃蒙特的多个城镇里当过镇长或市长。意大利军队在卡波雷托遭遇惨败之后，社会各界都指责他应当为此事负直接责任，同时还指责他极不愿意就军队的规划、后勤和士气进行任何彻底的调查。巴多利奥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在法西斯进军罗马的前夕，他曾公开表示，如果接到命令，他将向法西斯开火。然而，当法西斯夺取了国家权力之后，他又欣然接受了法西斯政府。1923年，他狡猾地选择了《克雷莫纳新闻》表达自己对法西斯政权的“健康的影响和作用”的崇敬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已经转变成为一个提倡进行极端军事改革的人，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任命巴多利奥为总参谋长是让军队保持稳定的一个信号，军队主要关注的还是如何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巴多利奥也很少放弃收受贿赂的机会）。

巴多利奥看起来好像并没有什么野心，但墨索里尼还是对他不放心，于是新设立了一个副总参谋长的职位来牵制他，并任命弗朗切斯科·萨韦里奥·格拉齐奥利将军担任这一职务。此人虽然表面上宣称自己支持法西斯，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变化无常和靠不住的人，并且很招巴多利奥的讨厌。而墨索里尼自己则兼任战争部长一职，这样他对军队的控制就安全多了。正如意大利杰出的军事历史学家焦尔焦·罗沙所讲的那样，墨索里尼的策略和计谋创造了“一支有着太多的军官和太少的士兵的军队，物资储备不足，军事体系陈旧低效，管理成本很高，同时其成员一个个都野心勃勃。”但是，法西斯政权对反法西斯媒体的打压也让它很轻松地避免了来自各方的批评。即使罗沙不说，有一点也很清楚，那就是如果不出现全面的危机和灾难，这支军队将会忠于墨索里尼。但是军队最终的倾向还是更亲近于国王和意大利各种旧的机构，而不是法西斯党及其宣称的“革命”。1925年，军队中最主要的一些将领理由很充分地相信，他们已经成功地让领袖进行了调整从而达到了他们自己的目标。

此时，马泰奥蒂被害一案及其产生的后果、实现独裁统治以及身兼数职给他带来的忙乱，都开始让墨索里尼付出代价了。1925年2月15日凌晨4点钟，也就是在墨索里尼让法里纳奇担任民族法西斯党的书记仅3天之后，原来一直是那么精力充沛、那么闯劲十足、那么敢做敢为、那么不屈不挠、那么轻松自信、已经被赋予一种坚强的男子汉形象的墨索里尼却突然病倒了。这可是一场严重的危机。在拉塞拉路的公寓里，他吐血了，房东赶紧叫来了好几个医生。这些医生诊断墨

索里尼患了溃疡，建议静养并改变膳食。墨索里尼连续几周没有在公共场合露面，于是外面开始谣言满天，说他已经病入膏肓了，还说费德佐尼正在与萨兰德拉和焦利蒂商量共同执政并奉行温和的路线，同时取代墨索里尼并抵御法西斯三巨头法里纳奇、德韦基和琼塔的威胁。秘密警察把这些收集到的谣言都报告给了墨索里尼。即使在后来康复之后，墨索里尼也很少吃肉，喝酒也很有节制。他的一个儿子的同学后来回忆说，墨索里尼曾简单地说起过午餐时喝酸奶的好处。一些满怀崇拜之情来访问的记者，尤其是女记者，很可能会享受到许多墨索里尼爱吃的水果和蔬菜，并注意到他吃肉、喝酒及咖啡方面很有节制这一高贵的习惯。他还抽时间给十几岁的女儿埃达送去他从报纸上剪下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尼古丁会使你变丑并且损害你的健康》。他承认自己在战争期间抽了“无数支”香烟，这损害了他的胃黏膜并让他患上黏膜炎。他最后用父亲式的告诫总结说：“你将会为生活中所有的事情付出代价的。”

1925年春天，医生还在犹豫是否要给墨索里尼做一个手术，但这对墨索里尼来说是难以接受的。所有这一切都是悄悄进行的，甚至连妻子拉凯莱都根本不知道丈夫的健康状况的恶化。在他们的婚姻的这个阶段，两个人的联系不多，而他们的儿女埃达后来甚至宣称，为了安慰自己，母亲曾一度有一个来自弗利的情人。如果埃达的话是真的，那么只会增加墨索里尼生活中的压力和紧张。墨索里尼可能不太情愿地向那些更加敏感的来访者承认，自己正“过着紧张不安的生活”，但他的公共形象却不能因为任何外在的虚弱而被破坏。事实上，墨索里尼还刚刚在《等级制度》上发表了一篇赞颂他的忠实的追随者的文章，但他在文章中却把战胜亚文丁联盟和法西斯异见分子的功劳全都归到了自己的身上。他说，法西斯的军事机构也应当效法这种顺从，只接受他一个人的指挥。从1925年开始，墨索里尼这个人，墨索里尼所代表的感召力和权力，以及“领袖”所代表的概念，都走上了一条与以前不同的道路。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拉凯莱与墨索里尼的孩子们一起搬到了卡皮纳别墅，而她的母亲安娜也在这里去世。那几月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是一段痛苦的日子：头一年，拉凯莱的两个姐妹相继去世。一个是死于癌症的皮纳，她去世的时候才35岁，撇下了7个孩子；另一个是死于难产的焦万纳，她当时已经有14个孩子了。1925年12月28日，贝尼托和拉凯莱终于在一个教堂里举行了婚礼，并为他们的3个孩子举行了洗礼（施行洗礼的是阿纳尔多·墨索里尼的妻子的兄弟）。这件事在政治上又有了说法，谣言开始流传说天主教教廷和法西斯统治的意大利已经达成了妥协。但是，墨索里尼与拉凯莱按宗教仪式举行婚礼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他开始体会到生命的脆弱了。

当然，这个大家庭并没有忽视与贝尼托·墨索里尼的亲戚关系能够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他们也知道一些有关“雇主—代理人”的关系。根据一份1927年保存

下来的典型文件的记载，当地的法西斯首领曾给普雷达皮奥当局写信报告说：

“领袖几乎被他的亲戚们提出的补贴照顾的要求包围了。事情正在变得让人厌烦，甚至有点不像话了。赶快回到普雷达皮奥来，并对公共注册档案和教堂里的洗礼记录进行彻底的调查，并用合适的方法迅速把随后附上的6万里拉分给领袖的这些亲戚们。领袖对你们为他所做的事情将会深深地感激。顺致法西斯革命的敬礼。”

一位居心不良的历史学家制作了一个表格，列出了到1943年为止通过与墨索里尼一家的关系从政府领取各种补助的总计334名亲戚中，有105名是拉凯莱家的亲戚，另外229名是贝尼托家的亲戚。有关这些亲戚的琐事都没有正式公开，但是毫无疑问是有人知道的，特别是在罗马涅地区。他们认为这也是人之常情。

墨索里尼家族在公众中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罗马诺·墨索里尼生于1927年9月，虽然起了一个像皇帝似的名字，但却是凡人一个。安娜·玛丽亚生于1929年9月，她和罗马诺大概都是在头一年的圣诞节在母亲肚子里扎下根的。墨索里尼家族在尽他们的最大努力来促进国家人口的增长，这在法西斯领导层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另外，在马泰奥蒂危机刚刚开始之后，埃达·墨索里尼就从米兰的一所高中转到了意大利最有名气的女子学院——位于佛罗伦萨附近的“至圣的圣母玛丽亚”学院。*即使是在那里，也有谣言说她比那些同班的贵族子弟还要狂野。**1928年，她又被送到了印度。***很快，她需要有一个丈夫了（她的丈夫的候选人的性格、前途和政治关系都要经过秘密警察的审查）。根据她父亲的命令，所有寄给她的信和邮件都要经过检查之后再送给她。

埃达的兄弟们都十几岁了，他们偶尔也在外出郊游或者在做一些家庭运动时与父亲合几张影，但是墨索里尼与他们的关系并不是特别亲密。墨索里尼的一个儿子回忆说，父亲宁可去抚摸家里养的猫也不愿拥抱一下自己的子女。维托里奥、特别是布鲁诺在年轻的时候都是沉默寡言，不像是新兴的统治阶层的子弟，也可能与此有关吧。墨索里尼偶尔也回家几次，但一般都喜欢一个人吃饭。同时代的人注意到，墨索里尼一家不喜欢聊天。1925年之后，也许是因为胃痛病经常发作的缘故，墨索里尼更加不喜欢绝大多数形式的身体接触了。从1925年开始，墨

* 1925年11月1日，墨索里尼给学校的领导写信说，他认为学校应当像对待埃达的同学一样对待她。

——作者注

** 1929年9月15日，秘密警察向墨索里尼报告说，埃达到博洛尼亚去见一个与她不相称的男孩。

——作者注

*** 1929年1月29日，墨索里尼在给埃达的信中亲切地欢迎她回来。

——作者注

索里尼经常会用手去按住自己的下腹部以缓解突然袭来的阵痛。虽然口头上还说着一大堆革命性的大话，但也许是因为这种生理上的折磨和心理上的紧张以及厌食（有很多种食物他吃起来都觉得没有味道），让墨索里尼“在内心里对什么事情都不相信”。在虚华的外表下，一种阴郁暗淡的感觉正在萌生回旋。

墨索里尼的私生活可能趋于平淡了，但在这些年里，对他个人的感召力和魅力的制造和巩固的活动一直在快速不停地进行着。1923年的时候，阿尔皮纳蒂认为有必要为墨索里尼搞一次衣锦还乡的活动，于是便导演了一场从艾达出发迎接领袖的游行活动。从那之后，墨索里尼的光辉伟大的形象便更没有止境了。1925年是天主教的大赦年，在大赦年的庆祝活动中，墨索里尼也被列入了可以参观或访问的对象。正如一位美国记者所说的那样：“所有来到罗马的人都想见见墨索里尼。除了参观古迹或者走一走那些古代的英雄们曾经走过的地方之外，能见到墨索里尼成了访问这座不朽的城市的另外一个主要目的。由阿纳尔多推荐给墨索里尼的一个记者莱奥·隆加内西此时发明了一句口号并开始流传开来：墨索里尼永远是正确的。一个虚构的墨索里尼开始出现了，他可以洞察人们的思想，甚至可以进入他们的梦境中去。一个法西斯宣传家宣称，村民们越来越相信，墨索里尼是一个一年到头都在开着摩托车或者汽车独自进行长途旅行的圣诞老人，并且在某一天晚上路过了他们家门口。这样一个墨索里尼不用睡觉，无处不在，他正在具备圣人或者上帝的某些特点。

不光是地位卑微的老百姓迷信墨索里尼，就连一些政治家也在逐渐变成精于阿谀奉承的老手了。例如，自认为是法西斯领导层中最为理性的朱塞佩·博塔伊*也开始又一次强调他对墨索里尼的“思想和方法的无限忠诚”。他和他和朋友们清楚，他们是“在法西斯主义中工作，也是为法西斯主义工作，并且首先是为您工作，我们承认您是我们这一代的精神领袖。”后来，博塔伊又把墨索里尼的美德和优点与法里纳奇之类不那么杰出的法西斯党成员的“慢性反叛”作了比较。**费德佐尼也向墨索里尼表达了他的“个人的无限忠诚”，称他的领袖必须注意自己的健康，因为“您的健康不仅仅是您自己的，而且是我们所有人的健康，它是属于全体意大利人民的。”即使是法里纳奇也表示赞同地说：“您担负的责任比我们其他所有人的都重要，您的生命并不是属于您自己的，而是属于全体意大利人民的”。然而，法里纳奇在写给墨索里尼的信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尊重的语调就不是那么可信了。法里纳奇曾劝告墨索里尼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飞行，墨索里尼对此大为恼火，但法

* 为他写传记的作家进一步吹嘘说，博塔伊是意大利历届内阁中最聪明的部长之一。

——作者注

** 博塔伊声称他从不赞同过分的阿谀奉承，但是……“领袖的确是一个非凡的人物”。

——作者注

里纳奇却在写给墨索里尼的信中反唇相讥地说：“从现在开始，我将改变对您的建议，支持您去飞行，并且还要建议您在开车时把时速保持在150公里以上。”

在塑造墨索里尼形象的过程中，运动以及与之有关的男子汉气概和现代性都是宣传家们坚持不懈的主题。一位评论家还声称，虽然运动好像一度曾经是“英国制造”，但现在领袖自己“无论从观念上、训练上还是从实际行动上讲”，已经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运动员了。法西斯宣传家们向人们描述了墨索里尼一天中典型的运动安排。他早上7点钟起床，先洗个冷水澡，迅速地喝下一杯牛奶，然后就开始一个小时的骑马，他跳上马背的姿势就像是一个“天生的牛仔”。骑马活动结束后，他将继续练习剑术。他喜欢最为男子化的凶狠的武器——长剑，练习剑术时，他双唇紧闭，神情坚毅，并且他的击剑技术“完全是个人独有的风格，灵活多变，诡计多端，擅用突然反击，经常出乎对手的逻辑意料之外，让对手就像耶稣受难那样被击中”。同样，他还很喜欢游泳，还对一个美国记者说，他很渴望有时间去练一练足球、网球甚至高尔夫球。无怪乎于1928年创刊的《法西斯体育报》在第1期上就称墨索里尼为“领袖、飞行员、剑客、骑士、意大利的第一个运动员”。

除了沉迷于运动之外，墨索里尼还喜欢上了照相。早在20世纪20年代，一个观察家就宣称，墨索里尼是历史上照相最多的人。通过媒体或者明信片等渠道，他的图片被广泛地散布到意大利民众中间。早在1922年之前，意大利人就习惯于收集亚平宁半岛上无数的描绘着圣人的物品作为纪念品，并以此来显示自己的虔诚。根据现在的估计，流传于世的墨索里尼的照片大约有3000万张，记录了墨索里尼的大约2500个姿势，这是一个把政治生活神圣化和商业化的一个新奇的例子。1926年，一个14岁的发烧友克拉雷塔·佩塔奇（她是教皇的医生的女儿）把她的整个房间都贴满了墨索里尼的图片，她当时的动机可能与几十年之后的青少年们珍藏流行艺术明星和足球明星们的照片的动机是一样的。满屋的墨索里尼的图片让年轻的佩塔奇如此激动，她于是给墨索里尼写了一封信，并且在信中附上了自己创作的几段对墨索里尼表示崇敬的诗句。也是在那一年，一位牧师赶在罗马教廷之前发现了一种把天主教教义和法西斯主义融合在一起的方法。于是，崇敬墨索里尼的人们被告知，墨索里尼是阿西尼的圣·弗朗西斯*再生。

墨索里尼的形象中有一个非常突出而富有人性化的特点，那就是他在公共场所或者照片上出现时喜欢把身上的汗或者水擦干，这在今天对于我们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在当时却还是很新奇的。墨索里尼爱出汗，他在游泳之后会把身

* 阿西尼城是意大利中部佩鲁贾东南偏东的一个城镇。圣·弗朗西斯1182年生于此地。1223年，他在这里建立了马厩圣地（宗教活动场所），并邀请当地的人们到这里来唱圣经颂歌。

上的水擦干，在滑雪（或者参加收割庄稼）前会把衬衣脱掉，这对于当时绝大部分人来说都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做法。他的身体给人们留下了一种能够引起忠诚的“余象”。希特勒、斯大林、列宁、鲍德温、张伯伦、罗斯福、勃鲁姆*和佛朗哥等从这方面来讲，看上去都显然不太像“男人”，他们都没有墨索里尼那么豪放，都羞怯地把自己的身体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

同样，虽然事实上已经深受他的健康状况的影响，但法西斯政权却从未否认过墨索里尼的性能力，而是同样把它与墨索里尼的形象和感召力联系在了一起。**法西斯的宣传在不断神化墨索里尼，并且在法西斯独裁政权存在的过程中更是愈演愈烈，把墨索里尼形容为“像花岗岩一样坚硬”，一个“绝无仅有的人”，并且不可避免地没有什么朋友，已经远远地超脱了一般的感情。但是，他也有人性化的一面，他无处不在，并且时时刻刻在观察着人们。也许这种特殊的神化和亵渎的混和可以用来解释一个崇拜墨索里尼的十几岁的小女孩写给墨索里尼的信。她在信中透露说，她刚刚第一次领完圣餐，心中充满了耶稣和墨索里尼赋予她的希望。“你们两个将停留在我的舌头上，落在我的胸上，落在我可怜的心上。你们是多么的好啊！”圣餐变体论***、口交和更为普通的性交，这些都混合交织在她的意识中，这实际上就是后来所谓的性感染力。这种力量后来甚至扩展而影响到了外国政要的夫人们。克莱芒蒂娜·丘吉尔在1926年3月会见了墨索里尼之后发现他“相当单纯而自然，非常威严……有一双美丽的、金棕色的、极富穿透力的眼睛，你可以理解它，但却无法与它对视”。总而言之，“墨索里尼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非常出色的男人。”她还非常高兴地向墨索里尼索要了一张签名照片作为纪念。阿斯奎斯****的夫人则更为简单地表达了她对墨索里尼的“肌肉”和“非凡的活力”的喜爱（毫无疑问墨索里尼与她的丈夫是不一样的类型）。张伯伦夫人也是一个长期的墨索里尼迷，她还喜欢珍藏各种法西斯徽章。*****据称，英国驻意大利大使的夫人西

* 勃鲁姆（1872~1950），法国社会党政治家，曾担任总理（1936~1937年，1938年及1946~1947年），在第二次大战期间被维希政权判刑入狱（1940~1945年）。

——译者注

** 对墨索里尼的性能力的最夸张的描述出现在“战后”。墨索里尼的勤务兵在回忆录中声称，墨索里尼几乎每天都要换一个女人，但是他通常与每个女人都只搞两三分钟。

——作者注

*** 圣餐变体论，一种认为尽管圣餐面包和葡萄酒的外表没有变化但已经变成了耶稣的身体和血的主张。

——译者注

**** 阿斯奎斯（1852~1928），英国自由党政治家和首相（1908~1916年）。

——译者注

***** 根据墨索里尼的备忘录的记载，他在这几年中与张伯伦一家至少有4次私人会面。

——作者注

比尔·格雷厄姆也非常迷恋墨索里尼。*在之后的10年里,许多贵妇人都热衷于能和墨索里尼一起喝上一杯茶。

不管墨索里尼的感召力是多么突出,他并不是没有受到任何的挑战,毕竟意大利仍然是一个君主制的国家。可以想见,也会有人出面来为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树立光辉的形象,虽然他长了个五短身材——玛格丽塔·萨尔法蒂恶毒地把他描述为一个坐在皇帝的宝座上但两脚却永远挨不着地的国王。但他还是被强调性地称为“法西斯政权的国王”,特别是在1925年6月他的登基纪念期间。有些宣传家相信,维克托·伊曼纽尔可以成为“国家和民族意志的最佳代言人”和“意大利的第一个士兵”。

当维托里奥来到罗马这个伟大帝国的首都时,他也有一项义不容辞的表示尊敬的责任,那就是去拜见教皇。就感召力而言,教皇庇护十一世是另外一个有竞争力的重要砝码。教皇甚至也被描述成为一个体育爱好者,他的崇拜者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喜欢在阿尔卑斯山中徒步旅行,并因此而送给了他一个“登山家教皇”的美称。罗马教廷的持久的历史影响,再加上现代天主教教义复杂的舞台道具的支持和渲染,在法西斯意大利政权的精神建设历史上都是永久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往往都被忘记或者低估了。宣传家们或许可以确保墨索里尼是挂在每个人口头上的名字,但是教皇以及他的红衣大主教和一般的主教、他的圣徒和殉教者在许多意大利人的心目中仍然保持着一个十分神圣的地位。一个法西斯记者在1928年夸口说“对于墨索里尼的膜拜已经深深地扎根于意大利民众的心中”,这一说法是值得怀疑的。这种崇拜保留着一些与教会崇拜相似的特点,因此不言而喻,它仍然没有脱离宗教虔诚和信仰的范围。一位担任牧师的法西斯分子高兴地宣称:“意大利的帝国主义正在认识到……在罗马,唯一有活力的、被人们普遍真心接受的信仰仍然是天主教。”

事实也一再暗示,一小部分法西斯分子也不愿意成为体现墨索里尼感召力的工具。为地方上一些野心勃勃的法西斯头目所做的传记也大量地涌现,尽管这样做通常会给他们带来麻烦:当詹保利和阿尔皮纳蒂的追随者们过分强调他们的感召力的时候,他们两个都被送进了监狱。

对于民族法西斯党的内部纪律的讨论也直到1925年1月3日墨索里尼发表演讲之后才结束。但是在当时,墨索里尼关注的还是如何镇压反法西斯的势力。在官方场合,墨索里尼都有意与重新出现的法西斯暴力活动保持着距离。例如,当法里纳奇公开对暗杀马泰奥蒂表示认可时,墨索里尼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对他的

* 墨索里尼也投挑报李地对一个来访的贵妇人说自己非常景仰西比尔夫人,称:“她有着金色的头发和恬静的气质,是我想象中的——一个伟大的女性。”

话进行了纠正，声称法西斯主义并不是因为发生了马泰奥蒂事件才取得了胜利，而应当说即使发生了这一事件，但法西斯主义仍然取得了胜利。但是，虽然墨索里尼强调了这种维护法制的态度，但他并没有做任何事情来阻止1925年7月法西斯对于乔瓦尼·阿门多拉的残酷的、最终是致命的迫害，而这只是1924年9月对年轻的“自由社会主义者”皮耶罗·戈贝蒂的迫害的翻版。那些能够逃往国外的人开始把这一方式作为逃避法西斯迫害的唯一途径，1925年夏天离开意大利的历史学家加埃塔诺·萨尔韦米尼就是其中的一个。不管怎样，当墨索里尼得知他的对手们的日子不好过的时候总是很高兴。也有少数自由党人在自由和法西斯政权之间选择了前者，于是他们也流亡到了国外，这其中就包括尼蒂和斯福尔扎。

在一手镇压对手的同时，墨索里尼也在不断地巩固自己的法西斯政权，而且这项工作并不是只有墨索里尼一个人在做，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是司法部长阿尔弗雷多·罗科。他以前是一个反动的民族主义者，1925年10月2日通过的“维多尼广场法案”表明他主张的社会政策获得了胜利。这个法案用简明的条文规定，法西斯工会应当取代社会党和天主教工会并成为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和“大商业联合会”（该组织成立于1910年，直到1934年一直都由出身皮埃蒙特一个犹太人大企业家家族的吉诺·奥里韦蒂领导。）认可的“唯一的工人代表组织”。作为交换条件，“法西斯社团联盟”承认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享有最高的权威。不言而喻，在实际情况下，这些工业家在行动上还是有很大的自由。虽然墨索里尼随后很快就很小心地有意与意大利的商业和银行业的领袖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是任何企图建立一个公平和平等的仲裁体系的想法都是错误的。

另外一件紧急要务是如何管理媒体。早在1923年，意大利重要的报纸之一《时代报》就在政府提供的补贴的引诱下倒向了法西斯事业，现在，法西斯政权也向其他报纸施加了压力，要求它们帮助维持法西斯主义要求的统一性。虽然自己就曾经从事过新闻工作，但墨索里尼现在却要求在他的统治下，任何人不得随意发表言论，哪怕这些言论过去曾经对他大有帮助。1925年11月4日，在纪念维托里奥威尼托胜利7周年时，一个社会党的代表蒂托·扎尼博尼和一个退休的将军路易吉·卡佩洛被指控策划暗杀墨索里尼而遭被捕（他们的计划从一开始就处在警察的密切注意之下），墨索里尼限制媒体自由的欲望变得更加强烈了。就在之后的一个月里，由富有的克雷皮家族拥有的意大利最有名的报纸《晚邮报》迫于压力再次重申解雇自己的自由党编辑阿尔贝蒂尼。其他报纸在得到政府的承诺要提供款项帮助它们进行改组之后，也做出了类似的举动。政府又出台了一项新的新闻法案，把新闻业转变成了一种国家监督管理下的活动。12月11日，在一篇评论劳工状况的演讲中，墨索里尼解释说：“我认为意大利这个国家处在一种永久性战争的状态中。我曾经说过，现在我再次重复声明，今后的5年或10年对于我们的人民的命运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自从科孚岛危机之后，意大利国内形势有着太多的变数，墨索里尼很少能抽出时间去考虑国际上的事务。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把外交事务交给了外交部的专家们去处理，但同时也提防着他们中出现的任何反对法西斯的迹象。^{*}他意识到法里纳奇的口无遮拦可能会对意大利的国际地位造成“危害”。1924年春天，在英国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战争期间曾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成为英国首相之后，墨索里尼运用了更为老练的外交手段，使得意识形态的差异并没有成为影响英、意两国关系的障碍。在处理与苏联的关系时，墨索里尼同样表现出了一种非常现实的态度。尽管法西斯主义宣称要在意大利彻底根除共产主义，墨索里尼本人也经常对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实行的政策进行攻击，但两国却在1924年2月7日签订了商业和航运条约，从而恢复了这两个互为对手的“革命国家”之间的正常关系。当时以及在那之后，法西斯统治的意大利就很少在国际上发起对苏联的外交讨伐。

1925年意大利参与的最为重要的外交行动是为《洛迦诺公约》做准备，这一条约最终在12月1日签订。这一条约的签订让德国重新回到了国际社会，作为交换条件，国际社会正式承认了它在“一战”结束时形成的西部边界。但是，这一条约并没有确认它的东部和南部的边界（正如一位研究这些事件的历史学家所评论的那样，《洛迦诺公约》并没有改变这一事实，即对于意大利来说，德、奥合并仍然是“问题中的问题”）。在《洛迦诺公约》的准备和签订过程中，墨索里尼发表了许多言论，坚决地强调说德奥合并是无法容忍的，将意味着“战火重燃”。^{**}然而，他并没有说明他的意大利将不会接受已经确立的在国际社会中处于“列强中最弱的一个”的地位。只有当他在国内发表讲话时，他谈到的法西斯外交政策才略有不同。例如，他曾暗示说，战争从未结束。12月11日，在同一次演讲中，他又非常有特色地使用了一个体育运动中的比喻：“在政治上有时需要忍受打击，就像你站在拳击台一样。最重要的是保证不被打到台下去，我们也应当这么做。”这种坚持战斗的意志和决心可能代表的含义将留到以后去解释。

在当时，意大利的法西斯统治并没有引起欧洲各国驻意大利使节的警惕，而墨索里尼也毫无疑问地被认为是将会更多地关注国内的事务的领导人，而不是一个有着难以约束的野心的领导人。所以，即使是在意大利国内，绝大多数的意大利知识分子与其他社会精英一样，也都接受了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并且开始从中寻求利益了。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是哲学家乔瓦尼·真蒂莱，他此时已经结束

^{*} 马泰奥蒂事件发生后，墨索里尼立即指示意大利驻外官员，要求他们在对这一事件发表任何评论时必须遵循官方的口径。

——作者注

^{**} 墨索里尼是在给一些主要的驻外大使的信中说这番话的。

——作者注

了教育部长的任期，参加了一个“十八人委员会”，受命根据最近的形势对宪法做出修改。4月份，真蒂莱发表了一个声明，对法西斯的秩序表示支持。他的这一声明让那些纯粹的自由主义者大为恼火，贝内德托·克罗齐*在5月1日发表了《反法西斯知识分子的声明》，并且从那之后退隐到了自己家族位于那不勒斯的豪华住宅中，在那里开始向带着崇敬之情前来访问的学生们宣扬自由主义的理念。其他不太纯粹的自由主义者和知识分子们对政治的理解与普通民众是一样的，他们也开始寻求建立一种能够获得不错报酬的“雇主—代理人”的关系。**

此时，真蒂莱开始喜欢赞美法西斯主义关于生活的“整体”概念了，而“整体”这个词也正在法西斯的词汇中获得一个新的显著的位置。6月22日，墨索里尼在罗马对民族法西斯党全国代表大会发表演讲时，宣布了他的决定：在全国实行法西斯化。他宣称：“我们强烈的极权主义意志需要有更加极端的暴行……目前我们的第一个口号是：纯粹的理想，现实中绝不妥协。第二个口号是：一切权力归法西斯所有。虽然在用词上还没有达到“历史”所要求的那么精确，但墨索里尼的确是在宣布法西斯决心要建立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了。这是一种新的体系，在这种体系下，个人要服务于一个统一的国家，阶级将不复存在。1925年10月28日，在一个灯光明亮的阶梯歌剧院里，墨索里尼用更为强硬的语言来纪念进军罗马3周年。他的讲话在此后被法西斯的宣传家们无数次地重复：“法西斯主义旨在建立一个政权，所有人都将支持这个国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脱离这个国家，没有任何人反对这个国家。”

* 贝内德托·克罗齐（1866~1952），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和评论家，以其现代唯心主义的主要作品《精神的哲学》（1902~1917年）和坚决反对法西斯主义而闻名。

——译者注

** 最一心一意为法西斯服务的例子可能是作曲家彼得罗·马斯卡尼，他曾经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作者注

5 上帝所赐的人

1925年7月，墨索里尼42岁了。拉凯莱给他带来了生日的祝愿，而墨索里尼则自嘲地说自己现在的感觉是“既非常年轻又非常老”。这种对生活的正反感情并存的状态并不让人感到吃惊，因为法西斯活动包括的范围非常宽泛，而他们的借口是法西斯政权是一个完整的政权。当然，法西斯政权的这种完整性也对墨索里尼提出了非凡的要求。在对法西斯童子军的宣传中，墨索里尼总是被描述为每天工作14个甚至16个小时，这可能还是打了点折扣。然而，为墨索里尼写传记的一个主要的意大利作家却声称，墨索里尼每天忙于政务的时间“在10个小时以上”，并且他从来都不像希特勒那样喜欢漫无目的的闲聊。一个年轻的同事回忆说他“喜欢官样文章，不管是清晰详细的历史年表、写得不错的总结和综合，还是生动的细节、要点的提炼，都能博得他的喜欢。”相反，在他不完全知情的情况下发表即席之作却是他不喜欢的事，并且，他总是喜欢在书桌上只有自己能看到的地方放上一份有关所有会议的书面安排。他自己很清楚，一个极权主义的独裁者必须是各方面的专家，或者要让别人看起来是这样。法里纳奇建议墨索里尼只需坐镇罗马，这让墨索里尼非常生气，因为这样他就再也无法了解各个省的基层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特别是在法西斯体系处于创立过程中的那些年里，墨索里尼这位独裁者总是事无巨细——1926年1月，他甚至还惦记着在官方场合指示新闻媒体不要报道那些自杀和犯罪事件，因为这样的报道只会给那些“弱势群体”树立坏的榜样。

对新闻媒体进行威胁只是建立极权主义独裁统治的一部分。在1926年至1929年间，墨索里尼努力地让劳动者、资本家、农民（连带着南部）和法西斯党都屈服于他个人的意志，并且也的确取得了一些或大或小的胜利。通过讨价还价，他还与天主教会达成了交易。他的外交政策在实践中虽然非常慎重，但还是吹嘘说意大利正在变成一个“世界强国，其利益不会只局限在一个地区或者欧洲大陆。”*他的野心中真正的创新之处是想进入目标大众的心中和精神中，并且把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宗教根植在他们的思想中。“极权主义”这个词最早是于1923年5月出现

在阿门多拉的《世界报》上的，当时它的含义很简单，只代表一种在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的欲望。但随着它的含义在那之后不断地扩展，墨索里尼也希望能够与意大利人民建立一种完全的不可分割的有机关系，至少在当时是这样。虽然有违他的意愿，但以前所有那些玩世不恭的态度却又悄悄地潜回了他的思想中。在那几年里，他渴望能够成为一种新型的革命者，并且希望找到一种能够胜过他年轻时信仰的社会主义以及那些反对法西斯的敌人的新的政治体系。

然而，如果这些是他的真实想法的话，那么这些想法并不意味着自由，维持新生的法西斯国家的基石仍然是镇压。在这方面，从一些事件也可以看出，法西斯对意大利的控制更加严厉了。现在机会来了，墨索里尼可以把他以前曾向法里纳奇描述过的他优先选择的策略付诸实施了：“趁我的敌手们最混乱无序和惊慌失措的时候，主动对他们发动突然袭击。”1925年11月，扎尼博尼和卡佩洛策划了一次针对墨索里尼的暗杀行动，在这之后，又接连发生了好几起针对他的暗杀事件。1926年4月7日，墨索里尼到位于罗马市中心的一个会堂参加了国际外科医生大会的开幕仪式。有点讽刺意味的是，上午11点，当他出席完仪式走出会堂时，一个出身上层社会的爱尔兰妇女维奥莱特·吉布森向他开枪射击。墨索里尼还真是幸运，子弹只是擦破了他的鼻梁，于是，墨索里尼趁机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对这一事件进行大肆宣传。他往脸上的伤口处贴了张膏药便又开始工作了，并且还拍了照片，暗示他刚刚死里逃生。事实上，下午4点半，墨索里尼就炫耀似地将头上缠上绷带在党内官员和政府工作人员参加的一个大会上发表演讲了。演讲结束时，他用了一句特色鲜明的结束语，敦促所有人都要“危险地活着”，这句话立刻就成了法西斯政权的一句口号。他在演讲中说：“事实上，我就像是一个老兵在对你们说话。假如我向前，你们要跟随我；假如我后退，你们就杀死我；假如我被刺身亡，你们就替我报仇。”当天晚上晚些时候，一些群众聚集在基吉宫前，墨索里尼又站在一个阳台上对人群发表了演讲，他说：“我是你们这一代人中的一员。这就意味着我是意大利的新生代，永远不会受到任何事件的阻扰，而将沿着命运为我安排的道路继续坚定地走下去。”阿纳尔多可没有他这么坚强的斯巴达精神，他从米兰给哥哥打来电话时痛哭流涕——他的电话被窃听，秘密警察录了音。墨索里尼告诉弟弟要保持冷静，说这一针对他的谋杀企图对他的影响只是“一时的”，而阿纳尔多则像往常一样感谢上帝救了哥哥一命。

事后，杀手吉布森小姐被诊断为精神不正常，在英国外交官的干预下，她很快被驱逐回了英国（法西斯的报纸并没有放过这次机会，它们发表了很多排外的言辞激烈的文章，《意大利生活》把吉布森骂为“外国女恶魔”）。然而，引起法西

* 墨索里尼是在1928年6月5日向国会参议院发表演说时说这番话的。

斯当局更为直接的反应的还是第3次针对墨索里尼的行刺事件。9月11日，在墨索里尼在波达皮亚驾车驶往他的办公室的途中，一个在法国待过一段时间之后又回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吉诺·卢切蒂向他投掷了一枚炸弹。结果，炸弹并没有伤到墨索里尼，却炸伤了8个看热闹的旁观者。这一事件之后，墨索里尼更换了警察总头目，继任该职位的是来自地方的警察头目阿图罗·博基尼。但是，博基尼立足未稳，又一起行刺事件发生了。10月31日，当墨索里尼驾车驶过博洛尼亚的街道时，一个出身于无政府主义家庭的十几岁的男孩安泰奥·赞博尼试图朝他开枪射击。赞博尼当场被暴怒的法西斯分子打死。围绕这一事件也引发了一场持续的争论，有人认为要么赞博尼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凶手，要么就是博洛尼亚持不同政见的法西斯分子策划了这一事件。而当地的法西斯头目阿尔皮纳蒂最终也的确与法西斯政权产生了冲突。

然而，对于赞博尼事件来说，真正重要的还是墨索里尼对它作出的反应。这一事件发生后，他开始放手大肆进行镇压了。11月6日，他免去了温和的费德佐尼的内务部长的职务，把这一职位重新收归到自己手中，同时还出台了其他一些新的法律。实际上，这些法律都是由费德佐尼和罗科（这两个人以前都是民族主义者而非狂热的法西斯分子）起草的。根据这些法律，反对党、团和协会等都被正式禁止存在，意大利变成了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那些参与“亚文丁退出”的成员从1925年1月起就一直被关押在监狱里，他们最终也被剥夺了在议会中的席位。在此之前，死刑先是在托斯卡纳公爵的领地内被废除，后来在意大利全国范围内都被废除，这在整个欧洲也是开了先河的。但是此时，死刑在意大利又被恢复了，政治犯罪可以被判处死刑。11月25日，一个国防特别法庭成立了，它带有很浓重的法西斯党的色彩，因为法庭的绝大多数法官都来自国家安全志愿军。法西斯还花了更大的力气来禁止秘密移民——趁边境士兵吃中午饭的时间稍稍有点长的机会就把萨尔韦米尼通过小圣伯纳德山隘*转移到国外的日子结束了，至少从理论上讲是不可能了。意大利即将变成一个法西斯分子的堡垒。

为了从意识形态上保证这些决策的实现，墨索里尼更换了警察总头目，挑选博基尼担任了这个职务。直到1940年死的时候，博基尼看起来都是一个“神秘而极为有力的独裁者中的独裁者”。博基尼是南部的一个官僚，是意大利复兴运动之后一个非常典型的人物。他1880年生于贝内文托省的圣乔治—德尔桑尼奥，这个省是位于那不勒斯东面山区的一个省。在取得一个法律学位之后，他在1903年进

* 小圣伯纳德山隘，意大利与法国间的山隘。位于勃朗峰南16公里。海拔2185米。沟通法国的伊泽尔河谷与意大利的多拉巴尔泰阿河谷，为阿尔卑斯山交通最方便的隘口之一。

了政府部门。他出身于一个地主家庭，有很多兄弟，这些兄弟们都把自己看成博基尼在当地的代理人。就任之后，他逐渐成为贝内文托地区的老板，该地区的任何发展都要征得他的同意，并且他自己要能够从中受益。他的职业生涯在1922年之后开始开花结果了，他先后曾在布雷西亚、博洛尼亚和热那亚任过职。在这些地方任职的时候，他以与镇压反对法西斯政权者同样严厉的手段来镇压持不同政见的法西斯分子，并因此而声名远扬。事实上，1926年的时候，费德佐尼就提到过他的名字，而布雷西亚的法西斯头目、在3月份接替法里纳奇成为民族法西斯党总书记的奥古斯托·图拉蒂也非常看好博基尼。

在博基尼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从来都不是一个法西斯革命的狂热信徒。他怪异的口味最为有名，他还笑谈只有自己身上系的腰带是法西斯的。一个德国朋友回忆说，他喜欢用“龙虾、牡蛎、阉鸡和法国佳酿勃艮第葡萄酒来抚慰自己的神经。”他死于1940年11月20日，那天，他先在罗马的大使饭店里吃了一顿味美多汤的大餐，然后又与玛丽亚·莱蒂齐亚·德列托·沃拉罗——出身于贝内文托一个贵族家庭的二十五岁的姑娘甜蜜地约会，之后就死了。他的死给姑娘的家族带来了许多流言蜚语，说她匆忙地嫁给一个垂死的警察头子是看中了他的大量遗产。博基尼还试图掩饰自己对“腐化”的传统看法，希望那些渴望得到他保护和支撑的人送给他的礼物的价值一定要适当。他还从秘密警察的预算中大捞特捞，好像这些预算是他自己的一样，而墨索里尼也非常仁慈地没有调查他从中到底捞了多少。博基尼在适用规则上也同样是一个聪明人，虽然法西斯政权一直在宣扬要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团结，但他却设法安排南部的警察来监视北部的反法西斯人士。与先前一样，他还在继续窃听法西斯主要领导人的电话，就连墨索里尼本人和他的兄弟（后来还包括他的情妇）的电话他也照样窃听不误。

与海因里希·希姆莱相比，博基尼更是一个没有任何信仰的法西斯分子。20世纪30年代末期，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的警察之间已经有着非常频繁的接触，而博基尼和希姆莱之间也保持着相当不错的关系，他甚至在私下场合里嘲笑地称纳粹是“土狼”。希姆莱和海德里希都庄重地参加了博基尼的葬礼，这下他在死后也有机会和他们开下流的玩笑了。博基尼生前还与外交部长齐亚诺联合，这让齐亚诺非常害怕，因为他担心这有可能导致意大利与德国结成联盟，而他则是希望意大利能够推迟参加“二战”。20世纪30年代，博基尼还是党的总书记斯塔拉切的一个对手，对于这位总书记对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革命的真心的信仰，他肯定感到非常滑稽可笑。斯塔拉切来自加利波利，而且更靠南部一些，在博基尼的心目中，这个地方比贝内文托还要偏远，这种看法更加剧了他们两人之间的对立态度。总而言之，博基尼认为利益关系是社会各个层面的生活所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包括现代国家本身也是如此，因此在他身上更多体现的恰恰是与一个“法西斯新人”相反的特点，相比之下，他能够更好地代表当时意大利的历史结构，而

不是法西斯革命。

此外，博基尼与墨索里尼也保持着极好的关系，他们几乎每天都见面。事实上，正是他们俩之间良好的合作关系居然为墨索里尼赢得了来自一位反法西斯历史学家的赞誉（这位历史学家曾是意大利历史上最伟大的警察部长之一）。1927年5月，在耶稣升天节*那天，墨索里尼发表了他最为重要的（对此还有争论）一篇演讲。在这次演讲中，墨索里尼公开地对由博基尼主持进行的警察改革表示了满意。墨索里尼对他那些恭顺的法西斯听众开玩笑地说：“在历史上警察难道不是比教授更加重要吗？”他夸口说，重组后的警察正在打击犯罪的斗争中赢得胜利，不管他们是轻微的犯罪还是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他们已经击败了反法西斯势力，他们是情报机构的楷模。在那之后，墨索里尼继续毫不吝啬地对博基尼大加赞扬，并且很喜欢他形影不离地跟随在自己左右。甚至当法西斯政权最后在苟延残喘的时候，墨索里尼还把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归结为博基尼的过早去世。**警察头目是一个不需要顾及太多言辞和魅力的职位，而墨索里尼如此喜欢博基尼也说明他自己也知道，行动有时候要比言辞和形象重要得多。

在那几年里，墨索里尼的创新之一是成立了秘密警察组织，或者叫“奥维拉”。这个名字并不代表什么特殊的含义，只不过叫起来比较响亮而已。博基尼为多达13万的意大利人建立了档案，因此有效地遏止了许多针对墨索里尼的暗杀计划。他还在其他一些方面取得了成功，一位后现代主义者将其称之为控制言论，令人信服地把反法西斯主义描述为一种令人信服的“落后和退化”的形象，同时一次又一次地利用自己的力量击败政治上的抵抗势力，从而强化了恐惧、怀疑和自我仇恨的氛围，并因此也让流亡国外带上些美好的色彩。法西斯政权还对新闻媒体实行了严格的审查制度，这就确保了意大利年青一代中的很多人甚至连那些流亡国外或者被放逐充军的反法西斯人士的名字都不知道。1940年的时候，博基尼的秘密警察组织总共只有大约375个人，但他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与其他独裁政权甚至是我们今天的社会相比都是非常高效的。但是毫无疑问，这么小的警察组织规模也暗示出，当时意大利的政治阶层的范围实际上是很小的，并且，不管是法西斯主义、反法西斯主义还是其他作为政治信仰的现代意识形态都并没有在绝大多数意大利人的生活中深深地扎下根来，而只是肤浅地停留在表面上。

同样荒谬的还有法西斯政权常常使用的惩罚方法——流放，这种惩罚方法是

* 耶稣升天节，复活节后40日。

——作者注

* 博基尼死后由卡尔米尔·塞尼塞接任了他的职位，此人与博基尼有着极为相似的态度、经历和阶级背景，也是他的老部下。

——作者注

从自由党政府那里沿袭下来的，但法西斯政权此时又把它“发扬光大”了。许多持不同政见的人士（其中还有许多法西斯分子）都被从他们的家乡流放到一些偏远的村庄里，这些村庄通常是在南部（特别是利帕里岛、特雷米蒂岛*和蓬扎岛上的一些小村落）。所有人都认为这些地方可能连社会文明都比较落后和缺乏，更不用说对民众的国民化了。许多政治异见人士都被看押他们的监狱看守称为“教授”，对于这些看守来说，他们是一些不可理解难以估量的、属于外来的有文化阶层的人物，同时也是与同样不可理解和难以估量的法西斯体系发生冲突的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据说墨索里尼的办公室中地位较低的职员对流放这种惩罚方法也持有与这些监狱看守相似的看法。

博基尼的警察统治的成功，以及墨索里尼给予他的全力支持，都让国防特别法庭诉诸于死刑的手段显得相对比较温和。从1927年到1943年，法西斯政权以政治罪名一共判处了42例死刑，真正执行的有31例，其中有22例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执行的。受迫害最多的是北部边境的斯洛文尼亚人——如果一个牧师被怀疑在斯洛文尼亚人中聚众活动，那么他就有可能被流放。1927年，墨索里尼对“斯拉夫威胁”非常担心，他告诉朱塞佩·沃尔皮说，他已经制定出了能够确保击退来自斯拉夫方面的任何军事入侵的计划。国防特别法庭总共就13547个案子进行了起诉，一共判处了27742年的徒刑。此外，还有数以万计的人被流放、软禁在家或者处于被监视之中。

在1945年之后受到法西斯迫害的最著名的人士是共产党历史学家及政治家安东尼奥·葛兰西。他是1927年遭到国防特别法庭迫害的，而墨索里尼则特别指示法官要保证判他20年监禁。虽然受到疾病的困扰，葛兰西还是在狱中活了10年。1937年4月27日，在被释出狱后没几天，他就去世了，死时才46岁。许多人都认为，对葛兰西的迫害反映了墨索里尼从整体上对工人阶级及其代表和组织机构的攻击。按照马克思主义者以及那些受到他们影响的人的理解，如果不承认墨索里尼当时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这一观点，要想对法西斯主义进行剖析是不可能的。他还记着自己年轻时作为社会主义者的经历，因此这一指控一直让墨索里尼感到非常痛苦，他也经常寻求机会对此加以反驳，还多次对资产阶级的优柔寡断和软弱无力进行了批判。他还抱怨说，人们总是喜欢盲目地模仿法国、英国和美国，但对根植在意大利的灵魂和土壤中的影响力却加以否认。**类似地，墨

* 一个被流放者在他的回忆录中称，那些荒凉的小岛早在1752年就开始被波旁王朝用于同样的目的。他发现那里很少有厕所，没有圈养的猪到处游荡，经常与它们的主人睡在一起。杜米尼也曾在特雷米蒂岛上待过，他也痛苦地抱怨说那里根本没有什么文明。

——作者注

** 墨索里尼是在就一部旨在确认法西斯工会的社会角色的法律而发表演讲时说这番话的。

——作者注

索里尼还强调说，法西斯政权也有自己的企业联合会和工会组织，它并不打算抛弃工人阶级；相反，在不侵犯财产权和危及国家利益的前提下，还将时时刻刻保护工人阶级。

在法西斯政权的统治精英中，工团主义者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些人也因此认为与希特勒相比，墨索里尼的政权具有更为明显的社会激进特点。从1922年到1928年，法西斯工团主义的领导人一直由埃德蒙多·罗索尼担任。他是墨索里尼在罗马涅的一个老朋友，也曾移民国外，但去的不是瑞士或者奥地利，而是美国。他在美国所受的贫穷和剥削的经历让他认识到，工会必须接受和认同国家。他既是一个革命者，又是一个支持参战者，1921年时，他已经投身到法西斯运动中了。

法西斯进军罗马之后，他立即被墨索里尼任命为法西斯社团联盟的总书记。1926年11月，与这个组织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和天主教工会组织被解散，这个组织也随之更名为法西斯全国总工会。法西斯政权声称，法西斯全国总工会将成为那些为国家创造财富的人的一个真正的保护伞。墨索里尼还对一个来访的英国记者说：“法西斯主义只是一种方法，并不是最终目标。只要你喜欢，它还可以变成一个带些民主色彩的独裁政权。”

也许是受到了墨索里尼的平民主义思想的支持和鼓励，罗索尼一直在为工人寻求权利。但是同时，他也失望地发现，绝大多数已有的用于仲裁的法律都是由反动分子罗科*拟定的。此外，有人声称，法律同时禁止罢工和停工，证明法西斯政权在对待阶级争端时的态度是公平的，对于这一说法，罗索尼认为也难以让人信服。同样，当墨索里尼声称要成立一个“社团型的国家”时，他也表示怀疑——1926年7月，墨索里尼新成立了一个“社团部”，**并且亲任部长。

在这种体系下，议会的要求将通过各个行业协会来体现，而据说在这些行业协会中劳资双方的社会地位是平等的，并且都将完全献身于国家和法西斯的事业。1927年4月，法西斯政权还制定了一部《劳动法》并且大加吹嘘，声称将给予“行业组织和工会组织”以完全的自由，但这也没有能够让罗索尼真正接受法西斯政权的新体系。

墨索里尼本人在这其中并没有扮演主要角色，他把事情留给了他的社团部副部长（对他非常恭顺，并且很机敏）博塔伊去与罗索尼和罗科争论。博塔伊最先

* 他也是一个随时准备承认墨索里尼“永远正确”的人。

——作者注

** 在当年的耶稣升天节的讲话中，墨索里尼的确声称这个社团部已经成立，但随后又自相矛盾地继续讨论成立这个社团部所需的程序。

——作者注

明白墨索里尼的意图，于是一个年轻的法西斯分子在《法西斯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号召所有的意大利人“效仿”墨索里尼的生活方式。这篇文章告诉人们说：“要认识并深刻地理解墨索里尼，要自觉地服从领袖，就意味着要以可能的最佳方式去理解法西斯主义的伟大事业。只有领袖的狂热追随者才能加快法西斯主义的进程。”博塔伊可能认为这部《劳动法》是对法西斯主义的社会目标的一种肯定，并且体现了“基本的道德伦理原则在经济秩序中至高无尚的地位”；但是罗索尼的看法则相反，他认为这部法律在削弱工人的力量的同时，对于老板们是有利的。即使领袖有再大的神秘魅力也无法掩盖这一事实。历史学家伦佐·德费利切在就此事发表评论时也认为，这部《劳动法》在改变意大利工人的工作状况方面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它的真正作用仅仅是提高了墨索里尼的个人权威。

这些事件导致的一个后果是罗索尼的下台。1928年11月，罗索尼在法西斯全国总工会担任的职位被废止了（来自工业、农业、贸易、交通、银行、专业人员和艺术家、海员和飞行员行业协会的7个领袖取代了他的位置）。有谣言说，法西斯政权之所以对劳工体系结构进行调整，是因为罗索尼竟敢大胆地谈到墨索里尼的下台。当然，墨索里尼当时也已经在收集他这位老朋友的腐败行为的证据了，包括他以他父亲或者叔叔的名义进行的土地交易，以及他乱搞男女关系的情况，就连有谣言说他那笨拙的妻子曾在罗马当过妓女也都记录在案。但是，这些事情并没有妨碍罗索尼最终又一次担任部长职务——从1935年1月到1939年10月，他又担任了农业和林业部部长。由一个前工会领导人担任农林部部长，这多少有些讽刺意味。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当时还在留心观察纳粹德国最新的劳工情况，并且自认为还是一个“左翼法西斯”。但是，在经历了7年的离职生涯重新担任部长之后，他也开始费尽心机地强调自己“首先是拥护墨索里尼的”。在整个法西斯统治期间，工团主义都只是作为想象中未来革命的一个目标而停留在墨索里尼和其他法西斯领导人的口头上，主要还处在知识研究的层面，实际上并没有付诸什么社会实践。

在建设“极权主义国家”的过程中，可以非常确定的一点是，不仅是劳工运动，工业和金融业也同样感受到了墨索里尼的权力的影响。在1926年以前，墨索里尼很少做出什么举动来挑战商业界的权威。有些比较好战的法西斯分子曾对意大利最富裕的阶层的行为方式产生过抱怨，墨索里尼还想就此展开调查。法里纳奇曾对一些银行的自私行为进行攻击，还就一些金融和财政问题发表了一些危险的评论，都受到了墨索里尼公开的责备。在大多数情况下，墨索里尼还是维护德斯特凡尼和沃尔皮的传统经济政策，并且称自己“农民的良好感觉”让他对于政府的过多支出有着天生的敏感和谨慎。

法西斯政权的经济政策的特点之一是，墨索里尼和他的官员们都设法借助外国资金来帮助使意大利的经济从战争中恢复过来，而最大的资金来源是美国。到1918年的时候，美国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金来源国。早在1923年5月，墨

索里尼就与摩根银行的新任资深股东T.W.拉蒙特见过面。即使是在发生马泰奥蒂事件那段艰难的时期，他们之间仍然保持着联系。沃尔皮也夸口说自己有着大大小小的能够获取国际资本的途径，在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之后，他又在1925年10月至11月之间访问了美国。一方面是去为意大利寻求更多的贷款，同时也是为意大利欠美国的债务以及等待德国的战争赔款等问题寻求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所有的事情都进展得很顺利，在1924年至1929年间，意大利跃升成为排在德国之后的美国贷款的第二大受益国。由于能够获取外国资金，意大利货币里拉的币值也得以维持，这在墨索里尼看来可是维护意大利国际声望的一个法宝。

为了巩固与J.P.摩根等美国银行家的良好关系，1926年夏天，沃尔皮准备再次访问美国。但是8月8日，他却突然收到了墨索里尼的指示，还附有一封加以解释的信件：

“后面附上的短信是对几个月来让我们头疼的问题进行研究的结果，但是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并不是很深入，很大程度上是靠直觉。但是就我自己而言，‘这种直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没有出过错的。”

面对墨索里尼这种有些粗鲁的解释，即使是狡诈的沃尔皮恐怕也要脸色发白。当他接着读下去的时候，他才发现墨索里尼最看重的问题并不是进一步赢得更多的贷款，而是如何能够稳定里拉的币值。当时，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里拉已经不那么被看重了。墨索里尼的语气很严肃，他强调说：“政权的命运与里拉的命运是密切关联的，因此有必要把捍卫里拉的战斗看做是一场绝对的决定性的战斗。”作为“极权主义者”，意大利人感觉他们自己在这个邪恶的世界上过得很“孤独”。他们绝不能屈服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金本位的束缚”；相反，他们应当自立自强，并且要“按照法西斯的方式行事，也就是说，要大胆进取，开阔眼界。”看来，里拉的价值并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更是一个心理上的问题。意大利必须足够强大，从而能够在意志上赢得胜利。10天之后，墨索里尼在佩萨罗发表演讲时公开宣布了这场“战斗”，声称“在法西斯政权内，从领导人到最基层的追随者都准备做出必要的牺牲来捍卫我们国家的象征——里拉，以及我们的财富、我们取得的成就、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牺牲、我们的眼泪和鲜血。”在墨索里尼的头脑里，里拉好像已经成为意大利和法西斯主义的人性化的化身了。

在接下来的16个月里，墨索里尼的这种态度没有丝毫的改变。1927年12月，墨索里尼正式确定了里拉的币值：1里拉兑换19美元、92.46英镑，然后再次将其与金本位挂钩。包括沃尔皮在内的许多评论家都认为里拉的币值定得太高了，但是墨索里尼仍然坚持强硬的通货紧缩政策，也许他是希望用自己的气势和决定来进一步压制美国的银行家们。A.S.本尼是意大利更为现代的工业家的代表，他受到了墨索里尼的启发，通过降低意大利大多数工人的工资，很快就调整适应了里拉的新币值。那些对法西斯的压制不太顺从的人也很快就因为随之而来的失业

率的上升而沉默了。即使是根据法西斯官方提供的数字，在1926年至1928年间，意大利的失业率已上升达到了先前的3倍。

那么法西斯政权代表的只是一种行事方式吗？墨索里尼的崇拜者们所持的最为持久的看法是，墨索里尼正在进行一种“发展的独裁统治”，它承诺要让意大利“现代化”。然而，在1926年至1929年间，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还是比较混杂。1926年7月，有关意大利货币的问题集中交由意大利银行处理，同时，那不勒斯银行和西西里银行也被剥夺了印制纸币的权利，这些实际上都是法西斯政权强化货币控制的举措。然而，几乎与此同时，法西斯政权也在小店主代表们的压力面前屈服了，因为这些代表中的许多人都是重要的法西斯分子。在这些人的压力下，政府出台了一个许可证制度，从而保护了零售商们免遭超级市场和其他现代销售体系的毁灭性冲击。就墨索里尼的经济政策而言，它有现代化的一面，同时也还有其传统的一面。

全国劳动合作银行的情况更加典型。1927年5月，先前的合作社合并后成立了这个银行。后来，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它在法西斯的统治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曾跟随意大利国旗到过埃塞俄比亚，也曾涉足西班牙内战，还与轴心国一起参与了欧洲新秩序的确立。合作社先前被控制在米兰的极端法西斯分子保罗·泰鲁齐的手中，他当时还受到墨索里尼本人的庇护。1925年，合作社交到了阿图罗·奥西奥的手中。尽管他的天主教背景好像有些荒谬，*但是他非常机敏，非常清楚在与法西斯高层的交往中，法里纳奇的庇护要比沃尔皮的敌视更为重要。从1926年9月起，奥西奥开始经常与墨索里尼见面，正是在墨索里尼的直接庇护和支持下，他才能够让合作社重新振兴，把它们转变成了一个现代银行，并且它的寿命比法西斯主义还要长。奥西奥还巩固了自己和法里纳奇的关系，**同时还接受了博塔伊、罗索尼、齐亚诺和塔翁·迪雷韦尔的庇护。但是，当被问起的时候，他还是很慎重地声称自己的任务很简单，就是努力让银行振兴起来。1942年1月，他突然被墨索里尼解职了。关于此事的原因有很多的谣言，其中一个谣言称他最终行事不慎，招致了佩塔奇家族的憎恨。***虽然经历了成功也遭受了挫折，但奥西奥毕竟成为了法西斯政权中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在了解法西斯意识形态的同时，他也同样清楚地了解其中的“雇主—代理人”的关系，并且也乐此

* 警察最初提交给墨索里尼的有关他的报告相当负面。

——作者注

** 在奥西奥被解职之后，法里纳奇还给墨索里尼写信直率地为他辩护。

——作者注

*** 被墨索里尼解职使他从1943年开始更轻易地发生了转变，转而开始反对法西斯。

——作者注

不疲地利用这些关系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里拉的升值造成了意大利经济的通货紧缩。当经济刚刚出现一丝恢复的迹象的时候，1929年10月，全世界又遭受了华尔街崩盘的重创。在20世纪30年代，当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巨浪袭击到意大利时，墨索里尼也采取了多种新的经济政策试图加以抵抗。1926年至1927年间，他对经济进行过一些忙乱的干预。但是之后，他对国家的经济事务表现出的兴趣并不大。事实上，据1928年7月接替沃尔皮*担任财政部长的安杰洛·莫斯科尼回忆说，墨索里尼是一个冷静而敏感领导人，他总是喜欢听到坦承直率的建议，这让他的部长能够更容易地采取谨慎而正确的经济政策。虽然墨索里尼对于任何可能有损国家声望的事情仍然保持着警惕——国民经济部长朱塞佩·贝卢佐曾不谨慎地声称意大利仍然缺乏足够的原材料，墨索里尼公开命令他收回这一声明——但他在维持对于银行家和工业家的权威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已经有所松动，他开始把一些问题留给专家们去处理了。这也是他经常使用的一种方法。

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的商业界自然会对墨索里尼的统治鼓掌称赞了。但是，当时意大利的农业人口在各行业中仍然是最多的，墨索里尼是如何对待农业的呢？许多明显的证据可以证明，在意大利的现代化进程中，法西斯政权在实现自己的许多目标的过程中，在农业方面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绩，农村仍然到处是贫穷和疾病。在欧洲国家中，意大利的能源消耗量只排名第18位，这在各个强国中可能是最差的，而意大利农村地区的情况则最为悲惨。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能让情况有所改善呢？

对于这一问题的一个回答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早在1924年，墨索里尼就对全党说：“意大利人之中绝大多数都是农村人口……农村的法西斯是最可靠的，农村民兵的纪律性是最强的。”第二年的6月，他又带着典型的军事家的口气宣布：“我已经正式地发动了一场粮食战役，并且已经成立了一个总参谋部来负责指挥这场战役。”在那之后，他也经常敦促要把意大利“农村化”。正如他在耶稣升天节的演讲中所说的那样，城市和工业化会导致精神和生理上的贫乏，只有农业才能让意大利成为一个帝国。

事实上，意大利农村正在按照自己的节奏和地区差异适应着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到了1921年6月的时候，卡拉布里亚地区一个小镇的官员还在预言说，与“真正的社会主义”一样，法西斯主义也无法在那里扎根“很多年”，因为当地的社会环境与一个大众政党是那么的格格不入。1922年10月28日之后，最早的

* J.P.摩根还是非常有礼貌地给沃尔皮写信对此表示遗憾。

法西斯分子和后来加入的法西斯分子之间的争端也在农村地区不断地酝酿着，其他地区也是如此。在卡坦查诺，一位头脑清醒的官员注意到，那些在城市起家的法西斯都是旧的统治集团的成员，他们现在只是披上了一件黑衬衫而已。他的评论得到了一位来访的美国人类学家的支持。1928年，这位人类学家在西西里岛的一个小村子里完成了一项实地调研工作，他发现那里的人们在日常谈话中根本没有人提到过意大利政坛中的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社团主义、工团主义——所有这些对他们来说都还是完全陌生的概念。当地的精英们倒是常常谈到这些政治名词，但那只是为了让他们的“派别”能够赢得优势，因为家乡在他们的记忆中总是处在分裂的状态之中。不管是谁问起，当地的农民总会非常小心地回答说墨索里尼是一个“天外圣人”。在1929年的选举投票中，他们也一致投票支持法西斯政权。投票的场面还很庄严，镇里的乐队杂乱地演奏着《青春曲》和《皇家进行曲》，人们踩着乐曲的节奏去投票点去投票。但是，不管是领袖、国王还是教皇，实际上对那里的农民们的日常生活都没有太大的影响，相反，他们的生活状况主要取决于当地的农业生态环境和当地地主的势力的大小。他们对于外面的大世界是那么的漠视或者玩世不恭，甚至相信像神一样的加里波第只会给他们带来霍乱或者征召他们入伍。不管法西斯政权在这些南部乡村里是否还取得了别的什么成就，但它的确没有给这些地方带来社会革命，或者甚至连想象的可能也没有。

南部的法西斯领导人们的意识形态也不是那么纯粹，他们还保留着过去的许多习惯和态度，与斯塔拉切的理论相比，他们对于博基尼的实际行事方式更为熟悉。例如，1924年9月，阿切尔博就给墨索里尼写信抱怨说，不管他什么时候到罗马，总会有一些针对他的隐蔽的阴谋随之而来。他的一个在阿布鲁齐的远房堂兄弟也因为他而失去了党内的的工作，他有些坦率地问墨索里尼，这些人至于这么过分吗？他还懊悔地说：“我的敌人以及在政府中的对手们取得了这么彻底的胜利，我没法儿再回阿布鲁齐了。”墨索里尼会干预这件事吗？如果他不干预，那么他就会发现“没有我，阿布鲁齐将会陷入一片混乱，情况甚至会变得更糟。”

墨索里尼还是适时地为阿切尔博提供了必要的支持，他也因此能够继续担任阿布鲁齐地区法西斯领导人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他还经常向墨索里尼提出一些“建议”，并声称“我现在是，并且将永远是您最忠诚的战士，时刻准备为您赴汤蹈火”（他的意思是要墨索里尼保证他在当地的权力不被动摇，并且还要适当慷慨地为他提供支持）。同样，1924年，米凯莱·比安基也求墨索里尼帮助他辟除那些说他玩弄女人的恶毒谣言，他认为这些谣言是党内匿名的竞争对手故意散布的。不过他可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用暗示来讹诈墨索里尼说，如果不帮他解决这些问题，那么马泰奥蒂危机就会有最糟糕的结果。“请您记着，领袖，我过去可是站在您这边的，并且一直是绝对无私的，尤其是在您起家掌权的过程中那些最忧愁

和最困难的日子里更是如此。”墨索里尼能不像对待一个朋友那样对待他吗？比安基的请求又一次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而他也被作为法西斯政权中一个重要人物而得到了墨索里尼的支持。虽然如此，墨索里尼还是在他日渐增厚的秘密档案中记了他一笔：比安基的党羽声称，他曾鼓励自己出身贵族的卡拉布里亚情妇在当地分发报酬不错的职位以收取贿赂。反过来，阿切尔博、比安基和其他来自南部的法西斯分子也都有他们各自的代理人，而这些代理人也用他们对待墨索里尼的同样的方法来对待他们。

南部这种相对独立的状况当然不是法西斯主义自我形象的一部分，与法西斯政权进行整体化控制的路线也是不相符合的。此外，在建设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过程中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发动了“反对黑手党的斗争”，而这正是过去令自由党声名狼藉的一个弱点。在这场斗争中，墨索里尼的代理人是切萨雷·莫里，像博基尼和巴多利奥一样，他也是一个与法西斯党没有什么特殊关系的官员。虽然他谨慎地声明自己是在“以领袖的名义并遵循领袖的意志”开展工作，但他还是被允许在1925年至1929年间出版一份记录他的行动的刊物，并且，他还在这份刊物上毫不谦虚地吹嘘自己取得的“胜利”。他还特别强调说，黑手党并不只是一个庞大的犯罪组织，它更是一种精神上的“病态”，因此需要一种优于它的更加高级的精神——法西斯主义才能克服它。法西斯自夸说取得了极大的胜利，对此，历史学家们一直持怀疑的态度。相反，他们却注意到莫里仍在保护旧的地主阶级的势力，而西西里也很容易地就再次回到了黑手党的手中——20世纪30年代，在当地的一些城镇里，法西斯的机构只在公共节假日才敢开门。在那10年里，墨索里尼也效仿了他的自由党前任的做法，把西西里排除在他的正常政策之外。1923年和1924年，他接连两次到西西里访问，但在那之后直到1937年才又一次踏上这个岛，发表的讲话也是空洞无物，说要把这个岛屿变成一个农业天堂。实际上，他的政策的目的远不是要对这个地方进行安抚，而是打算向当地的居民们慢慢地灌输现代化和国民化的革命热情。没有能够主动地动员西西里岛上的居民让法西斯政权付出了代价，而这一代价直到1943年夏天的时候才表现了出来：西西里人对待抵达这里的美国人并不感到陌生，并且还认为他们比意大利统治者更加富有。于是，西西里人义无反顾地抛弃了墨索里尼的统治（但是在“战后”时期，新法西斯主义在这个岛上又有了发展，并且还拥有了群众基础）。

意大利人中另外一个群体——妇女的命运也在这些年被确定了。自从1920年3月第一个法西斯妇女组织在蒙扎成立后，法西斯主义在妇女问题上的政策一直比较矛盾。最初，妇女在“战斗的法西斯蒂”这一组织内拥有了投票权。1923年5月，墨索里尼在办公室里宣布没有什么障碍能够阻止妇女拥有投票权，并且建议以行政选举作为开端。他甚至考虑让妇女在国家安全志愿军中任职。

然而不久之后，法西斯政权对女权运动的态度就开始模棱两可了。墨索里尼

是一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但他同时还是一个家长统治的重要支持者。妇女在地方上并没有获得投票权，因为地方上的选举被废止了。作为新的镇压举措的一部分，1926年，在整个意大利，通过选举产生的市长们全被任命的市长所取代了。法西斯政权的确在妇女的福利事业上有所发展，如在1925年成立了全国母亲儿童福利会。然而，这个组织取得的成就是以实现法西斯的目标为前提的。在耶稣升天节的讲话中，墨索里尼声称人口的增长是法西斯妇女运动的核心：“有必要用绝对严肃的态度来对待意大利民族的命运，有必要让我们的民族更健康，而这就要从母亲和儿童事务抓起。”墨索里尼还警告说，目前意大利人只有4000万，怎么能够与“9000万”德国人和“2亿”斯拉夫人相抗衡呢？如果意大利想在世界上显示出它的力量，那么它就必须在1950年时让它的人口增加至“6000万”。只有人口繁荣了，“帝国”才能长存和繁荣。作为一个促进人口增长的举措，1926年12月19日，墨索里尼还新增加了一个“单身税”。5年之后，成年男子之间的同性恋行为也被定为非法。正如图拉蒂所说的那样：“家庭是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基本单元，它是唯一可能的卫士和防护战壕，能够让我们抵御周围环境中各种非道德的、不道德的和有腐蚀性力量的侵蚀。”在法西斯政权统治下，一个妇女除非必须出去游行，否则，她还是会被限制在厨房和卧室里。

几年之后，墨索里尼的厌女症加深了。他对一个年轻的崇拜者说，“爱情”是转瞬即逝的，因此明智的人不会把它作为人生的坐标。女人与牧师的习惯一样，你给她一根手指头，她就会抓住你的整只胳膊。坚强的男人必须能够避免受到她们的影响，因为“女人的角色肯定是负面的。她们只会分析问题，而不会综合问题。”墨索里尼很讲究修辞地问一个来访者：“试问，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出现过一个妇女建筑家吗？”萨尔法蒂对他的影响正在日渐衰退，而墨索里尼也很少表现出想要寻求一个聪明的女人来陪伴他的意思。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还原成为一个受到其他男人赞赏的男人。

同时，不管对是男孩还是对女孩，法西斯政权对于青少年教育的控制也比以前更加积极而严厉了。1925年12月，法西斯政权开始在学校内强迫使用“罗马式”的敬礼。1926年10月，法西斯教育部长彼得罗·费代莱正式宣布将进军罗马纪念日定为全国欢庆日。1928年，法西斯的法律又把学校的教科书置于国家的严格控制之下（尽管负责监管的委员会实际上直到1939年才真正组成）。在半官方的刊物《等级制度》上，前民族主义者罗伯托·坎塔卢波发表文章称，法西斯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创造一个新的“统治阶层”，在20世纪30年代，这一问题的确是法西斯分子们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然而在当时，维护墨索里尼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仍然是最关紧的。当时非常典型的一件事是，1928年1月，教育部副部长埃米利奥·博德雷罗——又一个有着民族主义者背景的法西斯分子——向墨索里尼提交了一份阿谀奉承的政治思想汇报。墨索里尼的反应也非常干脆，称他的汇报“非常有

趣，并且对极了。你还可以补充一些内容，我的文化不是一般的文化，更不是普普通通的文化，它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是系统化的。准确地说，文化是为我服务的，而不是让我为文化服务。它是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是我的臂膀，而不是装饰品。”*对于认真考虑这些问题的人来说，墨索里尼的这番话都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他的文化宣言有时看起来有些奇怪——例如，作为意大利国家的缔造者和法西斯等级制度的维护者，他却对贝多芬这位崇拜法国大革命的德国人大加赞赏，称他是“所有作曲家中最伟大的”，他的音乐能够“让一个人超脱自我”，他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

能够体现墨索里尼的自负的权威的最大舞台仍然是法西斯党，所以毫不奇怪，墨索里尼仍然在牢牢地控制着它，并把它作为建设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一部分。他采取的步骤之一是解除了法里纳奇的民族法西斯党总书记的职务，并由奥古斯托·图拉蒂在1926年3月30日接任了总书记的职务。法里纳奇当然对此非常不满，当时和在那之后，他不停地在墨索里尼面前对批评他的继任者图拉蒂**以及其他主要的法西斯头目，如巴尔博、费德佐尼、博塔伊甚至阿纳尔多·墨索里尼。他认为，这些人一直在策划针对他的阴谋，并且用无赖的伎俩来对付他的法西斯美德。对于法里纳奇的指责，墨索里尼一次又一次地大发雷霆：“意大利国内和国外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当然也包括你，法西斯政权之所以能够取得那么多重大胜利并走到今天，是因为我现在还活着并且像个黑人一样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他继续无情地说：“党内问题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由你这种精神上的无纪律性的态度、你这种想成为党的唯一完美的救世主的企图和你这种毫无根据地、不断乱加指责而引起的。”墨索里尼抱怨他的太多的朋友说了过多的话，说法里纳奇应当立即与费德佐尼和巴尔博和解，并接受图拉蒂担任的总书记职位。“穿上伪教皇的衣冠昂首阔步地到处乱转并等待召唤是毫无道理的。”

图拉蒂一直与阿纳尔多·墨索里尼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当这位法西斯党的新总书记对党员进行新一轮的肃清时，他更喜欢社会上那些更加保守的政权的支持者。在演讲中，他多次对那些酗酒、跳查尔斯顿舞***及其他跳黑人舞蹈的人加以责骂。他在历史上的建树也是保守的。他和法西斯党都是战壕精神的体现，都

* 墨索里尼是在给博德雷罗的信中说这番话的。为了打消他的顾虑，墨索里尼的确补充说，博德雷罗可以说领袖也确实在哲学上有一些弱点，特别是在哲学史上，而他也正在读一些柏拉图的作品。

——作者注

** 法里纳奇在写给墨索里尼的信中谴责图拉蒂对他进行了长达“5年的迫害”。

——作者注

*** 查尔斯顿舞，一种流行于20世纪20年代的快节奏的4/4拍舞厅舞。

——译者注

看重秩序和纪律。他担忧地补充说,《劳动法》强调了“罗马和莫斯科”之间的完全对立。他还建议说,即使一时还不是那么危急,但法西斯政权的统治应当“微笑与拳头并重”,继续前进以统一国家、民族和种族。还应当发展一种能够把体育运动和战争的积极遗产结合在一起的教育体系,法西斯教育现在将铸造“一个新的统治阶级”。

但是,图拉蒂最大的任务还是加强法西斯党的纪律性,并让党员们接受由墨索里尼一个人来领导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不应当变得自高自大,他们应当承认他们自己也是为国家服务的。因此,当法西斯的地方首领与国家官员之间发生小争端的时候,他们必须优先考虑领导而不是党员。墨索里尼不是明确而严厉地对法里纳奇说过嘛,“要么谁也不要说话,要么是我一个人说话,因为我知道怎样比别的任何人都讲得更好。”图拉蒂明白,是墨索里尼自己挑选他担任民族法西斯党的总书记的。他也知道,他的工作是确保墨索里尼被接纳为“高于党的独裁者”。

米兰的马里奥·詹保利成为他惩戒全党时抓的一个典型。米兰是意大利的金融首都,詹保利领导着极端的法西斯势力,编辑着一份名为《1919》的月刊(这份刊物是他早期参加革命运动的一个象征)。虽然这份刊物也极力地强调墨索里尼是“时代最伟大的天才”,但它同时也竟敢补充说“法西斯党员也是他所需要的”。1926年的时候,詹保利就已经很不招阿纳尔多·墨索里尼的喜欢了,担心他会和法里纳奇结成联盟来重新发挥这位前任总书记的影响力。在之后的一年里,这位米兰的法西斯首领被网罗了一大堆罪名,说他在性生活和经济上都腐化堕落,与3个女人同居。1926年,他匆匆地与其中的一个结了婚,目的是让他们的儿子成为合法的婚生子。当时,当地的工业家们在他的压力下被迫送给他100万里拉。他还在演讲中有意表现出很有修养的样子,以此来讨好老的法西斯小分队的成员(虽然他缺乏正式的资格——他最初只是一名邮递员)。他还嗜赌如命,并且还从一个卖淫团伙中获取赌资。他还企图建立自己的贴身卫队,即使他的支持者和墨索里尼的兄弟的支持者在米兰发生公开分裂他也毫不在乎。他与米兰的分子和专家人员阶层的关系比较疏远,事实上,他与当地整个资产阶级的关系也是如此。这些罪名都被摆在了墨索里尼的案头,结果可想而知。詹保利被开除出民族法西斯党,而他的刊物《1919》也被查封了。阿纳尔多·墨索里尼和图拉蒂在米兰取得了胜利,他们还安排了一个大有前途的人——阿基列·斯塔拉切*来接替詹保利。但詹保利这位战败的米兰的法西斯首领并没有从此完全从法西斯的记录中

* 虽然他是一个大有前途的人,但也少不了被建立一个秘密档案,档案中记录了他一系列不检点的性行为,包括同性恋和强奸,以及生活腐化的记录,如吸食可卡因。另外,还说他与一些共济会会员是朋友,就连他惧内也记录在案。

消失，他还维持着与墨索里尼的通信联系，向他诉说自己的正直受到了伤害，并恳求墨索里尼重新给予他庇护。例如，1938年，詹保利相信是犹太人的阴谋诡计终止了他在那不勒斯的幸福生活。* 1940年，他为在战争中发动进攻而进行动员的努力让他重新获得了法西斯党的党票。但是警察仍然监视着他的行动，记录下了他奢侈放纵的生活方式和对关系人无情的盘剥。在有幸保存下来的一封詹保利写给墨索里尼的信中，他请求领袖恢复他在米兰的法西斯党的领导职务，还保证说他将会迅速从目前低落的情绪中重新振作起来，同时也表明了他对领袖的崇拜。

墨索里尼收到的最为不屈不挠的批评信件可能来自法里纳奇，他一直都不接受提拔图拉蒂作为党的总书记，对阿纳尔多·墨索里尼对领袖的虔诚和恭敬也不怎么喜欢。他一直在就墨索里尼的调整和转变进行无休止的发难，例如，他常常提起墨索里尼以前的反教权主义立场。带着法西斯主义者的聪明才智，他写到，一个有社会良知的红衣主教曾到克雷莫纳访问，并向工人们宣扬宗教和贞节，但主教应当知道，在法里纳奇的城市里，要说一个人与性关系没有什么沾染，那他简直就像“阿拉伯的凤凰一样珍稀”。法里纳奇还有意挖苦地问道：“能不能不把那些可敬的高级教士派往国外去传教？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世界上一共有13亿人，其中只有3亿人是天主教教徒。为什么不把其余的10亿人也带到上帝那里或者说天堂里去呢？”然而，法里纳奇的火力主要还是集中在民族法西斯党内那些他可以察觉到的敌人身上。这些人错误地把法里纳奇描述为墨索里尼的一个敌人，于是不停地策划各种针对法里纳奇和他的朋友以及同党的阴谋，并把他变成了一个“法西斯无政府主义者”。但即使这样，组成他的小圈子的仍是“有着纯粹的法西斯性情的法西斯主义者”——墨索里尼应当接受“一个真正的法西斯是一个永远都不惧怕向领袖说真话的人。”

在法里纳奇看来，在这个世界上，利益和个人之间永远充满着矛盾和冲突。法西斯党可以就民族和意识形态的统一发表有吸引力的声明，也可以颁布法律让意大利人盲目地为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服务，但是他清楚，任何人想要控制他的社会，都必须永远对他现在的朋友和敌人保持警惕。**同时，尽管墨索里尼经常遭到法里纳奇的烦扰，但他一直都没有和他决裂。法里纳奇这位来自克雷莫纳的法西斯

* 1929年，詹保利给塞巴斯蒂西尼写了不少信件。在这些信中，詹保利诉说了家庭的不幸，用词非常像杜米尼在困难时期的用词。祖母生病让他遭受了很大的痛苦，另外还有经济的困难，据称他的头发一夜之间全白了。在信中，他还强调了自己过去的忠诚和做出的贡献。

——作者注

** 法里纳奇攻击图拉蒂并对党的现状提出批评，说沃尔皮和巴尔博是不忠诚的，图拉蒂也一样。阿纳尔多在写给墨索里尼的信中也对法里纳奇进行了批评和指责。

——作者注

诸侯对墨索里尼自己的极端和“残忍”的历史知道得太多了，而且这些都是无法忽视和否认的。

在理解纳粹德国的统治方式时，“制度达尔文主义”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它可以为自身的政治激进主义提供许多重要的证据，或者至少可以说明这不是直接来自独裁者的指示。通过观察图拉蒂、法里内奇、詹保利和斯塔拉切之间的斗争，也可以发现发生在意大利的达尔文式的或者马基雅维利式的斗争。相互之间不停地进行这种斗争的并不只是这四个主要法西斯头目，而他们也并不是在得到墨索里尼的指示之后才这么做的。所有的证据都证明，在社会的精英中（很有可能其他的阶层也是如此），这种行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警察的秘密档案中，关于那些正在起家的政治人物的报告更是强调了谁是他们的支持者，谁又是他们的反对者。^{*}在墨索里尼的统治下，洞察这种无休止的结盟的变换，以及把握在一个利己主义的社会中出现的各个机会的能力都是非常重要的。很明显，任何独裁统治的矛盾，独裁者声称他所知道的和他实际真正知道的事情之间的差距，决策过程的秘密或者不透明性，靠感召力进行统治的本身的特点，所有这些都强化了这种对达尔文主义的信仰。也许一些对此持怀疑态度的历史学家们会补充说，在所谓的民主和繁荣的世界里，尤其是在我们当今的“非意识形态化”的社会里，这种态度和行为方式也同样存在。

在法西斯政权统治下，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并非只限于墨索里尼的思想。在墨索里尼执政的整个过程中，他很少错过讨好教会当局的机会。实际上，任何意大利领导人，特别是那些试图让民众国民化的领导人，都很自然地注意到教皇在意大利这个国家的存在。一个真正的极权主义国家本来应当希望能够将其彻底根除的。当然，在意大利复兴时期，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核心问题。自由党建立的国家也是在夺取了教皇的领土之后才建立起来的，包括被称为神圣的“君士坦丁御赐教产”。反过来，教皇庇护九世也在《谬说要录》（1864年）中对现代自由主义的原则进行了批判。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对于任何一个想在历史上有所建树的意大利政治家来说，如何解决“罗马问题”都是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

在“一战”期间和“战后”，奥兰多和尼蒂都曾试图与教会和解，但都遭到了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的阻挠。伊曼纽尔三世天生多疑的个性让他一生都对宗教保持着怀疑的态度。随着法西斯起家并掌握政权，墨索里尼很快就把自己以前的反教权主义立场掩盖了起来，并且竭尽全力在民族法西斯党内抑制反教权主

^{*} 警察注意到，兰蒂尼得到了图拉蒂的支持，但却遭到法里纳奇、罗索尼、巴尔博和博塔伊的反对。

义的表达。法西斯政权早期的公共运动之一是对共济会组织进行压制，因为从1789年起，该组织就被教会认为是它的一个无法和解的敌人。法西斯战胜了“无神论的社会主义”，这让教会阶层更有理由为正在意大利发展的新的体系而鼓掌喝彩了。同样，那些更为保守的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者们现在也可以鼓吹说，墨索里尼应当“公开地认可宗教的价值”，并且在“国家的戏剧表演”中给神职人员一个位置。他们还声称，法西斯主义是天主教会天生的同盟，而天主教起源于罗马也并非出于偶然。

1926年5月，教会和法西斯政权之间已经开始认真的对话了。墨索里尼授权罗科去和红衣主教彼得罗·加斯帕里——罗马教皇的国务秘书——会面并谈判，并且声称教会和国家的分离就像精神和物质的分离一样荒谬。8月份的时候，弗朗切斯科·帕切利也加入了这场谈判。此人是一个律师，是后来的教皇庇护十二世的兄弟，也是一个与教皇拥有的罗马银行有着密切关系的家族中的成员。罗马银行是法西斯统治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银行。他参加谈判也进一步证明了墨索里尼兄弟在意大利独裁政体中的角色，因为阿纳尔多·墨索里尼是领袖墨索里尼周围最为显眼的牧师之一。有了兄弟的保佑，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在1926年11月的时候与教会达成了一份协议草案。

然而，这份草案的签署却因教皇庇护十一世对法西斯的教育政策不满而一再被推迟。要想把巴利拉变成一个极权主义组织，就必须禁止其他与其竞争的天主教青年组织，而这遭到了教会的拒绝。在法西斯政权的领导层中，真蒂莱、巴尔博和法里纳奇（尽管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动机）都试图推迟与教会达成和解，而国王和诸如自由党参议员克罗齐和阿尔贝蒂尼等人都反对与教会和解。不管怎样，双方的对话在1928年恢复了，并且在1929年1月的时候达到了高潮。在敲定最后的一些条款时，墨索里尼亲自参加了谈判小组。根据这些特别的条款，法西斯政权最终将给教皇数额精确的经济补偿，以补偿它在过去失去的领地。事实上，这是一件至关重要、足以让墨索里尼直接关注的事情。一天接一天，他都一直工作到午夜之后。例如，1月31日，在最后一次审阅这些条款的时候，他从晚上9点一直工作到凌晨1点1刻。最后，甚至连详细的款项安排都要经过他的同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补偿的方法和渠道最终是由负责教皇的银行业的两位自由党老政客——焦利蒂和贝尔纳迪诺·诺加拉以及意大利银行的行长博纳尔多·斯特林格尔来确定的。

然后，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公之于众了，那将是一件令人高兴的大喜事，因为之前的谈判都是秘密进行的。1929年2月11日，在罗马的拉特兰宫举行了一个盛大的仪式，墨索里尼签署了多个协议。根据这些协议，梵蒂冈城成为罗马市内一个完全独立的飞地，并且它的市民可以不受法西斯法律的约束。作为回报，教廷认可了意大利复兴时期确定的领土划分方案。其他一些条款恢复了天主教在婚姻

方面的权威，恢复了必需的宗教教育并允许教廷对持不同意见的牧师进行更为严格的约束。历史学家们通常得出的结论是，教廷在《拉特兰协议》的谈判中坚持了强硬的立场，并且在意大利人的生活的许多方面加强了自己的权力。

然而，对于墨索里尼来说，这些都是可以留给历史的事情，而它们为他带来的巨大的短期回报才是重要的。他的弟弟阿纳尔多也说，一想到意大利人民能够让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源自天主教的灵感与他们的单一民族国家和解时，他就“极度地兴奋”。同样，教皇庇护十一世对此也毫不吝惜地大加赞扬，并且称赞墨索里尼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人”。教廷的报纸《罗马观察》也为协议的签署而鼓掌喝彩，称“意大利又归还给了上帝，而上帝也归还给了意大利。”耶稣会*的刊物《天主教文明》也在1929年3月声称，法西斯主义体现了“基督教社会的复原”。1932年，教皇庇护十一世甚至曾一度喜欢上了被他称为“天主教极权主义”的东西。天主教的宣传人员也鼓吹墨索里尼和教皇庇护十一世是“现代意大利两个最伟大的人”。一个负责调查意大利民意的警察也在报告中声称，这是“领袖的天才的空前无双的胜利”。但是，意大利的犹太人却担心天主教和法西斯政权的和解会给他们带来潜在的负面影响。这一和解在国外也同样得到了赞许，特别是那些与教会关系亲近的势力更是如此。英国天主教的喉舌媒体《公告板》也向“勇敢的”和“有伟大意志的”墨索里尼表示赞赏，称他的表现证明他是一个“知识的巨人”，打败了那些希望要一个“可以嘲笑教会的无神论国家”的意大利人。《时代》也欢呼这一协议的签署“的确是非常好的消息”，证明墨索里尼有着“卓越的胆识和伟大的政治才能”。只有《经济学家》带着怀疑的态度声称，人们不应该对两个独裁统治之间的结盟感到吃惊。尽管非天主教的媒体很快就把它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去了，但那些天主教的媒体，乃至整个天主教的舆论一直都没有忘记《拉特兰协议》，而绝大多数的天主教评论家们也打算原谅墨索里尼所做的其他事情了，因为“他”解决了罗马的问题。在1942年3月那段困难的日子里，墨索里尼想提高公众的士气，于是便授权卡洛·比吉尼（后来在萨罗共和国内担任部长）去搜集一份意大利人在某一件事上“一致同意”的完整的记录。比吉尼明白墨索里尼用这个词是想让他做什么。于是他报告说，在为《拉特兰协议》确定框架的那段时期里，墨索里尼是“毫不含糊地正确”的。当然，在意大利以外也有许多天主教人士对这一协议大加赞赏。甚至到了1943年9月，墨尔本的爱尔兰—澳大利亚大主教丹尼尔·曼尼克斯还把墨索里尼描述为“今天仍然健在的最伟大的人”，“意大利迄今最伟大的政府”的首脑。在这些天主教人士的眼里，法西斯与天主教的

* 耶稣会，天主教修会之一。

和解的确让墨索里尼成为了一个“上帝所赐的人”。难怪一个历史学家在研究1929年的意大利时声称，意大利的独裁者可以高兴地获得空前一致的意见了。

当然，墨索里尼在《拉特兰协议》中并没有使用他惯用的讽刺和反语。“革命的”墨索里尼与意大利社会中最强大的保守势力达成了协议。墨索里尼夸耀自己拥有完全的权力和无限的感召力，现在，他已经承认教皇与他拥有同等的（甚至可能是更大的）权力和感召力了。在内心中，墨索里尼可能还保留着年轻时的无神论信仰（也夹杂着许多农村人特有的迷信，相信上帝虽然有些不合理性，但他可能还是存在的）。虽然墨索里尼有时也抱怨自己的命运，但他的独裁统治的确没有，也不会，更不能攻破天主教的大本营。

当然，这种吹毛求疵的想法不能在公开场合讲。1927年，在协议签署的前两年，普雷达皮奥省内对墨索里尼心存感激的民众把一座中世纪时的城堡卡米内特城堡修复重建（实际上是仿建）后送给了领袖和他的家族。1929年，作为法西斯政权辉煌的国家荣誉的一个象征，这座城堡又被刷成了意大利人喜欢的绿、白、红三色（意大利国旗的颜色），从乡村和亚得里亚海上都可以看到这座城堡。墨索里尼家族的经济情况也因为这些忠诚的人们以及其他安排而大为改善。1926年的时候，阿纳尔多还在担心《意大利人民报》会难堪重债，然而报纸很快就有了支持者，当然，这份报纸也变成了极权主义政权的一个工具。除了卡皮纳的房产和卡米内特城堡之外，墨索里尼还在里西恩有一座海滨别墅，他经常在夏天到那里去避暑。尽管他常常谴责别人就这些事对他过分地公开奉承，但他实际上的确成了一个有产阶级。好像是为了暗示他这种新的社会地位，在签署了《拉特兰协议》之后，他放弃了自己在蒂托尼广场的住所搬到了托洛尼亚别墅里。这是一座华丽的18世纪的宫殿，在诺门塔那大道上，在奥雷连城牆靠近庇护门附近。别墅的主人们在意大利许多地方都拥有土地，他们并不支持进行社会革命。他们跟墨索里尼要的租金很便宜，当然，他们也希望自己的新房客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做。1929年11月15日，拉凯莱带着孩子们也搬到了这个带有大花园的富丽堂皇的新家，这下，墨索里尼一家又团聚了。至少从表面上看来，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天主教家庭。为了显示家里的财权应由自己掌握，拉凯莱从1923年起解雇了丈夫的管家切西拉·卡罗奇（她的解雇还带有典型的法西斯的人情味：由国家给切西拉·卡罗奇发放养老金。1944年，她还记着给他送去了一些额外的补偿）。墨索里尼可以在罗马施行他的统治，但他的妻子，一个办事非常传统的人，并没有把她在家里的权利也交出去。正是在教会和国家中那些重要人物的支持下，墨索里尼这个普雷达皮奥人才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对于这个上帝所赐的人来说，唯一的不利之处在于，类似博基尼、巴多利奥、奥西奥等其他人的提升一样，这些交易和安排也有可能某一天让法西斯革命乃至领袖的权力变成海市蜃楼。

第3部

权力高峰



1 鼎盛时期的墨索里尼

与天主教会成功地达成和解协议似乎把墨索里尼推上了一个新的权力高峰。1929年10月，华尔街崩盘了，当其他政治家们感觉生活中充满艰难并且前景暗淡的时候，墨索里尼的形象却在整个意大利以及国际上大放异彩。他继续运用耐心和技巧，与法西斯当政之前意大利几乎所有领域内的老精英们都达成了妥协。教皇和国王、工业家、银行家和地主、军队、警察和官僚、知识分子的主体（不包括极少数执意抵抗的异见分子，而且这些人大多数已经被赶到国外去了），所有这些人现在好像都很喜欢与墨索里尼合作了。当然，外国政府也是如此。在墨索里尼处于鼎盛时期的这几年里，这些外国政府的专家顾问们可能更多地是建议政府对意大利的模式进行研究。例如，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们正因为无法抵抗大萧条对他们的社会的袭击而感到无能为力一筹莫展，此时，他们就很愿意相信是法西斯主义事先为意大利接种了疫苗，从而使它能够抵御在其他国家到处发生的失业以及价格体系和生产的崩溃。《金融时报》的保罗·艾因齐格在1932年访问意大利之后深思道：“意大利这个国家已经变得非常有纪律，简直都快认不出来了，并且……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精神，让普遍的合作远高于自私的思想。”他还敦促说，有必要对这个社团主义国家进行细致的研究，而墨索里尼享有的权威让人对他心怀敬畏。这是一种“令人惊异的大众心理学现象”。他最后总结说，领袖墨索里尼的“力量和政治才能”是不可限量的。

在图拉蒂任总书记期间，曾经焦躁不安的法西斯党也受到了约束，变乖了不少。但同时也要承认，那些主要的法西斯人物之间的争斗仍在无休止地进行着。正如墨索里尼用他那惯常的口气解释的那样，革命的麻烦就是那些革命者在革命完成之后还活着。但是，用一种嘲讽的态度记录下这些人之间的争斗也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毕竟在当时，法西斯党内的主要人物都没有能力对墨索里尼的角色和感召力构成竞争威胁。在法西斯政权内，除了无法与皇帝相比之外，墨索里尼看来已经拥有了一个统治者应当具有的所有权力。墨索里尼并没有效仿在阿尔巴尼亚自立为国王索古一世的艾哈迈德·索古，但他的确喜欢把自己与拿破仑·波

拿巴相提并论（一些民族主义评论家甚至声称，尽管拿破仑是一个科西嘉人，但他“的确”是一个意大利人）。一些更加卑躬屈膝的传记作家们又补充说，不应当只拿一个皇帝来和墨索里尼相比，实际上，他是历史上所有杰出的皇帝的集大成者。*好像是要为这些评价指明方向一样，1928年至1929年间，墨索里尼还抽出时间与剧作家焦瓦基诺·福尔扎诺在一部有关拿破仑的剧作的内容方面进行了合作，并且同意这部剧作在意大利以外演出时可以声称他是剧本的合著者（这部剧作在布达佩斯的演出非常成功）。在这部福尔扎诺和墨索里尼合著的剧作中，拿破仑是一个伟大的男子汉，他先知先觉，并且英勇无畏，但是仍然注定遭到了背叛：“在我死后，你们将会听到法国所有污秽的口舌都在诽谤我。那些被我成就了的人，那些被我变得伟大的人，那些被我从贫穷和悲惨境地中挽救出来的人——他们将毫无羞耻地损害我的名誉。”

如果这部剧作能够反映出当时墨索里尼内心的一些想法的话，那么可以说它表明墨索里尼内心的阴云并没有散去。然而，这些猜测还只能限于他的个人想法。当时为他拍摄的新闻短片显示，墨索里尼的表达和姿态都很活跃，并且总是面带微笑，看上去充满魅力，派头十足。同样，在1929年的时候，意大利人也是既高兴又平静，只有少数人对墨索里尼的独裁统治是完全顺从的。宣传家们接到指示，要他们把法西斯主义作为宣传工作的中心。但是，历史的分析显示，天主教、家庭、家乡和地区、“资助人—代理人”的关系网、对性的态度等许多其他的意大利旧的结构体系都分散了意大利平民的注意力，让他们无法对法西斯主义抱有狂热的虔诚。虽然如此，特别是因为法西斯政权与教会达成了和解，在3月24日的大选中，绝大多数的民众还是平静而恭敬地投票支持了法西斯政权和它的政策：超过850万人投票支持法西斯政权，只有13.5万人反对，弃权的只有8092人。

墨索里尼已经达到如此伟大而无人企及的地位，作为这一地位的一个象征，1929年9月16日，墨索里尼把他的办公室从基吉宫搬到了威尼斯宫里。在那里，他被安置在“复兴两半球厅”里，这是15世纪时为教皇修建的一座建筑，最近才被修复。它的房间非常大，长18米，宽15米，房顶高12米。在这样大的一个房间里，从办公室的门口到墨索里尼的办公桌（通常非常混乱）之间就有长长的一段距离，来访者即使是蹑手蹑脚地走过这段距离，房间里也会有很大的回音。这座宫殿的外面就是罗马的心脏地带：那里有古罗马的朱庇特神殿，以及自由党时代的野心的伟大象征——维克托·伊曼纽尔纪念碑。很快，威尼斯宫上的阳台就成了墨索里尼发表最重要或者最平民化的演讲的地方。从那里还可以看得到罗马

* 这位作者声称，当他在1932年10月第一次见到墨索里尼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地咕哝道：“啊，恺撒大帝！”

圆形大剧场，以及一条被命名为帝国大道的林荫大道穿过古典的广场一直通到大竞技场。虽然现在已是意大利第三帝国，但这里还回荡着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的声音（一个自信和厚颜无耻的年轻法西斯分子通过了“松懈”的警卫走进了墨索里尼的办公室，他注意到，与其他许多人一样，墨索里尼在他的桌子上也摆着父母亲的照片，还有他自己拉小提琴的照片，他的房间的其他角落里还装饰着他的“高贵的安哥拉猫”）。

路易沙·帕塞里尼评论说，第一批到墨索里尼这里来的拜访者的首要目的是确认他们的梦想。如果说得更确切一些，墨索里尼可以激发起他们的梦想和恐惧。20世纪20年代的严峻的建筑风格能够体现出罗马共和国或者早期帝权的主题，而“两半球之厅”的设计风格能够给人造成一种受到胁迫而产生敬畏的感觉，用一种拜占廷式的风格把独裁者与他的统治目标隔离开来。从一个科里奥兰纳斯*，一个提比略·格拉古**，或者一个尤利乌斯·恺撒，墨索里尼已经被转变成了一个类似君士坦丁或者东罗马帝国皇帝的人，一个半神化的人，他的光辉足以让普通人中那些矮小的小偷们感到头晕目眩。为了显示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用来形容墨索里尼的感召力的语言也改变了方向。转而重点强调领袖是孤独的，而且必须继续孤独下去。在20世纪20年代，墨索里尼有时也抱怨过他的孤独。在30年代里，孤独已经成为或者据称已经成为他与生俱来的一部分。1932年4月，他对一位崇拜者说：

“一个人必须接受孤独……一个领袖不能有与之地位平等的人，也不能有朋友。从自信的交流而得来的谦卑的安慰是在否定他自己。他不能敞开他的心扉，永远都不能。”

当时，墨索里尼故意摆谱似地拒绝到法西斯政权的一些部长家里去访问，社会交际不属于他这样的人的行为。无数的照片把他新的“花岗岩似的”形象印在每个人的脑海里。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时候，墨索里尼这个独裁者的新的形象已经无处不在：严厉而没有任何笑容，薄嘴唇，剃了光头，很可能还带着一个军用头盔。毫无疑问，他带帽子的原因之一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秃顶（另外一个原因是他头上留下的一些头发正在变白），但是现在，墨索里尼这个像大理石一样

* 科里奥兰纳斯，莎士比亚所著历史悲剧中的一个人物。

——译者注

* 提比略·格拉古（公元前163~公元前132），古罗马政治家和社会改革家，与其弟弟盖约·森普罗纽·格拉古（公元前153~公元前121）合称“格拉古兄弟”。他寻求通过土地的大规模再划分来帮助贫穷的农民，遭到豪门贵族的反对，在选举保民官司的公民大会上被打死。盖约接替其兄的工作，发动了几次改革，但遭到了类似的命运。

——译者注

冷酷或者坚强如刚的战士，这个人类中的机器的形象，取代了他过去更为细腻的形象。

那么，从签署《拉特兰协议》那令人高兴的几年到纪念进军罗马10周年期间，墨索里尼是否完全掌握了国家的权力呢？他现在是一个面前没有任何重大的反对和阻碍的无拘无束的独裁者吗？一个可以独自描绘意大利的前途和命运，甚至立志要改变世界的人吗？在法西斯政权统治下的意大利，所有的事情真的像它们看起来那样在按照领导决策层的意愿发展吗？法西斯主义真的像一个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具有了“一个完美而坚实的极权主义体系的所有的特征”了吗？毕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总是相信他们所看到的事情。1927年，一份警方的报告声称，阿尔多·卢西尼奥利曾对他的朋友抱怨说，在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警察简直无处不在。他们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干预之多超过了意大利复兴时期以前“波旁王室或者奥地利人的肮脏记录”。卢西尼奥利问道：“但是，他们的这种镇压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如果墨索里尼以前愿意的话，他是可以根除法西斯分子中的暴力活动和腐败行为的，不至于再因此而遭受批评并陷入难堪的境地。卢西尼奥利说：“但是，鉴于他的心理和他对于比他更强的人那种天生的害怕，我现在不相信，并且永远也不会相信尊敬的墨索里尼会清除他的那些朋友，这些人神化墨索里尼的目的是为了控制摇摇欲坠的大厦。”1930年10月，图拉蒂突然被解除了民族法西斯党总书记的职务——盛传他是个同性恋，并且有恋童癖（与他具有斯巴达式的高尚情操的官方形象不符）。*现在回顾起来，应当是确有此事。1945年以后，他写文章回忆说，领袖是“对他自己的缺点心怀恐慌”。他还说，这一事件解决之后，墨索里尼看起来平静多了。在被自己的下属控制的过程中，墨索里尼总是心怀恐慌，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实。现在，他可以更好地把自己内心的这种恐慌隐藏起来了。图利奥·恰内蒂是一个来自翁布里亚的法西斯分子，也是一个法西斯工会运动的狂热分子，他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他注意到了墨索里尼每次演讲所带来的振奋人心的效果，只有在这种兴高采烈减退之后，问题才会浮现出来。怎样才能让这些大肆宣扬的政策得以贯彻？于是矛盾就出现了，因为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一问题，所以只能引用一句口号了：“墨索里尼的渐进主义”——这是用礼貌的语言描述在浮夸的言辞之下隐藏的真实的停滞不前的状况。

卢西尼奥利、图拉蒂和恰内蒂的话引起了一些有兴趣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人们为其他独裁统治编写历史时也曾出现过。领袖怎么样统治国家？如果存在局限性，那么墨索里尼的权力的局限性是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不是一个“软

* 墨索里尼喜欢对一些特定的听众说图拉蒂是清白的，那些谣言都是法里纳奇故意编造的，但是墨索里尼既没有出面挽救这位以前的同僚，也没有再给他在政府中任职的机会。

弱的”独裁者？法西斯政权的一些典型特征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形成的？是不是像法西斯政权大肆宣传的那样，是墨索里尼掌控着意大利？还是意大利掌控着他？

外交事务也许可以拿来对此做出衡量。从职业生涯的一开始起，墨索里尼就通过夸耀自己在国际关系方面的知识而最为直接地表达了他希望成为一个“大人物”的渴望。同样，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那之后，评论家们都急于谈论“墨索里尼的罗马帝国”和“墨索里尼的战争”。在当今的历史学家中，麦格雷戈·诺克斯就特别热切地把“领袖”一词和纳粹德国的“元首”联系起来，他认为二者有着天生的“共同命运”。在他看来，用现在说法，这二人都是“流氓国家”的领导人。另外，在诺克斯看来，在1926年的时候，墨索里尼的侵略计划的“所有主要的细节都已经确定了”，或者时间甚至会更早一些。他认为：“从一开始，墨索里尼的计划的就是战争，一次伟大的战争。”

其他历史学家倒是没那么自信。恩尼奥·迪诺尔福就精明地评论说，墨索里尼“支持修订凡尔赛条约，但并不是真心希望修订”。同样，同时代的人对此问题也并不确定。经常与墨索里尼打交道的英国外交大臣奥斯丁·张伯伦就评论说：“我非常怀疑墨索里尼自己是否确切地知道他所希望的意、法关系是什么样子。”墨索里尼在国内到处发表炫耀武力的演讲，而在外交场合的行为举止却理性得多。墨索里尼虽然满嘴花言巧语，但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却往国际联盟的许多委员会都派遣了忠实的代表，相反，这些被任命的意大利代表并没有被他们的同事们认为是被意识形态的狂热所控制的人。1928年，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甚至签署了《凯洛格—白里安公约》*。但是，在下议院发表的一次演讲中，墨索里尼在谈到这一公约时说它是“那么崇高，应当称它是超自然的”，从而引发了听众们会心的大笑。同样，在这一公约还在谈判的时候他就声称，单方面拒绝这一公约是毫无道理的。

尝试用这样或那样一个例子来解释墨索里尼的外交政策是一个文献学上的问题，也是历史学科中的一个典型问题。怎么样来理解这种言语和行动上的不一致呢？拿人的问题来说吧，如果是面对外交部的人而不是军队或者警察，那么墨索里尼的行为就会表现得更加激进。例如，1926年年初的时候，他就开始宣称这一年是法西斯主义的“拿破仑年”。他承诺说：“从今天开始，意大利不管是在精神

* 凯洛格，美国国务卿（1925~1929），倡议签署了《凯洛格—白里安公约》（1928年），得到62个国家认可，公约否认了将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实施的工具。他因此而获得1929年诺贝尔和平奖。白里安（1862~1932），法国政治家，从1909年起11次连任总理。任外交部长时是《洛迦诺条约》的主要筹划者（1925年），这一条约保证了比利时、法国和德国边境的和平。他也参与起草了《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并获1926年诺贝尔和平奖。

上还是在物质上都将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以适应它已经增长并且还在不断增长的国力。”9月份，他还真的让孔塔里尼从外交部秘书长的位置上退休了。*并且，他还唯恐继任者再像孔塔里尼那样的谦虚克制，所以从1927年开始，他再也没有任命新的秘书长。很明显，在法西斯政权下，是政治家而不是官僚在控制着外交部。

1928年，墨索里尼和他的野心勃勃的副部长迪诺·格兰迪一起让大约20个资深外交官提前退了休，同时还改变了进入外交部的规矩以允许“征召法西斯”。**这种对外交官的清除活动进行了多次（1932年又进行了一次），尤其是在1945年以后。这些活动让墨索里尼的外交政策在他整个执政期间要么是没有新意，要么就是赢得民族精英中大多数人的掌声。了解事情的前后关系是必要的，墨索里尼并不是第一个不任命外交部秘书长的人，克里斯皮在1888年也曾这么做过。自由党的部长们也没有完全退却，他们也在新的外交官中寻找他们自己的保护人，这些人也适度地坚持着特定的意识形态信仰。1914年，意大利的外交活动已经带有很强的南部地主阶层的色彩，外交部中有相当多来自这一阶层的人。而年轻的外交官们可能更愿意赞成新的民族主义者联盟的观点，希望能够像变戏法似地出现一个更加强大的意大利。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意识形态必须屈服于外交部中的现实和习惯——在这样一个地方，太过明显地表现出热情不可避免地被认为是一种讨人嫌的行为。但是在1928年之后，这对于意大利的外交官来说却是一种真真切切的现实。除了个别例外的情况，就外交部里那些“征召的法西斯”而言，他们的态度已经不太可能与那些从自由党时代就在外交部任职的同事的态度区分开来了。同样地，他们中很少有人支持后来的萨罗共和国，而且他们中还有一些人在1945年之后继续在外交部门中任职。其中一个在1943年被选中的人是弗朗哥·法里纳奇，他是克雷莫纳法西斯头目法里纳奇的儿子，之前曾在类似汉堡和塞维利亚这些在意识形态方面能够接受的地方担任过副领事。***他一直在意大利外交领域内任职，直到1973年才退休。

另外一个有启示意义的例子是格兰迪。他在1929年9月被提拔为外交部长，并一直担任这一职位到1932年7月。在那之后，他又担任意大利驻伦敦大使直至

* 据一位年轻的外交官说，这么做是格兰迪的主意。

——作者注

** 格兰迪在给图拉蒂的信中解释说，墨索里尼这么做是想让“战争英雄们”和“可信赖的法西斯”能够进入外交部。

——作者注

*** 弗朗哥·法里纳奇对轴心国在战争中的命运持明显的悲观态度。

——作者注

1939年。*尽管他的阶级背景让他可能受到尊敬，但他实际上却是一个极端的法西斯分子。1921年墨索里尼打算与社会主义者和解的时候，他是持反对意见的势力的领导人之一。他很早就主张解散国际联盟，声称它只不过是过于富裕的战争胜利者的一个联盟，另外，他还要求修改《凡尔赛条约》。然而，到了1922年的时候，格兰迪的世界观已经变得温和多了。他很容易就适应了自己的职务，并且把墨索里尼尊称为“一个有着几乎是超自然的本能的亲切的政治家”。他认为，领袖墨索里尼是“国家生活的综合体”，“他的现实主义是永远正确的”。格兰迪英俊潇洒，温文尔雅，彬彬有礼，在国际外交界是一个知名的、受重视和信任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容易被诱惑的人。* *

如果墨索里尼的外交部里的人看起来还并没有表现出完全违反外交政策的连续性的话，那么他们实际的外交政策到底是什么？有一些领域是法西斯特别感兴趣的，其中的许多方面也是从自由党政府那里沿袭下来的。比如，像以前一样，意大利对东非及其周边的情况一直保持着警惕，但是，从19世纪80年代之后得到的结果却是不同的。墨索里尼声明，在所有列强中，意大利在也门拥有最多的利益。他可能也在考虑是否可以在埃塞俄比亚获得更为直接的优势。但是，墨索里尼在之后并没有采取极端的行动，他还同意塔法里大公成为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并且两国还在1928年签署了一个友好条约。在这一地区，墨索里尼所采取的政策仍然是顺其自然。一个驻亚的斯亚贝巴的外交官对一次为墨索里尼举行的欢送会仍然记忆犹新，会上尽是些笑话和陈词滥调，会议结束时墨索里尼没有做任何指示，也没有以任何方式谈到修订国家的外交政策。

1931年的时候，埃塞俄比亚又成了意大利要考虑的一个问题。起因是当时的法国总理皮埃尔·赖伐尔向格兰迪提出，意大利有可能在那里得到“补偿”。拉法埃利·瓜里利亚（此人在1943年7月之后担任了法西斯政权垮台之后第一任外交部长）对赖伐尔的提议进行了详细的评价。虽然瓜里利亚有着传统的背景，但他还是愿意想出一种方式，以便让“墨索里尼这一代人”能够从民族的历史记录中洗刷掉阿杜瓦之战的“污点”。他建议说，埃塞俄比亚是“仍然对我们开放着的人口和经济方面的唯一出路。要渗入透进这个国家，我们需要金钱；而如果想要获取它，那需要的可能就是战争了。但是，如果你不付出努力和斗争，你在这个世界上就什么也得不到。如果我们想要成就帝权，那么我们就必须找到获取它的途径。”然而，他同时也警告说，当意大利在非洲采取行动时，意大利的领

* 20世纪80年代，德费利切学院的人在为格兰迪编辑论文集时还赞颂了当时年事已高的他。

——作者注

* * 墨索里尼也为格兰迪建立了秘密档案，并记录他在1929年的房地产交易中有腐败行为。

——作者注

领导人就不应当忘记国家的根本利益，“对我们国家来说，这即使不是致命的，也是一个严重的威胁。”战略上的不祥之事是指德国与奥地利的“合并”，也就是说，德国接管了奥地利。为了阻止德国的进逼，瓜里利亚建议进一步改善意大利与法国的关系。*在就这些事情进行的所有的讨论中，墨索里尼都没有扮演什么角色，只是被动地阅读一下官方的文件而已。埃塞俄比亚还没有重要到足以单独地引起他的兴趣的程度。

但是意大利并没有像设想的那样侵入非洲。在法西斯政权统治的前10年里，意大利面临的最为急迫的外交问题是与其东北面的新国家——后来被称为南斯拉夫的这个国家的关系。与20世纪90年代“北约”在这一地区的所作所为相比，当时法西斯的政策看起来还并不那么像是一个流氓国家的行为。墨索里尼虽然公开地批准了《拉帕洛条约》，但他从来都没有停止暗中干涉这个邻国的内政。意大利的外交官们并没有反对墨索里尼的阴谋诡计，相反，他们认为这是自阿尔巴尼亚这个国家在1913年出现以来意大利自由党政府所奉行的政策的沿续。意大利为国王索古**提供的庇护也是满怀着反对南斯拉夫的意图，而与此同时，墨索里尼也为科索沃当地的“穆斯林”武装送去了经济援助和微笑。1926年10月，他又突然向巴多利奥提议说，意大利应当拟定一个全面入侵南斯拉夫的计划——这是不是墨索里尼凭他的“直觉”做出判断的又一例证呢？然而，尽管墨索里尼敦促说“一分钟都不能再等了”，但这件事最终还是没有了下文，至少在20世纪20年代是这样。

对于一个统一的南斯拉夫来说，更具破坏性的做法是意大利对于克罗地亚分离主义的支持，而这种支持是通过最终成为杀人害命的法西斯的民族主义政治家安特·帕韦利奇来实现的。当南斯拉夫（以及塞尔维亚）在1929年选择了更为独裁的政体时，意大利就在自己国内为克罗地亚的异见分子们提供庇护和军事培训。这些事都是在前民族主义者罗伯托·福尔热·达万扎蒂的协助下完成的，而意大利外交部也从自己的秘密资金中每月为他们划拨出7万里拉作为经费。1929年2月，帕韦利奇在与一个意大利人（但不是墨索里尼）谈话时提出了一个想法，即策划一次针对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的暗杀行动。但在当时，意大利人并没有对此做出反应，而格兰迪当时也自满地说，不能把克罗地亚人的这种热情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真正的“革命本质”混为一谈。总而言之，法西斯政权统治下的意大利是南斯拉夫的一个坏邻居，但它还没有积极地策划意在让南斯拉夫彻底瓦解的阴谋。也很少有证据能够证明墨索里尼对这一地区的问题的态度最初是出自他自

* 瓜里利亚在第二年又重复了他的建议。

——作者注

** 索古政权的傀儡特性典型地表现在同意在发生战争时由意大利来指挥它的军队。

——作者注

己的想法，并且他的态度也没有产生大的影响。对于许多意大利人来说，南斯拉夫问题不可避免地与伦比亚朱利亚人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而且与民族主义者也有关系，这些人主张摒弃或者清除居住在那里的“斯拉夫”少数民族。墨索里尼很少违反意大利人的这些传统，1929年4月，他专横地命令的里雅斯特的地方官员，要他们确保在那些宣称是意大利的城市（但实际上多种语言通行）的大街上“没有斯拉夫的报纸”。

那么，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在国际上表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意识形态的形象呢？独裁制度和后来的极权主义国家的建立引发了有关法西斯主义在世界历史上的潜在空间的争论。对于外国人对意大利发生的事情的迷恋，《法西斯评论》等其他刊物的撰稿人一直都非常留心。法国的乔治·瓦卢瓦和他的法西斯，西班牙的米格尔·普里莫·德里韦拉和他的独裁政体，* 奥地利的准军国主义，立陶宛的右翼分子，** 日本、阿尔巴尼亚和英国（以及居住在意大利的亲法西斯分子）的法西斯分子，甚至一个澳大利亚的总理也宣称要在立法中学习法西斯——所有人的行动在法西斯的刊物中都有所提及，以作为习惯上被称为“法西斯主义的普遍适用性”的明显的证据。有人相信法西斯分子的信息可以跨越国境，这种迷信居然流传得十分广泛。而玛格丽塔·萨尔法蒂也煽情地解释说法西斯主义的先进之处在于，它相当于一种“通过伟大的意见交流和深刻的精神革命而实现的和平帝国主义”。然而，面对所有这些意识形态方面的膨胀主义现象，1928年3月，墨索里尼却在下议院发表演讲时坚定地声明：“法西斯主义不是用来出口的。”

这一声明意味着什么？唯一明智的结论是，法西斯的普遍适用性对于大国的独裁统治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墨索里尼和其他的统治精英们都还丝毫没有定论。当墨索里尼声称法西斯主义只适用于意大利时，他的弟弟却宣称意大利政府的模式具有可供其他国家借鉴的特点。1928年3月，阿纳尔多宣称法西斯主义的普遍适用性在于它代表了一种新型的文明，它源于战争，与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乏味”和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残暴”恰恰相反。阿纳尔多还资助了贝尔托·里奇，此人是一个有着哲学和激进倾向的年轻法西斯分子，渴望法西斯政权能够更进一步、更快地发展成为一个帝国，并且渴望全世界都能够法西斯化。1931年1月，里奇开始出版一份名为《普遍性》的刊物来宣传他的理想。在之后的一年里，法西斯

* 在给墨索里尼的信中，普里莫·德里韦拉这位西班牙将军对“墨索里尼所做出的在世界范围内都有价值的丰功伟绩”表达了赞美和敬意。

——作者注

** 巴斯蒂亚尼尼在给墨索里尼的信中告诉了他一个消息，即他们都把领袖作为自己的“精神领袖”。

——作者注

政权对成立“法西斯国际”表示了支持。但是当时，希特勒和纳粹在德国已经崛起，所以，不可能有太多的野心勃勃的外国法西斯分子仍然希望能从罗马而不是柏林得到知识和经济上的支持。最困惑的也许就是萨尔法蒂了，她在1932年宣布：“墨索里尼，以意大利的名义，承担起了领导世界的重任。但是他可能还有更重要的一项任务，那就是捍卫白种人创造的西方文明。”她的话是否反映了她的情人思想中的混乱，这一点还值得深思。

当然，很明显，阿纳尔多也不是没有矛盾。例如，他一直和善地关注着扶轮社从他的权力根据地米兰进入意大利，他自己还加入了这个组织。扶轮社的自由国际主义招致了一些法西斯分子的愤怒，但是，1929年，亚历山德罗·帕沃利尼对正确的法西斯路线进行了解释：“对于像扶轮社这样的国际组织和协会，虽然它们从精神上来讲与我们的法西斯主义是不一致的（例如民主主义、和平主义、新教和犹太主义），但政府从总体上还是奉行了现有的政策。政府可以用它自己的人来表达它的意见。”《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和国际联盟的故事又被重复了一遍。法西斯的发言人继续强调了他们的独裁政体在意大利国内具有的激进主义色彩，但是，至少在当时，他们还是愿意与其他大国达成妥协，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愿意根据这些大国的方式来调整他们自己。墨索里尼没有表现出任何反对这种微妙地运用战术的做法的迹象。

1929年至1932年间，裁军成了欧洲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而墨索里尼的这种态度在法西斯政权对待裁军问题的政策中也得到了体现。毫无疑问，在内心里，墨索里尼认为这一问题是一个“悲喜剧”，他也曾经用这个词来描述过奥斯丁·张伯伦（张伯伦对此可能不以为然）。然而，尽管墨索里尼在口头上叫嚷着意大利必须从任何有关裁军的协议中得到最大的好处，但实际上他并没有从日内瓦撤回意大利的代表。他奉行的是一条双重路线，一方面，他同意了格兰迪提出的带些迎合和讨好意味的建议：在国际联盟中的持续落败将会更加容易地说服意大利人同意在最终的重整军备中做出“新的牺牲”（口头上是这么说，但是意大利军队实际上很少有现代化的迹象——巴多利奥认为，任何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与法国和南斯拉夫作战的企图都无异于“我们的自杀”）。事实上，1930年10月，墨索里尼就对党内的官员说：“意大利可以裁军，但前提是所有的国家都要裁军……然而，我们必须清楚的一点是，我们从物质和精神上武装自己的目的是为了防卫而不是侵略。法西斯意大利永远不会发动战争。”*

* 他随即又否认自己曾经说过“法西斯主义不是用来出口的”这样的话，并且说法西斯主义在“精神上”相当具有普遍适用性。

在日内瓦被一再辩论的那些条文不太可能成为墨索里尼考虑的第一要务。但实际上，他对此事还是相当敏感。格兰迪直接写信给法里纳奇，而法里纳奇又在他的报纸《法西斯政权报》上发表文章赞扬格兰迪，格兰迪因此遭到了墨索里尼的严厉指责。墨索里尼怀疑在这一过程中会不会有发生改变的可能，竞争对手是不是在塑造自己的感召力？墨索里尼认为，他的下属走的所有的路最终都应当以他为终点。墨索里尼是一个对丝毫的抱怨和怀疑都高度警惕的领导人。1932年7月，墨索里尼重新亲自掌管了外交部，并任命来自的里雅斯特的一个法西斯分子富尔维奥·苏维克做他的副部长。据他回忆说，墨索里尼曾在许多场合说：“这不像是法西斯的做法。”在希特勒和纳粹崛起之前，对于墨索里尼来说，最为重要的仍然是自己的形象、如何维护自己的感召力和控制民族法西斯党，而不是为意大利描绘出一个新的、独立的外交政策。墨索里尼可能还是很热心或者尽职地阅读了外交文件，并且对送上他案头的大量的电报和要件都做了很多的批示。由于空缺外交部秘书长的职位，这就大大减少了这样一个可能性，即文件在外交部只经过严重官僚化的批复。在20世纪30年代，他还曾把他在一些政策领域内优先考虑的问题列出了个单子。但是，到了1932年，在他的独裁统治下，意大利的外交政策还是带有更多的意大利色彩。就外交事务而言，墨索里尼只是领导管理着一个体系，并没有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开创新的政策。

移民问题可能是国际事务中与此结论不太相符的一个领域。在法西斯执政将近10年的时候，法西斯主义好像在这一领域内起了作用。在1914年以前，每年都有将近100万的意大利人无情地抛弃了他们的国家移民国外（民族主义者悲伤地称之为“大出血”），但是到了1934年，这一数字已经降低到了68461人。1927年，格兰迪宣布“移民”一词已经从意大利语的词汇表中删除，这证实了意大利的国家政策在这一问题上有了急剧的转变。同样，在20世纪30年代复活的帝国主义也在人口统计学领域为自己寻找理论依据。有人提出，既然意大利是一个“多产的民族”，而不像法国和其他的邻国那样，那么意大利就应当获得更多的领土来满足自己的不断增长的人口的需要。提出这一观点的是一个新的官僚机构，即所谓的“海外法西斯”。它是由自由党统治时期的一个机构发展而来的，这个机构名叫“意大利殖民地学会”，但它一直都没有有效地发挥作用。“海外法西斯”声称将在移民国外的意大利人中宣扬法西斯主义的观点和意大利人的风格。官方也为它提供了大量的资金，以确保他们能够从1925年6月开始出版一份杂志，并起了一个悦耳的名字《军团报》，刊物上刊载的都是有关国家胜利的故事，以及宣扬“英雄的和宗教的”帝国的理念。还有一些文章鼓吹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法西斯和极权主义社会。他们对财富和民族荣誉的共同兴趣是否可以用来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即在1945年之后，墨索里尼留给大多数意大利移民团体的印象要比留给国内团体的印象更好一些？

但是，如果说“海外法西斯”改变了世界，这种说法还难以让人接受。实际上，墨索里尼和他的法西斯政权的移民政策也是因情况而做出的反应，而不是主动出台的政策。1923年，墨索里尼还认为移民是“意大利人民的生理需要”。1924年，他还在参议院里说：“一个人不能也不该考虑通过战争来获得殖民地。”1926年，他又改变立场说，他对移民“不再那么狂热了”。此时，他又重新提起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时对剥削的控诉，声称许多离开自己国家的意大利人正是因为无法逃避这种剥削才出国的。他之所以转而持这种新的立场，主要不是源于由意识形态推动的信仰，而是源于那些移民接收国所持的针对意大利移民的限制性的态度，特别是美国。但即使如此，墨索里尼对待这一问题仍然小心翼翼。当“海外法西斯”的风头过甚时，墨索里尼也会像指责国内激进的法西斯分子那样指责他们。1928年出台的新法律也要求海外的法西斯们不得违反所在国的法律。^{*}从那之后，法西斯政权就经常拨出款项用于在移民中宣传法西斯主义，而这些宣传通常都是通过类似业余俱乐部的组织进行的。然而，法西斯主义从来都没有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民族主义者所处的困境，更不用说种族主义者和意大利在这方面的外交政策了（意在把国外的意大利移民也国民化）。如果意大利真的想仿效纳粹德国并把所有移民都召回国内的话，那么它就需要计划立即夺取纽约、布宜诺斯艾利斯和美洲新大陆上其他许多城市。它最终选择在埃塞俄比亚和利比亚寻求利益，非洲的这些地区虽然有人居住，但任何明智的移民都不会对这些地方产生什么兴趣。即使是在法西斯意大利最具侵略性的时期，它的行为也还只是像一个19世纪的大国那样，只不过是当时那些大国侵略非洲的行为的翻版。不管是墨索里尼，还是其他意大利法西斯，他们都没有成功地找到一条能够给予扩张主义一个“群众基础”的道路，因此，作为后果之一，法西斯意大利在它的侵略行动中从来都没有获得像它的纳粹盟友那样臭名远扬的杀人决心。

在这种情况下，也有一些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法西斯意大利最悲惨的屠杀地点都在意大利国内，并且，自由党政府也在其中的很多地方做过类似的事。但是，相对于欧洲人征服欧洲以外的世界时的所作所为来说，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其中短短的一个章节而已。从多方面的意义来讲，意大利都是欧洲最弱和发展最晚的帝国主义国家。编写历史时的局限性以及1945年之后世界上的各种势力结合在一起，使得意大利历史中这一篇章以及墨索里尼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都有所隐藏。然而，这确实是一个悲哀而有教育意义的故事，值得对其进行详细的描述。

早在1922年，在意大利的一个官方文件中，就把在19世纪80年代获得的厄

^{*} 在接受《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采访时，墨索里尼否认自己有阻碍美国同化意大利移民的任何想法。

立特里亚和索马里的殖民地、以及在1911年至1912年间在与土耳其的战争中获得

的黎波里塔尼亚、昔兰尼加以及前费赞地区的沙漠省份合在了一起，并且重新恢复它旧时的名称：利比亚。通过与希腊的战争，意大利还夺取了多德卡尼斯群岛。虽然巨大的国际压力要求把希腊的平民交还希腊统治，但意大利仍然统治着这些岛屿。在这些满是沙尘的非洲殖民地中，利比亚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历届意大利的自由党政府并没有做出多大的努力去维持在这一地区的脆弱的统治。1921年，意大利政府在这个殖民地上只划分了89块总面积为2500公顷的土地用来发展农业。不过当时，在的黎波里塔尼亚总督朱塞佩·沃尔皮（1921年7月上任）和殖民地部长乔瓦尼·阿门多拉（1922年2月上任，最终成为法西斯的一个“烈士”）的支持下，意大利的自由党政府已经决定要“再次征服”利比亚了。这件事情是有背景的。最终成为《意大利生活》的编辑的马费奥·潘塔莱奥尼在1911年提出了一个假设，称“当地的人口质量低劣，是最让人厌恶的种族的混合体，因此他们必须被驱逐和消灭，并由优良的意大利血统来取代。”许多帝国主义大国都吞并了许多的土地，在这些土地上，即将或者已经导致土著居民被大批地杀害，而意大利的帝国主义也要不可避免地要与这些国家的帝国主义走上相同的道路。

当他们考虑要再次征服利比亚时，不管是沃尔皮还是自由党外交官阿门多拉都没有轻视“坚定”这个词，但这个词的实际意义却经常被忽略。法西斯的统治只在局部出现了不连贯，而墨索里尼自己在这问题上的路线也被一个主要的历史学家总结为“模糊，易变并且有时是矛盾的”。沃尔皮在这一地区一直担任总督至1925年8月，他试图在这里鼓励发展资本主义，优先考虑在更加平民化的移民方面进行投资，他的想法得到了费德佐尼和斯卡莱亚等一些身为民族主义者的部长们的支持，而墨索里尼对此也提供了不是很直接的支持。沃尔皮还费尽心机地写了一些有关殖民地发展情况的报告，在这些报告里，他在强调自己的贡献的同时还贬低了他人的贡献，当然，对于年轻的士兵鲁道夫·格拉齐亚尼取得的军事胜利，他却亲自把相关的消息送到了国内。格拉齐亚尼认为，获取胜利的最好办法就是要凶残，这就意味着在消灭反对意大利当局的武装“叛乱分子”的同时，还要杀掉老人、妇女和儿童。按照罗马人的思维模式，格拉齐亚尼习惯地把利比亚人定义为“野蛮人”。在他看来，他们都是些没有权利或者前途的人。

沃尔皮的继任者是埃米利奥·德博诺，他的任命可以看做是使意大利法西斯化的新的动力的一个迹象——1926年4月，就在维奥莱特·吉布森刺杀事件发生之后不久，墨索里尼就到的黎波里进行了一次访问，这次访问也被广为宣传。除了德博诺之外，墨索里尼还任命阿蒂利奥·泰鲁齐为昔兰尼加的总督，而前法西斯四巨头之一的切萨雷·马里亚·德韦基也从1923年10月起担任了索马里的总督（尤利乌斯·恺撒在他的有关军事行动的汇报中用了第三人称，德韦基也效仿他的

用法,并且大言不惭地夸大了他在那里取得的令人怀疑的成绩)。法西斯政权最引人注目任命是1934年1月让伊塔洛·巴尔博担任了利比亚的总督。多德卡尼斯群岛当地的居民,至少是相对较穷的居民本来对法西斯的帝国统治还是相对满意的,但是从1936年11月德韦基担任那儿的总督之后,他的激进和无能反而破坏了当地居民的这种满意态度。

1935年至1936年,意大利征服了埃塞俄比亚,从而极大地扩展了意大利帝国的版图,而对意大利进行法西斯化的新的企图也在考虑之中。同时,在征服埃塞俄比亚的过程中发生的伤亡不管有多么惨痛,还无法与1928年至1933年与利比亚讲和期间发生的伤亡人数相比。在这段时间里,巴多利奥被任命为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的联合总督,期间也发生了许多内部争斗。巴多利奥是格拉齐亚尼的一个对手,后者在1930年3月被任命为昔兰尼加的副总督。但这两个人都很讨厌于1929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任职的殖民地部长德博诺。格拉齐亚尼更倾向于强调为法西斯主义而献身,但巴多利奥则远没有这么革命。然而,从1930年6月起,两人却联合起来在管辖的区域内实行了一项种族清洗政策,一共驱逐了大约10万人。巴多利奥的政策更是残忍,他命令手下人要“残忍而无情地”驱逐发现的每一个家庭。那些被驱逐的难民被关进靠近海边的一系列集中营里,里面经常有人因饥饿和疾病而死亡(另外,昔兰尼加人所拥有的家畜中大约有90%都因法西斯的政策而被杀掉了)。1933年9月,当这些集中营最终被打破的时候,活下来的难民只有原来的一半。

当地也发生了反抗运动,但他们的领导人奥马尔·埃尔穆赫塔尔后来被捕了。1931年9月,在经过虚假的审判之后,这位领导人被处死了(他被作为一个“强盗”而被公开处以绞刑)。为了对付他们的顽强抵抗,意大利人毫不犹豫地使用毒气弹来轰炸他们的敌人。使用毒气弹这种做法是由伊塔洛·巴尔博在1927年很轻率地同意的,他当时任空军部副部长,非常欢迎“化学武器与天空的自然结合”。在昔兰尼加地区,毒气弹攻击的目标之一是“圣城”科夫拉。在这一地区,意大利人使用了有史以来(不管是何种版本的历史)可能最不道德的方法进行屠杀。意大利人在埃塞俄比亚也无情地使用了毒气弹。

1945年之后,虽然意大利的历史学家们已经是在为一个共和国而不是一个法西斯独裁者服务了,但想让他们承认法西斯所犯的这些罪行还是非常困难。他们一直对此保持沉默(对于来自“文明”大都市的统治者对殖民地人民进行的清洗,他们同样也是持这种态度)。相反,在有关纳粹德国的文献著作中,奥默·巴尔托夫等人却摆出证据以证明东线难以想象的“战争的野蛮行径”确是德军和狂热的纳粹分子所为。克肖认为,这是德国人甘心为他们的元首效命所造成的另一结果。相比之下,意大利帝国主义战争中发生的杀人暴力行为与纳粹德国是相似的,但意大利人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却是迥异的。墨索里尼本人可能也认可了这种最为

残暴的行为，但这些做法的始作俑者是巴多利奥和格拉齐亚尼等人，而不是墨索里尼。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很可能受到了一种新的野蛮的“未明说的假设”的影响，而这种野蛮是被法西斯主义所认可的，并且在墨索里尼的性格中也得到了体现。然而，巴多利奥是意大利皇家军队的一名军官，他自己也充分认同这一身份。他的帝国主义思想比“墨索里尼思想”更加传统。此外，也有人对这种清洗行为和集中营提出了批评，特别是德博诺和时任意大利驻开罗的公使、前民族主义者罗伯托·坎塔卢波。然而，他们的批评更多地带有个人动机（特别是德博诺），或者是一种战术策略（坎塔卢波当时正在试图与埃及的民族主义者恢复建立友好的关系），而不是出于伦理道德的考虑。不管那些身份地位低一些的意大利人持什么样的态度，但意大利的精英们——不管他们是不是法西斯分子——都很少把殖民地的土著居民作为与他们平等的人来看待。不管怎样，他们更多地是模仿19世纪英国和法国的殖民者的所作所为，而不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纳粹的所作所为。

如果墨索里尼和他的有教养的臣民在1932年还在梦想建立一个帝国的话，他们的国家还有另外一条虽然不是那么高贵但回报却不错的与世界进行联系的途径——旅游。极权主义国家向独立的外国民众开放旅游听起来似乎有些矛盾（纳粹德国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期间曾经暂停更加公开的诽谤行为，这一点更加广为人知）。但是，风景优美、艺术辉煌和历史悠久的意大利对于许多外国人来说的确是一个难得的度假胜地。但法西斯却在这一问题上产生了争议，特别是因为民族主义者多次敦促说，那些来意大利探寻复兴运动和寻找美女的游客实际上是在羞辱今天的意大利。马里内蒂更是把事情极端化了，他认为用飞机把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夷为平地是意大利走向现代化和伟大国家的最佳途径。当时，意大利的经济学家们正在强调说旅游是意大利最繁荣的行业，这些反对意见让这些生性节俭的经济学家们非常痛苦。那么墨索里尼对这个问题持什么样的看法呢？

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比较复杂，因为有许多势力都在争夺旅游业的管理权。其中有一些是以前的自由党的势力，还有一些则是更为严格的“法西斯”。“社团主义国家”是支持旅游业的，但它的政策却是模糊不清的。在墨索里尼的亲切关怀和赞许下，一个新的组织“旅游总指挥部”成立了，但以前存在的争论一直都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旅游部门中一些显要的官员都很不愿意放弃他们的工作到前线去服役。甚至在1942年至1943年间最艰苦的日子里，他们还在做着豪华饭店的美梦。在墨索里尼的统治下，旅游业组织仍然保持着自由党势力和法西斯势力两派，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仍然是一个官僚主义机构。

其中一个机构是自由党时期就有的，并且在1945年之后还继续存在，它就是本部设在米兰并引以为荣的“意大利旅游俱乐部”。从多方面来讲，它都是意大利中产阶级的一个典型的组织。它在意大利独裁统治期间的历史是具有启迪作用的。法西斯对于这个组织的侵扰日渐增多，并在1937年达到了顶点：强令把它名字

“意大利化”，后来又变成更法西斯化的“意大利旅游联合会”。但不管怎么变化，这个组织最终成功地抵制住了压力，没有把它的总部搬到“帝国的首都”罗马去。另外，墨索里尼还曾对“意大利旅游联合会”的主任说，他对这个组织的所有希望就是它能够继续从事它的爱国事业，而这也是它一贯坚持的目标。墨索里尼还暗示说，那些比他更狂热而不是更现实的人应当对“意大利旅游俱乐部”的杰出的领导们所受的烦扰负责。他说自己正准备对它的精神加以肯定，但同时也要要求它能够带上一些激进的法西斯主义的光彩。

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意大利社会法西斯化的过程中，旅游方面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是1932年的进军罗马10周年庆祝活动。当时，墨索里尼还曾骄傲地宣称，欧洲的法西斯化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罗马一直在闪耀的光辉的一种体现。但是墨索里尼也注意到，他并不是罗马遗产的唯一的解释者。《拉特兰协议》虽然已经签署了，但法西斯与教会之间的争执和冲突并没有停止。另外，在墨索里尼版本的宗教史中还有一种不虔诚的倾向。明显的一点是，1929年5月，他在议会下议院里说：“基督教诞生于巴勒斯坦，但在罗马已经变成了天主教。”他继续挑衅说，如果不是基督教命好碰到了罗马的话，那么它就很有可能“像苦修派*那样还是一个晦暗模糊的地方教派”，并且“最后将自行彻底枯竭而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一丝痕迹。”最后，他带着一点无意识的异教徒的想法总结说，之所以能够进行拉特兰谈判，是因为现在的教皇是“一个真正的意大利人”，从现实的理性上讲是一个典型的“伦巴第人”，愿意采取主动。

在之后的两年里，法西斯政权和教会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口角，法西斯政权对教育的控制程度是双方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教皇庇护十一世经常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天主教行动教皇”，对“天主教活动”的网络内的精神和物质行为有着特别的兴趣。天主教俱乐部和协会非常不赞同极权主义国家这一概念（即使是《法西斯评论》也乐于承认说教会同样也有自己的极权主义方式）。面对着这样顽固的对手，墨索里尼只好发泄他习惯性的愤世嫉俗和怨恨了，并唠叨说自己可能没有掌握真正的权力。当听到有谣言说教皇被诊断出患有前列腺癌时，墨索里尼还让时任驻梵蒂冈大使的德韦基去打探是不是真的有这回事。他还让人设法在西斯廷教堂内安装了一些设备，当教皇在那里做弥撒时收集他的尿液以验证他是不是真的患上了癌症。

1931年5月，法西斯政权向天主教行动青年组织发出了禁令，教皇庇护十一世为此发了一份措辞严厉的通谕，但却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我们没有需

* 苦修派，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间盛行于巴勒斯坦的一个犹太教派别。

要》。按照历史学家的说法，“意大利和梵蒂冈的关系（现在）降到了最低点。”也许这次争论是更加表面化的而不是深层次的，因为教皇庇护十一世和墨索里尼以及他们的顾问们知道，对于教会和法西斯政权来说，《拉特兰协议》都是一个很好的商业交易。到那年夏天结束的时候，双方已经达成了妥协，墨索里尼承认他“安排教会在政府组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教皇的国务秘书帕切利（他在1939年成为教皇庇护十二世）也被德韦基称赞为一个守信和有同情心的高级教士，据说他在得知这一消息之后立刻“精神焕发”。1932年2月，墨索里尼对梵蒂冈进行了正式的访问。尽管有些牧师和法西斯分子比其他人更加持怀疑态度，但墨索里尼和教皇庇护十一世都声明，教会和法西斯政权就国内的社会和性别秩序以及马耳他、苏联等许多其他国际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以便调整和保持最佳的政策。教皇说，法西斯主义代表着“秩序、权威和纪律，所有这些都与天主教的思维方法都不矛盾”。

法西斯党及其在进一步建设“社团主义国家”过程中的角色是另外两个让墨索里尼费神的问题，因为他的属下总是为此争论不休。*图拉蒂离职后，他的位置空缺了一段时间，其间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12月，乔瓦尼·朱里亚蒂担任了法西斯党总书记的职务。这位新的总书记有着更宽泛的民族主义背景，他1921年才加入法西斯党，聪明而激进。他后来声称，墨索里尼对他的日渐孤立和墨索里尼的浅薄让他很头疼——墨索里尼声称自己每天要阅读35份报纸（或者至少是看一看它们的大标题和社论），但朱里亚蒂却不为所动。朱里亚蒂还发现一件事情很让人厌烦，那就是墨索里尼希望人们“相信他不光能指挥管弦乐队，还能够演奏所有主要的乐器”。在私下的谈话中，当大家一起谈论起最近发生的牵涉到法西斯的丑闻时，他也最为警惕（墨索里尼可能喜欢听窃听到的直接的电话录音，下面是他在1932年10月得到的法里纳奇和战争部长佐皮将军之间的电话录音）：

法里纳奇：“我有一个弟弟，他想参加考试以便能被提升为上尉……”

佐皮：“您的弟弟不会出任何差错的。这事交给我了，我会搞定的。”

法里纳奇：“我们必须尽快办，佐皮，因为考试已经开始了。”

佐皮：“我会搞定的。”

法里纳奇：“谢谢。”

这种几近下流的监控丑闻的手段实际上也有其政治上的弱点（正如卢西尼奥利在1927年所说的那样）。当朱里亚蒂计划对民族法西斯党内的腐败和缺乏信仰进行一系列的整顿时，墨索里尼嘲讽地对他说：“如果你能清除掉1万人，

* 格兰迪在给墨索里尼的信中最终同意接受“巴尔博是一个可怜的懦夫”这一说法。

我就给你立一座纪念碑。”*当他试图把法西斯党的控制范围扩展到武装部队时，也同样遭到了阻挠。在绝大多数问题上，他都发现墨索里尼总是在用法西斯革命的更大的“现实情况”来阻挠他。因此，当他的辞职申请获得墨索里尼的同意时，他感到非常高兴。当然，他后来并没有像其他法西斯分子那样又回到政府中任职。

朱里亚蒂的继任者是阿基列·斯塔拉切，他是一个南方人，属于“一战”后的一代人，据说他在家乡加利波利被尊称为“阿基列阁下”。斯塔拉切的名声更臭，主要是因为墨索里尼曾对阿尔皮纳蒂说，他已经选定斯塔拉切接任朱里亚蒂，因为他“是一个白痴，但却是一个顺从的家伙”。当然，也有谣言说斯塔拉切的家庭成员非常富有并且有众多违法行为，特别是他的兄弟们。他也自夸说，在1935年至1936年间，他在埃塞俄比亚取得了巨大的战果。他的野蛮和残忍让他那些更具绅士派头的法西斯同事们心惊胆战——据说他抓住俘虏之后会把他们立即枪毙，并且通常是选择他们的心脏或者生殖器作为射击目标。德费利切式的历史学家们并没有像别人那样轻视他，例如，他们强调了他在党内的经验（他曾在1921至1923年间，以及1926年至1931年间担任副书记），称他并不是那么极端，但却是米兰的一个有信仰的法西斯，而米兰最知名的人物可是阿纳尔多·墨索里尼。斯塔拉切也努力地疏远与法里纳奇的距离，并且向墨索里尼汇报说，据说这位克雷莫纳的法西斯头目仍在对墨索里尼的统治的许多方面指手画脚地进行批评，称他是一个“完全失去领地的人”。**斯塔拉切愿意让法西斯党更加平民化一些——1931年秋天的时候，墨索里尼也开始宣布：“现在是要坚定地走向人民的时候。”——并且使党员的数量大大地增加（从1931年的82.5万人增加到1937年的200万人）。斯塔拉切对法西斯政权的“舞台艺术”的发展也很认同，进一步努力把墨索里尼的形象与任何基层的现实分离开来。1931年12月12日，斯塔拉切开创了在所有会议开始前都要“向领袖致敬”的先例。

正当这种新的、虔诚的（也是荒谬可笑的）礼拜仪式广泛传播的时候，墨索里尼的家庭却发生了悲剧。12月21日，阿纳尔多突然死于中风，年仅46岁。此前，他的长子于1930年8月死于白血病，这让他非常怀念并且一直饱受折磨。***当

* 朱里亚蒂还立志要把拉丁语恢复为国际外交用语。

——作者注

** 1932年1月20日，法里纳奇给墨索里尼写了一封长达27页的信，就他当时的境况和待遇向墨索里尼诉苦。

——作者注

*** 在长子死后，阿纳尔多非常伤感地写了一篇文章，开头一句是“爸爸在给你写信”。

——作者注

时，印度圣雄甘地刚刚带着敬意访问了罗马，墨索里尼正在为此而感到精神振奋呢。听到弟弟病逝的噩耗，他匆忙地赶到米兰，12月22日那天晚上，他整整一晚都守着弟弟的遗体以泪洗面。之后，他很快就为弟弟写了一部严肃的传记，*这本书与阿纳尔多一起被新闻媒体大加赞誉。即使是当时已经与法里纳奇有直接联系的《意大利生活》，**也没有忘记称颂阿纳尔多是一个专家记者、见诸行动的法西斯主义者和完美的弟弟。

实际上，阿纳尔多在墨索里尼的生活中还扮演着另外一个角色，正如他在1930年5月所说的那样，接见“无数到我这里请求支持、补贴和推荐的人”。阿纳尔多在米兰这个拥有股票市场的城市里掌管着《意大利人民报》，也是他哥哥的经纪人。就在死之前，他还对墨索里尼选择斯塔拉切担任总书记表示赞同，理由是他“直率、坦承、忠诚……是一个知道如何毫无意见地服从的好士兵”，也是米兰一个非常重要的法西斯，这一点很重要。墨索里尼会非常想念他的弟弟的，虽然得到了阿纳尔多的赞扬，但事实证明阿纳尔多是斯塔拉切无法代替的。

博塔伊在这10年里把盲目的平民主义作为治病的良方抓在自己手里，他在《法西斯评论》上坚持声称，法西斯意大利的法律并没有禁止辩论，“墨索里尼虽然对法西斯政权的重大事件负有唯一的责任，但他也不可能对法西斯内部的每一件事、每一项提议和每一个观点都能够担保。”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他又解释说，只要辩论不是过于形而上学，那么在纪律和辩论之间就没有矛盾。《法西斯评论》本身也支持就艺术的意义进行辩论。潜在的更大的激进主义存在于他们对苏联的评价中，记者布鲁诺·斯潘帕纳托认为苏联是一个应当用“法西斯的透明性”来评价的国家，而不应当简单地把它妖魔化。博塔伊过去还曾思索法西斯主义能否成为一个“永远的革命”，他仍然自信地认为法西斯党必须发展进化，并且应当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进行。

这些著作是否给墨索里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值得怀疑。他是否认为博塔伊的思想与那些“读了太多的平装本图书”的人一样呢？谁还能够比墨索里尼的思想更加深邃呢？事实上，1932年7月的时候，在哲学家乔瓦尼·真蒂莱的协助下，墨索里尼就以自己的名义为新版的国家百科全书出版了一篇入门级的概要：《法西斯主义原理》。文中强调了法西斯主义的“精神性”，称法西斯主义支持“人

* 奴颜婢膝的小说家阿达·尼格里当时正在请求墨索里尼提名她为诺贝尔奖候选人，因此特别就这本书给墨索里尼写信说，她发现这本书“从开头到最后一行都非常精彩，非常好，并且很朴素，感情浓重而强烈，就像一只手用力压在你的心脏上一样。”

——作者注

** 法里纳奇当时为这份刊物写月度专栏文章。

——作者注

只能通过斗争才能使自己进步”这一理论。文中还重申了极权主义的目标，称个人的自由只是一种错觉，只有通过为国家奉献才能得以实现。像过去反对社会主义一样，法西斯主义也是反自由的。它相信战争才能养育精神的伟大，声称意大利必须继续扩张，必须建立一个帝国。总之，法西斯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的原理”，未来属于法西斯主义。

随着进军罗马10周年纪念日的到来，墨索里尼在1932年3月至4月间接受了记者埃米尔·路德维希（墨索里尼后来不喜欢路德维希记录下的采访内容，于是最终称他是“一个肮脏和自命不凡的犹太人”）的一系列采访，这些采访也反映出了墨索里尼内心的思想。路德维希认为，“对话中的墨索里尼是世界上最简单而自然的人”，与为百科全书写文章的那个墨索里尼相比，此时的墨索里尼说话更具个人特点，而没有那么强的知识性。这给路德维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称墨索里尼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非常地幽默，并且是一个把握细节的大师。也许是考虑到进军罗马10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墨索里尼还谈到了法西斯的礼拜仪式：“每一个革命都会创造新的形式，新的神话以及新的仪式。那些还在用老传统但又想成为革命者的人必须改变他们的习惯。”然而，墨索里尼对法西斯主义的总结却是既不繁重也不狂妄：“最近，一个芬兰思想家让我用一句话来解释法西斯主义的意义，我是这样写的：‘生活不能太安逸。’”像往常一样，墨索里尼总是能够让他与别人的对话变得非常平和而流畅，他否认种族的存在，认为“民族的骄傲不需要有种族的狂妄。”他甚至非常正确地认为，一个好的统治者应当对那些弱者和有罪的人持有怜悯之情。路德维希注意到，当他要求墨索里尼多谈一些个人的私事时，墨索里尼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或者最多不过说一句“从根本上讲，我总是很孤独。”

不管是面对路德维希还是百科全书的读者以及他的一位老朋友，墨索里尼在这段时间里都坦承地说，他发现意大利人是“非常矛盾的”。那么，能够通过胁迫的手段把这样的人民真正变成一个新的极权主义的政治宗教的信徒吗？特别是当他们的领导人自己在内心中对此就不相信！这个问题也暗示出，在墨索里尼的头脑中对权力的本质也隐藏着一些困惑。在墨索里尼身上持有的明显的疑惑说明，进军罗马10周年纪念是一个可以从多方面去理解的事件。举行的纪念活动足以满足学生和那些易被言辞和形象迷惑的信徒们，然而，盛大的庆祝活动中也有许多做作的肤浅行为。其他国家已经知道面包和飞行表演队之间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有更大的发展的国家里，对于霸权宣传的理解要比墨索里尼更加深刻。事实上，意大利当时的经济情况并不好，失业人数至少有100万，实际工资与以前相比也下降了，“社团主义国家”仍然是制图板上的一个概念，而专家们也开始在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的最佳程度这一问题上展开了争论。^{*}但是，纪念进军罗马10周年可不是要对法西斯已经做的和应当做的事进行分析的时候。相反，它是为墨索里尼准备的一个庆典，并且是只为他一个人准备的。正如法西斯政权的一个

资深记者对法西斯的10年统治所做的总结那样：“新的意大利以它永远正确的领袖而被命名为墨索里尼。”“革命展示的也是他：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的另外一个主要的作家宣称：“与现实情况一样，人们的头脑和心中同样有一个虚幻的墨索里尼。”他又解释说，“作为权力和完美的一个同义词，墨索里尼这个名字已经家喻户晓……”一个庸俗的评论家的话相对有些陈旧：“墨索里尼现在已经无处不在了。”

盛大的展览，狂热的歌颂，显示出法西斯政权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坚实可靠，所有这些足以让任何政治家都沾沾自喜、忘乎所以。但高兴和满足总是躲避着贝尼托·墨索里尼。权力和无能之间的界线仍然模糊不清，而且弟弟阿纳尔多也去世了。女儿埃达在结婚之后也常常与墨索里尼通信。她是在1930年4月24日结婚的，婚礼是在离托洛尼亚别墅最近的教区教堂圣朱塞佩教堂里举行的，场面也非常宏大。1931年10月1日，墨索里尼的第一个外孙法布里齐奥出生了，**而妹妹埃德维杰也在1932年9月搬到了罗马。但是，所有这些补偿对他来说都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在五十岁生日临近的时候，正在变白的头发提醒着墨索里尼：他的家族成员的寿命都不长。虽然他禁止媒体对他的年龄进行任何讨论，但也无法回避这一问题。只有法西斯政权的宣传在掩饰这一事实，即墨索里尼正面临着人到中年的危机。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和克拉雷塔·佩塔奇这两个讨厌的人将进入他的生活，并且再也没有离开，直到他死。

* 例如，有人在赞扬墨索里尼成功地协调各方面的利益的同时，也鼓吹要维持自由贸易并拒绝“专制”。也有人认为没有哪一个单一的设计能够帮助经济走出困境。

——作者注

** 在法布里齐奥出生后的一个月之内，他的外公就给了他一张巴利拉的荣誉会员卡。

——作者注

2 阿道夫·希特勒的挑战

1933年1月30日，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元首希特勒就任了德国总理。这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不管他的绝大多数观点是多么的陈腐老套，他的个性是多么的单调乏味，他的行为是多么的反复无常，但上任伊始，希特勒就开始改变维持欧洲现状的一些潜规则以及处理外交事务的方式了。对于德国领导人的变更，受到极大影响的人之一就是贝尼托·墨索里尼。

正如人们注意到的那样，在步入晚年的时候，墨索里尼在考虑，一个经宪法确认的领袖的任期应当是14年还是10年。与许多老政治家一样，他是不愿意放弃一点点，甚至是想象出来的权力的，所以他选择了更长的任期。然而，如果他更能认真地想一想的话，也许他应当为自己选择两个每任5年的任期。因为，如果他选择这样的任期的话，那么他就可以在1932年10月28日退休了，毫无疑问，这样他的独裁统治就会是一个伟大的记录，顶多再加上一些微不足道的小缺憾，而他的统治对社会和政治自由的压制以及在利比亚的重大伤亡也可以轻易地解释过去了。他也不用为他的法西斯政权的暴政和因此造成的伤亡负全部责任，而历史中的他也将是一个既有功绩又有缺点的人物，一个从总体上讲虽然没有给人民带来多大的福祉但却至少统治了他们10年并且没有犯下太多不可饶恕的罪行的人。但是，从1933年1月30日起，情况就开始大不相同了。法西斯意大利与纳粹德国的关系是复仇女神在1943年至1945年间气势汹汹地逼近墨索里尼的主要原因。并且，墨索里尼在历史中之所以遭到人们那么多的诅咒，*德意两国的关系可以说是最明显的根据，虽然这也许不能算是最有力的理由。

在我们当今的时代，意识形态已经淡化了，一些分析家也因此而倾向于轻视

*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一个诗人的启发下，有两个科幻小说的作者还在他们的作品中把墨索里尼写进了地狱。但他们最终也承认，墨索里尼并不像希特勒那样是个完完全全的坏蛋，而是一个最初还有着美好意愿的人。比如，他不是没有对共产主义者进行清洗吗？

法西斯主义的模式。他们否认两次世界大战中间这段时期的重要意义，而正是这段时期曾一度被确认为把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这两个政权联系在了一起。这两个政权被认为是两个不同版本的“国家主义者的社会主义”，是专门设计用来抵制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吸引力的。伦佐·德费利切带头声称，无论是从社会、文化甚至外交政策方面来讲，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政权。在他看来，法西斯主义者总是注重未来，并且从根本上是一种乐观主义，这一点是纳粹分子所没有的。他的这些观点可能是有道理的，但是说法西斯主义者墨索里尼也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却很难让人相信。在回顾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过去12年的统治的时候，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从1933年开始，墨索里尼越来越无法否认他的意大利和新的德国之间存在着联系了。在这两个法西斯政权以外的世界，同时代的人几乎是非常自然地认为法西斯和纳粹的体系是类似的。

这种假设的不可避免性反过来也使意大利法西斯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具有了新的不安全性。愤怒、模仿和回避，所有这些因素都交织在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与希特勒的德国之间的关系中。下面的事实是无法忽视的：与罗马的法西斯政权相似的一些东西已经在柏林的纳粹政权中扎下了根，每天都会出现更多明显的极端主义分子和狂热分子，他们都准备并且愿意去做法西斯分子们声称要做的事，并且愿意现在就做。随着20世纪30年代的过去，纳粹的成功所散发出的光芒也照亮了法西斯主义的大厦。并且，细心的观察者也注意到，这种光芒同时也暴露出了墨索里尼所建起的法西斯大厦上的裂缝。

但是许多事情掩盖了这一现实，其中希特勒自己的语言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从政治生涯的一开始，希特勒就对墨索里尼这位意大利领袖崇拜有加，而评论家在把两个人拿来进行比较时也总是奉承墨索里尼，还曾希望墨索里尼能够恩赐一些补贴或者接见一次希特勒。在法西斯进军罗马的前夕，纳粹运动和法西斯运动之间还曾有过接触，而在进军罗马后不久，有人就告诉墨索里尼说，纳粹的运动“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模仿意大利法西斯的，例如要恢复国家的权威，要废除罢工、腐败和浪费，要裁减官僚机构等。总之是要恢复秩序，这就是他们的运动。”

后来“啤酒馆政变”失败了，希特勒本人也被关进了监狱，双方进一步的合作计划也就破产了。在一个意大利人看来，纳粹只不过是欧洲右翼这一寻求资金和支持的混杂的群体中的成员之一，它能像法西斯分子那样从历史中脱颖而出可能性微乎其微。就墨索里尼本人而言，没有证据证明他对当时尚处在幼年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有着特别的关注。的里雅斯特著名的政治评论员阿蒂利奥·塔马罗也在《法西斯评论》上发表文章，严格地把自称是法西斯的德国崇拜者与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者区分开来。他警告说，德国的反犹太运动是无政府主义的、复仇的和泛德国的，而它在犹太人问题上过分纠缠是没品味的，在政治上也是愚蠢的。希特勒可能想把阿尔托—阿迪杰地区留给意大利，塔马罗同意了，但是他

的其他属下的反对意见却最终占了上风。有一个道理非常明显，即这种类型的德国右翼分子是永远不会放弃对意大利领土的渴望的。

与1933年之后纳粹运动的主体相似，德国右翼的主体对意大利也持怀疑的态度，原因主要有三个。他们的种族理论让他们相信意大利人属于“地中海”种族，因此是欧洲第三等，也就是最劣等的种族。国家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安东·德雷克斯勒更是极端地宣称，墨索里尼“很可能”是一个犹太人，而法西斯主义也因此是一个犹太人的运动。^{*}除了种族的缺点外，德国人还知道意大利人的另外一个不是那么重要的缺点，即他们反复无常，软弱无力并且腐败堕落。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事件充分证明了他们这种可悲的品质。当时，意大利虽然在法律上属于同盟国的成员，但它却背叛了它的德国盟友，反过来帮助协约国一方。叛徒和意大利人是相同的概念。另外，从定义上解释，意大利人是很差劲的士兵，让他们蒙羞的卡波雷托惨败就证明了这一点（在意大利复兴时期他们也曾这么干过，当时他们盗取了德国人统治的领土）。最后一点是，作为凡尔赛会议上的一个战胜国，意大利取得了南蒂罗尔地区那些纯粹属于德国的领土，还有的里雅斯特，这从地缘政治学上讲可是德国在南部亚得里亚海上的一个出海口。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德国的民族主义者有充足的理由去策划一场阴谋让意大利垮台，就像他们策划颠覆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那样。但希特勒本人则不是这样，他的狂热的反犹太主义、反共产主义和反斯拉夫主义让他再也没有精力去反对意大利了。这位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元首可不是一个简单而普通的国家主义者，他准备崇拜“不可企及的”墨索里尼，^{**}并且很有艺术地称自己喜欢“飞上蓝天”，还喜欢意大利的文化遗产。

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热心于在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之间建立联系的是希特勒，而且只有他一个人。个人的因素在轴心国的形成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而希特勒可能是第一个解释为什么意大利和德国能够结成盟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即使像看起来的那样，没有一个领导人真正理解别国的战争）。例如，希特勒曾在《我的奋斗》中说，地缘政治决定了意大利是反法国的，因此就是德国的一个潜在的盟友。对于塔马罗的怀疑，希特勒撒了个谎，并且坚持声称他的朋友们应当接受这一观点，即“再次征服南蒂罗尔是不可能的”，那些不同意这一观点的民族主义者是被犹太人误导而入了迷途。他还说，在所有的事情上，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路线都是正确的：它打击共济会，对于

^{*} 纳粹思想理论家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也相信这种说法。

——作者注

^{**} 希特勒直到1942年4月还在用这话来描述墨索里尼。

——作者注

马克思主义进行跨越国度的打压，并且，不管是多么的“无意识”，但它还是反对“犹太人的三种主要的武器的”。1926年至1927年间，希特勒可能是唯一一个没有对意大利在阿尔托—阿迪杰推行意大利化的政策发出抱怨的德国人，他这样做为的是赢得墨索里尼个人的认可，*同时也是为了追求法西斯的行事方法，即“公开的矛盾要公开地解决”。在1928年完成的《希特勒秘著》中，希特勒重申了他希望与意大利结成联盟的主张。事实上，这个工作是以一份声明开始的，为了与意大利结成联盟共同反对法国，这份声明认为有必要认可法西斯对南蒂罗尔的统治。希特勒还补充说，德意志帝国犯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即过分重视与垂死的哈普斯堡王室的关系而忽视了更有前途和希望的意大利。他敦促说，尤其是当意大利正在受益于“卓越的政治家”贝尼托·墨索里尼的领导和指引时，这种形势是多么明显啊！

后来，在“二战”期间，在一些“席间闲谈”中，希特勒也承认说，在1919年他确定纳粹运动的框架时，他还根本没有听说过法西斯。但是他很快就又补充说：“不要推测说意大利发生的事件对我们没有任何影响。如果没有法西斯的黑衫党，很可能就不会有纳粹的褐衫党。1922年法西斯进军罗马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扬·克肖注意到，在法西斯进军罗马之后不久，希特勒的这种态度有了些变化，他当时已经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元首了。扬·克肖还相信，当时虽然弱小但却很难控制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这位领导人的形象是从法西斯党的领袖墨索里尼那里剽窃来的。

希特勒的这种希望与意大利交好的态度最终也引起了意大利专家们的注意。1927年，在德国的右翼势力中，希特勒这种坚持颂扬意大利的态度引起了意大利驻慕尼黑外交官的高度重视。**这位外交官向国内汇报说：“希特勒总结说，面对着一个脾气暴躁并且富于侵略性的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必须结成不可分割的联盟。”因此，希特勒在他的一个好朋友弗劳·贝希施泰因位于柏林的别墅里接见了一个意大利记者。当时德国魏玛政权正处在不断繁荣和稳定的时期，而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在政治上看起来正处在低潮中，但这位记者却听希特勒预测说，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在不久之后就将登上国家的政治舞台。希特勒声称，一场新的危机将袭击德国，然后他的时代就将到来。***

* 墨索里尼宣称该地区的德国人“不是一个少数民族，而是种族残余”。

——作者注

** 约瑟夫·戈培尔也趁机臣服于希特勒的感召力了，这是他接受与意大利（以及英国）结盟这一观点的一个步骤。

——作者注

*** 新闻参赞阿尔德罗万迪在给墨索里尼的信中报告了此事。

——作者注

有一点的确是真实的，即从1928年起，纳粹就开始成为魏玛政权的选举政治中一个重要的竞争者了，而意大利人也在断断续续地关注着此事（但他们更加直接的接触是在奥地利的准军事组织“海姆韦尔党”，他们可以大胆地支持那里的反共产主义、反社会主义和反议会政体主义，目的是指望奥地利的右翼势力有一天也能像德国的右翼势力一样对意大利奉行民族统一的政策）。1929年5月，《意大利人民报》驻维也纳记者拜见了希特勒并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记者甚至相信纳粹在反犹太主义政策方面已经有所缓和了。他还预测说，纳粹的政策将只限于剥夺那些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权利。就他自己而言，希特勒声称他决心“在德国人民中建立一种对于墨索里尼和意大利的赞同之情”。元首认为，意大利人的优越感是被误解的结果，虽然这么说，他对此还是非常警惕，并且趁机把“海姆韦尔党”贬低为“太过庸俗”。希特勒给这位意大利记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向罗马汇报说，“希特勒绝对不像他的敌人把他描述的那样是个小丑。”相反，他的热情和坚定表明“他是一个容易赢得大众的人”。

意大利的法西斯政府在看到这些新闻之后认为，纳粹正在成为德国右翼中最主要的政党。随着1930年9月德国选举的临近，意大利在德国的代理人——主要是当时驻柏林的意大利商会的主席马约尔·朱塞佩·伦泽蒂，他后来作为一个可靠的法西斯在外交部门任职——预测德国右翼将会在选举中有所作为，尽管他们最初还把胡根贝格党、钢盔党和和纳粹区分得不是很清楚。《等级制度》代表着墨索里尼的观点，它报道说纳粹在“希特勒的成功领导下”赢得了107个席位，并称希特勒“从某些方面看也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这证明“法西斯主义的理念正在走向世界”。文章所用的可不仅仅是祝贺的语气，它又补充说，纳粹的崛起对世界有着“完全的警示意义”，因为它表明德国将全面回归强权政治。希特勒这个奥地利裔德国人肯定会吞并奥地利。

法西斯与纳粹的秘密接触增多了，但相对来说还是低层次的接触，得到的信息也比较混杂。希特勒继续奉承他见到的每一个意大利人，在与《意大利人民报》的另外一位记者会面时，他说自己也认为法西斯主义不是用来出口的，而是一种“理论”，因为“它包含的总体概念具有国际价值”。这位记者报道说，希特勒在会谈时竭尽全力地承认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首要地位，但他又补充说：“他周围的人的态度可不是这样。”德国的形势仍然有它复杂而让人困惑的一面。好像是为了强调这件事一样，格兰迪在1931年5月向墨索里尼解释说：“德国总有一天会吞并奥地利。吞并是许多种族的规律，日尔曼种族更是如此。就意大利而言，目前的任务是拖延这个不可避免的进程，而且拖得越久越好。”格兰迪是这样考虑的：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意大利可以“解决阿尔托—阿迪杰的问题”，并且能够巩固它在多瑙河流域的利益。这样，意大利就能够与版图扩大之后的德国相抗衡了。

但是，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充满了骚动和压力，根本等不了一代人的时间了。即使是一直优先关注意大利国内事务的墨索里尼也曾经开玩笑似地说：“法西斯政权希望——如果可能的话——能够与所有的国家和平共处，梵蒂冈也包括在内。”此时，他已经无法忽视希特勒了，而柏林现在成了暴风雨聚集的中心。伦泽蒂现在成了墨索里尼和戈林私下的和业余的联系人，这也显示出与纳粹之间的任何交道都具有不一般的特性。伦泽蒂定期地与纳粹的主要头目会面，并且避开了正规的外交渠道而把情况直接报告给墨索里尼。虽然是通过这种非正规的沟通渠道进行接触，但法西斯和纳粹之间的关系的特点却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希特勒仍然强调自己对于墨索里尼的崇拜，以及与意大利结盟的决心。墨索里尼也非常愉悦地接受了这些来自德国领导人的表示敬意的言辞，并且也向他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例如，1931年11月，他警告希特勒不要被可能的伙伴联盟所左右从而偏离他自己奉行的严格的信仰和政策。有很多记载都表明，希特勒很想与墨索里尼面对面地谈一谈，但不知是意大利方面的原因还是德国方面的原因，他们的会谈总是被推迟。1932年10月，希特勒上台伊始就带着令人厌恶的恭维态度承诺说：“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在几十年里都会是朋友，至少在我死之前将会如此。”

意大利的媒体总体上对纳粹的崛起也表示了认可，当然也不是没有批评之辞。佛朗哥·恰兰蒂尼在一份名叫《奥古斯都》的文化和政治月刊上发表文章声称，过去人们常说法西斯主义不是用来出口的，但那些人“没有聪明地理解墨索里尼的思想”。“许多意大利人都坚持只把它的法西斯组织作为一个纪律、意志和权力的榜样，但那是一种幻想，或者说得更差一些，是一种反社会的愿望，也是我们所不赞成的。的确，希特勒在慕尼黑的布朗豪斯里也有一尊像墨索里尼那样的与真人同样大小的富于灵感的半身塑像，但是看到自己的理念在更大的范围内扩展，意大利人应当高兴才对，因为法西斯的影响可能继续扩展至“欧洲和世界”。另外一个记者也赞同地说，纳粹进入德国政府也是意大利的胜利，表明法西斯主义“是意大利的革命理论，同时也是一个普遍适用的原理”，因此应当对此鼓掌喝彩。

然而，大部分的评论还是带着一些暗藏的担忧。法里纳奇甚至警告说，不能太轻易地得出结论说纳粹和法西斯运动是完全一样的，这样做是“危险的”，就像以前错误地认可普里莫·德里韦拉在西班牙的统治一样。在1932年11月的选举中，纳粹遭遇了暂时的挫折，法里纳奇这下高兴了，得意地评论说革命可不是那么简单，并且高兴地推测纳粹将会在最后一个跨栏处摔倒。可以预见，《意大利生活》上刊登的文章也是非常欢迎反犹太势力在德国的兴起的。然而，纳粹对“犹太问题”的狂热的根源是什么，这一问题仍然困扰着意大利大多数的评论家。俗套的说法是，反犹太主义是一个舶来品——很明显，1932年的《意大利百科全书》没有认可德国的种族理论。一些评论家也毫不犹豫地指出，纳粹做得太过分了，他

们的信条本来还是有积极的一面的,但他们的反犹太主义破坏了这些积极的方面。阿斯维罗·格拉韦利是赞同法西斯主义的普遍适用性的一个狂热分子,他把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称为“种族宗教的新教徒。我们更愿意相信事实的真相而不是与事实真相不符的假设的现实。”伦泽蒂所持的立场更具普遍性,他在《等级制度》把纳粹的反犹太主义解释为德国历史中特定情况下的产物。伦泽蒂预测说,一旦掌权,纳粹在种族方面的政策就肯定会变得温和一些,因为他们将会面对许多更为严重的问题。*但是,1933年1月刚过,纳粹就开始迫害犹太人了。有可能是接受了伦泽蒂的建议,墨索里尼在《意大利人民报》上发表文章说,不能脱离背景孤立片面地看问题,要避免简单的道德说教。墨索里尼英明地推断说,没有哪个国家是完美的。新的外交部副部长是富尔维奥·苏维克,他是一个憎恶德国的的里雅斯特人。因此,他试图限制伦泽蒂与德国的联系,并且想把德意关系严格限制在外交领域内,但他的做法遭到了墨索里尼的阻挠。**与此同时,墨索里尼还在私下里给希特勒写信警告说,“过分的”反犹太主义正在遭到外国的批评,并且也在阻碍纳粹革命的进程。1933年7月,他还带着些偏见对博塔伊说,现在才是德国人真正理解“我们的秩序和我们的理论”的时候,一旦他们有了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他们“就可能会确信他们再没有什么好发明的了”。简单地回顾一下就会发现,墨索里尼自己对于新的德国的政策与法西斯媒体就此事发表的评论一样,也是含混不清的。

那么此时,当种族问题正在成为欧洲政治中争论的核心问题时,墨索里尼自己对于这一问题又是持什么样的态度呢?的确,从他发表的大量演讲和声明中可以找到相当数量的反犹太主义言论。此外,作为那么多报纸的审查员,他也确实没有禁止《意大利生活》刊登反犹太主义的文章,或者阻止普雷齐奥西发表针对犹太人的长篇累牍的攻击性演讲。他的法西斯政权也不时地表达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怀疑,并且据说还要求意大利的犹太人要具有“双重忠诚”。同样,他在私下里还抱怨意大利的大学里的犹太学生(还有天主教学生和反对法西斯的学生)的数目太多了。但是,尽管如此,却很少有证据能够证明墨索里尼在犹太人的问题上有自己独立的观点,他对这一问题的许多方面所持的观点同时也是意大利其他统治精英们的观点。他还多次重申自己对于种族学说理论的怀疑,事实上,他一直坚持认为“经过那么多世纪的长时间的混合过程,种族实际上已经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了。”的确,当墨索里尼和教皇在1932年2月会面的时候,倒是教皇更为

* 1933年,伦泽蒂继续在半官方刊物《等级制度》上发表同情纳粹的文章。

——作者注

** 苏维克在给伦泽蒂的信中希望他能够任满意大利驻柏林大使的任期。

——作者注

公开地表现为一个种族主义者。在教皇庇护十一世看来，教会在苏联、墨西哥和新的西班牙共和国里遇到的所有的麻烦“都是以反基督教精神的犹太教为基础的”。他又继续说道：“我以前在华沙的时候，就像教皇农西奥在1920年时那样，看到所有的布尔什维克组织，他们所有的男性和女性政委，全都是犹太人。”如果他的听众引用《意大利生活》中的一些不太相同的观点时，教皇就会立即补充说：“当然，意大利的犹太人是例外。”

有一点的确是真实的，即在耶稣升天节发表演讲时以及在其他许多的场合里，墨索里尼都敦促说，应当把人口统计学作为他的政权的社会政策的一个支点（即使全国的出生率实际上一直在下降）。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他经常详细地阐述用战争的价值观来对法西斯政权的人民进行教育的必要性。人民只有严谨、健康、诚实和团结，才能为建立一个帝国做好准备。墨索里尼非常喜欢把自己看成是“整体的意大利”的领袖，按照他的思维方式，意大利人的团结是由身为意大利人的那种意志而不是由暴力的无形影响铸造而成的。墨索里尼永远都不是一个“科学的”种族主义者，也很可能从来都没有理解希特勒和其他纳粹分子在种族问题上的信仰是多么纯粹。造成墨索里尼思想中的这种混乱的原因之一，有一种认识在他的头脑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即相信每一个人与其余的人确实都是有所差别的，而有一些人毫无疑问是“低等的”。不用说，墨索里尼也像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绝大部分欧洲人一样，相信欧洲以外的人，尤其是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都是“不文明的”。并且，不管是按照成就或者是按照前景来进行任何的等级排列，这些人无疑都应当排在最底层。

当他就更加熟悉的现实世界发表评论时，墨索里尼在种族主义方面的观点与在许多俱乐部酒吧以及听众来电直播节目中重复的观点没有什么两样（他还是电台上的对话节目的一个很好的主持人）。这种类型的种族主义，是先就其本身已经很缺乏的知识做一个假设，然后迅速为一个民族勾勒出一个未经夸大的轮廓。墨索里尼认为，“民主对于斯拉夫人来说，就像是酒精对于黑人那样。”德国民族主义者的“种族狂热”是难以理解的，但由于他们的边境上有数量庞大的“斯拉夫人”，所以他们这么做也是有理由的。1940年5月份，他还对一位来访者说，德国人天生都是“虐待狂”。英国既潮湿又灰暗，英国人也是正统而压抑，并且太过冷漠。美国人贪婪地掠夺，但他们正在变得文明一些，伪善让他们的资本主义的清教徒主义四分五裂。法国人背信弃义，傲慢自大，并且还贪吃。*此外，他还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分等级的（但是这种等级的秩序总是在不断

* 民族主义者开始称法国人是意大利人的“异父姐妹”。

地变动)：

“与一个法国人（墨索里尼正在与一个法国记者谈话）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意大利人在谈话中就会立即表现出充分的自信和良好的理解能力；当与一个英国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必须付出相当大的努力以能够理解他们和被他们理解；而当与一个德国人在一起的时候，差异和分歧就进一步加大了，至于说我们与俄国人之间，那简直就是隔着一条深渊。”

与此同时，他也会很轻易地否定这些观点中的负面影响。俄国人也可以变成是勇敢得有些固执；美国人也成了企业家，并且很风趣；而法国人则很有修养。至于犹太人，他们也不像黑人和阿拉伯人那样自然地被认为是野蛮的，他们也是“欧洲人”。他们中的大部分还都是好人，特别是意大利的犹太人。正如墨索里尼在1932年所说的那样，当地的犹太人“总是像意大利的公民一样表现得很好，并且像战士那样勇敢地战斗。”

墨索里尼并不是只喜欢就意大利居民中的犹太人发表评论。在他看来，不变的文化类型在意大利国内更具共同性，而与之相伴的等级制度也是显而易见的。虽然他宣称将努力使意大利人国民化，并且知道一个意大利人可以相当于“三个外国人”，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谈到热亚那“种族”、皮埃蒙特人（他在与一个皮埃蒙特人交谈时希望他们能够更快地增加自己的人口），以及罗马涅地区那些他“自己的人”所具有的永恒的美德。他认为，威尼斯人是不得不做威尼斯人的。再往南部，还能发现一些别的种族或者文化群体，但他们的行为可能就不那么值得称赞了。“佛罗伦萨人”天生就喜欢制造麻烦，他们的法西斯主义就喜欢发动叛乱和制造不同意见，也难怪，因为他们是佛罗伦萨人嘛；那不勒斯人软弱无力，缺乏纪律，并且他们这种天生的弱点是没法改变的；* 1936年，墨索里尼有一天提议要组织一次“进军那不勒斯”，这样他就可以“把吉他、曼陀林、小提琴和民歌手等全部一扫而光了。”** 同样，这些观点也都不是墨索里尼原创的——在塞尼塞接替博基尼担任警察总头目之后，齐亚诺在夸大了北方人有关南方人的所有闲话的基础上总结说，新的警察总头目是“一个那不勒斯人，一个奇怪的聪明和无知的混和体；天生的本性决定了他是一个敲诈者；总体上讲，他比较懒散，是一个爱唠叨的话匣子，一个肤浅的人，说起话来手舞足蹈的。”与其他几乎所有的意大利人一样，墨索里尼也相信并不是所有的意大利居民都是像他这样的意大利

* 他告诉弟弟阿纳尔多，他同意他的看法，即那不勒斯是一个“美丽但缺乏物质”的地方。

——作者注

** 相反，墨索里尼对一个来访的外国记者说，他自己拥有在精神上完全统一的意大利人民，并且消除了北方人和南方人之间存在的任何差别。

——作者注

人，这一结论很可能就是他的“种族”信条的最主要的部分。只要他继续与纳粹打交道，那么他对种族的理解就是唯意志论的，并且是与别人不同的。这两个概念从根本上就把他以及其他的意大利人与纳粹的种族乌托邦区别开了，这种种族乌托邦是由柏林那些可怕喜欢把事情简单化的人设计的，并且纳粹认为它是“科学的”。

在与新的德国的外交实践中，意大利也试图扮演一个领导者的角色。最初的计划是在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之间签订一个《四强协约》，在意大利国内也经常被称为《墨索里尼协约》。*这个协约最初是由墨索里尼在1933年3月相继向德国、法国和英国提出的，协约最终在7月15日签订。虽然墨索里尼到处推销这一协约以便让欧洲能有10年短暂的喘息时间，但是由于多个事件的接连发生，这一协约最终也没有获得正式批准。签署这个协约的其他几个国家在早期也对其表示怀疑。4月，墨索里尼曾对德国驻意大利大使提出忠告说：“这个协约在开始时只是一个小男孩，但英国想把它变成一个两性人，而对于法国人来说，它只能是一个女孩。”对于墨索里尼来说，真正的问题是欧洲的注意力被越来越多地吸引到了德国身上。已经退休的英国大使罗纳德·格雷厄姆先生还是非常友好，他向伦敦强调了他对墨索里尼的“精神”和“勇气”非常敬佩，认为墨索里尼的外交政策“从总体上讲是正确的，并且对欧洲是有用的”，并且确信“意大利没有错误的种族主义，也谈不上有什么反犹太主义。”但是，在欧洲其他大国的首都里，一件非常急迫的事是需要拟定针对柏林的正确路线，因此，各国不会再在第二个独裁者身上浪费过多的关心和热情。

不管怎样，对于自由党的外交官们来说，《墨索里尼协约》本身就有许多问题。为什么只有4个大国？为什么没有波兰和苏联（或者美国和日本）？为什么又明显地回到了“大国一致”的老路上了呢？这与伍德罗·威尔逊主张的“新外交”可是格格不入的，即使法国和英国的外交官们在内心中对“新外交”并不喜欢，但这种“大国一致”的做法与自由外交的理念也是不相符的。墨索里尼是在试图打破国际联盟这个框架吗？这个协约暗含的意思是，这4个欧洲强国在此之后将聚在一起重新讨论《凡尔赛条约》，并且很有可能对其进行修改。比如，柏林议会曾在1878年操纵了“东边的问题”。因此，他们有可能在不与其他实力较弱的大国事先商量的情况下就强加给捷克斯洛伐克一个安排——墨索里尼公开称这个国家是一个“混血早产儿”——或者也有可能是立陶宛或者波兰。他们还可能会组成

* 1933年6月13日，《等级制度》整期全是赞扬这一协约的内容。其中，领取意大利政府的秘密资金的奥斯瓦尔德·莫斯利宣称，这一协约“具有男子气概”，并且证明法西斯主义并不就意味着战争。

一个反共反苏集团。

意大利的历史文献仍然给予《四强协约》一个正面而积极的形象。例如，罗萨里亚·夸尔塔拉罗就声称，敏感的同时代人都认为这个协约是“领袖取得的伟大的个人胜利”，她的作品也被德费利切广泛引用。她还认为，是那些愚钝的或者憎恶意大利的政策和态度毁了这个协约，但墨索里尼和他的顾问们一直都没有完全放弃它。他们的目的是让意大利在躁动不安麻烦不断的欧洲能具有更重的分量，这也是有情可原的，直到1940年，他们还在期待自己的现实主义能够改变其他国家。英国人对待这一协约的态度与意大利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并不能够证明墨索里尼是在不怀好意地想通过这一协约为最终促成一个有利于纳粹德国的类似于《慕尼黑协定》的协约铺平道路，但他们也并不认为这个协约有多么重要。

《四强协约》是典型的意大利人的想法。对于“列强中最弱的一个”的意大利来说，如果能通过这样一个协约划定一个硬性的框架从而让其他大国接受它成为他们中的一员，那么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外交政策吗？此外，有相当多的证据可以证明，《四强协约》这一概念并不是轴心国概念的前奏。事实上，正是在为协约确定框架的那几个月里，墨索里尼才担任起了恩格尔伯特·多尔富斯的保护人的角色。此人是奥地利的总理（他更倾向于“教会法西斯主义”，但是是一个可靠的奥地利纳粹的反对者），两人在1933年4月见了面。之后墨索里尼总结说：“多尔富斯写的字很小，但他却是一个非常机灵的人，有着真正的意志。这些结合在一起给人一个不错的印象。”墨索里尼绝不认为德国吞并奥地利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正如苏维克所说的那样，《四强协约》旨在通过旧式外交的切实而可靠的方法来约束德国，而不是为了最终促成“好战的法西斯”这一结果。苏维克还记得，大约就在那段时间里，墨索里尼曾经痛心地对他说，他发现纳粹的种族理论是“一个天大的笑话”（苏维克也是这么认为的）。

在1933年至1934年间，奥地利问题并不是唯一让法西斯意大利努力为之奉行传统的现实主义政策的国际问题。墨索里尼在言辞上不断随意重复的一个问题是反共问题，当然，在20世纪里，他并不是唯一在此问题上出现反复的人。法西斯主义一直宣称对共产主义取得了胜利，墨索里尼的许多崇拜者和模仿者也认为他们是在讨伐布尔什维克主义。然而，墨索里尼绝对不允许这种意识形态的战争破坏法西斯意大利与共产党苏联之间的双边关系。1933年9月，意、苏两国签订了一个新的商业协定。另外，法西斯意大利也没有拒绝与苏联进行武器交易。例如，1931年至1932年间，意大利就向苏联销售了一批飞机从而大赚了一笔，后来又在意大利的造船厂里为苏联海军制造军舰，而且当时可并没有考虑这些武器会不会被苏联人用来向西班牙或者其他地方的意大利法西斯开火。意大利的政治评论员们绝对不会全都确信苏联天生就是意大利的一个敌人，他们甚至怀疑斯大林自己会不会有一天也蜕变成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广为人知的一点是，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期，墨索里尼曾在许多场合试图让希特勒接受他的建议，即单独与苏联保持和平，这样轴心国就能够集中力量对付“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地中海的威胁。尽管德费利切对待这个建议非常认真，但他还是觉得向纳粹提出这个建议是个疯狂的想法：因为纳粹当时的理想是先肃清共产主义者和斯拉夫人，“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因此，与种族主义思想相比，墨索里尼的反共态度一直都是不彻底的。在墨索里尼看来，如果有其他更好的途径能够让他获得最大的利益，那么没有哪种理念能够强有力到让他对这种途径熟视无睹的地步。正如1933年6月墨索里尼在另外一个场合所说的那样，他现在又开始重读马基雅维利的作品了。

在欧洲以外，也有几个大国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最显眼的就是美国。就在希特勒担任德国总理几周之前，富兰克林·罗斯福接任美国总统。法西斯媒体对于他的“新政”也是频繁地进行评论，就连墨索里尼自己也在1933年6月声称罗斯福也拥有独裁者的权力，甚至超过自己。他还不断地评论说，美国也在寻找一条通往法西斯主义的道路。相反，在墨索里尼的头脑里，日本倒并不是一个天生的盟友。1934年1月，他甚至警告说，日本有可能进一步侵入中国（墨索里尼的女婿和女儿当时仍任意大利驻华大使，并且表达了意大利对蒋介石和其他的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同情，他们在想这些人在内心里会不会也变成法西斯主义者）。

签订《四强协约》两周之后，墨索里尼又在庆祝自己的五十岁生日。此时，国际上阴云密布，国家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这也让墨索里尼陷入深思之中。而也在此时，他更不愿意谈到年龄对自己的影响了，并且开始约会他的最后一个情人。1933年9月，他还给女儿埃达写信说：“在你青春年少的时候，我们的日子还比较艰难，所以你过去是、现在仍是我心中的最爱。”但实际上，当时已经有另外一个女人在与埃达分享墨索里尼的宠爱了。她叫克拉雷塔·佩塔奇，生于1912年2月28日，出身于罗马一个安逸的资产阶级家庭（据说她的母亲是教皇庇护十一世的一个远房亲戚，而她的父亲弗朗切斯科·萨韦里奥·佩塔奇也在为教皇服务的医疗机构里工作）。这个姑娘当时才二十一岁，比埃达还小两岁，但她更多地还是被墨索里尼的身体而不是精神所吸引。1933年9月8日，两个人首次邂逅，于是故事就继续下去了。佩塔奇的家里很富有，她在十八岁时收到的生日礼物是一辆跑车，于是她经常驾车在奥斯蒂亚的海滩上闲逛。墨索里尼那天碰巧也驾车在那里兜圈子，并且没有带什么护卫和随从，于是两个人相遇了。年轻的女孩紧张得喘不过气来，但还是借此机会对墨索里尼低声咕哝说，她做梦都想亲眼目睹一下伟大的领袖。她还说曾经把一首诗作为礼物送给了墨索里尼，而墨索里尼也装模作样地说自己记得此事。

两人见面之后不到三天，贪婪好色的墨索里尼就把电话打到了佩塔奇的家里，但最初是和佩塔奇的母亲通的话。同样，这也是一个本性贪婪的女人——佩塔奇一家的贪婪是臭名昭著的。当克拉雷塔接到电话的时候，墨索里尼很有礼貌地问

她是否愿意继续他们之间的交谈。如果她愿意的话，他将在威尼斯宫里等着她。她第二天早上就去了，并且在“两半球厅”旁边一个墨索里尼用来小睡的小房间里见到了墨索里尼。不清楚他们当时是不是立即就发生了性关系。*但据德费利切说，两人直到1936年10月才开始经常来往，那时佩塔奇在威尼斯宫里已经有了一个住所，并且已经有点像是“女主人”了。她一般下午两点钟来，迅速地抽上一支烟（墨索里尼不赞成抽烟，因此她要把这个习惯隐藏起来），然后做好准备迎接她的情人。她的电话现在已经开始被法西斯政权忠于职守的警察们监听了，她大概并没有注意到这种监视。她一般在大约早上8点钟回到自己母亲的家里。在1934年6月，她就已经嫁给了里卡尔多·费德里西，因此，1936年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位“夫人”而不是“小姐”了。那年，她的丈夫被任命为意大利驻东京大使馆的空军武官，并且一直在那儿待到1945年。她和费德里西的婚礼盛大而庄重，教皇庇护十一世还亲自为他们祝福。

对佩塔奇的电话进行窃听也不可避免地录下了墨索里尼与她的交谈。他在谈情说爱时的言辞仍然是那么老套：“我是多么多么地爱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地爱你。我只爱你一个人！你的香吻让我眩晕，它杀死了我。当我望着你的眼睛的时候，我看到了你灵魂的最最深处！世界突然消失了，我忘记了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此外，他还认为一个男人必须是妒嫉的，而他也确实如此。他会想，那天她在干什么？而换个场合，他们之间的关系又是那么的亲密。每收到一件礼物，克拉雷塔都会回报给墨索里尼一个吻，而墨索里尼也会告诉她：“一点都不夸张地说，你给我的东西是无法补偿的。”罗马的社会也开始注意到此事了，但墨索里尼毫不理会那些对流言飞语敏感的旁观者，他喜欢把自己泡在科隆香水里（他更喜欢这种传统的抑制体臭的方法，而不是新发明的淋浴方法）。而克拉雷塔也是继续公开露面，接受上层社会那些眼里带着妒嫉的贵妇人们的苛刻评价。其中一个心怀恶意的人回忆说：

“佩塔奇小姐，尽管她像她的前任一样有着美丽的长腿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小脚，但与一个国家的领袖还是不太相配。我曾在歌剧院里见到过她，发现她在某一方面的确很有吸引力。但是，她的头发有太多的卷，妆也化得太浓了。而且，她的水貂皮外衣太大了，戴的首饰也过于艳丽扎眼。但不可否认的是，她的确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

佩塔奇肯定为人们提供了一些证据表明墨索里尼还没有丧失他的性吸引力，

* 有谣言说，墨索里尼还与一位法国记者玛格达·丰塔吉斯有荒淫之事。这位记者声称，墨索里尼当时用他的小提琴作为主要的引诱手段。1934年6月对墨索里尼的电话窃听也记录了他与另外一个情妇的交谈。同时代的人已经注意到，玛格丽塔·萨尔法蒂当时已经失宠了。

虽然他的身体日渐衰老，并且继续遭受着胃痛的折磨。*一个观察家发现，墨索里尼在1934年年初的时候变胖了（这很可能是牛奶在他的饮食中处于中心地位所产生的结果），但是精力却非常充沛。他也没有停止过运动，1934年1月，他还位于罗马东边的亚平宁山脉中一个新开的名叫泰尔米尼洛的度假胜地去滑雪，并且拍了许多照片（他注定要在1943年再次造访这个地方）。然而，当他晚上回到拉凯莱和孩子们住的托洛尼亚别墅里时，生活又变得如此地单调乏味。客人们注意到他家里的家具非常笨重，并且不配套。**墨索里尼还喜欢看电影，尤其是美国喜剧片（与同时代的人一样，他也喜欢迈克·塞纳特***、查理·卓别林、劳莱和哈代****）。来访者还记得，墨索里尼一直都避免在家里发生争吵。他与两个年纪较长的儿子关系并不亲密，学校和警察的报告显示，墨索里尼的这两个儿子都喜欢逃学、运动、开快车以及与放荡的女人鬼混。有一次，墨索里尼提出想看一看布鲁诺打篮球（他是他的篮球队的队长），这让布鲁诺大为吃惊。这也许算是小小的仁慈和关怀吧。而法布里齐奥·齐亚诺还记得，他那位很注意自己举止的身为上层资产阶级的外公像叫一个小孩子似的把他叫过来，命令他立正，然后打了他一个大耳光。*****

不管是在私下还是在公开的场合，墨索里尼仍然很少表示出满意之情。与佩塔奇这样一个年轻的女人之间的性关系只是让墨索里尼进一步确认了自己原先的看法，即女人才是真正喜欢性交的人。他说：“骄奢淫逸的生活和肉欲让女人感到高兴、充实和心满意足。”相反，留给她的可怜的情人的却只有“空虚和失望”。他还向一个同事倾吐说，不管怎样，男人通常总是要杀掉他最爱的人。

斯塔拉切为法西斯党设计的是一个平民化的、永远充满活力的形象，而墨索里尼的这种失望和沮丧和心态与此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但法西斯的宣传中把

* 1934年，墨索里尼还向一位外国记者夸口说，他坚持每天都到室外游泳一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并且虽然天气渐冷，他还一直坚持到10月25日。

——作者注

** 一个名叫安富索的客人还注意到，在一个比较公开的屋子里有太多的墨索里尼的照片和塑像，但墨索里尼看来好像并没有注意到这些。

——作者注

*** 迈克·塞纳特，加拿大裔美国制片人，以喜剧短片而闻名。

——译者注

**** 劳莱（1890~1965），英裔美国喜剧演员；哈代（1892~1957），美国喜剧作家和演员。这二人组成了有声电影中第一对杰出的喜剧搭档，他们的作品包括《八音盒》（1932年）和《牛津白痴》（1940年）等。

——译者注

***** 法布里奇奥找了一个德国女人做家庭教师，加莱亚佐·齐亚诺对此十分生气。

——译者注

墨索里尼塑造成为一个无处不在的、全知全能的、类似上帝的形象，这就隐藏了墨索里尼内心中日益加深的孤独。有时他好像也承认这种上天赐予的权力的局限性，说他的绝对的权威禁锢了他，他甚至坦白地说有时候他发布命令是因为人们期望他这么做，而不是他感觉这样做能够取得什么结果。他召集法西斯党最高委员会开会的次数也越来越少——最高委员会在1923年至1929年间召开了106次会议，在1930年至1936年间是56次，而在1937年至1943年间只有23次。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当最高委员会真正开会的时候，墨索里尼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只是到会上发表一个长篇大论的讲话。

在这种情况下，墨索里尼的党羽中一些较为独立的思想家们的遭遇就惨了，特别是在由斯塔拉切来决定政治风气的时候。巴尔博最多也就是一个立场不确定但又喜欢对任何事情都分析一番的分析家，但是有时候出于嫉妒，他在墨索里尼面前也会很不安分。但让他极为不满的是，1934年1月份，他被贬到了的黎波里。*这一时期主要的受害人是阿尔皮纳蒂，他在1933年5月突然被解除了内务部副部长的职务（他的继任者是圭多·布法里尼·圭迪，是一个托斯卡纳人，是在法西斯政权的最后10年里一直任职的人之一，并且在萨罗共和国里也担任了内务部长这一重要职务）。1934年7月，斯塔拉切被逮捕并开除出法西斯党，之后又被流放到康费诺，并在那里一直待到1940年。**阿尔皮纳蒂的落马是斯塔拉切的杰作，据说还得到了贾科莫·苏阿尔多、A.S.本尼和商业界的支持，这件事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法西斯党内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

斯塔拉切是这样向墨索里尼汇报阿尔皮纳蒂这件事的：他念念不忘领袖年轻时的过激行为，恶意毁谤攻击社团主义***，对政府帮助因大萧条而陷入困境的银行和企业摆脱困境的做法也进行诽谤和攻击。另外，政府要求《意大利人民报》在博洛尼亚省的订户要达到10万，但他却容忍这一数字降到了36个。他还有腐败行为，照顾裙带关系以及其他更严重的罪行。他的朋友还吸食可卡因，盘剥妓女，毒害未成年人，嗜赌成性，还诋毁法西斯取得的伟大成就。他还在公共场合说民族法西斯党只不过是“一群混乱的跳梁小丑”。他居然还有“黑人教皇”或者“法西斯主义的斯大林”之类的想法。最恶劣的是，他竟敢公开而猛烈地对领袖墨索

* 据说巴尔博多次指责斯塔拉切，并且还决心在朋友中组成一个小圈子来策划对付他。他的这些朋友中有威尼斯人沃尔皮和焦尔焦·奇尼。

——作者注

** 1939年，他的流放期又被延长了5年，因为他拒绝承认自己有什么罪过。

——作者注

*** 社团主义，把整个社会纳入极权国家指挥下的各种组合的理论与实践。

——译者注

里尼自己的演讲进行攻击。

斯塔拉切下定决心开始在党内进行清洗了，并且把自己看成是法西斯政权的未来的维辛斯基或者雅戈达。苏联在编写官方历史的时候，曾故意改变布哈林等这些1937年清洗运动中的受害人的姓名，把他们的姓名中本来应当大写的首字母小写。斯塔拉切也效仿苏联的这种做法，把阿尔皮纳蒂（Arpinati）的名字写为“arpinati”，而他的党羽们则更进一步把它写成“iraci”，并且希望能够把这些被清洗的人“从历史中根除掉”。墨索里尼对于他的老朋友阿尔皮纳蒂遭受迫害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一无所知，但他的确只是袖手旁观并且接受了这个现实。在墨索里尼的思想中有些想法可能与法里纳奇是相同的，*法里纳奇对墨索里尼说，他不相信斯塔拉切对阿尔皮纳蒂的指控是真的，并且不管怎样，阿尔皮纳蒂都是一个“绅士”。如果墨索里尼内心也是这种想法的话，那么根据他的神赐的“权力”的特点，他就必须先把法里纳奇这种私下的怀疑放在一边，等到战争开始引发爱国主义浪潮时再借机把阿尔皮纳蒂从他的流放地——利帕里群岛——召回来。后来墨索里尼也听到了一些谣言，说在他最喜爱和珍视的艾米利亚—博洛尼亚地区，阿尔皮纳蒂的落马让法西斯主义从此一蹶不振。法西斯党在波河河谷地区很受欢迎，但斯塔拉切在曼托瓦发表的一个演讲可能对此没有什么好处。他在演讲中夸口说，他“从来都不睡觉，即使在床上的时候也是在工作”。他又补充说，如果哪个女人想试一试的话，可以到后台来找他。**但是当时，希特勒的纳粹政权已经巩固，从而给国际关系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与此相比，国内问题给斯塔拉切等带来的辛苦劳累只能算是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了。

1934年夏天发生的三件大事让当时尚处于初始阶段的纳粹与法西斯之间的关系在这一阶段中达到了顶峰。一是期待已久的墨索里尼和元首希特勒之间的会面终于在1934年6月14至15日之间举行了，地点是威尼斯，这对于喜爱艺术的希特勒来说是一个很合适的地方。法西斯政权的媒体把这一事件宣扬为“两种革命的碰撞”。但是，我们有理由怀疑他们二人是否真正互生好感。在之前的几个月里，墨索里尼曾公开地反对德国吞并奥地利，声称“奥地利知道，在作为一个主权国

* 当墨索里尼开始与佩塔奇交往后，他也经常得到报告说法里纳奇正在与一个歌剧演唱者詹纳·佩代尔齐尼交往。让墨索里尼觉得好笑的是，在秘密警察给他送来的电话窃听录音中，这位歌剧演唱者最终在电话里大声说，她和法里纳奇两人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上床。

——作者注

** 另外，在1932年，宪兵拦下了斯塔拉切并说他超速驾驶，为了摆脱这一指控，斯塔拉切声称自己是墨索里尼的侄子。后来，他还在电话里声称传统君主制政权中的宪兵只不过是些“土匪”，当然这个电话也被窃听并录了下来。

——作者注

家捍卫其国家独立方面，它可以依赖我们意大利”。法西斯的媒体也对墨索里尼的话做出了回应，法里纳奇把纳粹嘲讽为“社会—国家主义者”，是一群“徒有法西斯其名而无其实”的人。墨索里尼也毫不犹豫地再次公开反对纳粹的种族主义：“百分之百的种族主义。反对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昨天他们反对天主教文明，今天又反对拉丁文明，明天，谁知道呢，也许他们会反对全世界的文明。”他又说，他们的政策因此是一种“愚民主义”、“排外主义”、“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这在20世纪是行不通的。在《意大利生活》上，纳粹的种族主义哲学家罗森贝格甚至被骂为是“反基督的”。一个评论员还轻蔑地声称，罗森贝格的“空洞”的理论简直就是“源自俄国的伪哲学”。

但是，在威尼斯，如果发现大部分事情都误入了歧途那也没有什么让人吃惊的。两个人第一次是在斯特拉别墅里见的面，这曾经是拿破仑的别墅，里面到处都是蚊子——本回忆录声称那儿的蚊子像鹤鹑一样大。第二次会面是在威尼斯的高尔夫俱乐部，沃尔皮和亨利·福特早在几年前就想安排他们在这里见面，但安排在这里会面并不合这两个独裁者的意，因为两人（不像佛朗哥）都太传统，无法理解高尔夫和“政治家的才能”怎么能够结合在一起。

在此期间，希特勒还参观了威尼斯艺术节，但令他感到厌恶的是，法西斯竟然没有禁止现代派的艺术作品展出——在他看来这就是退化堕落，现代派的绘画作品，满屋子都是。在所有的场合，希特勒都穿着平民的衣服，用墨索里尼的话来说，他看上去“像一个穿着橡皮布防水衣的管道维修工”。希特勒还用德语说个不停，并且他言语中的恶骂和诽谤也让墨索里尼感到厌烦或者难堪，而墨索里尼也想让他相信自己能够毫不费劲地听懂德语。但是，希特勒的喋喋不休在当时和之后也的确考验了墨索里尼的理解力。

同时代的人也常常努力地寻找他们希望这二人的会面所能够带来的成果。伦泽蒂汇报说，希特勒“容光焕发地”回到了德国，带着些奉承信服地声称，像墨索里尼这样的人物每个世纪才能出生一个。这位元首还说，有一些事情即使是对最亲密的德国合作者他都不会提起，但却可以拿来与墨索里尼一起讨论。苏维克给多尔富斯写的信更加辛辣地说，尽管别人已经“多多少少知道一些”，但希特勒还是喋喋不休地大讲他的人生观。对于德国吞并奥地利一事，他也并不是很有信心，而墨索里尼对此的反对也丝毫没有减弱。墨索里尼曾亲口对德韦基（他当时是墨索里尼驻梵蒂冈的非常虔诚的代表）说，当希特勒谈起犹太教和德国天主教徒的可恶行为时情绪非常激动，并且像张“破唱片”似的翻来覆去说个没完。墨索里尼希望希特勒能够在对待教会的政策上更冷静一些，但他又补充说很高兴法西斯意大利能够“在政治上和伦理上”与天主教保持一致。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与墨索里尼会面受到了鼓舞，希特勒一回到国内就下决心采取行动了。1934年6月30日，他组织了一次“长刀之夜”行动，包括救世军领

领导人罗姆在内的许多反对希特勒的右翼分子都被杀害了,其中有一些是出于意外,但有一些确实是被谋杀的。在这次行动中,有150到200人被害,连意大利的法西斯都被这样公开而大范围的暴力行动惊呆了,因为他们自己当年在崛起过程中的行动也无法与此相比。甚至连意大利那些亲德国的媒体也试图解释说,希特勒的政权正处在“心理危机”中,而这种心理危机是他们在“理智化”方面的弱点以及没有能够获得墨索里尼所体现出的那种“拉丁式的明确性”所造成的。而墨索里尼本人也借机鼓动奥地利人要更加严酷地抵抗“恐怖主义”。

但是,他的建议来得太晚了。7月25日,奥地利的纳粹分子在一次糟糕的政变中谋杀了多尔富斯,残忍地把他丢在维也纳官邸的地板上流血致死。就在几周前,这位奥地利总理还给苏维克写信说,他很高兴能够在海滨度假地里西恩与墨索里尼会面。就在被害的当天,他的妻子和孩子已经在和墨索里尼的家人一起度假了,*而正是墨索里尼本人向他们通报了这件事。墨索里尼对此事做出了最为强烈的反应,他甚至动员了4个师的部队并把一些装备都运到了勃伦纳山口**,而意大利媒体也为他做出的这一反应鼓掌喝彩***。从一个更加个人的层次上讲,多尔富斯这个政客的死也让墨索里尼非常头疼,因为多尔富斯是他在奥地利的代理人。多尔富斯死后,墨索里尼一直照顾着他的妻子弗劳·多尔富斯和孩子,1938年3月还为她在瑞士找到了一个避难所。在此之前,他还关切地命人给多尔富斯的孩子买了电动模型汽车,并给他的遗孀送去了一幅“恩格尔伯特·多尔富斯肖像”,这件作品现在还在威尼斯艺术节的奥地利展厅里展出。

现在,在发表政治评论时,墨索里尼已经没有什么理由来控制自己对纳粹德国的敌视态度了。他说,“社会—国家主义者”有那么多荒谬可笑的想法,希特勒的“新遗嘱”——他这样讥讽希特勒的《我的奋斗》——里的想法也是如此。他又更加挖苦地补充说,要想培育出一个纯种的德国种族,那得花费6个世纪的时间,因此,“有足够的时间来沉着而平静地讨论这个问题。”德国人自己就分裂成了至少6个种族,他们自己推行的绝育运动应当像他们的种族主义一样受到严厉的谴责。总而言之,德国人在背信弃义和玩世不恭方面是世界级的专家。在巴里的一次演讲中,他更是毫不掩饰对人们所说的他的德国模仿者(希特勒)的藐视:

* 1934年7月2日,警察报告了为此事所做的准备情况。

——作者注

** 勃伦纳山口,位于阿尔卑斯山脉东段奥地利和意大利两国边境上。

——译者注

*** 例如,法里纳奇在《意大利生活》上发表文章称,墨索里尼之所以做出这么快的反应是因为他了解德国人的急躁脾气,并且,墨索里尼的做法也“反映了欧洲文明国家的想法”。

——作者注

“长达30个世纪的悠久历史让我们可以高傲地藐视阿尔卑斯山脉那边的什么理论，那些信仰这些理论的人，他们的祖先在罗马已经有了恺撒、维吉尔和奥古斯都的时候还是一群文盲。”在1934年的秋天，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两国之间看起来绝对不像是天生的盟友。

从某种意义上讲，墨索里尼的抗议是有些过头了。在当时的欧洲，德国并不是唯一培养和助长政治恐怖主义的国家。墨索里尼经常鼓动多尔富斯在奥地利国内进行镇压，不管是对奥地利的纳粹还是对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后者在1934年2月遭受了残酷的镇压（在一些臭名昭著的事件中，甚至动用了坦克来轰炸和摧毁维也纳一些工人阶级的聚居区）。另外，匈牙利当时奉行修正主义的路线，总理久洛·贡博什是一个极右翼分子，墨索里尼还是他的后台，想让他在匈牙利也推行“更加法西斯”的路线。西班牙共和国是法西斯意大利的一个敌人，于是意大利的媒体也为吉梅内斯·卡瓦列罗——自封是西班牙未来的法西斯领袖——发表他模糊不清的理论留下了一席之地。但是，意大利法西斯的领导层采取的更为实际的行动是与持不同政见的将军们以及君主制主义者做交易。1932年，何塞·圣胡尔霍将军企图发动政变，意大利为他提供了武器和帮助。两年之后，墨索里尼和巴尔博会见了埃米利奥·巴雷拉将军和右翼其他的代表，又一次承诺为他们提供资金和来复枪、机关枪、手榴弹等武器弹药。这些东西当时都是秘密地通过的黎波里运送的，目的是期待他们再发动一次政变。墨索里尼夸口说：“当我帮助某个人的时候，我是在帮助很多人，这一点奥地利最清楚。”*

虽然墨索里尼对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势力中出现的反对意大利的倾向一直颇为恼火，**但他并没有停止对帕韦利奇和他的“乌斯塔沙运动”的支持。1934年10月9日，当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和法国外交部长路易·巴尔图正在法国马赛会面的时候，一个在意大利接受过训练的克罗地亚法西斯分子暗杀了他们。但对于意大利的外交来说，这件事来得并不是时候，因为意大利当时非常需要与法国保持和睦的关系。然而，墨索里尼仍然好斗地告诉贡博什说，他当然不会就此事进行公开道歉，而是会有意保持冷漠。他通知多尔富斯的继任者库尔特·冯·舒施尼格，说他没有同意引渡帕韦利奇和他的助手的意思（然后又向奥地利总理施加压力敦促他在国内实行法西斯式的统治）。

* 1934年10月，民族法西斯党和“波兰民族主义者”签订了协议，意大利为其提供资金、武器弹药和培训。

——作者注

** 墨索里尼在给加利的信中间了一张克罗地亚报纸，报纸声称100个克罗地亚人可以打败10000个意大利人。

——作者注

当然，在1934年的时候，意大利并不是在直接地维持着欧洲的现状。相当多的异见分子，不管是右翼的还是极右翼的，都从意大利法西斯那里获得了资助，作为报答，他们通常也虚伪地对墨索里尼表示感谢。当然，意大利也不是世界历史上唯一在外国寻找代理人的国家（在1914年以前，自由党的外交官就梦想着在未来通过由国家提供慷慨的资助能够笼络住一些外国人为意大利服务，从而能够与傲慢自大的法国人一比高下）。但问题是，这些国家的实力越弱，那么这些国家里的代理人就越靠不住，而他们的行为方式也更有可能会被比较富一些的国家认为是难以接受的。

不管怎样，在1934年年底的时候，法西斯关注的重点从欧洲转到了他们长期以来就在注意的目标——埃塞俄比亚。自从赖伐尔和瓜里利亚在1931年至1932年间提出这一问题之后，法西斯就时断时续地“计划”在那里采取行动。但是有一个问题，正如类似以殖民地部长德博诺为首的各个利益集团曾向墨索里尼提出的那样，法西斯虽然统治了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兰等东非殖民地，但却很少做什么事情来改变那里的沉睡状态，即使那些最热情或者天真的领土扩张主义者也都认为占领这些地方没有什么回报。1932年年底，德博诺在努力推动对埃塞俄比亚采取更加激进的政策（同时也能增加他的殖民地部的预算），当然，这也是因为作为殖民地部长，他也应当提出些什么政策来。

1934年2月初，这个提议对墨索里尼产生的吸引力比以前更大了，并且，虽然并没有确定具体的日期，但一定程度的军事准备已经开始了。5月份的时候，巴多利奥还确信夺取埃塞俄比亚对意大利将会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并且小心谨慎地建议说，获取的大多数殖民地都是很不划算的。多尔富斯的被杀更是起到了紧急制动的的作用，墨索里尼在8月份宣布，鉴于欧洲的形势太不稳定，意大利不能再转移焦点到非洲去冒险了。有一点很明显，即那些崇尚自由民主的国家抵抗德国的决心是非常勉强的，因此德国有理由享受这些国家的绥靖政策，但是意大利则不行。在多尔富斯被害事件发生后，意大利曾把军队调往勃伦纳山口，于是英国的媒体，尤其是报纸《苏格兰人》就提醒它的读者说，“残忍的”墨索里尼曾经野蛮地攻击了科孚岛。这份报纸的还总结说，从道义上来讲，“在意大利和德国之间没有什么好选择的”，因此，如果意大利真的与德国发生公开的冲突的话，那么意大利别指望会得到任何支持。此外，墨索里尼和他那些法西斯领导层的同事们有充足的理由预测欧洲的形势肯定会进一步恶化，因为纳粹德国的“修正主义意图”并没有任何收敛的迹象。几年稳定的时期已经结束了，作为列强中最弱的一个，意大利如果想得到一些好处的话，它就必须立即，同时还要无情地采取行动。现在与1911年的形势非常相似，那是在“一战”爆发前3年，焦利蒂夺取了利比亚，满足了意大利长期以来的野心。而在1935年，也就是“二战”爆发前4年，埃塞俄比亚即将成为意大利攫取的目标。

1934年12月30日，墨索里尼签发了一份有关埃塞俄比亚的指示。这份指示在第一段里写得非常清楚：“意大利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关系在最近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它已经从一个外交问题变成了一个需要用武力解决的问题。两国之间的‘历史’问题必须解决，而解决这类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武力。”墨索里尼又继续解释说，海尔·塞拉西皇帝正在把埃塞俄比亚建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并且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他的成就意味着“我们没有时间再等下去了”。意大利等的时间越长，征服埃塞俄比亚时遇到的抵抗就可能越顽强。“因此我们必须尽快解决这一问题，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军事实力能够确保取得胜利时解决这一问题。”墨索里尼继续写道：“一旦选择了战争，我们的目标就是摧毁阿比西尼亚人的武装力量并完全征服埃塞俄比亚。”“要想成就一个帝国，没有其他的途径。”法国对付摩洛哥的阿卜杜勒·克里姆的政策就是我们要走的路，法国“在趁德国人还几乎没有怎么武装的时候就获得了利益”。意大利需要欧洲保持“安静”，相信这种和平状态还能够持续到1937年。意大利与法国的关系当时已经改善，在那段时期里也扼制了德国对奥地利怀有的野心。意大利必须迅速地建立起军事优势，并且“效仿日本的新做法，即没有必要宣布开战，只要强调我们是在自卫就行。”他又强调说：“如果军事行动进展迅速的话，欧洲没有哪个国家会向我们发难。”不管怎样，意大利已经通过条约与英国和法国就埃塞俄比亚达成了交易，并且强调它的行动不会伤害到这些大国的利益。至于这样做会给国际联盟带来什么样的困境，那就不那么重要了。意大利一直希望成为埃塞俄比亚的统治者，现在，这种漫长的等待结束了。不管这件事反映出了多少意大利在东非的历史，也不管它对今天的国际关系有多大的影响，毕竟墨索里尼自己做主打了“他的”第一场战争。

3 在埃塞俄比亚建立帝国

1934年12月30日，墨索里尼签发了一份有关埃塞俄比亚的指示，在这份指示的最后一段，墨索里尼也谈到了意大利国内的形势。他对国内问题的看法的阐述很有特点，他写道：“那些旧时代的残余分子们对我们要采取的行动仍然非常担心，他们称之为冒险，那是因为他们希望还能够按照他们的模式发动战争。”他又补充说：“但是他们错了，并且，不管是从政治还是从社会方面来讲，他们现在都一文不值。”墨索里尼又解释说，虽然发动这场战争的目的是“获取非洲最后一块还没有被欧洲统治的地皮”，但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年青一代”在这场战争中可以显示出他们能够超越老一代人，并且还可以显示他们作为法西斯革命的孩子而获得的热情和锐气。用现实的眼光来看，在非洲推行帝国主义可能有些过时了，只不过是19世纪的自由主义的行为的翻版而已。但是，由法西斯领袖发动的一场战争将会披上一件新的“法西斯”外衣。像以前一样，法西斯的战争也将穿上一件黑衫。那么，墨索里尼到底要把法西斯革命引向何方？在1935年年初，墨索里尼是怎么看待战争的进程和前景呢？“走向人民”的政策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呢？他挑选阿基列·斯塔拉切作为法西斯党总书记的结果如何呢？在家里得到法西斯新女性支持的法西斯新男性，他们是否做好了准备作为法西斯帝国英勇无畏的军人和效忠于墨索里尼的士兵去为国家服务以征服埃塞俄比亚呢？

在12月30日的这份指示中，墨索里尼极力回避的一个问题是战争预算。他只是兴高采烈地建议要调动和部署占压倒优势的军力，“至少30万大军”，怎么样装备、派遣和为他们提供供应，但是，他却只字未提这将需要多少预算。官方的宣传称墨索里尼是一个经济天才，“不管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他都能把思想和行动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他还是“经济的创造者”，是一个每个字母都大写的“经济学家”，在政治家中，他在这方面受过非同寻常的教育，并且在管理国家财政方面有着不可比拟的技巧。但是在私下里，墨索里尼的下属们对于这些说法并不是太相信。苏维克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回忆说，领袖很少真正对财政和经济细节表现出什么兴趣来，最多也就是像对待其他问题一样只是定个基调，而不会去精确

地制定什么政策。然而，对于墨索里尼的下属们来说，这种所宣传的和他们所知道的真相之间的脱节并不怎么重要，因为自从里拉的币值出现波动之后，墨索里尼已经基本接受了他的技术官僚们的建议，很少干预他们的日常工作了。

但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经济形势再一次成为了影响政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虽然有些滞后，但意大利现在也开始感受到大萧条的影响了。许多领域都明显遇到了困难，股票市场的市值在1929年至1932年间缩水了1/3。银行体系也处境堪忧，黄金大量流到国外。生产和出口下降，失业率居高不下。1935年，按照官方披露的数字，意大利的失业人数还在75万以上。对于一个把自己装扮成非常关心工人的政府来说，这么高的失业率的确让它感觉不舒服。并且，人们的实际工资也下降了。旅游是意大利最大的无形资产，但即使教皇额外地把1933年定为又一个大赦年，*意大利的旅游业仍是处境悲惨。1929年至1932年间，意大利移民向国内的汇款以及其他传统的对国民的救助也减少了一半以上。相比之下，意大利在西欧国家中的情况要更差一些：1929年，意大利还占西欧总产出的8.2%，但1937年却下降到了8%（从1922年到1938年，法西斯意大利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9%，低于自由党政府在1897年至1913年间2.7%的年平均增长率，更无法与英国的2.2%、德国的3.8%和瑞典的4.1%相比了）。

即使按照最乐观的数字来估计，在日益恶化的国际形势为意大利制造了空前巨大的需求的情况下，墨索里尼对于经济的管理也没有什么闪光之处（的确，意大利的国家开支在1934年呈现出了一种螺旋上升的趋势。一个技术官僚带点讽刺意味地说，国家的经济进入了一个“英雄的补救和改善阶段”）。墨索里尼这时已经把意大利的经济命脉交到了两个技术官僚的手里。一个是圭多·容，他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物，既是一个西西里人，又是一个犹太人（他在1932年7月至1935年1月期间担任财政部长）；另外一个阿尔贝托·贝内杜切。正是在这两个人的合作下，墨索里尼在1933年1月批准成立了“工业复兴学院”。这个学院先前只是一个临时性的机构，直到1937年贝内杜切担任院长之后才参与了重大的国家经济活动。在公共资金的支持下，意大利有3个主要的银行和许多其他的工业企业走出了困境。工业复兴学院是后来被称之为“专制”政策的先驱，也就是说，意大利将不屑于从事国际贸易，并且打算奉行一种排外的国民经济政策（虽然对于国外移民汇款和旅游的依赖与这一政策是不一致的）。在演讲中，墨索里尼也把专制政策描述为新的激进的法西斯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 梵蒂冈自己的财政也很困难，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才找到解决的办法：更多地依赖美国。梵蒂冈的这种转变对意大利的经济潜力也是一个损害。

分。然而，大多数历史学家们都认为，即使是在30年代末，工业复兴学院也是继续被个人利益所操纵，并且从来都没有磨砺成为被极权控制的一个有力武器。一个分析家尖刻地总结说，专制政策意味着对所有的事情都加以控制，但是利益除外。

墨索里尼并没有下力气去推进重大的变革，相反，他更多地是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了对工业和金融精英的言论进行控制和建立“权威”上。例如，他的秘书收集到了一些信息，说菲亚特公司的乔瓦尼·阿戈内利无意让工业复兴学院成为政府向他这样的富人们借钱的一个渠道，他还表示自己更愿意储备美元而不是里拉。有关这些玩世不恭和贪婪的态度的报告反过来也再次让墨索里尼确认了自己的人生观。他在1937年评论说，15年的执政历程让他明白“我们的金融家们已经筋疲力尽，因为他们在想尽一切办法欺骗国家并阻止除他们自己以外的任何人赚钱。”对于一个一直在对自己说“他（以及任何真正的法西斯主义者）天生就是破坏分子”的人来说，这种愤怒和遁世的态度可能会起到安慰的作用，但是它并没有导致行动。例如，阿戈内利就一直是都灵真正的老板，法西斯革命并没有削弱他的声望和权力。正如墨索里尼在1934年12月一度坦承的那样：

“没有哪个国家比法西斯国家更加极权和独裁了，也没有哪个国家比法西斯国家更看重它的主权和声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法西斯国家的本性决定了它认为没有必要去干预它不熟悉的事务以及超出它能力之外的事务。”

虽然从来都没有公开声明过，但是实际上，在墨索里尼整个执政期间，对于法西斯主义那些完全而严格的要求，那些最大的商人和最高层的金融家们一直都是豁免权的。政治上的控制权可能掌握在墨索里尼的手里，但经济和社会的权力则一直都比较分散。

撇开这些金融界的精英们不说，法西斯鼓励大多数现代经济领域内的行业增长的政策与它广泛宣传的“社团主义”是一致的，法西斯政权宣称“社团主义”是他们统治的基础。博塔伊就在他的《法西斯评论》上带头呼吁推行社团主义，他写道：“社团主义等于是‘革命中的革命’，正是它使得法西斯革命能够永葆青春，生生不息。”墨索里尼自己也经常谈起社团主义者的现状和未来。1933年11月，他竟然宣布资本主义已经死亡：“今天，我们可以宣布，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以及充当它的辩护者的自由经济理论都已经被超越了。社团主义已经打败了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并且正在创造一个综合的理论。”他又说自己承认当时意大利还保留着一些资本主义的残余，但是，他统治的毕竟不是一个绝对纯粹的国家，而是一个“有机的和人性的国家，它希望能够与生活中的现实情况保持接触。”不管怎样，社团主义是一条通向21世纪的高速公路。极权主义国家要求平民“在道德和知识智力方面保持高度紧张的状态”，因此将最终“埋葬经济自由主义”。法西斯商人要学着成为“商人同志”。

好像是为了显示自己将要经济施行国家控制的决心一样，法西斯政权为自己制订了许多福利和发展的计划，这是墨索里尼统治意大利的另外一个突出的特点，也是在1945年之后仍然被一些公众记得并且感激的一个原因。在法西斯政府的行为中，获得更多称颂的是它建立了许多业余俱乐部，这些俱乐部致力于把工人人们的业余休闲娱乐活动引向一个有价值的、健康的和能够控制的方向，从理论上讲，就是要激发他们对于法西斯政权更大的认同感。这一计划最初并不是出自墨索里尼的想法，而是借鉴了更为先进的美国业界的做法。这个概念后来被罗索尼和他的工团主义者朋友所采用，以作为他们承诺将改善工人境况的证据。因此，法西斯主义在这方面走的是“第三条路”。墨索里尼对这一体系的最明显的贡献还是在宣传方面——他宣称，业余俱乐部的各个分支机构是“法西斯政权中最有活力和最重要的一些组织——他还为这些机构指派了一些领导者。另外，他还压制了工团主义者最具野心的一些理念，并授权当时任民族法西斯党总书记的较为温和的图拉蒂对这些业余俱乐部施以特别的控制。工团主义者企图把这些组织引向极端的方向，但他们的这些计划都被非常敏锐的图拉蒂挫败了。即使这样，这个法西斯党领导的工人的娱乐休闲组织也在稳定地发展壮大，1935年时已经有237.6万名成员，这个数字大约相当于产业工人总数的20%，农民总数的7%。

不过，最后这个微不足道的数字（以及整个意大利南部相对都缺乏运动场和其他基本的娱乐设施这一事实）也显示出了法西斯革命的另外一个矛盾之处。意大利这个国家就要发动一场战争了，并且还声称这场战争将是一场针对“荒蛮的”和“落后的”埃塞俄比亚的现代化的战争，而墨索里尼在演讲中喜欢称埃塞俄比亚是一个需要“再次回归土地”的国家。他习惯于把农民称做是一群“憎恶那些企图把他们的脑子塞满复杂的概念”的人，不管是哲学方面的还是技术方面的概念。在他的统治下，每个村庄都应当“通电，有电话、电影院、无线电广播和不错的道路”。农民有原始的充沛的精力，也非常热爱劳动，所以对于一个国家及其种族血统来说，他们是非常值得珍贵的。法西斯的现代主义可能并不是可靠的“反动”，但是，墨索里尼总结说，通过不断地唤醒一个失落的世界，法西斯在全国范围内（包括落后的南部）对于科学进步的热情也取得了平衡，而这种方法也被纳粹德国学了去。

法西斯政权在农村也开发了一些项目，其中最为广泛宣传的是开发庞廷等沼泽地，以及建立农业示范区，如位于罗马南面的利托里亚（今天的拉蒂纳），或者是位于西西里的早期的“农民花园城市”墨索里尼亚。法西斯政权的宣传家们喜欢声称这些计划来自于墨索里尼的灵感——他为这些运动提出了口号：“开垦了土地，也开化了土地上的人，进而也开化了我们的民族。”——但是，这些开垦土地的计划的真正的构想者是阿里戈·塞尔皮耶里，一个继承了自由党思想的技术官

僚。另外，对那些从威尼托搬到罗马外围的家庭进行个案研究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整个计划就是一个“骗局”，至少，对于那些迁到南部但却既没有获得繁荣也没有改变自己的阶级地位的农民来说是如此。与这些运动相伴的还有一场抗击疟疾的战斗，而对这场战斗进行研究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从自由党政府开始，在1922年之后，这种试图彻底根除在农村流行的古老的疾病的行动只是在断断续续地进行。因为这种行动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极权主义过程，所以很容易被当地的富人们操纵用来为自己谋取利益，并且这些行动对于那些真正感染了疟疾的穷人们是不透明的，他们仍然要为治病付出高昂的代价。不管怎样，在1935年之后，法西斯政府必须为其在国外的冒险行动付款了，因此，它在医疗福利方面的开支也骤然削减。医疗开支的削减，再加上后来意大利半岛全面卷入战争，导致疟疾在1945年之后，在那些法西斯政权曾宣布已经根除疟疾的绝大部分地区又卷土重来。

总的来说，虽然墨索里尼多次谈到要回归土地（拉凯莱也在卡皮纳别墅里试图证明自己是一个现代的、科学的地主），但他并没有能够弥合城乡之间在财富、影响、地位和相互理解方面的差距。在更加偏远的地区，人们的生活更是依然如故，好像罗马那个相距遥远并且没有什么影响力的政府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根本没有关系似的。与他们的父辈们在1915年的情景一样，当皮埃蒙特山区的农民们被征召入伍时，他们都认为自己是进入了天堂，因为在军队里居然可以吃得到肉。而在北部的阿尔卑斯山地区，那些一直待在家乡的农民在20世纪70年代接受记者采访时还带着些渴望说：“法西斯主义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但也没有对我们造成什么损害，就像它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样。”

在法西斯独裁统治下，不管政府作为还是不作为，它的主要的代理人通常都是国家官僚和法西斯党。墨索里尼本人对于公共管理部门的官员的态度也是摇摆不定的。他可能会充满敌意，宣称他的政权的基本目的之一就是清除腐败、低效和软弱的自由党政府，并代之以一个更具能动性的、更能取得成就的法西斯政权。1928年，他宣布：“我们的政权必须决定性地解决官僚政治的问题。”而在10年之后，他仍然说，从个人的角度来讲，他“从定义上就是反对官僚政治的”。然而，当鲁莽而草率的经济学家阿尔贝托·德斯特凡尼提出了一个旨在对官僚选拔及其工作方法进行重大变革的方案时，墨索里尼却说缺乏政治判断力。墨索里尼解释说，法西斯政权不能冒险疏远南部的中产阶级，那里的“饥饿的知识分子们是最难安抚的”。后来，他越来越频繁地改变自己先前的立场，转而而为他的官僚政客们欢呼了，称他们与其他国家的官员相比知识更加出众，工作更加高效，为人也更加正直。他宣称：“在意大利官员这支伟大的军队中，害群之马是非常少见的。”他还说，他们的习惯和精神没有进行重大改善的必要。随着20世纪30年代慢慢过去，尤其是因为独裁主义的原因，意大利涌现出了一大批半国家性质的机构和组

织，与那些严格意义上的官员相比，为这些组织工作的人更多地声称自己为法西斯革命作出了贡献。按照意大利的白领公务员中的历史学家们的说法，从总体上讲，法西斯在这一问题上的混杂的政策和态度既没有净化国家的官僚，也没有让他们现代化，而是让他们“困惑、沮丧和小心谨慎”，并且忧郁地相信自己是在一个并不确实存在统治的世界里被授予了统治的任务。

法里纳奇曾经评论说，墨索里尼过于喜欢倚重那些“教授”们：“我只是把他们引到门口，但是您却跪倒在他们面前。那些教授们杀了您，但您却为此而向他们表示感谢。”这位克雷莫纳的法西斯诸侯带着他惯常的虚张声势说：“谁为法西斯文化提供了素材？”墨索里尼非常珍爱“墨索里尼教授”这一头衔，而法里纳奇这些话是专门用来烦扰他的。墨索里尼从来都没有停止炫耀自己在哲学方面的兴趣，事实上，他看起来甚至有些向往那种终日沉思的学术生活了。他曾对一个狂热的追随者说：“不管是谁，如果他真正投身于研究的话，就必须避免过多地与普通人打交道。”尽管他的政务安排得满满的，但他还是喜欢寻机展示一下自己有关柏拉图、康德、尼采、爱默生*、威廉·詹姆斯**和马基雅维利的知识。有时，他还会用更加现实的建议来证明自己是具有资格对他们的作品的内容进行评价的：“今天，应当把哲学放在日常生活中加以实践。”

当然，在这些年里，法西斯的热情在教育领域内也被广为宣传。1936年，法西斯主义的教条被列为所有哲学专业的必修课，而意大利人也被灌输说，墨索里尼的思想与过去的那些伟大的圣贤们的思想具有同等的地位。***一位崇拜者有些晦涩地声称：“他的思想，我们可以称之为意大利。”还有一位更干脆地声称，虽然领袖没有写出一本有关教育学的专著，但他仍然是最伟大的教师。更有一位崇拜者声称，墨索里尼具备了与莱昂纳多·达·芬奇同样的思想广度，他的社团主义思想尤其体现出了这一点。吹嘘墨索里尼在学术方面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是一方面，但法西斯可并没有打算让知识界变成一个自由市场。1931年10月，大学的教授们都被强制要求宣誓效忠法西斯政权（只有极少数人拒绝了这一要求）。1933年，中学和小学的新教师要求必须是法西斯党的党员。第二年，所有的教师都被

* 爱默生（1803~1882），美国作家、哲学家。

——译者注

** 威廉·詹姆斯（1842~1910），美国心理学家、哲学家，机能心理学及实用主义的创始人。

——译者注

*** 据说，到1939年的时候，墨索里尼的思想已经非常普及，一个身为企业家的法西斯分子甚至出版了一本有关他的思想的字典，从而为市场提供了“一本对于所有个人和商业界都具有真正的实用效果的指南”。

——作者注

要求在所有的正式场合穿法西斯的制服。大学生也被要求加入“法西斯大学青年团”，这个组织既是大学生开始职业生涯的起点，同时它的成员还可以享受许多好处——包括可以参加许多体育活动，进所有的电影院一律半价等。并且，如果它的成员同时还加入了相关的民兵组织，那么他就可以不必立即去服兵役，同时即使被征入伍，他的服役时间也可以缩短3个月。德韦基在1935年1月至1936年11月间担任教育部长，他也谈到了法西斯对文化的“开垦”，并且用法西斯政权开发庞廷沼泽地的计划来做类比。

为了更准确地针对大众，1934年，新闻、宣传和旅游部下面的一个秘书处处在加莱亚佐·齐亚诺的领导下还专门创造了一套通俗文化。这个秘书处在1935年6月升格为一个部，仍由加莱亚佐·齐亚诺领导（直到1936年夏天）。1937年5月，这个组织进一步扩展成为“大众文化部”。这个部在20世纪20年代创造了大量广为传播的宣传口号，而墨索里尼自己也在1932年5月写了一条：宁可只当一天狮子也不愿意做100年绵羊，并且声称这是1918年皮亚韦河战斗时使用的一个口令（就是有点长）。流传最广的一句口号——信任、服从、战斗——据称是斯塔拉切创作的，但却被墨索里尼借用了。1932年，墨索里尼发布指示说：“法西斯党是一支军队，或者，也可以称之为一种秩序，你加入法西斯党就是要服务和服从。”

法西斯政权还强调吸纳青年人来保持自己的青春和活力——墨索里尼自己年纪较长的两个儿子也分别在1934年和1936年都满18岁了。在庆祝进军罗马10周年时墨索里尼就谈到，“在法西斯的第二个10年里，我们应当为年轻人腾出些空间来。我们需要年轻人来接过我们的火炬、我们的信仰，让他们满怀激情地继续我们的事业。”为了加强对年轻人的教育，法西斯政权成立了许多准军事性的组织，其中比较有名的是1930年在米兰成立的“法西斯神秘信仰学院”，阿纳尔多的儿子维托·墨索里尼还担任了首任院长。研究这个组织的历史学家认为，它对民众整体的影响“相当小”。更常见的事实是，从法西斯政权的文化政治中可以很容易地发现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电影就是一个很明显的领域，它是一个很普及和流行的信息传递的途径，墨索里尼本人也很喜欢看电影（虽然他很喜欢看美国电影，但是法西斯政权奉行的官方路线却是抵制美国电影的）。1938年，意大利的电影迷们购买的电影票总数达3.43亿张，即使后来发生了“二战”，但1942年售出的电影票总数仍然增加至4.69亿张。墨索里尼家族中的一员——维托里奥也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想在电影业内成名，他领导设计了金碧辉煌的贵族式的国家电影院，但也可以说它有些艳俗。博塔伊是法西斯领导层中主要的电影理论家，早在1926年他就声称，电影可能是所有艺术形式中“最法西斯的”。但是，他却不愿意太公开地对电影进行控制，说民众到电影院里是去寻求娱乐的，因此可能会对过于拙劣的法西斯宣传活动产生厌恶之情。

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经济危机，法西斯政权对政治自由也更严加限制，国家对电影的控制也更加严格了（梵蒂冈也做出了更大的努力以强加上自己的电影审查制度），但法西斯意大利却从来都没有像纳粹德国那样对电影的生产和发行横加干预。1936年年底，维托里奥·墨索里尼出国访问回来之后提出了电影业内许多资深人物一直就有的想法，即意大利应当避免采用德国对待电影的那种强硬手段，而应当采用好莱坞那种“技术鉴赏和不固定的解说式的方式”。从不满足的墨索里尼在心中仍然怀着过去的渴望，希望对普雷达皮奥（或者罗马）以外的大世界有更多的了解，因此，只要是反映其他国家的社会风俗习惯的外国电影，他都非常爱看。所以，他天生就不是一个态度强硬的电影审查者。

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文化研究专家认为，正是法西斯主义“原创的极权主义文化”驱使墨索里尼和他的法西斯政权在1935年“把能量释放到了非洲的土地上”。这位专家还补充说，“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必将扩展成为战争行为，并且预示着这种极权主义国家的目标最终将产生帝国主义的结果。”埃米利奥·真蒂莱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用了一个不那么牵强附会但却更具预言性的比喻，他说，到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人民和国家都被卷入了一张密密的符号和象征的网里”。也许可以这样问——这对一个传记作家来说更合适——墨索里尼自己是因为他在法西斯文化中所处的地位而被迫采取这种帝国主义的行为吗（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他之所以发动埃塞俄比亚战争，更多地是因为认同那些哲学教授的观点，还是为了满足大众因为吸收了好战的法西斯文化而激发出的高涨得几乎难以抑制的野心？法西斯政权的一个宣传家勇敢地宣称：“不管怎样，是领袖用一种熟悉的、但又是不可抗拒的热情把他的极权主义人民引入了战争，并且使我们的殖民地急剧扩大。”

毫无疑问，言辞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它的重要性的，但是在法西斯意大利，媒体并不是唯一的信息来源。即使是在文化和宣传的舞台上，所有事情并不是像它们看起来的那样。例如，虽然法西斯政权在不断地吹嘘一种神秘的国家和种族的团结，但保护者和代理人之间的关系这一概念就没有被完全从意大利人的头脑中清除掉。对于所谓的“国家文化的演出者”来说，20世纪30年代的确是一个机会。换句话说，那些机敏的中间人为自己赢得了把一个国家的慷慨分发给那些艺术家和演员的机会。法西斯并没有把在这种角色背后隐藏的假设转变成为一种新的道德。例如，墨索里尼在1934年收到了警察提交的一份有关作曲家彼得罗·马斯卡尼的报告，他是一个胡搅蛮缠的人，并且自认为是全国音乐界的一个英雄的领导人。

有人无意中曾听到他说，自己成为一个法西斯是受到了一种精神的推动，而这种精神来自于“一个我爱的人，并且我将永远爱他。”但是，他又问到，那么，这与对领袖的忠诚又有什么关系呢？又如，在克雷莫纳，所有的音乐演出都被法

里纳奇控制着，他甚至在庆祝篷基耶利*周年纪念的时候上演比才的歌剧《卡门》。马斯卡尼曾在信中写道：“用一部外国作品来纪念一个意大利的音乐大师？并且竟然没有人反对……天呐，多么让人感到羞耻啊！而我，篷基耶利的一个学生，也竟然被排除在庆祝仪式之外！”当墨索里尼读到这些话时，他就有机会再次确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法西斯的文化革命并没有消除空虚、投机主义、贪婪等，事实上，人类所有的缺点依旧存在。当墨索里尼在家里用餐的时候，他会不会也听到同样的新闻呢？维托里奥·墨索里尼有一个同班同学，带着十几岁青少年的希望和野心，他在试图描绘一条激进的社会变革的道路。维托里奥对他说：“你这么一点用都没有，法西斯主义只不过是一个‘骗局’而已，就连我爸爸想做的事都没有做成。意大利人是胆小的法西斯，他们并没有赋予革命什么内容。”毫无疑问，维托里奥的话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夸张，也是一种子女的反叛思想的体现，同时，他这也是像其他十几岁的孩子一样想在朋友面前炫耀一番。但是，他这种明显的自我和家庭意识、这种男子气（即使他的话表明他在家要比母亲拉凯莱更听墨索里尼的话），以及他在日常谈话中使用一些英语单词以获得褒奖的做法都表明，维托里奥也是一个没有屈从于极权主义洗脑运动的意大利人。

先前，德费利切并不清楚是否是国内的事务让墨索里尼决定侵占埃塞俄比亚的。在他看来，并不是法西斯主义取得的一些成功，而恰恰正是法西斯主义遭遇到的一些失败才是推动意大利发动侵略埃塞俄比亚战争的主要动力。然而，德费利切基本上还是认为埃塞俄比亚战争是一个外部事件，法西斯或者意大利的外交和殖民地政策才是这一事件的基本内容。意大利“在非洲的攫取”其实并不是法西斯文化革命的一个方面。如果德费利切是可信的，那么墨索里尼在1934年12月30日发布的指示中有关国际形势的详细内容才是解释墨索里尼发动埃塞俄比亚战争的动机的关键。法西斯政权在国内对这场战争进行宣传是很自然的，而在当时，国内对这种宣传产生积极而热烈的反应也是很自然的。但是，回顾1935年发生的历史事件就可以看出，意大利并没有在外交政策的各个方面都大肆宣传。

在讲述埃塞俄比亚战争这场国际危机之前，最后还有一件事情是值得提的。即使可以说埃塞俄比亚在海尔·塞拉西的领导下有一部分已经现代化，但从总体上讲，这仍是一个现代大国对殖民地人民发动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它与纳粹德国发动的种族主义战争是截然不同的。从很大程度上讲，墨索里尼仍然是在东非寻找“荣誉、上帝和黄金”，而欧洲其他国家的前辈们早在前几个世纪就在欧洲以外的世界干过这种事情了。从人口方面强调意大利能够最终解决埃塞俄比亚高地

* 篷基耶利（1834~1886），意大利作曲家，作品有芭蕾舞曲《克拉丽娜》（1873年）和歌剧《船女乔孔达》（1876年）。

问题是带有一些时代色彩的。意大利在1935年至1936年间发动的这场战争与纳粹在1941年发动的那场世界性的或者说是欧洲战争是不一样的。德国人是想从自己这个单一民族国家的邻国获取“生存空间”，*拯救那些东方的日尔曼“血统”，同时清除犹太人、斯拉夫人和共产主义者，而意大利人则不同，他们只是想把地图染绿（地图绘制家们也许会分配给意大利及其所属的地方以其他的颜色）。**1935年的时候，与墨索里尼齐名的强势人物除了阿道夫·希特勒以外，还有巴登·鲍威尔***、西奥多·罗斯福和马歇尔·利奥泰****。

有没有其他的对比能够让我们更好地评估墨索里尼发动这场战争时的情况呢？与焦利蒂的自由党政府在1911年至1912年间对土耳其的“利比亚”发动的进攻比较一下如何呢？在当时，意大利发动的那场战争受到了欧洲各国的广泛批评，尤其是“最好的和最文明的”英国媒体更是把那场战争称做是“不道德的”。但是，焦利蒂当时并没有考虑任何妥协。他先把军队开到的黎波里，然后才向土耳其宣战（最终给出了一个明显是捏造出来的理由以证明自己的行动是正当的）。他的部队已经踏上了利比亚的土地，他才迅速地发布命令。在意大利政府中，焦利蒂那些胆小的同事们认为他做得太过火，但他却立场坚定，毫不妥协。从许多方面看，与发动埃塞俄比亚战争时的墨索里尼相比，焦利蒂在1911年至1912年时的意志要更坚定一些，而做出战争决策时也更聪明一些。但是，焦利蒂当时寻求的并不是在 frontline 战场或者在与公众的关系方面取得多大的胜利（他没有尽力去掩饰自己的观点，即认为士兵们都是白痴），他更看重的是在外交谈判桌上取得的胜利。当时，脆弱的土耳其政府正在经历着巴尔干战争的折磨，意大利又暗中为土耳其的“恐怖主义分子”或者民族主义分子、塞尔维亚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罗马尼亚人等提供资金和军事支持，所以意大利最终赢得了那场战争。虽然两场战争都为意大利赢得了土地，但墨索里尼当然不会提起自由党政府取得的成就，因为当时法西斯政权已经把自由党定为是“反法西斯的”，并且声称自由党政府那些软弱堕落的政客们应当被收进历史的骨灰盒里。但是，从客观上讲，意大利在1935年至1936年间发动的那场战争与1911年至1912年间的那场战争是有许多共同之处的。

* 德国纳粹提出的作为对外侵略借口的反动理论，认为德国要想继续生存或经济富足，就必须在国土以外获得足够的额外领土和属地。

——译者注

** 意大利在地图上通常被涂成绿色。

——译者注

*** 巴登·鲍威尔（1857~1941），英国陆军军官，童子军创建人。

——译者注

**** 马歇尔·利奥泰，19世纪殖民地时期法国驻摩洛哥总督。

——译者注

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墨索里尼也在努力争取在外交谈判桌上获得控制权。他希望能够赢得埃塞俄比亚战争，但同时又不会损害与《洛迦诺公约》所涉及的大国之间的关系，也不会疏远与原来的战争盟友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关系。1月初，法国外交部长皮埃尔·赖伐尔访问了罗马。在为他举行的祝酒会上，墨索里尼端着一杯意大利苏打白葡萄酒（他只呷了一小口）致辞说，法国外长的这次访问是两国目前“和睦和亲善关系的具体表现”。而赖伐尔则更为谨慎地说：“所有有着和平理想的人现在都把目光转向了罗马。”在之前的10年里，意大利和法国的关系经常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并且很快又会处于这种状态。但是在当时，墨索里尼和其他外交官们都认为法国的这种恼怒的态度只是表面性的。1933年以前，纳粹德国的激进主义是各国关注的焦点。面对德国吞并奥地利的企图所带来的威胁以及其他修正主义者的骚乱活动，意大利和法国应当相互原谅并忘记过去的争吵，同样，对于最近发生的巴尔都*被暗杀这一事件也应当如此（他自己还曾是一位亲意大利的外交部长）。

墨索里尼和赖伐尔说的话的确是真实的，两人就一系列的问题毫不费力地达成了妥协，包括久拖未决的突尼斯问题。墨索里尼急切地向他的法国同事保证说，意大利再也不会在此问题上多管闲事了。墨索里尼一向喜欢直接说出别人的想法，而不愿意啰唆，在他们俩谈到德国重整军备这一问题的时候他仍是这样：“我们没法回头，要摧毁扩军备战，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打仗。”根据意大利的一些备忘录上的记载，墨索里尼在1月5日和6日的讨论中都提出，如果法国不再支持埃塞俄比亚，那么他将保证意大利在未来采取的行动将不会侵犯法国的利益。两人发表的联合公报讲得非常明确，至少《意大利人民报》对此的报道是很明确的：“永世长存的友谊不能只是停留在外交协议里，而必须活跃在生活中。”墨索里尼又继续说：“新的一年非常关键，新年伊始就有吉兆，意大利与法国达成了协议。”墨索里尼相信，他已经获得了某种认可，并且有可能最终与法国结成联盟。**他甚至在强调，自己想宣称已经获得了法国的支持，并将抓紧在非洲采取行动。好像是为了确认他的这种理解，在之后的几个月里，他鼓励巴多利奥与法国进行越来越深的军事交流，并且多次暗示，如果有一个全面的反德军事条约的话，他将会批准这一条约。同时，他还拿出了据称多达6000万里拉来贿赂贪财的法国传媒界，希望他们能够为意大利的行动创造一个友好的舆论环境。

* 巴尔都（1862~1934），法国保守派政治家。1913年任法国总理，被暗杀前不久在加斯东—杜梅格联合内阁中任外交部长。

——译者注

** 在意大利一方，瓜里利亚确信墨索里尼当时真的相信自己获得了法国完全充分的支持。

——作者注

与法国不同的是，英国与意大利有着“传统的友谊”，但这种友谊在法西斯当政这段时间还没有经受太多的考验。英国对墨索里尼即将发动的埃塞俄比亚战争持什么样的态度呢？墨索里尼自己也没有把握。于是他一开始的政策半带着些暗示，回顾起来，这种政策是应当受到谴责的。后来《凡尔赛条约》被破坏，意大利也卷入战争，并且扮演了不光彩的“纳粹德国的帮凶”的角色，所有这些都与墨索里尼的这种政策有着很大的关系。当然，对于英、意关系的破裂，英国也负有相当大的责任。虽然英国人在1935年至1936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吹嘘国际联盟的优点和作用，但从内心里讲，许多保守党人、在所谓的国家政府里占支配地位的势力，以及外交部门里绝大部分的官僚都像墨索里尼一样非常不喜欢“日内瓦主义”。另外，英国人虽然声称相信集体安全的政策，但实际上他们却开始单方面地奉行一条对德国的绥靖政策。在意大利人看来，这是把现实政治、缺点和伪善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政策。当德国再次提出吞并奥地利这一问题时，英国的立场会发生倒退吗？很可能会——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在1935年3月拜会希特勒时的所作所为、1935年6月签署的英—德海军协议，以及英国接受德国在1936年3月对莱茵兰地区的再度军事化还不能证明这一点吗？如果英国与德国达成交易即将对《凡尔赛条约》进行修改的话，那么它为什么不能给可怜的意大利一些东西呢？比如埃塞俄比亚，它“真的”只是非洲的一小块土地而已，对于“日不落帝国”来说也是毫无价值，它的太阳也不会落在这里。但是，如果与英国完全反目，那事态可就严重了。正如海军方面在1935年3月对墨索里尼所说的那样，这可能意味着意大利将成为一个“局外”国家，也就是说，它将不再是指导欧洲的《凡尔赛条约》框架内的国家了。在非洲的战争可能会导致法西斯意大利一头扎进黑暗里，并且最终只能在柏林找到唯一的一个立足点。

问题提出了，答案也是清楚的。虽然没有公开讲，但毫无疑问墨索里尼心里明白，如果继续在非洲的冒险行动，他也将面临很大的风险。墨索里尼那种靠神赐的超凡直觉来做决策的方法也有明显的缺点，并且还伴随着危险，决策缺乏详细的计划就是明显的证据。1935年，墨索里尼有太多至关重要的问题都没有经过周密的思考，意大利也没有一个机制来对这些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评估。做出决策前也没有征求法西斯党最高委员会的意见，而各个部的部长之间也缺乏相互的合作，也缺乏把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行动结合起来的观念。国王也受到了限制，最多也就是一个旁观者。后来，饱受压抑的国王还低声咕哝说，他发现领袖在发生危机期间很“冲动”。有谣传说，马格丽塔·萨尔法蒂当时曾试图劝阻旧情人，但她对墨索里尼的影响——不管是在性方面还是在知识方面——都早已经是明日黄花了。埃米利奥·德博诺是一个苛刻的白胡子老头，他既是一个士兵又是一个法西斯，“筹划”战争的任务就落在了他和墨索里尼的肩上。他们并没有仔细研究战争的某个阶段的详细计划，以及如何去处置取得的领土等问题（焦利蒂在1911年

至1912年间同样也是闭口不谈这些问题)。

1月25日，墨索里尼给意大利驻伦敦大使迪诺·格兰迪发了一封电报，从这封电报中可以看出墨索里尼当时对于战争的路线和方法的考虑。格兰迪老练而狡猾，墨索里尼在确定一些政策的框架时经常找他商量。墨索里尼在电报中向格兰迪保证说，法国已经同意意大利“用激进的方式来解决埃塞俄比亚问题，意大利可以直接统治埃塞俄比亚，或者也可以商量用其他的途径。”墨索里尼写到，现在是就同一问题更全面而深入地试探英国的态度的时候了。西蒙当然不可能对意大利所有的军事计划都做好了准备，但他应当清楚地知道，他的国家将不会“妨碍”意大利的行动，而只会对他表示“同情”。墨索里尼认为应当告诉西蒙，正是埃塞俄比亚的不妥协态度让意大利无法用温和的方式来解决，而被迫“用一种有效的、能够代表我们的和整体的利益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格兰迪很快就向罗马报告说，他设法得到了西蒙或者是他的官员的一些承认，并说他们明白其中的道理，但就是没有人敢说出来。当格兰迪谈到文明的欧洲和一个荒蛮的非洲国家之间的差别时，西蒙明白意大利传递的信息吗？赖伐尔在伦敦露了面，在与格兰迪一起进餐时还互致法西斯式的敬礼，并且还大谈在罗马与墨索里尼会面时的情景。这些消息会给西蒙留下深刻的印象吗？让人失望的是，所有这些问题唯一可能的答案是“没有”。格兰迪用讨好墨索里尼的话写道：“这些英国白痴。”他们一面迎合选民们的想法，一面又跑到柏林去。格兰迪又评论说：“他们的政策就像伦敦的雾一样难以约束。”*这是一个不吉祥的消息，但它并没有让墨索里尼感到气馁。3月8日，墨索里尼告诉正在厄立特里亚组织运送人员和设备的德博诺，他必须设法在当年的9月或者10月以前为入侵埃塞俄比亚准备好一支30万人的军队。

1936年4月份，组成一个英—法—意联盟的最后一次机会出现在墨索里尼的面前。按照计划，墨索里尼将在4月11日至13日在位于斯特雷萨的环境宜人的博罗梅奥别墅与赖伐尔、西蒙以及法国总理皮埃尔·艾蒂安·弗朗丹和英国首相詹姆士·拉姆齐·麦克唐纳会面。在此之前，墨索里尼在他自己的报纸上试图按照自己的主张为这次会谈定一个基调。他简单地列出了一个单子，表明他的要求是：“一，德国必须表明对此次会谈的态度；二，法国必须重视与意大利的友谊；三，英国必须迅速认清欧洲大陆的形势。”

虽然已经是春天了，但是在斯特雷萨，雾还没有散去。聚集在这里的政治家们最终的解决方案强调了和平的愿望和对国际联盟的承诺，墨索里尼与其他人一起签

* 当时，墨索里尼给意大利驻华盛顿、莫斯科和东京大使都写了信，讨好地向美国、苏联和日本保证说意大利绝不会对他们造成损害。

署了决议。后来，他又主张在决议中有关支持集体安全的语句里加入“在欧洲”的附加条件，这是一个明显的暗示，他想把集体安全这种有效的做法只限制在欧洲，从而把意大利在非洲的行动排除在外。但是，对于这个暗示，英国又一次假装不明白。面对英国这种有意冷落自己的需要和野心的态度，墨索里尼越来越愤怒和暴躁，这让他那些更加小心谨慎的顾问们——如苏维克和瓜里利亚——非常担心。5月18日，墨索里尼给德博诺发去电报声称：“法国是正确的，但还有点保守。英国有些焦虑不安。”但是，他宣布自己打算勇往直前，并且“不惜任何代价，即使是与英国决裂甚至最终与英国开战也在所不惜。”他还命令德博诺在10月前必须备好3年的库存供应，并拟定出应对苏伊士运河一旦被封锁时的行动方案。

这些言辞听起来非常激烈，但是不是应当按它们的字面意思来理解呢？——毕竟，墨索里尼是在用这些话来敦促办事效率不怎么高的德博诺赶快采取行动。墨索里尼现在真的决定用武力征服整个埃塞俄比亚而不为自己留下任何后退的余地吗？那些相信他有着“流氓无赖”的缺点的历史学家们（以及那些相信他们的社会精神和道德的正确性的历史学家们）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这也是从一个“法西斯恐怖主义分子”的假设得出的必然结论。当然，墨索里尼说话时要让别人听起来好像只有战争才能让他满足。由于对斯特雷萨会谈的结果不满意，他指示格兰迪转告西蒙说，意大利无法接受日内瓦就埃塞俄比亚问题做出的仲裁，并且意味深长地补充说：“我们的决心绝对是坚定的，不会让我们对重要的殖民地利益的追求受到与此无关的局外事务的阻碍。”在对议会下院发表演讲时，墨索里尼又警告法国政府不要指望意大利会“像块石头一样”站在勃伦纳山口并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事情袖手旁观。在意大利国内，法西斯政权的宣传机器加班加点地工作，不断地讲述意大利以前在埃塞俄比亚遭受的耻辱并强调复仇的必要性，一方面把埃塞俄比亚妖魔化，另一方面又极力激发意大利人渴望成就一个帝国的欲望。法西斯政权在使尽浑身的解数向英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展示，在征服埃塞俄比亚这个问题上，意大利将一意孤行，破釜沉舟。

但是，如果据此就说墨索里尼已经变成了一个不管付出任何代价也要发动战争的战争贩子，这一点还值得怀疑。毕竟，其他国家为安抚他和他的国家所做出的努力是那么的微不足道。1935年，作为一个国家，意大利处在被驱逐的边缘（墨索里尼不止一次地使用过这个比喻），这种危险的境况再明显不过了。特务机关从奥地利传来的秘密报告也说意大利人在那里普遍地遭到厌恶，而意大利对于维也纳政权进行庇护的前景看来也相当暗淡。总的形势看起来就更加让人沮丧了，正如一位美国外交官所说的那样：墨索里尼在埃塞俄比亚的“事业”只是“一个细节”，而德国“仍然是欧洲局势的关键所在”，英国总体上也是持这种观点。法国将军莫里斯·加默兰也有同感：“对于我们来说，意大利是重要的，但英国却是必不可少的。”国际关系的框架已经被柏林的纳粹政权搞得非常紧张了，其他国家不

会让它再按照有利于意大利或者让墨索里尼满意的模式发展了。但是，1935年6月，还真有人提出应当安抚一下墨索里尼这个意大利的独裁者，这确实让人觉得有些可笑。

提出这个计划的人是安东尼·伊登。他年轻、文雅、野心勃勃但又有些神经质，是英国的国联事务部大臣，但他所任职的国联事务部是新成立的，也不太可能受到罗马的重视。他提出的是一个领土交换的方案，根据这个方案，意大利将得到奥加登沙漠内的土地，而埃塞俄比亚将在英属索马里兰的泽拉得到一个出海口。这一地区是意大利、英国和法国在非洲侵略扩张的交汇点，但意大利的优势相对较弱。当他提出这个方案之后，伊登发现他碰到的是一个狂暴的领袖。回想起来，这位意大利独裁者当时的反应也没有什么让人吃惊的，但是显然没有人告诉伊登要对此有所准备。墨索里尼有意表现出一种绝不妥协的态度，他再次强调说，如果想要和平，意大利就必须得到埃塞俄比亚在上个世纪得到的除阿姆哈拉以外的所有领土，并且还要能够实际地控制那些“核心分子”。他又无情地宣布说，如果发生战争，那就意味着“埃塞俄比亚将最终从地图上消失”。墨索里尼又凭空编造了一个数据说，意大利有68万武装力量，另外很快就能再动员100万人。他没有说起，也许他当时还没有注意到，刚刚在私下里见过希特勒的伦泽蒂在他的报纸里夹了一张便条。伦泽蒂在这张便条上说，元首希特勒表示他确信意大利和德国的关系能够恢复昔日的辉煌。希特勒还说，他从来就没有打算过要吞并奥地利。

在意大利、英国和国际联盟之间的争吵已经没有退路了。英国的媒体对此表达了极度的愤怒，《伦敦时报》认为“要战争还是要和平这一问题事关重大，它决定着国际联盟的整个未来。”格兰迪向墨索里尼保证说，伊登在遭受了领袖的“重击”之后肯定会放弃先前的主张的。但是，随着那年夏天的悄悄过去，这场危机却越发加剧了。不管自己的国际形象遭到了什么样的损害，墨索里尼仍然固执地坚持己见。

墨索里尼给生性软弱而敏感的伊登留下的印象是“一个十足的强盗”，“一个反对基督的人”。伊登对墨索里尼的这种印象一直都没有改变，1956年，他还对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产生了这种印象。从总体上讲，埃塞俄比亚战争结束了外国记者和墨索里尼之间的亲密关系（如果这种关系曾经存在的话）。曾几何时，能被派驻到罗马可是记者们梦寐以求的，而墨索里尼的办公室外面也是经常围着一群要求采访他的外国记者。但是现在，一些对墨索里尼持更多批评态度的

* 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1918~1970），埃及军官和政治家，1954年至1956年任埃及总理，1957年至1958年任总统，1958年至1970年任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的总统。1956年他的使苏伊士运河国有化方案触发了一次国际危机。

记者被蛮横地逐出了意大利,但出版商们却发现了一个潜在的市场——可以写书来“揭露”法西斯主义的罪恶。在众多的此类作品中,有着最引人注目的书名和最持久影响力的一本书是乔治·塞尔迪斯的《有名无实的恺撒》。他的研究精神非常纯粹和彻底:“反动的独裁者都是一些不懂哲学的人,也没有强烈的人道主义理念,甚至连一个对他们的国家和世界有任何价值的经济计划也没有。”他们什么都不是,就是些“强盗”。外国的政治领导人总是倾向于把意大利人看做是不值一提的穷人,而墨索里尼现在的公共形象是一个连胡子都不刮的暴徒,一个最不可能妥协的独裁者。在伦敦的《标准晚报》上,在对意大利的政治进行评论时,戴维·洛*常用一只名叫“墨索”的狂吠的小猎狗的卡通形象来代指意大利。10月份,这份报纸上还刊登了一封这只小狗发给墨索里尼的电报:“想把我的名字改成海尔·塞拉西吗?那么先把你的名字改成‘污点’或者‘流浪汉’吧。”早在7月份,布林肯上校就曾哼着鼻子轻蔑地说:“天呐,阁下,伊登是对的,我们应当把中部非洲都送给墨索里尼,但是他自己必须待在那儿。”

为了改变自己越来越糟糕的形象,意大利人还设法资助那些对他们态度比较友好的记者。在伦敦,格兰迪被全权委托资助那些为意大利侵占埃塞俄比亚进行解释的媒体。从他那儿领取资助的主要人物是极右翼的评论员E·波尔森·纽曼,此人在20世纪20年代就曾写过一些对意大利有利的小册子。1935年8月至10月间,意大利出钱让纽曼到东非去旅行了一趟,回来之后,他就对法西斯的事业大加辩护,同时大声谴责埃塞俄比亚人的“野蛮”。但是,他的影响力等于零。格兰迪向墨索里尼诉苦说,他组织了一些有利于意大利人的谈话,但愿意来听的都是些“老寡妇和背井离乡的老妇女”,她们一直都想送一小块油饼给领袖吃。墨索里尼也向他抱怨说,英国正怀着敌视的态度威胁要把意大利逐出国际联盟并破坏全球白种人的事业。

在遭到世界各国的反对的时候,墨索里尼在外交上唯一的一线希望就是法国了。赖伐尔虽然狡猾,但从内心里讲,毫无疑问,只要意大利能够控制住勃伦纳山口,他就很愿意让意大利获得埃塞俄比亚甚至更多的殖民地。在与法国大使查尔斯·尚布伦进行的一系列的会谈中,墨索里尼向他确认说自己首要的谈判立场就是他对伊登所解释的那些内容。换句话说,就是吞并埃塞俄比亚大部分的边境领土,具体可以模仿摩洛哥、埃及、伊拉克的例子,甚至可以模仿当时用心最险恶的日本在中国建立伪满洲国的例子。赖伐尔表面上总是回应说他愿意就此提供帮助,但是实际上他却坦白地说法国的政策“是与国际联盟系

* 戴维·洛(1891~1963),英国政治漫画家,他创造了傲慢的布林肯上校这个极端保守分子形象。

在同一根轴上的”。

1935年9月9日，国际联盟的会议开幕了。但在闭幕时，国际联盟再一次做出了不利于意大利的决议，英国的外交大臣塞缪尔·霍尔极力支持集体安全的政策。与会各国还同意，如果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它将被施以制裁。虽然包括格兰迪在内的一些人都显示出有些畏缩和信心不足，但墨索里尼却对这种潜在的对国家经济造成毁灭性威胁的制裁不屑一顾，相反，他确信想要做的事最好尽快去做。9月29日，德博诺接到指示，要他在10月3日开始行动。那天黎明时分，意大利军队越过了边境，飞机迅速飞到阿杜瓦进行轰炸，这儿正是1896年意大利军队铩羽而归的地方。由此，法西斯意大利投入到了一场殖民地战争中。正如墨索里尼在他的“动员演说”中所说的那样，这场战争并不只是军队的行动，而是“代表4400万意大利人民的精神的行动”。

或者，这是不是墨索里尼个人的一场殖民战争？或者只是“一个人”的事业？当然，墨索里尼在危机发生的最初几个月里并没有屈服，他甚至在几个月前还对自己说，政策的实施首先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一个人如果拥有像拿破仑或者他自己那样的意志（或者像焦利蒂也行，但这有些说不上口），那么他就注定能够取得胜利。他的许多最亲密的同事都没有他那么坚定。像阿戈斯蒂诺·兰齐诺这样著名的法西斯知识分子，以及像阿尔伯特·皮雷利那样重要的商人都确信，一旦遭到制裁，意大利有限的黄金储备很快就会花光。连往常非常油滑的沃尔皮也竟然评论说“领袖疯了”。*国王和巴多利奥也都没有隐藏自己对这场殖民地战争所持的怀疑态度，对于大多数意大利人来说，当回忆起过去惨败的经历时，他们更多地是带着恐惧而不是复仇的精神。同样可以预料的是，博塔伊肯定会强调这场战争是一场精神和革命的运动，因此不应当用金钱来衡量。但是，即使是墨索里尼也知道，他最终必须要支付一些账单。1935年12月，他任命精明而独立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费利切·瓜尔内里担任新成立的贸易控制部副部长，并且直接向他汇报。墨索里尼这个独裁者真是有些异想天开，他之所以设立这个部门，是预测旅游业将会复兴，从而能够弥补一下目前的资金短缺。

的确，一直都有这样的观点，即如果墨索里尼有适当的收获，那么他就不会这么固执地坚持不妥协的态度了。在最初夺取了阿杜瓦和其他一些边境城市之后，意大利军队的挺进速度慢了下来，当时在索马里兰的德博诺和格拉齐亚尼都表现出了意大利军队将领自1896年那次惨败以来一直就有的典型的小心谨慎和不主动性，墨索里尼也暗示可以考虑某种程度的妥协。墨索里尼一方面发表了许多言辞激烈的

* 与之相反，德斯特凡尼却声称，意大利已经遭受了多年野蛮的制裁，它的移民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长篇演说（包括威胁要与英国海军在地中海较量一番，当然这种威胁是不太可能的），另一方面，他也不停地说，他的意大利天生就是英国和法国在欧洲的伙伴，并且将会阻止柏林发动任何的骚乱。此外，赖伐尔也坚持说他愿意谈一谈——墨索里尼被告知说，教皇作为“一个好意大利人”保佑领袖，并认为意大利的确需要扩张自己的领土，它在凡尔赛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同时还建议说应当与法国进行新的对话。同时，墨索里尼命令德博诺加快行动以占领更多的领土，因为这是谈判中唯一可用的东西，这表明墨索里尼确实是在听取别人的建议了。苏维克当时正在想办法把自己的外交部副部长的职位转变为一度被秘书长充任的顾问职位，于是他向墨索里尼提出，《四强协约》仍然有利用的潜力。在他看来，这个协约仍然是在欧洲处理危机的最“可靠、理性和现实”的途径。

巴黎和伦敦都听到并且理解了从罗马传递出来的信息。最先是“专家”们，后来霍尔和赖伐尔自己也开始制订一个计划了。墨索里尼大受鼓舞，把他的“最大化的要求”（正是9月份时告诉法国的那些）告诉了格兰迪，但是在那之后他又暗示，满足不了那么多要求也可以接受。法国甚至开始向海尔·塞拉西施加压力，让他同意接受意大利托管他的国家埃塞俄比亚。

然而，这种协商注定不会有什么结果。在巴黎，这个计划被漏泄给了新闻界。霍尔当时在瑞士滑冰时摔断了鼻子，因此稍晚才回到伦敦，在下院就此事给国际联盟的团结造成的损害发表演讲时也显得有气无力。但是，新闻界却刮起了一场风暴，《伦敦时报》选择12月13日星期五那天刊登文章宣称，《霍尔—赖伐尔条约》正在让英国的“好名声”面临危险。几天之后，这份报纸又诅咒了这个条约，称它只是用一条“供骆驼行走的通道”就想收买高贵的海尔·塞拉西。戴维·洛现在真的把他的卡通小狗改名为海尔·塞拉西了，并且把英国和法国的交易画在了一个有两个十字路口的走廊上。虽然墨索里尼在之后的几个月里也曾两三次公开表示并不是没有妥协的可能，但法西斯意大利命中注定没有能够通过谈判来结束它的埃塞俄比亚战争。并且，日内瓦虽然也威胁要对侵略者施以“军事制裁”，但这种威胁却缺乏一致性，意大利因此也没有理会这种威胁，转而开始努力取得压倒性的军事胜利了。

在谈到非洲的行动时，墨索里尼常爱用“不和解”、“不动摇”和“不妥协”这些词语来表明态度。11月，他用巴多利奥接替了德博诺，这个职业军人带领他的部队在5月5日就打到了亚的斯亚贝巴。意大利的伤亡人数只有1000多，而埃塞俄比亚则遭受了狂轰滥炸和大屠杀*——虽然意大利已经签署了不使用毒气的公约，但巴多利奥在战争中再次使用了毒气弹，**并且这种做法也得到了墨索里尼的支持。格拉齐亚尼当时使用了这样一句口号：“领袖可以决定埃塞俄比亚有或者没有埃塞俄比亚人，就看他高兴不高兴了。”最险恶的是一个年轻的法西斯记者因德罗·蒙塔内利，他在文章中称，意大利士兵从根本上就对埃塞俄比亚人怀有藐

视。1946年之后，这个记者成为意大利共和国最有名的保守派评论家。他当时敦促意大利人有必要增加自己的“种族高贵感”。当然，他们的种族主义不会去模仿“阿尔卑斯山那边的种族主义”。他还进一步总结说，“如果我们对自己天生的高贵没有确切的意识，那么我们就永远成不了统治者。我们不能与黑人亲如兄弟，我们不能，我们绝不能这样。”

墨索里尼的家庭成员也听到了这种有关种族主义的理论，并且发现这种理论已经渗入到了他们的思想中。而在非洲另外一个被欧洲统治的地方，这种理论最终的导致了种族隔离政策。维托里奥和刚刚17岁的布鲁诺·墨索里尼也参加了意大利的军队，他们的父亲喜欢给他们发电报并就他们轰炸的威力表示祝贺（并告诉他们别忘记给他们的母亲写信）。墨索里尼的儿子还承认，当他完成第一次空袭之后非常失望，因为他没有制造出像自己先前看到的美国电影里的那种爆炸的情景。令人遗憾的是，埃塞俄比亚那些脆弱的小屋一被他的炸弹击中就倒塌了。他还承认，从内心里讲，当地那些身材高大但又柔软而敏捷的妇女对他还真有些吸引力，她们确实具有“性吸引力”（他还用了英语里的一个词汇“sex appeal”来描述）。但是他又承认，当他走近看的时候，这种感觉就没有了。

墨索里尼把一些老法西斯头目也派到了战场上，这些人高傲自大、野蛮残忍并且满不在乎，而维托里奥·墨索里尼和蒙塔内利也跟他们一样。博塔伊对待这些事件的态度是最为理性的，而法里纳奇则恰恰相反，尽管他身上带着一枚手榴弹在德塞附近的一个湖边钓鱼时失去了一只手。更重要的还是国内的形势。媒体上一系列标题都在宣传意大利取得的军事胜利和在战争中微不足道的人员伤亡，还有对日内瓦那些对意大利施加制裁人进行指责的内容。不管当初对战争存在多少怀疑，现在都迅速地被媒体的宣传打消了。在法西斯政权的吹嘘的影响下，许多意大利人都把埃塞俄比亚战争以及意大利帝国宣告成立看做是一次民族的胜利。许多曾经坚定地反对法西斯的人物，从奥兰多到克罗齐，都再次聚集到了国家的旗帜下，而且还响应号召捐出了他们的勋章和珠宝手饰——法西斯政权出台了一个反制裁计划，并把它宣传为一个爱国行动。在罗马，就在1935年的圣诞节之前，埃莱娜王后还把她的结婚戒指捐给了民族和帝国的事业。

* 据巴多利奥估计，抵抗他的埃塞俄比亚军队大概在35万人左右。这是一场典型的殖民地战争，但他和像德费利切这样通晓一切的历史学家都没有费力去估计埃塞俄比亚在这场战争中的伤亡人数。这个数字肯定有几万人。多达40%的“意大利”士兵都是“殖民地士兵”，即黑人士兵，主要来自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

——作者注

** 意大利在战争中总共使用了1597颗毒气弹，总重317吨。

——作者注

但是，埃塞俄比亚战争真正的赢家还是贝尼托·墨索里尼——一个团结并且获得胜利的国家领袖。德费利切毫不夸张地写道，当意大利军队挺进亚的斯亚贝巴的时候，“领袖的兴奋之情难以想象”。英国驻罗马的大使告诉伊登说，墨索里尼“不是那种只为说些寒暄的话而接受采访的人，他希望来访者尽快说明来意，然后他就立即给出回答。当然，有时候他也有可能趁机把那些浪费他时间的外交官们痛骂一顿。”但是，从意大利的精英们的嘴里却很容易听到高兴的话。哲学家乔瓦尼·真蒂莱就强调说，“帝国又回到了罗马的七丘之上”，这意味着“意大利的新历史的开始”。他又解释说：“墨索里尼今天不只是在埃塞俄比亚建立了一个帝国，更重要的是，他创建了一个新的意大利。”在领袖对“思想和行动”的神秘的融合力的鼓舞下，意大利人现在可以变成“新类型的新人了”。虽然埃塞俄比亚当时还有2/3的土地并没有被意大利人占领，而这些地区的形势也并不稳定，但在许多意大利人看来，占领亚的斯亚贝巴说明领袖的指挥能力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可以把这看成是一场“墨索里尼式的革命”。

后来的历史学家中也有人同意这种说法。德费利切还把建立帝国称做是“墨索里尼的杰作”，还说他之所以比较容易地取得了成功，是因为与法西斯政权的其他运动相比，墨索里尼对这件事的信心更加坚定。

当然，除了在心理上需要坚持到底之外，墨索里尼还是比较容易就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虽然埃塞俄比亚人在1935年9月也装备了371枚炸弹和11架飞机（但是飞得比较慢，并且还有3架无法起飞），但这些并没有对法西斯军队构成什么威胁。墨索里尼的将军们之间可能也发生了一些争吵，那些知情者在闲谈中还谈到了臭名远扬的巴多利奥，说他虚荣而自负，*收受贿赂并且喜欢照顾裙带关系。这些人还说，领袖讨厌责骂士兵，但很容易被他们胁迫。墨索里尼党内的下属们也并不像他们自诩的那么英勇，相反，为了自己能够获得有利的地位，他们之间也一直在勾心斗角。**

他的女婿齐亚诺的那种厌世的、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玩世不恭的形象也越加明显了，身为被墨索里尼指定的年青法西斯一代的领导，有这种形象好像很不合适。如何处理取得的殖民地，当时可能还没有切实的计划。

在这一危机发生之前和过程中，意大利人的野蛮行动被大肆宣扬，这让法西斯独裁政府在国际上的形象比以前更加糟糕了。意大利与纳粹德国的接触可能比

* 正是在此时，他被提升为亚的斯亚贝巴公爵。而当法里纳奇听到自己还获得了一个荣誉博士的头衔时，他还想自己能不能同时成为一个大教堂教士或者红衣主教。

——作者注

** 例如，博塔伊和他的朋友们确信，巴多利奥拉拢德博诺是由巴尔博和莱索纳策划的。

——作者注

以前增多了，*由此也可以证明意大利可能会成为一个被国际社会遗弃的国家，而墨索里尼的内心里也可能开始产生与“其他法西斯国家”恢复友好和睦的关系的想法。另外，激增的军事和政府开支让那些节俭的经济学家们感到已经无力支撑了。然而，墨索里尼自己能做的只是发表更多的鼓舞人心的演讲，并且从意大利安全的角度鼓励士兵们坚持下去。至少，在短期内取得胜利还是最容易完成的任务。

1935年11月，在博塔伊离开意大利赶赴前线之前，墨索里尼还见了。博塔伊回忆说，领袖“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了他的办公室，好像是一路跑上了楼梯。并且，他的腰部紧勒，一下子从一个胖子变成了一个“人造的瘦子”。领袖匆匆忙忙地对博塔伊说，细节问题他一点都不感兴趣。“逻辑推理太多了，我们应当更注重本能的感觉！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是一场革命战争，这就足够了！”毫无疑问，他这番话是事先刻意准备好的，目的是给容易轻信的博塔伊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事实上，在整个1935年至1936年间，墨索里尼对许多事情都是视而不见，但最终却取得了胜利。现在，就连他父亲的在天之灵都无法否认，他的儿子是一个比克里斯皮还要伟大的人。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也几乎要冲着墨索里尼和所有沉浸在快乐中的意大利人民微笑了。1936年5月9日，墨索里尼一反原先对周围的世界不屑一顾的态度，只是带着一丝不安宣称：“意大利终于有了自己的帝国……这是一个法西斯帝国，一个和平的帝国，一个文明和博爱的帝国。”但他当时不会想到，他注定永远不会去访问埃塞俄比亚，而法西斯革命也只能抓取一把埃塞俄比亚古老的泥土罢了。墨索里尼成为了一个帝国的领袖，但这个帝国却是历史上寿命最短的帝国之一。

* 1936年1月，苏维克向墨索里尼汇报说，他正在大造谣言，称意大利打算倒向德国一方以引起外国外交官们的注意。希特勒也告诉苏维克，他确信意大利能够取得胜利。

4 欧洲的危机

在意大利，宣告成立帝国让墨索里尼赢得了至高无上的声誉。那些对他佩服得五体投体的歌颂者甚至在犹豫，应该把他作为圣徒还是作为神来赞美。正如胆怯的记者阿斯维罗·格拉韦利在他的有关“对墨索里尼的精神的理解”的专著中所总结的那样：“荷马*是艺术之神；耶稣是生命之神；墨索里尼是行动之神。”或者说，把这些综合在一起，墨索里尼就成了一个类似阿波罗似的人物。格拉韦利写道：“墨索里尼的微笑就像是太阳神发出的光芒，我们期待它，渴求它，因为它能够带来健康和生命。”“拿谁来和他相比呢？没有人能和他相比，拿外国任何一个政治家来与他相比都是对他的一种贬低。”其他的宣传家们自然也不甘落后：“他总是那么孤独，但每一种信仰的创始人也都像他这样。他创立的信仰的名字就叫意大利。”“他‘永远正确’，他的出现是‘天命注定的’，他是一个‘提坦’**，一个‘耶稣’，一个‘神灵’。”看他就像是看太阳一样，虽然无法看到他，但却能感觉到“一股来自苍天的光芒、一股震颤和一股巨大的洪流”。

虽然别人的赞美多得让人厌烦甚至窒息，***但从个人的角度讲，墨索里尼很快就发现埃塞俄比亚战争胜利所散发的光彩正在逐渐地退去，而生活也再一次确认了他以往就持有的悲观主义态度。1936年6月，他最小的孩子——当时才6岁的安娜·玛丽亚患上了小儿麻痹症。患病才一周多，她好像就快要死掉了，墨

* 荷马，希腊史诗作者，创作了西方文学最伟大的两部作品《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译者注

** 提坦，又译泰坦，是希腊神话中众巨神之一，是天神和天地女神之子。

——译者注

*** 从埃塞俄比亚回到意大利时，博塔伊发现迎接自己的“不是人而是雕像”。

——作者注

索里尼撇下了自己的工作守候在女儿的病床前。*当时新的殖民地部长亚历山德罗·莱索纳（1936年6月至1937年11月在任）有一天早晨在托洛尼亚别墅碰到了墨索里尼，他发现领袖“脸庞消瘦，没刮胡子，两眼红肿，穿着一件皱巴巴的衬衣，外面套着一件旧夹克。”他就像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尤利乌斯·恺撒一样，看到他的人会发现，这个神正在颤抖。

墨索里尼与家庭中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仍然不是那么亲密。维托里奥先前想成为一个青年记者，但在1936年7月，他与著名的电影专家以及“阳光学院”新闻系主任卢恰诺·德费奥共同创办和编辑了一份新的理论性杂志：《电影》。墨索里尼当时很为他感到骄傲。然而，墨索里尼的大儿子却不是那么专注，他与弟弟布鲁诺把更多的时间都花在了高级妓院里。布鲁诺还要疲于应付一个可怜的罗马女孩，她还声称布鲁诺诱奸了她，然后又抛弃了她。1937年2月的一个阴雨天，维托里奥与出身米兰资产阶级家庭的奥尔索拉·布法利结婚了。他的堂兄弟维托与他同时举行了婚礼，妻子是西尔维亚·塔尔迪尼。两人的婚礼是在圣彼得大教堂举行的，这件事也在意大利的媒体上享受了皇家的待遇。但是，虽然受到了如此的追捧，但维托里奥在政治仍然没有任何影响力。布鲁诺也是一样，他的爱好是开快车，这也许是一个名叫特里沙·韦卢蒂的老妇人在罗马横穿一条街道时被撞死的原因（但官方的报告对此事件做出的结论却说过错全在她身上）。布鲁诺是一个飞行员，这一职业自然也受到了媒体的追捧。他的妻子是吉娜·鲁贝蒂，是一个学校督查员的女儿。她的祖父是一个天主教法西斯，是意大利的财政部长。两人在1938年10月份完婚，并且很快就有了一个女儿。**没过多久，布鲁诺还担任了意大利拳击联合会主席的职务。

在罗马期间，拉凯莱一直住在托洛尼亚别墅里，并且保持着自己朴素的形象。据说，她一直都没有进过墨索里尼的“两半球之厅”，而那些比较挑剔的来访者也都不愿意吃她做的比较粗糙的食物。***在性生活方面，墨索里尼当时已经开始与克拉雷塔·佩塔奇调情了，虽然她并不总是那么可爱——她会抱怨她的身体、她的牙齿、她的健康和胸脯的大小，并且如果有机会，她会整日躺在床上吃巧克力。她的哥哥倒是很快就出了名。他生于1910年，有一个很悦耳的名字：马尔切洛·

* 在墨索里尼的私人文件里，对安娜·玛丽亚患病表示痛惜的最私人性的信件是法里纳奇写的。
——作者注

** 马里纳·墨索里尼生于1940年3月6日。

——作者注

***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88年还出版了一本带些怀旧性质的《墨索里尼食谱》，这证明墨索里尼的声望在意大利有所复苏。

——作者注

切萨雷·奥古斯托·佩塔奇，是罗马资产阶级的帝国梦想的一个可疑的化身。

墨索里尼的家庭成员中唯一的明星人物是埃达的丈夫加莱亚佐·齐亚诺，1936年6月11日，他被提升为意大利外交部长。当时他才只有三十三岁，比欧洲其他国家担任这一职务的人要年轻得多。齐亚诺能够被提升至权力的高层，并且还选定为新一代法西斯的代表，这一点让人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他并不是一个革命青年，从各个方面来讲都更像一个“公子哥儿”，有人把这个意大利词语拙劣地翻译成“父亲的儿子”。他的父亲科斯坦佐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和海军将军，并且还在1924年至1934年间担任了墨索里尼政府的交通部长，是法西斯政权中连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个部长（墨索里尼除外）。老齐亚诺在自己的家乡里窝那有许多资产，其中之一是重要并且相对独立的一份报纸《电讯报》。科斯坦佐·齐亚诺最初负责掌管法西斯政权的财政，1925年，他被提升为科尔泰拉佐伯爵，从而成了一个贵族，而这个贵族称号也让他的儿子开始自称为“伯爵”。

加莱亚佐·齐亚诺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人，1921年，他以全国第二名的成绩高中毕业。在担任外交部长期间，他的精明机敏让他与轻率的伊登、忧郁的哈利法克斯、诡诈多变的邦内特和让人生畏的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年轻时还创作了一些小诗，从中也能看出他的抱负和雄心壮志。他经常出没于罗马的一些高档咖啡馆，并且经常拜访一些有抱负的文人。他喜欢的少年读物中有一部戏剧名叫《哈姆雷特的幸福》。1924年，齐亚诺有些勉强地参加了外交官选拔考试。次年，35个合格的候选人中有27个进入了外交部，齐亚诺是其中的一个。一些比较迟钝的同时代人，以及后来的一些历史学家都把他描述成一个“自命不凡的假内行”，一个只喜欢做表面文章并把这当作唯一目的的人。他们还带着嫉妒和羡慕批评他的“开放婚姻”——不管是谁问起，埃达都会承认自己的有情人，但同时又保证说她的孩子确实是和齐亚诺生的。*

作为外交部长，墨索里尼的女婿最常待的地方不是在办公桌前，而是在罗马的社会精英们聚集的场所——阿夸桑塔高尔夫俱乐部里。他还继承了父亲积聚资金的习惯，1939年4月意大利控制阿尔巴尼亚傀儡政权的时候，他还趁机在阿尔巴尼亚的石油业中做了一笔股票投机交易。**一个在军队中任职的吹毛求疵的同时代人把他贬低性地描述为“又矮又胖、优柔寡断、皮肤黝黑，面色像夜总会里的人，头发像漆皮一样黑。”这位同时代的人又补充说，齐亚诺“具有专业男妓的特征和道德观……他虚荣自负、轻浮，并且自我陶醉，自尊自大。”不过有时候，

* 两个小孩称呼墨索里尼为“外公领袖”。

——作者注

** 有谣言说他持有意大利阿尔巴尼亚石油公司40%的股票。

——作者注

也有人会用比较仁慈的眼光来看待齐亚诺。当然，他的日记还是非常有名，充满有意识的才智和虽然不是那么有意识但仍很独到的洞察力，至今仍是研究墨索里尼时代的意大利以及其他许多问题的最独特的素材。

但是，作为被推荐的墨索里尼这个粗野、坚强并且“不怎么与人交往的动物”的接班人，齐亚诺到底在做些什么呢？如果法西斯主义是一场旨在让资产阶级交出权力并彻底粉碎他们骄奢淫逸的生活的革命，那么齐亚诺如何能够代表这种革命？还有别的比他更资产阶级化的人吗？这位领袖的女婿身上体现出的明显的矛盾从来就没有得到解决。齐亚诺四十岁就去世了，这可能是作为“墨索里尼的影子”给他带来的惩罚。^{*}但是在纳粹分子和那些法西斯革命真正的信仰者看来，他是对领袖所代表的所有事物的一种奇怪的扭曲。不管怎样，这个年轻人对墨索里尼来说可能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到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为了让他也表现得“孤独”一些，他也受到了越来越严格的限制。至少从墨索里尼个人来说，相对于那些针对他的造神运动的狂潮来说，圆滑的齐亚诺和粗俗的法里纳奇的确是与他不太相符的矛盾因素（拉凯莱却总是在损害自己颓废的、自大的、爱打高尔夫球的女婿，她总是在家里重复法里纳奇在政坛上所表达的态度和“真理”）。在这种破裂的关系中，在这种虽然明显但却没有说明的矛盾中，墨索里尼在寻求保持一种幽默感^{**}和独立的位置。墨索里尼能够超脱于他自己的感召力之外，并且知道，在自己的个性的边缘同样能够找到法里纳奇或者齐亚诺的影子。这两个人的特点他可能都有，但又与两个人都不同。

虽然有这种心理解脱的方法，但作为领袖，墨索里尼的心理压力仍然非常大。1938年，有一段时间正处在消沉之中的墨索里尼坦诚地说，他已经成为“自己、他人、事件、希望和幻想的一个囚徒”。他又继续坦白地说出了内心的一些想法，这些话政治家们可能经常会说，但也许不应当从一个领袖嘴里说出来：

“虽然有些事情我没有说，但是我必须想，并且有时必须说些言不由衷的话。是的，在两个墨索里尼之间的确存在着隔阂，并且这种隔阂有时深得可怕。也许有一天，两个墨索里尼中的一个会请求休战，他会折断他的剑举手投降。但我还不知道会是哪一个。”

但是，墨索里尼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发表演讲以显示他在任何时候都是最自信的。1937年2月至3月间，他接受了《每日邮报》的瓦尔德·普赖斯和《联合新闻》

^{*} 作者在这里借用了R·莫斯利的一本书的名字《墨索里尼的影子：加莱亚佐·齐亚诺的双重生活》（1999年）。

——译者注

^{**} 他对一个朋友说，他瞧不起党内少数高层人士身上那种高傲自负以及缺乏幽默感的缺陷。

——作者注

的韦布·米勒的“私人”采访，但并没打算透露太多的内容。他强调说，他的膳食中很少有肉，只是偶尔吃一点，但是有很多水果和蔬菜。他每天的两顿饭都是“农家饭”。他也不喝茶或者咖啡，只是偶尔喝一小口酒。但是，“像最后一个爱好和平的资产阶级那样”，他也喜欢在每天下午喝一杯甘菊茶。他不抽烟，并且每天坚持进行30到45分钟的锻炼，一般从晚上11点睡到第二天早上7点。他每天工作12到14个小时，每年要读大约70本书，喜欢“小说、历史和名著，偶尔也读一些浪漫作品。”他还喜欢紧跟最新出版的作品。他说：“法语、德语和英语作品我都读。”他喜欢威尔第、瓦格纳和罗西尼，但同时也喜欢爵士乐，特别是他可以跟着爵士乐跳舞。作为一个统治者，他的生活的秘诀是“精确和勤奋”——“我可以自夸地说我是一个一流的官僚。任何没有组织纪律性、稀里糊涂和浪费时间的人都会被我解职。”他最后总结说，他是一个泰勒式的人。

“我把我的活动按照工作进行分类，努力避免分散精力和浪费时间。这就是我为什么能够完成那么多工作但又从来都不感觉到累的原因。我已经把自己的身体变成了一台机器，并且不断对它进行检查和控制，所以它能够完全有规律地运转。”

虽然他也在文件上进行批注，并且明白无误地在上边签上“M”以显示他已经阅读了文件并了解了其中的信息，而这也显示出他和希特勒不同，他是一个勤勉的统治者，但事实情况当然并不全像他自己自夸的那样。他与希特勒一样，都有着超群的记忆力，特别是对细节问题——他曾对一个朋友说自己非常注意“小事情”，用他的话来说，“小得就相当于让你挠一挠头皮上的跳蚤一样”。如果你不在意这些事情，就会发生更加糟糕的事情。他有时也承认，他喜欢接待来访者，但这的确很浪费时间。*为每一次新的来访做准备成了墨索里尼的一项政务——如果墨索里尼知道年轻的知识分子们最新出版的书的名字，那么他们就很容易被感动。对于所有的来访者来说，如果他们被认可去做什么事情，当然通常他们要自己弄明白具体该怎么做，他们就会感到特别高兴。但是这么做也有危险，特别是当法西斯主义“神圣的”一面变得更加神秘和更具渗透性的时候。斯塔拉切禁止人们在见面时行握手礼，说它是守旧的、资产阶级的和英国式的礼节，但是墨索里尼却总是与来访者握手。**他还身着制服，站在威尼斯宫外的一个阳台上向满怀崇

* 他把这个数字也夸大了许多，说有数以十万计。一个反法西斯主义评论家认为，不断地接受来访是墨索里尼统治的基础。

——作者注

** 20世纪20年代，一个法国记者抱怨说她必须行5次罗马式的敬礼才能到达墨索里尼的办公室，最后还要再向墨索里尼敬一次礼。

——作者注

敬之情的群众发表长篇大论的讲话，俨然是一个军事领袖。*但是在办公室里的时候，墨索里尼会咯吱咯吱地啃个苹果，穿一件已经磨损的蓝外套或者干脆就只穿件衬衫，当有来访者进来的时候，他还会摘掉眼镜，此时的法西斯领袖也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了。正如一个头脑清醒的年轻来访者描述的那样，当他见到墨索里尼从事日常工作的时候，他感到自己“被领袖神秘的形象欺骗了”。

作为一个纯粹的感召力的载体，“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让人们到窗户前来观看游行”也有它不可靠的一面，而墨索里尼有时也很希望能够少一些公共活动，多做一些“决策”。从这一点来看，埃塞俄比亚战争胜利之后的几个月显示出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国际政治的复杂性。1934年的时候，墨索里尼还相信欧洲的平静状态能够维持到1937年，但事实证明他有些过分乐观了。1936年7月17日，西班牙军队中的一些将军发动了一场针对该国民主政府的政变。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场政变导致了长达3年的可怕的内战。许多同时代的人都认为，这场冲突是左翼和右翼之间的一场直接的战争，也是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或者自由民主与教会、军队以及国际法西斯主义之间的一场血腥的战争。西班牙内战中主要的外国参与者就是墨索里尼的意大利。这种情况是怎样发生的呢？

至少就短期因素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正好是墨索里尼根据直觉进行决策的一个范例研究。从1931年西班牙君主制政体被推翻开始，法西斯意大利就成为了西班牙共和国的敌人的保护人。从西班牙新政府成立开始，墨索里尼就不断地对其进行诋毁：

“西班牙的共和政体并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个剽窃来的东西，而且他们剽窃的还是150年以前的东西。在今天，建立一个议会共和政体就像是在一个使用电灯的年代里还在使用油灯。”

在那之后，许多右翼的异见分子都能够享受到来自罗马的补贴，而像瓜里利亚（1932~1935年任意大利驻马德里大使）这样的职业官僚和巴尔博这样的法西斯高层领导也都有机会充当国外那些需要他们并对他们心存感激的人的保护人。类似的做法最初并非直接源于墨索里尼，在他看来，西班牙只不过是一个既偏远又落后的国家，不管对国际法西斯事业还是对意大利的国家利益来说都没有什么重要意义。**此外，1933年的时候，罗马出现了一些极端主义分子，他们更喜欢

* 帕农齐奥注意到了领袖是如何了解在西班牙的军事进展情况的——意大利旅游俱乐部送给他一张地图，他在这张地图上标记军事行动的进展情况。

——作者注

** 墨索里尼一向习惯在外交文件上画线批示，但即使在西班牙发生内战之后，他也没有在有关西班牙的报告上批示过，很可能他根本就没有看过这些文件。

——作者注

柏林的新型独裁体制而不是旧的独裁体制，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韦拉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的父亲是前独裁者以及“诗人法西斯”和长枪党的“领袖”，他倒是非常崇拜旧的独裁体制。瓜里利亚鼓励小普里莫·德里韦拉去拜会一下墨索里尼，但两个人一直没有见面。但即使如此，在意大利每月通过其新大使奥拉齐奥·佩德拉齐给西班牙的被保护人的1000西班牙银币中，何塞·安东尼奥仍然能够从中盘剥相当一部分。

1936夏天的时候，尽管西班牙共和国政府严阵以待，但意大利的外交官们仍在关注有没有可能发生一场叛乱，而他们当时与弗朗切斯科·佛朗哥之间并没有联系。后者当时是驻西班牙军队的司令，虽然有很大的偶然因素，但他命中注定将成为一个“新西班牙”的元首。7月13日，右翼政治家何塞·卡尔瓦·索洛特被杀，佩德拉齐当时正在圣塞瓦斯蒂安这个风靡一时的度假地中的他的避暑寓所里休养，听到这个消息，他大受鼓舞，甚至预测很快就会有一个宣言出台了。但是，当西班牙真正发生叛乱时，意大利人还是吃了一惊。但佩德拉齐还是给罗马的新部长发去电报说，他敢保证任何军事独裁政府都将“明显地持合作的态度，并且会坚决镇压颠覆和破坏活动。”

是佛朗哥自己向罗马提出了请求。7月19日，他派特使路易斯·博林到了罗马。另一方面，他还请求意大利驻丹吉尔的军队借给他飞机以协助他把军队运过直布罗陀海峡到达欧洲的西班牙。西班牙流亡在外的国王阿方索十三世——西班牙的君主制主义者也在与意大利密切联系——也直接给墨索里尼发去了请求。让佛朗哥感到气愤和厌恶的是——他为罗马的“政治近视”而悲叹——虽然缺乏经验的齐亚诺曾在是否给他一些帮助这一问题上有些动摇，但在最初，意大利当局还是拒绝了他所有寻求帮助的请求。

在与意大利代表谈话时，佛朗哥热情洋溢地声称自己决心建立一个“法西斯类型”的政府。不管是不是被这种承诺所打动，齐亚诺最终同意可以为他提供飞机，但他希望佛朗哥能够提前支付租金。另外，他还急切地要求驻西班牙的代理人对这场颠覆运动成功的可能性的进行大小进行评估。在形势还没有完全明朗之前，意大利就得到了关键的秘密信息，说法国将允许私下向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出口武器和物资，因为这个政府本身就像法国政府一样是一个“人民阵线”^{*}。据说，当有人建议当时的法国总理利昂·勃鲁姆与墨索里尼接触一下时，他草率地声明：“我拒绝与杀害马泰奥蒂的凶手打任何交道。”而墨索里尼也通过《意大利人民报》对此做出了回应，粗暴地把勃鲁姆谴责为“一个没有预见天赋的犹太人”。

^{*} 人民阵线，左派与中间派政党为反对法西斯等共同敌人或实现社会改革而建立的，通常为临时性的。尤其指1936~1939年的法国人民阵线。

于是，意大利的飞机开始从位于萨迪尼亚的机场起飞飞往西属摩洛哥。这段距离在今天看来不过是一步之遥，但罗马很快就得到报告说，12架飞机中只有9架到达了目的地。另外3架中有一架栽入了海里，两架在法属摩洛哥坠毁。这两架飞机的飞行员被抓，并且很没有英雄气概地招认了他们的行动计划。本来，在埃塞俄比亚战争时法国媒体就把墨索里尼描述为“国际强奸犯”，这下更是惹恼了法国媒体。而法西斯媒体也是以牙还牙，一向敌视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天主教會的报纸也趁机加了进来。在没有明确的决策过程，也没有对财政、政治和经济成本及其影响进行严肃的评估的情况下，法西斯意大利就开始干涉一场外国的内战了。在所有的外交史上，这种行为都不会得到认可，也是军事顾问们所反对的。7月21日，马里奥·罗阿塔就有预见性地对墨索里尼说：“西班牙就像是一片流沙。如果你插手的话，很多事情都会随之而来。如果事情发展得不好，他们会责怪我们，如果事情发展得很顺利，他们也会把我们忘记的。”但是，他的这些建议很快就成了过眼云烟。8月初的时候，意大利和德国的专家们已经就向佛朗哥领导的起义军提供汽油这样的细节问题进行会谈了。到了10月份，当佛朗哥的军队开始向马德里发动一次不成功的攻击的时候，意大利的地面部队已经开始为他们提供支援了*——1937年年初，大约有5万名“志愿军”（缩写为CTV）在西班牙服役，这支部队就是所谓的“志愿军”，它还得到了大量昂贵的物资供应。1939年3月，佛朗哥最终艰难地取得了胜利，而意大利也是为此付出巨大代价的主要的外国势力。当时，官方的统计数字承认，死亡3819人，约有1.2万人负伤，损失了157辆坦克，总共花费了850万里拉。

一根无情的链条在逐渐缠绕墨索里尼，让他在国际舞台上回旋的自由越来越少，而参与西班牙内战只是这根链条中的一环。墨索里尼自己也发现，很多强制因素都让他不得不与德国的朋友合作了。其中一个起作用的因素是1937年3月的瓜达拉哈拉之战。一开始，法西斯军队就夸口说，只要他们稍加攻击马德里就会立刻陷落。但是事实上，意大利的进攻先是被阻碍，后来又被迫退。虽然只是部分失利，但也很容易勾起他们对卡波雷托惨败的回忆，以及外国人普遍对他们抱有的成见：意大利人都是差劲的士兵。有些评论家的嘴还不算太损，但他们也声称，对意大利战俘的审问“使有一点再明白不过了，即这支意大利部队中不仅包含有法西斯民兵，而且还有意大利的正规军。”意大利官方一直声称并没有正式干涉西班牙的内战，而这一事实恰恰是对他们这种说法的一个讽刺。埃塞俄比亚战争就让意大利背上了“当代最糟糕的特强凌弱者”的恶名，而他们在西班牙的行

* 相当典型的一件事是，意大利人最初在报告里说，鉴于意大利军队的威力，胜利就在眼前，首都马德里很快就会被攻陷。

动更是进一步确认了他们的这种名声。据说，就连西班牙的平民百姓也都把“志愿军”（CTV）的意思改成了“你们什么时候回家？”

西班牙将军贡萨洛·凯波·德利亚诺也评论说：“德国人的行为还是比较尊贵，他们避免炫耀和卖弄。但意大利人却喜欢吵吵闹闹，并且是霸道的恃强凌弱者。”墨索里尼也认为这次失利是对他个人的一次羞辱，他在1937年3月对格兰迪说：“除非哪天报了瓜达拉哈拉之战的军事和政治之仇，否则我不会从西班牙撤回一兵一卒！”他还残忍地命令把意大利在押的“赤党分子”一个不剩地全部枪毙。但实际上，意大利在宣传上也遭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在马德里外围获胜的西班牙共和国的部队中，有一支由意大利人组成的“加里波第旅”，这是一支由支持左翼事业的反法西斯人士组成的部队。他们之所以起这个名字，是为了向法西斯版本的历史发动挑战，并把意大利复兴时期的英雄作为他们事业的象征。据后来的历史学家们考证，有3354名意大利志愿者参加了抵抗佛朗哥的斗争。他们用爱国的民主社会党人士卡洛·罗塞利的一句口号来激励自己：“今天在西班牙，明天就在意大利”。卡洛·罗塞利是一个反法西斯运动的领导人，这个运动的基地位于巴黎，名叫“公正与自由”。在意大利国内，有组织的反抗法西斯政权的运动力量还很弱，一方面是因为博基尼一直对此进行着密切的监视，另一方面，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的胜利对他们也起到了压制的作用。从自身来讲，这些运动也因为在意识形态上产生争论而分裂成了多个派系——来自撒丁岛的激进的埃米利奥·卢苏属于右翼派别，他认为，就意大利的反法西斯人士而言，西班牙共和国的确需要他们，但是他们自己有更多的理由到西班牙去。不管怎样，一向对民众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反法西斯倾向都极为敏感的墨索里尼对这个消息的理解是：真正的反对仍然存在，并且非常可怕。

他随后就采取了相应的行动。1937年6月9日，罗塞利和他的兄弟内洛在法国的诺曼底驾车行驶时被法国的一个法西斯组织的成员堵截，然后被残忍地刺死。战后一系列复杂的审判表明，应当对罗塞利兄弟之死负责的是齐亚诺和他的密友及助手费利波·安富索。虽然很难宣布墨索里尼本人与此事毫无关系，但确有一些目击者否认墨索里尼直接参与了此事。从一方面来讲，暗杀行动是法西斯在建立“极权主义国家”之前常用的一种根除敌手的方法，而暗杀罗塞利兄弟也只是这种方法的再一次发作。从另一方面讲，这件事也证明厌世的、三十多岁就过早当权的资产阶级也有可能策划出像法西斯小分队所干的那种无情的暗杀行动。不管怎样，这一事件也显示出，任何人如果认为自己是“效忠于领袖”的，那么他的野性肯定不会隐藏得很深。

然而，所有的事情都是相对而言的。一个并不太可靠的名人在1937年声称，与其他一些罪恶相比，西班牙人的残忍非同寻常。就在瓜达拉哈拉之战之前，墨索里尼派罗伯托·法里纳奇去了西班牙，一方面去见一见佛朗哥，另一方面

也是去调查一下那里民间的抵抗情况。但是这一趟西班牙之行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他发现佛朗哥“胆小而羞怯”，并且明显“缺乏一个真正的军队司令的素质”。更糟糕的是，他警告说，这位西班牙元首在意识形态上并没有做任何准备：

“关于西班牙的未来应当是一个什么样子，他没有任何明确的概念。他感兴趣的只是如何赢得战争，然后在一段长时期内如何建立极权主义政府，或者说得更好一些，如何建立一个独裁政府，并且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清洗，把那些与‘赤党分子’有过任何接触的人——不管是直接或者间接的接触——统统清洗掉。”

佛朗哥不懂什么社团主义，也无意去收买工人阶级。他与意大利的友谊可能也相当虚假，他自己也没有放弃残余的崇拜英国的思想。他领导的叛军打起来并不着急，战争中每天的死亡人数骇人听闻，但他对此态度却非常冷漠。法里纳奇总结说，“说实话，赤党分子与民族主义者同样残忍。这是一场屠杀的竞赛，几乎成了一项运动了。”但是，你从西班牙人那里也同样能够看到这种残忍。埃米利奥·莫拉看起来好像要比佛朗哥聪明一些，但也兴奋地说如果他打赢了战争，就要消灭“100万赤党分子”。法里纳奇这位克雷莫纳的法西斯头目担心，意大利会被拖入一个险象环生并且无法估计的世界，并且这个世界与意大利自己的价值观是如此不同。

瓜达拉哈拉之战的失利之所以让墨索里尼如此恼火，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这次战役进行期间，他正忙着在利比亚进行一次胜利之旅，这是他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这个殖民地，这个殖民地帮他成就了一个完整的帝国。1937年3月18日，在的黎波里的一个仪式上，他拔出了“伊斯兰教之剑”，承诺说法西斯主义将保护穆斯林群众，并将帮助使伊斯兰教获得更大的发展。那么，在攻陷亚的斯亚贝巴之后，在法西斯帝国里发生了哪些事情呢？

1936年7月，墨索里尼任命格拉齐亚尼元帅为“埃塞俄比亚总督”，并指示他“对反叛者和平民中任何支持他们的人采取有计划有步骤的恐怖和灭绝政策”。6个月之后，墨索里尼感觉可以宣布他已经“完整地占领”埃塞俄比亚了，他夸口说，“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伟大的远征”是一个“由热情、军事科学和政治技巧完成的杰作”，并且现在已经赢得了胜利。但是，墨索里尼这次讲话又没有选好时机。1937年2月19日，当意大利的一些官员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仪式庆祝皇太子翁贝托喜得贵子的时候，埃塞俄比亚的游击队向人群中扔了十几枚手榴弹，至少有30人被炸伤，格拉齐亚尼也在其中。当地的法西斯头目圭多·科尔泰塞气急败坏地对他的下属们说，他们有3天时间“对埃塞俄比亚进行摧毁和剿杀，或者干任何想干的事。”据估计，在这次大屠杀中死亡的人数在3000至3万人之间，而殖民主义的历史告诉我们，3000人这个数字肯定是被低估了。德布拉莱布拉诺斯修道院是埃塞俄比亚一个“神圣的”寺院，法西斯不仅煞费苦心地理杀

了里面的僧侣，还纵火烧毁了藏在那里的有关埃塞俄比亚历史的珍贵档案。

法西斯随后还打算对埃塞俄比亚进行灭绝种族的大屠杀。格拉齐亚尼可能有此打算，但却及时地被墨索里尼劝阻了。事实上，在暴怒之后是更长时间的平静。1937年12月，身为皇家军官学校领导的奥斯塔公爵阿梅迪奥取代了格拉齐亚尼埃塞俄比亚总督的位置，这多少让人有些吃惊。奥斯塔公爵赞成与周围的英属殖民地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当然他对埃塞俄比亚的统治也带有更多英国的和军事的色彩，而不是狂热的法西斯主义色彩。来到这里的一些意大利官员也急切地强调他们职业选择的正确性，并把自己与那些他们认为是“腐败、野蛮和无能”的“法西斯分子”区别开来。墨索里尼自己的态度也很有特色，他任由事情继续这么发展下去。

事实上，当时并不是适合埃塞俄比亚“发展”的时期。到1941年的时候，只有3200名意大利农民移民到了埃塞俄比亚，并且，尽管法西斯政府已经尽了最大可能来削减政府开支，但他们在埃塞俄比亚的经营仍然是亏本的。更加诚实一些的殖民地官员很快就注意到，当地人比那些殖民地的“拥有者们”更了解殖民地的任何情况。在埃塞俄比亚人烟稀少的腹地，相邻两个城镇之间都没有可靠的通讯，更不用说与罗马的通信了。像其他深入非洲腹地的城市官僚一样，这些为法西斯政权服务的官员们不得不在这样一个复杂而令人困惑的世界里勉强度日。

最直接而诚实地向墨索里尼汇报有关新帝国的失败之处的人仍然是法里纳奇。他先到意属东非（包括厄立特里亚、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旅行了一趟，回国之后，1938年12月，他给墨索里尼写了一篇长达10页、让人看了灰心丧气的报告。在报告开始他就写到，对于那些从国内移民到埃塞俄比亚的意大利人，他们的实际状况和政府对他们的承诺之间有着很大的差距。那里的官员们从事的唯一严肃的活动就是背后恶意指谤和中伤，每个人都这么讲：“真希望墨索里尼能够知道和看到这里正在发生什么事。”浪费和腐败已经成了一种地方病。“太多的人，太多的公司都在罪恶地吸取祖国母亲的乳汁。”官员们的生活极尽奢侈腐化，而一般的移民和士兵却被迫与埃塞俄比亚人同住在破旧的小茅屋里。“迄今为止，就预算事务而言，我的印象是，那儿是没有人明白的，或者说他们也不想明白什么。”应该把类似沃尔皮和奇尼这样的专家派到那儿去评估一下存在的问题，我们没有理由乐观。“如果所有的人还都告诉你情况非常好，他们实际上是对您和您不知疲倦的工作的最大的背叛。”如果法里纳奇说的话是可信的，那也就是说在这片罗马军

* 据称，选他来接任格拉齐亚尼是亚历山德罗·莱索纳的主意。他幼年时曾在一个苏格兰学校里读书，但据说他不喜欢那里的食物，也不喜欢冷水浴和橄榄球。

团以前从未踏上过的土地上，意大利还没有真正开始建设一个帝国。

法里纳奇汇报的有关腐败、剥削和内讧的消息应该不会让墨索里尼感到吃惊。其中一个想从帝国获得利益的人是来自普雷达皮奥的费迪南多·博阿蒂尼。秘密警察对他的调查表明，他在1936年才加入法西斯党，并且很快就去了意属东非。在那里，他组织做起了皮毛生意，并通过与拉凯莱·墨索里尼和埃达·齐亚诺的关系为自己的生意铺平了道路。1937年4月，博阿蒂尼通过与她们的关系购买到了4辆菲亚特卡车用在国内运输货物，心存感激的他还送给她们每人5张上等的豹皮作为回报。据说博阿蒂尼做皮毛生意的赢利高达300万里拉，但其中他自己最终得到的只有50万里拉，剩余的250万里拉都分给了帮助过他但同时又非常贪婪的关系人。战争开始的时候，博阿蒂尼也非常清楚自己该如何应对。1941年1月3日，接到征召令的他在5天之内就把自己舒舒服服地安置在了博洛尼亚的医院里，并且在1月18日之前就设法彻底解除了自己的征召令。他一直紧抓着与拉凯莱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在1942年夏天也进一步得到了利用。当时，宪兵在清剿普雷达皮奥一个非法赌博集团时把博阿蒂尼也逮捕了，但是“拉凯莱女士阁下”干预了此事。于是，那位热心逮捕博阿蒂尼的警官立即被从弗利调到了位于巴勒莫以外卡法卢的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任职，他的命运的确不幸。

那时，经常有有关腐败的报告送到墨索里尼的办公桌上。1937年，最为公开的一份有关腐败的报告最终引发了德博诺和莱索纳之间的一场激烈的争吵。这两个人都当过殖民地部长，莱索纳当时已经成为法西斯意大利的一个非常显眼的重要人物了，但仍有许多有关他从事可疑交易和行为不轨的传闻，还说他与国王圈子里的人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另外，人们认为正是他向墨索里尼施压以放弃德博诺，并支持巴多利奥接替他担任埃塞俄比亚驻军司令的职位。莱索纳对博阿蒂尼的公开攻击导致后者向墨索里尼请求帮助，并且毫不隐瞒地揭露了法西斯政权中的“保护人—代理人”关系。争论最多的是有关修建从马萨瓦到阿斯马拉之间的公路的合同问题，莱索纳声称德博诺在其中有腐败行为。愤怒不已的德博诺给墨索里尼写了大量的信件来表明自己的正直，并请求领袖干预此事为自己做主。1937年2月，墨索里尼通过一个声明做出了回应：

“我确信意大利元帅德博诺是值得信任的。任何人胆敢对他进行诽谤和中伤，我都将严惩不怠。如果说修建马萨瓦到阿斯马拉的公路时没有按照正常的官方程序进行招标的话，那也是出自我的命令，因为为了赢得战争很多事情都必须尽快处理。”

他又补充说，至于工程超支的问题，那只能怪相关的部门“太有能力”。

不管怎样，这场争执在墨索里尼的英明干预下终于结束了。1937年7月，曾经在马泰奥蒂谋杀事件期间担任法西斯警察头目的德博诺给墨索里尼写了一些直言不讳的信件。他满心气恼地说，他等了又等，但是现在：“我感觉被人当成了一

个傻瓜，而正是你把我当成了一个傻瓜并且利用了我的善良。”他又继续写道：“我是那么无限热情地为你献身，我已经对我的感情有所节制，但我仍然确信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现在，我的杯子却被打翻了，我再也无法继续忍受下去了。我已经低声下气地喝了太多的橄榄油，并且已经患了肠炎。够了！”像莱索纳这样“卑鄙可耻和粗野险恶”的人策划出这样的阴谋诡计本来也在意料之中。但是，也许墨索里尼必须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我的血管里没有一滴奴性的血液，并且，在我的心中和个性里也没有害怕的种子。我再向你重复一遍我曾经说过和写过的话：我什么事情都不怕，也不怕任何人。我也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并且，你也不应当对我能够做出的事情感到吃惊。”德博诺树敌颇多，在莱索纳背后，真正操纵这件事情的人是巴尔博和德韦基。但是，德博诺再一次提起了马泰奥蒂事件，这让墨索里尼不得不关注他的问题：

“正是你负有照顾我的职责，因为我一直都是属于你的一个人。如果你坐视不管，那么我将用一种最安全和最方便的途径来为我自己寻求公正。你最好不要对此产生什么怀疑，我觉得合适的时候会这么干的，而且到那时我可就只考虑我自己的利益了。”

正如他后来在一封信里重申的那样，如果事情不按照他的思路发展，墨索里尼将会看到一个“好的”德博诺是怎么样“变坏”的。

虽然德博诺并没有明确具体地说明这些威胁——墨索里尼对一个熟人说德博诺是一个上了年纪又心怀愤怒的大老粗——但这些威胁还是产生了一些效果。莱索纳被降职成了一个部长，并且退居罗马大学做了一个政治学教授。他后来申请被封为贵族，但这一请求也被拒绝了。警察在窃听他家里的电话时听到他妻子抱怨说，他们家不得不辞退用人和厨师，并且面临着穷困。尽管莱索纳也试过直接向领袖提出抗议，但是他命中注定最终也没有被恢复职务。

在这场冲突最严重的时候，秘密警察向墨索里尼提交了一份报告，说意大利的精英分子们对此事的态度是“令人厌恶的麻木不仁”。但是，在墨索里尼看来，这件事恰恰进一步证明了人性的弱点和罪恶。墨索里尼一直都深信，这个世界上的人可以区分为“朋友”和敌人。他在发表即席讲话时很喜欢把别人定义为“朋友”，这个定义的弹性还非常大，可以把皮斯托亚公爵、普雷齐奥西、E.M.格雷、沃尔皮、画家马里奥·西罗尼和埃兹拉·庞德等其他许多人都包括在内。但是，秘密警察的报告也一直在提醒墨索里尼，并不是所有的“朋友”都是那么忠诚可靠。例如，巴尔博从利比亚回到国内的一段时间里，住在罗马的一个豪华旅馆里，秘密警察窃听了他的电话，听到他对所有的事情都牢骚满腹：从法西斯在西班牙的野蛮残忍到社团主义国家的种种弊端。他说，实际上，在社团主义国家里，占主导地位的官僚们的精神世界与真正的工人是相去甚远的。巴尔博还补充说，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问题在于官员们都是由上层任命

的。“我非常坦率地告诉你们，我更支持进行选举，这是有很多理由的，包括从公共秩序的角度来考虑。选举就像是一个温度计，可以用它来衡量公众精神的温度。”在许多人的眼里，这位利比亚总督与齐亚诺一样有可能成为领袖的继承者。但如果他说的这些话是他的真实想法的话，那么他就恢复成了一个自由主义者了，而不再是法西斯革命的执剑护卫者了，倒更像是一个为领袖卖命的人。警察不断地向墨索里尼提交类似这样的或者其他的报告，*再加上他几乎每天都要和故意做出玩世不恭的态度的博基尼见面，这也难怪墨索里尼会深信“人是可笑的动物”，而找到一个好人就像是“买彩票中了奖”一样难。同时，也难怪他会一边继续做着统治这个国家的工作，一边却在私下里怀疑他的法西斯政权是否真的已经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态度。与把极权法西斯主义的教条灌输给意大利人这一任务相比，不管是多么复杂和险恶的国外事务，墨索里尼处理起来都有一种解脱和放松的感觉。

墨索里尼在1934年12月30日发布的指示中曾经承诺过，一旦征服了埃塞俄比亚，他的注意力就会立即转回到欧洲来，但是这时又有新的国际危机发生了。**当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的消息占据了意大利报纸的头条的时候，德国，纳粹德国又怎么样了呢？它是不是还在计划吞并奥地利？“普遍适用的法西斯主义”又怎么样了？是不是像墨索里尼吹嘘的那样，意大利的模式将成为统治20世纪的政治体制呢？

就最后一个问题而言，倒是有不少值得乐观的理由。当时，右翼独裁政体已经不再限于意大利一个国家了——事实上，当时在欧洲，除了英国和大西洋沿岸从法国到瑞典的几个国家以外，就剩下捷克斯洛伐克这一个国家在表面上还有一些自由和民主的特征了，但是1938年至1939年间，捷克也被出卖了。1936年8月，扬尼斯·梅塔克斯这个新的独裁者在希腊掌了权，在王室的认可下，他对自由主义的立宪主义置之不理。墨索里尼也非常急切地向他的政权表示支持，同时也建议并敦促他尽快做到以下几点：

1) 创建一个单一的执政党；2) 成立一个单一的希腊青年组织；3) 创建一个经过法律确认的单一的雇员和工人组织，并且让他们签订一个有法律依据的集体

* 这些报告中有明显的有关巴多利奥和他的家人的腐败和虚荣的证据。这位将军非常坚定地想成为亚的斯亚贝巴公爵，他还设法从政府的各个机构截流了300万里拉用来在罗马建造一所富丽堂皇的宅邸。

——作者注

** 阿切尔博给墨索里尼写了一封长达14页的信，提醒领袖让意大利成为一个欧洲强国是一件多么紧迫的事。

——作者注

劳动合同；4）按照意大利的模式创建一个业余俱乐部组织。*

当然，要想解释“法西斯主义”，会遇到很多复杂的情况。但在1936年，作为墨索里尼版本的对于他的理念和“革命”的解释，上面这个简单的模式（当然还要加上一个身为独裁者的领袖）还真的被接受了。

墨索里尼还建议奥地利也采用这一模式。但是，舒施尼格与多尔富斯不一样，他从未像多尔富斯那样热情地对意大利表现出友好的态度，并且，意大利实际上也不希望奥地利真地成为一个完全“极权化”的国家。即使是亲德国的苏维克也在1936年7月离任前对意大利的外交选择进行总结时承认，奥地利的情况是“困难的”。1936年6月初，墨索里尼在卡米内特城堡里接见了舒施尼格，并向他保证“意大利对奥地利问题的立场没有改变”。他还警告说，舒施尼格的支持者与奥地利的纳粹支持者之间的过于热乎的对话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同时，墨索里尼还通知英国，意大利和德国的关系因为一些事件的推动看起来有所解冻，但英国不必为此感到惊慌。但是，这两个独裁国家之间的关系的确在发生着改变。在接见舒施尼格之后，墨索里尼的态度有了一个180度的改变，他立即通知意大利驻柏林大使说，他现在“在很大程度上”支持奥地利与德国之间通过一个“权宜之计”来解决问题。做出这一结论是正确的，因为德、奥这两个日尔曼国家已经在7月11日达成了和解，舒施尼格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命运，即眼看着自己的国家更明显地被纳入纳粹德国的势力范围内。

鉴于这一前景，英国的领导层，尤其是伊登在承认意大利征服埃塞俄比亚这一问题上又非常勉强，**所以墨索里尼不再像以前那样积极地促成一个反德战线了。一个官僚有些扭曲地形容说：“元首和领袖这两个美人正在互相进入对方的力场***。”的确，墨索里尼一直在向任何愿意听他说这句话的人说，让别国承认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吞并是眼前要做的事，因为这样才能让意大利人满意。但是，事实上可能就在同时，他又向法西斯政权的官员们发表演讲，有必要再次点燃由赢得战争而激发起的那种精神，并且强调要“最大可能地发展我们的经济专制政策。”1936年9月，墨索里尼对奥地利的外交部长说，因为德国没有加入

* 墨索里尼在给德罗西的信中敦促佛朗哥确保他的“极权主义政府”还要有“平民性和社会性”。

——作者注

** 根据墨索里尼与哈塞尔的会谈记录，墨索里尼当时再次重申支持一个“权宜之计”，但是同时要求德国推迟单方面承认意大利占领埃塞俄比亚。根据墨索里尼与弗兰克后来的谈话记录，墨索里尼态度不那么蛮横地劝说德国不要突然承认意大利占领埃塞俄比亚。

——作者注

*** 力场，在整个范围内可通过单一媒介——如电流——产生的可操作力的空间区域。

——作者注

制裁意大利的集团，所以意大利和德国的关系已经得到了稳步的改善。现在，两国在国际舞台上正在更多地取得“一致”。那么这种情况能够持续多久呢？墨索里尼回答说，那要取决于英国了，因为鉴于法国的国内危机，目前与它进行对话已经不太可能了。当时，意大利还在担心英国和德国会不会达成什么协议，但是西班牙问题进一步强化了罗马和柏林之间的这种“一致”（墨索里尼再一次使用了这个词）。“在西班牙，德国和意大利的行动是一致的，双方都支持佛朗哥式的革命。”月底的时候，他的这种感觉进一步加深了。纳粹建议墨索里尼访问德国，他也认为对德国进行一次正式的官方访问对他会很有好处。他推测说，应当对这件事“广泛宣传，因为它代表的是有着相似的运动和哲学的两个国家的领导人之间的会面。”必须为这件事做好充分的准备，因为它将“不但标志着两个政权之间的团结，而且标志着两国将奉行共同的政策，这种政策必须要对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都描述清楚。”*

实际上，最先访问德国的是齐亚诺，他当时正积极而热情地提倡与德国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10月24日，齐亚诺在贝希特斯加登拜见了希特勒，两人在出卖英国和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方面一拍即合——齐亚诺还带来了一份由意大利特务机关准备的档案以证明英国对德国纳粹政权心存恶意。齐亚诺表示，现在是意大利和德国“更加主动”和“更具进攻性地”对付自由民主国家的时候了。他说：

“地中海就是一个意大利海。未来对国际平衡的任何修正都必须向有利于意大利的方向倾斜。所以，德国也应当拥有向东面以及向波罗的海国家采取行动的自由。我们两国各自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力，这样就能够避免我们自己之间发生利益冲突。”

齐亚诺并没有什么经验，虽然有些厌世的态度，但也很容易沉迷于成名，他在这件事上走得太远了。而且，他的岳父墨索里尼并没有阻止他。相反，11月1日，在米兰大教堂外面搭起的一个讲台上，墨索里尼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讲：德国和意大利两国达成的“协约”“不是一个隔膜，更像一根轴心，所有希望协作与和平的欧洲国家都可以随之旋转。”他又补充说，英国必须同意，虽然地中海可能是它通往印度的通道，但对于意大利来说，它代表着“生命本身”。意大利无法忍耐在那里处于一种窒息的状态。反对共产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都成了他的格言：“我们不是那种留恋过去的人，我们是愿意参与未来的人。”法西斯主义正在建设一种“真正的劳动文明”，社团主义体制很快便将“完全实现”。

对于1936年年底时意大利或者说墨索里尼在外交方面的所作所为，历史学家

* 根据墨索里尼与弗兰克的谈话记录，当时墨索里尼趁机敦促纳粹不要那么热情高涨地反对天主教，他警告说，反对宗教就像是反对云雾一样。

们有着不同的理解。意大利外交界的历史学家们易于受到旧的或者是新的民族主义的影响，他们认为德国和意大利两国之间的和解是“现实主义”的结果，相比之下，它更反映了对传统的国家利益的追求，而不是意识形态的相似性或者独裁意志的产物。相反，麦格雷戈·诺克斯则认为，这个“轴心”正是墨索里尼最迟从1936年1月就开始“积极努力实现的目标”，而且是他实现“打破欧洲平衡”并建立“意大利—德国革命联盟以对抗西方”的难以遏制的目标的一部分。

然而，有证据表明，所有这些观点都太过极端。的确，意大利当时是在试图恢复与纳粹德国的和睦关系，也在一次次地试图改变现状。1937年至1938年间，墨索里尼和齐亚诺一直很高兴地在偷偷发放补贴给比利时的法西斯党——列克斯党，以及马耳他、埃及等其他更多英属国家里反对英国的民族主义者。他们还继续支持南斯拉夫国内的克罗地亚恐怖分子，还企图把阿尔巴尼亚从一个接受意大利保护的国家转变成一个被意大利直接统治的国家——1936年，墨索里尼却把它定义为“意大利的一个还没有派驻官员的省份”。*他们还傲慢地说瑞士没有什么光明的前景，并且说提契诺河具备的全是意大利的特征。**谈到英国人，墨索里尼说他们都是“用屁股来思考问题的人”；而美国则是一个“黑鬼和犹太人的国家”，让他们真正地互相理解是根本不可能的。谈到这些，两人一起放声大笑。他们俩还一致同意，意大利必须通过经常投入战争才能保持良好的状态，而当地的资本家们更喜欢保护他们的利益，绝不会像英雄一样去考虑战争。

他们俩这可并不仅仅是闲聊。尽管有时候对佛朗哥的拖拉、忘恩负义和残忍也颇有微词，但意大利仍然是介入西班牙事务最深的国家。由于参与西班牙内战以及进行的一些其他活动，在1935年至1938年间，意大利的军事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与德国一样多，大约相当于英国和法国的两倍。从1934年到1940年，军事和殖民地方面的预算占到意大利政府开支的51%。此外，墨索里尼在许多场合也强调说他决心避免“像跳华尔兹时那样的向后转”——他用这个词来形容意大利自由党政府在1914年以前的外交政策的反复无常。

但是同时，虽然说了这些张扬的大空话，意大利的外交政策仍然有波动。意大利此时是在狂热地反对共产主义吗？也许是。当然，在与德国人打交道时，墨索里尼、齐亚诺和法西斯其他的高层人士都不会忘记这样说。另外，苏联的大清洗运动也的确提醒墨索里尼把苏联谴责成为一个“充满饥荒和恐怖”的地方，一个只有“白痴”才会向往的地方。直到1936年，意大利和苏联之间都保持着相对

* 齐亚诺在他的日记里夸口说，他已经积累了高达6000万的秘密资金来促进这一进程。

——作者注

** 早先，他们还讨论过为了进攻法国，可以不顾瑞士的中立立场。

——作者注

良好的双边关系。但是，1937年11月6日，好像是为了证明自己新的国际反共立场似的，意大利与德国和日本一起加入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意大利与苏联的关系也有所冷淡。就在几个月之前，法西斯的媒体还在讨论苏联是不是正在朝着民族主义、社团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的方向演化，现在这些讨论也停止了。即使这样，意大利和苏联之间保持亲善的关系也是可能的。很明显的一点是，当里宾特洛甫*到罗马来商讨意大利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一事时，墨索里尼与他讨论最多的不是苏联的问题，而是西班牙、奥地利和地中海的问题。法西斯意大利的确是反共联盟的成员之一，但是意识形态并不是它加入这一联盟的唯一动机。**

那么意大利当时是否已经成了大英帝国的不共戴天的仇敌了呢？从墨索里尼与齐亚诺的谈话来看，意大利好像已经“不可避免地”加入了反英集团。早在1936年4月，墨索里尼就对格兰迪说，对意大利施加的制裁运动让意大利人对英国产生了深刻的仇恨，“现在，我们要用武力和外交两种途径来推翻任何企图阻止我们的人。”这个“轴心”就显示了外交应当被引向何方。同样，与伊登的争吵也是非常激烈，并且也是针对个人的（双方都是这样）。就在德国吞并奥地利前夕，身为外交部长的伊登下台了，墨索里尼和他的同事们拍手称快。1937年5月，内维尔·张伯伦接任英国首相的职务。与张伯伦打交道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格兰迪、齐亚诺和墨索里尼已经在准备着听类似律师阿德里安·丁格利和保守党官僚约瑟夫·鲍尔这样的代理人向意大利发出的绥靖的声音了。据格兰迪说，张伯伦已经表示希望通过一个“极权主义的方案”来解决英国和意大利两国的争吵。这位首相亲自直接给墨索里尼写信，表示希望签订一个协定。他还说，他的哥哥奥斯丁一直认为墨索里尼是“一个很好的交易伙伴”。

作为回应，墨索里尼也准备做出退让，说两国之间并没有很深的利益冲突，“不管是在地中海还是在其他地区”。当时，两国之间虽然没有签订一个协定，但也没有排除这种可能性，而意大利也仍然是介入西班牙事务的大国中最狂妄自大的一个。1937年1月，英国和意大利签订了一个旨在限制干预的协定，但却取了一个不太恰当的名字——“君子协定”，而意大利明显没把它当回事。此外，意大利还在12月宣布它有意退出国际联盟，而墨索里尼也批判说“被幕后势力操纵的

* 里宾特洛甫（1893~1946），德国外交家，曾任外交部长（1938~1945年），协助签署了1939年德国—苏联互不侵犯条约。“战后”在纽伦堡被宣判为战犯并被绞死。

——译者注

** 齐亚诺在日记中称，他当时在考虑能不能扩大这个联盟，从而把西班牙、巴西和波兰也包括进来，但纳粹德国永远都不可能欢迎波兰成为这个集团的一员。1938年2月15日，墨索里尼有了一个好主意，即让奥地利加入这个联盟以显示其独立自主性。

——作者注

日内瓦‘犹太教公会’对我们意大利和我们的革命持敌视的态度”。墨索里尼的用词变得更加喧闹和失控了，也更加纳粹化了。但是实际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收回的，英、意两个“传统的朋友”也会分手。两国未来的关系更大程度上将不是取决于它们各自的行动，而是取决于纳粹德国将在未来几个月和几年内在欧洲采取的行动。

1937年9月25日至29日，墨索里尼对德国进行了第一次正式访问，在此期间，他为意大利的新外交政策描绘出了最重要的蓝图。这次访问的高潮是墨索里尼用德语发表的一次演讲，虽然他说德语时有些结结巴巴的，并且那天还下着倾盆大雨，但在柏林，听他演讲的群众估计有80万人。他在演讲中谈到了法西斯和纳粹体制的共同点，用他的话来说，这两种体制是“当今世界现有的最伟大和最可信的民主”。德国人也想尽了一切办法来给这位意大利独裁者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他们成功了。然而，墨索里尼并没有做出什么非常具体的承诺，戈培尔只好发表评论说，每个人都必须“等等看”这次访问在长期内会对两国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墨索里尼回国后则宣称，他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确信“欧洲的未来属于法西斯”了。

那么，到1937年年底的时候，意大利在奥地利问题上奉行的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路线呢？毕竟，在墨索里尼和他的顾问们看来，德国吞并奥地利这一问题对于意大利的外交来说可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1936年11月的时候，墨索里尼就向他的内阁强调说，奥地利人对意大利有着一种“难以改变的”和“历史的”“仇恨”。意大利在奥地利的代理人好像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是感激。好像是要对此做出反应似的，1937年4月，当墨索里尼再次会见舒施尼格的时候，向他传递了一个矛盾的信息，说“意大利仍然寻求一个直接的政策以维持奥地利的独立和完整，同时还会通过罗马—柏林轴心来协调此事。”他又补充说，“欧洲的特点是根据在西班牙问题上的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共同点自动地形成了两个政治集团”。然而，在注意到了奥地利的教权主义后，他又改变了说法解释说，德国和意大利这两个极权主义国家在宗教问题上还是有所区别的：“我们信仰天主教，我们尊重它并且以此为荣。我们不接受种族主义理论，尤其是当它被赋予合法的结果的时候。甚至我们的经济学家也与他们的有所不同。”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真正毋庸置疑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有“共同的敌人”。

墨索里尼经常喜欢根据自己的听众的不同而精心选择不同的用词，他用的最后一个词也非常生动。这个词的意思并不是说意大利和德国的友谊只是由偶然因素造成的，因为当时，在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和其他国家，一些势力较弱但仍在策划夺权的法西斯运动的暴力和侵略行为极大地激发起了国际反法西斯运动。但是，这一点的确意味着，墨索里尼以及意大利领导层的其他人仍然没有明确地认可德国吞并奥地利。他们并没有认为这是为允许更进一步的侵略扫清了障碍。

相反，对于墨索里尼来说，奥地利和德国之间的关系是另外一个他闭上眼假装看不见的问题，但是他还是希望最坏的情况不会发生。所以，1938年年初，他对齐亚诺说，奥德联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希望能够尽可能地推迟这一进程。到了2月27日，墨索里尼还列出了许多相关的重要因素对奥地利问题进行分析，并且确信“奥地利保持独立是符合意大利的利益的”。但是他又补充说，这种利益还没有大到需要意大利利用军事手段或者通过“在政治上与德国完全反目”来加以维护的程度。既然意大利还没有能够阻止德国吞并奥地利的力量——有报告称奥地利国内有恐德症，墨索里尼对此仍然有着深刻的印象*——那么意大利就必须确保德奥联盟不会对自己造成损害。他有些不吉利地说：“勃伦纳山口会让德国人担心的，这种形势可能会产生敌对的结果。”虽然已经与德国建立了轴心，但意大利的外交仍然有多个选择方向。齐亚诺也听到了新南斯拉夫的铁腕人物米兰·斯托亚迪诺维奇的建议，并且聪明地评论说，意大利可以再建立一个“垂直的轴心”以平衡现有的“水平轴心”。

但是，事情的发展注定会突破这一框架。尽管包括戈林在内的许多人都承诺说，在没有事先征得意大利同意的情况下，德国永远都不会对奥地利采取行动，但是1938年3月10日，希特勒还是认为对奥地利采取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3月12日，星期六，一支侵略军越过了两国边界。就在前一天，希特勒给墨索里尼写了一封短信，说不对奥地利采取行动已经不太可能了，还说“如果意大利处在这样的位置”也会采取同样的行动。至于勃伦纳山口，希特勒声称它是德、意两国的永久性边界——“这并不是我在1938年才得出的结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我就是这么认为的，并且我从来都没有把这当成一个秘密。”对于希特勒这番话，意大利并没有做出什么反应，于是希特勒又给墨索里尼写了一封更短的信直截了当地说：“墨索里尼，这一点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第二天，墨索里尼很有礼貌地做出了回应，说他这种容忍的态度是考虑到两国之间的友谊，“是为德意轴心作出的贡献”。但是，他的同事却发现这些事情让他的脾气变得非常暴躁。墨索里尼还在议会下院发表演讲为德国的行动进行开脱，称这是“命中注定的”，但让人们感到困惑的是，他又敦促说：“对于我们法西斯来说，所有的边界都是神圣的，是不容讨论的，是必须捍卫的。”面对齐亚诺，他又坦白地承认说，虽然德国吞并奥地利是“不可避免的”，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有一点点高兴的意思。另外，他还说，德国在吞并奥地利之后，肯定还会进一步依次对捷克斯洛伐克、瑞士和比利时采取行动。未来虽然前途未卜，困难重重，但潜在地也有可能得到很多回报，所以意大利必须调

* 匈牙利领导人伊什特万·拜特伦在1月份曾对墨索里尼说，80%的奥地利人都是纳粹，其余的人也大都支持德国吞并奥地利。

整自己的政策来适应它。另外，墨索里尼还命令在短期内在意大利的东北部边界加速修建各种防御工事。那段时间，齐亚诺发现各种匿名信像炸弹一样飞向他和他的岳父，这些信件都是对德国吞并奥地利和意大利怯懦地接受此事表示悲叹。后来的一些评论家认为，意大利在1938年3月时已经失去了独立自主性，并且它的“真正的”法西斯主义的历史也已经走到了尽头。

危机一个接一个地发生，国际关系发展的进程也在不断地加速，而制造危机并搅乱局面的正是纳粹德国。美国大使威廉·菲利普斯向国内报告说，意大利在新时期的一个特征是，墨索里尼看起来正在失去英国，而他的世界也越来越被柏林限制住了。4月份，墨索里尼还在抱怨说德国的民族主义正在阿尔托—阿迪杰地区复发，还说如果这是由希特勒支持的话，那么他会看到德意轴心的“彻底崩溃”。之后，他又谈到，意大利还有可能与英国和解。意大利的一些记者可能接着强调说，如果德国吞并奥地利是“符合逻辑的”，那么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就绝不是同一类型的政权。但是，对于墨索里尼和他的政权来说，想通过一些微妙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是越来越不太可能了。

在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后，另外一场危机又接踵而至了。5月初，希特勒对法西斯意大利进行了第二次访问，与1934年相比，他此时可是一个赫赫有名的重要人物了。*但这样也有弊端——意大利宪法规定的元首是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为了让双方都满意，国王被硬塞进来陪同德国元首希特勒。据说，伊曼纽尔还没趣地问希特勒，德国士兵穿的步兵靴里有多少个鞋钉。更可笑的是，为了显示他对细节的了解，他告诉希特勒说意大利的步兵靴里一共有74颗鞋钉（其中鞋跟上有22颗，鞋底上有52颗）。1942年的时候，希特勒还回忆说，再没有比碰上那些可怜的马屁精更糟糕的事了。梵蒂冈对希特勒的这次访问也非常敏感，本来还安排了一个在圣彼得大教堂举行的双方的和解活动，但教皇庇护十一世不愿为被他谴责为“现代基督教和教会最大的敌人”的人再增光添彩，所以齐亚诺最终还是取消了这个活动。博基尼知道德国人曾笑话意大利在那不勒斯举行的军事展览，说那儿的四条腿的动物要比坦克的数量多。借希特勒这次访问的机会，博基尼也试探性地向那些他认为知道内情的人打听希特勒与爱娃·布朗**之间的关系。但是，一涉及稍微严肃的

* 博塔伊不太明确地解释说，德意轴心的关系之所以如此紧密，是因为它并没有过多地把意识形态方面的密切关系作为利益共同点。

——作者注

** 爱娃·布朗（1912~1945），阿道夫·希特勒的情人及后来的妻子。他们1936年开始同居，但他们的私通是秘密的，她从未和他在公开场合露过面。他们于1945年4月30日结婚，几小时后，两人双双自杀。

——译者注

问题——德国人暗示想与他们的“轴心伙伴”建立一个全面的军事联盟关系——意大利人就找出种种理由进行搪塞。

像1934年一样，从意大利一回到国内，希特勒就立即采取了行动，而这一次的牺牲品是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军队已经有了侵略捷克的计划，但是捷克人已经下定决心进行抵抗，德国人的计划落空了。墨索里尼告诉齐亚诺，他已经注意到希特勒访问意大利时在脸上搽了胭脂以掩盖他脸色容易发白的习惯，但是他还是迎合希特勒说与里宾特洛甫谈话是一个让人恼火的经历。墨索里尼还声称，如果爆发捷克战争，他将“立即介入战争并站在德国这边”。

当然，这一承诺只是口头上的。1938年夏天的时候，意大利人并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的德国朋友与捷克斯洛伐克人之间仍在继续的冷战上。8月19日，齐亚诺听说纳粹正准备在下个月发动军事行动，这个消息让他非常震惊。尽管墨索里尼长篇大论地反对“捷克——德国——波兰——匈牙利——鲁塞尼亚*——罗马——斯洛伐克”这一概念，但是当他在慕尼黑危机后期再次出现在国际舞台的中心时，他所扮演已经只是希特勒的副手的角色了。他也向齐亚诺透露了心里话，说如果爆发一场一方是德国，另外一方是苏联、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战争，那么他将保持中立。他又声称，要是英国介入的话，鉴于和它有着全面的意识形态的冲突，“法西斯意大利就不能再保持中立了”。他甚至在没有对问题进行仔细研究的情况下就说，他欢迎日本介入全面的危机，而不管这样会不会把美国也拖进来。同时，战争部副部长阿尔伯托·帕里亚尼也开始接受“闪电战法”了，主张“大规模地使用毒气”，甚至对付现代的防御工事也这样做。他和他的士兵们都没有想过要对这种做法的军事价值进行评估，更不用说政治价值了。实际上，对于墨索里尼以及法西斯领导层的其他人来说，幸运的是慕尼黑危机并没有引发战争。然而，这是墨索里尼作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政治家的最后一次表现机会，他成了最终实现和平协商的计划的渠道。但是齐亚诺注意到，他的上司在慕尼黑会议的最后几次讨论中情绪很糟糕，因为他“厌烦了他们那种含混不清的议会气氛”。

当墨索里尼从慕尼黑返回的时候，对此事进行报道的法西斯摄影记者使用了一张名为“欧洲的救世主”的照片。在欢迎他归来的群众中，一些真心的崇拜者在标语牌上写道：“领袖，您是人性博爱之父。”墨索里尼自己也声称，他带回国内的是“公正的和平”。意大利人对此自然也是大张旗鼓地庆祝一番，自从征服亚的斯亚贝巴以来他们还没有这么做过呢。意大利人对他们的领导人的欢迎活动是

* 鲁塞尼亚，原苏联乌克兰西部的一个地区，在喀尔巴阡山脉之南，曾属于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

如此热烈，简直让墨索里尼有些反感了。回到2月份，他还曾经正式地走过“鹅步”^{*}呢。并且他当时还评论说，“那个整天坐着的、又胖又蠢的矮子（他的听众可能认为他在不礼貌地暗指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永远也不会这么走路。我们因此而喜欢走正步。”他又好战地补充说：“我们的敌人说这种游行步伐体现了真正的军国主义，我们对此非常高兴。”但是，1938年10月份的时候，意大利人最厌恶的就是军国主义了，因为他们非常珍惜他们那个时代为时不多的和平。对于墨索里尼来说，他必须要找到另外一个理由来动员人民。与以前不同，现在的意大利需要走向种族主义了。

^{*} 即正步走，或者叫“罗马步”，来源于鹅曾经从高卢人手里挽救过古罗马的主神殿（丘比特神殿）的传说，并且鹅在罗马也非常常见。

第4部

日暮穷途



1 第二次世界大战迫近

1938年7月，墨索里尼接见了意大利著名人类学家圭多·兰德拉，并且透露了有关他家族的一些信息。墨索里尼声称他的家族属于“北欧日耳曼民族”。他们与法国人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相反，他们倒是与英国人和德国人有很多共同点。他还举出了一些证据，如埃达嫁给了一个“托斯卡纳人”，维托里奥娶了一个“伦巴第族人”。墨索里尼说，这些选择显示出“他的家族成员保持了一种本能，这种本能让他们去选择从种族的观点来看更加纯粹的人来做配偶。”在谈到“拉丁人”和“地中海人”的时候，他又扩展了话题补充说，他的国家里不能再有这些人了，他们应当被代之以享有特权的“雅利安人”。当然，对于再次进行动员的法西斯意大利来说，古罗马精神仍然是一个主要的特点。

这位意大利的独裁者试图用种族主义的理论来解读他的家族的历史，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就在不久前，墨索里尼还在嘲笑德国人的“反科学的傻话”，他很高兴地指出，德国人的理论是以“法国人的戈比诺理论”为基础的。在那段时期，他很高兴地对一些熟人说，希特勒是“一个糊涂蛋，他的脑袋里塞满了各种完全不协调的哲学和政治标签。”墨索里尼不光是在口头上讲一讲，之后还有具体的行动。在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最初几年里，墨索里尼还允许大约3000名德国的犹太人到意大利寻求避难。1936年的时候，他还亲自干预了一些案子，为一些他认为是“朋友”的外国犹太人提供支持。历史学家乔治·莫斯的家族是一个著名的德国犹太裔家族，在出版和新闻报纸领域有着很广泛的影响力。乔治·莫斯还记得，当时墨索里尼给他住在佛罗伦萨的母亲打电话保证说，她和她的家庭成员“不会有人去动的……只要你们喜欢，想待多久都可以。”

即使是这样，在此前的几年里，墨索里尼在谈到犹太人的时候，仍然比以往带有更多的轻视态度——1936年11月，他向内阁建议说，现在是把种族主义引入法西斯理论和教条中的时候了。在这方面，一个明显的重要的影响是外国媒体对埃塞俄比亚战争的敌意，墨索里尼开始注意到，这些在外国媒体发表评论的人很多都是犹太人。正像他对当时还对法西斯政权比较友好的经济学家保罗·艾因齐

格所说的那样：“世界上的犹太人不干好事，他们正在与反法西斯制裁运动结合在一起，来共同与一个至少迄今为止既没有实践也没有鼓吹反犹太主义的国家为敌。”* 1935年，警察在毁坏都灵的一所监狱时还发现里面有许多犹太人，而在巴黎，卡洛·罗塞利也在继续好斗地领导着一个非共产主义的反法西斯运动。

罗塞利是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被暗杀的。这场冲突是代表“秩序”和代表“颠覆”的两股势力之间的竞争，另外，它也引发了对犹太人在左翼势力的革命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思考，而马克思自己正是最先思考这个问题的人。墨索里尼对法国发生的事情一直都非常敏感，法国一度是他心中的榜样，他也一直把法国当做自己的量尺来看。但是，这种好感却被利昂·勃鲁姆领导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以及法国左翼对共和党人的明显的安慰（至少法西斯的媒体是这么说的）破坏了。**但是，并不是只有墨索里尼一个人有这样的态度和反应。除了极为热情地支持佛朗哥的事业之外，天主教耶稣会的刊物《天主教文明》还对德国实行的反犹太主义立法这一做法大为赞赏。当时，对于许多欧洲人来说，政治已被简化成只有两种选择。如果发现犹太人属于左翼，那么反犹太的人就自动地站到了右翼。当时，在几乎所有国家，都存在许多问题——意大利与英国在地中海问题***上的争吵加剧、西班牙的问题****、德国叫嚷着要进攻犹太人（以及在波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等与法西斯意大利有着友好关系的国家出现的越来越公开的反犹太主义）——所有这些都要求墨索里尼把注意力集中在种族主义问题上。

意大利人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概括了当时的情况。年轻的历史学家埃米利亚·莫雷利认为，埃塞俄比亚战争结束后，意大利人得到的真正的启示是要团结一致“对付唯一的敌人——外国人”。但是，征服埃塞俄比亚给意大利帝国带来的并不只是排外这一个问题。墨索里尼也并不是第一个提起这个问题的人，但是，正像他在1938年1月向齐亚诺抱怨的那样：“我们中的许多人的行为正在让当地

* 普雷齐奥西趁机确认说，犹太人在利比亚战争期间也对意大利提出了批评。

——作者注

** 同时，普雷齐奥西还苦心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勃鲁姆（曾在1936~1937年，1938年及1946~1947年担任法国总理）“对世界的理解完全像犹太人那样”。

——作者注

*** 一个评论家在《意大利生活》上声称，英国令人不快的“精神和宗教”的特点中主导的宗教因素就是犹太主义。

——作者注

**** 例如，一个种族主义哲学家声称，由犹太人和共济会会员操纵的西班牙的“布尔什维克化”有普遍化的倾向。

——作者注

人失去他们对白人的尊重。”两个月前，他就坚决地指示奥斯塔公爵，要他用“种族纪律”对意大利人加以约束。实际上，像其他国家一样，对于“黑人”的一种种族敌视感在意大利也有很长的历史——它比反犹太主义更有“群众基础”。在1936年之后，已经有很多关于种族问题的讨论，并且对排外问题进行立法也开始有所进展（虽然这很少是出自墨索里尼的指示）。不管是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时代精神的鼓舞，具体的种族立法的确已经从亚的斯亚贝巴开始而被提上意大利的议事日程了。

1937年3月，墨索里尼利用访问利比亚的机会宣布了一项积极的政策，这项政策是针对居住在他的帝国内的阿拉伯居民，以及居住在其他地方的他们的亲属的。按照一个古老的公式：我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所以这种“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就把阿拉伯人推到了反英的一边，因此他们也就站到了亲意大利的一边。这项政策的指向性虽然不是非常明确，但却有它暗含的种族方面的含意。当时在意大利占领的黎波里地区，犹太人的数量超过了1/4，并且从1922年之后，当地的犹太人就一直比较富有，而且很有权势。1934年1月，巴尔博走马上任利比亚总督，他有一个重要的移民计划，打算把意大利的农民移民到那里并逐渐使殖民地现代化。当地的犹太人与巴尔博的关系非常好。虽然他们对殖民地的现代化也很感兴趣，但却对阿拉伯的民族主义心存顾忌。而根据那个古老的公式，墨索里尼对阿拉伯人的友好态度反过来就暗含着对当地犹太人的潜在的威胁。

1937年年底，对于意大利已经全面地倒向反犹太人的种族主义这一点，还是有理由怀疑的，齐亚诺在他的日记中对此略有记载，当时，意大利的犹太人担心纳粹已经说服他同意迫害犹太人，但是他评论说：

“错了，德国人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这件事，我也不相信我们应当在意大利发起一个反犹太运动。这个问题在意大利根本就不存在。犹太人数量不多，并且除了少数人以外，大部分都是好的。此外，迫害犹太人永远都不是一个好主意，因为这种做法会让全世界的犹太人更加团结。可以通过其他很多的机制对他们施加影响。但是，我再次重申，意大利不存在犹太人问题。也许，这个社会还需要有少量的犹太人，就像做面包时需要少量的发酵粉一样。”

也许齐亚诺此处更详细地写出了他的岳父在先前表达的感受：他真的不太喜欢犹太人。但是，这种不喜欢并没有让他转变成为一个实际的反犹太主义者。1938年2月，墨索里尼几乎是重复了女婿齐亚诺的话，说他并不想惹起原本并不存在的麻烦。然而，在这种形势下，墨索里尼的话语中还是带着一丝威胁的意味。他的目的是给那些受到反犹太主义鼓舞的狂热分子浇上一盆凉水，他说：“但是，不要把火完全扑灭。”在纳粹德国，种族主义显示出的强大的动员力量对墨索里尼来说还是有说服力的，对他和他的事业也是有帮助的。1937年10月，墨索里尼指示兰德拉的一个年轻助手以“种族科学”的观点就意大利的犹太人问题准备一份全

面的学术大纲。虽然并不准备完全模仿纳粹德国的做法，但是与以前相比，墨索里尼还是更明显地暗示出，在意大利实行某种形式的反犹太主义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于是，他先写了一篇匿名文章发表在《外交资讯》上以试探一下舆论，还告诉齐亚诺说这是“一篇反犹太主义的宣传杰作”。在文章的开头，他先是又一次否认意大利“正在准备实行一项反犹太主义的政策”，然后又说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创建一个“犹太国”，但是它不能在巴勒斯坦国内。齐亚诺支持墨索里尼的这个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结论，因为否则的话，这位年轻的外交部长不能“保证我们与阿拉伯人的关系”。但是，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里，墨索里尼的确冒险阐述了一个新的立场。他说，法西斯政权不希望犹太人的影响力，特别是那些犹太移民的影响力变得“不成比例”。怎样去理解犹太人这种过大的影响力，他在文章里并没有说明，而是把问题留给了他的读者去思考。

随着外交危机的“震中”从奥地利转移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墨索里尼就意大利与各国关系的诸多方面发表演讲时的语调也变得越来越尖锐了。1938年5月14日，墨索里尼在热那亚发表了一个演讲，讲台被搭建成一个战舰的舰首的样子，墨索里尼在演讲中说的一句话成为了法西斯政权最后几年里常用的口号之一：停滞就会消亡。为了激发他的人民继续前进，他第一次使用了一个表达排外思想的词汇，这个词最初由民族主义者发明，但现在已经在更大的范围里使用了。他说，当“外国人”唠唠叨叨地谈起意大利过去的伟大时，他们误解了意大利，相反，意大利真正的朋友应当看到它目前的“军力和影响”。7月4日，在“新城”阿普里利亚发表演讲时，他对自己粗暴地称为“大财阀”的人进行了批判，他直截了当地把他们称为“意大利的敌人”。他的话语中这种新的愤怒的口吻让意大利的当权者们非常担心，但是墨索里尼的这种鲁莽竟然越演越甚，他对齐亚诺（实际上是所有人）说，需要通过法西斯主义的“第三次浪潮”对那些“失败的”资产阶级加以规范和约束。墨索里尼甚至宣布他决定要建立一系列“集中营”，与目前被放逐的囚犯相比，那里面的囚犯将受到更加严厉的对待。他又恶狠狠地说，“将把犹太人、共济会会员和亲法国的人的作品堆起来并点燃，以照亮通往这些集中营的道路”。“犹太作家和记者”将被禁止。稍稍缓和了一下，他又说：“革命现在必须给意大利人的习惯留下印迹。”他们必须不再那么“有同情心，相反，应当变得强硬，难以满足和可憎才对。换句话说，就是要当头儿。”

只有一次，墨索里尼不单单是在吹牛。7月14日，法西斯政权出版了所谓的“种族科学家宣言”，这是一份主要由墨索里尼亲自拟定的文件。另外，这份文件还特意选在巴士底日*出版，并且通过对人类潜能的许多乐观的理解否认了启蒙运动的许多内容，是墨索里尼公然对抗巴黎代表的精神和知识的优势的一个大胆尝

试。按照墨索里尼惯用的模式，这份文件也就种族问题高屋建瓴地总结了出了十条圣训。文章中最关键的一些声明包括：“意大利人民属于雅利安种族，他们的文明也是雅利安文明”；以及“犹太人不属于意大利种族”（其他的“东方人”或者“非洲人”也不属于意大利种族）。他不顾许多证据都可以证明的意大利历史上种族的多样性——他过去经常承认这一问题，而且之后也并没有完全否认这一问题——他现在声称，“一个纯粹的‘意大利种族’已经存在”，并且这一种族的主体已经在意大利半岛上生活了“几千年”。在这篇文章之后，他又在《意大利人民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再次强调他的主题：“称呼我们自己为雅利安人意味着宣布我们自己在历史上就属于一个按照种族划分的群体，我们属于印欧群体，正是这个群体创造了世界文明。没有一个清晰明确而又时刻存在的种族意识，帝国就不能持久。这就是为什么一些曾经藏而不露的问题会在1935年10月3日（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的日子）之后突显并成为严重问题的原因。”

墨索里尼的这两篇文章为法西斯的媒体指明了方向，它们立即跟着领袖对种族问题大肆宣扬。普雷齐奥西趁机在《意大利生活》上撰文声称，他自己一直都是正确的，并且还提供了一大串引用来证明他至少早在1921年就敦促领袖要有种族的观念。对于这些对自己的生平故事的重新诠释，墨索里尼表现出了一种认可的态度，他为此还正式接见了自己原本并不喜欢的普雷齐奥西。为了表示对领袖的敬意，普雷齐奥西向领袖赠送了全套的杂志。朱塞佩·博塔伊也试图使这项政策知识化和理论化。他写道，意大利的种族主义并不只是一种“科学”，它还包含其他很多内容。它否认和摒弃了唯物主义，从而更新了从马基雅维利到马志尼再到墨索里尼这一条人文主义的线索。“实际上，意大利种族主义的真正基础是，也必定是一种非同寻常的精神，即使它有幸恰好源自一些纯粹的生物学数据。”必须利用种族主义来对抗犹太人（他们是“国际反法西斯主义的总参谋部”）和非洲人。它同时还能够根除那些“白痴的和罪恶的、主要是外国人写的假冒伪劣的文学作品”——对于博塔伊来说，民族主义者的语言现在也已经更新了——这些作品把意大利人描述为“多愁善感的人，没有纪律的人，懒惰的人，贪图安逸的人。”博塔伊认为，法西斯的知识分子应当激励自己把这些道理广泛传播，从北部的阿尔卑斯山一直到南部的各个岛屿。法西斯政权已经开始了一项新的事业，而要推动这项事业的发展，必须从学校开始，然后扩展到法西斯教育的所有领域。***

* 巴士底日，7月14日，法国国庆日；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于该日攻克巴士底狱。

——译者注

** 不久之前，一个有名的记者还谴责罗斯福是一个“超级犹太人”，说他攻击法西斯分子曾经嘲弄他的“新政”，并且还把美国列入了意大利的种族敌人之中。

——作者注

但是,当抛开大的理论并对细节问题进行检验的时候,法西斯的种族主义理论仍然让人感到非常困惑——谁也说不清楚唯意志论的种族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以及这种唯意志论如何能够与原始的意大利种族的历史相交。意大利的帝国统治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法西斯政权禁止意大利人与其他种族通婚,并把这与反对犹太主义结合在一起,但是却并没有进行解释或者给出正当的理由。有人断言法西斯主义者本来就是种族主义者,这种说法是不可信的,除非说所有欧洲国家,当然包括像英国和法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都有可能是彻底的种族主义者。有人神经紧张地重申说,意大利所采取的行动是独立自主的,并且并没有通过模仿德国朋友来贬低自己(不管媒体怎么说,民众对此是不相信的),也有人声称意大利需要再次走向极端从而让法西斯革命能够最终贯彻到底,这些说法同样也是漏洞百出,矛盾重重。墨索里尼自己心神不安地要求在意大利全境都建立“集中营”——这个决定的实际执行情况很糟糕——这一做法足以证明当时他对于柏林的“法西斯主义”产生了一种不安的嫉妒心理(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比意大利的出现得要晚),并且正在设法让意大利赶上德国(克里斯皮和自由党时代的政治家也这么做过,他们采取的一些政策也是旨在把意大利变成一个真正的强国)。意大利这么快就也采用了种族主义理论,倒是让纳粹德国感到颇为震惊(私下里,他们对种族并不纯的意大利人敢于如此大胆更是感到震惊),但是纳粹的影响的确已经渗透进了意大利。

无论德国的模式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在1938年8月至9月间,当慕尼黑危机正在困扰整个欧洲的时候,墨索里尼的注意力却有很大一部分已经放在了国内的种族“革命”上。早期理论的不成熟(以及不人道)成为了最主要的障碍,而再没有什么事情比公然的批评更让墨索里尼恼火了。从利比亚出差回来,巴尔博趁机就德国盟友以及斯塔拉切对意大利和法西斯党的所作所为向齐亚诺抱怨了一番。墨索里尼当时正在里西恩度假,齐亚诺怀着恶意匆忙地把这些消息告诉他的岳父,谁知道竟惹得他发表了一通长篇激烈的演说。墨索里尼发誓说,如果巴尔博“动一下手指头”,他就会把他抓起来。然而,巴尔博并不是唯一爱挑毛病的人。墨索里尼声称,独裁专制必须更加“不妥协”,君主对于法西斯政权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必须取消皇室,可以等到在西班牙取得胜利的同时这么做。墨索里尼总结说:“意大利的军国主义化永远都不够充分”(他的用词显示出他并没有理解纳粹主义的现代性)。他最后又用一种至少让齐亚诺感到吃惊的好斗态度补充说:“我永远也不会安静地离开意大利,哪怕我下面长了6只脚。”

教皇对纳粹德国一向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因此,现在意大利的反犹太主义让他感到有些惊慌失措。墨索里尼夸口说:“只要我一点头,人民的反教权主义就会重新风起云涌了。他们难以接受犹太教上帝这一概念。”之后领袖对他的话引起的反响明显非常满意,他又继续说道:“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是一个天主教徒,但却反对基督教。”几周之后,在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让自己变得更恶毒一些之后,他

向齐亚诺建议说，可以把犹太人遣送到索马里的一个地方，那里“有许多自然资源可以供犹太人开采。至于剩下的犹太人吗，捕鲨业将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行当，因为这样很多犹太人就会被鲨鱼吃得干干净净。”

除了写文章攻击谩骂之外，他还向人们发表了许多演讲。9月中旬，墨索里尼来到意大利的东北部边境地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意大利复兴运动的冲突给这些地区的人们带来了不小的伤害，但墨索里尼在那里发表的演讲并没有完全抚平他们的伤痛，敌视德国的情绪在那里仍然有群众基础（这也成为出现“边境法西斯”的关键的催化剂）。墨索里尼最主要的演讲是在的里雅斯特发表的——一个斯洛文尼亚旁观者还记得，尽管她自己尽了最大的努力保持着距离，但当领袖出现在欢呼的人群中时，他还是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在简要地复述了一些历史背景之后，墨索里尼就开始大声为德国盟友辩护了。墨索里尼断言，如果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发展成为一场武装冲突，那么“意大利已经被选定站在德国一边了。”在如此草率地宣布他将选择参加战争之后，墨索里尼又迅速地转而评论起国内的主要争论点——种族问题。他坚持说，“种族问题”并不是突然出现的。相反，它有着非常明确的意义，因此是帝国统治的一个非常必要的组成部分。他又突然补充说，但是，犹太人的问题是种族问题的核心。如果法西斯放松了警惕，像海盗一样的犹太人就会永远时刻准备着登上意大利国家这艘大船并把它洗劫一空。我们需要采取行动。因此，国家将要采取“隔离政策”，但是对那些对于意大利或者法西斯有着“不可否认的军事或者民用价值”的犹太人来说，这项政策是不适用的。

实际上，在意大利人的生活中，把犹太人排除在外的这种立法过程已经开始了，8月3日，外国犹太人被赶出了学校。在慕尼黑取得的和平并没有对这一运动产生约束作用。从德国回到国内后，墨索里尼向法西斯党最高委员会发表了一个演讲，*更加坚持要对资产阶级和犹太人发动攻击。他还对博塔伊说，他从1908年开始就一直在考虑犹太人的问题（他像往常一样沉着地再一次改变了自己的历史）。他还认为，正宗的罗马人本来就是种族主义者。他又继续说，整个意大利人的历史是意大利人作为“纯粹的地中海类型的雅利安人”的一部种族史，我们应当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意大利的历史。他又解释说，英国和法国绝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战，这一点“像数学一样确定无疑”（这是他喜欢说的一句话，但每次说这句话时都意味着从统计学上来讲是不精确的），因为他们不断下降的出生率和种族退化已经让他们在精神上变成残废了。相反，意大利人还可以进一步“军事化”，并且他们也愿意这样做。11月12日，传来了纳粹袭击犹太人的“水晶之夜”行动

* 根据齐亚诺在日记中的记载，当时巴尔博、德博诺和费德佐尼都反对这条新的路线，但是博塔伊却坚决地支持墨索里尼。阿切尔博是另外一个不喜欢种族政治的法西斯元老。

的消息，墨索里尼对齐亚诺说，他“无条件地同意”纳粹的大屠杀：“他（希特勒）说，如果我们处在类似的情况下，我们也会这么做的。”然而第二天（也许他得到消息说意大利的态度在德国引起了反感），他的态度又有所收敛，把纳粹政府强迫犹太人交罚金的做法描述为“荒谬可笑的”，并且对德国政府可能与天主教会发生冲突表示担心。他警告说，如果纳粹用对待德国犹太人那样的暴行来对待德国的天主教徒，那么德意轴心将不复存在。

很多人说墨索里尼并没有对德国种族主义的特点做过仔细的研究，但不管怎样，法西斯意大利仍然在沿着自己的反犹太主义路线继续前进。11月17日，法西斯政权颁布了一部种族主义的法律。开篇第一条就规定：“禁止属于雅利安种族的意大利人与属于其他种族的人通婚。”此外，后面还有详细的条目禁止犹太人参军，禁止从事教育、银行和保险业，以及禁止他们进入政府机构和法西斯党内。允许他们做的也就是些小生意，或者务农。但是，对于那些为意大利和法西斯政权服务的人及其家属，法律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一系列的豁免。接着，媒体又发起了一波造势运动。泰莱西奥·因泰兰迪是意大利最强硬持久的种族主义者，也是普雷齐奥西的竞争对手，他非常喜欢编辑他的双周刊《捍卫种族》，并且一直在宣扬“法西斯主义最根本的逻辑”就是种族主义。他对一些很年轻的法西斯很有吸引力，如焦尔焦·阿尔米兰特，此人在“战后”成为新法西斯主义组织“意大利社会运动”的领导。意大利此时的确已经走向种族主义，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种族主义一直延续到了法西斯的消亡。

然而，正如墨索里尼以及其他心中充满伪善和疑惑的人发表的有关言论那样，意大利的反犹太主义以及其他形式的种族主义一直都缺乏严密的连续性。意大利通向奥斯维辛的道路不仅仅是曲折的，而且还绕了许多弯路。直到1943年，意大利的犹太人还在遭受他们没有想象的迫害，而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是赞同法西斯主义的。但是，不管怎样，他们还没有被杀掉。回到1938年8月，法里纳奇又一次试图让他的领袖再考虑一下实行这项政策的根据。他这一次采取的策略非常独特，他先散布了一个有趣的谣言说教皇的母亲是一个犹太人——法里纳奇使用他那种小流氓的伎俩，是多么让人好笑的一件事。只要领袖点一下头，他就可以从克雷莫纳发起一场媒体运动，那将会让梵蒂冈感到脸红的。但是法里纳奇的脑子里还考虑了其他的，更加严肃的问题。种族主义在意大利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他说：

“坦白地说，人类学上有关种族问题的理论从来就没有说服过我。这个问题更主要地是一个政治问题。实际上，我甚至更加相信在此之前，当科学家们被卷入政治问题的时候，他们只好妥协了。在哲学和科学的舞台上，这个问题还是可以争论的。但如果掺入了国家的因素，那么一个人就必须而且只能作假和服从了。”

法里纳奇倒并不关心他自己家族的血管里是否真的流淌着雅利安人的血液，相反，他倒是更注重现实的方法（声称血管里天生流淌的就是法西斯的血液）。

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法里纳奇对种族主义理论的理解是非常粗糙的，并且也带着一些复杂的因素。与许多意大利人一样，法里纳奇也有“他的”犹太人，他的很忠实的秘书约莱·福阿就是一个犹太人，这个克雷莫纳的法西斯头领是不会愿意让她离开自己的办公室的。他没有带一点难为情地解释说，她大约五十岁，是一个老处女，很能干而且很有效率，是一个好帮手。总之，解雇她会造成一个很恶劣的印象。法里纳奇用他惯常的手法写道：“我非常高兴地同意灭绝所有的犹太人，但是我们不能从卑微和无辜的人开始，而必须先从那些上层犹太人开刀。”

这种在许多特殊个案上都比较仁慈和怜悯的想法很容易为意大利人接受。当然，法里纳奇的建议是有策略地做一个种族主义者，就这些个案给予豁免的可能性只是反映出了他这个建议的另外一个方面，而不是出于狂热的“科学信仰”。他有许多作品是论述墨索里尼家族所拥有的雅利安血统的优点的，墨索里尼也没有对此真正地提出异议，或者说没有坚持这么做。尽管他在1938年发表了许多愤怒的或热情的言论，但墨索里尼并没有转变成为德国式的种族主义的一个助手。相反，他对生命的理解仍然非常复杂，即使是住在托洛尼亚别墅里的时候也是如此。1941年年底，德国人已经开始在他们夺取的苏联的领土上实行种族灭绝的政策了，墨索里尼当时在自己家里承认说：“我的儿子们坚定地保护他们的犹太人朋友，他们还威胁说要在自己的房间里加上一张床让这些朋友来往，并且一直到允许他们移民国外或者能够在意大利为他们提供一个合法而持久的安置地为止。”不管怎样，墨索里尼是在用一种自我辩白的方式在思考问题。此外，他还“永远都不会忘记，意大利民族主义的7个创始人中有4个都是犹太人。”对于德国取得的军事胜利的嫉妒以及意大利在军事上的失败给他带来的耻辱无疑都让他在私下里对希特勒充满了反感。但是，“元首”对于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狂热又让墨索里尼认为他是一个“思想深奥”的人，一个类似“江湖郎中或者小市场上的哲学家”的人物。墨索里尼的儿子们在为他们的犹太朋友说话时已经给出了一些暗示，那么墨索里尼自己会不会也像他们那么做，或者像法里纳奇希望的那样做呢？1938年11月，玛格丽塔·萨尔法蒂被人从意大利迅速而神秘地带走了，后来在她的老情人墨索里尼的直接协助和建议下，她又被从葡萄牙转移到了美国的避难所。墨索里尼确实谈到了种族主义，当他试图让他自己和他人相信意大利已经成为纳粹德国坚定的战友的时候，他也确实有所行动。但是实际上，法西斯政权主要是在1938年通过了许多种族主义的法律，1939年又后续通过了一些，*然后官方对犹太人

* 1939年夏天，对犹太人的禁令扩展到了新闻工作和公证人等，有关遗产继承的规定也比以前更苛刻了。但是，另外一部法律同时赋予了墨索里尼特别的权利，可以让任何他喜欢的人“雅利安化”，从而让“犹太种族”可以科学地加以定义这种说法一下子失去了根据。

的迫害行动就逐渐减缓了。此外，与其他许多问题一样，在种族问题上，官方在“法定的意大利”所采取的路线并不总是能够在“真实的意大利”得以贯彻执行。不管德国是什么样的情况，意大利人很少表现出甘愿充当迫害犹太人的“刽子手”的意愿。

但是，如果像一些法西斯怀旧者那样免除墨索里尼对任何大屠杀的责任，那也是荒谬可笑的。反过来，如果认为他从哲学上就确信反犹太主义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种族主义，那同样也是不真实的。*正如有勇气的法里纳奇所提示的那样，法西斯的种族主义更多的是一种机会主义和短期的做法，而不是一种狂热的信仰。像墨索里尼的统治政策的许多方面一样，他的种族主义也是空洞无物。

到了血腥的20世纪30年代末期的时候，这种空洞性越来越明显了。一些法西斯分子甚至通过揣测墨索里尼的想法来讨他的喜欢，斯塔拉切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是一个有创新性的总书记，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设法使民众变得更激进一些。1936年6月，“法西斯星期六”承诺将每周举行一次动员游行。第二年，法西斯政权又颁布法律，规定只有民族法西斯党的党员才可以申请获得任何政府机构的职位。斯塔拉切还试图改变意大利人的语言习惯，禁止人们使用敬语形式的“您”，而改用直接称呼的“你”。他这些做法得到了一些前民族主义者的支持，其中包括著名的地理学家焦托·达伊内利。此人是一个语言纯化论者，对“外国”旅馆的名称以及来自边境的影响非常在意，在这方面也闹出了一些可笑的事情。旅游俱乐部的主席认为，他的组织的名称在拉丁文里是“球”和“臀角”的意思。佛罗伦萨“英美旅馆”的主人们一直在做着艰苦而徒劳的工作：1940年，他们把旅馆的名字换成了“美国旅馆”；1941年又换成“皇后”；1943年又换成了“水星”；而到了1944年又最终换回“英美旅馆”。

在这种文字斗争中，墨索里尼扮演的主要角色是创造出更多的口号。这个永远正确的领袖劝告他的人民说，如果停滞下来，他们就会消亡；他们必须像狮子那样一天天地过，而不能像绵羊那样浪费一个世纪。总之，最主要的，他们必须信任、服从和战斗。有了“书、枪和完美的法西斯”，他们必须宣称：“我们要向前挺进”。在这些圣歌的激励下，在大多数问题上，墨索里尼现在至少在口头上选择了最“极权主义”的路线。除了斯塔拉切以外，博塔伊是他热情最高的助手。博塔伊在1936年11月接替狂暴的德韦基担任了国民教育部长，他自己也提出了一些口号，虽然不是那么上口易记。他宣称：“学校是国家精神生活的温度计。”为了进一步对意大利人的言语加以控制，博塔伊还在1939年出版了《教育规章》。他

* 吉普赛人从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在法西斯意大利受到了不公的待遇，被看做是一个“犯罪”问题。

宣称，教育曾是“资产阶级”的防御工事，但是现在，它最终从他们手中被收回并掌握在了法西斯国家和人民的手里。他又解释说，像种族政策一样，这种转变是征服埃塞俄比亚带来的另外一个自然的结果。在塑造帝国的新男性和新女性方面，教育是一个最基本的工具，它能够让墨索里尼主导一场“永久的革命”。

话虽然说得这么炽热，但创造法西斯文化的运动实际上却在减缓。新一代受过教育的年轻人都在看美国的电影，读美国的小说，并且，一有机会他们也会像美国人那样去消费——埃达·齐亚诺为那些社会精英身边的女性们树立了一个极为矛盾的社会榜样。跟随丈夫齐亚诺到中国上海任职的时候，她就知道当时的时尚是喝可口可乐。但是，在意大利的乡村，文盲仍然非常普遍*——与苏联采取的政策相比，法西斯政权采取的旨在根除造成乡村苦难的根源的教育政策仍然是软弱无力的。斯塔拉切正在沉默下去，这让那些对自己的知性仍然有很强的自我意识感的精英阶层非常苦恼。但是，精英阶层的这种知性对于许多农民来说书卷气太深了，而这些农民们的文化虽然经历了20年的法西斯革命，但却很少有什么变化。不管是在“上面”还是在“下面”，法西斯的冲击力现在都正在变得越来越钝化了。对于法西斯理论和实践之间如此明显的差距，墨索里尼又做何反应呢？

法西斯党最高委员会的一个成员还记得，墨索里尼在那几年里的“愤怒”愈演愈烈。这种感情一直是领袖对生活的反应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组成部分，现在，在各方面遭受的挫败更加深了他的愤怒。这些挫败一方面来自意大利国内（也有来自他的家庭的），但最让他气愤的可能还是来自德国，这也证明他并不是一个坚强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是，这种永久的敌意也并没有给一些接受者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例如，维托·帕农齐奥是一个主要的法西斯理论家的儿子，他还记得在1938年至1939年期间，他和他的大学朋友的思想比较极端，喜欢抱怨斯塔拉切和德国盟友。墨索里尼明显的对人的轻视也让他们感到非常悲伤，担心是不是“他们的”法西斯主义没有“他的”好。法西斯政权的警察们的工作仍然非常有效，平民中的反法西斯主义***也很少有复苏的迹象。但是，但泽危机的加深带给人们一种感觉，即法西斯政权正在走向穷途末路。这种新的软弱无力遭到了责怪，但

* 确切地说，在意大利南部和那些岛屿上，文盲的比例占到人口的将近一半。

——作者注

** 有报告说，尽管至少对于一个工业国家来说，他们的工程师的效率很低，但是估计在1935年仍有50%的工程师失业。

——作者注

*** 1938年，有310名反法西斯人士被特别法庭判刑，1939年有365人，比从1932年至1937年间的总数还要多，但是少于20世纪20年代的数字。

——作者注

这种责怪主要是针对“法西斯主义者”的（尤其是爱出汗并且没有什么吸引力的斯塔拉切），而不是针对墨索里尼的。然而，一个知识分子在他的保密日记中记录了当时的谣言，说领袖每天都要打电话叫医生来给他检查健康状况，而他的游泳技术也没有官方吹嘘的那么好。在官方的宣传中，他有着“古铜色的皮肤”和“棱角分明的肌肉”，以及斯达汉诺夫*的工作效率。虽然这种宣传的力度越来越强，但是在有些人看来，这尊神灵可能同样长着一双泥巴脚。

值得怀疑的并不只是墨索里尼的运动技能。1938年7月，已满五十五岁的墨索里尼仍在放纵自己的性欲。对于一些知情者来说，佩塔奇一家的问题变得急迫了。在1938年和1939年温和的夏日里，墨索里尼全家住到了位于里米尼的一家豪华饭店里，里面的房间也是非常宜人。这是个华丽的休养地，同时，佩塔奇一家就住在沿亚得里亚海往上的里西恩，离墨索里尼的住处不远，因此非常方便。于是，谣言很快就传开了，说克拉雷塔一接到情人墨索里尼打来的电话就立刻开始卖弄风情。1943年的监禁也唤起了她的一些珍贵的回忆。她说，一天黎明，在亚得里亚海一个荒弃的海滩上，她与墨索里尼相遇了。他喊她“宝贝儿”，说他爱她并且崇拜她：“你是我生命中最美丽的一部分，你是我的青春。”她记得他就是这么说的。她是一个易动感情的人，但比她更糟糕的是她的哥哥。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恶棍，但是凭着与墨索里尼的关系，居然厚颜无耻地得到“推荐”并成功地通过了医学外科的考试。他办事残忍无情，那些被挑选出来对他进行评估的怯懦的教授们违心地让他通过了考试，而那些为他提供帮助并负责记录这一过程的官僚们也为他做出了一个不合事实的评价。他的粗野的行为在罗马臭名昭著。《信使报》上还曾经有匿名文章报导说，他的狗咬伤了一位记者的耳朵。在法西斯意大利，“腐化”的风气从来都没有消失，并且，随着法西斯政权和墨索里尼步入老年，受贿和奸滑的风气也开始蔓延。

如果说法西斯政权对人民的思想没有实现完全的控制的话，那么它的法律基础和它理想中的永久革命又怎么样呢？20世纪30年代末期的危机让法西斯政权的结构体系又经历了一次考验。需要对它进行修正吗？官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必须从各个方面为革命注入新的推动力。事实上，从1924年9月起，在墨索里尼的指示下，一系列令人厌烦的委员会就开始对法西斯的制度结构进行调查。但是，他们得出的报告也是同样地空洞无聊。直到1939年3月才真正有所行动：议会下院被废除了，取代它的是“法西斯分支机构和社团院”，这个机构的成员倒

* 斯达汉诺夫（1906~1977），苏联的煤矿工人，著名的劳动模范，1935年创一班采煤超定额14倍的纪录。苏联还曾在第二个5年计划期间以他的名字发起了一场旨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斯达汉诺夫运动。

是没有太大的变化。作为一个更加临时性的妥协，参议院仍然维持着原状。法西斯政权把这个新成立的机构描述为“真正的民主”，这一点是不可信的。同样，墨索里尼以前辩护地声称“参议院是罗马式的，而下议院是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这也是不可信的。墨索里尼所谓的永久革命的概念也越来越显得平淡无奇了，只不过是他自己有一种永久性的感觉，即没有把其他人按照他自己的形象进行改造（一种傲慢自大的感觉，同时也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担心，因为法西斯主义一直都没有具备他在很多年前放弃的社会主义在知识上的严谨性和精确性）。

国王的位置也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讨论的话题。在私下里，墨索里尼对君主也是非常轻视的，认为它是意大利人缺乏英雄气概的另一个象征，而且，君主对德意轴心的态度也很冷漠——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的确在许多场合都对此表示反对，他主要还是站在一个典型的老兵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认为意大利应当维持与“一战”时的盟友的关系。1938年3月，国王和墨索里尼之间的争吵加剧了，起因是科斯坦佐·齐亚诺突然宣布墨索里尼将就任“帝国第一元帅”的职位，这个职位以前没有先例，并且至少具有潜在的半帝王的性质。墨索里尼在战时将成为意大利军事力量的官方统帅，而这一位置以前是留给国王的。

维克托·伊曼纽尔对丧失了这一皇室特权明确地表示了遗憾，这一下子激怒了加莱亚佐·齐亚诺和斯塔拉切，他们于是无所顾忌地大谈要在将来某个时候建立一个法西斯共和国。墨索里尼则不怀好意但又很高兴地给国王送去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是由一个法西斯法理学家准备的，论证了“帝国第一元帅”这一新职位的合法性。他还说，就这个新的职位而言，“我虽然是个外行，但我考虑得很详尽。”由于这件事，墨索里尼与国王的关系很快就滑落到了以前那样的低谷状态。几年以前，墨索里尼就解释说，他和国王就像是同居一室但却分床而眠，这确实是对两人关系的一个不错的解释。他们两个都有厌世和厌恶女人的心态，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在逐渐加深，二人也都在这种心态中寻求逃避——当墨索里尼听说国王相信女人“只适合补补袜子和一起上床”时，以及认为总参谋长巴多利奥是一个“长着麻雀脑袋和大象皮”的人的时候，他肯定会点头称是的。当谈到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的时候，博塔伊可能会认为他已找到了一句聪明的客套话：“他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国王，是有组织的人民的化身。”但是，国王和墨索里尼两人仍然都怀疑，就像人类制造出的每个产品一样，言辞同样也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废物。

墨索里尼和国王都不喜欢牧师，在这一点上两人也是一致的。教皇庇护十一世是在1939年2月10日去世的，在他死前的最后几年里，教会与法西斯政权的关系比较紧张。他在1937年1月发布的通谕中对纳粹政权进行了攻击，说作为一个国家、一种意识形态和一种道德来说，它犯下的罪恶与共产党苏联差不到哪儿去。但是，法西斯主义一直未被列入到这种谴责的范围之内：教会领导层并没有认

可“法西斯模式”，但是教会庇护十一世对种族主义运动是持否定态度的，对德、意轴心也表示怀疑，并且他并不介意让墨索里尼知道他的这种反对态度。对于教皇的这种态度，墨索里尼也针锋相对地做出了回应。他也经常发泄对教皇的不满，并且在教皇死后，还赌气拒绝对其表示哀悼。他暗示，梵蒂冈太微不足道了，无法赢得像他这样坚强的斗士的承认和重视。新教皇庇护十二世出身豪门，积极地反对共产主义，*并且与其他的束缚人类的现代意识形态相比，他更喜欢法西斯主义，因此，法西斯领导层还是主张把他的地位提高到像过去那样应有的地位。**尽管教皇庇护十二世与墨索里尼也有冲突，但在他担任教皇期间，并没有宣布教会与法西斯政权决裂。

到了1939年的时候，墨索里尼在谈话中经常愤怒地抱怨国内法西斯分子的革命热情不足。但是，对于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来说，国际事务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也是墨索里尼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从这一点来看，因为法西斯吵嚷着要求回报和补偿，所以慕尼黑会议之后的几个月显得尤为活跃。这次的目标是法国，意大利想要的是尼斯、科西嘉岛、萨伏伊、突尼斯和吉布提。就是在这个时候，墨索里尼告诉克拉雷塔·佩塔奇说，法国人总是想寻机伏击他，因此他们必须为他们这种习惯性的背叛付出代价。但是，法西斯对法国的勒索到底够不够黑呢？还不是太黑，因为意大利针对其西北部邻国的军事准备主要还是防御性质的，并且意大利对于科西嘉和突尼斯的军事行动计划当时还只是处在理论水平上。相反，墨索里尼与齐亚诺之间的交易也再一次显示出靠神赐的超凡魅力进行统治的局限性，对于墨索里尼来说，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谈判的。他认为，可以用萨伏伊来换取提契诺河。那么在吉布提这一问题上墨索里尼能走多远呢？或者像他偶尔谈起的那样，这一行动的真实意图是为意大利未来进攻阿尔巴尼亚先释放一个烟幕弹？然而，即使是对这件已经思虑已久的事情，意大利的准备仍然是处在初期阶段。就意大利与法国之间的口角争端，也许国王发表的评论是最具启发性的。他说，他高兴地想到，也许科西嘉“命中注定”要交给意大利，特别是可能会因为一场“大危机”而完成。国王的贪婪表明，一个有领土野心的意大利领导人没有必要非得是一个法西斯分子，就连齐亚诺也承认，科西嘉人思想中并不存在一种领土收复主义。

新的一年开始了，意大利媒体还在吵吵嚷嚷不停地责骂着法国，但意大利政策的关注点却已经移到了英国。内维尔·张伯伦和他的外交大臣洛德·哈利法克

* 一个作者认为他是“犹太—布尔什维克旋风”的一个敌人。

——作者注

** 德费利切认为，民族法西斯党与天主教会在1938年7月达成的交易是教会的一个胜利。

——作者注

斯在1939年1月访问了罗马——墨索里尼发现后者是一个“适合参加葬礼的人”，因为他不管到哪儿都是一副“哭丧脸”。墨索里尼在慕尼黑给这位英国的首相留下了一个“安静而有所保留”的深刻印象，因此，他这次来是想借用墨索里尼的影响力居中调停，以便与他认为是高深莫测的希特勒达成最后一项绥靖计划。张伯伦倒是保持着乐观的态度，墨索里尼一些很小的姿态上的表示（如穿着晚礼服而不是元帅制服出席宴会之类），都能很容易地让他感到满足。他的印象是，墨索里尼看上去“非常好”，有“很强的幽默感和吸引人的微笑”，在谈话中也很“愉快”。但是，他“对希特勒仍然保持着完全彻底的忠诚”。但齐亚诺对这次会谈的总结可没有那么仁慈，称它是“零——全是平局”。张伯伦这次来罗马并没有给意大利带来任何确定的东西。

不管怎样，在张伯伦这次访问之前和期间，墨索里尼和齐亚诺的真正的注意力还是在德国身上。里宾特洛甫已经建议应当把《反共产国际协定》转变为一个全面的联盟，意大利的领导层也很喜欢这个建议。然而，这一次他们的热情仍然是有限的。1939年1月至2月间，意大利的军方领导多次建议与德国签订一个正式的军事条约，但都被墨索里尼拒绝了。墨索里尼的想法与士兵们不一样，他并不像他们那样害怕法国的入侵。3月10日，在与齐亚诺谈到德国时，他甚至故作镇定地说，德国人崇尚军事化，但并不好战。给他们足够的“香肠、黄油、啤酒和一辆大众汽车”，他们就不会再给全世界找麻烦了。

墨索里尼的自我感觉出现错误已经不是第一次了。3月15日，希特勒占领了捷克“尾部”（最西部的领土）的地区，同时还充当着约瑟夫·季索牧师的保护人的角色，此人是斯洛伐克的统治者，是一个不太可靠的法西斯牧师。意大利领导层对德国采取的行动极为震惊，因为德国人事先并没有跟他们打招呼。气愤而又懊恼的墨索里尼嘟哝着说：“意大利人会嘲笑我的。每次希特勒进攻一个国家都会给我送个信儿的。”齐亚诺在托洛尼亚别墅里见到墨索里尼时，发现他闷闷不乐，疲惫而苍老，并且确信没有人能够阻止德国进一步在欧洲建立霸权。很快，法西斯党最高委员会就此事进行了讨论——英国当时已经做出了重大决定，如果纳粹德国进一步侵略波兰的话，它将对抗德国，这就确定了“二战”的第一场战役——“但泽战役”的形势。博塔伊在法西斯最高委员会里对这些事件的描述非常生动。委员会的成员一开始先是讨论外国媒体对国际形势的评论，但墨索里尼却开始在会上发泄他的“讽刺、愤怒、厌倦、憎恶和蔑视”。他的这些情绪很快就传染给了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后来，他开始就德国的力量进行评论了。在这里举出一些证据是有益的。当时，德国在军事上占有绝对优势，在人口上也是如此——墨索里尼悲伤地说，“8000万”德国人要比4500万意大利人多得多。不管怎样，他都爱重复一句话，这句话也逐渐成了他的固定观念：不再可能有像跳华尔兹似的向后转了。不管喜不喜欢，法西斯意大利现在不管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在实际行动上都和德国捆在了一起。

墨索里尼谈到的德国的优势之一是它的经济。他说，德国的工业产出是意大利的12倍。正如他在1937年对一个主要的工业家所说的那样，墨索里尼喜欢宣称“经济问题从来都没有阻挡历史的前进。”然而，在最近的几年里，意大利的商品贸易和人员往来都正在与纳粹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1939年2月，这两个极权主义国家又签订了一个新的商业协约，从而进一步确认了两国走向结盟的命运。意大利还向德国派出了总人数达50万的“客座劳工”，并且对这一做法的重大意义大张旗鼓地进行了宣传。意大利早已禁止使用“移民”一词，而德国则宣称自己在人种上已经纯化了，因此，有关这些从意大利到德国的移民的故事就带上了些魔幻的色彩。但是，这种做法还是有一些让人担心的实际影响。从许多方面来讲，这些被派到德国的劳工实际上变成了人质。法西斯政权在把这些劳工派往德国的时候曾经对此大肆宣扬，那么在此之后它会不会在这件事情上或者在与德国结成轴心国所定下的政策的其他方面上产生180度的大转弯呢？如果这些劳工不能回到意大利，那么这对意大利的独裁政权又意味着什么呢？向德国输出人力是否意味着意大利已经成为纳粹德国的“第一个附属国”了呢？

这些意大利劳工的噩梦是在所难免的。正如一位罗马尼亚外交官观察的那样：

“墨索里尼已经挑战命运太长时间了，以至于没有感觉到出现回转可能时所带来的威胁。他有一种悲观的预感，他好像急于逃脱定数。希特勒能够召集起更大的力量，但他与希特勒之间的关系也并不是没有让人担心的因素。他认为自己是在自己开辟的路上被人拖着走，成了自己开创出的体系和释放出的热情的一个囚徒——他正在这条路上被人拖向一个并不确定的目的地。他已经播下了罪恶的种子，他担心会产生恶报，并且是他难以控制的恶报。他仍然希望自己的冲力能够让自己安全地闯过暗礁。他的本能与希特勒不同，他不会一头冲向障碍，他希望有利地绕过它们。但是他对危险的意识并没有把他从那些控制他的力量中解放出来：旧的忌恨，强烈的愤怒和不断高涨的自尊。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地觉察到会有灾祸，他的麻烦也变得日益明显了。”

另外，在国际形势越来越带有不祥之兆的时候，墨索里尼也在担心人的问题。这位罗马尼亚外交官总结说，“身边这位明显的享乐主义者（齐亚诺）对墨索里尼也是一个警示，让他明白权力正在从他手中溜走，但是他已经准备忍耐了。”

意大利当时存在各种自我贬低的思想，为了驱散这些思想，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最终决定侵略并吞并阿尔巴尼亚。意大利让自己的进攻尽可能多地带有暗杀的方式：它选择在耶稣受难节这一天发动了进攻，*而就在前一天，阿尔巴尼亚

* 意大利的自由党政府曾经做出过榜样：它曾在1914年的圣诞节入侵干旱缺水的萨赞岛（阿尔巴尼亚西南部）。

女王杰拉尔丁刚刚生了一个儿子。意大利有机会不动一刀一枪就成为阿尔巴尼亚的保护国，但墨索里尼拒绝了这种可能。虽然如此，他还是把大部分的准备工作都交给了齐亚诺及其下属，这些人做得并不怎么好。虽然没有什么政治上的对抗，但阿尔巴尼亚的平民从内心和精神上并没有真正屈服于意大利的统治，他们甚至比西西里人更明白：政权虽然更替了，但日常生活依旧。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的统治下又多了一个王国，一个阿尔巴尼亚法西斯党也很快就被组建起来了，但是法西斯在那里的统治仍然只是停留在表层，并且付出的代价也很高。即使阿尔巴尼亚位于欧洲，而法西斯的侵略也让那里有了不祥的纳粹气氛，但阿尔巴尼亚担当的仍然是帝国的另外一个前哨站的角色，并没有被吸纳进意大利这个“极权主义”国家，还是保持着它的“落后状态”。

墨索里尼应当已经习惯了痛苦的胜利，但是阿尔巴尼亚还是让他的脾气变得很坏。罗斯福草拟了一份和平草案，墨索里尼满怀恶意地把它称为“急性麻痹病”的产物，从而一口回绝了美国人。持续的危机以及意大利军队在登陆阿尔巴尼亚时表现出来的明显的无能——军事观察家们称意大利军队在那儿的表现是“小孩子式的业余爱好”——最终促使法西斯对其军事力量进行了一番评估。在德国人向布拉格继续前进的时候，墨索里尼宣布：“今天的命令是：更多的加农炮，更多的军舰和更多的飞机。并且要不惜一切代价，不管通过何种途径。”6个星期之后，齐亚诺也承认，意大利的军事力量是一个“悲剧性骗局”。没有什么储备，甚至用于防御的装备也都是古旧废弃的，或者根本就没有。他沮丧地声称，领袖上了军方的当。没过多久，从瓜尔内里那里又传来了同样令人沮丧的有关意大利的国际贸易平衡的坏消息——这位贸易控制部部长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对意大利是否有能力在外交政策方面做出大手笔表示怀疑。他认为领袖虽然有些盛气凌人，但还是“愿意坦率地面对现实”的，所以便向领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瓜尔内里警告说，不管建立任何形式的帝国，其需要付出的花费都会“把意大利耗空的”。种族主义的法律以及一轮又一轮的外交危机都对旅游业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据他的估计，在1939年的前6个月，国家的财富积累下降了约60%。总之，意大利的经济是“不稳定的”，再也经不起任何震荡了，也无法支撑一场国际冲突。

法西斯的领导层也很难否认他们在语言和行动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但事情还在继续进行。墨索里尼还在好战地谈论着战争的“不可避免性”，然而，他也曾在文章中承认意大利需要“三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和平（这个数字并没有什么意义，对他来说每件事情都是有弹性的）。同时，齐亚诺还到米兰与里宾特洛甫见了面，并且，在墨索里尼的直接指示下，1939年5月7日，意大利和纳粹德国签订了一个同盟条约，即所谓的“钢铁盟约”。

迈出了这重大的一步之后，意大利又开始跟随德国一起漂流了。国王警告说，一旦德国人相信他们不再需要意大利，他们就会说：“你们真是不幸的人。”听到

这种让人丧气的预言，墨索里尼气急败坏地说：“我就像是一只猫，敏感而谨慎。但是当我跳起来的时候，我知道我希望自己落在哪儿。”他又一次考虑，现在是不是对国王进行压制的时机？此外，墨索里尼并没有为战争做好准备。5月30日，他给希特勒写了一封委婉的信，说明尽管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必须把它推迟到“1942年底”。他承认，意大利还有一些次要的任务需要完成——对利比亚和阿尔巴尼亚进行整合，安抚平定埃塞俄比亚，以及把战争工业从波河河谷地区迁往南部等。另外，意大利还需要6艘新的战舰，更好的大炮，士气也需要提高（在这一点上，他最后还要神气一次，说德国人应当明智一些，最好平息与梵蒂冈的不和关系）。独裁制度也必须得到进一步的改善。他又建议说，在未来的战争的最初阶段里，不管是在1942年或者其他任何时间，可不可以由意大利提供人力，而由德国出钱？

希特勒对此并没有提出异议，还很有礼貌地说如果能够再次与领袖会面，他将感到非常高兴。于是，欧洲在去年夏天达成的和平开始真的成为过去了，而意大利的领导层并没有做出多大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行为。对于在使其战争机器以及社会走向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缺陷和不足，它也没有花大力气来弥补。意大利驻柏林的大使报告说，斯大林无意为别人去冒险。英国和法国想与苏联达成一项协议，但又摆出一副恩人的态度拖拖拉拉，这让斯大林越来越没有耐心了。取得胜利的佛朗哥倒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在目前的情况下，西班牙无法面对一场欧洲战争。”墨索里尼总是时刻准备着为他认为是自己的下属的人提供保护，他在回信中敦促这位西班牙的元首要“坚定地走向人民”，同时还邀请他在方便的时候访问罗马。^{*}然后还有波兰的问题。就但泽问题而言，墨索里尼很有信心像在慕尼黑那样再签订一项协议。虽然如此，他还是发誓说，如果英国发动一场全面的战争，那么意大利就会参战。但是，在意大利人看来，北部边境仍然是相当平静，齐亚诺甚至还在日记中对他的一些下属的“危言耸听”进行了讽刺。

但是，当齐亚诺8月11日在萨尔茨堡见到里宾特洛甫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的乐观主义是多么错误。齐亚诺带去了墨索里尼的意见：一场全面战争“将会使各方都损失惨重”；但是，里宾特洛甫以及希特勒和德国领导层的意见却是：“这是不可改变的。”齐亚诺与里宾特洛甫进行了长达10个小时的讨论，并且还见了元首希特勒，但是最终也丝毫没有能够动摇德国人的决心，也没能够改变他们的看

^{*} 墨索里尼是在给佛朗哥的信中说这番话的。齐亚诺会见了佛朗哥，他吃惊地得知西班牙军队“每天在马德里打死250人，在巴塞罗纳打死150人，在塞维利亚打死80人”，认为这种体现“西班牙精神”的行动实在是太残忍了。佛朗哥还讨好地宣布，他这种把人民束缚于政权的做法是从墨索里尼那儿学来的。

法，即认为现在是发动战争的最好时机。德国人并不在乎意大利的反对，也不在意自己过去曾经说过要等上几年再发动全面战争的话。齐亚诺气急败坏地回到了罗马，确信德国人“背叛”了自己，从此一下子由亲德转向了反德。意大利的贪欲也有所收敛了，并且，单是对德国的真正而全面的担心就让德意轴心的继续存在有了正当的理由。法西斯意大利的外交政策至少可以说在墨索里尼的女婿的领导下已经崩溃了。

那么墨索里尼对此是什么态度呢？8月13日，齐亚诺去威尼斯宫晋见了墨索里尼，“领袖的反应变化无常。一开始，他说我是对的。之后，他又说荣誉让他不得不与德国人并肩前进。最后，他又说想在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得到部分战利品。”虽然齐亚诺并没有指明，但墨索里尼选中这些地区作为战利品确实带些讽刺的意味，因为这样就意味着意大利在其东北部边境建立了一条针对德国的防线。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虽然墨索里尼的想法仍然在变来变去，但“对希特勒的愤怒的害怕”却是难以掩饰的。墨索里尼问齐亚诺，如果意大利退出的话，那么纳粹会不会放弃波兰并转而“来找意大利算账”？

墨索里尼是靠自己超凡的魅力来统治国家的，因此，即使面对目前这种极其重大的危机，他的决策过程也非常地简单，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就在几个月前，墨索里尼还自夸说，他的政府里的部长们“就像是一些电灯泡，我可以随意打开或关掉他们。”面对这样的国际形势，意大利并没有一个对其进行分析和评估的程序，因此，它后来稀里糊涂地就犯了错误。当时，墨索里尼一些主要的下属们对于在但泽发生的事情还一无所知，连被认为比较聪明的博塔伊也不清楚柏林的“狄奥尼索斯和尼采精神”和罗马的“形式主义与司法精髓”之间是否已经发生了表面化的冲突。

墨索里尼和齐亚诺两人见面时谈话的态度好几个月都没有什么变化。齐亚诺因为德国人的不守诺言而愤怒不已，拒绝与德国人在战争中结成同盟。而墨索里尼则不同，不管思想怎样多变，他始终坚持接受与德国结盟。虽然如此，他还是转弯抹角地寻找借口对希特勒说，意大利还没有做好准备参加因德国入侵波兰而可能引发的全面战争，但是，如果德国先进行谈判，在其他国家“不妥协”而使谈判失败的情况再发动战争，那么“意大利将参战并站在德国一方”。实际上，纳粹德国又一次让意大利这个不幸的盟友大吃了一惊。8月21日，《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公布了（两天之后签署），这一次罗马事先又没有得到任何消息。*维托里奥·墨索里尼后来说，当他在《零钱报》上看到这一消息时，认为这肯定是排版印刷出了错误。齐亚诺认为这个交易“无疑是一个高明的政变”，它“把欧洲的形式整个

* 1939年8月25日，希特勒给墨索里尼写信对此事进行了解释。

颠倒过来了”。在他看来，轴心国的股票稍微升值了。一方面，他希望其他事情不要过早地发生；另一方面，他现在也很急切地想得到“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的战利品”了。

很多人的想法一下子冷静下来了，意大利的军方领导用极为强烈的语气描述说，对于战争，国家根本就是处在一种无准备的状况。国王也表示愿意支持“中立”的立场（但他同时也没有忘记说，一旦发生战争，他的儿子应当成为军事统帅）。墨索里尼却向希特勒解释说，尽管他“完全同意”《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也理解德国的立场，即对波兰的不妥协态度不能永远忍耐下去，但如果想让意大利迅速参战，德国还需要给意大利提供大量的“战争物资和主要产品”。他又毫无诚意地补充说，意大利需要这些物资以便“能够抵抗法国和英国主要针对我们的进攻。”* 齐亚诺带点讽刺的意味说，如果德国人同意为意大利提供清单上所列的东西，**那么光是运输这1.7亿吨的货物就需要1.7万列火车。

8月26日，墨索里尼又给希特勒写了一封信，恳求元首希特勒想象一下“他的精神状况”，说他“发现自己被强于自己意志的影响所左右”，因此，他希望能够不参与这场伟大的战争。希特勒在回信中要求意大利再加派更多的劳工到德国，并在危机深化时为德国提供“心理上的支持”。墨索里尼的确想推动德国人和平解决但泽问题，而且还想再次扮演他在慕尼黑扮演的角色。齐亚诺仍然在焦急地关注着墨索里尼的情绪的变化——今天，他可能会甘心接受现实，但明天可能又会不安分地要采取行动。不管怎样，墨索里尼是坚决不会再提“中立”这个词，不愿意再采取1914年自由党政府的外交政策了。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开始的时候，法西斯意大利也并没有注定要参加这次战争。正如法西斯政权宣传的那样，领袖可能会让火车继续准点运行，至于战争，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博基尼通知梵蒂冈，他已经告诉领袖说“所有的意大利人都憎恶战争，人民不愿意为德国人而战。”在法西斯的其他领导人中，也只有斯塔拉切支持立即参战。但是，当他吃惊地发现自己原先夸口的能够立即执行的给养计划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时候，他也退缩了。佛朗哥以及葡萄牙的牧师独裁者萨拉查也都不愿意让意大利参战。由于受到这些人的意见的困扰，墨索里尼最终妥协了。正如齐亚诺描述的那样，在9月2日的晚上，“领袖相信了保持中立的必要性，但是他心里并不高兴。只要有可能，他每次都要谈起我们采取行动的可能性。相反，对于已经做出的决定，意大利人绝对是全体都感到欢欣鼓舞的。”

* 墨索里尼在给希特勒的信中列明了意大利所需物资的详细清单。

——作者注

** 事实上，希特勒只是为意大利提供了部分而非全部所需物资。

——作者注

两天之后，也就是当英国、法国和德国已经正式参战的时候，墨索里尼再一次为“共同的命运”而感到烦恼，他确信，这个“共同的命运”把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捆在了一起。这场冲突是纳粹德国与并不情愿打仗的西方列强之间一场奇怪的竞赛，对所有人来说，这场战争可以说是一个“假货”，但是波兰人却因此而遭了大罪，他们被纳粹的闪电战迅速击垮了。那么意大利的非交战状态（这么叫是为了避免使用“中立”一词）是不是也是“假货”呢？或者说法西斯主义和领袖独裁者是否也是真正的“假货”呢？将近30年前，民族主义者就高兴地声称，自由党政府统治的意大利需要经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检验”，并且把“墨索里尼教授”争取到了他们一边。现在，法西斯政权能够经受住一场新的战争的检验吗？它能否，或者说应当对两方面的优势进行分析和评估呢？或者，法西斯意大利真的不可避免地要与纳粹德国一起从事普遍适用的法西斯主义的杀人事业吗？

2 纳粹德国的不光彩的帮凶

在萨尔茨堡会谈之后，齐亚诺就试图把墨索里尼引向反对德国的方向。他提醒墨索里尼说，他已经成为希特勒的“不太明智的助手”了。这个词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发明的，用来形容“一战”中的德国的盟友奥地利所扮演的角色——他的本意是友好的，但很快就被认为是在贬低奥地利。齐亚诺是针对他的岳父经常表现出的担心而说这番话的，墨索里尼担心意大利再次像自由党政府那样因为出现180度的大转变而在外交上出洋相。当时，并不只是墨索里尼和齐亚诺两个人注意到历史正在重演，后来的一些历史学家肯定也注意到了这种重复的可能性。1939年9月，某种形式的世界战争已经爆发，但意大利没有参加。1914年8月，“一战”已经开始了，意大利当时也是在旁观，直到1915年5月才参战。当意大利参战的时候，它的敌人是德国和奥匈帝国，而它们在1914年7月的时候还是三国同盟的盟友（并且还共同采取了一些军事行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可能是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让意大利倒向了英国和法国，但是，在参战的9个月里，可以想象，意大利可能同时与同盟国和协约国两个集团都保护着联系（或者说完全地游离于战争之外）。

同样的情况会在1939年至1940年间再次发生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是，1940年6月10日，法西斯意大利真的是出于结构上的原因并且忍受着“列强中最弱的一个”这样的地位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吗？或者进一步说，墨索里尼是出于共同的对意识形态的狂热和对战争的热情才与希特勒联合起来的吗？或者说所有的事情都是出于偶然？长期和短期的原因、个人角色与社会以及精神的角色相比较，可以说，意大利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典型的历史因果关系造成的。

研究意大利参加“二战”，还牵涉到一个文献记录的问题，而齐亚诺的日记在其中起着核心的作用。齐亚诺描绘了一幅生动的画面：正如另一位日记作者所写的那样，领袖代表的一派希望参战，“就像一个小孩想要月亮一样”；*另一派

* 这位日记作者是安萨尔多，他还是从齐亚诺那里听到这个说法的。

以齐亚诺这个年轻的拉孔奥*为代表,他们在尽一切努力帮助墨索里尼抵抗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势力的致命的诱惑,避免意大利参战。也许这两派之间真的存在着严重的冲突,但是一个分析家在这个问题上也要小心,不能只听信齐亚诺的一面之词。纵观法西斯的历史,我们不应当简单而表面化地理解一些言辞的意思。毫无疑问,从1939年9月到1940年6月,墨索里尼和齐亚诺两派的确各执己见,吵吵嚷嚷,但是,这种争执仍然是一种密友和至交之间的争执方式,他们两个代表的也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两个方面。不管怎样,不争论的时候,他们两个都在等待和关注着战争前线的情况。多年来在言辞和真实行动上的好战,以及与法西斯革命理论联系在一起的墨索里尼的地位和个性,在这里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洞悉形势判断谁将赢得战争,何时以及怎样赢得战争,以及怎样使意大利受到最小的威胁而取得最大的优势,这些问题同样是至关重要的。

在“非交战状态”的最初时期,意大利的民众对于法西斯政权不参战的决定感到非常高兴。在银行发生了轻微的挤兑之后,股票市场猛涨。梵蒂冈也非常高兴。博基尼、博塔伊和费德佐尼都公开表示相信墨索里尼会选择不参加战争,兰齐诺还充满感情地描述了“平静的中立”所具有的吸引力。相反,法里纳奇则猛烈地抨击那些“患了白痴病的”反对轴心国的人,对于有人提出的意大利参战并抗击德国的建议,他更是强烈地反对,称这是“国际反法西斯主义、临阵脱逃和犹太人的想法。”但即使如此,鉴于意大利的军队用严格的标准检验起来只不过是一支“玩具军队”这一事实,法里纳奇也并不赞成意大利现在就参加战争。**佛朗哥和迈塔克萨斯***也以不太夸张的态度对意大利的决定表示赞许。即使是德国民众也对战争缺乏热情,正如齐亚诺的妹夫、驻柏林使馆的马西莫·马吉斯特拉蒂告诉他的那样:“除了波兰走廊的问题以外,这场战争的基本的结果将会是负面的,并且对所有国家来说都很危险。”看起来只有墨索里尼自己有些焦虑不安、如坐针毡,并且一提起1914年至1915年时的情况他就大发脾气,齐亚诺(只是女婿而不是儿子)的努力并没有能够让他相信这将会是一场长期和艰苦的战争,他也不相信英国将会最终赢得战争。他急切地想做些什么,或者要让别人看起来他正在做着些什么事。他试图说服希特勒(以及他自己)相信“意大利所采取的这

* 拉孔奥,希腊神话中的神,特洛伊的祭师,因警告特洛伊人不要中木马计而触怒天神,和他两个儿子一起同被巨蟒缠死。

——译者注

** 法里纳奇是在给墨索里尼的信中说这番话的,这封信长达13页。

——译者注

*** 迈塔克萨斯(1871~1941),希腊将军和独裁领导人(1936~1941年),1940年意大利侵入希腊后加入盟军。

——译者注

种并不是中立的态度比我们真正参战作用更大”，但他也在考虑，如果这样说，德国人会怎么想呢？如果意大利从一开始就参与这场冲突，英国和法国会不会立即集中全部火力进攻意大利呢？这样造成的结果会不会抵消德国人在波兰获胜所造成的影响呢？

后来，墨索里尼又评论说，意大利至少还可以控制住巴尔干的局势。他还强调说，他目前“在政治和外交上仍然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并且可能为德国带来巨大的利益。”换句话说，在战争已经爆发之后，墨索里尼还在考虑能否再次套用慕尼黑模式来解决危机。^{*}根据自己的想法和办事方法，墨索里尼认为希特勒很快就会提出一项和平议案，但他又一次错了。同样，齐亚诺打算建立一个巴尔干中立国集团的计划也没有什么进展，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外交部长齐亚诺仍然在克罗地亚闻到了“战利品”的气味（墨索里尼可能也是这种想法）——齐亚诺坦率地想，如果英国和法国同意，意大利可以吞并克罗地亚，从而可以阻止德国再向东南方向扩张。墨索里尼告诉法西斯的领导层，现在是流行“最无情的政治现实主义的年代，我们帮助别人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世界自我们而始，也因我们而终。”但是，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墨索里尼自己找到最佳的政策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11月30日，苏联军队发动了针对芬兰的“冬季战争”，齐亚诺认为这中间肯定又有阴谋诡计。德国和苏联突然签订《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并且对此未加解释，这在意大利激起了极大的愤怒。当时，齐亚诺不光是一个反共主义者，而且看起来还是一个很好的法西斯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分子。甚至连墨索里尼也认为德国侵略波兰是帮了斯大林的忙。齐亚诺在高尔夫俱乐部里的朋友也相信可怜的小芬兰会受到野蛮的攻击，据说，芬兰那些有钱的大学生们也都对芬兰人的命运非常关注。因此，12月初，齐亚诺接受提供50架飞机经德国送给芬兰人的建议，而且还谈到可能会派法西斯“志愿者”到赫尔辛基去。但是最终，在德国人的阻挠下，齐亚诺屈服了，这些计划也都成了空话。虽然如此，意大利还是一直坚持站在反共立场上对苏联继续进行谴责。好像是为了说明针对苏联（齐亚诺认为德国才是真正的敌人，苏联只是其代理人）采取的行动的正当性，齐亚诺指示大使奥古斯托·罗索对斯大林的外交政策进行评估，也让他评估一下与德国的友好关系能够持续多久，以及苏联的“扩张主义”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动机。罗索英明地回复说，苏联的国家利益决定着它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承诺。虽然有些讽刺意味，但毕竟更加值得一提的是，罗索任职大使三年以来，国内第一次就一些

^{*} 《意大利生活》确信这场战争是犹太人的错误，但是它又预测和平很快就会到来。

重要的问题征求了他的意见，并让他参与制定了外交政策的框架。从他的回复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也对齐亚诺的年轻及其对现实世界太缺乏经验表示担心，并且也知道墨索里尼并不重视职业外交官。

意大利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仍然是与德国的双边关系，这让所有的对外使节都有理由愤怒和抱怨。从这一点上讲，战争促进了有关居住在阿尔托—阿迪杰地区说德语的居民的问题的解决。墨索里尼和他的法西斯政权多次声称有必要对居住在意大利边境地区的居民进行意大利化，还说马志尼早在1886年就把勃伦纳分水岭定为了德国和意大利两国之间的边界。据估计，1939年，虽然说德语的人占到了该地区人口的75%，但95%的公共事务职位却都被意大利人控制着。且不说希特勒本人，德国的民族主义者在此问题上至少是和法西斯持有同样不妥协的态度。德国总统兴登堡也声称：“边境上那些说德语的居民是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后，戈林就立即发起了一个“人口迁移”的运动，这在今天被称为“种族净化”。到了1939年5月，希姆莱就已经拟定了一个计划草案，打算把多达20万的南蒂罗尔人迁移到纳粹德国，并且把这个计划描述为“可能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慷慨的计划”。起初，墨索里尼对那些说德语的意大利人被迁移走这一事件感到非常不安，虽然希特勒一再保证说勃伦纳将“永远”属于意大利，但墨索里尼仍然行动迟缓。但不管怎样，“科学地”看待种族迁移的概念是符合纳粹精神的（这也是蒂罗尔问题的一个“最终解决方案”）。阿尔托—阿迪杰地区的这些德国人被迁移的先例成为了后来战争期间纳粹德国进行大批移民行动的原型。1939年10月21日，在就细节问题进行了艰苦的讨价还价后德意终于达成了一项协议。之后还进行了一次公民投票表决，德国的宣传家们认为这是对当地说德语的居民的一种威胁：如果他们不选择去德国，那么他们将被移民到阿尔巴尼亚或者西西里。最终有18.5万人选择迁往德国，另外8.2万人希望留在当地。但是，这个计划执行起来并不容易，到1943年9月的时候，只有13万人真正获得了德国公民的身份，还有5.2万人仍然留在意大利。

齐亚诺的姐姐玛丽亚的生病和去世分散了齐亚诺对这些事情的注意力。10月25日，另外一个消息让他更加生气了：领袖再一次做出了亲德的举动。他打算“给希特勒写一封信，说意大利在目前的形势下可以扮演一个德国在精神和经济上的后备军的角色，但以后也可以承担军事方面的角色。”齐亚诺担心地注意到，他的岳父又一次“想做点什么”，并且语气坚决地强调“德意轴心和《钢铁盟约》仍然存在，并且还在切实而充分地发挥着作用。”

在大多数时间里，齐亚诺的影响和地位还在提高。10月31日，墨索里尼再次进行了被他称为“更换护卫”的行动，即对他的政府进行了重组。在这次政府的重新洗牌中，斯塔拉切是最大的输家，埃托雷·穆蒂这个才三十七岁并且在政坛并不知名的人取代了他的法西斯党总书记的职位（从1937年开始，这个职位获得

了部一级的地位)。穆蒂是一个出身微贱的拉文纳人，因为娶了一个造船主的女儿一下成了当地的贵族。在墨索里尼看来，穆蒂具有罗马涅人的美德；而在齐亚诺看来，他明显是一个敌视德国的人，并且“将会像只羔羊一样跟在我的后面”。墨索里尼还为斯塔拉切在国家安全志愿军里安排了一个职位，但他很快就退隐乡里，并且经常给领袖写信哀叹自己的命运，但是墨索里尼一直都没有给他回信。墨索里尼也一直不愿意与这位老部下见面，而所有意大利人都都相信，失去领袖恩宠的斯塔拉切是一个可怜的老头。他还受到一些旧友的困扰，甚至完全失去了生活的意志。*同时，担任了新职位的穆蒂也正处在迷茫之中——1940年1月，有秘密备忘录强调说，法西斯党的宣传没有能够在人民的思想中创造“一种正确的政治意识”，并且意大利妇女反对参战的情绪日益高涨，她们甚至满怀怨恨地储藏了许多油、豆类、大米和肥皂。不久之后，又有一份报告称民众正在更多地参与教会的活动，由于害怕战争持续较长时间以及害怕意大利参战，对天主教的信仰也开始在各地蔓延。

除了穆蒂接替斯塔拉切担任总书记以外，这次政府改组中另一个最重要的变化是亚历山德罗·帕沃利尼掌管了大众文化部，成为了革命的法西斯主义一个狂热的拥护者。但是1939年的时候，人们还认为他对德意联盟是持怀疑态度的，是属于齐亚诺的人——有人把新政府描述为“齐亚诺内阁”，使这位外交部长越发自负了。当时，到齐亚诺家里来寻求职位的人挤破了门槛，这让齐亚诺非常得意。此外，这次政府改组中还有另外3个变化值得一提：法西斯经济学家拉法埃洛·里卡尔迪**取代了费利切·瓜尔内里，乌巴尔多·索杜将军***和弗朗切斯科·普里科洛将军被任命为战争部和空军部副部长。这3项人事任命都是为了积极而热情地为参战做好准备。

意大利继续被排除在一些“大事”之外，这让墨索里尼越来越感到懊恼和难

* 斯塔拉切在1941年12月24日写给墨索里尼的信中谈到自己还在骑马，因为那是领袖喜欢的一项体育运动，但实际上，已经失去职位的斯塔拉切当时已经无力支付这项上层阶级的运动的费用了。在1942年10月28日写给墨索里尼的信中，斯塔拉切承认自己精神低落，期待着领袖承认自己还是他的一个“老兵”。

——译者注

** 秘密报告称，里卡尔迪——他也是齐亚诺的朋友——依靠有权审批出口许可证而大搞贪污腐化。此外，据说他还经常与全国劳动合作银行里的奥西奥打网球比赛，赌金是1000里拉，而奥西奥总是想尽一切办法输给他。

——译者注

*** 索杜有一句有关军队生活的绝妙格言：“只要有一盘能保证生命的意大利面，再加上一点音乐，你就不用要别的什么东西了。”

——译者注

堪。博基尼胆子很大，他居然敢妄加猜测说，领袖的烦躁不安是不是因为他的梅毒又发作了。这种从医学的角度来分析问题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战争形势仍然对意大利不利。在德国的意大利观察家们毫不掩饰地承认他们“恨”德国人，但是同时又相信希特勒将会赢得战争。贝尔纳多·阿托利科大使也向国内汇报说，和平可能是另一码事了，因为德国在波兰的“恐怖行动”是那么血腥，至少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才能修复两国关系。几乎所有的方式都难以描述出一个理想的解决问题的途径，面对着这些相互矛盾而又带着警告性的消息，在意大利的精英阶层中观点摇摆不定的并不只是墨索里尼一个人。例如，小个子国王就向齐亚诺表示他是一个坚定的“中立主义者”，但是不久他就又说自己也不喜欢法国。国王表达的是意大利这个“列强中最弱的一个”国家一直面对的一个问题——怎样才能让意大利不付出任何代价同时又能利用危机而立即获得好处？

此时，面对意大利所处的进退两难的局面，自称比其他人意志更坚强的墨索里尼也只有唯一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那就是跟随德国参加战争。虽然齐亚诺确信意大利参加战争并站在德国一边将是“一次犯罪，也是一个白痴的行为”，是绝对不能这么做的，但是让他感到厌恶的是，墨索里尼最终还是在新年之初给他的“朋友”——元首希特勒写了一封信。为了探听虚实，他在信的开头先离题万里地讲了自己对《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的理解，以及它在西班牙、英国、芬兰和其他国家引起的反应。他又警告说，如果苏德关系进一步密切，那将在意大利“引起灾难性的反应，因为我们是坚决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特别是对于广大法西斯来说，这一点是绝对不容讨论的。”与他在1942年至1943年时的立场正好相反，墨索里尼此时毫无疑问地告诉希特勒：“你可以到俄罗斯去解决德国的‘生存空间’问题，而不是其他地方。”他还记得反犹太主义肯定能够让他的同事高兴，于是他提醒希特勒不能降下“反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大旗”。他完全赞同肃清波兰的犹太人，还对“您把犹太人集中到卢布林的大聚居区里的做法”大加赞扬。他接着又问希特勒，波兰的实际情况到底怎么样？难道不能重建一个“温和的、被解除武装的”波兰从而恢复和平吗？他又警告说，美国（墨索里尼对美国的政策多年来也是摇摆不定的）是不会允许“民主的彻底失败的”。至于备战情况，意大利是不会被强迫着加快进程的，但是可以让元首希特勒确定的一点是，意大利只会在“最有利和最具决定性的时刻”参战。在精心地进行了一番遣词造句之后，墨索里尼也给齐亚诺一份更简短的、只有6条内容的总结。他在总结中写到，他得出了一个关键结论，即“除非德国犯了不可挽回的错误，否则我们不应当公开指责我们的盟友。”如果倒向另一方，那将无法服务于意大利的国家利益。到这年夏天的时候，意大利的战争准备情况应当能够达到一个“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水平了。

虽然墨索里尼暗示意大利在将来会有所行动，但任何领导人现在还无法声称

意大利将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齐亚诺确信，除了军事上的准备以外，意大利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目光短浅了，简直是“十足”的短浅。巴多利奥*声称，意大利可能会在1942年的某一天准备好参战，而到了1940年1月中旬，甚至连墨索里尼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意大利的军事实力之弱了。博基尼是个以能吃著称的人，他对这些事情也很敏感，因为他发现一些基本的食品也正在变得越来越短缺了。里卡尔迪还担心意大利剩余的外汇储备会很快花完，他的同事们也并不是全都相信墨索里尼对内阁所做的声明，即“国家不存在财政问题。只有战争的失败或者内部的瓦解才会影响到国家的兴衰。”当财政部长保罗·塔翁·迪雷韦尔试图把话题引到已有的先例——法国革命及印发纸币的灾难性后果时，墨索里尼回答说：“革命必须要聪明。法国革命最终是不聪明的。”但是，让天真的博塔伊感到沮丧的是，墨索里尼并没有进一步解释为一场法西斯战争提供财政支持的理想的方式到底是什么。**为了显示自己法西斯式的虚张声势，保罗·塔翁·迪雷韦尔高兴地谈到，意大利可以通过拍卖在火灾中受损的众多“无价的”艺术作品来克服任何财政收支困难，这让齐亚诺感到非常震惊，但墨索里尼却认为他的财政部长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主意。

国内的情绪和变化可能经历了许多变化，但德国仍然是切实存在的问题，柏林的吉凶仍然未卜。那么，希特勒、里宾特洛甫和戈林三个人关起门来讨论墨索里尼的信件长达3个小时但却没有给予正式的答复，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希特勒真的像阿托利科所说的那样“不是一个正常的领导人，而是一个不正常的领导人”，那么他的奇思怪想可能会把他带向何方呢（尤其是当他的随从们现在已经毫不犹豫地显示出他们对意大利的冷淡的时候）？前线又在发生什么事呢？正像意大利国王向齐亚诺询问的那样，如果德军在春季攻势中取得胜利并且有所收获，那么形势将会如何呢？“战利品”又将怎么样呢？对于克罗地亚的法西斯首领帕韦利奇（他当时说了许多讨好的话，包括意大利在科索沃具有优势，以及“天主教”克罗地亚人与意大利之间是完全团结一致的等）的图谋，以及随之而来的阻止德国向意大利东北部边境渗透的可能性，意大利是否应当漠然置之呢？

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困境，难怪墨索里尼又开始对他的胃痛病和意大利人民进行抱怨了。他用一种明显是在掩饰自己的失败（以及他女婿的失败）的口气凶

* 对巴多利奥的电话窃听证明他反对参战，并且对法西斯党越来越不信任。

——译者注

** 《等级制度》在这段时间讨论了旅游业可能会对国家的经济作出大的贡献，这明显是不现实的。同样，博塔伊也试图回避目前的难题，他建议说尽管现代战争有赖于经济情况，但真正起到重要作用的并不只是生产，“组织”也同样重要。从这个角度来讲，法西斯意大利是一个榜样。

——译者注

巴巴地对齐亚诺说：“要想继续下去，就必须让人们从早到晚都整装列队，并且要给予他们一次又一次的重击。”

在这个困难的关键时刻，1940年2月底，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特使萨姆纳·韦尔斯带着一项“和平使命”访问了意大利并会见了法西斯领导层。齐亚诺友好地接待了韦尔斯并且评论说：“没有哪个国家喜欢与德国为邻。但意大利既然与德国是邻国，我们就必须尽我们的最大可能与它和睦相处。”墨索里尼也更加公开地显示出沮丧的态度。在韦尔斯看来：

“他的实际年龄是56岁，但他看上去却比实际年龄要老15岁。他郁闷呆板，安静而缺乏活力。他的行动像大象一样迟缓，每走一步看起来好像都很费劲。就身高而言，他有些过重了。睡觉的时候，他脸上的肉一条一条的，剪短了的头发像雪一样白。”

如果韦尔斯的描述是可信的，那么此时意大利所处的这种“非交战状态”明显让墨索里尼感到非常痛苦，意大利处在一种没有地方可去的状态。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出于自身利益，墨索里尼对韦尔斯和他的总统大加痛斥，并且就他与韦尔斯的交谈很快得出结论说，美国人想问题永远是那么肤浅，而意大利人对事情的判断则很有深度。

离开罗马之后，韦尔斯又动身到欧洲其他国家的首都进行了访问，在3月中旬又回到意大利。此时，他发现墨索里尼不管是在身体上还是在心理上都已经大大恢复，开始虚夸却没什么精确性地谈到要恢复《四强协约》。在这期间，墨索里尼又迎来了另外一个来访者——里宾特洛甫。齐亚诺对他非常憎恶，匆忙地回避去打他的高尔夫球了，在这种情况下，里宾特洛甫却受到了墨索里尼的欢迎。让墨索里尼感到宽慰的是，希特勒最终很友善地回复了他于1月5日所写的信件，墨索里尼把希特勒的回信认真地读了三遍。希特勒在信中告诉墨索里尼，德国与苏联的友好关系是有限度的，他仍然把墨索里尼和意大利当做真正的朋友。希特勒还说，其实什么都没有改变——德国和意大利仍然是两个孪生的“极权主义国家”，而英国和法国则下决心要摧毁他们。德意轴心继续有效（德国将在煤炭供应上为意大利提供帮助；就意大利永远急需安全的能源进口而言，与英国的谈判对此不会有任何的帮助）。

在3月10日和11日举行的长时间的会谈中，里宾特洛甫也重申了这些观点，并且还透露了一个非常紧急的消息，说德国很快就会采取军事行动。希特勒也急切地想与墨索里尼会面以讨论更多的相关内容。这次会面被安排在之后的一周进行，地点是在旧的奥地利边境上的一个地方。墨索里尼原来担心德意联盟会解散，而意大利与苏联相比也会失去吸引力，但是现在他的这种担心被消除了。于是，在与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举行第二次会面时他宣布：“意大利现在可能会不参与这场冲突。但是在适当的时机，它会参加战争并站在德国一边，但这种参战的方

式也将是平行的，因为意大利还有自己的问题需要解决。”他又补充说，意大利必须“能够自由地进入大西洋”，它的战争应当是一场地中海战争。墨索里尼的信心现在已经恢复得足够强了，他可以模仿日本的外交“迟钝”了，还可以吹嘘说意大利在西西里海峡的前哨潘泰莱里亚岛固若金汤。然而到了那天深夜，他又给克拉雷塔·佩塔奇打电话寻求安慰，承认自己“被会谈搞得精疲力竭”，但又说这下“把骰子已经掷出去了”。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他又预言说，根据德国的实力、它的军事训练和它的“哑巴武器”（它的恐怖很快就会显现出来）判断，德国将会赢得战争。

那么这是不是对于战争的最后决定呢？或者进一步说，是不是意大利对自己的“平行战争”的最后决定呢？也许是吧，但不是的可能性更大。里宾特洛甫回国走到阿尔卑斯山上空的时候，墨索里尼就已经再次经受“神经”的折磨了。他不久前都说了些什么呀（国王也在考虑这个问题，这是否从1925年以来第一次意味着，未来如果没有领袖，那将是不可想象的）？到3月16日的时候，墨索里尼已经淡化了将与纳粹团结一致的可能性。他声称，现在他是不会参战的，但他的这个决心仍然是模棱两可的。

3月18日，墨索里尼来到了勃伦纳边境地区。当时，罗马已是阳光明媚的春天了，可那里仍然在下雪。希特勒也到了，并且继续主导着会谈（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了）。希特勒态度非常坚决地说，德国必将赢得战争。他又补充说：“意大利和德国的命运已经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了一起。”与苏联签订的和约只不过是政治手段而已，而且苏联正在朝着“斯拉夫—莫斯科人”的方向发展，已经远离了“犹太—国际主义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墨索里尼也只是点头称是，并且确认自己是第一个以现实为基础与苏联打交道的人。据齐亚诺的日记记载，墨索里尼仍然认为自己对希特勒这个纳粹领导人是有“吸引力”的。但是，墨索里尼却没有做出任何最终的承诺就回到了罗马。3月31日，他告诉齐亚诺、国王和他的军事将领们说，目前的形势仍然是“极不确定的”。他对德国立即发动侵略的可行性表示怀疑，但这一次他的判断又错了。如果意大利不愿意像瑞士那样保持中立，那它就必须参加战争，并且按照正常的逻辑，意大利应当跟德国一伙。因为如果它倒向另外一边的话，就会招致德国对意大利发动进攻，而到那时意大利可就只能单独抗击德国了。意大利到底想要什么？墨索里尼并不是第一个遇到这一问题的意大利政治家，1922年以前的自由党政府的领导人也碰到过这个问题，实际上，加富尔*之后所有的意大利政治家都曾面临过这样的问题。最终，墨索里尼的结论是，意大利应当参加一个短期

* 加富尔（1810~1861），意大利政治领袖，曾任撒丁总理（1852~1859年，1860~1861年），并辅佐撒丁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统一意大利。

的战争，并且它的参战要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希特勒发动了春季攻势，欧洲北部也腾起了战争的硝烟。1940年3月1日，希特勒下达了准备入侵挪威的命令，4月9日，德国就发动了进攻。在之后的几周里，英军在挪威北部的多个海港登陆，但却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胜利来得轻而易举，希特勒大受鼓舞，他立即给墨索里尼写信，一是报捷，另外还对“我们共同的事业取得的伟大胜利”而欢呼。墨索里尼听到这些消息的第一反应是闷闷不乐，并且很少有迹象表明他受到了“法西斯主义的普遍适用性”的激励（尽管在4月初，他还再次试图与弗朗哥就可能的政策协调一致）。墨索里尼并没有浪费时间来向纳粹表示祝贺，他正在大谈自己发现的意大利民意的变化。他阴郁而险恶地总结说，人民就像是一个“妓女”，只会去寻求一个“征服她的男人”。但是，在给希特勒的回信中，他的有关意大利民意的结论却变成了“对同盟国抱有坚定的敌视情绪”。

毫无疑问，不管是哪个阶层或者政治派别的意大利人，都受到德国人取得胜利的消息的影响。虽然被任命为战争生产部副部长（直接向墨索里尼汇报工作）的卡洛·法瓦格罗萨警告说，意大利的准备并不充分，只能应付最轻微的军事行动，但是掌管财政的部长们却像穆蒂一样愿意跟着德国人摇摆。墨索里尼还比较冷静，4月22日，他声称意大利可能会在“1941”年参战；但是仅仅三天之后他又改口说，法西斯会参战的，但要等到它有了“像数学一样确定的把握”。持反德立场的齐亚诺倒是一下子显得孤立了，他很不慎重地对高尔夫俱乐部里的一些朋友说，他在考虑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要求把他的岳父抓起来。4月17日，他又对博塔伊说，墨索里尼只不过是一个小人物，特别是与希特勒相比，这可把博塔伊吓坏了。博塔伊在自己的日记中用像是从学生的宗教手册中抄来的句子写道：

“我保持了沉默。我不敢承认心中的痛苦。我们这一代人的一切都是墨索里尼给的。就是墨索里尼。我们不能没有他。必须承认，他和我们像鱼和水一样是分不开的。”

当博塔伊还在坦白地坚持法西斯的理论或者说某种信仰体系的时候，形势的发展却正在驱使意大利尽快作出一个决策。随着纳粹占领挪威，意大利国王和巴多利奥也都开始重新为自己塑造一个“不反德”的形象，但是前线形势的发展却打破了他们的这种小心谨慎。5月10日，德国军队直扑低地国家*和法国，希特勒用恺撒式的语言通知他的意大利同事说，这一行动意味着他已经“跨过了卢比肯河**”。此时，意大利参战几乎已经是确定无疑的了，但墨索里尼仍然有些迟疑。5月10

* 低地国家，欧洲西北部地区，包括比利时、荷兰、卢森堡。

——译者注

** 发源于意大利中北部，公元前49年恺撒及其军队渡过此河，从此开始了内战。引申的意思是只要越过或经过就无可挽回的一个界线，通常会造成不可改变的事实。

——译者注

日的时候，他认为德国人已经获胜；但到了5月11日，他又认为意大利再等一等更好。他又扯到了一些枝节问题，对齐亚诺说教皇是“侵蚀我们国家健康肌体的一颗毒瘤”。他还用夸张而野蛮的语言说，所有他需要做的是召集罗马涅地区“7个城市”的人民，就可以把国王和教皇一起永远地赶走。*虽然发表了这些出格的言论，但他并没有显示出要采取行动的迹象。对于5月17日的战事，墨索里尼又一次强调要保持冷静。但是就在前一天，他还发表演讲说，如果意大利不参战，那么它就会变成“二流强国”。**

但是，意大利的选择范围越来越小了。好像是为了逃避前一段发生的事情一样，齐亚诺溜到了他在阿尔巴尼亚的封地，***在那里，人们在欢迎他的时候欢呼：“领袖！齐亚诺！”但是博塔伊却恶毒地认为，他听到的是“领袖齐亚诺！”法西斯意大利的决策程序是不透明的，不知怎么的就作出了决策。5月29日，墨索里尼把巴多利奥及其他军事将领们召集到了一起。私下里，他告诉他的总参谋长说，他确信战争将会在9月之前结束，而意大利只需要“付出几千人的伤亡就能够作为一个交战国去参加和平会议了”。****而在更加正式的会议上，墨索里尼又用国王的名义发出了号召，敦促说意大利不能置身于战争之外。他强调说，“我们绝对无法避免战争，我们也不能站在同盟国一边，我们只能与德国一起打这场战争。”他还说，德国在地面和空中都有绝对优势，美国人也难以阻挡他们。至于意大利军队，他们的准备虽然还不是太理想，但是还可以打仗。6月5日，战争将在“所有的前线”展开。

第二天，希特勒也发布了同样的消息，而墨索里尼也强调说：“我将担任所有武装部队的司令。”巴多利奥和法瓦格罗萨对必须参加重大战役还持怀疑态度，在获得德国的同意之后，意大利的参战日期又往后推迟了5天。最终，在6月10日的下午，墨索里尼站在威尼斯宫外的阳台上发表了讲话。批准集会的命令是前一

* 教皇当时还在希望通过妥协达成和平。

——作者注

** 1940年5月初，墨索里尼还斥责了克雷莫纳地区的官员（无疑，在他们身后的人是法里纳奇），抱怨说意大利的人口增长太慢，以至于意大利的人口现在才只有“4500万”，而斯拉夫人则有“2.5亿”，日耳曼人也有“1亿”。他的这番话再次证明从他口里说出的数字一贯是不精确的，另外，他也担心战争的实际“震中”会在地中海。

——作者注

*** 他汇报说，阿尔巴尼亚的合作者支持战争，因为这样他们可以获得科索沃以及希腊北部的部分地区。

——作者注

**** 巴多利奥警告说，这意味着“自杀”。

——作者注

天刚刚签署的，因此民众都是急匆匆地赶来听他的演讲。墨索里尼宣布，“天命”注定会有战争：“我们要上战场去与西方那些财阀和反动的民主国家战斗，因为他们多次阻挡意大利人民的前进，甚至威胁到我们的生存。”他又说：“我们的意识非常清晰，荣誉、自身的利益和未来，我们都不能忽视。”他又用了一个比喻解释说：“我们要斩断环绕在‘我们的海’里的、把我们束缚得快要窒息的领土和军事的锁链。如果没有一个自由的出海口，有着4500万人口的意大利人民就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墨索里尼又把法西斯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言辞结合在一起补充说：

“大规模的战争只是我们的革命合理发展的一个阶段，这是一场穷人们反抗那些掌握了世界上所有的财富和黄金却还想把我们饿死的人的战争，一场有生命力的年轻人反抗那些衰老的、走向暮年的人的战争，也是两个世纪、两种理念之间的一场战争。”

在西班牙，佛朗哥也兴奋地承诺说，他将立即把西班牙对待战争的立场调整为“非交战状态”，暗含的承诺是，西班牙在参战并加入（获胜的）轴心国一方之前可以成为一个补给站。对于形势的变化，齐亚诺在日记中更加充满感情地记录下了他当时的感受：“我感到悲伤，非常悲伤。冒险开始了。上帝，帮帮意大利吧。”一个退休的自由党和民族主义外交官更具洞察力地写道：“说来奇怪，总的感受倒是觉得解脱了。那段痛苦难熬的时期终于结束了。虽然命运可能会更好或者更坏，但毕竟骰子已经掷出去了。”1940年6月10日正好是贾科莫·马泰奥蒂被害16周年纪念日，这是不是一个明显的征兆呢？先前犯下的臭名昭著的罪行所沾上的血污还没有洗干净，墨索里尼就又选择加入了一场危险的战争。的确，血债注定要用血来还。

在意大利参战6个月之后，明显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英国首相丘吉尔宣布，意大利做出参战的选择，这个责任“只应当由一个人来承担”。在编写历史的时候，丘吉尔的这句话也多次被重复，因为把“罪过”归到墨索里尼一个人的身人更加符合许多历史学家的利己主义和意识形态（齐亚诺的日记中所描述的细节也为这些历史学家的观点提供了支持）。意大利选择参加战争很快就被证明是一场灾难，1943年9月8日，统治这个国家的旧精英们全面彻底地崩溃了。巴多利奥和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想改变立场也没有成功，意大利人有足够的理由把墨索里尼拿出来加以谴责。事实上，很少有意大利的历史学家不接受这种有意安排的立场，即认为大人物在当时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例如，虽然修正主义者德菲利切也认为墨索里尼当时选择参战的动机至少有一部分是可信的，即对纳粹德国心存疑虑并且想在某种程度上限制它的霸权，但他还是同意是“唯一的一个人”让意大利卷入了战争。

但是，正如我在讲述墨索里尼的政治路线在“非交战时期”发生突然转变时所指出的那样，对于他的权力的全面性和绝对性也有怀疑的理由。虽然他在表达希望和平能够继续时所说的话听起来很不舒服，但他的确是等到他的可怕的盟友

看起来即将取得胜利时才真正参战的。用数学的方法来衡量（借用一下墨索里尼式的比喻），与1914年至1915年时的意大利自由党政府相比，法西斯意大利对战争形势的观察更为小心谨慎。也许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任何相信意大利是或者应当成为一个强国的意大利领导人，哪一个愿意比墨索里尼等待更长的时间呢？违反事实的历史是很难加以反驳的。但是，这仍然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更多的是因为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其他意大利人——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在法国陷落的几周里，逐渐打消了他们心中对意大利参战怀有的疑虑并掩饰了他们对纳粹德国的憎恶。到1940年6月的时候，就连天主教会也接受了这样一个概念，即意大利可以参加一场即将取得胜利的战斗。换句话说，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这样认为，即在1940年6月中旬那种特殊的情况下，墨索里尼做出了一个并没有多少人对其提出异议的“决策”。

然而，无可争议的事实是，意大利的参战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证明是犯了一个错误。虽然意大利在“二战”中相对属于外围国家，承担的任务也不是很重，但这场“测验”还是非常明显地暴露出法西斯主义的局限性以及墨索里尼声称的革命的肤浅性，同时也明显地暴露出意大利人想成为“国际强国”这种野心的愚蠢性，而在意大利复兴运动之后，这种野心就一直在受过教育的意大利人的思想中不断膨胀。很多国家都有类似法西斯意大利的经历，即它们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信仰方面的空洞和虚假在战争中暴露无遗——衰落的法国和被德国摧毁的波兰就是先例。但是，就法西斯意大利因为参战而暴露出的在野心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而言，其他参战国倒是无法与之相比。对于这样一个灾难性的“失败”，意大利的领袖，贝尼托·墨索里尼，必然承担许多历史谴责。

同样，在读相关的历史记载时也要小心。不管是持什么样的意识形态立场，这些历史文献中都有很多有关意大利在战争中在军事、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失败之处的叙述，但奇怪的一点是，这些描述通常要与“比意大利强一些”的国家进行一番比较。在“二战”中表现最“英勇”的有三个国家，在战败一方有纳粹德国和帝国主义日本，在战胜的一方有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是不是不经过讨论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历史应当为意大利这个国家，或者法西斯“革命”，或者墨索里尼没有能够达到这些国家当时的水平而感到悲哀？虽然许多军事历史学家都受到这种想法的束缚，但也许输掉战争并不总是最差的选择。

意大利几乎是立刻就表现出了失败的征兆。几个月来，英国一直在地中海对法西斯海军的动向保持着警惕，在意大利正式宣战之前两小时，他们就攻击了一艘意大利潜艇。从6月11日开始，同盟国的战机就轰炸了意大利北部的一些城市，如都灵和热那亚，意大利防空力量的全面严重不足让人们感到非常沮丧，而法瓦格罗萨在参战前就已经指出了这一点。偶尔也会有谣言说和平很快就要来了，只有这时，民众的情绪才会稍有振奋。意大利军队在法国边境上的进展非常缓慢，一

遇到抵抗，他们立刻就会很不光彩地撤退。6月28日，在利比亚，伊塔洛·巴尔博成为意大利第一个在战争中死亡的重要人物。当他乘飞机飞过托布鲁克上空的时候，神经紧张的意大利士兵误击了他的飞机，把他给打了下来。几个月之后，墨索里尼声称，他的老同事有“太多的缺点和过错”，是一个“没用的白痴和奸商集团”的牺牲品，从而，这个来自费拉拉的法西斯诸侯也沦落成为墨索里尼准备高兴地忘记的一个“朋友”。

从意大利参战之后最初的几个月所发生的事件和国内表现出的态度可以看出，法西斯在军事和社会现代化方面存在着极大的结构体制方面的缺陷。虽然墨索里尼曾粗心大意地说起他有“800万刺刀”和完全军事化的人民，但军队里的军官仍然是一个脱离了其他民众的等级集团。这些军官对他们自己当然是忠诚的，也许对君主也有一些忠诚，但国家其他的事就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了。这些军官的价值观与士兵们是有着极大的区别的，本来大多数意大利人就喜欢用方言进行交谈，这些士兵们在谈话中更是经常使用不同种类的语言。阶级差别在各个地方都非常明显，意大利许多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大学生都不用参军服役。参军服役的要求对其他社会群体也是有弹性的，那些得到朋友和关系人推荐的人都可以找到正当的理由免服兵役。到1940年9月的时候，战争部在中午时间居然还关门，理由是官员们每天都要午休。同样是在这个月，数十万已经被征召的农民又被解散回家去收割庄稼去了。这种挥之不去的依恋土地的情结也许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意大利军队顽固地拒绝现代意义上的机动性。虽然有着不同的原因，但是意大利军队中从军官到士兵都更喜欢使用马或者骡子，而不是卡车。

再来谈谈意大利的空军。在许多国家里，空军都被当做是更好地融汇了现代技术的空中堡垒，但在意大利，空军却还保留着一些工匠的色彩。空军里没有精确的数字记录，军官们更是无耻地把他们的库存飞机的数量夸大了数十倍，并且直到1939年，这种飞机严重缺乏的真实情况才暴露出来。战争一开始，意大利的生产能力仍然糟糕得让人觉得可笑。1942年，美国的工厂在一周之内生产的飞机数量居然比意大利在一年里能生产的数量还要多，单从这个数字就可以推断，战争的结局只会有一种可能。

相比之下，意大利的海军要更加有效一些。但是在1940年11月，3艘泊在塔伦托的军舰沉没了；1941年3月，海军又在马塔潘角失去了3艘重型巡洋舰。这些都让意大利海军的领导层明白，在勇猛的同时还要有正确的判断力。从那之后，意大利海军一直对与英国和其他同盟国的海军进行严重对抗心存余悸。并且，不同军种之间也从没有尝试过互相配合——海军将领们对航空母舰也很轻视，嘲笑说那东西是赶时髦的——而墨索里尼对于任何不经过自己而进行的讨论，也非常警惕和嫉妒。即使是在战时，意大利的指挥机构仍然非常杂乱无序。同时，墨索里尼也不时地横加干预，但主要还是想获得一种手中掌握权力的满足感。格拉齐

亚尼当时负责北非的事务，他还记得他的总司令在被领袖接见时带着“圆滑的微笑”，但离开时却并不认为墨索里尼要求他们执行的方案有什么好处。博塔伊也在日记中描述说，作为战争的领导人，领袖的指挥越来越“粗略”，他是一个“心中只有头号大标题的人”，他讨厌细节或者是讨论，宁愿“让事情放任自流”。同时，军方领导人之间也是勾心斗角，矛盾重重，都害怕在无休止的地位竞争和被赏识的竞争中落败。1941年12月的一份报告称，“整个国家生活中到处都充满了个人利己主义的冲突”，当然，这种情况在负责战争组织和供应的领域内也不例外。墨索里尼并没有能够建立一个有关军事和经济的优先体系，也不知道应该怎样把军事和当时仍然非常落后的工业（包括化学武器的生产）结合在一起。相反，他当时却把时间花在了学习外语上，居然能够静下心来把冗长的复兴运动时期的小说《约婚夫妇》翻译成德语。希特勒与他会谈时总是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他这么苦学德语，是不是希望能够更熟练地掌握德语以便下次与希特勒会谈时可以更容易地插话呢？

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官，墨索里尼的管理和指挥方法丝毫没有改变国家的战争准备不足的状况。他的典型做法是把军方领导人召集起来，然后就战争形势给出一个总体性的和表面化的评论。会议可能会就一些情况的改善提出建议，比如建议把飞机的产量增加到每月500架，但是却并没有说明怎样才能实现飞机产量的增加。并且，墨索里尼的谈话还一直存在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那就是统计数字很不准确，缺乏“数学般的精确”。

墨索里尼很少关注战争的后方事务，只是偶尔给些鼓励，同样，它也没有能够进行调整以适应整个战争的需要。1941年的时候，据说工人们还很崇拜他们的领袖，但是同时他们还认为“战争是法西斯自己的事”，他们并没有被包含在这个范围之内。1940年秋天，即使是在类似热那亚、米兰和博洛尼亚这样据称是汇集了战争经济的工业城市里，仍然有数以万计的意大利人失业。食物供应匮乏并且很不稳定，1941年至1943年间，每个家庭分得的食物配额与德国统治下的波兰差不多。负责发放粮食配额的官员在发放粮食前也要先为自己和其他官员留出一些，1940年6月，墨索里尼突然以偷窃粮食配额对该官员提出了指控，但是却被其他一些小心翼翼的官员劝阻了。即使是在富裕的威尼斯，情况也是如此。1941年3月，当地官员贝尼尼汇报说，比较贫穷的阶层连一些基本的食物如面包、面食和食用油都快没有了。与战争相关的主要行业仍然很脆弱，钢的产量远远低于一个真正的强国所应有水平，被一个历史学家形容为是“可笑的”。在1940年至1942年间，意大利的国内生产总值没有什么增长，并且生产在那之后也下降了。意大利的工业生产能力本来就很有限，但在1941年1月，德国人估计意大利的生产能力只发挥出了1/4。同样，意大利的武器不是陈旧就是设计不合理，并且在整个战争期间，且不说质量如何，意大利根本就没有能够制造出一辆坦克。

总而言之，正如一贯容易轻信的博塔伊在参战之初的几周里发现的那样，所有方面都显示出由于“临阵磨枪”而导致的“备战的失败”。有关墨索里尼自己的神话，以及他事无巨细都要过问的习惯，都给墨索里尼带来了更多的束缚。至少在1940年10月之前，他还幻想着战争会在短时间内结束，他甚至容忍法西斯官员们不集中精力应付意大利和法西斯政权目前所处的艰难处境，而是高兴地去为战后的一些活动做打算。这种混乱局面经常破坏已有的计划，正如博塔伊抱怨的那样，领袖对此的反应是：“如果事情办好了，功劳是他的；如果事情办砸了，他就会责备别人。”博塔伊总结说，这就是下面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墨索里尼永远是对的。”一个士兵总结得更加简单明了：意大利的战争是纯粹的“无政府状态”。看起来，墨索里尼的独裁政府好像非常软弱，在第一次经受战争考验的时候，好像没有人在控制它。

墨索里尼决定举办一个体育活动，这样既可以展示领袖的确是一个“超人”，又可以体现意大利“种族”的男子气概。虽然托洛尼亚别墅的花园里聚集了23名外国记者，但这次活动却搞得不怎么成功。墨索里尼穿着一件白色的运动短袖衫出场了，他先骑马做了一套跳跃动作。为了提高记者们的兴趣，他又把骑术和剑术结合起来做了一番表演。接下来，他又透露了一些生活细节，说他喜欢吃带黄油的面食、大蒜和奶酪，还喜欢吃椰菜和夏南瓜。之后是打网球。一个美国记者是这样描述的：

“这个独裁者穿着一件浅褐色的马球衫和短裤出现了，能够看到他参加“一战”受伤时在大腿上留下的疤痕。他玩的是双打，他像一个初学者一样充当底线球员，但他老是违反网球的规则，至少越过底线两步去击球。虽然他的网球技术并不怎么样，并且华而不实，但对面的两个球员——马里奥·德拉迪内利，罗马首屈一指的网球运动员；以及埃尔拉多·蒙佐格奥伊奥，意大利国家足球队队员——看起来居然很难把他的球回过来。并且，他们每次回过来的球都是又飘又慢，哪怕是一个瘸腿加断胳膊的人也能接住。领袖抛球、扣球并且微笑着，对自己的胜利感到非常高兴。”

但即使这样，他们还是失了一些分，也丢掉了几局比赛。记者们注意到，在他们注意观看的三局比赛中，墨索里尼和他的搭档卢乔·萨沃尔尼安都输了。因此，当亚历山德罗·帕沃利尼宣布比赛最后的结果是领袖以总比分7比5获胜时，他们都感到非常吃惊。

但是，类似的宣传活动并不能掩盖法西斯政权在前线遭遇到的惨败。意大利也想学一学纳粹德国的闪电战。1940年10月28日，在经过两个星期的军事准备之后，意大利军队从阿尔巴尼亚的基地出发，向希腊发起了进攻。但是，这场进攻的结果却是灾难性的。1940年11月10日，墨索里尼下令把希腊所有人口超过1万的城镇全部夷为平地。这种做法，与其说是他习惯性的由于粗心而表现出的野

蛮的一个例证，倒不如说是他越来越无能的一种表现。雅典非但没有像墨索里尼和其他法西斯领导人所预料的那样在几天之内就陷落，相反，希腊军队很快就发起了反击。他们越过了阿尔巴尼亚的边界，并且威胁要把意大利军队赶到亚得里亚海里去。一个受命检查登记军事装备缺乏情况的军官发现，破烂的军装在雨里淋着，机械化的后勤保障和医疗保障也是极为缺乏，不管是军官还是士兵，士气都非常低落。再说说意大利国内的情况。1940年12月，有报告说在播放有关领袖的新闻影片时，观众以沉默来表达对领袖的不满。6周过去了，胜利好像还很遥远，而意大利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比小小的希腊还要弱的强国；同样，墨索里尼的独裁统治看起来甚至连梅塔克斯将军的摇摇欲坠的反动政府还不如。

在之前的几个月里，意大利就曾时断时续地把希腊当成自己获取的目标。由于缺乏像纳粹德国那样的民族和种族的驱动力，所以意大利并没有主张对希腊实现民族上的统一（但是它的阿尔巴尼亚傀儡政权却有这样的主张）。事实上，如果希腊政府足够大胆的话，意大利没准儿会成为希腊民族主义者期望获取的目标。意大利之所以单单选择希腊作为进攻目标，是因为它的德国盟友曾在8月份告诫它不要去招惹南斯拉夫。德国这样做是因为狡猾的法国维希派*政治家们说服了德国征服者不要太过屈从于贪婪的意大利人——他们已经得到了萨伏伊、尼斯、科西嘉，居然还得寸进尺地妄想再得到吉布提——据德费利切说，墨索里尼对预言的仔细研究让他确信这场大战很快就要结束了。

当然，在地中海打一场“平行战争”的概念也一直只是一个概念而已。意大利参战仅仅9天之后，里宾特洛甫就告诉齐亚诺说，希特勒坚信“英帝国是保持世界稳定和保持社会秩序的一个要素，因此有着很大的作用。就目前的形势而言，要取代它是不可能的。”同样，对于意大利想把伊拉克和阿拉伯世界的其他一些国家争取到轴心国一边的计划（除了历史学家德费利切，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不太可能的），德国人也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如果意大利充分扩展自己的参战目标的话，那么要想使德国和意大利两国的参战目标相协调，看来还是不太可能。墨索里尼之前就在夸口说，意大利将在“5条战线”上发起进攻，在希腊，他好像还想开辟更多的战线，**但却没有考虑到他的计划实际上是支离破碎、不切实际的。意大利的军事计划忽东忽西、变化不定，但包括墨索里尼自己在内，谁也不知道这到底是因为什么。

* 维希派，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拥护设在维希的贝当傀儡政权的法国投降派。

——译者注

** 墨索里尼在给希特勒的信中大方地说，他想先放弃吉布提，因为它只是一片“沙漠”。他还轻松地认为没有必要担心美国，因为美国人正在竭尽全力地帮助他们的盟友。

——译者注

1940年10月15日，墨索里尼正式决定进攻希腊。^{*}墨索里尼之所以突然决定采取行动，是想仿效德国人对罗马尼亚的做法。他向齐亚诺抱怨说：“希特勒总是制造既成事实给我看，这次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将从报纸上看到我已经占领希腊的消息，这样我们就扯平了。”

在希腊遭遇惨败之后，意大利在其他地方也遭受了损失。在利比亚，墨索里尼越来越频繁地敦促意大利发起攻击，但胆小怕事的格拉齐亚尼将军对此却并没有理会。从10月底开始，意大利军队在英军面前迅速溃退——伊登满怀讽刺地评论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少的人打败这么多的人的战例。”1941年2月，在得到埃尔文·隆美尔将军支援的情况下，轴心国在利比亚的军队才得以重整旗鼓。意军后来攻占了英属索马里兰，法西斯政权也没忘对此大加宣扬，但是，意大利很快就在其他地方遭遇了惨败。英军攻占了亚的斯亚贝巴，^{**}它在1941年4月又回到了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的手中。当然，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统治只有短短的5年，并且它的统治也很肤浅。5年间只有56个意大利人被当地人暗杀，这也许也已证明意大利在那里的统治并不深入。1936年，几乎所有的意大利人都为意大利在（意属）东非建立帝权而感到欢欣鼓舞，但是现在，当意大利失去在那里的帝权时，却几乎没有什么人为此而发出一声哀叹。

这些挫折也导致了一些人的下台。12月初，在漫长的一个月里，从法里纳奇开始——他写文章说人们被在希腊和苏联发生的事给“弄傻了”——许多将军都先后下台。巴多利奥最终辞去了总参谋长的职务，另一个职业军官乌戈·卡瓦莱罗接任了他的职务。在去世后才出版的日记里，卡瓦莱罗写到，12月1日，墨索里尼让他负责组建一个以“富有成效的合作为基础的”总参谋部，而不能像他的前任领导的总参谋部那样老是出现“穆斯林式的旷工”。为了保证他能够胜任这一职位，领袖声称每天都要与他见一次面。墨索里尼也把同样的话对巴多利奥说了一遍（他认为领袖对军事问题的评论总是“总体性的”，一点也不具体）。但是，知道内情的士兵却已满腹牢骚地抱怨说，墨索里尼“每个下午”都与克拉雷塔·佩塔奇待在一起，而且经常找不到他。

战争的后方发生变化的时间更早，穆蒂在10月30日就下台了。根据警察的报告，这位党的总书记支持“解散”民族法西斯党，理由是在法西斯执政19年之后，作为一个法西斯和作为一个意大利人，这两者已经是无法分割了。同样，博塔伊

^{*} 1940年10月15日，墨索里尼接见了齐亚诺、亚科莫里和军方的将领。

——作者注

^{**} 1940年11月14日至15日，巴多利奥与凯特尔举行了会谈，他告诉他的德国同事，他对那里的情况不了解。

——作者注

也在《法西斯评论》上敦促说，战争应当成为“全国上下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和各个组织的一种生活方式”，但是他不久又有些矛盾地说，战争是“一种信仰的行为”，因此应当让它充满“我们法西斯信仰的神秘力量”。墨索里尼写的文章倒是没有这么呆板，但他同样一直都不相信法西斯党和人民已经合二为一了。他的法西斯政权发动的这场战争的一个明显的失败之处在于，它没有能够把意大利国家的概念和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真正地融入到大众的思想之中。当然，在1940年的秋天，有关地方上的腐败行为的谣言也是满天乱飞——墨索里尼自己也听说过这样一个笑话：帮助希特勒征服英国的最好办法是送给他“一打法西斯党的领导人”，他们是那么腐化贪婪，能够把英吉利海峡吸干。很明显，更换穆蒂将会牵涉到许多问题。事实上，新的总书记阿代尔基·塞雷纳是一个没有什么特点的党内官僚，之前曾担任过拉奎拉的市长和公共事务部的部长。他的确是一个有能力的管理者，但是在之后的一年里，他也并没有能够挽救法西斯党的颓势。

的确，法西斯党的党员人数一直在不停地增长，但这并没有什么意义——1942年，党员人数达到了顶峰：477万。然而就在一年前，德博诺还把民族法西斯党称做是“意大利最大的敌人”，甚至连墨索里尼自己也在努力地与党的一些明显的缺点保持着距离。1941年1月，他还宣布要动员他的部长们到阿尔巴尼亚前线去，齐亚诺描述说，当他在威尼斯宫的等候室里等待的时候，心里确是忐忑不安。博塔伊一向对“无情”的领袖保持着天真的信仰，但这时连他自己也崩溃了：“可怕的孤独。20多年来维持我心脏跳动的一种东西现在因经受了一个打击而突然停止了。一种爱，一种信仰，一种奉献。现在，我孤独了，没有了我的领袖。”

墨索里尼也被心理上的危机所困扰，他对卡瓦莱罗说：“鉴于我们目前的不利形势……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一切交给希特勒，因为我们已经没有能力做任何事情了。”他的同事们也注意到，他脸色苍白，明显有睡眠不足的迹象。此时，作为一个战时领导人，墨索里尼年事已高，在公务的重压和明显的失败面前，他正在崩溃。到1941年的时候，像法西斯主义和“强国”意大利一样，墨索里尼也正在逐渐衰弱淡出，这个过程可能会有所停顿，但却永远也不会逆转了。虽然如此，他还是在别的方面采取了行动。他仍然坦白不太懂得经济，也相信军方领导人最精通军事，但他还是希望有一天能够再次发挥他在“政治”方面的专业知识。然而，对他自己和他的同事来说，到哪里去找这种演练的机会，现在还不得而知。

然而，从多方面来讲，1941年都是轴心国取得胜利的一年，希特勒领导的联盟看起来即将赢得“二战”的胜利了。三四月份，轴心国联军挺进埃及——利比亚边界，并且节节胜利，包围了托布鲁克（于1942年6月陷落），直到1942年10月至11月份的阿拉曼战役。1941年四五月份，纳粹军队横扫南斯拉夫和希腊，6月，他们又在克里特岛消灭了最后一支抵抗的英军。4月份，帕韦利奇已经在萨格勒布掌了权。在德国的帮助下，意大利也在斯洛文尼亚（“卢比安纳”省被意大利

吞并)、克罗地亚、黑山和希腊取得了管理者的角色。6月22日，纳粹德国启动了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在希特勒宣布这一决定几小时之后，当时正在里西恩的度假别墅里睡觉的墨索里尼被叫醒了*——德军节节胜利，一直逼近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大门，直到最终被苏联的严冬所阻挡。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了美国珍珠港，“二战”扩展到了太平洋。不久之后，日本又从英国人手里夺下了新加坡，从而很有可能摧毁英国、法国和荷兰在亚太地区的帝权。

在这场规模空前的全球性战争中，墨索里尼没有为意大利争取到什么大的利益。同时，意大利在战争中的伤亡也不大，截至1943年7月，意大利在所有前线上死亡的军人只有20.5万人，平民也只有2.5万人死亡，总死亡人数只占“一战”中死亡人数的1/3（65万人）。这一数字更无法与付出巨大伤亡的苏联、南斯拉夫、波兰、德国、中国和日本相比（还有欧洲的犹太人）。也许，墨索里尼的感召力有时也会再次在法西斯的领导层或者意大利的平民中发挥作用。然而，意大利在希腊遭遇了惨败，而法西斯在此之后也明显地没有能够重整旗鼓，这都让大多数的意大利人，甚至可能包括墨索里尼自己在内，确信他们的国家和“革命”不可能再取得什么非凡和伟大的成就了，而是必须并且至多扮演一个（不光彩的）纳粹德国的帮凶的角色了。

意大利以外的国家的人是同意这种看法的。意大利在战争中相对“软弱”的表现让他们的德国盟友对他们非常蔑视——1941年6月，戈培尔厌恶地评论说：“我们有一个能够想象得到的最差劲的盟友。”他后来又补充说：“全欧洲最招人恨的就是意大利人。”最初，意大利的将军们还真的想请求他们的领袖去说服德国人不要只把他们当做辅助力量来对待，但是他们很快就放弃了这种希望独立的想法，在绝大多数战场上，他们都是心怀郁闷和不满地听从德国人的调遣。反过来，德国的指挥官们还指责意大利人“消极懈怠”，像“一群小孩”，“咖啡、香烟和女人就能够很容易让他们满足”。当危险临近的时候，纳粹军队也很高兴抛弃他们不怎么体面的盟国的军队，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东部战线上。即使是一直喜欢意大利的希特勒也有些动摇了，1940年11月的时候，他曾说墨索里尼是意大利“唯一真正的男人”。第二个月月初，他还表示同意戈培尔的看法，认为意大利人简直就是一个“笑柄”。后来，他又带着些吃惊和不安说：“谁将领导欧洲？是希特勒还是墨索里尼？这个问题现在不会再有什么疑问了。”在那之后，这两个法西斯的领导人经常通信联系，并且还多次见面互相交换意见。但是，在这些讨论中，希特勒总

* 据齐亚诺在日记里的记载，6月初的时候，希特勒就向墨索里尼暗示了他可能采取的行动，但墨索里尼当时的反应是嫉妒，他甚至希望德国人那里“掉很多的毛”。意大利驻德国大使罗索也是从广播上得知这一消息的。

是持一种高人一等的态度。而墨索里尼能做的只是偶尔在私下里满怀恶意地对自己的忠实而顺从的下属说，意大利和德国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比如，阿尔托—阿迪杰问题就可能引发冲突。但是再想一想，即使发生这样的冲突，意大利军队也注定会向德国人投降的，于是他又平静了下来。

虽然帕韦利奇有时也为讨好罗马而大谈“墨索里尼式的政策”所取得的胜利，但意大利军队和他们的喜欢行凶杀人的克罗地亚“朋友”也明显缺乏相互之间的了解。当时，来自萨伏伊的爱莫恩成为了新的克罗地亚国王托米斯拉夫二世，他被墨索里尼贬为一个“精神完全有缺陷的人”，但自从行完加冕礼之后就一直被软禁在萨格勒布。爱莫恩很明智地待在了意大利，并且为自己赢得了—个很好听的头衔：从不是国王的国王。巴尔干发生的事件进一步加深了墨索里尼对人类阴暗面的认识。1942年3月，他对卡瓦莱罗说，每一个前南斯拉夫的居民都应该被当做敌人看待。他又命令齐亚诺，如果有一个意大利人受伤，就要报复性地射杀两个当地人；如果有一个意大利人被打死，那就打死20个当地人。但是，他的女婿却说他“不会这么干的”。实际上，他有时也确实这么做过。在被意大利统治的南斯拉夫地区，法西斯的行为并不温和。罗阿塔将军后来就被指控在这一地区犯有战争罪，数以万计的“斯拉夫人”被害，许多都是在—大屠杀中死亡的。这些大屠杀连妇女和儿童也不放过，有的村庄甚至被整个夷为平地。10年前，在利比亚，意大利军队也是在墨索里尼的命令下犯下了不赦的罪行。但是，对于这些罪行，墨索里尼应承担的责任更多的是来自他对暴力和野蛮行为的习惯性认可，而不是直接地发布具体的命令。

意大利与西班牙之间的友好关系也出现了问题。墨索里尼想让佛朗哥在1940年夏天参加战争，但是当时西班牙国内的形势也很糟糕，而佛朗哥的军队还在镇压国内的共和党敌人。在意大利对希腊发动进攻的同时，佛朗哥也在昂代见到了希特勒，这次会面让希特勒确信西班牙并不愿意卷入战争。1941年2月，佛朗哥和他的外交部长拉蒙·塞拉诺·苏内尔又到意大利进行了一次访问，但是他们并没有与墨索里尼谈什么问题。墨索里尼尴尬地想为意大利的惨败进行开脱，而佛朗哥也小心翼翼地强调说最近的收成不好，他的国家还很穷。

当然，从1941年6月开始，德国和苏联已经在东线战场开战了。在写给墨索里尼的信中，希特勒解释说，发起对苏联的进攻让他有一种“被解放”的感觉。最终，他打了他一直都想打的一场战争。墨索里尼对此事的反应在表面上也很热情。这场反对共产主义的战争让意大利国内很多人都感到高兴——教会只是其中的一个——而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又可以复苏了。美国人的确讨厌，但他们并不能阻挡这次远征。墨索里尼总结说，“意大利人民的精神”现在“的确非常好”，他们已经准备好与他们的德国盟友“前进到底”了。但是，他的话中还是带着一丝怀疑。墨索里尼警告说，与苏联的战争是一场“与空间的战争”。但他又立即补充

说，毫无疑问，德国的飞机和坦克能够征服苏联的广袤，没有必要为这一点感到担心。当然，1941年11月的时候，他还是试图建议希特勒，现在胜利的关键还是要埃及边境取得与英国对抗的胜利，但是希特勒并没有给他明确的答复。在德国对苏联发动进攻之后，墨索里尼曾再次谈到，一旦他获得胜利，他将如何进行一场“真正的”革命。但是，与东线的意识形态大战相比，不管是意大利的国家利益还是意大利法西斯的意识形态都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

处于这种不现实的空想中，墨索里尼很高兴地看到日本把美国也拖进了战争。由于有移民的历史，意大利比其国家更想了解一下美国的经济实力。希特勒只是德国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分子，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对更广阔的世界也没有什么理解，但“墨索里尼教授”却不同，他曾一度立志要了解更广泛的知识。但是，就意大利对美国政府和人民宣战*而言，这两方面都没有起到什么重要的作用。回到1941年5月，墨索里尼还曾经这样贬低罗斯福：“历史上从未有哪一个国家的人民被一个麻痹症患者统治过。历史上曾有过秃顶的国王、胖子国王、英俊的国王甚至愚蠢的国王，但却从来没有一个连上厕所或者去吃饭都要别人帮忙的国王。”这是墨索里尼典型的野蛮的发泄方式。然而，到了1941年年底的时候，墨索里尼已经在拿意大利相对并不发达的经济和分崩离析的社会来与美国和苏联对抗了。在这场实力并不相当的对抗中，正是贝尼托·墨索里尼自己明白了麻痹症的含义。而在理解其含义的过程中，意大利同时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 据齐亚诺说，国王对此也持欢迎态度。

3 第一次落败和无力的复兴

日本的胜利也许是值得大加赞扬的（特别是对德国心存嫉妒的时候）。但是在1941年圣诞节的时候，节日并没有能够给墨索里尼带来欢乐，相反，他的厌世情绪比以前更严重了。从德国传来消息说，瓦尔特·布劳希奇将军突然被解职了，这意味着苏联还没有被“从地图上抹掉”。东线的战事是否证明希特勒是一个“傻瓜”？——尽管齐亚诺声称是一个德国外交官曾这么说过，但他在日记中写下这个词时肯定也很高兴。这些日子很难看到墨索里尼脸上出现笑容，相反，在与齐亚诺见面时，他也时常显露出内心的怨恨和恼怒。之前，他还在猛烈地抨击要求把他的军队进一步政治化的建议（在他看来，这又是一个无聊并且根本没用的建议），现在，他又转而反对起圣诞节来了。他说，他很纳闷德国人为什么没有废除这一节日。这个节日“只是纪念了一个犹太人的降生，而这个犹太人给全世界带来的理论只能让世界变得软弱无力。”他又抱怨说：“耶稣的影响正在意大利泛滥，而教皇的本事也只是让意大利社会变得支离破碎。”墨索里尼夸口说，为了根除这一邪恶的影响，他已经禁止意大利的报纸谈论耶稣的诞生。但是，这么做是徒劳的。齐亚诺在他的日记中倾诉说，当领袖从“两半球之厅”的窗户望出去的时候，他就会发现，外面街上那些熙熙攘攘的人群“仍然记得圣诞节并且喜欢它”。也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墨索里尼现在即使想做一个“格林奇”都遭到了失败。

也许一些法西斯党的忠诚分子会把他们的庆祝时间推迟到法西斯的主显节（1月6日，耶稣显灵日，或者称“圣诞节的最后一天”，在意大利是传统的互相交换圣诞节礼物的日子。在独裁统治下带有些法西斯的色彩）。当然，墨索里尼也给他的下属、法西斯党和全国上下保留了一份圣诞节的“惊喜”：12月26日，墨索里尼宣布解除塞雷纳的民族法西斯党总书记的职务，继任者是阿尔多·维杜索尼。齐亚诺对此事感到非常吃惊，他写道：

“接任总书记职务的是维杜索尼，他因为在西班牙作战英勇而获得过一枚金质奖章，只有26岁，拥有法律学位。但除了上面这些情况，我对这个人没有更多的了解。很明显，我们是在讨论一个大胆的试验，让我们祝愿这一次运气会真的与

勇气同在。我对这个人根本不了解，甚至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一天之后，齐亚诺发现这个消息所造成的结果是“全体迷惑”——从地位卑微的高尔夫俱乐部的小球童到赫赫有名的朱塞佩·沃尔皮，后者当时已经是米苏拉塔伯爵，并且同时担任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和意大利—克罗地亚经济委员会两个机构的主席。*所有的意大利人都在嘲笑墨索里尼的这一选择。即使是在政界里与这位新的政治明星比较熟悉的人也感到迷惑不解。齐亚诺尖刻地回忆说，当维杜索尼指责“党内像老妓女一样的气氛”的时候，这个年轻的总书记在“汗血”。他看起来是一个狂热分子，一个真正的法西斯信仰者，也许这么说还是好听的，但大多数人看他都是“从领袖脑袋里蹦出来的”，就像是“从朱庇特**的脑袋里蹦出来的密涅瓦***一样”。

一周之后，维杜索尼来到外交部与齐亚诺讨论巴尔干的局势，齐亚诺对这个新一代法西斯化身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那一地区不稳定的形势一直困扰着意大利的东北部边境，游击队反抗法西斯统治的活动也正在扩展。维杜索尼的观点非常直接：意大利应当清除所有的斯洛文尼亚人。身为政治家和资产阶级的齐亚诺则提醒说：“那儿可有100多万斯洛文尼亚人呢。”维杜索尼的回答是：“没关系。我们可以像土著兵（意大利从厄里特里亚和索马里兰征来的黑人殖民地士兵）对待他们的敌人那样，把他们消灭就是了。”看起来，这是一个把时代精神融入到轴心国事业中的年轻人（但是，他用黑人士兵来做榜样表明他没有能够深刻领会“科学的种族主义的含义”）。

德费利切认为，墨索里尼更换总书记是他最后一次试图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组织法西斯党，但是选择维杜索尼看来更像是一种绝望之举。领袖可能也曾对全党说过，年轻人必须有出头之日（他还暗示说维杜索尼其实是28岁，而不是26岁****），维杜索尼可以先做他的“徒弟”。墨索里尼还敦促新的总书记要把工作重点放在“政治事务”上，要加强对人民的教育和信仰的灌输，而不要放在“警察活动”上，他认为那应当是由“国家”来做的事。他还得出结论说，一场持久的战争也有它的好

* 沃尔皮一直在鼓吹达尔文主义，声称在战争中一些军队注定要实现征服，而另一些人注定要被消灭。

——作者注

** 朱庇特，希腊神话中的主神。

——作者注

*** 密涅瓦，掌管智慧、工艺和战争的女神，即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女神。

——作者注

**** 但是克雷塔克却记得维杜索尼只有25岁，同时还认为这一任命反映了墨索里尼对其所有下属的轻视。

——作者注

处，这样它就可以迫使所有的意大利人从精神上深入地挖掘，直到最后在国内和国外都赢得战争。但是，不管是维杜索尼还是墨索里尼，现在都无法掩盖正在崩塌的法西斯主义大厦到处都在发出的噼噼啪啪的爆裂声。

对于墨索里尼更换总书记这件事，老的法西斯精英们想得越多，他们就越觉得墨索里尼轻视了他们。所有这些人先前都认为自己是领袖的特殊的“散发物”，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他的至交密友，但是现在却沦落成了没有什么价值的无能之辈。法里纳奇*、齐亚诺**和博塔伊***心中都不服气：维杜索尼这个“白痴病患者”和“低能儿”现在居然突然要成为他们的竞争者或者上级了。更糟糕的是，他们的判断居然不幸言中了。有谣言说，这位新的总书记为了显示自己的年轻、男子气概和顺从的精神，每次一进威尼斯宫，都要从领袖的办公室门口一路小跑地跑到他的办公桌前。维杜索尼还会喊一些法西斯口号，但是，作为法西斯“神秘主义”的一个载体，这位新的总书记却进一步证明，法西斯主义并没有能够彻底改变人们内心的思想，同时也证明要担任一个管理者的职位的确是需要经过一些培训的。1943年2月，警察提交的一份报告把维杜索尼的任期总结为“一场灾难”，特别强调说因为他“缺乏组织能力，致使党的精英进一步流失。”这位评论者进一步抱怨说：“维杜索尼的工作仅限于到医院里去慰问伤员，以及参加足球赛或者拳击比赛。”在任职14个月之后，维杜索尼仍然没有能够与党内的主要人物搞好关系，也没有能够理解他们的行为方式。那些关键人物仍然在质问，作为党的总书记，他到底在做些什么？领袖为什么要把这个无名小卒提升到这个有名无实的显赫位置？换句话说，墨索里尼之所以更换总书记并选择维杜索尼，与其说是想把民族法西斯党变成他自己的党，还不如说是想有意疏远与他那些最紧密的追随者之间的关系。1943年4月，当维杜索尼最终离职的时候，墨索里尼自己的衰亡也即将来临了。

1942年1月，当墨索里尼在讲话中把维杜索尼介绍给他的新同事的时候，他就声称：“在我们执政20年之后，两代人都在争夺政府。一代人正在日落西山，而

* 1942年11月，法里纳奇给墨索里尼写了一封长信，提醒他注意公众对此的不满，并敦促他立即采取行动。他又补充说：“党在所有方面都无所作为。维杜索尼确实是一个勇敢的孩子，但他只是一个孩子而已。”

——作者注

** 维杜索尼声称，鉴于战争拖的时间比较长，他要关闭高尔夫俱乐部。这让墨索里尼的女婿尤为愤怒，憎恶地称他听起来就像是一个1920~1921年间的社会主义暴徒。另外，维杜索尼还声称要严厉追究逃税者的刑事责任，这也让齐亚诺大为惊骇。

——作者注

*** 博塔伊说，维杜索尼甚至读不懂他的下属为他写的稿子。

——作者注

另一代人正如旭日初升。”他又借用在自己的世界观中占主导地位的达尔文主义的理论补充说：每一代人都要与他的前辈竞争。但是，这是一个危险的观点。墨索里尼三十九岁就当上了总理，1943年的时候他将年满六十岁。而他的大多数同事年龄都比他小，许多人甚至比他小十岁甚至更多，而齐亚诺只有四十岁。这些人是否也是构成“新一代”^{*}的一部分？他们是否也注定要取代老一代？宣传家们还可以说“没有人像他那样能永葆青春，也没有人像他那样就是为历史、为政治和为法西斯主义而生”，并且补充说人民需要“他”，就像是他们需要“面包和空气”一样。但是，一个永远年轻的领袖的可信性实际上正在崩溃。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老”这个词也越来越适合用来形容墨索里尼了。1942年10月的一个晚上，在与墨索里尼见面之后，博塔伊对其作了一番非常典型的描述。墨索里尼明显正在衰老，“他脸色灰白，两颊深陷，嘴巴痛苦地下垂着”，好像是他的溃疡病又引发了疼痛一样。博塔伊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个人并不是累了，或者内心沮丧、郁闷，而是年事已高。”对那些“爱他的人，以及那些不顾一切仍然爱着他的人”来说，他这个样子会让他们感到沮丧的，特别是当他真的拉着他们的手和他们说话的时候。他正在毁灭他原来的形象。博塔伊即使在和他的下属谈话的时候，也悲伤地承认说，墨索里尼现在因为他的又秃又亮的脑袋而被嘲笑为“硬奶酪”，而他的脑袋“一度曾是代表他的吸引力的地方”。他又说，“那个曾经永远正确的人，现在在大多数人看来，总是错误的。”“曾几何时，任何明显的成绩或者优点都要归功于他。但是现在，任何糟糕的事情都可以拿来责备他，即使根本不是他的错。这就是因果报应的结果。”

那么，在1942年至1943年间，墨索里尼的健康状况怎么样呢？在何种程度上可以称他是另外一个在军事指挥和身体状况两方面同时衰弱的战争领导人呢？自从1925年那次患病之后，墨索里尼就一直经受着十二指肠溃疡的痛苦。同时，他在大部分时间里膳食都很谨慎（尽管医生说这是由于细菌感染，但他还是过分依靠牛奶和其他奶制品），避免吃肉、饮酒和抽烟，这些安排都是合理的。法西斯的宣传家们把他塑造成一个永远年轻的有男子气概的人，在床上精力充沛，并且精通所有能想象得到的体育运动，但是，他的头发却在五十岁的时候变白了，这与官方宣传的形象是不一致的。在战争的压力下，曾经喜欢游泳、慢跑和骑马的领袖逐渐变成了一个健康状况恶化、有时甚至精疲力竭的人。

1941年8月，墨索里尼家族中也有人在战争中死亡了：布鲁诺在托斯卡纳担任轰炸机试飞员时因为飞机失事而死。布鲁诺的遗孀忍痛收拾好丈夫头天晚上在

^{*} 博塔伊的刊物《法西斯评论》还曾称赞维杜索尼是“最年青一代”的化身，这确实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一个比萨旅馆里睡觉时所用的被褥和枕套等遗物，然后带着这些遗物去见她悲痛欲绝的婆婆了。墨索里尼从未亲近过他的几个小儿子，但是据说在布鲁诺死后，他也努力花更多的时间与维托里奥待在一起。弟弟阿纳尔多去世时，他曾写过一本《阿纳尔多的一生》，现在，他也为布鲁诺写了一本名为《我与布鲁诺谈话》的小书。与前一本书一样，这本书也很奇怪，法西斯的严厉与脆弱的家庭感情交织在一起。书中也有虚伪做作的内容，把布鲁诺也神化了，称他是一个勇于追求胜利的战士。同样，墨索里尼还在书中强调了有关父子关系和布鲁诺的坟墓的秘密，同时还以法西斯式的大吹大擂来向公众宣传他的书。与布鲁诺熟悉的人发现书中塑造的法西斯英雄与真正的布鲁诺一点都不像，根本反映不出他们认识的那个“害羞、胆小、专横、少言寡语和压抑”的布鲁诺。

虽然没有放弃在托洛尼亚别墅和卡米内特堡里的家庭生活，但由于日常生活中也有不顺心的地方，因此这种家庭生活也没有能够帮助缓解墨索里尼的压力。从婚外私通中获得的满足也得不到保证。他与克拉雷塔·佩塔奇的关系仍在继续——齐亚诺以及其他下属竟然公开说墨索里尼的闲话，吹毛求疵地谈论起他的“老年性欲”来。而阿尔皮纳蒂被放逐期满回来后说，克拉雷塔在里米尼也是非常爱管闲事，就像其他“墨索里尼的女人们”在罗马涅的其他地区的行为一样。虽然墨索里尼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缺乏活力，但克拉雷塔每次回到罗马时都要在她的卧室里住上一段时间。她的卧室里有很多镜子，还有一个整套的黑色大理石浴室——连德费利切都严肃地评论说，它看起来“像美国电影里的东西，明显缺乏品味。”在办公室里熬过了艰难的一天之后，墨索里尼习惯于在深夜给他的情人打个电话，通常是抱怨繁重的工作和失眠，而两人之间并不值钱的情话也能让他放松一些。这些电话大多被录了下来，例如，墨索里尼在1940年6月9日和1941年6月22日这两天的半夜里打的电话——在后一天的晚上，墨索里尼预言德国进攻苏联将是一场灾难。他说，德国将赢得许多战斗，但最终将输掉整个战争。克拉雷塔当时也经常生病。1940年，她好像有过一次宫外孕。还有谣言说她流过一次产。1941年12月，警察在窃听她的电话时听到她告诉墨索里尼说，她怀上了他的孩子。虽然最终并没有孩子出生，但听到这一消息，墨索里尼照旧说了些俗套的表示高兴的话。克拉雷塔对墨索里尼的健康问题也非常焦虑，向他的医生们施压说要确保他的健康状况有明显的改善。也许可以推测两人都患有抑郁症，这可能是维持两个人的关系的一个因素。

同样，马尔切洛·佩塔奇也惹了不少麻烦。他与一个威尼斯的女伯爵就一处房产发生了公开的争吵，从而引起了广泛注意。1942年夏天，还有谣言说他非法倒卖黄金。里卡尔迪谈起此事都替领袖感到丢人，因为墨索里尼被迫承认纵容他的“家庭成员”侵吞公款。1943年2月，佩塔奇把她的年轻无知发挥到了新的最高水平：她为领袖制定了一个赢得战争的蓝图。这是一份异想天开的计划，包括

组织和联合西班牙军队对摩洛哥的英美联军发动突然袭击，联合土耳其对苏联发动进攻，联合中国出兵西伯利亚（让日本去进攻印度和澳大利亚），所有这些行动还要获得梵蒂冈的支持。佩塔奇还补充说，如果这些计划都不可行，他可以通过一个不知名的朋友买通斯大林，或者通过塞缪尔·霍尔买通英国。按照佩塔奇的估计，很明显需要做出一些安排，因为英美联军的力量要比意大利军队强10倍。

克拉雷塔的妹妹玛丽亚所从事的行业也是丑闻不断。她生于1923年，虽然嗓音有点尖细，但是到1940年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个小歌星了。后来她又有一些色情电影里扮演了一些角色，还用了一个艺名：马里亚姆·迪·圣塞尔沃洛。1942年6月，她嫁给了一个伯爵。*毫无疑问，佩塔奇一家的丑行进一步损害了墨索里尼的感召力——到了1942年年底的时候，连博塔伊都评论说：“法西斯政权正在受到‘蓬巴杜侯爵夫人’**的影响，而这个‘蓬巴杜侯爵夫人’的本质却是恶劣的！”

看来，获得性的满足是要付出代价的。此外，到1942年的时候，克拉雷塔已经有了一个竞争者了。她名叫埃莱娜·库尔蒂，才19岁，是一个打字员，也是一个学哲学的学生——她所学的专业正好满足了墨索里尼的需要。墨索里尼习惯在下午泡在库尔蒂的公寓里聊天，享受一个年轻女孩对他的崇敬所带来的那种心理满足感（当然也要忍受克拉雷塔的嫉妒）。毫无疑问，墨索里尼对于这种安慰的渴求也是为了抵御自己在办公室时常有的那种厌世情绪——像他之前和以后的许多男性领导人在五十多岁的时候一样，墨索里尼也在寻找一个温柔的港湾以逃避残酷的现实世界。通过为埃莱娜和克拉雷塔充当“甜爸爸”的角色，他可以从办公桌上堆得厚厚的让人生厌的公文中解脱出来，并且忘记那些很难为他带来满足感的与同事之间的关系。与她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可以试图让一个“真实的”墨索里尼复活，并且暂时卸下他的神秘的光环为他带来的重负。

这种经历无疑让墨索里尼感到非常高兴，但是健康问题仍然在困扰着他。1941年的时候，对健康的担心就分散了他对战争的注意力。1942年5月，他患上了一次流感。同时代的人也注意到，他越来越容易患上类似感冒之类的小病了。7月份，正在利比亚访问的他因为腹部疼痛复发而赶回国内。在之后的几个月，疼

* 战争期间法西斯最臭名昭著的事件是亚历山德罗·帕沃利尼与电影演员多丽丝·杜兰蒂之间的丑闻。后者是一个更为成功的电影演员，丑闻也更多，她自豪地声称自己是第一个在电影中展示裸露的双乳的人，但是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

——作者注

** 蓬巴杜侯爵夫人(1721~1764)，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和密友，在宫廷中颇有影响，促进法奥结盟，保护画家、雕塑家和百科全书派作家。

——作者注

痛加剧了，他的家人和医生都怀疑他的疼痛究竟是由溃疡造成的，还是由于在位于热带的利比亚感染了其他的病。11月的时候，腹部的痉挛和阵痛剧烈得难以忍受了。一个医生注意到，领袖的标志性的突出的下腭不再那么明显了，他变得“面无血色，脸颊深陷，缩着脖子。”他的健康状况太糟糕了，他不得不用别人给出的秘方来治疗了——来自弗利的老友贾科莫·保卢奇·迪·恰尔博利向他保证说，以“土豆汁”为基础的一个秘方肯定能让他返老还童，恢复活力。

对于他的医生来说，他是一个顺从的病人，认真地服用为他开出的药，膳食也很谨慎。即使在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如果病情允许，他也喜欢读一些哲学作品。通常情况下，他旁边总是堆着一摞摞的报纸，而在医生们看来，他读这些报纸只是出于爱好和一种责任感。并且，他还喜欢手里拿上一枝铅笔，随时挑出看到的错误，然后大声而带着讽刺性地评论一番。甚至到了1943年7月的时候，他还虚荣地叫一个修甲师去为他服务。人们注意到，托洛尼亚别墅的看门人和管家都来自罗马涅——一个更注重规矩和礼节的年轻的来访者吃惊地发现，那里的男仆人居然还穿着棕色的鞋子和敞口的衬衫。墨索里尼家里的情况也不怎么样，对于所有的来访者来说，那都不是一个让人感觉舒服的地方。齐亚诺曾谈起有一次在托洛尼亚别墅吃饭的经历。领袖对维托里奥说，他将在“5年里”让意大利发生“真正的跳跃”，而拉凯莱这个来自红土地带的“法西斯王后”则勇敢地打断了墨索里尼的话：“少说两句吧。”

在这中间，墨索里尼曾有一段时间感觉不错——期间，博塔伊注意到，当领袖与官员们谈起他过去的辉煌时，他发现领袖的眼睛里居然有泪光——之后，墨索里尼又病倒了。1942年12月，他不得不派他的女婿齐亚诺替他去参加与希特勒安排好的会面。据他的医生说，他在短短的几个月里体重减轻了1/4。墨索里尼每天都要通过打针来治疗胃病，他的体重也在继续下降，血压也明显地下降了。然而，他的医疗小组倒是弄不明白他们到底是在治疗一种身体的疾病，还是在治疗一种心理上的疾病。墨索里尼的情绪明显非常低落。在1942年到1943年的圣诞节至新年假期这段时间里，他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的——现在，他甚至没有力气再做一次“格林奇”了。1月中旬的时候，一个医生甚至认为他患了癌症并且已经到了晚期，这一诊断后来证明是杞人忧天。1943年，从2月至7月，墨索里尼的病情有所好转，尽管胃部还是经常剧烈地疼痛，但在大多数时间里还是可以忍受的。失眠症仍然伴随着他。尽管很注意膳食，并且通常以流食为主，但他在饭后还是会呕吐，而体重也在继续上下波动。据说他还贫血体虚，一位来访的匈牙利政治家发现他看上去“病得非常重。他的脑袋谢顶，皮肤白里透黄，说话很快，同时带着些神经紧张的手势和动作。”1943年4月访问德国期间，他又出现了一次健康危机。5月的一个晚上，他住在卡米内特堡里的时候，剧烈的疼痛让他从床上滚到了地板上。连他在“一战”中受的伤现在也重新发作了。不管怎样，

这些危险最终都过去了，墨索里尼又恢复了先前繁重的工作。但是，他却养成了一个习惯。当胃部疼痛的时候，他都会松开裤子用手压在胃部，这成了他日常缓解疼痛的一个方法。*在与希特勒的通信中，两人也经常就健康问题交换意见，这两个独裁者，尤其是墨索里尼，在信中坦白地承认了战争给他造成的疲惫。**

除了身体上和心理上的痛苦之外，还有政治上的苦恼。除了公开谈论意大利要进入大西洋之外，墨索里尼和他的法西斯政权从未真正解释过他们的战争目的。直到在希腊受挫之前，他们一直都抱有战争在短期内将会结束的幻想。在希腊的惨败让他们认识到意大利必须依赖德国，要想独自去谋划意大利能够得到的利益看来是不现实的，也是愚蠢的。通过演讲和写文章，墨索里尼也多次想方设法努力解释意大利能够从战争中得到什么样的好处。例如，1941年10月，他就声称，轴心国军队在意志上的优势能够确保“用不了几年，世界将是法西斯的天下。”1942年1月，种族问题是关键问题。战争让意大利各个省份加快了融合，因此，意大利人确信他们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就能够造就出“一个纯粹的意大利种族”来。墨索里尼声称，能够“自由地进入海洋”将在某种程度上促进这一进程，并且促进意大利的团结（同时，它还意味着可以避免“向后转”）。通过避免犯自由党政府过去犯下的错误，并与德国和日本一道前进“至最大限度”，意大利将能够在战争的“测验”中得到一个高分。在这场测验中，一些国家衰落了，而另外一些国家却崛起了，意大利必须属于后者。墨索里尼仍然认可最原始的达尔文主义：

“一切事物在源头上就存在着斗争，因为生活本身就充满了对比。有爱和恨、黑和白、白天和黑夜以及善与恶。在这些对比达成平衡之前，斗争将一直存在于人类的本性的内心深处，并且将会是它的最终命运。”

但是，一个变得越来越明显的问题是，如果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墨索里尼成为历史的输家，那又将如何是好呢？

但是，资产阶级的软弱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在所有的人心中扎下根来，这也是墨索里尼一直在猛烈抨击的一个问题。他召集威尼托和阿尔托—阿迪杰地区的党内官员开了一个会（这个地区紧邻“超高效率”的德国），并且在会上很有自知之明地谈到，意大利人必须学会提高效率。他们必须生活得有计划才行。“如果时间

* 德费利切总是对墨索里尼的事持乐观的态度，声称领袖的健康状况在1943年7月的时候确实正在好转，并且这种好转显示他患的并不是心理疾病。

——作者注

** 墨索里尼在给希特勒的信中称，他已经摆脱了“43年的政治活动”对他的“神经”带来的损害，并且向元首希特勒保证说：“与民主—富豪统治和犹太主义给人类造成的伤害相比，他个人这点小病根本不算什么。”

——作者注

定在9点钟，那么我们就必须从9点钟开始，而不能等到九点一刻。”他又用让人听起来有些沮丧的话补充说：“我们必须不顾一切地争取成为一个做事认真的民族。”法西斯党必须戒除懒散和拖沓，“我们把宝完全押在年轻人身上，也就是说，押在年青一代身上。”他对法西斯党艾米利亚地区的书记也说了类似的话：“我们必须让意大利人习惯在语言、声明和事实上的精确性。”他又补充说，“外国人认为我们永远不会按时到达，语言表达和承诺也总是模糊不清，模棱两可，还喜欢“向后转”（他再次使用了这个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令人尴尬的词）。

但是，他这些话也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意大利人还是依然如故。1942年5月，墨索里尼还就战争后方的困难向党的领导层提出了警告，说“随处可见无纪律现象、破坏活动和消极的抵抗。”法西斯正在储藏“皮革、饮料和梨罐头（这最后一种食物好像是他无意中说出他自己常吃的东西）。”在1915年至1918年间——与自由党政府的战争相比，能够再一次感觉到法西斯对战争的准备的不足——意大利人就已经真切地理解了自我牺牲的含义。现在，必须通过“绝对的无情”让他们再次做出牺牲。意大利的商业界尤其应当被谴责，他们又玩起了以前的诡计，从来不知道服从于法西斯革命的大局。然而，面对一个工业家，他又会说他真正指责的是那些“小商人和旅馆经营者”，他们才是没有完全法西斯化的人。虽然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抨击，但法西斯政权却从来没有提出如何去改进，也从来没有解释为什么，这只能证明法西斯虽然已经执政20年，但却并没有取得什么成绩。从这一点来讲，墨索里尼绝对是一个最擅长否定和反驳的人。在法西斯新闻工作者的一次大会上，墨索里尼把会上讨论的所有内容用几句话进行了总结：“在20年的统治中，法西斯主义已经回答了困扰当代人思想意识的所有问题。”他又补充说，法西斯主义没有任何哪怕是最小的问题。但是，让意大利人失望的正是法西斯主义。

但是，所有这些长篇大论的演讲在战争带来的诸多困境面前都显得无济于事。一个可怕的问题是欧洲犹太人的命运。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犹太人的有计划的种族灭绝的消息也传到了罗马。1941年12月，克罗地亚的战争部长斯拉夫科·克瓦泰尔尼克带着“意味深长的微笑”告诉齐亚诺，在他的统治下，通过让他们再也回不来的一个“移民过程”，犹太人的数量减少了2/3以上。墨索里尼曾声称德国人无论在经济、军事还是政治上对克罗地亚人都占有压倒性的优势，意大利的领导对他的说法非常不满，而帕韦利奇在德、意两国之间的挑拨离间也再次证实了墨索里尼一直对这种自称为朋友的人所持有的看法：忘恩负义。他还准备直接批评帕韦利奇的一些做法，比如，他热衷于屠杀塞尔维亚人。墨索里尼指责说，这种做法不仅仅是“野蛮残忍的”，而且是一个“政治错误，一个极大的错误。”然而，对于希特勒，墨索里尼的话就很少了。他通常只是用一些他认为元首爱听的话提出建议，认为轴心国在前南斯拉夫的占领军应当采取“极端”的措施来镇压那些对轴心国统治进行反抗的行为。

从苏联和东线战场也开始传来更加糟糕的消息。1942年3月，一个从柏林赶回国内的意大利外交官告诉他的外交部的同事，“德国在波兰和苏联的被占领土上犯下了令人恐怖的罪行。包括有计划的大规模屠杀，杀害妇女和儿童，强奸，把修女送到妓院里去等等。”五六月份的时候，梵蒂冈也收到了有关的详细的报告，称在轴心国占领区内发生了“最极端的反犹太主义”，有“几百万人”被害。但就在同时，帕韦利奇却告诉教皇庇护十二世，在他的奉行天主教的地区，“克罗地亚人民欢迎他的统治，并且那儿的法律完全源自天主教的教义。”教皇对这些事情的反应是保持沉默，这已经成了他应付战争所带来的灾难的方法了，他这种保持沉默的态度也是应当受到责备的。不管怎样，到了1942年夏天和秋天的时候，意大利在南斯拉夫、法国和突尼斯的官员，以及意大利在各地的公民已经开始从德国的暴行下救助犹太人了。*他们用迷惑和拖拉的战术来应付德国人，这也是他们的官僚机构一直就有的“武器”，多年的法西斯式的“严格”也没有能够根除这一习惯。

在意大利国内，战争期间有关种族的政策仍然很混乱，反犹太主义的媒体还在继续就这一问题争论着。1942年9月，普雷齐奥西写了一篇典型的偏执狂似的文章，敦促“犹太人问题的解决”，声称犹太人对意大利的渗透比以前所认识到的程度要深得多。他还确信，教会中也隐藏了许多犹太人。并且认为应当尽快对意大利的血统进行精确而科学的造册，这样国家和它的革命者才能继续前进。法里纳奇的想法倒是没有这么明确，他在米兰发表一个演讲时说，需要“下决心并用外科医生的智慧来解决犹太人的问题”。“犹太人想毁灭我们，我们就要先毁灭他们。”其他宣传家们也对据称是被犹太人支配着的美国及其领导人进行了抨击，称之为“白宫里的罪恶”。最极端的种族主义者兴奋地声称，迫切需要用“极端的手段”把“2100万”犹太人作为“牺牲品”以解决种族主义问题。

话说得虽然很残酷无情，并且也得到了法西斯官方的认可（曾经与玛格丽塔·萨尔法蒂共有、现在已经变成墨索里尼个人的理论刊物的《等级制度》也刊登了一些谩骂诽谤犹太人的文章），但在法西斯的统治下，意大利的反犹太主义运动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仁慈的。直到1943年7月，人们才知道前线的官员非但没有使犹太难民经受在其他地方经历的恐怖，而且还在意大利边境上为他们提供避难所。如果战争像X光一样能够暴露出一个社会的现实（当然也包括能够暴露纳粹主义杀人成性的矛盾冲突），那么意大利执行的相对仁慈的种族主义政策以及大多数意大利人思想中对种族主义的理论的怀疑都表明，现代种族主义只是法西斯主义的延伸，而不是它的核心。但是，这一点对于墨索里尼自己来说是不是适用呢？毕

* 例如，波罗的海国家的意大利人就曾救助过犹太人。

竟，在所有意大利人之中，他可是希特勒唯一“真正的”朋友。墨索里尼对于消灭犹太人这一“最终的解决方案”到底持什么样的立场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就其态度和反应而言，他与许多意大利人没有什么两样。如果德国人在这一问题上对他施加压力，他就顺从他们。例如，1942年8月，德国人直截了当地提出要在意大利的占领区内与克罗地亚人一起对犹太人进行清除，墨索里尼同意了，并且说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挡两国之间的合作。德国人还要意大利军队为此提供支持，但他们后来并没有出现。墨索里尼虽然嘴上这么说，但他并没有阻止意大利人对德国采取拖延和阻挠的策略。反过来，纳粹的领导层也没有把一些事情全部告知墨索里尼。例如，希姆莱10月份在威尼斯宫见到墨索里尼的时候对有些事情就有所隐瞒。他承认把犹太人驱逐到了东边，在苏联，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相当多”的人被射杀，因为不这样做的话他们就会去帮助游击队。墨索里尼点了点头，说“这是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希姆莱又补充说，更多的犹太人是在工作中累死的，主要是因为他们太经受不住体力劳动了。之后，他又赶忙进一步虚假地补充说，纳粹并没有杀害那些上了年纪的犹太人，还把他们舒适地安置在特里西恩施塔特，或者是在柏林、维也纳以及其他地方的医院里。还有一些犹太人强行冲过苏、德两军的前线到了苏联那边，但却被共产党的军队开枪打死了，这“清楚地证明苏联人也不喜欢犹太人”。

希姆莱当然没有把屠杀犹太人的细节完整地告诉他的意大利盟友，但他确实承认对犹太人进行了屠杀。墨索里尼也随他信口开河，并没有提出严肃的问题或是不同的意见。几周之后，维杜索尼到东线走了一趟之后回到了意大利（他声称自己坚持坐三等火车车厢完成了这次行程），他带回的信息也是真假掺半。他汇报说，德国人对待犹太人“绝对地严厉”，意思是他们不是被杀害就是被强迫工作至死。他又补充说，“德国人的杀人方法以及犹太人的屈从都给意大利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维杜索尼的是非感和表达能力都不强，因此他也没有说太多内容就把话题转到其他的事情上了，如意大利士兵不喜欢德国人，以及他自己对希特勒和纳粹的崇拜等。然而，维杜索尼所讲的内容足以让久经世故的墨索里尼感到惊骇。想变得愤世嫉俗是如此容易——1942年11月，工业家阿尔伯托·皮雷利就德国人在东部的占领政策向墨索里尼提出了抱怨，墨索里尼却搪塞说：“他们是在把犹太人移民到另外一个世界。”几周之后，他对法西斯议会说：“如果不恨敌人，你就无法发动战争。”他又告诫说，意大利人必须摒弃“虚假的多愁善感”。但是，他并没有借此机会来声讨犹太人。可以得出结论，在墨索里尼看来，在东部发生的屠杀的确是这场战争以及德国盟友的最让人恐怖的一部分，但是他自己、或者法西斯主义，或者意大利对此又能怎样呢？直到1943年7月，在对待屠杀犹太人这一问题上，墨索里尼一直在设法做一个彼拉多*。但在1943年9月之后，连获得哪怕是最小限度的超脱也是不可能的了。

同时，快到1942年年底的时候，与同盟国相比，轴心国的劣势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在北非战场，即使有了德国的支援也没有能够阻止盟国发动第二次攻势，11月份，盟军占领了昔兰尼加。同月，美国军队在法属摩洛哥登陆，并且威胁要继续向轴心国此前匆忙占领的突尼斯挺进。于是，弱小的意大利与富有的美国终于不可思议地交上手了。更糟糕的是，在东线战场上，希特勒顽固地用他的第六军团来包围斯大林格勒，结果导致第六军团受困于此——德军在这次战役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其伤亡人数相当于意大利从1940年至1943年7月的伤亡人数的总和。1943年1月，冯·保卢斯元帅投降了。虽然东线的战事异常艰苦，但希特勒仍然对盟国意大利军队的帮助非常蔑视。他说，法西斯军队甚至比罗马尼亚军队还差劲（但是，希特勒还是一个好奥地利人，他认为匈牙利军队是最差的）。同样，德国人对来自意大利的劳工也是这样的印象——1941年，意大利又为德国提供了22.9万名劳工，1942年又提供了8.1万人。据德国的时间和行为专家的“科学的”研究发现，在生产效率和组织纪律性方面，意大利的劳工甚至比苏联的战俘还要差。提起“南部种族”，可以用缺乏组织纪律性和干活无精打采来形容，他们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与女人们眉目传情和打牌上。从各方面来看，意大利人都不是令人满意的盟友。1942年春天，墨索里尼紧张不安地重复着他听到的一句德国俗语：“我们将在两个月之内打赢苏联，在4个月之内战胜英国，在4天之内打败意大利。”

如果说轴心国在欧洲的形势不妙的话，那么在北非，德、意联军更是被同盟国的军队从西边赶到了东边。利比亚这块意大利在自由党政府统治时期获取的最大的殖民地也失去了——1943年2月的时候，隆美尔想利用法国在30年代筑起的防线，把轴心国的军队放在的黎波里塔尼亚边境上突尼斯一侧设防。最初，美国军队遭受了一些损失。但到了5月份，英军从的黎波里、美军从突尼斯两面夹击“第五军团”，在突围没有成功的情况下，轴心国军队投降了。德、意联军大约有22.5万人成为了盟军的战俘，之后，进攻意大利本土被提上了同盟国的日程。

面对一系列军事惨败，墨索里尼毫无对策。他现在与希特勒经常定期会面，但每次会面都是希特勒在喋喋不休，谈得最多的是他对东线战事进程的判断（1942年4月，他对墨索里尼说，气象学家与神学家一样应当受到谴责）。墨索里尼一把话题转到意大利的需要上——例如，他想让德国帮忙迫使马耳他投降——希特勒

* 彼拉多，钉死耶稣的古代罗马的犹太总督。

——作者注

** 据克肖称，在这场战役中，德军有10万人死亡，11.3万人被俘，其中只有几千人最终回到了国内。参见克肖的著作《希特勒，1936~1945》，第550页。

——作者注

立即就把他搪塞过去了。在其他地区，轴心国的军队也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塞拉诺·苏内尔从内心讲可能还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但面对当时的战局，即使是他也确信西班牙应当继续保持中立。1943年2月的时候，墨索里尼吓唬佛朗哥说，同盟国将“不再区分什么法西斯主义、长枪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了，他们更愿意使“赤党”恢复元气。即使是法国的维希政府，在1942年11月法国被轴心国军队完全占领之后，也很少愿意去讨好意大利人。更糟糕的是，尽管墨索里尼用尽一切办法想说服希特勒不要继续在东线上耗费兵力，“盎格鲁—撒克逊人”才是轴心国真正的敌人，但希特勒却一点也听不进去。这也难怪，希特勒、纳粹和绝大多数的德国人的意识形态已经是如此坚定，他们一心要打一场针对“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伟大的种族意识形态的战争。

到1943年春天的时候，意大利国内的形势也明显正在变得让人绝望了。2月份，墨索里尼又一次突然对内阁进行了重大的改组。这次被免职的人包括博塔伊、里卡尔迪和齐亚诺。齐亚诺被免去外交部长的职务后又被任命为驻梵蒂冈大使，这也暗示出法西斯主义的资产阶级可能会通过与教会达成一些交易而逃过它的天命。齐亚诺在他的日记中也反映出了这种可能性：“上天选择的道路有时候的确是非常神秘的。”博塔伊被解除了教育部长的职务后，墨索里尼见到他时居然无情地没有做出任何表示，而博塔伊也像处在青春期的少年一样，倔犟地表现出一种冷漠而无所谓的态度。

墨索里尼又亲自兼任起了外交部长的职务，副部长是朱塞佩·巴斯蒂亚尼尼。他在1939年至1940年间接替格兰迪担任驻伦敦的大使，并且在那儿干得不错。巴斯蒂亚尼尼也像苏维克一样，试图劝说墨索里尼要确定意大利的战争目标。他还为墨索里尼拟定了一个7点建议，希望以此来对抗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大西洋宪章》。巴斯蒂亚尼尼认为，意大利是在为“种族统一”而战。他写到，所有国家都应当有权实现这一目标（墨索里尼把“种族统一”这个词换成了“同种”，还把“所有国家”进一步限制在了“欧洲国家”），以及完全的主权和独立（墨索里尼明显是受到了与非洲的埃塞俄比亚的冲突的伤害，再加上在斯特雷萨产生的误解，所以在这一点上又把范围限制在了欧洲国家）。每个国家都有权建立自己的国内体制，并且有权享有全世界的经济资源（墨索里尼把这一条删掉了），以及为了人民而实现社会公正（同样被墨索里尼删掉了）。他还认为和平只能通过在经济和社会等许多领域内进行“真正的合作”而实现（墨索里尼对这一条作了补充，说这种合作必须在欧洲范围内，并且“要在轴心国的领导下”进行），此外，所有国家还应当拥有海上的自由（这一点也被墨索里尼删去了）。很明显，这些目标是很难获得纳粹狂热分子的认同的，而墨索里尼对这些目标的修改也更像是出自个人的私心，而不是狂热的法西斯主义的体现。难怪墨索里尼现在有时还坚持认为“所有的法西斯战争都是不可避免的”，而他自己也被拖入了这些战争中。

1943年4月，维杜索尼的总书记职位最终被一个老法西斯主义者卡洛·斯福尔扎（生于1897年）取代了——这证明把希望寄托在年青一代身上并没有得到多么大的回报。虽然明显为时已晚，但斯福尔扎发誓要重振法西斯党的雄风，并扩展法西斯党对意大利社会的控制。在前一年的12月份，斯福尔扎就已经被提升为民族法西斯党的副书记，在那之后不久，他就敦促说意大利的阶级差别必须结束，也必须对党进行肃清。虽然这么说，但他还是小心谨慎地强调说，意大利拥有的“最有力的武器”是“领袖的形象、思想、个人和他的行动”。尽管墨索里尼曾暗示自己不喜欢太过独立和激进的下属，但当上总书记之后不久，斯福尔扎还是在6月7日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报告来探测全国的形势。

在报告的开头，斯福尔扎先强调说自己只是想做一个“聪明的下属”，理解领袖希望“把整个国家的生活带向一个全新的方向”的意愿。然后，他又为墨索里尼分析了一下国家当前的阶级状况（这些情况对于保持法西斯的团结有着重要的意义）。斯福尔扎认为，在意大利上层社会中，“反法西斯主义和反墨索里尼主义只是因为害怕才没有表现出来”，而战争的结束将导致社会的崩溃并引发“布尔什维克主义”。在社会中层，白领工人和专业人员中的这种敌对态度相比之下不是那么明显，但也很难发现“坚定的法西斯主义者”。只有那些小资产阶级和其他“平民百姓”还依旧是真正的法西斯和领袖的忠诚信仰者，因此，法西斯进行任何政治重建都必须以他们为基础。法西斯党自身已经处在严重的病态之中，庞大的党员数量、腐败和内部纷争都对党造成了损害，现在只有年轻人还依旧信仰它。此外，国家的官僚机构对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横加干预，包括应当由党负责的领域。特别是高级官员的腐败行为更为严重。经济形势目前也很糟糕，一方面是饥饿，另一方面黑市却很猖獗。由于成立了许多半政府性质的机构，独裁已经导致了许多重叠和混乱，因此必须立即裁减这些机构和组织。军方也有罪过，他们“计划失败、缺乏准备、无能并且不负责任”。意大利目前有5个“最高机构”在负责战争事务，但它们没有一个真正管用。意大利人对他们的德国盟友非常怀疑，德国人需要拿出更有说服力的事实证明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事业。必须马上撤换那些高级将领。墨索里尼自己也应当在所有的领域内都自强不息、有所行动，并且要让人知道他有所行动。只有在全国广泛地重新燃起法西斯的精神，法西斯政权才能重新振兴，战争也才能够取得胜利。

5月份，埃达发回了一封同样详细而更具影响力的电报，汇报了轰炸巴勒莫在当地所造成的影响。她在电报中说，“这儿的平民觉得他们被意大利军队或者说法西斯抛弃了。”“我在阿尔巴尼亚和苏联都待过，但从来没有见到人们经历如此的苦痛。”她接下来又补充了一段话，每个意大利北部的人到南部去的时候都会想起这段话：“那里的情况给我留下了一个总体印象，熟悉那里情况的人也都会有这样的印象，即那里与祖国和文明至少隔着1000公里。”医药、衣物、面包、面食，所

有的东西都很匮乏。

对于斯福尔扎发表的倾向于平民性的言论，当然应当打些折扣，但是他和埃达的报告也的确表明，在战争这场测验中，法西斯意大利和它的领袖墨索里尼的得分是多么低。很明显，现在再想做任何事情都已经晚了。面对这些报告中暗含的批评，墨索里尼自己倒没有太在意。7月10日，盟军在狂轰乱炸之后成功登陆西西里，号称“固若金汤”的潘泰莱里亚岛和蓝佩杜萨岛也被盟军攻占。据说，在攻占蓝佩杜萨岛时，盟军付出的代价是只有一个人受伤，而且还是被一头驴子踢伤的。在盟军进攻期间，墨索里尼多次请求德国给予空中支援，但他只是听到了一些好话而已。7月14日，无奈的墨索里尼可怜兮兮地问安布罗西奥将军，如果盟军继续进攻西西里岛，还有没有办法能够挽救它。他肯定知道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了。

推翻墨索里尼的可能性已经被讨论了至少有6个月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齐亚诺逢人便说战争已经输了，无论是国王、教皇、商界领袖还是警察都在准备接受任何让意大利退出战争的计划。更糟糕的是，三四月份，意大利的工人也开始勇敢地举行罢工了，这在纳粹—法西斯的“新秩序”下开了先河。墨索里尼非常关注此事，他在内心深处非常担心。尽管沃尔皮试图安慰他说，这些抗议“只是一个经济现象而已”，但他还是害怕这是他多年前背叛的社会主义又在激励着现在的意大利工人。

有这么多烦恼缠身，同时代的人注意到，墨索里尼蜕变成了一个米考伯式*的人物，完全没了主意，只是幻想着会有什么积极的事情出现。**对于精英阶层的其他人来说，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了。他们怎样才能摆脱墨索里尼，同时又不会为自己和他们的国家招来德国人的暴怒呢？如果惹恼了德国人，那很可能不仅仅意味着他们个人要遭受惩罚，同时意大利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也很可能会落入德国人的手里。虽然身心俱疲，但墨索里尼还是于7月19日在费尔特雷附近的一所别墅里与希特勒见了最后一面并讨论了战争的形势。中间，他还亲自驾机飞行了一段路程。巴斯蒂亚尼匆匆忙忙地为领袖准备了一份备忘录，把意大利一系列的军事失败归因于没有足够的物资，并再次请求希特勒给予大量援助。在这次会谈中，元首仍旧是长篇大论喋喋不休地谈论总体的战争形势，特别是东线的形势，而

* 米考伯，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是一个无忧无虑并且老想着走运的乐天派。

——译者注

** 德费利切为墨索里尼辩护说，他是在负责地避免做一个萨姆森（在圣经旧约中，被腓力斯人黛利拉所背叛的以色列法官、勇士），也不愿意推倒房屋砸着他的人民。他确信，德国人永远也不会接受意大利人的背叛。

——作者注

墨索里尼仍然是插不进去嘴。最后，元首很专横地告诉他的意大利同事，他必须制造出更多的现代化武器，并想法让意大利的军官们有更高的士气，然后就结束了会谈。

当墨索里尼正在与希特勒进行这次没有取得什么成果的会谈时，盟军却已经在轰炸他的首都罗马了。轰炸对铁路沿线的工人聚居区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但是并没有毁坏罗马的7个天主教大教堂之一——圣罗伦索大教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后来的战争中，轰炸产生的效果各种各样，但是这次对罗马的轰炸却标志着墨索里尼的结束。据说，当时有15万人逃离了罗马，并且平民们现在不再相信法西斯主义，转而相信教会（甚至是英国人和美国人）了。在接下来的一周里，福贾和博洛尼亚地区也遭到了盟军的空袭。乡下的农民们并不像法西斯们那样对技术化的战争有所理解，盟军的轰炸让他们进一步相信美国人个个都是百万富翁——要不然，他们怎么舍得这么大方地从天上往下扔东西呢？

1943年7月24日至25日夜，法西斯党最高委员会召开了第187次会议，这也是它的最后一次会议，从而结束了墨索里尼的独裁统治。这个委员会是法西斯政权中又一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失去作用的机构——自从战争开始以来，委员会的成员就没有再开过会。在阴险狡诈的迪诺·格兰迪的领导下，包括齐亚诺、博塔伊以及15名其他成员组成了一个多数派，并决定恢复国王的军事指挥权。与会的成员大都明白，这意味着墨索里尼将失去相当大的权力。但是，有一点还不太清楚，就是当时到底有多少人认识到，他们这是在计划推翻墨索里尼和法西斯政权。

当时正是夏季，会议是在一个酷热的下午的五点一刻开始的。在威尼斯宫的鸚鵡厅（这个名字有点不太合适），气氛非常压抑。患有哮喘病的苏阿尔多呼吸沉重，这更增加了紧张的气氛，与会的上了年纪的政治家们身上都已经冒了汗。马里内利的耳朵太聋了，他没有搞清楚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但却在劫难逃地听从了大多数人的意见。据说，墨索里尼在到达会议现场时耳边还回响着拉凯莱的忠告：“把他们都抓起来。”但是，他还是先就当时的战争形势发表了一通冗长但并不连贯的讲话。他的讲话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期间还不得不多次停下来用手压住胃部以缓解疼痛。他的讲话的确有些自吹自擂，也许是为了让自己相信自己还有“钢铁般的记忆力”。之后，攻击开始了，但大都是寻找不同的借口进行旁敲侧击——例如，针对墨索里尼的评论，德博诺为军队提出了辩护。法里纳奇并不是19个成员之一，他承认自己是“一个失望的士兵和市民”。维杜索尼也抱怨说，墨索里尼对“我们这些老家伙”从来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像以往的会议一样，这次会议也进行得非常艰难。到了半夜的时候，墨索里尼提出休会，但是遭到了格兰迪的反对，于是达成妥协，会议暂停半个小时。会议再次开始的时候，巴斯蒂亚尼在对形势进行评论的时候打了一个比喻：“全国都在继续罢工反对法西斯党。”会议最终进行了投票：19票支持，7票反对，苏阿

尔多弃权，而法里纳奇则宣布自己只能支持自己的提议。直到凌晨3点钟，精疲力竭的法西斯头目们才最后散会。墨索里尼对格兰迪说：“我是一个六十岁的人了（再过4天就是他的六十岁生日），我非常清楚这些事情应当如何结束。”最后投完票之后，他又说：“先生们，法西斯政权的危机自你们而始。”来自国家安全志愿军的斯福尔扎和恩佐·加尔比亚蒂是他的支持者，后者还直白地建议用暴力手段来保卫领袖。但是，墨索里尼并没有对他们进行鼓励。加尔比亚蒂还建议墨索里尼飞到德国与希姆莱进行“磋商”，墨索里尼也没有理会。

墨索里尼费力地回到家里，也免不了遭受拉凯莱的一顿指责，也许他又是彻夜难眠，意志消沉。但是第二天早上，他又迅速地回到办公室开始工作了。上午10点半，他接见了斯福尔扎，中午又接见了日本大使（他再次与大使谈到要让希特勒接受建议，与苏联单独实现和平）。下午5点，他又准时赶到萨沃亚别墅去和国王进行每两周一次的会面，但是却穿着一件皱皱巴巴的蓝外套。相反，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却像一名老军人一样穿着军装。像当初处理自由党政府内阁危机一样，墨索里尼告诉国王，格兰迪的动议获得了通过。维克托·伊曼纽尔先是谈了谈炎热的天气，然后发表了一通让墨索里尼更加沮丧的评论。他说，领袖已经成为“意大利最招人恨的人”。鉴于这样一个事实，他决定必须由巴多利奥来担任政府的首脑。与国王的会面结束了，墨索里尼垂头丧气地走向自己的汽车。但就在这时，一个名叫保罗·维涅里的上尉截住了他，他被立即送往一个军队医院，并且从此被关押了起来——王后埃莱娜是一个门的内哥罗人，她还担心皇室参与了此事，说任何拜访皇室的客人遭遇不测都不会带来什么好处。7月27日，弗朗哥·毛杰里元帅护送墨索里尼到了蓬扎岛，这也是一种形式的放逐。毛杰里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墨索里尼“穿着一件肥大的、皱巴巴的破蓝斜纹哔叽外套，看上去他好像好几天都是穿着它睡觉的，并且这很有可能。”几个小时之前还是一个被奉若神灵的人物，现在却好像是“一个扭曲的、悲哀的甚至是可怜的小丑”。于是——至少是第一次——法西斯主义和它的领袖倒下了。

当时，在蓬扎岛上还关押着像彼得罗·南尼和蒂托·扎尼博尼这样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墨索里尼被安置在远离主要居住区的一所院子里，这里曾经是关押埃塞俄比亚王公伊坦姆的地方。但是，蓬扎岛在军事上并不安全，于是，墨索里尼在8月7日又被转送到了撒丁岛附近的拉马达莱娜海军基地。但他在这里待的时间也不长，8月28日，他再次被转送到了大萨索山滑雪胜地一个名为“皇家营地”（这个名字更加意味深长）的地方关押。这个滑雪胜地海拔2000米，墨索里尼把它描述为“世界上最高的监狱”。墨索里尼虽然倒台了，但意大利的新政府对德国人仍然非常担心。的确，纳粹当时正在四处搜寻墨索里尼，这也预示着他们将在1946年可笑地四处寻找墨索里尼的尸体。希姆莱找来了一个占星家，希望他能确定墨索里尼的命运提出有益的建议。但是纳粹特务机关的传统方法更管用，

他们最终找到了关押他们的轴心国盟友墨索里尼的地方。德国准备采取行动解救墨索里尼了。

被关押在蓬扎岛上的时候，墨索里尼显示出了皈依天主教的迹象（尽管墨索里尼并不是完全能够忍受与当地的牧师谈话，但他一直都是只说听众爱听的话）。从某些方面来讲，他仍然是“墨索里尼教授”，居然能够静下心来把卡尔杜奇的《原始的颂歌》翻译成德语。在拉马达莱娜，他高兴地收到了希特勒送给他的六十岁生日礼物（虽然迟到了）——全套24卷的尼采全集——墨索里尼声称读了前4卷，但后来被别的事情打断了。这位先前的领袖还给家里人写信，先是请求拉凯莱给他送些干净的内衣和一些书籍，后来又告诉她自己的意识很“清醒”：“我已经公正无私、满怀忠诚并且不间断地工作了21个年头。”他与妹妹埃德维杰的通信内容更具有启示意义。他在信中对妹妹说，他认为自己已经“死了”，是“一堆正在腐烂分解的皮和骨头”。他希望能够按照天主教的风俗埋葬自己，并且鉴于目前的形势，他不要求给予什么官方的荣誉。

在被关押期间，墨索里尼的健康情况在进一步恶化。他在蓬扎岛上忧郁地度过了自己的六十岁生日，同时也又一次忍受了剧烈的胃痛。在那之后，由于使用了新药，他的情况看起来稍有好转。按照逻辑判断，他现在已经是一具行尸走肉了。在拉马达莱娜的时候，他还为自己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感到悲哀，声称是撒丁岛恶劣的气候毁了自己的身体。在被转送到“皇家营地”之后，他也是无精打采、昏昏欲睡，更喜欢玩一种纸牌游戏而不是阅读。他早上7点钟就吃饭，在谈起自己的身体状况的时候才最有精神。有谣言说，他打算割腕自杀而不愿意落入盟军手中。但是，他一贯喜欢夸大其词，所以人们对他是否有自杀的决心还持怀疑态度。*

当墨索里尼自顾不暇的时候，巴多利奥政府和国王也正在试图摆脱战争——现在他们认为这是一场“法西斯战争”。9月3日，他们与同盟国的谈判代表达成了一项协议，5天之后，意大利正式投降了。**但是灾难也接踵而至。从7月份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开始，德国人就把他们的实际控制范围扩大到了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9月9日一大早，只顾自己保命的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及其政府抛弃了自己的人民逃出了罗马，把国家的首都以及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所有地区都拱手送给了纳粹德国。在这一片混乱之中，9月12日，墨索里尼被德国的一个滑翔机小分队营救了。领导这个滑翔机小队的是奥托·斯科泽尼上校，他是一个奥地利

* 一个法西斯记者声称，在1944年年底的时候，墨索里尼又一次打算自杀。

——作者注

* 有关此事在意大利有很多争议，特别是在近些年。德费利切一派的人认为这是意大利历史上最糟糕的时刻。

——作者注

人，7月25日之后希特勒就秘密地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在墨索里尼被营救之后的5天里，他的监狱看守竟然没有从罗马得到任何信息。并且，在营救过程中，德国人也没有遭到什么抵抗。墨索里尼被塞进一架单座飞机，飞机艰难地起飞并把他送到了位于普拉迪卡迪马雷的一个由德国人控制的机场。然后，德国人又继续用飞机把他送到了慕尼黑。在那里，他见到了希特勒，并且与他的家人团聚了。之前，他的家人通过各种渠道得到了纳粹的庇护。9月18日，他在身体充分恢复之后在慕尼黑的广播上发表了讲话，说他还活着，并且决心惩治国王及其支持者。墨索里尼宣称：“只有用血才能把如此羞耻的一页从祖国的历史上删去。”战争仍在继续，各种类型的背叛者都必须被“消灭”。“寄生的富豪统治”必须结束。农民、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可以团结起来重新振兴法西斯主义的事业。按照墨索里尼后来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的说法，从7月到9月，他像耶稣一样经历了一次“受难和复活”的过程。

墨索里尼的这个比喻可能有些俗套，但是，就在1945年之后不久，法西斯的同情者在谈到9月8日的事件时就声称，领袖当时是勇敢地决定为意大利人民献身的。他这样做是为了挽救意大利人民，要不然，他们会因为意大利的“背叛”而遭到德国人的可怕的报复。按照这种观点，之后由墨索里尼领导建立的新的共和国也是一个“必需的共和国”了。20世纪90年代，一些严肃的历史学家再一次以此为借口替法西斯的翻案浪潮进行了辩护。在为法国的菲利普·贝当和维希政权进行辩护的时候，也有人提到了这种说法，即一个领导人屈从并忠于纳粹是为了保护他的人民免受恐怖和灾难。但是，不管是在法国还是在意大利，这种说法都不足以令人信服。的确，无论是被监禁还是后来又被释放，墨索里尼都像一个梦游者一样稀里糊涂地全部接受了这些事实。除非自杀，否则他不接受的话又能怎么样呢？但是，这种被动性却不当与计划或者牺牲混为一谈。墨索里尼之所以同意领导建立“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并不仅仅是出于无奈，也是因为他还有政治野心，并且的确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和“元首的朋友”，仍然愿意与纳粹德国合作而不是主动地与之对抗。此外，害怕也是他做出这种选择的另外一个原因。墨索里尼曾经谈到，英国人可能会把他关在伦敦塔里，或者是放逐到一个偏远的荒岛上——他可能还想与拿破仑相提并论。但是，隐藏在这些话背后的是他对被审判、羞辱和处死的恐惧。他可能会想到，与德国人在一起总要比与英国人在一起更好些。的确，墨索里尼这么做对他自己来说是要好一些，但是别人却因此倒霉了。

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当德国人把墨索里尼救到北部的时候，他“身体已经崩溃

* 斯科泽尼声称，他个人从未原谅意大利人盗取南蒂罗尔的行为。在他成功地营救了墨索里尼之后，他赢得了在半夜里与元首一起喝茶的荣誉。

了”，心理上也遭受了沉重的打击。现在，由多位德国医生组成的医疗组对他进行治疗，最终负责的是希特勒的医生特奥多尔·莫雷尔。一个名叫乔治·察哈里埃的医生后来还就墨索里尼写了一本回忆录。他回忆说，一到德国，他们立即为领袖进行了全面的临床检查。检查结果表明，他的确患了十二指肠溃疡，这又引起肝脏肿大并阻塞了部分肠道。如果不使用缓泻药，他的消化系统就不能正常运转。没有证据表明他患了癌症，他的心脏和动脉的功能也都正常，但是血压相当低。一个神经科专家也为墨索里尼做了检查，也没发现他有什么不正常。此外，医生们也没有发现他有患梅毒的迹象，问起他来，墨索里尼也坚决否认他曾受过这种病的折磨。

但是，回到意大利以后，墨索里尼仍然经受着病痛、压抑和失眠的折磨。1943年10月，办公室里新来的秘书在第一次见到墨索里尼时就注意到，他坐在那里，并且裤腰带是松开的。在谈话中间，他还把手伸下去按住腹部以缓解疼痛。*察哈里埃现在一个人从德国来到了意大利，这位意大利独裁者的身心状况让他感到非常震惊。他发现墨索里尼意志消沉地坐在会议室里，穿着一件衬衫和一件脏乎乎的晨衣。墨索里尼咕哝着向他打招呼：“唉，你看我现在的样子。”然后，他的病人又继续向他讲述他患溃疡已经有“20年”了，但是病情是从“1940年”以后才开始严重的。“饭后两三个小时里，以及晚上，他都会经受腹痛的折磨，就好像有人在使尽全力猛击他的腹部一样。”他无法入睡，后来逐渐变得一到晚上就有些害怕。他常常便秘，只有靠吃强效的泻药。他吃得很少，在这位德国医生看来，他的饭量当然是不足以支撑他繁重的工作的。总之，他的身体“已经严重受损，已经站在坟墓的边上了。”——墨索里尼在描述这个世界和人类时总是没有什么好脾气，这也许真的是由于他的消化道不畅造成的。

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医生们为他制定了一个养生食谱，包括茶、干面包、一点水果罐头和牛奶。近来他每天还要喝两升开水。但是，这种膳食却让他的便秘更严重了。察哈里埃更多地接受了莫雷尔的治疗方法，让墨索里尼服用多种维生素（尽管他在战后所写的回忆录中否认全盘接受了莫雷尔的治疗方法）。根据察哈里埃的记述，服用维生素并且把牛奶从墨索里尼的膳食中取消确实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的确，按照察哈里埃的说法，墨索里尼在1944年初的时候情况已经大有改善，能够吃一些禽肉或是鱼肉了，同时也减少了原来常吃的熟制水果。不管是服用还是注射，墨索里尼仍然坚持使用大剂量的维生素B和C。他的体重增加了，气色也有所改善，还开始骑自行车，并且每天早上能够打上一个半小时的网球。察哈里埃回忆说，当他指出墨索里尼讲德语时所犯的错误时，墨索里尼很谦恭地向

* 跟以前一样，他的办公室里的舞台道具仍然包括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作品，并且是打开放在桌子上的。

他表示感谢——当外语老师曾经有可能满足墨索里尼的野心，现在他还可能成为那时的墨索里尼吗？但是，他还是很容易疲劳，也容易患上感冒。这种较好的健康状况保持到了1945年2月份，然后又开始恶化了。他体重减轻，胃痛，情绪低落甚至接近于冷漠，最终“神经遭受了严重的打击，真的崩溃了。”最初见到墨索里尼的时候，察哈里埃就推测，这位独裁者的健康状况是如此差，肯定会对他做决策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很可能从1940年就开始了。看起来，墨索里尼在1945年的时候又重新成了一具行尸走肉。

墨索里尼的身体有所恢复的时候，他的家人却感到有些不适应。官员们忙忙碌碌地保证费尔特里内利别墅里有充足的咖啡供应，3大马车书籍被运到了那里，还运来了许多袋红土以便整修网球场，连过去的修甲师也重新开始为他威严的客户服务了。但是，墨索里尼家里的气氛却变得日渐不和谐。拉凯莱对那些在7月份“背叛”了他丈夫的人极为痛恨，并且把最强烈的敌意发泄到了她的女婿齐亚诺这个爱打高尔夫球的雅皮士身上。年轻的罗马诺也带来不少麻烦，他后来成了一个爵士乐钢琴手，也许是为了逃避学习上的失败——他的老师们在1942年建议立即对他进行治疗，以克服他注意力不能较长时间集中的毛病——虽然他的德国房东明显地不堪忍受，但他还是坚持演奏他的爵士乐。更糟糕的是，当墨索里尼声称他能够读懂尼采原著中引用的希腊语时，罗马诺竟然公然说他父亲是在胡说八道。即使是在家里，也少不了有关法西斯主义的或大或小的谎言。即使墨索里尼一家曾住在阴暗的房子里，墨索里尼对他的政治上的同事也没有更多的仁慈。1943年10月，他对一个人说，这些同事都是“卑鄙的虫子”，是“身体已经长大的动物”。好像是出于本能一样，他现在又开始从事自己已经习惯了的管理工作了。他把大量的时间都花在了他的“听众”上，每天，他都要在15到30分钟内接见20个人。绝大多数的谈话都带有虚幻的色彩，很少能够提起墨索里尼的精神，或者是驱散他的悲观厌世的思想。

因此，当发现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是一个充满矛盾和腐败无能、同时又愿意容忍并施行最野蛮的暴力活动的组织时，我们就不应当感到吃惊了。原先那些“好听的陈词滥调”变得毫无意义，法西斯意大利也变成了实行“最后的解决方案”的罪犯。大约有7500名犹太人被集中并被派到了东线战场，最后只有610人活了下来，这些事主要是由意大利人干的。11月份，那些支持新政府的人在维罗纳开了个会并且拟定了一个宣言，无情而又有些混乱地声称：“属于犹太种族的人都是外国人。在这次战争中，他们都属于敌国的人。”同时，该政权又以内务部长圭多·布法里尼·圭迪的名义颁布了一部法令，命令把所有的犹太人都关进集中营，他们的财产也被没收。

墨索里尼并没有在新政府中兼任内务部长的职务，这表明他的神化和权力在新政权中都比较脆弱，也同样没有能够清楚地描述出国家和政党之间的关系。像

法里纳奇这样真正的法西斯信仰者（也是自私自利者）当时在大声地疾呼，要求法西斯党像1919年时那样摆脱国家管理的束缚，并且以纳粹德国为榜样。面对这样的冲突，墨索里尼在言辞上又一次采取了逃避的态度，说是“人的因素”让他在过去遭遇了失败，而法西斯主义理论本身并没有任何问题——它需要的只是进一步进行精炼和纯化（墨索里尼教授在思考，如果作为一个哲学家，他在历史上得到的分数会不会比作为一个军阀和独裁者更高）。当时有很多要求“扩大和完善”“社会化”的言论，墨索里尼过去曾嘲笑过这个概念，但是现在它却非常适合于平民主义的倾向，能够把民众重新聚集在他的领导之下。

确有一些意大利人被吸引到了新的政权下，有一部分是有些爱国精神并对9月8日的事件感到义愤填膺的人，也有些是喜欢冒险的年轻人，或者是不怀好意要在欧洲推行法西斯的人（有时候，所有这些动机都可以通过对领袖的热爱表达出来）。相反，也有一些意大利人已经准备好上山参加武装抵抗法西斯的运动了。绝大多数平民百姓并没有选择两种中的任何一种，他们关注的只是如何阻止战争带来的全面灾难侵入到他们的个人生活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把发生在1943年的事情作为前车之鉴：“在这里，没有人相信任何东西。”在新的世纪里，在意大利人的思想中仍然能够寻找到这种观点的足迹。

对于墨索里尼来说，最大的困境却是更简单的问题，即面对寻找政治上的第三条道路时遭遇的重大失败如何保持自己的自尊心；以及如何使意大利民众国民化并毫不含糊地把意大利提升成为一个真正的强国。他的权力历程并没有给他留下能够操控局势的感觉，也没有留给他退却的可能。现在，不管是他还是其他任何意大利人都不可能指望再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了。墨索里尼带着对希特勒的嫉妒的崇拜对他的同事说，元首是“一个伟大的现代国家的神秘的领导人。德国人在进行多么大的冒险啊！”同时，他也在抱怨意大利人的作战能力。法里纳奇这个粗人一直还是墨索里尼比较喜欢的同事，但在9月份，他试图让德国人支持自己来领导新的意大利。然而，他发现眼光挑剔的希特勒根本不喜欢他。法里纳奇作为墨索里尼面前一个直言善谏者的日子结束了，墨索里尼挖苦他是一个“土皇帝”。在加尔尼亚诺安顿下来以后，墨索里尼就找到了一个代替他的人。这个人名叫尼古拉·邦巴奇，与墨索里尼一样，他也是一个背叛社会主义的“老鼠”，但是时间要比墨索里尼晚一些。虽然背叛了社会主义，但他一直没有完全抛弃社会主义的理想。他们两个经常谈话，墨索里尼也许可以从中使自己相信，他也从来没有真正被资产阶级收买然后又出卖。

在最后的10年里，法西斯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最直接代表就是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在法西斯政权经历的成功与艰难之中，墨索里尼和齐亚诺构成了一对不太稳定的搭档。虽然表面上有些分歧，但他们还是努力地成为了政治上的同事。但是现在，齐亚诺是近在咫尺的“七月的叛徒”，遭到了德国人以及意大利社会共和

国的其他领导人的憎恨，特别是重新组成的共和法西斯党的总书记帕沃利尼的憎恨。因为在7月份之前两人的背景和态度是那么的相似，所以帕沃利尼更加坚决地要处死他的老朋友。拉凯莱也要求处死她的女婿，但墨索里尼倒是不太坚决地躲避着这些批评。10月份，墨索里尼对他的总书记说，齐亚诺其实不比任何人更好，也不比任何人更坏。他很有自知之明地说，齐亚诺这位前外交部长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是因为别人不能去谴责他们的领袖自己。他坦承，齐亚诺的缺点和过失也是他自己的缺点和过失。

实际上，对于齐亚诺和法里纳奇的出于有意或者由于疏忽而犯下的每项罪过，墨索里尼也都有份。他鼓吹的这场革命并没有摧毁私有制以及依附于它的家族和等级制度。他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天主教徒；他既是一个罗马涅人、意大利人，又是一个世界性的人物；他既是一个平民主义者，又是一个鼓吹精英统治的人；既相信传统的经济学，又提倡社会福利；既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的这种诡计曾经（并且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的确很有效。他享受到的阿谀奉承在今天只有那些体育和娱乐“产业”的明星才能享受到了，他也被赋予了无限的感召力，还创建了“意大利帝国”。但是，即使是在一片“和散那”^{*}声中，他也从没有获得个人的满足。在家里的时候，拉凯莱和埃达也增加了他的不安。克拉雷塔可能偶尔使他的身体得到放松，但从来都没有让他的精神有所放松。胃痛也不断地困扰着他。而现在，在他的临时的新共和国里，他不得不生活在北部湖区的灰暗之中，经历着权力的转移，并且忍受着自己地位的衰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已经被降级成了“加尔尼亚诺市长”，正努力“在流沙中站直身子”。虽然说了这样的话，但他仍然在自欺欺人。在1943年至1944年间，墨索里尼已经变成了一个“傀儡独裁者”，一个手中并没有可靠军队的战争领导人。他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但他的理论却被他的“神秘的”伙伴劫持到了北边。这真是历史的矛盾修辞法^{**}。有关这个政权自己的神秘主义的所有夸张的宣传，以及它自己的热情好战都是要付出代价的。1944年1月，落败的墨索里尼怯懦地让他的女婿齐亚诺充当了他的替死鬼，并且在那之后还把意大利的战争带入了一个最残酷的阶段。虽然意大利的战争与东线战事的惨烈程度无法相比，但仍然葬送了20多万意大利人的性命。1945年4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幸运地结束了，对于他这个曾经是

^{*} 和散那，赞美上帝的用语。

——译者注

^{**} 矛盾修辞法，一种把互相矛盾或不调和的词合在一起的修辞手法，如“震耳欲聋的沉默”和“悲伤的乐观”等。

——译者注

本阶级的第一人并且从来都不缺少智慧的人来说，玩世不恭和达尔文主义——在他混乱的思想中，这是两种留存下来的人生态度——让他付出的代价却是羞辱和死亡。

4 贝尼托·墨索里尼的阴魂

1945年4月28日，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佩塔奇在梅泽格拉被处死。他们的尸体，以及墨索里尼最后的下属如尼古拉·邦巴奇、亚历山德罗·帕沃利尼、保罗·泽尔比诺以及他的私人秘书路易吉·加蒂的尸体都被游击队员扔到了一辆卡车上。这辆卡车拉着这些人的尸体，穿过死亡之夜，到达远离米兰大约60公里的科莫湖畔。一个最近的历史学家塞尔焦·卢扎托说：“1945年4月28日下午，在贝尔蒙特·迪·朱利诺别墅的门前，一段历史结束了。但这只是活着的墨索里尼的历史结束了，另一段历史却开始了，那就是他的阴魂。”在米兰，这些阴魂与法里纳奇（他与出身贵族的情妇在逃跑过程中被杀）以及斯塔拉切的阴魂又结合在了一起——斯塔拉切在米兰还有一些支持者，这些人还走上街头去宣传他的法西斯热情。游击队的目的地是位于伦巴第首府内中心火车站附近的罗雷托广场。这是一个很普通的郊外广场，它的一侧有许多加油站。今天，这些加油站已经看不到了，取代它们的是一座用来纪念当时抗击纳粹活动的锈迹斑斑的纪念碑。但是，喜爱吃快餐的游客可以坐在附近一家麦当劳快餐店的二楼，一边满足他们的食欲，一边俯瞰这一历史遗迹，并追思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些“真正的”胜利者。

我在这里并不是随意地提及罗雷托广场的。1944年8月10日的早上，作为对盟军的轰炸和空袭的报复，在德国的指挥下，15名被关押的游击队员被枪杀了。让当地人感到恐怖的是，这些游击队员的尸体被公开地暴露在罗雷托广场上——据说，一些有同情心的妇女还往他们的遗体上撒满了鲜花。不管是在公开还是在私下的场合，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当局都试图摆脱对这种野蛮暴行应付的责任。一个主要的官员还声称，这种公开的暴行只会对盟国有所帮助。除了在萨罗的所作所为之外，据说墨索里尼曾自言自语地说：“我们将会为发生在罗雷托广场的血案付出高昂的代价。”对于这种事后的辩护，我们不能只从其字面意思上去理解。当时纳粹是作为法西斯的朋友和盟友存在于米兰的，因此，对于纳粹这种对等的报复行动，墨索里尼和他的同事们是不会感到震惊的。不管怎样，罗雷托广场都不是纳粹施行公然的恐怖活动的唯一地点，但对于意大利人来说，他们有更多的理

由需要记住这个地方。

发生在罗雷托广场的第二次恐怖事件与第一次有所不同，从更多的意义上讲，它是一个“意大利”事件，而不是一个“德国”事件。4月29日凌晨，当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们还没有做出决定如何处理墨索里尼“神圣的遗体”时，那辆拉着墨索里尼和他的同事们的尸体的卡车就到达了米兰。那些来自科莫湖畔的游击队员们在这一问题上倒是更有主见，他们把这些尸体继续拉到了罗雷托广场上，并把他们扔在了广场上一排张贴电影和戏剧海报的广告栏前面。消息立刻就传开了，说这里有着更直接的娱乐活动。

这是一个春天的黎明，人们从附近同时往这里聚集。对于这些人们来说，他们的生活已经受到了战争的太多的破坏和影响。这一刻终于到来了，他们终于看到了墨索里尼暴政和战争的结束，看到了那些伟大的政治家以及墨索里尼这个独裁者的下场。墨索里尼的尸体原本是可以逃过一劫的，但是愤怒的人们不光诅咒了他们的这位前领导人，而且还往他的尸体上啐唾沫，并用棍棒甚至用手去猛击墨索里尼的尸体。据说，当地的妇女们还往他的尸体上撒尿。这下得以为1944年被处死的15名游击队员报仇雪恨了，并且从各个方面来讲，墨索里尼这个独裁者的结局都是羞辱的和不光彩的。当地人还把他的尸体放在他的情妇的尸体上，让他的手里握着一面类似国王节杖的法西斯三角旗，然后为他照了一张像。在这张照片上，他看起来像是一个死了的或者被废黜的国王，毫无希望但却毫不后悔地在手里抓着一根空的权杖。后来，有些怜悯心的人又把他的尸体倒挂在了加油站旁边。他的尸体上有多处伤口，头右侧的伤口尤其深，脑浆从这些伤口里流了出来。他的情妇克拉雷塔·佩塔奇的尸体被悬挂在他的尸体的旁边，这样她到死都可以陪伴她的贝尼托了。据说，一位“值得尊重的人”（也有人说是一位仁慈的牧师）还试图把她的裙子扎了起来——她是被倒挂着的，这样她就不会在喧闹而不依不饶的公众面前暴露得太多。

塞尔焦·卢扎托从道德的角度对这一令人恐怖的场景提出了批评，把它描述为“死亡的节日”，说它在意大利民众心目中留下了令人遗憾的负面影响。卢扎托从道德的角度来进行批判，这也符合了一个政党的路线。目前，比较保守的意大利历史学家在编写历史文献时有一种非意识形态化的倾向，这也更加符合我们当前所处的非意识形态化的世界，或者说在“历史结束后”更加符合未来的非意识形态化的世界。1945年，那些更有自知之明的前法西斯主义者同样也对民众中表现出的这种“可怕的暴行”感到忧虑。对于发生在罗雷托广场的事件，也有其他理解。有人认为，墨索里尼得到在罗雷托广场的这样一个下场也有它的合理性。墨索里尼这个出生在小村庄多维亚，又一路走过普雷达皮奥、弗利、米兰最终到达罗马的小男孩，最终又回到了米兰——这个位于伦巴第省的城市里，而他的兄弟也曾在这里工作并且最终也死在了这里。早在1914年前，这里就已经成为他的主

要的权力基础所在地了。这里的银行家和商人们在他需要的时候也曾帮助过他，但是，当他明显地输掉了战争的时候，他们又完全抛弃了他们的领袖。在1943年至1945年间，墨索里尼曾希望米兰能够成为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首都，这也许是因为那里的建筑物有点太德国化了，太容易让人回想起哈普斯堡皇室的统治，也太像特伦蒂诺那样能够让墨索里尼的灵魂得到满足的缘故吧。另一方面，这个城市离欧洲和巴黎更近，而那里可是墨索里尼年轻时曾经向往的大世界。罗马、非洲和其他地方现在都变成了幻觉，米兰是一个合适的地方，贝尼托·墨索里尼应当死在这里（或者说他的死应当在这里公之于众）。

但是，罗雷托广场上发生的事情也并不像卢扎托所认为的那样“不道德”。4月29日事件并不是罗马的威尼斯广场上的游行和演讲的重放。*墨索里尼遭遇的下场与历史上那些落败的暴君的下场没有什么两样。的确，民众的反应是激烈的甚至是暴力的，但是与法西斯政权对待他们、他们的家人以及所有的受害者的手段相比，民众还并不算特别残暴。还有一个更明显的对比案例，那就是希特勒最终死在柏林的堡垒里的下场。朱塞佩·普雷佐利尼一直就有曲解历史的本事，他在纽约一直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5月5日所写的日记中，他也对这些事情进行了评论。他认为，墨索里尼生前的保护人“希特勒死得还算有面子，并且还带着些神秘，与‘尼伯龙根之神’这一身份是相符的。墨索里尼却好像是死于酒馆里的一次争吵（对于墨索里尼是怎么死的还有争议），因此相比之下，希特勒的死好像是一个相反的例子。”当然，希特勒在死的时候还利用了火以及在战争中所使用的技术，有点像是“众神的毁灭”，只留下了他的牙齿作为让后人鉴别其身份的最确定的证据。墨索里尼的死法更加传统（因此他的遗体也更容易辨认），不是那么“现代”，对于他这样一个罪大恶极但还没有完全背叛人类的人来说，这种死法也是比较合适的。

此外，虽然罗雷托广场上的人们的暴力行为有些不光彩，但他们并不是唯一想拿墨索里尼的尸体出气的一群人。在罗雷托广场上被暴尸之后，墨索里尼的尸体又被运到了米兰大学的医院里。在那里，他的尸体被仁慈地进行了清洗和测量——墨索里尼死后的体重是72公斤，身高是1.66米。墨索里尼在死后也遭到了凌辱，他的尸体被解剖了，并且，按照美国军方的要求，他们的医生也参加了解剖过程。当时，即使是在米兰大学的医院里，尸体周围也有成群的意大利民众。美国医生还从墨索里尼的头里取了一些脑组织，并把它送回国内进行进一步检验。美国人确信墨索里尼是个“疯子”，并且相信墨索里尼的这种精神错乱是由于长期患梅毒而造成

* 卢扎托声称，罗雷托广场上发生的事件是耶稣受难和犹太人遭遇大屠杀的翻版。

的（美国的一些专家在“二战”期间曾对希特勒进行过缺席的心理分析，但是，他们迄今为止并没有对墨索里尼进行过类似的心理分析）。现在，他们打算借助医学科学来证明他们的假设的正确性了。

但是，美国很快就又投身到一场冷战中去了，墨索里尼也因此而没有理由继续成为他们的鬼神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对象了。不管怎样，这些专家们再次证明墨索里尼并没有染上梅毒，而单纯的科学也不能对他的政治行为做出解读。墨索里尼的脑组织在华盛顿的伊丽莎白精神病医院里被保存了多年，最终，可能是出于大扫除的需要，美国人不想要这个东西了。于是，1966年3月25日，墨索里尼的这部分脑组织被装在6个试管里，并被放在一个木制的盒子里，经由美国驻罗马大使交还给了拉凯莱。据称，木盒上还贴着英文标签，标明这是一个名叫墨索里尼的人的脑组织（标签把墨索里尼的名字“Mussolini”错拼成了“Mussolini”）。

除了被美国人带走的这部分脑组织以外，墨索里尼的尸体的其余部分被迅速地转移出了米兰大学的医院，并被匿名埋葬在了米兰城外的穆索科墓地里。坟墓的编号是384号，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任何标志。墨索里尼的家人当时就立即被驱散了，也不允许他们前来悼念。但是，墨索里尼的遗体并没有能够安静地躺在这个墓地里。1946年4月22日，一个名叫多梅尼科·莱奇西的法西斯怀旧分子和他的两个朋友在半夜里溜进了墓地，他们企图偷走墨索里尼的尸体。莱奇西自己也承认，作为一个盗墓者，他的技术并不怎么好。他们迷迷糊糊的直到凌晨两点半才找到墨索里尼的真实的墓葬。但是，墓里的土硬得像石头一样，非常难挖，而且挖起来声音还很大，他们花了一个半小时还多的时间才发现棺材。最终，莱奇西亲自跳进他们3人挖的洞里并撬开了棺材，墨索里尼那破损的头部露了出来，莱奇西认为，墨索里尼的表情是苦笑。这位前独裁者的尸体被裹在一条被单里，莱奇西费了好大劲才把它解开。墨索里尼的尸体还是很沉重——他们怎样才能把它运出开阔的墓地呢？天快亮的时候，他们才想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他们找到了一辆园丁使用的手推车来装运他们的宝贝。莱奇西回忆起了他当时的不安，因为当他们推着手推车沿着墓地的道路快跑的时候，领袖的脑袋从车的一侧垂了下来。当时，虔诚而狂热的莱奇西认为自己的行为就像是让耶稣复活一样，他还打算按照葬礼的顺序在墓葬周围庄重地走上几圈再离开。实际上，他们最后离开时相当仓促，当他们翻越墓地两米高的围墙时，一些皮肤和骨头还从墨索里尼已经腐烂的尸体上掉下来散落在墙边。莱奇西的帮手在翻越围墙时也不慎跌落在地上，尸体也掉下来落在了他身上。他们又尽全力收拾好墨索里尼的尸体，并把它放进了汽车的后备箱里，然后在晨曦中飞快地逃离了。临走前，他们还没有忘记在墓地留下了一些法西斯民主党的宣传材料——这是一个由莱奇西领导的小组织。另外，他们还发布了一篇新闻稿，题目是“穆索科墓地——死人长了翅膀”。确实，在“二战”后期，一位美国传教士就发现墨索里尼是反耶稣的，他也预料到了他

的复活，但是却没有人料到莱奇西会以这种方式让墨索里尼重见天日。

虽然作为盗墓者，莱奇西和他的朋友取得了不错的收获，但是他却注定不会崛起并取得权力。然而，尽管消失的只是墨索里尼的尸体，但这件事还是对意大利媒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媒体开始就未来将在6月2日举行的公民投票进行了热情的讨论，并且最终决定驱逐意大利王室，成立一个共和国。发生在1924年的马泰奥蒂被害事件又可笑地被重新提起，而马泰奥蒂的尸体的下落也成了公众讨论的话题。以警察为主的司法当局用了100天时间再次寻找他的尸体，而有关他尸体下落的谣言也传得越来越神。有些人相信，墨索里尼的尸体将会被放在罗马的“祖国祭坛”上以阻止纪念“二战”结束一周年的活动。“战后”，丘吉尔这个有魔力的名字常常与墨索里尼的名字相提并论，因此也有人担心是丘吉尔出于未知的原因为把墨索里尼的尸体偷运到了英吉利海峡那边。可以想见，警察把他们的对手估计得太高了，他们确信盗墓者肯定是死亡启示和医学方面的专家，并且明显得到了大量的资助。

虽然产生了这种错觉，但当局还是很快就发现了力量薄弱而且没有什么经验的法西斯民主党，并抓了一些人。公民投票的日期日益临近，并且历时也不会长，而他们现在却找不到墨索里尼的尸体。直到7月31日，莱奇西才在米兰落网，但他却死不承认自己曾经干过什么。最后，在8月11日，两名怀有法西斯式的同情心的牧师才出来承认曾经帮助藏匿过墨索里尼的尸体。这两人之中的一个名叫帕德雷·祖卡（他的名字很有意思，字面的意思是“父亲南瓜”），另一个名叫帕德雷·阿尔伯特·帕里尼，后者是萨罗地区主要的法西斯分子皮埃罗·帕里尼的兄弟。据他们交代，墨索里尼的尸体先是被运到了瓦尔泰利纳——这件事也满有讽刺意味，墨索里尼生前曾夸口说要把这个地方建成法西斯最后的堡垒，虽然有些迟到，但他现在还是最终来到了这个堡垒里。但是，尸体只在这里藏匿了几个星期，然后又被运回了米兰。在一些虔诚的神父的帮助下，他们把尸体藏在了圣安吉洛教堂里。之后的几周里，尸体又被送到了帕维亚的卡尔特修道院里，这个地方环境优美，是意大利最有名的宗教胜地之一。但是，优美的风景并不能防止尸体的腐化。这些人用塑料布把尸体包起来塞进一个箱子里，又把这个箱子藏在了卡尔特修道院一层一个修道士的房间的壁橱里。

塞尔焦·卢扎托是研究这些奇闻逸事的历史学家，他倾向于同情莱奇西。他认为，莱奇西是一个“真诚的人，真心地崇拜领袖并且投身新的法西斯主义事业。”意大利政府认为这件事只不过像是一个小男孩的恶作剧，卢扎托对意大利政府的这种反应很是不满。莱奇西只被轻描淡写地判了6个月的监禁，并且罪名还是制造假币（警察在突袭法西斯民主党时发现了一些假币），而对他盗取墨索里尼尸体的罪行却免于处罚。也许可以这样认为，当局的这种宽容是一种高超的技巧，是用一种嘲讽的态度处理了整个事件，而这种嘲讽也是这一事件应得的。死去的独

裁者可能还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盗尸事件并没有分散意大利政府的注意力，他们关注的还是通过公民投票成立一个共和国并开始一个新的政治进程，而这一进程也在之后的几十年里给亚平宁半岛上的人民带来了许多他们更加需要的改革。

当一个共和国的历史即将开始的时候，墨索里尼被重新埋葬了。这次是埋在了米兰郊外马焦雷湖边的嘉布遣会*小教堂里。根据天主教团体的建议，缺少了部分脑组织以及一些皮肤和骨头的墨索里尼的尸体按照基督教的仪式被埋葬了。此前，牧师祖卡和帕里尼两人在认为这种妥协的安排对墨索里尼来说还算是尊重之后，才说出了墨索里尼的尸体在帕维亚卡尔特修道院里的隐匿地点。**

另外，有关墨索里尼的尸体的传奇还有其他值得一提的故事。1957年，墨索里尼被最终移葬在了他的家乡普雷达皮奥的圣卡西亚诺墓地——拉凯莱又回到那里生活了。据她的崇敬者讲，拉凯莱还是很俭朴，喜欢为她的活下来的朋友和亲戚们煮豆粥喝。为墨索里尼完成最后一次移葬的是时任总理的基督教民主党人阿多尔·佐利， he 现在是佛罗伦萨的一个律师，也是一个天主教反法西斯主义者。更重要的是，佐利与拉凯莱是同乡，他还曾建议罗莎·玛尔托尼把她的儿子送到法恩扎的慈幼会去，并且也通过某种方式而成为墨索里尼一家的资助人。很自然地，阿多尔·佐利与普雷达皮奥地方当局和墨索里尼的家人都保持着联系。此外，普雷达皮奥当地年老的教区牧师在20世纪50年代初也在宣扬要体现出新的仁慈，这可能是促使佐利为墨索里尼移葬的另外一个原因。而普雷达皮奥这位仁慈的高级教士名叫唐·彼得罗·佐利，在第一次世界前曾在罗莎·玛尔托尼的学校里学习，并且还受到了照顾，而他对此也一直铭记在心。

这样说来就没有什么让人感到吃惊的了。1957年8月31日，阿多尔·佐利颁布了必要的政府许可令，允许通过一定的仪式把墨索里尼移葬在位于他的家乡的家族墓地。谈起这件事，一个英国官员评论说，“意大利极为尊重死者和失去亲人的家属，因此，就连共产党在对政府进行批评时也要谨慎地考虑考虑。”他又仁慈地补充说，不管怎样，“尽管墨索里尼对意大利这个国家犯下了罪行，但对领袖的怀念并没有再次在绝大多数意大利人中激起暴力情绪。如果人们记得他犯下的罪行的话，那么他们也会记得他早年取得的成绩，以及给予他的人民的那种属于一个国家的公民的感觉。”墨索里尼自己的精神可能不会这么容易就消失。虽然他在当政的时候就努力避免思考这一问题，但是也许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测，即

* 嘉布遣会，正式名称为嘉布遣小兄弟会，为天主教方济各会的一支，其会服附有尖顶风帽。

——作者注

** 在被短时间关押之后，两个牧师与其他移民一起被送到了南非。据莱奇西说，他们在那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作者注

如果这个独裁者是在当权的时候死的，那么他将会被埋葬在罗马一个豪华的坟墓里——罗马可是理想的国家心脏。也许罗马万国博览会可以在它的郊区提供一个合适的墓葬地——那儿已经建成了一个像纪念碑似的法西斯建筑。但是，领袖最终还是被葬在了圣卡西亚诺墓地，而他的具有讽刺意味的葬礼也在他的家乡和普雷达皮奥当地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墨索里尼命中注定不会终结于他自己建立的意大利罗马帝国，而他想在更广阔的世界里昂首阔步的野心也注定无法实现。

当然，在普雷达皮奥，很少有人这么认为。相反，在法西斯政权的统治下，他们的家乡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最重要的变化是市中心从山上移到了山下的拉比河边，也更加靠近多维亚村庄和墨索里尼的出生地。普雷达皮奥旧城还静静地躺在山坡上，那里还有它建在斜坡上的大致呈椭圆形的小广场、两个曾互相竞争的教堂以及刷成柔和色彩的房屋。新城则展现出一种不同的建筑风格，样式有更多的变化，并且带有更多的军事色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时候，普雷达皮奥新城就成为了一个朝圣地。新城的中心是一片柱廊，站在这里，满怀敬畏之情的法西斯参观者往东面能够看到墨索里尼一家的堡垒式住所卡米内特城堡；往西能看到旧的瓦拉诺校舍，那儿也是“领袖的出生地”，当然也是一个神圣的地方。这片神圣的核心区域同时也是一个平凡的市场所在地，一条名为“墨索里尼大街”的道路从中穿过，虽然并不像它的名字那样让人觉得很伟大，但它却是贯穿全镇的一条主要道路。在这条道路的南端也有一个广场，广场上矗立着一座宏伟但是又很难看的教堂：圣安东尼奥教堂。另外还有一个相当漂亮的塔状建筑：法西斯宫。在墨索里尼大街旁还有一个新的兵营（供墨索里尼的私人警卫住）、一所被命名为罗莎·玛尔托尼的新学校、一家医院以及一个新的银行（这个银行也许是最有用的）。在20世纪30年代，在河边一些比较平坦的地方还建了一个工厂来生产卡普罗尼战斗机。另外，周围亚平宁山脉上的一些小山丘还被推土机推平并修建了一个机场（但是，据说它的跑道上没有起飞过一架飞机）。几年前，繁荣的普雷达皮奥镇还被批准把相邻的非乌马纳合并过来——这无疑也是一次微缩的“国际政治事件”。

换句话说，法西斯政权的统治的确给普雷达皮奥带来了不少好处，虽然他们并没有用势不可当的方式来改变这里的面貌。相比之下，法西斯工会组织的领导人埃德蒙多·罗索尼对他的家乡——位于费拉拉特雷西加洛——的照顾就更加大方了。实际上，在普雷达皮奥及其方圆左近最有名望的并不是墨索里尼本人，而是拉凯莱。她是当地的“强硬人物”，因此最好不要得罪她。她是“拉凯莱夫人”，一个受人尊敬的女士，与其他许多她这样的人一样，她也充当别人的保护人，也许还曾寻求过非法所得。直到法西斯政权垮台，拉凯莱一直都讲当地方言，并没有理会当局的国民化的要求。1945年之后，她很快就又回到了普雷达皮奥，重新经营起了卡皮纳别墅附近的家族地产。她还曾经在卡米内特城堡附近开了一家小饭馆，并为她的顾客们提供当地的特色小吃：波伦亚风味的宽面条。

在后法西斯时期，普雷达皮奥还有许多其他具有讽刺意味的事。随着战争的结束，它很快就被左翼所控制。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父亲亚历山德罗·墨索里尼的精神战胜了儿子贝尼托·墨索里尼的精神。艾米利亚—罗马涅则更加典型，它成为了意大利共产党的一个据点。20世纪50年代，维托雷·奎雷尔这个对法西斯心怀同情的人在文章中还对此事表示悲伤，并且还有些夸张地宣布普雷达皮奥是“全意大利最穷、最落后、最让人悲哀和最破的城镇。”他还对战争结束时游击队对领袖出生地的洗劫感到悲痛，并对圣卡西亚诺墓地的被荒弃进行了谴责。但后来他也承认，墓地在之后确实被打扫干净了，并且重新成为了“罗马涅地区最浪漫的地点之一。”

奎雷尔还有一个主张，即普雷达皮奥有可能成为一个朝圣地和追思领袖的历史的地方，从而能够赚到游客更多的钱。他声称，游客们已经开始来到这里了，酒吧里也开始出现了法西斯怀旧情绪。许多人还到墨索里尼家族的地下坟墓参观，那里埋葬着墨索里尼的父母、阿纳尔多、布鲁诺及其妻子吉娜。事实上，唯一没有装饰法西斯徽章的就是吉娜·鲁贝蒂的坟墓，这也许是因为她于1946年5月死于意外的缘故。当时，她一个人在与一些英国官员划船游玩，结果船出了事故，于是就有了许多诽谤和猥亵性的传言。

奎雷尔还提到，可以在墨索里尼家族的墓室里放一个笔记本，这样，那些“地位卑微的人、士兵和法西斯”就能够在上面写下他们对于“这个已经落败并且死后连尸体也不得安宁的人”的崇敬。就在奎雷尔说这些话之后不久，他的隐含的希望就实现了——墨索里尼的遗体得以被转移过来与他的家人葬在了一起。然而，墨索里尼并没有从此而获得完全的安宁。1971年圣诞节的晚上，可能出于政治的动机，一颗神秘的炸弹在圣卡西亚诺的墓室门外爆炸了。此外，墨索里尼的家人发现，他们很难摆脱墨索里尼对他们的影响，并且，他们的生活既不幸也无法有所创新。患小儿麻痹症的安娜·玛丽亚也结婚了，但是在1968就去世了，也没有生育子女。她的姐姐埃达一直没有原谅父亲处死自己丈夫的行为，她在1945年以后也一直过着平凡的生活——有谣言说，她曾在利帕里附近的海里裸浴，这让一些法西斯纯粹主义者大为惊慌。埃达直到1995年才去世，但很长时间都受肾病的折磨，这也许是她饮酒的结果。她竟然眼看着自己的一个儿子加入了新的法西斯党派——“意大利社会运动”。她的这个儿子叫法布里齐奥，他还以这个新法西斯党派的党员身份参加了议会选举，但是没有成功。他当时不自在地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因为误会并为此付出代价的法西斯的儿子”。他在选举中遭遇的失败是可以预料到的，之后，他移民去了委内瑞拉。埃达的另一个儿子马尔齐奥在1974年死于酒精中毒。

墨索里尼的长子维托里奥·墨索里尼也在拉丁美洲待了多年。意大利人移民到那个地区已经有好几代人的历史，但是意大利政府在那里却没有太大的影

响。1946年12月，维托里奥借助梵蒂冈的渠道逃到了阿根廷。“二战”结束的时候，有许多前法西斯分子都是这样逃走的。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他受到了当地独裁者霍安·庇隆的热情欢迎。此人是墨索里尼的一个长期的崇拜者，1936年，当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获胜、墨索里尼宣布成立新的罗马帝国时，欢呼的人群中就有他，而他对此一直记忆犹新。后来，维托里奥还不时地回到意大利，经常是为了“维护”他自己作为一个士兵的“荣誉”以及他的家庭的“荣誉”。1968年，他再次回到意大利并且没有再离开。他的婚姻也破裂了，1979年10月拉凯莱死后，他成了墨索里尼家族的家长。

维托里奥的弟弟罗马诺在“战后”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一个爵士乐钢琴手，作为一个“雅利安人”法西斯独裁者的儿子，他的兴趣从政治上讲好像有点不合适。*也许是受到了那些追名逐利的记者的影响，他也像家族的其他成员一样出版了一些有关父亲的回忆录，但大多也是放在咖啡茶几上作摆设的那种书，内容平淡无奇。**更有助于他出名的还是他的婚姻。他的妻子是那不勒斯人玛丽亚·希科洛内，是著名演员索菲娅·罗兰的一个姐妹。但是，他最终也离婚了。他的女儿亚历山德拉·墨索里尼很上镜，1992年，她还真的成为了媒体的标题人物：她被选为意大利下院的议员。并且，在新千年里，她还连任了。当时，她是以“意大利社会运动”成员的身份参加选举并赢得胜利的。该组织的领导人詹弗兰科·菲尼后来宣布把该组织更名为民族联盟。詹弗兰科·菲尼是一个“后法西斯主义者”，2001年，他还担任了意大利的副总理。亚历山德拉·墨索里尼的政治观点有些摇摆不定，还在玩弄某种形式的法西斯女权运动。而民族联盟中的许多成员也都有家长制的观念，这对她在这一组织内的晋升是不利的。然而，她总是能够因为参加某些仪式或者活动而在媒体的封面上露脸——通常都是在普雷达皮奥的圣安东尼奥“法西斯”教堂参加婚礼、洗礼或者是纪念活动。此外，她还努力维持自己的声望，声称自己是祖父的一个“真正的信仰者”。她会很有特色地对访问她的人说：“人们称呼我墨索里尼，我的身份非常清楚……人们爱我或者恨我。”事实上，她的这番话并没有表达出什么清楚的含意，但是，就媒体而言，亚历山德拉确实是新一代的墨索里尼。另外，亚历山德拉还把她的第二个女儿起名为克拉丽洛·贝尼塔，她的意图很明显，那就是希望自己以后的几代人都能够从精神上与领袖有所联系。

事实证明，奎雷尔对普雷达皮奥的旅游前景的设想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正确的。另一方面，意大利的左翼政府也一直在努力避免使墨索里尼的家乡成为宣扬法西斯

* 据说当初他的父亲就不赞成他的兴趣。

——作者注

** 维托里奥·墨索里尼还为他代笔写了一些粗词滥造的回忆录。

——作者注

神话的中心。不管怎样，今天的游客还能够看到那里的一些建筑、墨索里尼家族的墓室和那个笔记本——据说，这个笔记本每隔6周就要换一个的，因为本子上很快就会写满对墨索里尼的崇拜和尊敬之辞，以及要求立即让他的理论和观点复苏的希望之辞。为了进一步营造气氛，在墨索里尼的墓室里还摆上了一尊他凝神皱眉的大理石半身雕像。此外，那里还摆放着他的黑衬衫和一只军靴（另外一只可能是在1946年尸体被盗时弄丢的）等遗物，以此来让人们回忆起他的战斗精神。那里还有一个祭坛，上面还带有墨索里尼很有特色的“M”签名——这个签名曾经是墨索里尼浏览一些官样文章之后使用的。镇上还有4家卖纪念品的商店，法西斯的怀旧者们可以从这里买到很便宜的文化衫、仿真武器、墨索里尼（以及他的直系后裔，意大利社会运动和民族联盟的领导人）的小塑像和各种明信片。普雷达皮奥当局为了更好地唤起人们对墨索里尼这个本地最有名的人物的回忆，还打算建一个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的“遗产”纪念馆，这可能就是建“法西斯宫”的初衷。但是他们也担心，这样做会太轻易地把那段历史变成庆典活动从而臭名昭著。但是，在普雷达皮奥的街道上，贝尼托·墨索里尼的阴魂从来都没有散去。

毫无疑问，墨索里尼的尸体一直在坟墓里不停地腐化，但是他的精神呢？法西斯主义和人们对法西斯统治的整体记忆又怎样呢？法西斯主义对意大利共和国的影响到底有多深呢？在1945年之后，从某种意义上讲，墨索里尼的灵魂是否还在继续前进呢？

从政治上讲，这些问题的答案很明显是肯定的。不管是在西德、东德还是奥地利，他们都在尽全力回避和隐藏纳粹无处不在的影响，但法西斯势力在意大利的活动却是明目张胆。甚至早在1944年，以广播喜剧演员兼记者古列尔莫·詹尼尼为领导的“人人党”（这个名字很有趣）的旗下就聚集了一帮旧政权的同情者，特别是在罗马和意大利南部。他们的口号是“打倒一切”。不久之后，詹尼尼在政治上就被精明而无情的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帕尔米罗·陶里亚蒂摧毁了。但是没过多久，在1946年12月26日，意大利社会运动就成立了，为首的是阿图罗·米凯利尼。意大利当时已经有禁止再次组建法西斯党的相关法律，但“社会运动”这个名字的间接性足以使其避开相关的法律规定。知道内情的人都很清楚，意大利社会运动“实际上”代表的是“墨索里尼永垂不朽”*——墨索里尼活着的时候，肯定会指出后一句话中同义重复的错误的。**

意大利社会运动在意大利的多党制政体中很快就占有了一席之地，在全国大

* 在意大利语中，这两句话的首字母缩写都是“MSI”。

——作者注

** 后一句话是硬造出来的，意思有些重复，直译是“墨索里尼永远永垂不朽”。

——作者注

选中通常能够排名第四，排在天主教民主党、意大利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后面。尽管在各个大区的情况有所不同，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新的法西斯政党都能够获得8%的选票。像议会中其他党派一样，意大利社会运动内部也分成了不同的派系。在这个党的历史上，温和派和强硬派之间也在不停地争论。温和派主张通过一些“转化”而进入共和体系，但强硬派却坚决反对妥协。

在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焦尔焦·阿尔米兰特一直担任该党的领导人。他以前曾是呆板的反犹太主义刊物《捍卫种族》的一个撰稿人，也曾在萨罗政权中任职，在政治上常常见风使舵。但是有一点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即他对一些思想保守的新法西斯主义的哲学家是持支持和鼓励态度的，比如他在《捍卫种族》时的同事尤利乌斯·埃沃拉。此外，这个党的右翼派别中还有一群恐怖分子。他们的恐怖行动继续在意大利共和国的历史上留下了伤疤，最悲惨的一次恐怖活动是他们于1969年12月在米兰的丰塔纳广场制造的爆炸案。此外，1974年5月，他们还在布雷西亚的德拉洛基亚广场制造了爆炸，并且还多次破坏佛罗伦萨和博洛尼亚之间的铁路线。他们的恐怖活动在1980年8月达到了顶点，在博洛尼亚火车站恐怖事件中，有80多人遇难。

在罗马、米兰等城市的一些城区和大学校园里，恐怖主义活动也很普遍。尤其是在1968年政治剧变之后的那段时期，一些“禁区”内常有法西斯暴徒在游荡。在意大利的年轻人中也有法西斯主义的遗毒，但是目前的表现形式却有很大不同，足球迷们就经常打着法西斯的旗帜来展现他们的男子气概。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年轻人把挥舞法西斯主义的旗帜当成是真正激进的姿态表现，是在统一的社会秩序中唯一能够展现“多样化”的一种政治立场，甚至把它当做是一种国家原教旨主义。另外，在意大利南部的许多地区（也是意大利社会运动最大的选举根据地），以及在散布于全世界的意大利移民社团中，很长时间以来都存在着不同形式的对旧的法西斯政权的怀旧情绪。例如，在澳大利亚，极端的法西斯主义者弗朗哥·巴蒂斯特萨就夸口说自己已经在印度的孟买成立了第一个法西斯组织。在“意大利人社团”这个组织中，他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物。“意大利人社团”这个组织还一度主张再办一份《意大利人民报》。*

不管是国内的人还是那些移民，他们的教育程度相对都不是很高，对法西斯主义多是出于一种感性的认识。正如塞尔焦·卢扎托所说的那样，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那些通俗文化迷们喜欢阅读的主要是一些低级趣味的杂志，而这些杂志也更喜欢刊登一些怀念法西斯统治秩序的通俗历史，对墨索里尼这个“强人”也肯

* 他们在这里没有使用墨索里尼当年办报纸时用的名字，即没有使用“Popolo”（人民）一词，而是用了“Gente”（人民）这个词，后者的意思要比前者的意思含糊一些。

定有一种怀旧的情绪。*例如,后来变得比较独立和极端保守的前法西斯主义记者因德罗·蒙塔内利就以这些主题写了一系列的叙述性作品,从而满足了这一部分民众的胃口。

影响更大的是,在特务部门和商业界,实际上是在统治精英中所有半隐蔽的部门内,包括在那些受到美国使馆保佑的人中间,这种残余的对法西斯主义的渴望都没有被彻底根除。而反共产主义、反法西斯主义和其他一些形式的法西斯主义也并不是很容易就能够梳理清楚的。1964年和1970年,这些右翼势力还曾计划发动政变,也有一些推翻意大利共和国的阴谋。此外,这些“院外”集团总是与国际势力有着一些联系,例如南美洲的一些独裁者、南非的种族隔离者、佛朗哥、萨拉查和希腊的一些势力。总之,不管来自什么地方,他们都是些反民主的势力。

唯一的问题是,墨索里尼的阴魂能否因为出现这种新法西斯主义而得到好评。有关墨索里尼的回忆录通常都很混杂。像尤利乌斯·埃沃拉这样有自知之明的深刻的思想家比较喜欢罗马尼亚人科尔内留·科德雷亚努,后者是“天使迈克尔军团”的领袖,后被谋杀,但是留下了大量带有模糊和神秘色彩的作品。另外,与当政者们通常表现出的妥协态度相比,他在言辞上也显得非常极端。新法西斯主义者还不至于没脑筋到把这些话写在纸上,但是他们中有很多人相对来说更偏爱希特勒和德国右翼所取得的那些令人恐怖的瓦格纳式的“成功”,而不是墨索里尼式的令人有些怀疑的极权主义。意大利在“二战”中遭遇的让人感到羞辱的惨败是一个沉重但又无法否认和克服的“遗产”。

但是,墨索里尼的狂热者们还是一次又一次地现身。20世纪60年代,新法西斯主义知识分子贾诺·阿卡梅就曾在罗马以“右翼文化在罗马的汇聚”为题组织了一系列的讲座。在发表讲座的人之中有一个美国政治学家:A.J.格雷戈尔,他当时是英国唯一从根本上重视墨索里尼思想的学者。意大利社会运动所倚重的另一个人是出版商乔瓦尼·沃尔佩,他是法西斯政权中最有名的历史学家焦阿基诺·沃尔佩的儿子。1945年之后,老沃尔佩这个知识分子没做出多大的努力就更更换了自己的政治外衣。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当年法西斯政权的重要人物博塔伊的儿子布鲁诺·博塔伊已经成为了意大利的外交部长,而“德费利切学校”也非常重视与他的关系,他们以前对法西斯主义的那种强烈的谴责现在也温和了不少。

然而,在讲英语的国家里,墨索里尼的名声仍然很差。一个又一个历史学家都把他当成一个玩笑来写。A.J.P.泰勒是他所处那一代人中最杰出的历史作家,他在谈到法西斯主义时语出惊人:

* 卢扎托认为这种文化是“支配性的”,并且值得赞扬的是,它的繁荣并没有得到国家的补贴。

“法西斯主义从来都没有像国家社会主义那样残忍的动机,更不用说物质的力量了。从道德上讲,它也是腐化的——或者就其欺骗性来讲更是如此。法西斯主义的一切东西都只是一个骗局。它声称意大利解除了危机,但实际上是一个骗局;它夺取权力的方法也是一个骗局;墨索里尼自己的能力和政策也带有欺骗性;法西斯的统治是腐化的、无能的和空洞的;墨索里尼本人也是一个自负而笨拙的吹牛家,并且没有什么思想和目标。”

一些意大利历史学家认为,他的这番话是对意大利一代人的历史的一种武断的贬低,是一种草率和武断的行为,但这也没有什么让人感到惊奇的。20世纪60年代,伦佐·德费利切就在为墨索里尼所写的传记中为其正名了,即使谈不上是一个支持和拥护者,他也可以说是一个捍卫者。在之后的一些作品里,这位意大利历史学家越来越倾向于相信墨索里尼所取得的功绩及其理论了。另外,在意大利国内也有人对德费利切的作品随声附和了。在20世纪80年代,阿卡梅和德费利切合作组织了一系列展览,而为展览提供资助的是时任总理的社会党人贝蒂诺·克拉克西。这一点也突出地显示出了法西斯主义活跃的特性,同样,法西斯主义的一些纪念品也反映出了这种特性。他们忽视了战争、暴政和惨败。同时,美国也有一些专家开始转而成为德费利切的支持者了。他们也许是受到自己所在的移民“社团”的影响,也许是意识到了他们的“根”,所以对泰勒及其朋友对法西斯主义的讽刺挖苦很是不喜欢。*

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内,涉及历史事件时也有“非政治化”的倾向。20世纪90年代,相当多的意大利历史学家甚至是许多权威专家都开始研究这样一个奇怪的问题,即为什么当年对意大利民众的国民化进程没有获得成功?在就这一问题进行研究调查时,他们通常的目标是“一些政党”,但实际上他们所指的常常是共和政体下的意大利共产党。他们的调查集中在意大利左翼的缺点和不足上,这样也反过来给法西斯主义增加了一些光彩。一些评论家,包括临死之前的德费利切都持这样的态度,即他们承认法西斯政权的确有它的缺点和不足,但是,它的这些缺点和不足是否比现在的意大利共和国还要多呢?

最为重要的是,新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政治尤其喜欢与过去“和解”。20世纪90年代成了为父辈的罪孽“道歉”的10年,但是这种“道歉”通常都是以最轻描淡写的方式,而很少试图严肃地去调查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那些让人真心感到悔恨的罪恶。在意大利,与这一过程相伴而来的还有对法西斯独裁历史的“非意识形态化”,以及对历史上较近的一些历史事件的“非道德化”。法西斯主义和

* 在英国也有这样的人,比如理查德·兰姆。

反法西斯主义之间的争论现在常常被描绘为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热情，但是比较聪明的人能够很容易地看出双方都存在的缺点和错误。无论是法西斯主义者还是反法西斯主义者，他们都杀过意大利人，所以从道德上是无法对他们进行区分的。不管怎样，历史和遗产都被放进了信息娱乐片这同一口熔锅里了。在这一锅浑水里，法西斯主义的优势是因为它做出了一些让步而看起来多了一些吸引力，比如它已经没有以前的游行和军装；与那些信奉“客户至上主义”的人相比，它的宣传工作是有些软弱无力，但却仍然保持着活力。许多所谓“文化学者”的历史学家很喜欢对他们所发现的独裁政体的各个领域内“有重要意义的部分”进行“浓墨重彩的描述”，这种情况在美国尤为常见。他们这么做，如果不全是为了满足读者，也是为了自娱自乐。

墨索里尼本人也是被这些“文化学者”们作为一个处于基础地位的对象来描述的，因为这些人通常认为自己是在从根本上来描写这段历史的。另外，这些学者是基于他们自己目前并没有什么权力这样一个现实来写的，所以他们也认为没有必要去描述墨索里尼过去的权力历程，在这些人看来，墨索里尼是曾经拥有权力的人。当历史成为被用来描述而不是被用来分析的对象的时候，又有谁会在意呢？总而言之，与法西斯的历史进行“和解”对墨索里尼是有好处的。总是面对令人尴尬的问题的时代结束了。早在20世纪80年代，墨索里尼昂首阔步富有男子气概的形象就被用来为威尼斯的高级宾馆“益精饭店”做广告了。广告的标题醒目地说明，任何入住的顾客都可以享受到它的舒适的服务，因为他们的宗旨是，“顾客永远是对的”。1998年年，一个意大利犯罪小说作家决定写一部有关当年墨索里尼遇刺事件的纪实小说，并且还为其起了一个很吸引人的题目：《墨索里尼的鼻子》。一个英国的犯罪小说作家对墨索里尼可就没有这么尊重了，他早就在他的一部作品中刻画了一个名叫贝尼托·墨索里尼的人物，但这个墨索里尼可是一个摄影师、一个敲诈勒索者和一个谋杀的牺牲品，并且还没有他的宠物猴子聪明。在这种氛围内，其他人描述的墨索里尼的形象就可想而知了。把墨索里尼描述成一个凡人可能与他有些不符，但毕竟还不至于让人讨厌，如果对他的人生进行更为严格的分析的话，可能还会产生对他更加不利的结论。

当墨索里尼那么自负地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时，他可能不会想到自己会被用作广告人物。但是，在新千年里，他的一些理论看来又是明显错误的。在我们这个自由主义的时代，法西斯所施行的独裁和专制肯定会被当做是根本错误的经济学。法西斯当政时盛行的意大利民族主义从来都没有能够保证意大利成为一个强国，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测验”中也遭遇了彻底的失败，而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里，它就更显得过时而落后于时代潮流了。今天，欧洲看起来也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而拥护意大利融入欧洲的意大利人也比主张民族化的人要多得多，因此，法西斯主义者希望把民众民族化的企图同样也是走向了一个错误的方

向。更为明显的一点是，在从大约是墨索里尼出生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这段时间里，意大利已经不再是一个可靠的人才、财富和教化的中心了。正如墨索里尼自己以前的观点那样，法西斯认为一个国家的一个大敌是社会主义者的民主，但是现在看来，这个敌人可能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现在，跨国公司拥有的霸权是如此牢固而不可挑战，他们以提供“信息”为由而进行的宣传也是如此具有渗透性，相比之下，法西斯宣扬要建立一个无所不在的极权主义国家听起来的确是有些古怪。

墨索里尼过去常常夸口说法西斯主义是20世纪的意识形态。他的众多的崇拜者和政治上的同路人，从希特勒到佛朗哥，再到教皇庇护十二世、庇隆以及其他“战后”一些国家的领导人，都曾一度明显地认同他的这种观点。另外，即使是在意大利，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新的法西斯主义在1945年之后也绝对没有销声匿迹。在经历了两代人的时间之后，虽然偶尔也浮现出像海德尔、勒·彭斯和菲尼这样的人物，但是历史最终证明墨索里尼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在我们现在这样一个时代的世界秩序下，极右势力要想长期生存或者想有较大的影响，唯一的方法是调整自己以适应全球化的资本主义，而这就需要淡化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减少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段时间里遗留下来的一些残余的思想，如社团主义、专制主义、反犹太主义以及其他形式的种族主义理论、帝国理论、战争和富于侵入性的“极权主义”国家的理论。在特定的地点和特定的情景下，极右翼势力和市场化潮流之间也会达成一些交易，这与历史上的一些输家在绝望之余纵容民族主义者和其他形式的原教旨主义是一样的道理。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其结果都不会顺理成章地是法西斯主义。回归福利主义（至少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团有这种渴望）的渴望、恃强凌弱的宗法主义、主张对邻国资源进行贪婪掠夺的思想（那些已经拥有财富的人尤其有这种想法）、信奉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由他人的成功引发的连锁而又矛盾的嫉妒的思想、希望通过战争和战争以外的手段进行无情的杀戮的愿望、纯粹的种族主义（特别是针对黑人、“斯拉夫人”和阿拉伯人，但又扩展到犹太人）、想剥夺工会权力的思想（或者想把这种权力导向某些社会集团的利益），以及喜欢虚假宣传的思想等，所有这些理论和思想都可能生存并且发展繁荣。但是，我们不应当再继续认为它们等同于“法西斯威胁”。同样，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现在也应当被认为是一个特定时期的一个特有的现象。虽然久未消失，但它只是花言巧语地宣扬一种不可信的“第三条路”。它与市场化是背道而驰的，仍然带有一些法西斯的特点，而这也正是鼓吹这条路的人所努力地有意忽视和否认的。

如果墨索里尼的理论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中，那他也许就算不上一个政治家了。他曾经试图表现出自己是一个知识最渊博的人，而今天的领导人同样也时不时地炫耀一下他们不太可信的知识。如果墨索里尼自己的声望没有让他感到高兴而只

是让他对女人、朋友、家庭和国家都持一种愤世嫉俗的态度的话，那么他的后来者也会像他一样，在拼命攫取权力之后才最终发现它只是一场空。的确，墨索里尼自己也积极参加了对他的感召力进行神化的过程，而这也可能为他开辟了一条通向当时的“旋转的”世界的路。在这个世界里，对任何贤明的领导人来说，最后的或者最具破坏力的野心就是有自知之明。墨索里尼式的平民主义——他所谓的对运动的喜爱，他与范围广泛的群体以及外国崇拜者的打成一片（更多是在办公室以外），甚至他在公众场合擦汗的做法——在他死后都有成为正常现象的趋势，但在他那个年代却是不寻常的。我们可能并不清楚墨索里尼在多大程度上相信事物的表象，但是他经常表现出他是相信它的，或者说还是相信为好。作为一个偶像，墨索里尼的确可以因为后来者而感到自豪。

总而言之，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墨索里尼这个人“虽然如此”，但只是一个反映了他的性别、阶级、地区和国家情况的人。当然，他是一个暴君，但是还没有罪大恶极到需要在历史上把他打入并冻结在但丁所描述的地狱的最底层的地步。也许让他感到更为沮丧的是，墨索里尼的故事实际上是一个不错的、情节激烈的故事，并且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对于意大利人和欧洲人都有着特定的历史意义，但是作为一个持久的遗产来说，它还是比较肤浅的。我们对其进行最后的分析，贝尼托·阿米卡尔·安德烈亚·墨索里尼的问题在于，尽管他对权力有着强烈的渴求，但他也只不过是一个来自农村的野心勃勃的知识分子。他相信他的意志是最为重要的，并且，像其他一些人一样，他认为自己是一个领袖，能够领导像意大利这样的一个国家走向一种特殊类型的现代化。他的宣传家们也鼓吹说他是永远正确的。然而，在有关人性的最深层的问题上，除了个别例外的情况以外，他都是错误的。